

張建成 著

# 歲月留痕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親歷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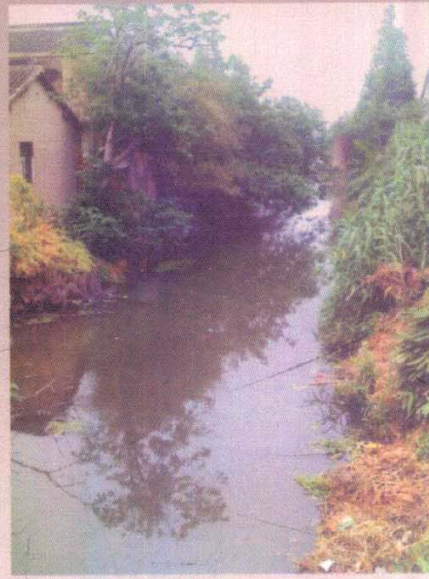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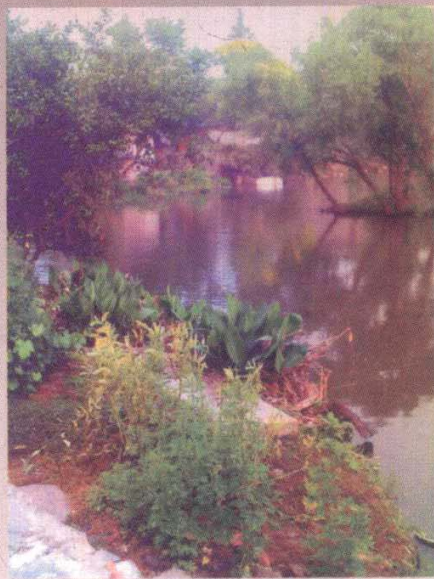
文化傳播出版社



責任編輯：鍾 逸

封面設計：世 慧

書名題簽：王紹良



9 789881 635013

定價：1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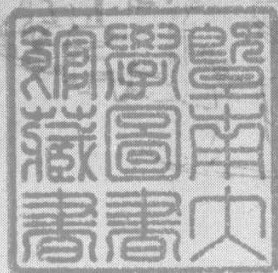


港台書

●張建成 著

# 歲月留痕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親歷記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數據

歲月留痕——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親歷記/張建成著.

—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4.6

ISBN978—988—16350—1—3

I.①歲… II.①張… III.文革—回憶—武漢

歲月留痕——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親歷記

張建成 著

責任編輯:鍾 逸

封面設計:世 慧

封面題簽:王紹良

開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張:31.5

字數:453 千字

印數:1—500

ISBN 978—988—16350—1—3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4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14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33號豐盈工貿中心5字樓G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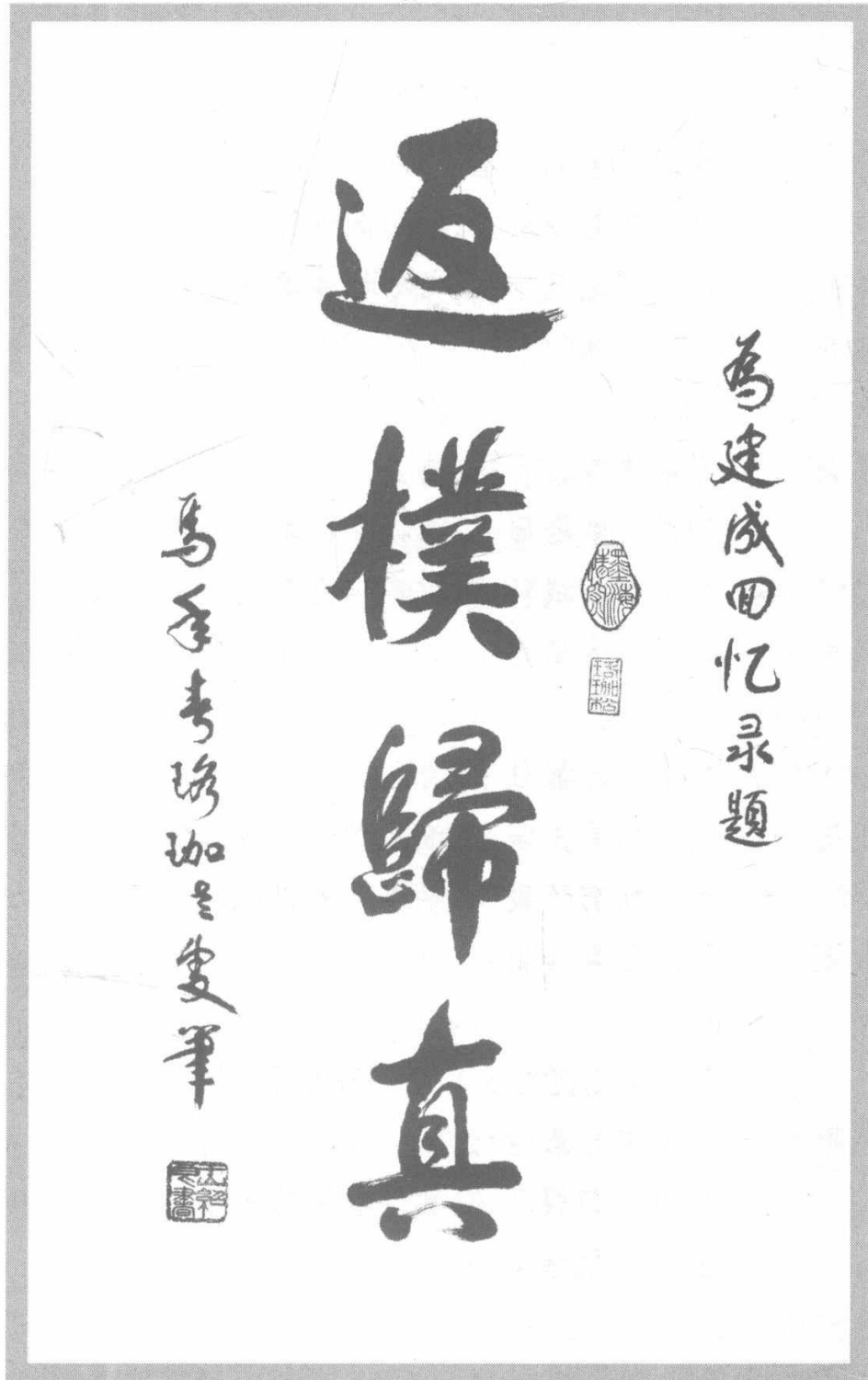
Tel: 00852—39216033

Fax: 00852—25285333

定價:128.00 元



王紹良題字



作者注：王紹良，武漢大學教授，著名水利志專家、學者。現任《水電與新能源》期刊主編。



# 贈建成兄詩四首

吳冠英

(一)

與君共事六年整，相知互信五十春。  
品德才智令敬重，教誨關愛銘記心。  
南北迢迢三千里，心心相印莫逆情。  
今秋江城敘往事，明日塞上話人生。

(二)

君品高潔待人誠，為國為民忠心耿。  
滿腔正氣顯風骨，嚴以律己兩袖清。  
執着果斷成竹胸，處事認真且公正。  
平易近人廣交友，虛懷若谷受人尊。

(三)

歷史洪流掀狂潮，身不由己趕潮人。  
憑心所為主義真，潮起潮落犧牲品。  
一無所有不喪志，融入社會再啟程。  
步履艱難雄風在，為酬壯志搏終生。

(四)

青春年華何處尋？古稀蒼發聚江城。  
久別喜逢激情燃，抱膝傾吐故友情。  
年近八旬親迎送，莫逆溫情感人深。  
盛宴歡聚頻舉杯，互祝健康享天倫。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作者注：吳冠英，江西人，一九三八年出生。湖北大學法律系畢業，分配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任院團委宣傳部長。一九七一年調寧夏回族自治區農墾局渠口農場工作，後調自治區農墾局任副局長，直至退休。二〇一三年十月來漢相聚，有感而發，寫詩四首相贈。將其收錄，以資紀念。



# 文化大革命是彰顯黨閥和學閥 醜惡靈魂的照妖鏡

老 田

用過多的謊言編撰文革史，從長期看來，消極後果越來越嚴重。每一部親歷者回憶錄的出版，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不管其政治傾向如何，在客觀上都構成對黨閥學閥聯手編撰的“謊言文革史”進行一次反駁和證偽，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下稱“水院”）張建成老師的回憶錄《歲月留痕》就是這樣一部很有分量的證偽著作。

老田曾經為學習文革這一段歷史，對張老師訪談過好幾次，一度自以為對於水院的文革有了相當的瞭解。這一次拿到張老師的回憶錄《歲月留痕》書稿，先後讀了三遍，仍然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水院的六次權力結構變化與文革運動起落的關係：每一次權力結構的變化都引起其後的運動走向變化。與許多高官回憶錄相比，更難能可貴的是，張老師沒有攬功諉過，而是嚴于解剖自己，對文革為什麼失敗和自己的不足做了深刻的反思，甚至還就自己在改革時代“落伍”做了自我批評。

## 一、文革十年水院權力結構的六次變化

在水院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間，主導文革的權力結構先後發生了六次變化，可以由此劃分出段落分明的六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省委工作組（隊）和黨委聯合領導。

這一階段時間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月，湖北省委先後兩次派出李鳳翔和劉真帶領工作組（隊）進駐水院。工作組和院黨委共同商定的文革運動是按照反右派的模式進行的，在學校師生中間進行左中右排隊，還秘密召開所謂的“六一三左派會議”，發動一部分學生搜

集材料，把另外一部分學生打成右派。

在文革的第一階段，水院的運動與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截然相反，不是向上指向當權派，而是向下橫掃：“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九月，基本上是先由黨委領導，後由工作組、黨委共同領導，矛頭向下大揭大批，然後是省委工作隊黨委領導反右派，最後由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破四舊、抓‘南下一小撮’，這些都是由湖北省委領導的、有組織的運動群眾。”（引自張建成《歲月留痕》，以下引文凡未註明者均引自該書）

這一階段的成果是：“工作隊進院有效時間約 50 天（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這 50 天裏，工作隊與院黨委一起，主要工作是抓師生員工中的右派，從摸底排隊，發動揭、批以引蛇出洞，直到全面反右，其結果在水院整死 2 人，抓 1 人，院重點批鬥 4 人，各系、各部門點名批判一百多人。”其中“張庭英老師割腕自殺身亡，羅守琳老師跳江自盡，有個學生被說成‘精神分裂’，關到了武漢精神病醫院。”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毛澤東決策撤銷工作組，水院在張蕪承等人的操縱之下先是成立了文革委員會，然後又成立了保守派組織“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繼續體現省委和院黨委的運動意圖，違反法律和黨紀大搞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我院紅衛兵在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對院內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進行了大規模的抄家活動，這時出面抄家的紅衛兵是官辦的，由院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

不管是開始的“左中右排隊”還是隨後的“反擊右派”、乃至於後來的抄家運動，以及在省委指導下的“驅趕南下一小撮”，都與中央公開的指導性政策沒有關係。

第二個時期：造反派形成并逐步掌握主導權。

從水院的文革時間可以看出，造反派之所以產生，以及造反派與保守派對立的形勢和內容，都內在地與當權派的倒行逆施有關。正是在省委和院黨委領導運動的過程當中，產生了一個明顯的附帶後



果——給自己製造了一個堅定的對立面：“在廣大師生中造成了派別差異，工作隊封了一批左派、鬥了一批右派，這為在以後的運動中形成派系鬥爭、特別是革與保的鬥爭播下了罪惡的種子。”在後來發起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過程中間：“造反派把矛頭指向了省委、院黨委及省委工作隊黨委的當權派，而以文化革命委員會為代表的多數派則堅定地站在當權派一邊，反對和阻止造反派的一切行動。於是，形成了群眾中革與保的兩派鬥爭。”

造反派的形成和壯大，肇始于對水院當權派“左派會議”安排的質疑，在七月遭到反擊之後處于低潮，撤銷工作組之後丁家顯等開始寫出公開信表示不同意見。北京南下學生的支持和到北京串聯受到的鼓勵，是少數派壯大的轉捩點，後來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公布“黑材料”以及為那些受打擊的同學平反等關鍵環節，揭露和批判當權派的倒行逆施，爭取到絕大多數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少數派已經成為水院的多數，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

從水院的文革實踐看，造反派特別是造反派的中堅分子——老造反派——主要不是回應毛主席號召或者中央政策指示而造反的，而是作為省委和院黨委所引導的倒行逆施的批評者身份出場的，換句話說，造反派是反對文革的當權派“反向動員”出來的。如果沒有當權派和保守派的倒行逆施和不得人心，就沒有老造反派的強烈批判意識；如果不是當權派對批評意見的殘酷打擊，就沒有造反派發誓要與這一撥勢力“血戰到底”的堅定性。

當權派在水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間的強烈批判意識，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的“六一八事件”就是這種批判意識的體現。隨後，以張芾承為代表的當權派，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在取得省委書記許道琦的同意之後，還在七月份部署“反擊”，作為這個反擊部署的步驟之一是：捏造罪名構陷大三學生郭明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參加北京國慶活動回校以後，少數派幹了三件



事：一是出一批大字報，介紹中央領導講話，介紹北京運動情況。二是組織召開批判資反路線誓師大會。三是召開北京文化大革命情況介紹會。這三件事就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使少數派獲得了群眾的好感與信任，取得了運動的主動權。而多數派的領導人回校後無所作為，在等待省委的指示，脫離了群眾，陷入了被動”。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張萑承等人拒不按照中央文件要求把黑材料交回給群眾，而是在行政大樓偷偷處理，試圖燒掉，結果被丁家顯為首的造反派得知并搶出來公布于眾，“這對院黨委、各總支來講則是致命的一擊。黑材料是黨委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的鐵證，從而也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鐵證”。

“從參加北京國慶活動返校到十二月底，經過三個月的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揭露院黨委、工作隊黨委整革命群眾的黑材料及‘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執行資反路線的事實，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復復的一系列事件，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什麼叫鎮壓群眾運動，什麼叫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什麼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什麼叫兩條路線的鬥爭。一系列的事實使大家具體地看到了，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從而教育了廣大群眾。”

水院文革早期，造反派所做的事情，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讓全院師生看到了當權派是如何倒行逆施的，他們的行為不僅不符合中央政策、違反法律，而且以張萑承、李喜爾為首的權貴所操控的野蠻抄家和殘酷迫害，已經到了令人髮指、泯滅人性的地步，一向緊跟當權派的保守派也沒有辦法有效地為他們辯護，結果是人心離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造反派才取得了優勢。等到一九六六年冬天，水院中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參加了造反派組織，保守派組織趨于瓦解，形勢變化不利于當權派。“保守派的‘大學校’從組織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轉到了造反派一邊。原來堅定的人，也開始懷疑省委、黨委中一些人言論、行動的正確性，于是開始逍遙起來了。‘大學校’已

經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員會也在鬥爭中靠邊站了，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隊伍壯大了，在鬥爭中組成了各種兵團，相互支持，形成了有戰鬥力的組織，掌握着運動的大方向、主導權，控制了學校的宣傳陣地（廣播臺與院刊）。造反派已經在政治上、組織上、宣傳上都處于主導、主動的地位。”

第三個時期：軍隊支左并且鎮壓佔優勢的造反派力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軍隊支左之後情況大變：“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經過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拼搏後，形勢一片大好。但在武漢軍區介入後，形勢急轉直下。”“從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開始到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漫長的五個月中，他們取締工人總部，大肆抓人，壓迫二司、九一三，分化造反派隊伍，拉一派打一派；扶持百萬雄師，對造反派實行武力清剿，實行白色恐怖；公然抗拒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發動‘七二〇’兵變，扣押毆打中央代表……。”一份官方編撰的黨史，曬出了百萬雄師部分的殺人成績單：“據不完全統計，6月份僅武漢市就在武鬥中打死108人，打傷2774人。”<sup>①</sup>水院較為幸運，在百萬雄師的武力圍剿期間，僅有總部勤務組成員嚴菊明、動態組鍾光超老師等七人被長矛刺傷。

如果說一九六六年文革早期是省市黨委和各單位黨委的表演時間——在公眾面前表演他們放肆地踐踏政策和法律的話，顯然一九六七年元月底“軍隊支左”之後，就成了軍隊當權派的表演時間了，這一次的表演除了踐踏政策和法律之外，還要加上殘暴的鎮壓場景和野蠻的殺人情節。文革到了這個階段之後，所有的當權派群體都獲得了表演機會，反過來，民眾也獲得深度觀察和識別當權派的機會。

第四個時期：革委會成立和派性分裂。

經過各個組織的協商，水院革委會由37人組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水院革委會成立。在革委會成員協商過程中間，已經有了

---

<sup>①</sup>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在湖北8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345頁。



兩種不同的意見和標準：“在委員條件上，井岡山兵團主張看貢獻，提出防止有人摘桃子；以紅旗兵團為首則提出革命不分先後，主要看他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是否得到群眾的擁護，提出革委會是全院師生員工的，不是哪個兵團、哪一家的。雙方的說法其實都有所指，沒有捅穿而已。這些提法、指責都成為日後派性鬥爭的內容。”兩種不同的標準，意味着不同的革委會席位分配方法，為了最大化本派別的席位數：“各派死抱住自己的山頭不放，為自己的山頭多爭些利益，以文革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別的組織，要以自己為核心實現大聯合，所以總聯合不起來，即使表面聯合了，心裏不服氣，所以爭論不休，戰鬥不斷。”

在革委會成立之前兩派就有分歧，成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派性鬥爭，結果，派性鬥爭的分量太大，成為壓倒其他事務的重頭戲：“紅水院兩派的鬥爭，從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一九六七年九月算起整整一年，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兩派正式分裂，到工宣隊進院也有半年時間。造反派組織是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間形成的，這樣算起來，派性鬥爭的時間占了一半。”

無原則的派性鬥爭，後果是“革委會已名存實亡，無法開會，更不能統一領導，兩派各行其道。上級發到革委會的會議通知、各種票證都是兩套，由支左辦公室安排，兩邊都照顧到。這些方面沒有產生衝突，但整天的高音喇叭聲吵得人不能安生，群眾敢怒不敢言，越到後來，逍遙派越多”。

革委會內部分成互不相容的兩個山頭，導致新的無政府狀態，“從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的談話來看，我認為毛主席派工宣隊進學校，目的是制止武鬥，消除資產階級的派性，進行鬥、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時間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與願違，從工軍宣隊進院到軍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個月；再到工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鬥是鬥，主要是鬥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謂的派性；改是

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東西，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眾來監督幹部和教育幹部等等，這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意願”。

第五個時期：軍宣隊、工宣隊掌權。

革委會內部的派性引導了群眾組織中間的派性，結果導致革委會無法工作。軍工宣隊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進駐，軍工宣隊的第一任指揮長是宋國英，他在學院期間的工作，主要是消除派性，清理階級隊伍，整頓紀律、秩序。

“工宣隊進院，革委會靠邊站，不說取消，但也不起作用。”“說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實際上是軍隊幹部控制一切，決定一切，院、系及行政部門和處、室一把手都是軍人。”

“工宣隊進駐學校後，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在組織上及領導系統上的改革，實行軍事化編制，進行軍事化管理，以實現迅速改變學校面貌的目的。”“學院下面成立四個大隊，原一、二、三系分別改為一、二、三大隊，行政管理部門成立四大隊，大隊下面設連、排、班。機關設四個組：辦事組、政工組、教育革命組、後勤組。”“各大隊的行政領導由工宣隊員擔任，大隊政委和機關四大組的組長均由軍宣隊員擔任。”“湖北省成立“文教戰綫指揮部”，正副指揮長均是解放軍，是學校工宣隊的上級領導機關。”

“從此，由解放軍領導學校的一切，廣大師生員工由學校的主人變成了被改造的對象。他們按照軍人的要求，早上出操，開會要列隊進入會場，列隊離開會場，開會前要唱歌等等。”

為了實現徹底鎮壓造反派的目的，為解決派性問題所派出的軍宣隊和工宣隊（成員主要由造反派組成）已經不敷使用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工宣隊進行了一次大換班，指揮長宋國英離校，樊馬義接任。工人也全部換了，由國棉三廠、青山熱電廠派工人進駐我院，鑄鋼廠和車輛廠的工人全部回廠，工人副指揮長由國棉三廠的吳玉清師傅（女）擔任，時間不長，又由國棉三廠的朱三梅（女）接任，工宣隊員均



換成了原保守組織的成員（第一屆工宣隊員多數是造反派）。”“指揮長樊馬義與宋國英的作風也絕然不同，這屆軍、工宣隊從進院開始貫徹五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以後又進一步清查‘五一六’分子，時間長達兩年多，全部精力用於整造反派。”“有人說，這屆工宣隊進院的目標與任務，就是要徹底整垮造反派，進來的人、起用的人都是保守派的，鬥爭的對象都是造反派。”“經過他們的‘分析’、‘研究’、‘重點突破’、誘供、逼供、信供，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四百多師生員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占全院師生的8%左右。”

第六個時期：重新成立黨委到徹底否定文革。

“從一九七二年九月開始，工宣隊指揮部已不再領導一切了。黨委書記是軍代表吳紹文，副書記3人，革委會副主任6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委會，有其名，無其實，因為委員都被隔離審查，至今未解脫，副主任張如屏、張建成都被當作敵我矛盾排除在外，所以此時的革委會沒有委員，沒有群眾代表，祇有上級任命的主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在群眾性批林批孔運動的壓力之下，水院內部產生了一點點新的變化：“為了領導好批林批孔運動，黨委決定成立院批林批孔辦公室，黨委宣傳部長常樹蔭任主任，任命我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總支書記任組長，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師為組員。主要任務就是為“兩清”中的冤、假、錯案平反，處理黑材料。”看起來，要那些官員執行政策，重視事實和法律，如果沒有外在的群眾運動的壓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落實政策、改正當權派製造的冤假錯案，都是迫不得已。

一九七六年各級官員趁着“粉碎四人幫”的“東風”，從自己的需要出發積極推動所謂的“揭批查運動”，把文革中間整治造反派的“兩清一批”運動的衣鉢延續下去，繼續製造冤案鎮壓造反派：“抓捕‘四人幫’後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所謂有牽連的人就是指那些積極支持與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人——造反派中的骨幹，所謂有牽連的事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在與大的“揭批查運動”配合的同時，一些官員個人的“小九九”也搭上順風車，水院當權派栽贓給造反派的“所謂‘批宮揪張’，實質上是某人的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那個年代，祇要把自己說成是被‘四人幫’及其爪牙迫害的，那就是革命者，就是英雄，一舉兩得，既可打倒張建成，也可抬高宮雨屏和張蕪承的身價”。“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對我進行逼供”。在文革前後，每一個運動都結合着當權派的私心和私利，正是因為這樣，每一個運動都搞得有聲有色，除了上頭的號召和組織原則之外，各種私心雜念都得到搭順風車的機會。

有意無意地給官員實現自身機會主義目標的空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誘導，反而是一些領導人鞏固自身權力的訣要，這種上下結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場腐化墮落的加速器。從捷克流亡到瑞士的學者希克指出：“只有當第一書記實行的政策或多或少地符合官僚機關的根本利益時，他才能取得個人的統治地位。如果他企圖進行一次違反官僚利益的政治變革，那麼他遲早就要失敗。”<sup>①</sup>在中共高層劉少奇和鄧小平就是這樣的聰明人，鄧小平廢除四大、明確保證二十年不搞運動，劉少奇明確主張“馴服工具論”、“入黨做官論”，就是這種官場智慧的體現。反過來，毛澤東則逆官場潮流而動并預先做好了“摔得粉碎”的心理準備。

## 二、公權力私有化的擴張趨勢——張蕪承在官場中間的代表性

一個官員如何看待自己的權力，如何對待自己、對待下級，如何執行政策和法律，這對於其權力範圍內的政治狀況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在文革的各個時期，當權派明目張膽地違反政策和法律，這是一個共同的現象，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張蕪承等人在省委許道琦和工作組的支持下把群眾整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軍隊支左之後武漢軍區陳再道等人鎮壓造反派，軍宣隊工宣隊派進學校之後很短

<sup>①</sup>[捷]奧塔·希克著、蔡慧梅等譯：《共產主義政權體系》，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頁。



時期就進行“大換血”，目的都是為了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二年成立的各級黨委一直主政到“四人幫”被抓之後的“揭批查運動”，其關於文革的作為都是系統地違反政策和黨紀的。總而言之，從文革前後的政治實踐看，當權派普遍地不執行政策和法律，而是按照自己的私心和需要去行使權力，這就意味着：對文革演變過程的解釋也必須在政策和法律的視野之外去尋找原因。

非常遺憾的是，好幹部往往成為官場的例外，而恰恰是那些自私自利、作風惡劣的壞幹部擁有代表性。張蕪承的代表性往往體現為一個逆向選擇過程：從官場中間逐步地淘汰好幹部，壞幹部的比例就越來越大，水院官場就有這樣的長期趨勢。就文革所暴露的官場行為看，張蕪承恰好就是特別有代表性的人。在張老師的記憶中間：“張蕪承的權術運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善于抓住機會，條件成熟時，果斷出擊；需要忍耐時，他一定會隱藏起來；需要表現傷心的時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編造謊言時，他就大膽地編，達到目的為止。他對人當面叫哥哥，背後摸傢伙；他可以為親信包庇掩飾錯誤；他對上報喜不報憂，說假話，對下壓制不同意見，制裁反對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獨立王國。在這個王國裏，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張蕪承的這種種作為，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公權力私有化”——把執行政策和法律實現管理的公權力，通過各種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任用私人建立獨立王國）用以追求私人利益擴張和權力為小圈子服務的私欲。而獨立王國的建設成就越大，權力得到制約和挑戰的機會就越小，就這樣，權力的第一步腐化為第二步腐化開闢出新的空間。

在一定程度上，要解釋文革為什麼按照那個樣子搞法，以及為什麼會搞成那個樣子，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思想都沒有辦法解釋，恰好，張蕪承這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官員及其利用權力的方式，更能夠貼切地解釋文革前後的狀況，也就是說，不是政策設計、指導思想或者是制度、法律，而是官員的“公權力私有化”願望有着更高程度的解釋力。張老師精闢地指出：“根據我在文革中與這些人的接觸，我覺得

他們是一些風派人物，沒有原則，沒有信仰，跟着權力、利益走。這種人在洋人入侵時，會不會成為漢奸就很難說；但當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他們肯定是擁護的，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要想說清楚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後的許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對一些幹部、教職工、學生痛下殺手的原因，就要講清楚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的行為準則，以及這個利益集團對內對外的矛盾與鬥爭，當他們達到目的後又是如何構建他們的獨立王國的。不管他們內部為了權力而鬥爭，矛盾有多大，但他們始終執行着‘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幹部政策。”

為了實現黨同伐異的目標，張芾承在“生活作風錯誤”問題上包庇常樹蔭，同時處分并拱走李貞儒：“常樹蔭犯過生活作風的錯誤。此事發生後，張芾承包庇常樹蔭，既不准知情人講出來，也不進行組織處理。由此，常樹蔭對張芾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常樹蔭掌權後就不一定了），成為張芾承的得力助手，進而成為張芾承的接班人。”優先提拔那些違法亂紀的壞幹部，這等同于一筆投資，可以指望在未來獲得回報——看漲的預期收益，張芾承保護壞幹部顯然可以增加自己的預期收益，正是在這種預期收益的激勵之下，張芾承必須超越政策和法律的許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要壓制住內部的不滿。反過來，如果違紀行為人有可能威脅到預期收益時，那就需要反過來按規則行事：“一九八七年，李貞儒與辦公室打字員之間的不正當男女關係被揭露，兼任院紀委書記的高進珊要立案調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樹蔭則千方百計要保李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讓李貞儒死不承認，以為這樣就無法作結論。這一招沒有奏效，……高進珊這邊依靠省紀委，由省紀委找李貞儒談話，李貞儒最後承認了。學校給了李貞儒個黨內處分，接着把他調到長沙鐵道學院。”

還有一個顏國良，也得到張芾承和常樹蔭的超常提拔和重用。看一下這個人的文革經歷和升官圖是很有意思的：“顏國良作為水院‘紅教工’組織的一號頭頭……，在抓‘五一六’時，他是最早承認自己



是‘五一六’分子的，并揭發了我院‘五一六’的組織系統，揭發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組織領導者，除了反軍亂軍外，還整理了周總理的材料，給他看過，他還提出過修改意見等等。之後，他與造反派劃清界限，碰面時假裝沒看見。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又成為造反派頭頭，慷慨激昂發表演說，參加各類會議，包括派頭頭的會議。他向我檢討錯誤，表示決心跟着毛主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依然十分積極。‘四人幫’被抓後，他反戈一擊，我們又成了陌生人，還是見面裝作看不見。對於這樣的風派人物，張蕪承、常樹蔭看中了什麼？他們看中的，就是顏國良的隨風倒，看中的就是要從顏國良嘴裏講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顏國良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們的需要，肆意編造所謂的‘證據’。他們在短短的幾年裏，讓他入黨，給他提幹，調他到教務處，後又升任處長，之後又推薦他擔任長沙水電師範學院的副院長，這就是他們對顏國良的獎賞。”

司馬遷曾經說過“不知其人，視其友”。這就是說，你不知道一個人是什麼樣子的人，就看看他與什麼人友善就知道了，張蕪承、常樹蔭等人打擊誰、提拔誰，鮮明地揭示了他們的內心和為人處世準則。在另外一個方面，什麼人得到官場重視和提拔，不僅體現了“誰應該得到獎賞誰應該得到懲罰”的社會準則，間接地成為執政黨政治合法性的指針。

在文革期間，選拔誰來執行政策至關重要，軍宣隊和工宣隊進入學校之後，第一批進校的宋國英大體上執行政策，也做了一些促進兩派聯合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樊馬義代替。樊馬義本人不僅作風粗暴，而且懷有對知識份子“改造、改造、再改造”的狹隘心理，結果很好地實現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任務。第一批工宣隊成員多數是造反派工人，進入學校之後也能夠執行政策做一些兩派團結的工作，但一樣被換成保守派成員。在樊馬義的領導下，在水院師生中間採取“逼供信”手段羅織口供，打了四百多個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占全校師生總

人數 8%)。不僅僅像張萑承那樣為了鞏固個人權力需要仔細地選人當權，就算是要實現當權派鎮壓造反派這個共同目的也需要採取換人政策，看起來，當權派都能夠嫻熟地找到合適的人，去做他們認為合適的事。

雖然張老師本人受到張萑承長期的報復和打擊，但他仍然客觀地肯定：“就三代掌門人的廉潔程度、工作能力來說，張萑承是無可挑剔的，客觀地說，三代掌門人一代不如一代。”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整個社會轉型和官場蛻化程度相關，在文革結束近四十年來，應該說，公權力私有化的趨勢是有增無減，與這個趨勢相匹配的官員個人，其私心私欲的擴張也是同步上升的。張萑承在毛時代應該算是品德不好的幹部典型，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反而有資格得到一張“好人卡”，這不能說不是一個悲哀。

在官場中間苦心經營權力小圈子，固然可以實現一些私利，但效果並不那麼可靠，張萑承晚年的失落還得到張老師過于泛濫的同情：“對一個權力欲極強、并用權力隨心所欲實現個人願望的人來說，失去權力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失去一切，尤其面對自己培養的接班人（常樹蔭、高進珊）的一反常態，由熱情討好變為冷漠，由向自己彙報、聆聽教誨變為嫌棄，他無法接受，心情不好，……張萑承在被免去顧問職務後不久，身體明顯差了許多，也蒼老了許多，到後來，走路要有人扶着，否則會倒下去，腰快彎成九十度了”。張萑承的淒涼晚景也許是事實，關鍵是被他那顆拳拳經營“公權力私有化”事業的苦心所放大，客觀上的失落被主觀感受所放大——畢竟投入了那麼多得到却那麼少，心情不佳是在所難免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經營“公權力私有化”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由于此種風險的實際存在，也許（也祇能說是也許），張萑承這樣的代表性人物還有可能在批判的壓力和正面的引導教育之下改邪歸正吧，這也許是毛老人家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擴大教育面”的信心所在。

一個老闆在自己的企業裏面任人唯親，也肯定會激起部分人的

不滿，但不會導致普遍的高度不滿，畢竟企業是老闆自己的；但是，張蕪承在水院公然搞那種“公權力私有化”的經營方法，在整個水院所激發不滿和批判，要強烈得多。恰好在文革早期很適合這種不滿意的公開表述，文革的水院群眾對走資派的反抗和批判力量，造反派之所以產生并得到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其內在的政治動力就在于：人們對於“公權力私有化”的容忍程度更低。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文革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并有那麼大的聲勢，恰好是與民眾厭惡、憎恨并且在合適的氣候下對“公權力私有化”發起批判的信念是相一致的，

而文革結束後，張蕪承那種“公權力私有化”經營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把手負責制”正當化了，同時還在強化管理手段運用——“更多由上級掌控下級命運”——的管理和制度改革中間，預先地消弭了絕大部分來自下級的批評意見，改革年代官員對內管治權力的巨大提升，是一個長期趨勢，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內部監督的可能。而在外部監督上，倒是有黨委紀檢、行政監察、經濟審計、司法反貪等等機構的建立，但是外部監督的強化並沒有能夠遏制住幹部隊伍的整體腐化墮落的趨勢。今天的中央領導層始終懷有提高“公信力”和“執行力”的良好願望，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三十多年來官場私心私欲泛濫擴張的趨勢，大大地壓倒了三十多年來一系列的監督制度建設成就，就算是以後繼續出臺再多的反腐政策，能夠取得多大的效果，仍然不無疑問。如果拒絕像文革那樣借用群眾的有組織的批判力量，那麼，僅僅局限于外部監督機制的鼓搗，還有多少潛力可挖？也許需要追問一下：一味地着眼于外部監督強化相對於被取消的內部監督，其有效性又如何？

### 三、文革的必要性檢驗——政治生活中間的“負外部性”觀察

從文革時期民間造反派力量興起的經驗事實，可以看出：宏觀政治制度對於普通民眾的影響是間接的，而微觀政治狀況——單位內部的當權派及其選拔的積極分子如何行事——對民眾的影響則更加直接而具體。被張蕪承選為反擊對象的學生郭明正遭遇冤獄，這個



案例是一面鏡子，折射出基層政治生活異化對人們的損害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對郭明正來說這是一場無妄之災，造成這場災難的固然有張蕪承的需要和省委的縱容，但還離不開他的同班同學提供假證詞的貢獻。“郭明正因泄露左派會議內容成為破壞文革的罪人”，張蕪承既然這麼定了，他的同班同學張耀先就按照保衛科需要編造郭要殺人的口供，省公安廳就根據張蕪承、李喜爾等人的誣陷材料公開逮捕郭明正。在造反派上訪團取得副總理謝富治支持之後郭明正被釋放出來，但是公安廳副廳長徐耕耘、省委秘書長李衍綬等人却公開反對平反，他另一個同班同學董兆花更是在張蕪承等人的安排之下複製郭的所謂罪證材料去北京上訪，試圖取得中央支持反對為郭明正平反。郭明正被構陷固然是一個特殊的案例，但正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案例，讓張蕪承、許道琦、李衍綬和徐耕耘等高官，向人們展示了他們如何對待法律的，同時也相應地地揭示了張耀先和董兆花這些為虎作倀的小打手——他們時刻準備着為權勢人物製造冤案提供一切需要的東西，在張蕪承這樣的壞幹部之外，張耀先和董兆花這種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也是一個威脅力量。

在老田看來，張蕪承式的壞幹部，和張耀先、董兆花式的馬屁精，共同組成一個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壞幹部+馬屁精”同盟的存在和擴張，是毛時代政治異化的主要推動力量，這個同盟在每一個單位內部都成為群眾政治感受惡化的威脅性力量。

對照一九五〇年代張老師在北京電力學校和北京電力學院的經歷，可以看出共產黨基層驚人的變化。當時，幹部和群眾中間的黨團員對普通民眾生存境遇的影響是極其正面的。在張老師的同學中間，上海同學瞧不起河南同學，認為他們又窮又髒；反過來，河南同學也一樣對上海同學抱有敵意，這種隔閡長期存在導致各種不團結和相互排斥，這無疑極大地惡化了人們對同伴的看法和自己的感受。張老師在上級的指示之下，耐心地做雙方的工作，幫助河南同學改掉舊的習慣，最終的結果是成功化解了雙方的敵視和排斥，做好了雙方

的團結工作，這無疑同時改善了兩部分同學的感受：從自身最貼近的人際環境中間消弭敵視和排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一系總支書記把各個班級的黨團員骨幹召集起來，秘密召開“左派會議”。而對此持有異議的郭明正則被官員和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聯手構陷，于七月十七日被公安廳公開逮捕，關押一百多天。對於遭遇冤獄的郭明正而言，當權派是一個威脅性的力量，同學中間“積極要求進步”的張耀先和董兆花等人則像定時炸彈那樣危險，祇要是當權派認為需要，自己身邊那些積極分子就會毫無原則、違反事實提供一切當權派需要的證詞，達到陷害自己、滿足當權派需要的目的。就這樣，五十年代曾經在普通民眾中間起建設性作用，幫助消弭敵視和排斥的政治力量（幹部+積極分子），在文革之前業已蛻化成為了小圈子利益隨時打算陷害同伴的威脅性力量，這極大地惡化了人們的政治感受：就像是一個百萬富翁破產之後生活陷入困頓那樣。有差別的是：一個百萬富翁破產是經濟處境的惡化，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找到自己的責任；但是，政治境況的惡化確實是自己無力控制的當權派和黨組織變化所引起的，沒有自身的個人原因。

借用經濟學的“外部性”概念，來粗略地梳理一下共產黨基層組織和權力的變化對普通人的影響。在經濟學看來，一個人的行為對其他人會產生影響，這就是外部性，對其他人產生正面或者好的影響，就是正的外部性，產生不好的影響就是負的外部性。在沒有共產黨幹部和基層組織介入的情況下，一九五〇年代張老師的同班同學中上海與河南學生之間的相互敵視和排斥，就是一種負的外部性，張老師在自己上級的指導之下努力解決了這個問題，搞好了同學們之間的團結，這是消弭了負的外部性同時建設了正的外部性，改善了同學們的境遇。而文革初期的郭明正遭遇說明，張萑承和李喜爾指導下的積極分子，恰好是一種威脅性的力量，是一種負的外部性。基層組織的行事準則的變化，不再跟事實掛鉤，而是服從上級所認定的需

要，這種負的外部性更加難以讓人接受，換句話說，基層黨組織及其選定的積極分子改變了行事準則之後，對於普通民眾造成的負的外部性很大，而且這種外部性根據任何政治、法律或者道德準則都是不能接受的。

也許需要提請思考的是：很多達官貴人的回憶錄也指出一九五〇年代風氣很好，一九六〇年代變壞了。這個轉變張老師也感受到了，如何理解這樣的轉變對於理解文化大革命也很有幫助。

老田認為：供求法則對於政治和社會領域也是一樣有效的，會非常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歷史記憶。很多上層人士在自己的回憶中間，對一九五〇年代的肯定程度遠高于此後的一九六〇年代，這中間的區別往往被簡單地歸結為“政策轉換”——例如說是“階級鬥爭天天講”帶來的。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奠基于人生親歷的感受主要來自社會流動階梯的寬鬆與否的記憶。因為在一九五〇年代，政權處于草創階段同時工商業處于快速擴張期，大量的上層職位短期內提供給一個小得多的候補群體（這恐怕與一九八〇年代早中期的大學生對整個社會的感受差不多），許多人感受到社會公正和興旺的記憶主要來自對向上爬的公正性和開放性相關的，說實在的，一九五〇年代“健康向上”的記憶，主要與親眼看到很多人的才華得到重視和提拔的事實是緊密相關的。今天回顧一九五〇年代，甚至可以說當時“過小的才華也得到了過度的重用”——畢竟這是由全社會人力資本積累不足但國家和企業管理（包括技術職位）需求極大的對比關係決定的。

相反，那些一九五〇年代得到過度重用的人力資本，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之後，就成為一種霸佔并阻礙向上爬機會的因素了。這中間的好壞轉換應該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這一次運動確立了向上爬的標準，在“文化資本”與“政治資本”的分量對比關係中，更重視所謂的“政治資本”（而政治資本的考評又是以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小圈子規則”占主導的），同時最小化“文化資本”的分量，更為重要的後果，是全面終結了此前向上爬“較高通過率”的供求關係。一



九五七年反右之後過度拔高“政治資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此前得到過度提拔群體的“資本擁有量”相匹配的——“文化資本”極度不足同時却是各種政治積極分子出身<sup>①</sup>。

以此而論：一九五〇年代的好風氣，內在地與供求關係中“求大於供”聯繫在一起，而一九六〇年代官場“小圈子”規則盛行並呈現對外的排斥性，則對應着“供大於求”的客觀對比，所以，一九六五年張老師一到武漢水院，就充分感受到了。張蕪承式的幹部及其代表性，恰好在“供過于求”的時代逐步地成為主流，而張老師一九五〇年代在北京電力學校和北京電力學院的感受，可能在“求大於供”時期有普遍性。如果這個分析站得住的話，顯然，結論就要悲觀得多，這意味着官場的好風氣是暫時的偶然現象，而壞風氣則是具有內在規律性的必然現象。而要再造一種讓普通民眾感到滿意的新型政治所要走的道路就更加遙遠和漫長，需要克服的困難和阻力要比張老師想像的更大。這個分析與一九六八年水院“闖派”和“好派”激烈爭論中的“十七年紅綫論”也有一定關係。

張蕪承的代表性，意味着政治異化的普遍性和規律性。在毛時代的單位內部，政治生活的異化和蛻化，惡化了人們的生存感受，激起了廣泛的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這是文革得到群眾擁護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一個單位內部造反派的力量大小，通常是與幹部不得人心的程度成正比的，換句話說，幹部及其依靠的積極分子所幹的得罪群眾的事情越少，群眾就越是難于發動起來，造反派就越是難于組織起來和發展壯大。一句話：造反派的力量大小與本單位政治機會主義同盟製造出來的“負的外部性”成正比。

對於政治機會主義同盟造成的“負外部性”問題，毛澤東有着敏銳和深刻的認識，他清楚地看到了：“有些幹部為什麼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群眾有氣。一個是

<sup>①</sup>老田：《毛時代的社會分層與文革所揭示的官民矛盾——與李遜商榷》，載《記憶》電子雜誌第 115 期。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sup>①</sup>這段話中間，毛澤東根據自己的老經驗，指出幹部往往對本單位群眾負有新老兩筆“政治債務”，新債務是文革初期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時期欠下來的，而老債務則是因為長期不民主所積欠下來的債務，對於這兩筆債務，毛澤東支持群眾組織起來進行披露。按照同一次講話的意思，毛澤東實際上不支持群眾組織全面討債，而僅僅祇是支持群眾組織起來“曬曬欠條”而已，目的並不是整個地整垮幹部隊伍，而是敦促整個幹部隊伍重視“新老債務”引發的大量“負的外部性”及其可怕後果，以期給幹部行為準則中間設置一個威脅：在欠下債務的同時必須考慮其後果，同時借助群眾運動的東風，趁機推銷“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這樣一種“負外部性”最小化的掌權方式。很明顯，如果沒有群眾造反的大形勢，官場肯定不會接納毛澤東推銷的新方法。從後來的演變看，即便是有了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官場中間願意聽取毛澤東建設性意見的人也不多。

#### 四、造反派派性斗争与分裂问题的深度

在政治活動中間，負外部性問題比經濟領域更為明顯，人們對於政治負外部性的容忍程度更低。文革期間，除了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兩部分成員之外，其他的重要政治行為人例如造反派組織，也一樣受到這個負外部性問題的困擾。一九六六年底造反派在武漢普遍取得了優勢，在隨後的“一月奪權”前後，由于缺乏經驗，就沒有能夠很

---

<sup>①</sup>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一九六七年七月一九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388頁。

好地協調各個組織的需要，結果導致分裂。在分裂發生之後，一些人就肆意地攻擊別的組織及其頭頭，結果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導致分裂的擴大，被軍內當權派利用。在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之後的大聯合、三結合過程中，為了爭奪革委會的席位，同樣發生了無原則的爭執。在革委會成立之後，各個派別也一樣沒有能夠找到合作并建立互信的機制，結果，相互之間的不滿引發批評和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造反派的分裂以及與之緊密相隨的派別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驗證“負外部性”危害的經典案例。

對於派別鬥爭的危害，張老師做了很深刻的反省：“派性鬥爭沒有理性，不講政策，不顧大局，祇有派別的利害關係，你站在我這邊，就是好幹部，革命的，站到對立面，則是壞人、反革命，就要打倒；為了派性鬥爭的需要，搶旗幟，清理階級隊伍，祇清對方的，不清自己隊伍中的；大批判中，給院領導及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掛牌，在武漢三鎮遊行；學習毛主席著作、馬列著作，不是用來提高自己、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而是用來對付別人，批判別人，這種貼標籤式、手電筒式的學習方法，在派性鬥爭中大行其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痛心啊！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浪費了一年的大好時光，傷害了兩派的廣大群眾，拖了文化大革命的後腿。我每想起，痛心疾首。”“全國情況亦然，由于造反派內部的鬥爭，很多地方發展到大規模武鬥，毛主席的計劃無法實現。文革失敗後，我們有些人說，如果毛主席晚走幾年就好了。試問，如果文化革命按主席計劃三年完成，那麼就有七年的鞏固時期，那將是什麼情況？從這個角度講，文革久拖不能結束，文革的失敗，造反派自己應該負責，也應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每一個組織批判都會導致對方的不滿，并引發不好的動機猜測，導致一種反批評。就文革的實踐經驗看，不管這種批評別人的意見是否懷有惡意，在“三結合”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解讀為想要排斥別的派別，最大化本派的席位，由此引發對應的反批評。結果，就在這樣的“批評—反批評”的惡性循環中間，派別對立呈現出一種逐步加深



的趨勢，這也許可以稱之為“派別鬥爭中間負外部性的自動增長規律”。這個方面的派性在自動增長趨勢下，極大地干擾了文革運動的走向，成為最難于解決的問題。作為政治經驗豐富的老人，毛老人家指出：“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聯合。”“對受蒙蔽的群眾，不能壓，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說百萬雄師這樣的保守派組織最好也是由自己的群眾起來造反，“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sup>①</sup>這些主張其實都是着眼于“負外部性最小化”的考慮，但是當年能夠聽得進去勸告的造反派領袖不多。

香花派與毒草派的分裂，被武漢軍區陳再道等人利用，祇是由于陳再道等人處置失當，才導致毒草派中部分造反派成員回頭參加反擊“二月逆流”，而重慶的五十四軍就一直拖拉着“革聯會”作為反對“砸派”的打手，不需要像武漢那樣組織武裝基幹民兵組織“紅武兵”去武力掃平造反派力量。一九六八年水院革委會成立之後“闖派”和“好派”的分裂，一樣被樊馬義等人利用，最後實際上廢除了革委會，把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都作為打擊對象。

毛主席提出“鬥私批修”的口號，就文革的實踐看，如果造反派頭頭不能夠超越自己的小小私心，不僅做不到批判當權派的修正主義，甚至自身都不能聯合起來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造反派頭頭在政治上的成熟，需要他們充分認識到派別鬥爭“負外部性”的嚴重後果并願意為此採取積極行動去解決的時候，才能夠實現。

從這個角度看，武漢鋼工總頭頭胡厚民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一九六八年的鋼派和新派鬥爭中間，他提出“鋼化江城”的口號，應該說此時他是一個為派別鬥爭“添磚加瓦”的積極分子。等到

<sup>①</sup>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一九六七年七月一九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頁。

當權派通過“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來死整造反派的時候，他迅速意識到必須搞好造反派內部的團結，為此他多次請人上門向新派工總頭頭吳焱金道歉，爭取他一起參加“反復舊”運動。一九七四年胡厚民甚至提出聯合百萬雄師的頭頭一起“批林批孔”，明確地意識到爭取保守派群眾的必要性。不過此時，百萬雄師與造反派之間的裂痕已經足夠深，難于回頭了，畢竟經歷過一九六七年夏天百萬雄師殺死殺傷數千造反派的歷史，經歷過軍宣隊主導下百萬雄師很多成員作為專案組成員參與對造反派的逼供信、製造“五一六”冤案的海量事實。讓百萬雄師回頭與造反派搞好聯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當欠債數量達到還不起的時候，賴賬就往往成為首選了。百萬雄師對造反派欠下這兩筆巨大的“政治債務”，成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很難跨過去的政治障礙，不用說，這兩筆龐大的政治債務在造反派中間激起普遍的敵視情緒，這不僅導致百萬雄師難于回頭與造反派進行聯合（據百萬雄師頭頭章迪傑回憶，一九七四年百萬雄師一些成員擔心省市屈服于造反派壓力否定“兩清一批”，三次去北京上訪要求中央關注此事），而且在造反派內部也普遍地形成絕對不與死敵百萬雄師合作的“堅定立場”，果不其然，胡厚民這個聯合百萬雄師的主張被造反派目為“投降”。

拿胡厚民的認識演變過程，與全國的一些造反派頭頭進行對照，上海王洪文在一九六六年底赤衛隊瓦解之後就達到他一九七四年才達到的認識水準，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直到今天還沒有達到胡厚民一九七四年就形成的認識。據研究上海文革的李遜先生介紹：一九六六年底保守派組織赤衛隊瓦解之後，工總司曾經開會徹夜辯論如何對待赤衛隊工人，許多造反派頭頭不願意接納保守派，擔心這些人參加進來之後帶來一些不利影響，王洪文毫不妥協，在辯論會上拍了桌子，堅決主張接納保守派成員，他這個主張最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實施。因為上海工總司沒有排斥保守派工人，結果各個單位造反派組織順利地吸納了保守派成員，此後赤衛隊頭頭幾次想重新拉隊伍

都未能奏效，一九六七年之後上海的文革演進中就再也沒有強大的保守派組織出場了，這在全國都算是特例。而武漢就不是這樣，一九六七年夏天武漢一些保守派參加百萬雄師武力清剿造反派，一九六九—一九七三年很多保守派作為“動力”大搞“逼供信”、參與製造“五一六冤案”，甚至一九七四年還想要捍衛“兩清一批”的成果，武漢保守派的後續表現在全國是有代表性的。因為缺乏有組織的保守派力量與造反派進行角力，上海的大多數當權派從自己的權力地位着眼，也祇能“理性地選擇”接受當時中央的指示——走上“檢討、亮相、結合”的三步走戰略，其中檢討就是承認從前的錯誤并表示悔改，亮相就是保證以後與造反派合作，在走完這兩步之後才獲得群眾組織的諒解，被重新賦予權力和地位。一九六七年秋天張春橋在河南傳達毛主席重要講話精神時提到：“上海部、局長一級幹部已經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sup>①</sup>上海作為當權派反復詛咒的“文革重災區”，在解放幹部方面反而又多又快。

王洪文在文革的實踐中間，利用一九六六年底有利于造反派的大形勢，整合赤衛隊，從根本上解決了如何避免群眾組織分裂的戰略性課題，也改變了此後上海的文革走向。此後工總司還較為妥善地解決了工總司內部耿金章二兵團的派性問題、一九六七年上柴聯司和支聯站問題（後兩次派別鬥爭的解決祇是戰術性課題），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團結，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這應該是王個人在文革實踐中的最大貢獻。據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介紹，周總理在一九七三年8月23日在政治局召集的省市區和中直負責人會議上傳達，說毛主席在九大、特別是九一三事件之後多次提出要提“工農出身的同志為黨的副主席、常委，并具體提到王洪文同志”<sup>②</sup>。在文革的大背景

①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等編印：《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1968年，第329頁。

②逢先知等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494頁。



下，王洪文作為文革前工廠保衛幹事和後來的群眾組織頭頭，除了解決如何實現群眾組織的團結這個戰略性課題的貢獻之外，沒有太多別的貢獻或者資歷。

根據楊道遠的看法，在造反派組織的骨幹成員中間，真正的左派不一定達到 10% 的比例，而毛主席也說“左派歷來是少數”。根據毛主席這個較高的“左派”標準，實際上近似於盧梭的“大立法者”——這種人創設新的制度和理論並能夠完成推動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整合，這樣的左派高標準實際上是一種“成熟的左派領袖”標準。就文革的實踐而言，真正的左派領袖需要完成三個關鍵的課題：一是把民間的批判力量整合起來形成一股有組織的力量，並在各種複雜形勢下避免分裂或者彌合分裂；二是把這股有組織的力量引導到新制度的建設中發揮作用，同時對舊制度的各種影響進行有效的批判；三是要避免這樣一股批判力量自身的蛻化變質趨勢，成為新制度的永久性支撐力量，這意味着需要建設一個真正的代表多數人利益而且永不變色的“反對黨”。祇有同時解決了這三大課題之後，才能真正化解毛澤東那個著名的擔憂——“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

從王洪文、胡厚民和蒯大富的對比中間可以看到，能夠做到在最有利的時機整合民眾的力量，避免分裂，阻斷“負外部性”持續上升的趨勢，全國祇有上海做到了，這在文革當中是個別的情況。而像武漢那樣，一月奪權之後造反派陣營內部分裂成為兩派則是普遍現象，而保守派則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造反派爭取的視野之外。而這種群眾組織之間的分裂總是被當權派利用，拉一派打擊另外一派，通過這種手法加深群眾組織之間的分裂和相互仇視，這種分裂和相互仇視其實就是負外部性所塑造出來的個人感受。到了一九七四年胡厚民雖然認識有很大進步，但是，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彌合造反派與保守派裂痕的可能性了，這是因為保守派作為當權派打手對造反派的傷害已經銘心刻骨了，反過來，百萬雄師也“自主自覺”地認識到如果守不住造反派是壞人的底綫，他們自己就要成為壞人了，所以在一年內

三次去北京上訪要求捍衛“兩清一批”的成果。換句話說，上海之所以能夠避免赤衛隊重新拉隊伍，關鍵在於雙方衝突不多、矛盾沒有尖銳化的早期就實現了整合，是在“負外部性”積累較少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良好的整合；像武漢那樣經過百萬雄師“武力圍剿”和充當“動力”大搞逼供信之後，負外部性之大，業已從根本上塑造了兩派眾多骨幹基本定型的看法，這個時候再提議雙方的整合，在內外部所遭遇的阻力已經達到了無法克服的地步，這其實就是一九七四年胡厚民遇到的情況。

毛主席說文革的任務不可能一次完成：“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sup>①</sup>僅僅從如何把群眾凝結成為一股有組織的力量，避免分裂和內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王洪文和胡厚民的對比中間可以看出：造反派要在恰當的時候完成內部的整合，造反派頭頭要能夠抓住一閃即逝的時機完成與保守派群眾的團結，就很少有人能夠做到。從胡厚民政治意識的逐步成長看，一個造反派頭頭要超越自己的派別獲得全局性的政治意識，要經過多麼艱難曲折的過程，胡厚民從清隊中間得出結論——必須完成造反派內部的團結，從很多保守派成員甘當“動力”積極參加對造反派的“逼供信”情形中間認識到保守派也需要團結好，就這樣，胡厚民逐步超越自己，眼界逐步放寬，從一個鋼工總頭頭上升到造反派整體的代表，從造反派的代表上升到全體群眾的領袖，他用了差不多八年的時間從親身經歷的當權派殘酷鎮壓中間體會到群眾力量團結和整合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如同一九七四年那個政治水準的胡厚民那樣的領袖在全國群眾運動中間起組織和領導作用，群眾組織的分

---

<sup>①</sup>毛澤東：在《偉大的歷史文件》一文中所寫的一段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載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等編《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年卷），1968年，第311頁。

裂和內耗問題就很難解決。文革很難一次勝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造反派方面而言，群眾領袖的成長進度遠遠落後于運動的進程，則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即便在群眾運動起始階段，就有大批領袖人物達到胡厚民一九七四年的政治水準，也祇能解決文革的第一個課題：使群眾組織成為一股有組織的批判力量。但是，如何把這樣一股有組織的力量塑造為新制度的建設力量和捍衛力量，仍然處于空白。實際上，上海工總司在成立革委會之後就在很大程度上面臨着第二個問題，如果群眾組織長期存在下去還會面臨着“常規組織政黨化”之後的第三個課題——自身的蛻化變質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其黨魁的“變修”問題就是一個前車之鑒；在毛澤東眼裏蘇共變修和中共內部的走資派問題，也是一樣性質的問題。

相比較而言，文革第一個課題——完成群眾力量的整合以及批判當權派的倒行逆施都僅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第二個課題則是目的——就是要把群眾的有組織力量作為新制度的支撐來起作用，解決這個關鍵性的問題困難和阻力更大。造反派在文革期間的錯誤，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經驗不足，找不到解決爭論和分歧的協調管道，這在一月奪權後的分裂中間表現得特別明顯；二是造反派要解決的課題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和結構性難題，需要突破的阻力和障礙之大遠遠超出人們的大膽想像。換句話說：造反派是在自己的“政治學徒工”階段就面臨着“老師傅”也感到棘手的政治難題。

一九六八年水院“闖派”“好派”爭論中間，闖派提出“二代紅就是二代機”的觀點，而“好派”力持“十七年紅綫主導論”，內在的分歧在于“共產黨組織特別是其基層政治生活規則是否需要根本性的改造”。事後回顧，老田傾向于認為：執政之後黨組織和基層政治生活的異化是結構性的，確實需要徹底改造。當年“闖派”的問題是：在沒有建立兩派的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就提出戰略性課題，結果在是戰術性層面加深派性猜疑和分裂，實際上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過來，一九五〇



年代的好風氣助長人們產生一個幻想：共產黨組織似乎可以超越社會分化的規律祇需要定期清除灰塵就能夠恢復好的作風。但社會分化的規律却在頑強地起作用：從一九五〇年代至今，權力精英的蛻化變質是一個長期的趨勢，即便是有了文革這樣的巨大衝擊也沒有得到根本扭轉。正是因為如此，文革才採取支持有組織的群眾去批判幹部，讓體制外的缺乏經驗的“學徒工”批判體制內的有經驗的“老師傅”，這個選擇內在地斷定——體制內的“老師傅們”絕對不可能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惟其如此，才有那個“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決心，支持建立體制外的有組織的群眾批判力量雖然帶來“亂”的代價，却為治療體制內癌症提供了一綫希望。

在我寫的《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很重要》一文中間，做過一點假設：

為了最小化派性鬥爭和衝突，借鑒私營企業的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的“職能三分法”，也許可以考慮這樣的設計：造反派是全體民眾中間對當權派最具批判意識的群體，就由造反派主導監事會并逐步接掌政治教育和訓練職能；由造反派和保守派共同組成董事會性質的“革委會”；而業務權力則交由有經驗的經理班子掌握，人事制度和組織制度等與管理人力資本相關的考評組織祇能附設于經理班子考核體系中間；多數幹部可以恢復工作，但要接受董事會和監事會的稽核。文革實踐中間對於董事會和經理班子這樣的常規權力角色當時很少討論，監督權的擴大在文革期間被廣泛意識到，毛澤東當時已經設想過“奪權主要奪運動領導權和業務監督權”——這意味着從當權派手上剝離出監督權和其他政治性權力，周總理在外交部進行過試點，到1967年10月毛提出“建黨五十字方針”（“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在文革的背景下，實際上也是以造反派為範本的想像力；而造反派中間很多人對於當權派和保守派同盟的反感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監事會的常規視

野，實際上已經意味着重建共產黨組織的新標準，前造反派李憲源曾經寫過文章提出“教育黨”概念。

不過，文革實驗沒有達到過這樣的深度，即便是實現了也有可能帶來新的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第一個有成就的工人階級政黨，其黨魁之所以走向“修正主義”，是因為缺乏工人生存感受的知識份子隨着政黨擴大而逐步掌握組織內部的專職管理權力，結果造成“寡頭統治鐵律”；這樣的黨組織在面對強勢國家機器的鎮壓前景時，就會轉而背叛組織成立的宗旨和綱領，伯恩斯坦鼓吹“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考茨基論證一種“經濟決定論”式的馬克思主義，目的都是告訴德國政權：資本主義自己會“自動”地變成社會主義的，不是我們要怎麼怎麼樣。這樣就必然地要放棄有組織的鬥爭，最後出現一種怪異現象：底層的工人要採取激烈的鬥爭手段例如罷工，黨魁反而出面要求工人不要做過于激烈的反抗，說這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利益。這種種都無非是希求一種“安全”：最後組織的存在本身倒是成了目的，而綱領和宗旨變成是可以犧牲的東西了。（參閱羅伯特·米歇爾斯《寡頭統治鐵律》）

結合文革的實踐，“教育黨”概念意味着由社會群體中間最具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的造反派群體，接掌監督當權派的職能，同時，還由這一部分人組成的監事會機構接管群眾的政治訓練職能，並且就政治訓練成績、對當權派的監督實踐再造與普通群眾的關係，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設立黨員選拔和訓練標準——讓每一個新黨員都善于跟群眾打交道同時能夠對上保持批判意識。這意味着“黨建工作”轉交給“監事會”性質的機構來執行，這樣，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黨團員多數是“馴服工具”的現實。在這樣的政黨制度中間，可以一黨執政，但是，要徹底黨政脫鉤：甚至可以由黨組織機構推薦官員任職，但是，祇要任職就自動與黨脫鉤從而成為黨組織批判性的審視對象。在今天中國人力資源充裕的情況下，可以讓普通勞動者接受政治訓練的時間多于生產時間，這樣的訓練力度有可能在黨組織內部建設

各個層級的多套“影子內閣”，影子內閣可以由下臺幹部和積極分子等成分組成，這樣的監督力量就很接近于專業水準。從文革的實踐出發，這樣的黨組織建設可以超越西方選票民主的根本性問題——“消極無能的大眾”，這是《寡頭統治鐵律》一書中間最為沮喪的關節點，從而創造出一種“積極的有能力的精英民眾”，變無根的民主為有根的民主。僅僅在這一點上，文革的實踐超越了傳統政黨的限制，這個超越能夠提供多大的新政治空間，肯定可以給落實“人民制憲權”以更大的空間，但能夠達到什麼程度，是否足以解決根本性的問題，這還不是書齋中間能夠想像或者演算出來的。

文革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要解決那些問題，其實與人類在當權派“管治之下”的最後解放這個命題等價。看起來是要走一小步，其實，與最後一步也相差不遠，制度建設所要超越的各種傳統之沉重恐怕超出最大膽的想像，為什麼造反派受到當權派和保守派如此嚴酷的鎮壓？這祇是這個沉重傳統所表現出來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如此，戰略和策略、權宜之計和長遠之路都很難分開，以此而論，文革走過的路程離想要到達的目的地，還十分遙遠。但是，正確地提出問題，看清楚問題在社會現實中間所處的位置及其環境的各種糾葛，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不是嗎？有很多人對於文革期間的各種混亂、無序以及惡性政治競爭的無原則性，嘖有煩言，其實，正是這些混亂和人的私心，以及由私心推動的各種壞表現，才真正地構成現實世界的結構性矛盾和糾結，祇有把這所有的問題和困難都考慮到了，設想推進新制度才算是建立在真正的現實基礎之上的，如果遇到困難推進不下去，顯然是因為現實中間還存在沒有克服的困難和障礙，這比凌空蹈虛地設計新制度要靠譜得多。

### 五、黨閥與學閥相結合及其意識形態後果

據說，劉少奇曾經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并對此懷有信心，但是，到目前為止，文革史仍然是權貴和馬屁文人用顛倒黑白的謊言寫成的，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中把這兩群人蔑稱為“黨閥”和“學閥”。



針對今天主流文革史現狀，假如劉本人真的像宣傳所言對歷史評價懷有信心的話，今天的人們結合事實來解讀，恐怕會認為這是對黨閥加學閥的信心，而不是對人民有什麼信心。

官學兩界通過編造謠言來書寫文革史的努力，一開始就面臨着知情者過多而且難于封口的困境。從前有個說法，說文化大革命是人類靈魂的照妖鏡，今天低調一點，至少可以說，文革是一個精英階層醜惡靈魂的放大鏡，讓人們更加清晰地看到精英階層的斑斑劣跡，這個放大鏡至今仍然在起作用。這個放大鏡就“架設”在數以億記的文革知情者和官學兩界偽史編撰者之間。除了捏造歷史事實之外，為了讓他們的謊言顯得很有學問，還放肆地修改和歪曲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發展生產力”、“效率優先”，結果就像文革曾經預言的那樣：修正馬克思主義成為官學兩界的主要理論手法。復辟勢力的主要手法必然是“修正主義”，這是一個他們回避不了的表演特徵。正是在這樣的對照中間，人們能夠輕易識別：到底有沒有五一六通知附件所說的“黨閥”和“學閥”，有沒有十六條所說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

文化大革命作為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群眾性政治運動，目的是為了防止“黨變修”、“國變色”，提醒人們注意“反對修正主義”。無論文革最後的成敗如何，但是，文革的必要性始終是與是否存在修正主義和復辟勢力來檢驗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修正主義和復辟勢力，文革的必要性就不存在，反過來，文革就有其必要性。

一九八〇年代鄧小平組織人馬論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說公有制社會裏頭不存在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共產黨官場裏頭絕對沒有走資派，知識分子還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打總一句話就是：在公有制社會裏面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階層沒有獨立于勞動階級的特殊利益，更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復辟力量。而文革的指導性文件“十六條”就不是這樣看的，第一條就開宗明義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

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句子中間潛在地指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復辟勢力及其活動領域：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兩個群體構成了公有制社會的復辟勢力，而這兩個群體所掌控的意識形態以及教育和文藝等領域，都潛在地發展着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趨勢。

就文革的政治實踐而言，文革是不是有必要性，關鍵還不在于毛澤東思想是否具有預見性和前瞻性，最終還是要由文革的對象自身通過自己的政治實踐來回答和檢驗。在文革的實踐中間，由從前的勞動者（工人、農民）和受教育者（青年學生）組成的有組織批判力量，對復辟勢力的兩個組成部分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揭露，正是在這種批判和揭露過程中間，復辟勢力採取了相應的系列政治行動，正是通過這系列政治行動檢驗出復辟勢力自身的屬性，經過文革之後，老百姓發現這幫子當權派果然不是好人。換句話說，祇有通過被看做文革對象的“復辟勢力”自身的政治實踐，才能夠從根本上檢驗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人，讓人們看到這兩群人與修正主義和復辟勢力的關係，進而得出文革是否必要的結論。這樣的檢驗過程，其實比通常的理論論證和思想方法，能夠更為有力地揭示出人世間的真理。

文革期間的小學語文課本說：“修正主義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就湖北文革前後的歷史演變而言：文革初期省市黨委領着各單位黨委把群眾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夏天軍隊支持百萬雄師武力屠殺造反派、一九六九—一九七三年軍隊幹部結合黨政幹部和保守派以“逼供信”手段製造五一六冤案、一九七六年抓捕四人幫之後的揭批查運動全國鎮壓群眾和幹部上千萬人，這些行為如果不算“法西斯”又能算什麼？改革三十多年來，工人、農民成了弱勢群體，不是吃二遍苦是什麼？如果說當初那個預言有什麼不足的話，顯然那個預言大大低估了統治階級的排斥綫，只是預計到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會受到經濟剝削和

政治壓迫，沒有預計到今天中國絕大多數的“小資白領”也和工人農民一樣處于極端弱勢地位，今天的統治階級把排斥綫大大提高，囊括了社會結構的中上層。從文革之後的社會轉型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催生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新同盟，這個新同盟不再是文革當中當權派和保守派的結合，而是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政治同盟，他們主導了徹底否定文革并推動了改革。這樣一次巨大的社會轉型按照文革的語言內涵和邏輯確實就是資本主義復辟，與這個復辟過程緊密相關的是：三十多年來一個由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資本精英組成的龐大統治階級被再造出來并盤踞于整個社會之上。

在一定程度上，文革與後來的歷史形成鮮明的對照，加深了新形成的統治階級的自我辯護的難度。權力和財富在少數人手上積聚的同時，其不道德和不公正的外觀更為清晰地暴露在公眾的視野裏，無法掩蓋。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產生過如此強大、掌握如此巨大權力資本和思想武器的統治階級，他們的權力對於整個社會的滲透至深，但是得到的民眾認同度却極低，以至于如此強大的統治階級自己都開始擔心“仇官”“仇富”心態了。據說已經有高官推薦閱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擔心發生社會革命導致整體翻盤。

就較長的歷史階段而言，文革是一個歷史的加速器，把許多變化高度濃縮在一個很短的時間段裏面，許許多多的親歷者能夠身臨其境去體驗和體會，并得出自身的認識。張老師的一生經歷過一九四九年革命後的社會轉型，又經歷過一九七八年至今的一百八十度轉折，從個人的經驗和體會當中，對很多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命題有着深刻體認——例如所謂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精神的相容性問題，這是一份結合實際的理論認識，比那些坐在學院裏頭捏造的高妙理論更靠譜。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 前 言

回憶一生，跌宕起伏。經歷了日偽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新中國成立後，又經歷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及其身後的年代，對所處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略有認識。從投身新中國建設的激情歲月，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起雲湧；從文革後的蹊蹺結局，到下海試水，我的一生，是深入社會實踐的一生，是建立信仰、堅定信仰的一生。我自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就把自己包括生命在內交給了黨，決心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奮鬥終身。我崇敬毛澤東，信仰毛澤東思想，懷念毛澤東時代！

回憶錄定名為《歲月留痕》，主要是把我一生經歷過的真實歷史記錄下來，特別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我身上和周圍發生的那些事，以及形形色色的那些人，記錄下來，留給後人，留給社會，盡自己一份歷史責任。

回憶錄分三個部分。

“**成長篇**”主要是講我在解放前的經歷及解放後到文革前的學習、工作情況，這是我人生成長的階段。本篇記錄了我對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認識過程，使自己逐步走上了自覺革命的道路。回顧這一段經歷，我覺得自己能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文革篇**”是重點回憶內容，因為它是我一生中跟着毛主席幹革命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是我一生中磨難最多的時期，也是我一生中學習最多，思考最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最緊密，認識社會矛盾、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人與人之間關係最具體、最深刻的時期，也是改變我人生軌迹的時期。自認為經過這一時期的實踐，自己變得更成熟、更淡定，也更堅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

“**游泳篇**”記述的這一段人生軌迹，是我人生歷史的合理延續，雖

然不是我自願的選擇。我想嘗試適應社會潮流，結果失敗了，說明此路不通。經過實踐，讓我弄明白了有什麼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形態和社會運行機制；進一步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念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念是水火不相容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統一不了，矛盾重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不可能有同一性；因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也不可能裝到一個籬筐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一次嘗試與演練，是一次真正的群眾性革命運動，涉及中國大地所有階級、階層及每個家庭，幾經反復，最後以失敗告終。它告訴人們，革命是艱難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程說明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舊的習慣勢力相當頑固，他們時刻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進行拼死的鬥爭。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裏，他們公然違背黨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瘋狂鎮壓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推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形“左”而實右的反動路線。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無產階級革命派予以堅決的反擊，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進程。在此之後的一段時間裏，他們的反抗變得隱蔽起來。但當運動發展到革命派向走資派全面奪權的階段，鬥爭又公開地激烈起來，他們指使或直接指揮保守力量組織武裝隊伍，挑起武鬥，對革命派進行武裝鎮壓，一直發展到出現武漢“七二〇”事件——他們公然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略決策，妄圖以武力迫使黨中央、毛主席改變文革航向。

武漢“七二〇”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轉捩點，中央調整了某些部署，放緩對走資派、特別是對軍內反對文革路線的那些人的鬥爭；把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戚本禹作為替罪羊抓起來，清除出中央文革。之後，形勢進一步朝有利于保守勢力的方向發展，走資派利用毛主席派軍、工宣隊進駐文教衛系統及事業單位、政府部門的機會，以批資產階級派性和抓“五一六”分子為名，對革命派實行鎮壓與清

算，重用保守勢力和沒有改正錯誤的領導幹部，形成了軍、工宣隊，沒有改正錯誤的領導幹部和保守勢力中頑固堅持資反路線的人的三位一體，向革命派反攻倒算。在地方表現為對造反派的清算與鎮壓，在中央表現為以鄧小平為首的勢力對文革派的圍攻。毛主席的指示得不到貫徹，在無奈的情況下，毛主席決定再次把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翻文革案的勢力清除出中央領導機構，着手鞏固文革成果，如革委會補臺，黨組織吐故納新，提出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等，但為時已晚。毛主席逝世，風雲突變，復辟勢力與黨內一些權欲熏心的領導人勾結一起，武力抓捕文革派領導人，并以此為由，進一步鎮壓與清算文革中的革命派，使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失敗。

我參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過程來佐證以上的論述。革命是自願的，也是要付出代價的。我自願參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鍛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無怨無悔。

文化大革命已過去近五十年，它的功過是非由歷史去作結論。我認為，把它定性為“動亂”、“浩劫”是不符合事實的，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說毛澤東發動億萬群眾搞一場“動亂”、“浩劫”，于情于理講得過去嗎？

現在片面的、偽造的文革歷史到處都是，真實的文革歷史却不能公開傳播，這種愚弄歷史的行為是對歷史的犯罪，它誤導年青一代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認識與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涉及各個階層、各個家庭，影響極其深遠、廣泛。

文革結束後，把跟隨黨中央、毛主席參加文革的基層群眾（造反派）與所謂反革命罪捆綁在一起，有的被判刑、關押，有的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更多的受到審查與處分。這些人的罪名是莫須有的，迫害他們的唯一理由因為是造反派！而在文革中真正搞打、砸、搶、抄、抓，搞武鬥，破壞文物，殘害人民致傷、致死的犯罪分子，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反而被培養，被重用，因為他們不是造反派！這種



以派劃線、不分是非的政策造成了歷史的顛倒，所有這些也造成了共產黨和我們國家、民族沉重的歷史包袱，不利于社會和諧，不利于團結，也不利于民族的復興大業。要解決歷史包袱，就要反思文革歷史，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基于歷史真相的披露。只有文革歷史的真相，才能讓反思落到實處；也只有文革歷史的真相，才能讓文革的反思達成共識；也只有達成共識，才能圓滿地解決文革歷史的遺留問題。我也許看不到這一天的到來，但我堅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由于水平有限，以及文革中我所處的位置，對許多情況不甚瞭解，看問題的視角不同，片面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指正。

在本書寫作與出版過程中，得到了周文斌、王紹良、王新民、李德俊、賴文德、朱冠先、蔣兆慶、徐海亮、蔣繼清、龔壽眉（解放）等同志的熱情幫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也對關心本書寫作與出版的朋友們表示感謝！

二〇一四年五月

## 目 錄

王紹良題字

贈建成兄詩四首 吳冠英

文化大革命是彰顯黨閥和學閥醜惡靈魂的照妖鏡……………老 田(1)  
前 言 ……………(33)

## 成長篇

一、童年……………(1)

(一) 我的家庭……………(1)

(二) 當日軍奴工……………(4)

(三) 童年的最後歲月……………(6)

(四) 學徒生涯……………(8)

(五) 我的父親與母親……………(13)

二、新天地……………(17)

(一) 解放……………(17)

(二) 學校向工農開門,圓了我的讀書夢……………(20)

(三) 土地改革……………(25)

(四) 縣政協代表與縣學聯委員……………(28)

(五) 新的開始,到北京電力學校學習……………(30)

(六) 蘇式教育……………(36)

(七) 老革命的風範……………(39)

(八) 近距離仰視國家領導人……………(42)

(九) 張一純……………(44)

三、在北京工作……………(47)

(一) 留校當教師……………(47)

(二) 反右派鬥爭……………(51)

(三) 在大躍進的日子裏……………(56)

(四) 嘗試教育改革……………(62)

(五) 告別北京……………(66)

四、新的崗位……………(70)

(一) 印象……………(70)

- (二) 新的工作崗位 ..... (72)
- (三) 出席團中央座談會 ..... (79)
- (四) 工作團隊 ..... (82)

## 文革篇

- 一、文革初期 ..... (87)
  - (一) 省委工作組進院 ..... (89)
  - (二) 揭、批高潮 ..... (91)
  - (三) 反擊 ..... (96)
    - 1. “六一八”事件 ..... (97)
    - 2. “七一五”反右 ..... (100)
    - 3. “七一七”逮捕郭明正 ..... (102)
  - (四) 工作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 (104)
- 二、文化革命委員會 ..... (107)
  - (一) 成立院文化革命委員會 ..... (107)
  - (二) 破“四舊” ..... (109)
  - (三) 抓“南下一小撮” ..... (114)
  - (四) 文化大革命的轉機 ..... (117)
- 三、造反派在鬥爭中成長 ..... (119)
  - (一) 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 (119)
    - 1. 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 ..... (120)
    - 2. 抄黑材料, 促批判資反路線深入發展 ..... (121)
    - 3. 搶奪廣播台, 建立宣傳陣地 ..... (121)
    - 4. 為郭明正平反 ..... (123)
  - (二)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組織簡介 ..... (127)
    - 1. 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群眾組織 ..... (127)
    - 2.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組織的演變 ..... (128)
  - (三) 煎熬的兩個月——造反的心路歷程 ..... (136)
  - (四)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的幾件事 ..... (141)
    - 1. 關於開除黨員黨籍、燒入黨志願書的問題 ..... (142)
    - 2. 關於批判班幹部的問題 ..... (142)
    - 3. 關於胡承群反江青言論的問題 ..... (145)
    - 4. 保護唐懋官老師 ..... (145)
- 四、部隊支左與文革形勢逆轉 ..... (147)

(一) “一·二六”奪權與“二八”聲明·····	(148)
(二) 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與為工總翻案·····	(152)
1. 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與取締工人總部·····	(153)
2. 二司的處境 ·····	(155)
3. “香花”、“毒草”兩派殊途同歸,反擊“二月逆流”·····	(158)
4. 紅水院——武漢抗暴鬥爭中的根據地·····	(161)
(三) 關於幹部問題 ·····	(169)
1. 省、市委主要領導幹部在紅水院的日子 ·····	(170)
2. 張如屏在造反派處逆境時亮相·····	(172)
(四) “七二〇”事件 ·····	(178)
1. 黨中央、毛主席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的戰略部署·····	(178)
2. 武漢“七二〇”事件中的紅水院·····	(191)
五、“七二〇”後的幾件事·····	(196)
(一) “八一”渡江事件 ·····	(196)
(二) “八一〇”大會 ·····	(200)
(三) 關於“搶槍”問題 ·····	(201)
(四) 關於到市人武部辦聯絡站問題·····	(203)
(五) 關於各地紅水院聯絡站問題 ·····	(206)
六、成立紅水院革命委員會·····	(207)
七、一九六八年的派性鬥爭·····	(210)
(一) 派性鬥爭的由來 ·····	(212)
1. 認識上的差異是派性鬥爭的思想基礎·····	(212)
2. 山頭的存在是派性鬥爭的組織基礎 ·····	(214)
(二) 派性的發展與鬥爭 ·····	(215)
1. 成立革委會的爭議,兩派矛盾表面化、公開化 ·····	(215)
2. “三反一粉碎”時兩派鬥爭升級·····	(216)
3. 進入資產階級派性鬥爭階段·····	(219)
(三) 我的反思 ·····	(222)
1. 沒有擺正位置 ·····	(223)
2. 處置不當使矛盾不斷升級·····	(224)
3. 用“唯我獨革”來反對別人的“唯我獨左”、“以我為核心”,越反 問題越多 ·····	(226)
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時期 ·····	(227)



(一) 宋國英時期(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九年九月)	
.....	(228)
1. 舉辦革委會成員學習班.....	(229)
2. 清理階級隊伍 .....	(230)
3. 實行軍事化改革, 進行軍事化管理 .....	(232)
4. 拉練 .....	(233)
5. 武漢的反復舊運動.....	(234)
(二) 樊馬義時期(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239)
1. 北京中央學習班.....	(240)
2. 長陽門、批、改基地.....	(245)
3. 差一點被樊馬義送進監獄.....	(251)
4. 奉命組建京劇團.....	(253)
5. 清查“五一六”.....	(257)
6. 五七隊監督勞動.....	(266)
(三) 吳紹文時期(一九七二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五月).....	(268)
<b>九、正式安排工作時期(一九七三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底)</b>	
.....	(270)
(一) 在院人防辦公室我做了些什麼.....	(270)
(二) 批林批孔運動中我做了些什麼.....	(274)
1. 打聽省座談會消息.....	(275)
2. 努力爭取為“五一六”冤案平反.....	(276)
3. 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幾件事.....	(277)
(三) 在總務處我做了些什麼 .....	(284)
1. 抓總務工作指導思想的教育.....	(284)
2. 抓增強後勤保障能力.....	(285)
3. 瞭解情況, 抓主要矛盾 .....	(287)
4. 住房公平、合理分配 .....	(288)
5. 按政策辦事, 為職工排憂解難 .....	(290)
(四)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我做了些什麼.....	(294)
1. 主張依靠黨委解決問題, 反對搞大民主 .....	(296)
2. 審批革委會主張兩步走.....	(297)
3. 關於到湖北大學見到彭勛的問題.....	(297)
4. 關於在全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上的發言 .....	(298)
(五) 關於我的提拔問題 .....	(299)

十、“四人幫”被抓後發生的事	(302)
(一)從“四人幫”被抓所想到的	(302)
1.不贊成用武力解決“四人幫”問題	(302)
2.“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歷史現象,共產黨也難以避免	(304)
3.抓捕“四人幫”是重大的政治行動,除了除掉政敵以鞏固 自己的權力之外,往往意味着政治方向的改變	(304)
(二)從“半工半讀”到黨委擴大會	(306)
(三)隔離審查	(309)
(四)農場監督勞動	(317)
(五)結論材料拉鋸戰與最後的處理	(321)
1.結論材料之爭	(321)
2.要求復查、對質,按中央規定的政策辦事	(322)
3.水利電力部出面解決在材料上簽字的問題	(324)
4.結果	(327)
(六)解析	(331)
1.“三張一梁”與“鐵三角”	(332)
2.張蕩承的組織路線	(336)
3.一脉相承	(344)
4.對我下毒手的原因	(348)
5.失去權力以後	(351)
(七)傷痛	(354)
1.給朋友帶來的傷痛	(354)
2.給親人帶來的傷痛	(358)
3.永遠的傷痛	(366)

## 游泳篇

一、受聘武漢市青菱鄉工業公司	(371)
(一)引進活動房營造項目	(373)
(二)引進電鍍加工項目	(375)
(三)引進塑料製品項目	(376)
(四)辦書刊門市部	(382)
二、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382)
(一)提前退休	(382)
(二)組建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384)

1.研究所為什麼落戶黃岡·····	(385)
2.組建湖北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386)
3.成立水處理服務站及友聯加工廠·····	(387)
4.科技扶貧·····	(389)
<b>三、研究生物有機肥料·····</b>	<b>(391)</b>
(一) 走自己的路·····	(391)
(二) 漫長而艱苦的研究之路·····	(393)
1.功能微生物的篩選、鑒定·····	(395)
2.申報立項·····	(396)
3.建立中間試驗工廠·····	(399)
4.田間肥效試驗·····	(402)
5.湖北省科委組織鑒定會·····	(404)
6.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408)
7.各方反應·····	(411)
<b>四、成立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b>	<b>(415)</b>
(一) 公司的三大項目·····	(416)
1.生物有機複合肥料·····	(417)
2.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	(417)
3.雙效農星液·····	(418)
(二) 實施情況·····	(418)
1.生物有機複合肥·····	(418)
2.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	(421)
3.雙效農星液·····	(427)
(三) 公司的落敗·····	(428)
1.歷史的錯位·····	(429)
2.資本的力量·····	(430)
3.利益的驅動·····	(431)
4.自己的反省·····	(433)
<b>五、闖下江·····</b>	<b>(436)</b>
(一) 蘇州新科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	(436)
(二) 上海金寶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	(440)
<b>六、回歸·····</b>	<b>(444)</b>
<b>跋·····</b>	<b>碧 峽(447)</b>

# 成長篇

## 一、童年

### (一) 我的家庭

張家木橋，是上海市東北郊嘉定區徐行鎮和橋村的一個祇有 11 戶人家的小村落。一九三五年三月，我就出生在這個村落的一戶貧農家庭裏。



老屋前与姑媽合影，攝于一九九八年秋

張家木橋附近有 4 個張姓村落——老張宅、泥牆宅、西宅（又叫張家堰）、西張家宅。我們那裏沒有家譜，也無從考證，我猜想這五個張姓村落可能是同一個老祖宗吧。

張姓村落中數我們張家木橋最小，最窮，解放前幾乎家家都為泥牆宅、西宅的地主家做工，種“甲色田”，以維持生活。

所謂“甲色田”，就是農民向地主租地種，農民每年為地主打工，每畝地需打 35 個工，每勞動一天算一個工。每天勞動的時間不以鐘點計算，而是以日出日落來計算的，太陽一出就要出工，太陽落山才收工，一般工作時間很長，下雨了，幹不了農活就不算工，還必須隨叫隨到。

“甲色田”是我們那裏解放前地主對貧苦農民的一種剝削方式，用土改工作隊負責人的話說，是一種看來很文明但很殘酷的剝削方式。

老人們形象地說：我們是挑擔的，扁擔兩頭掛着東西兩村的地主





張家木橋村東、村南河邊

和富農。因為泥牆宅、西宅的地主富農多，而張家木橋又在這兩宅的中間，家家為這兩宅的地主、富農打工，故有此一說。

我家五口人，自己祖上傳下來祇有一畝地，向泥牆宅的地主租種了 5 畝地，每年要為地主家打工 175 天。農忙時，父母基本上白天都為地主打工，祇有在出工前和收工後才能為自己的地播種或收割。常常發生地主家的麥子、稻穀收好了，而自己家莊稼却因下雨而倒在地裏造成歉收，一家人吃不飽穿不暖。所以“甲色田”這種看似文明的剝削方式，的確是很殘酷的。

我家幾代單傳，祖父張阿江一九一四年逝世，那時我父親祇有 13 歲，祖母拉扯父親、姑姑兄妹二人，祖母在他們成家後不久也離世了。

父母親婚後共生了 7 個孩子，大姐夭折，二姐比我大 8 歲，三姐從小殘疾，不能從事農業生產，用母親的話說，養了個“吃白食的”。生我時父親已經 35 歲了，可以想像我的出生給這個家庭帶來的喜悅，我就成了父母眼中的寶貝疙瘩。在我之後，母親又生了大妹妹張琴芳，還有一對雙胞胎小妹妹，但她們出生後就被送到嘉定育嬰堂，連名字也沒有。

一九六三年我曾找過，但育嬰堂在解放後撤掉了，無從查起。

我一直思念着我的兩個小妹妹，不知她們在何處，是否還活在世上。我大妹妹也因家境貧寒養不起而給了老張宅的張文典夫婦撫養，萬幸的是，他們無兒無女，把我大妹妹當作親生女兒撫養，對我妹妹很好。

舊社會造成的骨肉分離，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我永遠也忘不了，在我大妹離家的那一天，我拖着（因年紀小祇能半抱半拖）妹妹東躲西藏的情景，妹妹被抱走時，我聲嘶力竭地叫喊。永遠也忘不了，兩個小妹妹被放在菜籃裏，父親要送走時，我又喊又叫沖過去搶籃子，求父親不要把妹妹丟掉。

我不怪父親狠心，因為憑家裏的條件，父母能養活我們姐弟三人就已經很吃力了。

在我的記憶中，我家每年有一個半月的時間斷糧，在每年的春天，四月份前後。此時，稻米已經吃完，麥子還未收進來。這段時間主要吃苜蓿湯，煮一鍋苜蓿湯，放很少的米，用來充饑。記得有一次，家裏來了鄰居，我餓了要吃飯，母親老不盛飯給我，我就吵，那個鄰居叫我母親給我盛飯，她又不走，母親就是不給我盛飯。等那個鄰居走後，母親說：“你怎麼不懂事，家裏沒有吃的，祇有稀米湯，叫人看了多不好意思。以後乖點，有人在不要叫餓，不要吵着要吃飯。”難道深愛我的母親不給我吃飽肚子嗎？不是的，母親是被逼無奈。以後每年都有一個多月的日子偷偷喝這種苜蓿稀米湯。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軍對上海發動了大規模進攻，當地駐軍奮起抵抗，爆發了歷時三個月之久的淞滬會戰。

淞滬會戰時，我們那裏屬“三光”區，房子全部燒光，東西全部搶光，樹木也全部砍光，老百姓隨十九路軍向西撤退，所以死的人不多。會戰結束後，回到家時，看到的是一片廢墟，我家本來就窮，此時就更加困難了。當時我僅3歲，等懂事時，纔知道我們家祇有臨時搭建的兩間簡易房，一間是我父母和我的臥室，一間是做飯的“灶間”，二姐借住在別人家裏（與年紀相仿的小姑娘同住），三姐住在草棚中。村

中其他人家也都蓋有這樣的小房子。

日本軍隊于一九四四年進駐我們地區時，5 個張姓村落，唯獨張家木橋沒有日本軍人住，其他 4 個村落均住有日軍。而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來到時，我們村家家戶戶都住滿了解放軍，地主富農最多的泥牆宅房子雖大，却沒有一個解放軍住。立場何其鮮明！

## (二) 當日軍奴工

一九四〇年九月我進入和橋小學讀書，那是一所初級小學。校長劉世昌先生是地方上的社會名流，我的名字就是劉校長幫助起的。學校包括校長在內一共 4 位老師。

學校設在一個祠堂的邊上，祠堂裏面還存放有四具棺材。我們都怕到有棺材的地方去玩。

我學習很認真，每學期的成績都很好。但三年級沒有結束，不知道什麼原因學校停辦了。一九四三年九月，幾個家境較好的家長請了一位姓潘的老師在老張宅辦了個班，在和橋小學上學的四年級的孩子都來了。時間不長，我們發現潘老師的老婆是個巫婆，經常在我們上課時，她說有仙人上她的身，說些稀奇古怪的話，學生去看“仙人附體”，課也不上了，弄得潘先生的口碑不好，我們也就經常逃課。一九四四年夏天，大批日軍進駐本地，校舍被占，初小四年級的學習也就無法進行下去了。

從日軍來本地到日本投降的一年多時間裏，我們是在日本人的奴役中過日子。日偽政權強化保甲制度，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日本人的監督之下。

在我們村，日本人規定每戶必須出一人，為其築路、修碉堡。因父母要為地主家幹活，自己家的地也要種，姐姐又不能去（姑娘是不敢為日本人做工的），所以祇有我這個不滿 10 歲的孩子去頂着。

雖然我祇有 9 歲，但我個子長得高，日本人每天點卯時同意我為合格的勞工。這樣我就和那些大人一起每天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主要是修路（加寬土路以便走汽車），築工事，修靶場等，每天的報酬

是一斤大米。

我同村的一個同學，也是從小一起的玩伴，他比我大兩歲，因個子矮小，有一次日本人認為他不合格，要求換人。他家和我家一樣，父母要給地主家做工，所以他不能走，想混過去，結果日本人放狼狗咬他，肚皮上被咬掉了一塊肉，鮮血直流。我怕日本人的狼狗，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日本人的殘暴，還有更厲害的。當時日本人要東西，要人，都是由保長下達到甲長。例如日軍小隊長要吃青蛙、吃蛇肉，就規定每甲每天交多少隻青蛙、多少條蛇，甲長就派到每戶。當時家家戶戶在河邊地頭挖圓坑，青蛙、蛇掉到坑裏後出不來，天亮後捉起來向日本人交差。

有一次，一位甲長沒有完成任務，被日本人捉去懲罰，還要叫大家去看。懲罰的辦法是，兩手左右伸直，手背向上，放一塊磚，時間長了，手臂漸漸下沉，日本人就用皮鞭抽，兩臂伸直了不抽，沉下去了再抽。後來改成手背上放臉盆，再往臉盆中加水，祇要兩臂不直，就用皮鞭抽。那天把那個甲長折磨得半死不活，其他甲長和老百姓嚇得直哆嗦，老老實實地聽他們擺布。

在一年多的勞役生活中，體力上的折磨是難熬的，一個不到 10 歲的孩子，一天要勞動八九個小時，有時要走十幾里路去修靶場，挖土，抬土，回到家裏早已筋疲力盡，倒頭就睡。

有時稍不留神，還要挨日本人的耳光。勞工挨耳光是家常便飯，日本人對看不上的人和事，就要打耳光。我自己也挨過兩次耳光。一次是被一個炊事員打的。那天中午放工了，我回家吃飯，路過日軍的炊事班，他叫我，我聽不懂，以為他在和他的同夥說話，就一直往前走。他追上來就給我兩個耳光，打得我眼前直冒金星，感到很委屈，又很害怕，就大哭起來。他不准我哭，用手比劃要我下午帶西瓜來換糖豆。第二次挨打是在日本投降後，從碉堡中搬運武器到船上，因碉堡離船較遠，我抬的是一箱手槍，抬到船邊實在抬不動了，就在岸邊放下來，想喘口氣，結果有個日本人從船上跳下來，給了我兩個耳光，



要我直接抬到船上去。那時我們鄉下既沒有收音機，也沒有報紙，根本不知道日本人投降的事，直到傳來住在西張家宅的日本少將旅團長剖腹自殺的消息，纔知道日本人投降了。

在日本人占領期間，有一件事我一直很納悶，也難以忘懷。有一個日本軍官，軍階是大尉（我們叫他一條杠四顆星），他每個月要到工地來檢查，第一次看到我時，就摸摸我的頭，顯得很親切。以後來了總要抱我一下，有時還給糖豆吃。什麼原因也不知道，我猜想他在日本可能有個兒子，與我同齡，或者我在某些方面（如長相、個子等）與他的兒子有些相似，所以看到我就會思念他的兒子，下意識地做些愛撫的動作。

一九四五年六月到八月，我被安排專門為日軍隊長（上尉）殺青蛙，每天殺 20 隻青蛙，這活兒很輕鬆，也是我的拿手好戲，20 隻青蛙用不了半個小時，殺完了就可以隨便玩，也沒有人管我，每天一斤大米照樣領。給我安排這種活不知是否與那個大尉有關。

### （三）童年的最後歲月

日本投降後，日軍於一九四五年九月間撤離。沒有了日本兵，村子裏又恢復了往常的寧靜。父母依然早出晚歸，為一家人的生計而忙碌着。

經過一年多的勞工生活，雖然剛過 10 歲，我覺得可以幫助家裏做事了。我很想讀書，但本地沒有書讀，祇有到離家三四里地的羅店鎮去，纔有學校讀書，但家裏又交不起學費，所以我祇能在家幫助幹活。

我固定的任務是積肥。那時沒有化肥，種地肥料主要靠糞便、豆餅、豬糞等，不養豬的話，地裏施肥就困難了。

每天早上，孩子們都出去找狗屎，把狗屎弄回來放到糞池中發酵，是很好的肥料。我每天找一糞箕狗屎回來，天不亮就得出去，去晚了給別的孩子撿走了。一年到頭，除了雨天，我天天重複這種農活。

夏天，與父親一起在天亮前要用水車把一畝水稻田的水灌足再

去撿狗屎。往往四更天(老人說是曉星出來的時候)就要起床,小孩子貪睡,起不來,經常被父親拖着上水車。有時上水車還迷迷糊糊的,腳的動作與水車轉動不同步,就要掉下來,腳上經常被磕得青一塊、紫一塊的,這種情境現在城裏的青少年是無法想像的。

在這一年中,我主要學習各種農活,除了挖河泥、挑河泥、挑糞等重體力勞動父親不讓我參加外(父親擔心我挑重擔會壓住身體,長不高),一般的農活都要幹,如插秧、鋤草、割稻、割麥、種菜、種西瓜、種棉花等等。

我的家鄉是河網地帶,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學習划船、搖櫓也是必須的。這種勞動生產技能的學習及鍛煉,當時有兩個目的,一是幫助家裏做點事,二是為今後當農民準備必要的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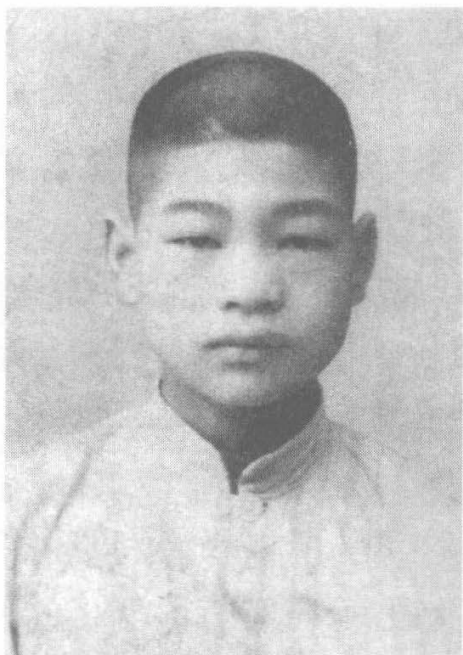
但我內心一直想讀書,將來出去做點事,改變家庭面貌。

一九四六年九月,我終於又有了上學的機會,到羅店鎮豐樂小學讀五年級(高小)。這是一所由羅店鎮米業公會辦的學校,由會長仇凡親自任校長。該校學費較其他學校低一些,父親終於咬着牙讓我去讀書。我答應父親,撿狗糞、夏天車水的任務我照樣完成,放學了有時間就幫家裏幹活。

這時我父親除種地外,還搞了一項業務——紅白喜事的服務工作,名叫“茶爐子”。從酒席用具、臨時用餐房(木園堂),到迎新娘的花衣花轎、茶水供應、客人洗臉淨手等一應服務,由我父親負責操辦。冬天忙的時候,我也要去當下手,他要我答應需要時向學校請假,我都一一承諾。

羅店鎮是我們這一帶比較繁榮、有名的集鎮,水陸交通方便,是農副產品的集散地,商業發達,教育也較發達,有完全小學三所、初中一所,有戲院等娛樂場所,每年有廟會、划龍船等活動,因而被譽為“金羅店”。

我到羅店鎮讀書,眼界又開闊了,見識也多了。好不容易得來學習機會,我自然不敢懈怠,雖然放學後要勞動,天不亮就起來拾狗糞,夏天要車水,有時還要請假幫父親從事紅白喜事的服務工作等等,但



一九四八年七月小學畢業照

我上課認真聽講，弄懂老師講的每一堂課，課間都把作業做完。我知道，回家後就沒有條件學習了，為了省豆油（用豆油、燈草點燈照明），天黑就要睡覺。即便這樣，我的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

一九四八年小學畢業，真想到羅溪中學讀初中，一打聽學費每學期要兩石米（一石米為160斤），我們哪能交得起這麼貴的學費！眼看同班同學紛紛去羅溪中學讀書，我又回到家裏幫助幹農活，心情自然是不好的。本來愛說話、活潑的我變得沉默寡言了。

父母知道我想讀書，但沒有辦法；留在農村受苦，他們也于心不忍。於是決定送我到上海去當學徒，學紅幫裁縫，即用縫紉機做衣服的裁縫。我的生活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農村自由自在，雖苦，但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大部分時間仍然歡樂。當學徒後，童年就此結束了。

#### （四）學徒生涯

當學徒，是貧困農家孩子走出農村的重要途徑。我們村上後來在上海工作的人，都是解放前到上海當學徒的。

我去當學徒的地方在上海靜安寺1664弄8號（現已拆掉）中和內衣廠，實際是一所家庭工廠，有三個師傅，三個學徒（包括我），以生產男襯衫為主。

廠主是我姑父，他原本也是我們那裏的人，後來到上海當學徒，學紅幫裁縫，慢慢搞起了一個小工廠，兼做布匹生意（解放前叫“跑街”，解放後叫業務員，現在叫業務中介）。我父親希望姑父給我介紹一家有前途的廠家當學徒，姑父與姑媽商量後，決定將我留在他們廠裏當學徒。姑父對我的父親說，先學做衣服，以後學“跑街”做生意。

父親聽後，覺得不錯，就同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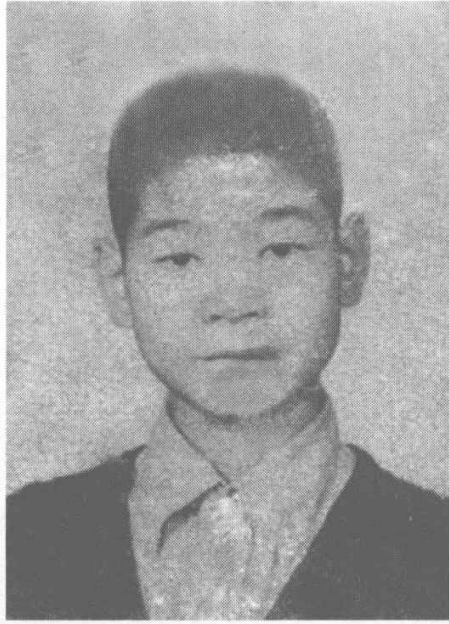
以前當學徒，叫“學三年，幫三年”。什麼意思呢？在三年學徒期間是學不到手藝的，真的學手藝是在出師後的三年。前三年主要幫師娘做家務，在廠裏打雜，工資是沒有的，祇管吃、住，等新的徒弟招進來，師兄纔能從家務及打雜事務中解脫出來。這時一般已經快到三年了，然而什麼手藝也沒有學到。所以雖然出師了，還得留在師傅廠裏學手藝。這三年中有工資，却很低。因為你沒有技術，還在學習，沒有獨立工作的本領，跳槽也沒有人要，祇好老老實實地待在原地。

我到中和內衣廠時，大師兄已經在廠裏五年多了，已經有歸自己使用的縫紉機，可以獨立完成一般內衣的製作；二師兄來廠裏兩年多，一直在做家務、打雜。我去後，他帶了我三天，熟悉各種雜務工作。從第四天開始，他上縫紉機，由一名老師傅帶着學做衣服，他也可以指揮我做這做那了，真是媳婦熬成了婆，大不一樣。我雖不願意二師兄對我指手畫腳，但祇能服從，不能有半點反抗的表示，心想熬上一年二年，自己也成了師兄，就也有師弟使喚了。

我的工作，從早到晚，基本上是固定的，很少有例外。早上一早起來（師傅、師兄們還在睡覺），生爐子、燒熱水，供師傅一家人及師傅、師兄們起來洗臉用，然後燒稀飯或泡飯；等我做完這些，師娘出去買早點（大餅、油條、包子之類），我整理車間，把睡覺用的被褥放到角落裏，把縫紉機放到工作位置，因工廠也是睡覺的地方，所以晚上要把縫紉機推到一邊，騰出地方睡覺，早上就要歸位；我為每個人盛好稀飯或泡飯，早飯後再收拾洗碗，師傅們開始工作，師娘去買菜，我就抱孩子（我的表弟）玩；十點左右，摘菜、洗菜、淘米、做飯，炒菜是師娘的事；中午先伺候人吃飯，然後我吃，吃完收拾停當已是下午一點鐘了。午後我表弟要睡兩個小時，我就鎖扣子，釘鈕扣。

我最願意做的是，拿縫紉機機頭到修理店去修理。修理店離廠二里多路，雖然很累，但可以看工人修理縫紉機，或到書攤上看書，《楊家將》就是在那個時候看完的。下午四點左右開始準備做晚飯，晚飯後燒洗澡洗腳水，等工人師傅歇工後，我整理和清掃工作場地，





一九四九年元月當學徒時攝

準備他們睡覺的地方。我總是最後一個洗，最後一個睡。有時晚上不加班，那是最高興的時候，既不幹活也不用抱孩子，就到馬路上玩，或到“百樂門”一帶逛商場（“百樂門”舞廳離我廠約二百多米）。

我像機器一樣地工作，總覺得睡眠不足，不到半年，人瘦了許多，個子又長高了，變成細長條，父親見到我，嚇了一跳，抱住我哭，我也哭了。我姑父的妹妹看到我的變化，對我姑媽說：“你自己的侄子，怎麼也讓他這麼做，瘦成這個樣子。”姑媽說：“學徒規矩不能破，破了，對他的師兄不好交待，以後的師弟也不好帶了。”這話是在我面前說的，我明白姑媽的意思。在這裏，不是姑媽與侄子的關係，而是師娘與學徒的關係，叫幹什麼就得幹什麼。我想，站在老闆的立場上，姑媽是對的，一視同仁，對我处理好與師兄的關係、與工人師傅的關係是有好處的。

師傅（姑父）沒有忘記對我父親的承諾，我到上海三個月，開始帶我見識如何“跑街”。每週一次（週六），我作為他的跟隨（拎包）到上海五馬路華興樓二樓，那是內衣、布匹行業業務交流、買賣的地點。我們中和內衣廠有一張桌子，師傅坐着，我站在旁邊，桌上放着本廠生產的襯衣樣品與各色布匹樣本，不時有顧客來看貨談生意，談成襯衣業務由廠裏做；談成布匹業務，師傅就與有關方談價格、數量、付款時間等，一般先拿貨，後付款，而顧客必須付款後拿貨。

後來我纔弄懂，利用貨與款、供方與需方的時間差做無本錢生意，中間的差價即是利潤。有時一個電話可以賺很多錢。我去了幾次後，對此就很感興趣，希望將來可以賺大錢。師傅的一次失誤，差點傾家蕩產，甚至命都不保，又使我感到商海吉凶莫測，成功與失敗就在頃刻之間。

事情是這樣的：一單布匹生意，客戶是熟客，稱銀根有點緊，希望

先拿貨，三天后付款，他也想學我師傅的辦法玩空手道。因為時間上又算得過來，師傅就同意了。簽了約，布取走了。可三天過去了，既不見匯款也不見人，電話也打不通。到第四天，供貨方要款，師傅拿不出來，一邊答應供貨方晚上一定給錢，一邊將妻兒帶到一家旅館住下。臨走時，他要我們幾個徒弟把廠裏設備看好，不准任何人來搬設備，給了我們一些生活費就走了。第二天，供貨方來找人，我們說沒有回來，問到哪里去了，我們說不知道。他們就走了，後來又來，還是不見師傅。到第六天對方來人就搬設備，我們死活不幹，大師兄關上大門，我和二師兄一邊搶奪，一邊大哭大叫，對方一看不好對付這幫小傢伙，5台縫紉機也值不了多少錢，也就沒有拿走，就找“包打聽”找師傅的去處，揚言要師傅的命。半個月後，師傅全家回來了。後來聽說是通過關係，請黑道人物出面，損失由雙方各負擔一半，開始供貨方不幹，說是我師傅故意要吞掉他這批布。後黑道人物放話，說他不管了，以後出什麼事也不管。供應商害怕了，自認倒楣。這事發生在一九四八年底或一九四九年初。

進入一九四九年，上海的經濟混亂不堪，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生意不好做，許多企業關門，中和內衣廠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師傅自這單布匹業務之後，已無力再維持生產了。他當機立斷，通過關係，把三位工人師傅安排到其他單位工作，將我們師兄弟三人安排到一個軍工廠。

這個廠專門生產軍人衣服、被褥等，縫紉機是自己帶去的。我和二師兄不會做衣服，所以我們三人被安排到生產布襪子的車間，這種襪子的生產很簡單，祇要會用縫紉機就會生產。我除了生產外，還需服侍兩個師兄的生活，但比在師傅家裏輕鬆，工作也單一，真的很開心。

但好景不長，二月下旬，廠內因伙食不好，爆發了一場罷工。工人把吃飯的碗砸了，把盛菜飯的木桶砸了，最後把食堂也砸了。我不懂這些事的來龍去脈，無事可做，就在車間裏閑着。三天以後，說談判勝利了，但厄運也來了，廠裏開除了一些人（帶頭鬧罷工的），解雇了一些人，說生意少了，不需要這麼多人。我們這些臨時招來的工人

首當其衝，我們師兄弟三人被解雇了。

回到中和內衣廠，師傅把大師兄安排出去了（因他會做衣服），我和二師兄不會做衣服，但不能白吃飯，師傅安排我們去馬路邊上擺攤，賣廠裏存下的襯衣、長褲、短褲、內褲等，地點就在“百樂門”舞廳旁的馬路邊上。

那時的金圓券已經不值錢，沒有人要，賣東西一般祇收銀元，所謂大小頭，大頭指袁世凱，小頭指孫中山，師傅教我們如何識別真假。

當時擺攤做生意最大的兩個危險，一是被警察沒收貨物。警察推着大木車，車上是一個大木箱，把小販們的貨物往木箱裏倒。我們對付的辦法是，攤販們祇要有一個發現警察就大叫，大家卷起貨物就跑。等警察走了，再出來擺，一天要跑五六次。我為保安全，把攤擺在中間，不管哪頭發生事，我都可以安全撤離，所以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我沒有被沒收過貨物。第二個危險是，不僅要沒收貨物，而且會被抓去坐牢。當時為了穩定上海市場，維持秩序，為了所謂保衛大上海，對黑市上的銀元交易打擊很厲害。後來發展到攤販、商店不收金圓券、祇收銀元的也屬嚴打之列。國民黨派出大批便衣，冒充顧客去買東西，祇要你不收金圓券祇收銀元，那就會連人帶貨一起帶走。

有一天下午3點左右，有個中年男子到我攤子前問衣服的價格，問我：收不收金圓券？若付銀元什麼價？金圓券什麼價？我當時想到我攤上買衣服的都是一般市民，因為價錢較便宜，料子是一般的布料。我想提出要銀元，如對方沒有，就談金圓券價。這個人穿着西裝，什麼都問，好像不是要買東西，而是在調查，我馬上想到他可能是密探，故我回答金圓券、銀元都要，金圓券與銀元的比例要比政府規定的高些。他問為什麼不按規定收，我說金圓券時刻在漲（貶值），我要到晚上纔回去，所以要收高些，如果收回去的金圓券到晚上向老闆交付時漲價了，我就要挨打。他聽後覺得沒有把柄可抓，就走了，我也慶幸逃過了一劫。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上海戰事已經吃緊，國民黨到處抓人，飛行堡壘（警車）呼叫着飛馳在上海各個角落，天天有捕人殺人的消息，說

是殺共產黨人，叫喊着“誓死保衛大上海”、“朱毛不死，大亂不止”等口號，社會秩序極度混亂。

師傅怕我們在外擺攤出事，也怕對我們的父母不好交待，故讓我二師兄回無錫老家，我仍留在廠裏。

五月中旬，上海已被解放軍包圍，父親那時在吳淞一間漁行工作，解放軍要進攻吳淞，他就逃來上海。其實他當時可以回鄉下老家，他是放心不下我，想到上海看情況而定，若走不掉就一起留在上海，能走就帶我回鄉下。可一到上海就回不去了，又擔心鄉下的母親和姐姐、妹妹，他整天一聲不響，在煎熬中過日子，每天聽着郊區的槍炮聲，向北望着嘆氣。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我們被機槍聲、迫擊炮聲驚醒，大家分別躲在桌子底下、牆腳邊，怕被炮彈擊中。此時解放軍正進攻靜安警察局，該警局就離我們住地二百多米。槍聲很快停止，我們苦熬到天亮。大人不敢出門，我好奇，到弄堂口一看，馬路上全睡着軍人，手臂上戴着紅袖章、身上背着匣子槍的便衣人員在張貼標語：“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慶祝上海解放！”等。我馬上回去報信，大家也就敢出門了。不一會，老百姓都擁到了馬路上。由西邊過來的部隊向東移動，大家鼓掌歡迎。此時東邊傳來槍炮聲，因為蘇州河一帶的戰事還未結束。

三天以後，父親帶着我迫不及待地趕回鄉下老家，平時兩個小時就可到家的路程，斷斷續續地走了一天。一路上有時乘汽車，有時乘自行車，有時走路，馬路上坑坑窪窪，幾乎不能走汽車，大部分是坐自行車走的。回家看到母親、姐姐、妹妹都安全，心裏的石頭落地了。

## (五) 我的父親與母親

父親張啟祥，生于一九〇一年，卒于一九七五年。父親小時候當過鞋匠學徒，13歲喪父，挑起家庭生活重擔，一生沒有讀過書，除從事農業生產外還從事婚喪服務，一九四八年經人介紹到吳淞漁行從事季節性工作。



父親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加上他在村裏輩分較高，所以村民中有什麼矛盾，經常找我父親去“評理”，他說的話一般也就是結論。

我從小就覺得好奇，我們家裏很窮，但有時地主家有什麼矛盾也來找父親，請他幫忙解決。大人都叫他伯伯，小的叫他公公。水漲船高，同輩人叫我小爺叔，弄得我很難為情。父親在村裏有威信，一是他輩分高，說話有分量，二是他能秉公辦事，處理事情公平合理，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

關於我們家的輩份，在五個張姓村落中，祇在泥牆宅和張家木橋兩個村落中有效。因此，我想這兩個村落的祖上是一脈的。但為什麼會演變成一個村落富、一個村落窮呢？我不得而知，也無法調查清楚。

我父親給我另一個深刻印象是外表嚴肅，在家很少言談。但對家庭，對家人是有責任心的。祇要經濟條件好一點，就會買好吃的東西回來。有困難，他從不在家人面前講，一個人承擔。一九四七年的春節，父親遇到了經濟危機，因借錢蓋了三間小瓦房，姐姐出嫁，也借了一些債，平時油鹽醬醋等生活用品賒賬到年底也要結清。他無法兌現，從小年開始，他一人到外面去了，直到年初六纔回來，我看到父親時，一頭白髮。以前聽人說過，人着急了要急出白髮的，這次在父親身上驗證了，這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痛。母親哭了，我們也哭了。我們在家雖因沒有錢而沒有過像樣的年，但與父親所承擔的壓力、痛苦相比，那就不值一提了。

父親的性格耿直，看不慣的事他就說，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打擊，受了很大的委屈。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土地改革時，沒收了地主的浮財，但分給農民時却沒有金銀首飾，原來這些東西被一些農會幹部私吞了。我父親就提出這些首飾到哪里去了，提這問題的還有幾個人。農會幹部為了掩蓋自己的劣行，反誣我父親等三人破壞土改。報到區政府，就把父親等幾個人抓去了，關了三個月不了了之，放出來了。雖然父親等人吃了苦，某些農會幹部的貪污得逞了，但他們在內心的折磨時刻存在着，農會主任後來剖腹自殺了。

一九五八年搞大食堂，父親負責為村裏食堂做飯，但他反對辦食

堂。有一次我回去，他對我說，搞大食堂對老百姓沒有好處，對幹部有好處，他們可以多吃多占。因為他對幹部提出不要搞大食堂，後來就把他調離了食堂。

母親陳三妹，生于一九〇六年，卒于一九六〇年。文盲，一個心裏祇有丈夫、孩子的女人。她從沒有自己的要求，祇希望能讓孩子吃飽飯、有衣穿。她對丈夫逆來順受，雖有想法也不敢當面給丈夫提。父親好客，酒給別人喝完了，自己沒有喝的，菜給別人吃了，孩子們沒有吃的。母親心裏不滿，但還得熱情招待。有時她在我們面前說：“菜吃光了，你們就將就點。”

我們家最辛苦的，就是母親，從早到晚都在勞動，還要洗衣燒飯，但從無一句怨言。母親從不參與鄰里糾紛，不搬弄是非，所以在村上人緣很好。

淞滬會戰時，因種“甲色田”，父親必須為地主家西撤搬東西，說是到了西邊，安頓好了回來接我們。可是很快十九路軍要撤離上海戰場，老百姓就跟着西撤，父親也沒能趕回來接我們。

據老人講，十九路軍讓老百姓先走，然後他們纔撤，仗打得很激烈艱苦，我們那裏老一輩的人對十九路軍是十分贊賞的。

我母親帶着我們姐弟三人西撤。二姐 11 歲，三姐 7 歲，是殘疾人，我 2 歲半。二姐背着我，母親牽着三姐，一路討飯向西。後來日本人追上來了，我們就在田野裏東躲西藏。幾個月後又一路向東討飯回家，回到家裏，發現什麼都燒光了。母親又靠她的勤勞，搭起了棚子，使我們有個棲身之所，一邊恢復農業生產，一邊東拼西湊地維持我們最低的生存需要。

我長大後聽母親講這一段經歷，我真難以想像，一個看似懦弱、并不精明的女人，怎麼能在巨大困難面前發出如此強勁的光輝，克服這麼多的看似無法克服的困難。母親用她的雙手，在戰火紛飛、生靈塗炭的時候，又給了我們姐弟一個家，她用羸弱的肩膀，為我們頂起了一片天。

父親回來時，看到妻兒都在，並有了住所時，直流眼淚。他說：他

怕回來時再也見不到我們了。我想這就是偉大的母愛，偉大的中華民族的精神，再困難，不能把兒女丟下，即便是殘疾的孩子也不能丟下，祇要有目標、有信心，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所有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的母親是平凡的，是億萬農村婦女中的一個，她在我的心中，是一位偉大的母親，我吮着她的乳汁長大，在她的愛護下成長，她沒有條件給我物質的享受，但她給了我愛，使我感到幸福。我不會忘記，她做工時下午發的點心，自己不吃，總要帶回來給我吃；我不會忘記，為了滿足我要一雙膠鞋的願望，她省吃儉用，用賣雞蛋積攢的錢給我買鞋；我不會忘記，她破天荒第一次到羅溪中學來找我，為的是讓我回家吃我喜歡的糯米圓子；我更不會忘記，為了減輕我的負擔，她不顧身患高血壓病（血壓最高時 120/220mmHg），並在乳腺癌手術不到兩年時，就到北京照顧我剛半歲的兒子，等等。

母親為我做得太多太多，而我為母親想得太少，做得更少。在我還沒來得及報答她的時候，她就早早地離開了我們。在我們家，我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母親，每想到母親，我就會熱淚盈眶。

媽媽，我想你！

我的家庭、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沒有給我物質享受，沒有給我物質財富，但給了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精神與力量，給了我勤勞、艱苦奮鬥的精神，給了我各種勞動技能的學習與鍛煉，給了我認識舊世界、熱愛新社會的直觀感覺。所有這一切，對於我今後的成長與認識世界，是無價之寶。

從我懂事開始到學徒生涯（童工）結束，十幾年的經歷，雖然艱苦但不算苦難，這段經歷是我成長的基礎。我比我姐姐、妹妹幸運，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愛。我讀了六年書，她們一天學也未上過。我一直生活在父母身邊，姐姐白天勞動，晚上借住在別人家裏，妹妹 1 歲時就過繼給了別人……

生活是艱苦的，但我學到了如何在艱苦條件下愉快地生活，學到了各種勞動技能和獨立生活的能力。我看到了在日偽統治時期人民

的苦難，看到了上海繁榮的另一面——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現狀。這些經歷，為我在解放後接受共產黨的主張、接受馬列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

## 二、新天地

### (一) 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我家在上海市北郊，時屬江蘇省松江專區，在上海解放之前家鄉已經解放，成了解放上海戰役的後方基地，也是部隊及傷病員的集散地。

我于五月二十八日回到家鄉，一切變了，一切感到新鮮。昔日冷冷清清、死氣沉沉的張家木橋，每家每戶住滿了人民解放軍。我家一間不足 15 平方米的堂屋，住了整整一個班。

由于解放軍的進駐，不僅使大家感到安全，而且人氣十足，經常歌聲嘹亮，增添了熱鬧的氣氛。解放軍每天將室內外打掃得乾乾淨淨，有好吃的，總要給房東老鄉送一碗。可惜當時我們那裏的人不吃蒜薹、不吃辣的，送來的蒜薹燒肉、紅燒肉（辣味）等，大部分沒有人吃。我父親挑些肉吃了，其他都倒了，真是可惜。

住我家的解放軍當中，有一個年紀比較小、與我很合得來的戰士，一有空就和我一起玩。他們唱歌、扭秧歌時，他一定會帶我去。他也教我唱歌、扭秧歌，這為我以後組織村裏的秧歌隊打下了基礎。

我剛從上海回來，父母沒有讓我下地勞動，從早到晚的活動都與解放軍有關。一是看號兵吹號、練號。那時一切部隊的活動都吹號通知，如起床、休息、睡覺、集合等都靠號兵吹號，每個連都有號兵，他們每天上午都練習，我們就在旁邊看，很覺過癮。

二是看部隊操練。上下午都有，有隊列訓練、有刺殺訓練、有戰術方面的訓練，小孩、大人都喜歡看。我們那裏駐過日本兵，抗戰勝利後又來了一個連的國民黨兵，現在又來了解放軍。他們都訓練，我們都喜歡看，比較起來，日本兵、解放軍的訓練刻苦、實戰性強，國民



黨軍則差些，不僅練的時間少，而且也不太認真。

三是看部隊的文體活動。解放軍幹什麼事都不會趕走老百姓，文體活動時還請老百姓一起參加。所以他們不管幹什麼，都有群眾看。他們開會發言，都是講北方話，老人、婦女聽不懂，就問我們聽懂的人講什麼，我們就當“即席翻譯”，想起來的確有意思。

時間一長，相互之間也就熟悉了。住在我家的解放軍戰士，知道我是從上海回來的，是在上海當學徒，認為我出身貧窮，現在又是學徒，應該參加革命，動員我參軍。我對父母講了，他們堅決反對，找班長說，我是家裏的獨苗，不能參軍。以後就沒有再提此事了。

現在想起來，主要是我的覺悟低，對革命、解放都不清楚，僅認為解放軍好，所以父母一反對，我也就不再想了。我有時後悔，要是當時參了軍，現在不是可以有個“離休”的名分了嗎？當時聽說，我們那裏駐軍的師長是長征時的十八勇士之一。

解放軍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南下。沒有了駐軍的農村，一下子顯得冷清了，似乎又回到了從前的樣子。

解放軍走後，我的心情也就變了，無所事事，想着不久又要到上海當學徒，又要過那種機器人一樣的生活。到七月中旬，上海傳來消息，叫我不要到上海去了，中和內衣廠關門了。

雖然可以不再去做學徒，可以在老家，却又產生了另一種失落感。當學徒雖然苦，但可以熬出頭，可以離開農村到上海工作、生活。如今又祇能一輩子待在農村了。思想是矛盾的，又沒有其他辦法，祇好安下心來種地。

剛解放，除政權變更外，其他還是按原樣進行，地主照樣雇工，農民照樣種地。我開始了在地主家當小工的新生活。那時，租給我家土地的東家正在蓋房，我就去當小工。他家的兒子與我同年，有智力障礙。我早就小學畢業了，他還在讀二年級。所以我的另一個任務是幫他復習功課。

解放初期，解放區的主要任務是政權建設，先建立縣、區、鄉政府，各村組織了農會，指定了農會主任、村長。將國民黨時期的區、鄉

長一般都抓起來了，保長們有民憤的也抓起來，沒有民憤的交農會監督管制。

我們村（當時叫和橋村）的工作是由山東南下的女鄉長直接負責。她個子不高，很結實，腰裏別着一把匣子槍，風風火火，說話很乾脆利索，到我們村來了幾次，指定張文具當農會主任，王德俊當村長。為什麼讓他們當？不清楚其中原因。這兩人都沒有在地主家租過地，也沒有為地主打過工，應該算中農，也叫自耕農，自己的土地自己種，但他們都能說會道。後來我想，可能是他們積極靠近鄉長的緣故，叫做積極靠攏組織。

剛解放，南下幹部對本地不瞭解，祇要沒有大的問題，又是本分的農民，積極與領導配合，就指定為領導，不像後來選生產隊長，群眾不僅要考慮你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要考慮你的人品。這兩人在土改中沒收了一批地主的浮財（金銀首飾），却不翼而飛，反而將反映情況的人誣為“破壞土改”而坐牢三個月，土改後他們都離開了領導崗位。農會主任在文革中自殺身亡。因為這件事涉及到我的父親，所以我一直十分關注這兩個人的去向。

解放後最大的特點是開會多，有村裏的、鄉裏的還有區裏的各種會。村裏開會比較簡單，到鄉里、區裏開會，各村都有組織地前往，隊伍前面有鑼鼓、彩旗，以後又發展到有秧歌隊，一路上鑼鼓喧天，又唱又跳，甚是熱鬧。到了會場上，分片坐下，各村間互相拉歌。這都是跟解放軍學的，氣氛相當熱烈。唱得最多的歌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以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都是解放軍教的。那種熱火朝天的群眾活動的場面，在以後的各項政治活動中均有體現，令人嚮往，令人難忘。

共產黨辦什麼事都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相信群眾。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肅反、鎮反、三反五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鬥爭、大躍進、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抗議帝國主義的侵略，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表達對友好國家人民的感情、歡迎他們的領導人等活動，也是發動群

衆，所以群眾關心國家大事，政治熱情高漲。為什麼？因為共產黨把人民群眾當國家的主人，哪有不讓主人瞭解、參與的道理？國民黨把群眾當阿斗、當工具、當奴隸，都要隨他們的指揮棒轉。玩政治，是他們的事，叫你做什麼就得做什麼，叫你怎麼做就得怎麼做，否則會受到鎮壓。不讓群眾關心國家大事，更不會搞群眾運動，他們怕群眾，怕群眾知道了他們的那些事就會起來造反。共產黨與國民黨背道而馳，在國統區宣傳群眾、發動群眾、搞群眾集會、示威抗議；解放後，則公開宣傳群眾、發動群眾關心國家大事，進行群眾性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以後，情況又變了，群眾活動少了，又似乎回到了解放前。我作為經歷過幾個時代的人，相比之下，我更嚮往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熱情和人民群眾參與國家大事的積極性。

## （二）學校向工農開門，圓了我的讀書夢

一九五〇年六月間，小學同學張健生來找我。他住西宅，後來高中畢業保送留蘇，學成回國效力，現退休居上海。他對我說，現在解放了，學校要向工農開門，工農子弟過去因沒有錢上不起學的，現在可以去上學，學校提出了向工農開門，凡是沒有錢讀書的窮人家的孩子，可以不交學費，生活有困難的，可以申請助學金。他動員我去，七月份報名考試。聽到這個消息，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可以圓我的讀書夢，憂的是家裏經濟困難，不僅無錢供我讀書，而且我現在已成了家裏的重要勞動力，怕父親不同意。

為了能說服父親，我到學校去瞭解情況，結果與同學說的一樣。我強烈的學習願望，父親是知道的，父親說他沒有錢給我，我聲明不用家裏的錢，申請助學金，而且保證積肥、車水等工作照樣完成，最終說服了父親。通過考試，我被錄取了。

羅溪中學是寶山縣三所中學之一，是一所私立中學，在當地是很有名氣的。校牌是馮玉祥將軍親自寫的，校長沈同文是地方上的名流、教育界的名人，其弟沈同衡是美術家、老革命，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負責人之一。

沈校長按照黨對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學校向工農開門”、“採用新課本”（即解放區的課本）、“教育與勞動結合”，這三條在當時既大膽又先進，成為蘇南教育界的一面旗幟、先進典型。

羅溪中學的任課老師業務水準都比較高。他們之間平時用英語交談，上課時非常認真，講課深入淺出，很容易聽懂。老師都平易近人，師生關係十分融洽。有的老師中途調離，在告別會上，師生都痛哭流涕。我們的任課老師中，之後有的調入大學工作，有的調入省裏重點中學高中部，從校長到學生都依依不捨。

一九五〇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過去無錢讀書的貧苦農家子弟占 1/4 以上。這屆學生的特點是年齡相差大，文化水準相差大。我比當年小學畢業即入學的同学大 3 歲，有的同學比我大 5 歲。休學多年的學生，文化水準肯定不如應屆畢業生。但這些學生由于有切身的感受，對學習都十分認真刻苦，所以經過一年左右的學習，絕大多數趕上來了。畢業後，大多數升入高中并考入大學，一部分考入中等專業學校，在各行各業的崗位上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而奮鬥。

羅溪中學在沈校長領導下，把教育與國家的重大政治活動緊密結合。我們在校期間，經歷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大政治運動。學校組織學生學習土改法，弄清劃分階級成分的標準，組織學生參加社會上的憶苦會，到農村宣傳土地改革的重要性、政策等。通過學習、宣傳及參與土改的一些實際活動，學生瞭解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瞭解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針，回到農村參加土改的活動，起到了推動土地改革的作用，同時也提高了學生的階級覺悟。

在開展土改的同時，抗美援朝運動蓬勃興起。老師給我們講解形勢，學校組織我們游行示威、參加捐獻活動、歡送同學及其他青年參軍、參幹，積極參加反對美國對我國發動的細菌戰。在寶山長江口漂有大量的食品、衣物等，經檢驗是美國用飛機投放的帶有各種細菌的物品。寶山縣政府組織全縣人民（包括學生在內）日夜打撈，撈上來的物品，一律焚燒并掩埋。這些學習與活動激起了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學校又引導學生把仇恨化為學好本領、將來建設強大國家的動力。



那時候，雖然社會活動很多，經常停課，但同學們學習都非常刻苦努力，加上老師的認真教導，所以學習成績都還不錯。

全國範圍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是在一九五二年開展的。新中國成立不久，美國發動了侵朝戰爭，國內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在大張旗鼓地進行，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國內外形勢使得階級敵人瘋狂地反撲，殺人放火、破壞建設、造謠惑眾等等，時有發生。為穩定新生紅色政權，為使土地改革順利進行，為了更好地抗美援朝、打敗美國的侵略，一場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開展。中央發布了懲治反革命條例，號召廣大群眾檢舉揭發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也敦促反革命分子自首投案，爭取寬大處理。為了震懾敵人，對證據確鑿的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進行公開宣判，立即執行槍決。

羅溪中學操場是羅店鎮鎮壓反革命集會的地點，學校後邊到連祁河邊的空地就是刑場。每次宣判大會結束，就把反革命分子押赴刑場槍決。每次宣判大會全校師生都參加。大部分反革命分子聽到宣布“立即執行”後身體癱軟，也有個別反革命分子聽到宣判後高呼反動口號。女同學怕看殺人，更不敢到刑場上去看死人，我們一些男生膽子大，散會後跑到刑場去看。在我校操場開宣判會有5次以上，每次少則七八人、多則十多人被槍決。縣公安局先把犯人關在我們教室裏，開會時押上來，五花大綁，我想敵人看到這種場面，一定是心驚肉跳的。

鎮壓反革命高潮期，不管農村與城鎮，晚上都實行宵禁，解放軍、民兵值班、站崗、巡邏，也組織部分學生參加，我也是其中之一。雖然晚上站崗巡邏、白天學習比一般同學辛苦，但很願意，也很興奮。一則是因為領導的信任，二來是認為直接參與了鎮反工作，有自豪感，同時也鍛煉了自己，增長了見識。

有一次解放軍的通訊員騎自行車快速進入我們防區，我們叫他停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自行車上跳下，端着衝鋒槍，槍口對着我們大聲喊：你們是什麼人？我們一看是解放軍，問他“口令”，他回答後問我們“回令”，我們也答對了，說明是自己人。口令和回令一

般是一天一換，有時一晚上換兩次，以防泄密。在那種氣氛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弄得不好，就會誤傷人。在我們村，有些人對晚上禁止外出不以為然，有時出外沒有按時回來，給站崗的解放軍解釋一下就放行了。敵人利用解放軍的寬厚，襲擊了哨所，解放軍犧牲一人，敵人跑了。之後部隊要求嚴格執行宵禁令，有位鄉親因事外出回來晚了，哨兵問他口令，他說不知道（老百姓當然不會知道），叫他停下，他繼續往前走，哨兵就開槍打傷了他的腿。出了這件事，村民纔真正重視起來。

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緊密結合，使學生瞭解并關心國家大事，把個人置于國家的事業中，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知道自己的學習為了什麼，將來如何為國效力，這是在羅溪中學三年學習中的收穫。進羅溪中學時，想通過讀書改變家庭世代為農、生活困難的境況，也為了改變自身的境況。三年後走出羅溪中學校門時，我考慮的是如何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羅溪中學教育的另一特點是與勞動緊密結合。學校安排每週有半天的勞動，勞動與教學結合，也與技能教育結合。勞動一般由植物老師帶領，種菜、種糧食作物。老師根據不同的內容講解，我們在實踐中學習、體會。如種菜，從平整土地開始，到播種、澆水、施肥、整枝、消除病蟲害、收穫等全過程都要學。我們還要學習打草鞋、織毛衣等技能，勞動成果歸學校。學校因為向工農開門，很多學生不交學費，教學經費肯定拮据，勞動果實多少可以貼補一點。

羅溪中學在沈校長的領導下，師生關係、同學關係都十分融洽，我至今懷念。特別是我的班主任老師陳佩玉，南京金陵大學畢業，在我們班教語文。我作文寫得好，每次都是甲或甲上成績，不少篇作文在全班作為範文。陳老師對我要求更嚴，不僅在學習上有高目標，而且在社會工作、人品修養方面，都要求我走在別人前面。他幫我交書費，希望我讀大學文科。我因家庭經濟太困難而未考高中，他總為我惋惜。我到北京上學、工作期間，回家時總要去看望他。他在我們畢業後調到常州中學高中部任教。我每次去看望，他都要留我吃飯，我



們情同父子。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時，有人誣陷他是國民黨特務，他上吊自盡了。我聽到此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師恩未報，恩師先我而去。嗚呼！

羅溪中學同學之間，在共同學習、共同勞動、共同參加國家各項政治活動中結成了深厚的友誼，情同兄弟姐妹。雖然畢業後各自選擇了不同的學校、行業、單位，但同學之間聯繫不斷。一九九八年同學第一次聚會，全國各地的同學都如約而至，暢談別後情況。大家要求再聚，二〇〇八年又聚了一次。本來說好是最後一次，可大家又要求再聚一次，所以在二〇一二年十月又聚了一次，有的年齡已超過八十歲，最小的也已七十四歲了，可見同學情誼之深。



四十二年後與莊正鈐合影留念，一九九八年于江蘇宜興

我的同班同學莊正鈐在校時是學生會主席，我與他分別考入燃料工業部所屬的北京電力學校、北京石油

學校，畢業後我留校任教，他分配到青海冷湖油田工作。他知道我家裏生活困難，每月給我家裏寄錢，一年後我纔知道這事，我寫信表示感謝，并要求他停止寄錢。另一個同學杜一華是南京航空測量學校畢業的，後在首都機場任經營處長，得胰腺癌，知自己時日不多，要我去見一面。我趕到北京協和醫院與他見面。他見到我精神一振，堅持着說了一下午話，從羅溪中學讀書談起，談到婚姻、工作、病況，說就想在走之前與同窗好友見一面。整個下午，他是在掙扎中堅持的，每個姿勢堅持不了兩分鐘。告別時，我說明天我再來，可等我第二天再去時，他已于昨晚走了。他愣是掙扎着見了我後纔離世的。

這種同學情誼怎麼不叫我感動！他就這樣走了，怎麼不叫我痛徹心肺！

### (三)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共產黨在農村極為重要的政策。黨解放勞苦大眾，讓勞苦大眾當家作主，在農村首先要打倒地主階級，讓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地得到土地，翻身當主人，發展生產，支援國家建設。所以土地改革是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

上海地區是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的，經過一年多的準備，一九五〇年下半年開始土地改革。我那時已經在羅溪中學讀書，學校組織我們學習了土地法大綱，老師給我們講了啥人養活啥人的道理。在討論時，我不同意農民養活地主的說法。以我家為例，如果沒有地主租給5畝地，我家就無法維持生活。因此，我認為，地主、農民是相互依存的。老師批評我，說我階級覺悟不高，受到地主的殘酷剝削還為地主階級唱贊歌，重點幫助我提高認識，因此也推遲了我的入團時間。本來我應當是第一批入團的，結果推遲到第三批。

我用在學校學到的道理，回鄉進行宣傳，參加村裏的土改活動。在我們村裏，土地改革進行得比較順利，因為地主們沒有民憤，能配合土改，沒有不法活動，所以沒有打罵、鬥爭地主的情況發生。地主與農民一樣，分配一份土地、住房，讓他們自食其力。他們多餘的房



屋、土地沒收分配給貧苦農民。

我家當時有四口人(父、母、我、三姐,二姐已出嫁),自己家有1畝地,故劃為貧農(雇農指自己沒有土地,完全靠給地主打工為生)。村裏人均土地面積為1.3畝,所以我們家分得土地4.2畝,加上自家的1畝,全家有土地5.2畝。

劃分成分是根據具體情況而定的,如有一個叫張慕生的人,他們家平時生活也困難,祇有很少的地,平時吃飯、穿衣都與一般農民差不多,但劃成分時定為“破落地主”。大家搞不懂,工作隊向大家講解:張慕生家裏過去和其他地主一樣,土地不少。因其好吃懶做,又好賭,逐步把土地、房子賣了。但他們全家的生活來源主要靠收地租,他們宗族在外地有一片土地,這片土地沒有分給個人,所以誰也不能賣,每年收的地租分給宗族成員,而張慕生主要靠這筆地租來維持生活,所以雖然其生活不富裕,但是靠剝削生活,應該劃為地主成分。又因為其家境沒有什麼可沒收的,還要分給他土地,故叫“破落地主”。

老張宅有一青年,平時好吃懶做,解放前靠撈魚摸蝦生活,後來成為專職壯丁。上面派下壯丁名額,鄉長出錢讓他去。他拿到錢後,先揮霍一半,即去國民黨軍當兵。不到三個月,他就逃回來,用另一半錢。下一次上面又派下壯丁,鄉長如法炮製。他一共當過三次壯丁。他一個人,無家室,家裏一無所有。土改時,成分定為“二流子”,照樣分地分房。可他惡習難改,仍好吃懶做,文革初期嚇得上吊自盡了。而出錢讓他當壯丁的鄉長,他用賣自己土地的錢買壯丁,不坑害百姓,百姓口碑甚佳,成為解放後沒有受處罰的極少數國民黨鄉級領導人之一。

農村土改分三個階段,學習宣講階段,主要是組織農民學習中央土地改革法。方法是由工作隊宣講,弄清土地改革的意義與政策。同時組織憶苦會,控訴舊社會,控訴地主的剝削,激發起群眾參加土地改革的熱情。

第二階段是劃分階級成分,這個階段政策性很強,不能主觀臆

斷，要深入對每戶（包括以後被劃成地主的家庭）核實人口、土地、房產等，工作量非常大。貧雇農的成分相對容易定。在貧農與中農、中農與富裕中農、富裕中農和富農、富農與地主之間的界定就要進行各種計算，特別是富農與地主的區分，是以剝削量來劃分的。而兩者的政治、經濟待遇相差甚遠，一旦弄錯，會給對方造成極大的損害。所以區、鄉政府也特別重視這個檔次的把關。

當時村裏的中學生本來不多，貧農出身的中學生更少。我就被工作隊叫去參加計算和統計工作，所以對這個階段的工作難以忘懷。

第三階段是分浮財、分地、分房。這是窮苦百姓盼望已久的事，那種期盼，那種渴望得到土地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那段時間，參加會議的人特別多特別齊，沒有缺席的，連小孩子也去。分地分房時，因為事先已經計算好了，會上祇是宣布誰分得多少地，在哪里，哪戶分得幾間房等。分得土地和房屋的家庭第二天就開始熱鬧起來，看地釘牌子，看房準備搬家，着實熱鬧了一陣子。

分土地、分房子，工作隊都有計算的依據，因此比較公平合理。即使有意見也祇是土地遠近的問題、房子好壞的問題。浮財分配包括地主家的生活用品、生產工具等，從衣服、被褥、家具，到農業生產用的各種農具，由農會幹部說了算。這樣的分配往往憑幹部的印象、好惡、關係親疏等而定，所以分配後有不同反映。最突出的問題是發現分配的浮財中沒有金、銀、玉器，就問農會幹部這些東西到哪里去了，他們說沒有看見。農民去問地主，地主說都被抄走了。於是，群眾對農會幹部不滿，群情激憤。為了平息風波，農會打報告給區鄉政府，說有人聚眾鬧事，反對農會，破壞土改。區政府不問青紅皂白抓了最活躍的三個人，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三個月後，土改完成了，被關的人也被釋放了。

對此事，我很長時間內總是耿耿于懷，總想為我父親討個說法。因為農會的兩個主要領導，本來與我父親的關係是不錯的，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為了掩蓋他們私分浮財的醜行，竟誣陷揭發他們的人反對農會、破壞土改，使他們遭受不白之冤。六十年代，我準備回去找

他們討個說法，聽說農會主任為此事長期受到良心的煎熬而剖腹自殺了。聽後雖感到他罪有應得，但究竟罪不至死，何況我從小與他很熟（因他與父親的關係），我又有點同情他、可憐他。

土地改革是我人生中經歷的第一次政治活動，也是在實踐中認識共產黨、認識黨的幹部（工作隊均為南下幹部）、認識黨的政策的重要性、認識群眾利益不可侵犯的一次學習，對我日後的成長及工作都是十分有益的。

#### （四）縣政協代表與縣學聯委員

解放初，從中央到地方，都由政治協商會議代行人大職權，政協代表參與管理國家及地方事務。

一九五二年春，我被推選為寶山縣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縣共六名學生代表，每個中學兩名，我校是我與杜一華。在校期間，我參加過兩次政協會議。政協的代表面很廣泛，有工、農、商、軍等各界代表，還有資本家、開明地主當代表的，我們沈校長也是政協代表。

在一九五二年春的代表會議上，長興島的一個代表被宣布撤銷其代表資格并當場逮捕。他是地主，解放後積極靠近政府，當時認為是開明地主，後來在土改中發現民憤很大，而且破壞土改，所以逮捕法辦，撤銷其代表資格。

政協開會的程序與現在差不多，先通過會議議程，代表資格審查，再作政府工作報告，然後審查提案等。每次會議十天左右，小車接送，住招待所（那時沒有賓館），吃得很好。第一次參加那樣的會議，第一次坐小汽車，第一次住招待所，第一次有那麼多好菜吃等等，對我來說有太多的第一，新鮮事天天有。我們六個學生代表為一個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討論提案，早上和晚飯後到海塘邊散步聊天，晚上看文藝節目。

我在會議期間，認識一位解放軍代表叫楊香九，是一位連長、戰鬥英雄。我們請他講戰鬥故事，我回校後寫了一篇作文《我所認識的楊香九》，語文老師大加贊揚，并讓我在班上念，讓大家討論。我到北

京讀書後，沒有繼續與楊香九聯繫了。

我是嘉定縣人，但對嘉定的情況一無所知。因為參加寶山縣的政協會議，所以對寶山的情況比較瞭解，如當時寶山的人口、土地、經濟、土改、鎮反、反細菌戰活動等等。

一九五二年春，寶山縣成立“寶山縣學生聯合會”，我是委員之一，并被推舉為體育部長。我當選為學聯委員，事先并不知道，學聯開會時纔知道的。

學聯成立後的第一件事是籌備寶山縣第一屆運動會，我成了籌委會成員之一。籌委會的工作人員主要是三個中學的體育老師，加上少數小學的體育老師。他們參加過運動會，懂得如何搞，如運動項目的確定、器材的準備、運動會的程序、場址的確定等等。

由于我是委員，他們擬定的事項需要我來點頭，這確實有些為難，因為我什麼也不懂。我愛好體育，但僅僅是喜歡玩，如打籃球、跳遠、墊床運動等。運動會我却沒有見過，所以對他們提出的事項難于發表意見，祇能說你們認為怎麼辦好就怎麼辦。

經過半年的籌備，一九五二年秋天，在羅店鎮召開了寶山縣第一屆運動會。城鎮居民、農民來看運動會的人很多，很熱鬧，運動會進行得也比較順利。我除了要關心運動會的進程，解決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外，自己也參加了項目，我的三級跳遠成績縣紀錄保持了許多年。運動會在當時影響很大，縣領導也很滿意。

當時的學聯，不像現在祇掛個名，少數人在做什麼誰也不知道。我們當時主要是搞群眾體育，動員群眾鍛煉身體、活躍生活，很受群眾歡迎。我們組織的籃球賽，幾乎每週都有，有縣際的、校際的、鎮際的，總是吸引了許多觀眾，籃球場周圍裏三層、外三層，打出一個好球，掌聲雷動。

我們學校除校隊外，還有一個由學生自發組織起來的籃球隊——“黑隊”，發起人就是我，在當地小有名氣。我經常組織外地球隊到羅店與黑隊賽球，影響較大。幾十年後，我回到羅店，有些老人見了說面熟，我說我是羅溪中學五〇屆的學生，打籃球比較多，他們就說，你



是黑隊的。打球很費鞋，有時十來天一雙。媽媽來不及做，練球時就赤腳，賽球時穿鞋。看到別人穿解放鞋，既跟腳又好看，我想盡一切辦法買了一雙。平常不穿，比賽時穿，壞了就補，一直穿到從羅溪中學畢業，已經看不出解放鞋的原樣了。

一九五三年春，松江專區組織所屬九縣的籃球、排球比賽，我們又忙了一陣子。結果讓我這個從未打過排球的人當排球隊長，臨時組織了 12 個人，練了半個月就上陣了，成績可想而知，墊底！

在羅溪中學的 3 年中，我粗略算了一下，大約有 1/4 的時間從事各種社會工作及參加政治運動，對學習肯定有影響。但我仍名列班上的三甲。

三年的中學生活，使我學到了文化知識，懂得了生活目標，鍛煉了我的工作能力，也使我初步涉足了政治生活。這一切，對於我今後的學習、工作無疑是極為有用的。所以，我感謝羅溪中學！感謝老師！感謝沈校長！

### (五) 新的開始，到北京電力學校學習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考上了燃料工業部北京電力學校。那時考試，學校是不管的，想考什麼學校自己找，自己去考。我沒有聽從語文老師要我上高中、將來考大學文科的指教，也沒有聽從體育老師希望我學體育的指教，而是選擇了考中專工科，原因是家境貧困，想早日工作，以幫助家庭。我喜歡工科，我又嚮往毛主席住的地方——首都北京。

燃料工業部下屬 3 個學校，北京電力學校、北京石油學校、北京煤炭學校，同時到上海招生。我們有 3 個同學考上了北京電力學校，3 個同學考上了北京石油學校，事先是不知道的，錄取後互相打聽纔知道。

燃料工業部後來分成電力、石油、煤炭三個部，以後在電力學校、石油學校的基礎上分別成立了北京電力學院、北京石油學院。

北京電力學校地處北京市西直門外北下關，學生原在天津一個

技工學校上課。一九五三年在北京正式建校，也有了第一批畢業生。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天津、河南、上海招生，設汽輪機、鍋爐裝置、發配電、電廠化學四個專業，為電力事業培養中等技術人才。從我們這屆學生開始，全面實行蘇式教學體系，聘有蘇聯專家組駐校指導工作。

北京電力學校當時是電力部唯一的培養電力事業建設人才的學校，也是幹部培訓、提高的場所。

解放初期我國電力事業發展很快，很多老革命轉入經濟建設戰綫。電力戰綫也一樣，為了幫助他們儘快掌握電力科學的基本知識，廠、局級幹部在北京電校進行輪訓，時間為半年到一年。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脫產學習的廠、局級領導幹部近 200 人，每年向電力戰綫輸送各專業畢業生 400 人左右，北京電力學校為新中國的電力建設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在北京三年的學習中，我目睹了首都的偉大變化。一九五三年九月初，剛到北京時，公交車還有用木炭做能源的，很少有現代建築。三年後一切都變了樣，連蔬菜的品種也多起來了。剛到北京時，南方蔬菜品種見不到，後來應有盡有，主食花樣也更多了。

記得剛到學校的當晚，上海同學看到金銀卷，以為是麵粉和雞蛋做的，有的同學一下子拿了好幾個，一吃發現不是雞蛋、白麵而是六角粉（玉米麵）做的，都不吃了。到一九五六年時，玉米麵很少吃了。

我們讀書時，不交任何費用，吃飯也不要錢，連碗筷、馬扎都是發的，伙食費用每月 9 元標準，吃得很好。

三年的業務學習，使我從一個沒有任何電力科學知識的農村青年，成為一個初步掌握了電廠鍋爐裝置專業的安裝、運行、設計的中專畢業生。剛進學校時，到石景山發電廠參觀，在鍋爐裝置上興奮地上下跑動，問老師鍋爐在哪里，老師說你下邊、上邊都是鍋爐。當時弄不明白，鍋爐有那麼大，幾層樓高，當你瞭解、掌握了它的形體、功能、部件的組成之後，就感到人類的偉大，發明了這種造福人類的現代工業設備。

三年的學習，也讓我成為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生活目標更明確

了，更堅定了。在北京電力學校黨組織的幫助教育下，我於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我來說，參加中國共產黨，為黨奮鬥一生是很自然的、順理成章的事情。黨解放了我們勞苦大眾，黨的奮鬥目標也是我的人生目標。為了實現黨的目標，需要千千萬萬的有志者為之奮鬥，所以我在一九五四年初寫了入黨申請書。

我們班有一位轉業軍人叫劉少蘭，她年齡較大，是預備黨員，她經常找我談心，說我缺乏共產黨人的胸懷，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她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我們班存在團結問題，要我帶頭解決。我雖然在組織上服從了，但心裏很勉強。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班由京津、上海、河南三地學生組成，各占三分之一，問題出在上海與河南同學間。由於歷史原因，上海同學嫌河南同學不講衛生（不洗腳，很少洗澡，甚至不刷牙）、身上有蝨子，髒，看不起河南同學，講些不好聽的話，不願和他們住一個宿舍、坐一張課桌。而河南同學則認為上海同學嬌、驕二氣嚴重，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突出，也不願意與上海同學交往。

班主任為了做好團結工作，解決這些矛盾，除了進行思想教育外，還從組織上採取措施，進行宿舍調整，每個宿舍三地學生混住。討論中上海學生堅決反對，不同意搬到河南同學的宿舍。我雖然沒說反對，心裏也不願意。為打破僵局，班主任、劉大姐（那位轉業軍人）找我談話，要我帶頭。我祇好服從領導安排，雖然內心不願意，但還是搬到了河南同學的宿舍。

我是農村來的，也是貧苦出身，比起上海市區的同学來，則要土得多，隨便得多，加上對自己嚴格要求，平時還能與河南同學友好相處。但住到一起後，對那股難聞的味道還是感到噁心，尤其看到他們津津有味地捉蝨子，一個一個往嘴裏送，實在感到難以忍受。兩天以後，我身上也有了虱子，我再也忍無可忍了，找班主任要求搬出來。班主任嚴肅地批評了我，他對我說，河南經濟比較落後，又缺水，生活習慣與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肯定不同。他們不講衛生是不好的習慣，要幫助、教育他們改過來。上海同學講衛生的習慣是好的，但不能嫌

棄別人，應該去幫助別人，大家一起進步，這纔是一個進步青年應該做的。你搬出來，你乾淨了、衛生了、舒服了，他們的習慣仍不變，還是不洗腳、不換衣服、不洗被子、不刷牙，身上有蝨子，你能高興嗎？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活動、一起吃飯，能分得那麼清楚嗎？你想的不應該是搬出來、獨善其身，而是如何改變河南同學的不衛生習慣，如何改變宿舍的面貌。班主任提出先從滅虱子開始，並講了具體做法。

班主任的話，對我震動很大，我決心改變被動局面，主動和同學們商量如何滅虱子等問題。同學們也願意改變現狀，於是我們同心協力，用開水洗衣服（先洗澡，把衣服換下來）、泡被褥，將六六粉灑在床板上、宿舍的地上、牆角，使虱子無處藏身。經過兩次這樣的大清洗、大掃除，把可憎的虱子給消滅了。河南同學也漸漸地講究衛生，經常換洗衣服、洗腳、每天刷牙，定期集體拆洗被褥等等，同學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地和諧了。

這件事成為我前進中的重要事件，一方面使我認識了自己心靈深處的自私，考慮自己多，不去團結大家改變不衛生的面貌，班主任、劉大姐的批評是對的。另一方面這件事也成了我在入黨審查中的大事。黨組織要我深挖思想根源，也為此拖延了我入黨的時間。

我要感謝班主任，感謝劉大姐，他們是我到北京後走向新的人生的啟蒙者。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年齡比我大不了多少，共產黨員，叫張純三。他後來調到水利電力部工作，在水利電力部監察局長任上退休。最後一任班主任叫孫國柱，共產黨員，工作深入細緻，對人和藹可親，學生都尊敬他。他們兩位對我影響最大，也是我學習的榜樣。孫老師一直在學校工作，在華北電力大學北京研究生院副院長任上退休。

在三年學習中，社會工作一直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剛到北京不久，寶山縣政協、學聯的有關開會通知、材料、提案處理等由羅溪中學轉到北京電力學校再轉交給我，這樣校方知道了我過去的情況，開始讓我當學生會的學習部副部長。部長是三年級學生王昱，她出主意，具體工作我做，算是傳、幫、帶。



第一學期結束，因我們班上比較亂，班主任與學校商量，調我回班上當團支部書記，直到畢業。團支部書記是班上的核心，班主任的得力助手，班主任的意圖、決定大多通過團支部去貫徹。

由于地域不同、生活習慣不同、城鄉差別、經濟條件不同、成長環境不同，同學之間差異就很大。一般來講，轉業軍人（我們班有5人）覺悟高、自覺性強，但文化底子薄、學習壓力大；農村學生學習刻苦、生活簡樸、比較聽話，他們看不慣城裏的學生，認為他們小資產階級思想濃，不好相處；城裏的學生，特別是上海地區的學生，見多識廣，腦子靈，多數家庭生活條件好，學習成績好，看不起其他地區的同學。

在我們班上，鬧不團結的主要是上海地區部分同學與河南地區的部分同學。京津地區的同學比較隨和，兩邊不摻和，兩邊不得罪，星期六放學後回家，星期天晚上回來。所以當時有一公式形容三地同學情況，即（上海地區同學+河南地區同學）÷2=京津地區同學。例如穿衣服，上海同學的衣服比較緊身，褲腳小，河南同學的衣服肥大，特別是褲腳大，二者相加除以二，等于京津地區同學所穿衣服的大小。又例如，上海地區學生多數經濟條件較好，河南地區學生生活困難的多、經濟條件差，京津地區學生的經濟條件在兩者之間，性格上也差不多如此。

據此，我們分析班上團結問題的關鍵在上海同學，他們居高臨下，看不起河南同學，引起河南同學的反感。所以我們把工作重點放在上海同學身上。經過一學期的努力，形勢有很大的好轉，不能說彼此親密無間，但也沒有什麼大矛盾了。

在任何情況下，我認為要以身作則，纔能有發言權。如上面講的，我搬到河南同學宿舍一起滅虱子。在助學金問題上亦如此。

我家的經濟情況土改後雖有好轉，但因三姐離婚回家，受刺激瘋了，增加了負擔，無力支持我在北京的生活費用，家裏每年還要領取困難補助。按理說，我完全有理由申請人民助學金，但看班上困難同學比較多，我放棄了申請，轉而求助于我的好朋友張乃昌。他在日寇投降後初小畢業即到上海當學徒，解放後在上海的街道辦事處工作。

我們是鄰居，是發小，一起上學，他比我大2歲，論輩分我比他長一輩，但我們兄弟相稱。他表示全力支援我，根據我的要求，每月寄5元錢作為我除吃住外的生活費用，他每月領到工資就給我寄錢，將近持續了2年時間（第三年，我女朋友中專畢業參加工作，她給我寄錢了）。其間，同村另一好友張志高也在經濟上支持我。

那時的5元錢是什麼概念？相當于一般人工資的 $1/6 \sim 1/8$ （月工資30～40元），我們之間的情誼可見一斑。

祇有自己堅信不移，纔能叫別人相信，祇有自己做到，纔能叫人去做，這是很早就形成的信念。我從學生時期開始，一切都帶頭幹，從學習到建校勞動，從團結同學到社會工作，從體育活動到文藝活動等，有時我很不願意，但為了工作我還是硬着頭皮幹。如跳舞，那時跳舞盛行，每週六都開舞會。學生、老師到大禮堂跳交誼舞，有時蘇聯專家也去，團中央也號召跳舞，穿花襯衫。我雖不喜歡跳舞，但每次舞會都去，自己不跳，站在一旁看同學跳舞。正因為我能處處、事事帶頭，所以在班上也就頗有“權威”，調皮的同學在我面前不敢“胡鬧”，有事可以擺平，班主任也就會把更多的事交給我辦，連實習隊長也要我當。到工地、到電廠，一個班四十來人，從路上安全到住地的吃、喝、拉、撒，同學實習情況的瞭解與彙報，都叫我幹，很累，很苦，但也因此讓我在學習期間得到了各方面的鍛煉。一畢業學校就讓我帶學生到工地實習，我駕輕就熟，工作輕鬆而順利。



張乃昌與夫人金彩英二〇一〇年攝于老家

## (六) 蘇式教育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強調向蘇聯學習，教育系統也是一樣。北京電力學校從我們這一屆開始，全盤按蘇聯模式進行教學工作。

學校聘請了三位蘇聯顧問，由蘇聯人教俄語，教學大綱、教材、教學模式全按蘇聯的一套辦。

我這裏講的“蘇式教育”，其實指的是教學體制、模式、內容。在學生思想教育方面，則是有我國特色的。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學習目的教育、形勢教育，讓學生在學習業務的過程中，解決人生觀、世界觀的問題，解決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問題，把學習與祖國建設、與為人民服務結合起來。綜合起來講，就是教育學生為祖國、為人民而學習，學好本領為人民服務，自己是屬於國家的、人民的，因此沒有理由不學習好。

這種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學生學習都很自覺，違反學習紀律的情況基本不存在。同學間自願組織學習小組，相互幫助，共同進步，最後都能以比較好的成績畢業走上工作崗位。畢業分配時填寫的志願都是這樣寫的：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我班同學分配到祖國各地，沒有一個鬧情緒的。班長孫祥榮帶頭支邊到新疆，他是江蘇無錫人，後任電廠廠長，是全國勞動模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新疆的電力建設事業。

當時對形勢教育抓得很緊，定期有形勢報告會，結合國內外重大事件，請有關負責人作形勢報告，然後開展學習討論。如尼赫魯、蘇加諾訪華前，就要介紹印度、印尼的情況，萬隆會議結束後也會報告情況。這樣做的結果，把學生跟國內外形勢拉近了，大家非常關心國內外的形勢，有時自發組織起來討論。

我在學校學到的這種教育內容、形式、方法，應用到我以後的政治思想工作中，也很有成效。我十分懷念北京電力學校的學習經歷，也懷念那時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內容、形式與效果。

對於蘇聯的教學模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實用性。從課程設置、

教學內容到考試、設計、實習等各個環節都圍繞着專業培養目標，很明確。因此通過3年艱苦學習後，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專業已有明晰的瞭解，從事本專業的實際工作(工地、電廠、設計院)基本可以勝任。我們有的同學在國內工作兩年後，到國外去當專家了，這是現在的學校很難做到的。

當然，我們的學習是艱苦而緊張的，平時幾乎全部精力放在學習上，星期天上午也在學習，下午用于處理自己的事，即洗澡、洗衣服、出外買日用品等，偶然也會到電影院看電影。幹部會大多安排在星期天的下午進行，所以學生幹部時間更緊。

課程安排大體上分三個部分：普通課，如數、理、化、政治、外語等；專業基礎課因專業不同而課程也不同，我的專業基礎課程有傳熱學、流體力學、材料力學、製圖、電工基礎、熱力學等；專業課有鍋爐裝置、鍋爐安裝、鍋爐運行、熱電站等。為鞏固與提高專業知識及技能，有兩個課程設計，一是鍋爐裝置的熱力計算(即鍋爐設計計算)，二是熱電站設計(電站設計)。

為使學生適應未來的工作，在校期間安排三個實習時間段，每次實習一般為六周。一年級到校辦工廠進行金工實習，主要是掌握車、鉗、刨、銑、焊等工藝技術，要求達到二級工水準。實習結束要考試，不合格要重新實習補考。二年級到鍋爐安裝工地實習，學習鍋爐安裝工藝技術，所有崗位都要輪到，實習結束時要達到基本上瞭解鍋爐安裝工序、各工序要求、質量標準、工地布置等。由工地主任、班長、老師分別對學生進行考核。第三年安排到發電廠進行運行實習，與所學專業相關的各崗位都要實習，實習結束時，進行考核，要求達到司爐水準。考試辦法是模擬鍋爐運行中出現事故，要求學生進行處理，處置對了為通過，錯了要重新考核。

畢業設計大部分題目為設計一個電廠，在規定條件下進行技術計算、設備選型、廠房布置等，極少數人進行實戰設計，要求設計合格，能實際應用。最後進行國家考試，由專家組成考試委員會，專家委員會成員由電力部決定，學生答辯時委員提出各種問題，包括與設



計題目無關的一些問題(但與課程有關),學生都要回答,學生心情非常緊張,一旦通過,不僅感到輕鬆,更感到神聖、光榮。

我畢業設計的課題是真刀真槍的,把石景山發電廠的一台日本製造的鍋爐出力由 15 噸/時提高到 30 噸/時,石景山發電廠要求設計能實施。我在設計過程中住在電廠,廠長張桂楠親自抓,圖紙都按施工圖的要求繪製。設計完成後,進行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委員會成員均為有實踐經驗的專家。我通過了答辯,張廠長要求學校把我分配到發電廠實施改造方案。由于學校要留我,最終沒有讓我去。這是我終身遺憾之一,沒有能親自實施我的第一個設計項目。

學習成績為 5 分制,分四級,優秀、良好、及格、不及格。老師出試卷,每人一份,各不相同。每份試卷三個題目,分屬三個類型:概念題、理論題、應用題。可想而知,老師很辛苦,因為一個班有四十多人,就要出四十多份試題。祇有對課程熟悉、且理解比較透徹,纔能擬出一百多個符合要求的題目。任課老師出完題後還需經教研室討論通過。考試方式是,當場抽題、當場準備、答題。學生無法猜題,也無法投機取巧,祇有全面瞭解課程內容纔有可能得到滿分。這種考試方式對老師、對學生無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所以要比較多地介紹當時學校的教學情況,有兩個原因:其一,現在社會上一些人,一些媒體,強調學習英美的教育模式,否認前蘇聯的教育模式,我沒有資格評論誰好誰壞,但我相信,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經受過蘇聯模式教育的人,大多對那時培養出來的學生的業務水準、道德品質、工作才能都是十分肯定的。其二,那時的教育目標明確、任務明確。教育部門、學校、老師、學生都向同一方向努力,所以效果特別好。培養出來的學生就能擔負實際工作,為國家建設輸送了大批有用人才,這些人也成為了我國四化建設的骨幹,他們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現在的教育搞什麼教育航母、并校、培養精英。家長、學生以到西方國家學習、工作、定居為目標,并以此為榮。調查一下,我國高校有多少畢業生出國後不回來的,有多少黨政領導幹部的子女在國外

工作、定居的，就可以比較一下，以前是培養什麼人，現在是培養什麼人。

不僅如此，高校黨政領導退休後隨子女到西方國家生活的也不在少數。我們學校有的總支書記、有的黨委書記跑到國外去了，甚至死也要死在國外。這些人能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嗎？能培養出中華民族的精英嗎？有些人，在臺上時是共產黨員，是“領導”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他們享受着比常人高得多的待遇，下來後，去國外尋求他們的終極目標，然而還拿着人民的錢，這些人是共產黨人嗎？不是的，他們沒有共產主義的信仰，沒有民族的氣節。他們是投機者，哪里有好處他們就往哪里鑽。

### (七) 老革命的風範

在到北京前，我接觸過南下幹部，開會時見過，聽報告時見過，但沒有面對面、近距離接觸交流，所以祇有理性上對老革命的崇敬。

到北京上學以後，領導人那種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生活的具體事實以及深入細緻、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給我以教育，為我樹立了榜樣，讓我在熏陶中成長。

在北京電力學校學習的三年中，我校換了三任校長，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任校長郭郁麟，是電力部幹部司司長，兼任校長。他工作很忙，白天主要在部裏上班，到學校來也是開會為多。他每天晚上來學校，主要是到教師宿舍、學生宿舍轉悠，接觸群眾，瞭解情況，解答問題。

我們從上海剛到北京，有天晚上來了個幹部，五十來歲，問我們是哪里人，來北京生活習慣不習慣，衣服帶得夠不夠等等，還問我們有什麼要求，有什麼問題需要他幫助解決。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也不敢問他是幹什麼的，開始很拘束，不敢講話。

他說：我是學校的工作人員，我的工作就是幫助你們解決問題，使你們能安心學習。我年輕時也想讀書，可日本人、國民黨不給我讀

書的機會，于是就跟着毛主席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解放了，讓你們來毛主席身邊上學，管住管吃，還派我們為你們服務，給你們創造條件，讓你們學習得好、生活得好，學好本領，為國家服務。後來我們纔知道，他就是郭校長。

他的一席話，既親切又溫暖，于是大家的話匣子打開了。大家向他反映生活上的問題，如洗澡問題、宿舍住八個人沒有地方放東西的問題等，還向他提了畢業後到什麼地方工作、幹什麼等問題。他耐心地聽，有問必答，平易近人。

年輕人剛遠離家鄉，對異鄉的生疏、不習慣，對家鄉、對親人的思念不可避免，剛到北京時，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情緒不高、不愛講話、不愛活動。經郭校長到宿舍座談，大家心情好多了，有說有笑，認識到眼前的困難因剛建校是暫時的，隨着時間的推移會逐步解決。對學習的目的、今後的任務似乎清楚些了。郭校長走後，同學們繼續自發地議論，很活躍。

郭校長在一年任期內到我們班宿舍來過三次，我留校工作後聽老師們講了許多郭校長深入教師宿舍瞭解情況、解決問題的事例，老師們也很懷念郭校長。

第二任校長叫劉慶宇，一九五四年九月到任，一九五五年下半年電力部調他到西安籌組西安動力學院，在校共一年多時間。

劉校長的特點是工作認真，很有計劃性，有布置有檢查，一旦發現問題，不講情面，不看場合，當面嚴厲批評并責令立即改正，但嚴肅有餘平易近人不足，所以幹部、教師都有點怕他。學生不怕他，因為他不批評學生。他認為事情沒有辦好，不能責怪群眾，是因為幹部沒有做好工作。學生有問題，是因為領導、教師沒有把工作做到位。他對幹部、教師的要求比較嚴。

一九五五年春，學校的校舍、辦公樓、實驗室等均已建成，操場、校內馬路也已完成，校內植樹是這時的主要任務。校內各單位按規劃，分區、分單位包乾，學生按班完成規定任務，由總務部門負責帶領我們植樹。

我們班負責校區一段馬路的路邊植樹。我們挖坑將樹(不是苗,而是半大的樹)放進去,填土,澆水。劉校長正好此時來了,他一看有幾棵樹歪歪斜斜不在一條直線上,就叫人把負責的總務科工作人員叫來。他問,你是負責人,為什麼學生植樹時你不在一起?他批評這位負責人工作不負責任,樹種得不齊整,要求把不在直線上的三棵樹挖出來重新植上。他說:“這個工作由你來做,學生們可以走了。”那個幹部連忙檢討,他一個人挖土、把樹扶正、填土、澆水,花了一個半小時纔弄好。我們要幫忙,劉校長不准,說這是對他工作不負責任應給的懲罰。

這件事對我們教育很大,班幹部進行了討論,認為錯是我們犯的,讓別人為我們背黑鍋,今後一定要吸取這個教訓,一定要把工作做好。進而也認識到劉校長這麼處理,是因為任務確定以後,能否完成的決定因素在幹部。幹部帶頭,幹部在與群眾一起幹的同時還擔負指導、監督、糾錯的任務。幹部不能指手劃腳,任務一布置完,自己休息或幹別的事去了,群眾幹好幹壞也不知道,這樣十有八九要出錯。

所以劉校長批評幹部而沒有批評學生,并讓他一個人來糾正錯誤是對的。不僅教育了那位幹部,也教育了我們學生,特別是學生幹部。我工作以後,在處理問題、對待群眾與幹部的關係問題上,也是按劉校長的教導去做的。劉校長後來擔任寶雞大學校長。

第三任校長叫董一博,是由華東局調來的一位老同志。董校長來校任職時,我們已是三年級了。

他和劉校長不同,能與群眾打成一片,經常在教師、學生中活動,瞭解第一手材料,解決問題及時,工作也深入細緻,師生員工都很愛戴他。

我和他接觸是在畢業實習中間,回學校彙報實習隊的情況。他來聽了我的彙報,作了詳細的記錄。聽我彙報時,他不時提出一些問題,結束時要我回去代他向同學問好,要大家注意身體、注意安全。我總的感覺是校長很重視我們的實習,關心同學們的安全與健康。通過這次面對面的接觸,感受到老同志對我們年輕一代的關懷,他們



希望我們健康成長，將來成為祖國建設的有用人才。我第二次回校碰到董校長，他居然能叫出我的名字，嚮我詢問情況，以後我畢業分配、工作安排等都與董校長有了聯繫。1959年反右傾時，有人批評董校長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劃不清界綫，使他受了衝擊，這是後話。董校長在北京電力學院成立後擔任副院長，以後又調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館館長。我每次到北京都會去看望他。

我在三位校長身上學到了很多，對我成長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熟悉我的朋友、學生從我的工作態度、工作作風中也許會看到我的幾位老校長的影子。

其實在北京期間，接觸的老同志很多，他們資歷深，工作經驗豐富，級別比較高，他們有着共同的特點，事業心強、工作認真負責、樸實無華、與群眾打成一片。老一輩革命者的風範，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讓我們跟着他們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忘我奮鬥，即使受到曲解與委屈、碰到困難與挫折、需要犧牲個人利益時，都無怨無悔。

## （八）近距離仰視國家領導人

在北京的日子裏，政治生活豐富多彩，其中最令人興奮的是能夠近距離仰視國家領導人，這是在外地生活的人無法享受到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晚，我被指定參加北京“一二·九”運動紀念會，我校參加會議的近20人。紀念會在懷仁堂舉行，胡耀邦主持，彭真作報告，接着文藝演出。中途周恩來總理來了，大家都站起來鼓掌歡迎，高喊要總理講話，場面十分熱烈，演出無法進行。胡耀邦就站到桌子上說，周總理答應講話，但在文藝演出後再講。這時大家纔坐下。演出結束後，總理上臺與演員一一握手，接着他講了一個多小時的話，沒有講稿，滔滔不絕，從國內形勢講到國際形勢，再講青年的使命。一個多小時除了掌聲、拍紀錄片的機器聲外，沒有其他聲音。那天我很幸運，坐在第六排，所以看得特別清楚，新聞紀錄片中還有我的鏡頭。放映後，有的老同學看到了，來信說我上了新聞紀錄片。這是我到北京後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周總理、彭真、胡耀邦等領導人。

一九五五年暑假期間，我沒有回上海，電力部電力職工全國運動會在我校召開。運動會結束那天，我被叫到禮堂，說周總理要來參加運動會閉幕式，要保衛總理安全，讓我在主席臺上值班，不准外人進入。周總理參加了閉幕式的全過程，並講了話。

會議結束，我們護衛總理上車，並記住了總理的汽車號碼。那時年輕記性好，看一眼就記住了。一周後，我們學校組織留校學生參加頤和園夏令營，下午六點多鐘，有同學說在門口（頤和園）看到總理的汽車來了。我們大家趕緊進園尋找，果然看到總理、鄧大姐一行在園內散步。我們趕過去跟着走，警衛員也不趕我們。總理邊走邊和旁邊的人說話，我們一直跟隨總理到頤和園門口。

一九六三年春天，我們全家到頤和園玩，碰到周總理陪坦桑尼亞副總統卡瓦瓦游園。我父親抱着我三歲的兒子張益民，站在路邊，卡瓦瓦過來摸我兒子的臉以示友好，我兒子看着卡瓦瓦哭起來了。卡瓦瓦皮膚特別黑，黑得發亮，眼睛很亮，牙齒很白，小孩子看着不習慣，有點怕，哭了。

以上三次都是近距離看到周恩來總理，其他場合見到周總理的機會也比較多。如歡迎外賓來訪，總理總是陪同外賓站在一起，如尼赫魯、蘇加諾、西哈努克、緬甸領導人吳努來訪等均如此。

在北京，聽周總理講話的機會也比較多，每年大中專學生畢業，北京總會開個畢業生報告會，報告人必定是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彭真市長三人中的一人。有時一人講話，三人都到場。除此之外，因工作關係，聽總理作報告的機會也較多，如中蘇分歧的報告、三年困難時期的形勢報告等等。

我在一九六五年調離北京後，祇在中央學習班聽過總理報告，一九六七年總理陪謝胡來武漢時在武漢測繪學院近距離見過周總理。雖時隔幾十年，總理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諄諄教誨猶在耳邊，怎不叫人懷念感傷！

近距離仰視領袖毛主席有兩次。一次是他老人家陪越南胡志明主席游中山公園，我被指定參加。事先沒有說毛主席要去，祇講是胡

主席游園，有領導人陪同，規定了各種紀律。晚上八點，當看到毛主席陪同胡主席來到時，中山公園沸騰了。毛主席一路上邊走邊與胡主席說話，談笑風生，不斷地變換手勢。那次不准跟着走，所以總覺得不過癮。另一次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訪，毛主席親自到機場迎接。車隊就從我們面前經過，毛主席向歡呼的人群揮手致意。這次活動，在天安門廣場南端出了點事。因為人們向毛主席歡呼，都想近一點看看毛主席，人群擁向車隊，車隊停止行進十分鐘。這算是一次嚴重的政治事故，該轄區的區委書記因此被撤職。每年“五一”、“十一”兩次可以遠距離仰視毛主席，白天他檢閱游行隊伍，晚上與民同樂，我們都會去參加。

在北京期間，還近距離仰視過朱德總司令。那也是在頤和園見的，他和康大姐去那裏游園，我們碰到了。還見過賀龍元帥等領導人。

在北京生活、學習、工作，沒有見過劉少奇、鄧小平，也沒有聽過他們的報告或講話，現在想起來大概是無緣吧！

### (九) 張一純

張一純是著名愛國將領、原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張治



張一純二〇一三年五月攝于北京

中將軍的小兒子，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年長我5歲。

國共和平談判破裂後，中共地下黨安排張一純與他母親到上海乘國民黨接張治中的飛機到北京，其間沒有通知到張治中的大兒子。所以大陸解放前，張一純的哥

哥到了臺灣，因張治中的關係，臺灣當局禁止他哥哥離開臺灣，當然也斷絕了相互之間的聯繫。

張一純長得比較瘦小，按他母親的說法是“一純從小吃奶少了，所以身體瘦小”。其夫人馮德惠，也是我們同屆同學，但專業不同，她是電廠化學專業的（已去世多年）。

張一純既沒有國民黨高級將領子女的那種高人一等、目空一切、胡作非為的作派，也沒有共產黨高幹子弟的作派。穿着簡單，生活簡樸，從不亂花錢，不顯擺，平易近人，與同學關係非常融洽。同學吃不完的飯菜，給他吃他也照樣吃。

我與他討論過，他出身望族，為什麼身上沒有一點官僚氣息，沒有一點紈袴子弟的影子？他給我講了他的過去，張治中將軍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學習上可以創造條件，願意深造的可以送出去深造，但沒有任何特權。從來沒用他的車接送子女，經濟上也是祇給零用錢。張一純很早就被送到甘肅山區的一所半工半讀學校上學，這所學校是由新西蘭共產黨員艾黎開辦的，學生在學校裏一邊上課，一邊從事生產勞動，基本上實現生活自給。他在這裏學會了開汽車，成為學校運輸車輛的司機。進城買東西，將農場東西運到城裏出售，都由他開車。所以他很早就離開了那個舒適的家庭，而過着艱苦奮鬥的集體生活，這就形成了一種平民習氣，而官僚富家子弟的陋習在他身上已看不到了。

我與張一純的關係好，主要是因為志同道合，很談得來，而且觀點相同。我們共同爭取入黨，我一九五五年入黨，他比我晚半年，因為他必須經北京市委審查批准。我們是一個互助小組的，張一純的學習基礎較差，我和小組的另一成員汪本堯（後任河北電力設計院總工程師）着重幫助他克服學習上的困難，讓他能順利完成學業，這也是當時班主任交給我的任務。在他自己的努力下，終於順利完成了學業，畢業後分配到北京電力中心試驗所任工會主席，以後調北京市政協任副秘書長，從事對台工作。我們三人之間的聯繫從未中斷過。

受張一純的邀請，我多次到張家作客，有幸見到了張治中將軍及



其夫人，也見到了一純的姐姐們。給我的感覺，一家人都很平易近人。張將軍詢問我們學校的情況，問我的家庭情況。那天我們是在外邊吃了飯去的，他問張一純是不是你付的錢，一純答是，他笑了，說應該你付錢。張夫人沒有一點官太太的架子，聽一純說我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對我很親切，給我講一純小時候的事情，說因為自己奶水不足，所以一純從小身體就瘦弱，住校學習（指在半工半讀學校讀書）吃了許多苦。她說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是農村出來的人，張將軍一直忠于他們的感情，這在國民黨高官中是少見的。我想，就是在共產黨的高官中，革命勝利後，把原配休了另覓新歡的也多的是。

在此前，張一純給我講了不少有關他父親的事，在新疆解救過很多共產黨人。他要求加入共產黨，黨認為他不入黨作用會更大，勸他留在國民黨內。他希望張一純加入中國共產黨。我見到張將軍及其家庭成員後，備感親切，對他們更加敬重。

張將軍與周總理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周總理在百忙中常抽空到張家問寒問暖，總理病重期間安排了很多後事，其中之一，是讓秘書長童小鵬到張家瞭解將軍遺屬的生活工作情況，看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解決。張一純請童秘書長轉告總理，一切都很好，請他放心，並祝他早日康復。但總理考慮到將軍起義時是隻身過來的，解放後靠工資維持一家生計，經濟上不富餘，決定給將軍遺屬送一筆款子。總理就是這樣的人，自己將不久于人世，想的做的都是國家的事、別人的事！所以張家後人對毛主席、周總理是感恩戴德、非常懷念的。

張治中將軍的回憶錄，在他逝世後沒有地方可以出版，出版社不願出版這類著作。張一純的姐姐想拿到美國去出版，一純不同意，對我講了這件事，我建議他去找董一博校長，此時董校長已擔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館館長，此事他應該也可以解決。于是我陪同張一純到恭王府去找董校長（董的辦公室在恭王府），他聽後表示一定幫助解決。董一博校長真的辦到了，將軍回憶錄出版後，一純給我寄了一本。

張一純生性隨和，跟誰都合得來，工作很細心，對別人很體貼，適合做群眾工作。畢業後他擔任基層單位的工會主席，我以為適得其

所。他工作很努力，在群眾中很有威望。

他後來調到北京市政協工作，任副秘書長，副部級。他幹得很出色，專事對台工作，得以兄弟見面。張將軍的老部下來大陸訪問，一定要見見張一純，這層關係對他開展對台工作是有利的。

對我來講，與一純幾十年的相交，感受到他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愛，我終身難忘。在上學的時候，他看到我墊褥很薄，拿來一條墊褥給我；畢業留校工作，他帶來5塊錶，有手錶、有掛錶。他說，你要當教師了，上課要掌握時間，沒有錶是不行的，我們家舊錶很多，能用，你挑一塊用。我當時沒有想過當教師了要有錶，也沒有錢買錶，他都為我想好了。我挑了一塊懷錶，是張將軍在德國留學時用的。這塊懷錶用了三年，又改成手錶一直用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一九八〇年，我從農場回武漢，一純立即給我寄來了錢，要我買臥鋪票到北京去玩一玩。到北京後又派其兒子陪我到北戴河玩一周，使我的身心受到極好的調養，受壓抑的心情一掃而光。

一純總是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他看到了、想到了，堅決地出手相助。這就是我們的友誼，時間、距離、政治運動都阻隔不了，因為我們相互瞭解，心靈相通。

### 三、在北京工作

#### (一) 留校當教師

一九五六年七月，我在北京電力學校修業期滿，等待畢業分配。

畢業分配前夕，因為畢業設計是改建石景山發電廠的一台鍋爐，所以石景山發電廠的領導要我去石電，從廠長張桂楠（後任北京電力局局長），到黨委副書記李錫銘（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到學校來，要求將我分配到石景山發電廠，我自己也願意去。可董一博校長堅決不同意，他讓我留校當教師。

我們那一批畢業生，機、爐、電、化幾個專業一共留校近20人。那時師資缺乏，就趕鴨子上架，讓我們充實教師隊伍。其實我心裏希



一九五六年畢業時攝

望最好到建設工地搞鍋爐安裝工程，到石景山發電廠次之，最不願意的是留校當老師。但我作為共產黨員，學生中有影響力，早已喊出了“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祇好愉快地服從分配。

那時候把我們自己的直接領導看作是組織、是黨，因為學生的分配權在學校，學校要你到哪里，就是黨要你到哪里。到電廠、到工地就不是黨的需要了？其實黨也需要我們去電廠、工地從事建設。不過學校的黨組織有決定權，說教育事業需要你留校，也就是黨需要你留校，你就得留。

現在想來，這種以領導就是黨的思想、做法是不科學的，也是造成政治生活中許多錯誤的根源之一。

為了使這批留校的老師能夠儘快地達到勝任教學任務的目的，學校制定了詳細的培訓計劃。我們動力科的張保衡、馬建隆兩位主任，為我們儘快上講臺，給我們創造條件，計劃落實到人，定期檢查。我們這些人後來在工作中小有成效，兩位主任功不可沒。張保衡、馬建隆兩位老師後來成為華北電力大學知名教授。

當時的培訓計劃有幾個要點：

一是明確任務，第一年進修，第二年開課（五七年暑假後開課），每人明確所擔負的教學課程。我負責的專業課是“鍋爐裝置”，明確指導老師是馬建隆教授。我要在一年學習中寫出教案，教案由指導老師審閱，進行 2～3 次試講。

二是到清華大學進修，提高業務水準，由學校聯繫并辦理有關手續。我在清華大學主要選修馮俊凱教授的“鍋爐學”課程，同時還選修自動控制等課程，隨着講課的進度自學其他參考書，并寫出講稿。

三是到北京業餘動力學院學習，從基礎入手提高，五年內達到大學本科水準。

這樣的安排，可說非常全面，從目前到長遠，都有打算，也都有了具體的安排。然而對我們來說，這樣的安排，真是魔鬼式的生活，每天早上五點多起床，八點以前趕到清華大學聽課，中午回來，下午自學、寫教案，晚上到業餘動力學院上課，還要做作業，每天睡得晚、起得早，天天如此，星期天多睡一會兒，略作補償。

一九五七年五月我帶學生到安裝工地實習，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業務水準。

通過一年的艱苦努力，教案寫完了，試講幾次都通過了，動力學院的學習堅持了，清華大學的進修也結束了，算是圓滿地完成了領導交給的任務，也就是黨交給的任務。領導上很滿意，我們也挺開心。

一九五七年九月開學後，我被任命為一個班的班主任，教授兩個班的專業課“鍋爐裝置”，小班上課，每班每週6個學時，兩個班12學時，每天都有課。作為一個新任課教師，每天都有課，壓力之大可想而知，而且還擔任班主任，要抽時間和同學一起活動，與班幹部研究工作，找學生談話，向教務處、團委彙報等等，占去不少時間，同時學校處於反右鬥爭後期，我是教師黨支部的委員，會議特別多。那段時間，總感到時間不夠用。

當老師，在課堂上會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弄得不好會很尷尬。我們的老師傳給我們一些小竅門，可以應付尷尬的局面。

例1：第一堂課與同學見面，先要介紹自己，然後點名，認識學生。可學生的姓名五花八門，有的字不認識，念錯了就會引來哄堂大笑，且將長期成為學生的笑料。所以點名時，遇到不認識、或者念不准音的字，就跳過去，最後問，有誰沒有點到名？未被點到名的學生就會站起來說還有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就會告訴你。

例2：老師上課要很好地掌握時間，下課鈴響了還在講，學生就不聽了。課講完了還不到下課時間，也是尷尬事。老師教我們，碰到前面的情況，就要長話短說，如果還有較多的內容未講完，就壓縮在下一節課上講，千萬不要壓堂，學生最反感的是占用了他們的課間休息時間。碰到後面的情況，可以把當堂課的內容總結一下，或提個問



題讓學生討論。

例 3: 有的學生對年輕教師的業務水準有懷疑, 會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讓老師回答。有些問題教師確實不清楚, 碰到這類問題, 一是實事求是, 承認自己還不清楚, 等搞清楚後回答學生。二是回答這個問題值得探討, 下次給你答復。千萬不要不懂裝懂, 胡說一氣, 這樣就會失去學生對你的信任。學生不是希望老師什麼都懂, 而是希望老師把真才實學教給學生, 即使當時不懂, 弄懂後告訴學生, 學生也會尊重你, 信任你。

我在北京電力學校教了兩年書, 和同學們打成一片, 和同學們的關係非常融洽, 對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也逐步深入、提高, 居然對教師這一行當產生了興趣。所以產生這樣的轉變, 源于以下三個原因:

一是天天與學生接觸、交流思想、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自身也得到了提高, 生活充滿了活力, 逼着自己努力學習, 提高業務及政治理論水準。這兩年雖然很緊張也很累, 但充實、愉快。

二是隨着教學業務水準的提高, 講課逐漸自如, 學生學習努力, 成績較好, 增強了當好教師的信心。

三是最重要的一點, 認識到了自身工作的價值。祖國建設需要人才, 而自己是從事培養人才的工作, 也就是做建設祖國的基礎工作。自己從一個一無所知的農村青年, 經過老師的教育培養, 掌握了電力建設事業的某些知識, 而今我又用所學得的知識去教育培養一批批青年, 使他們成為我國電力事業的建設人才, 感到任務艱巨、責任重大, 也感到擔任這項工作的光榮與自豪。

我安下心來以後, 在教學上進一步摸索教學方法, 提高教學質量, 在業務上堅持業餘動力學院的學習, 選擇了“地熱利用”作為今後的研究課題。當我着手搜集有關資料的時候, 新的情況使我的計劃泡湯了。

我離開了教學崗位, 漸漸遠離了我的業務, 去從事一項既陌生又有風險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五八年在“大躍進”的浪潮中, 北京電力學校升格為北京電力

學院。反右派後為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強黨的領導，各系成立了黨組織。我被任命為動力系黨支部專職書記，成為一名政工幹部。

從此，桌上的書不再是數學、熱力學、流體力學、鍋爐學等業務書，而是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原著、毛主席著作等政治書籍。角色的轉變，學習及工作內容也就跟着轉變。我仍然從組織上服從，但內心是不願意的。我們那個時代，人都是組織的人，一切由組織安排，碰到想不通的事，祇有檢查自己，使自己跟上組織的步伐，按領導的決定盡力把工作做好。

## (二) 反右派鬥爭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稱之為在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的一次政治上、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有人稱之為“引蛇出洞”。

我親身經歷了反右派鬥爭的全過程。反右派鬥爭不是預先計劃好的，既非有計劃的“引蛇出洞”，也非計劃好的一場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在整風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為反擊這股逆流，進行了一場反右派鬥爭。但在反右派鬥爭中，對形勢的估計過於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導致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

一九五六年，受蘇共非斯大林化的影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出現了一些問題。尤其是波蘭、匈牙利兩國的動亂，史稱“波匈事件”，對執政的各國共產黨震動很大。

中國國內“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比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事件。在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傳（1949—1976）》第611—61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毛主席把罷工、罷課一類問題產生的根源，歸結為官僚主義。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講：“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

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群眾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上書第612頁）毛主席在這次會上宣布明年（即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可見黨的整風運動是根據形勢的需要而決定的。

為了使黨內外提高對國內外形勢及整風運動的認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三月一日，召開了有一千八百多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毛主席在會上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發表講話。從闡述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開始，講到肅反、合作化、工商業者改造、知識分子問題、雙百方針，到鬧事、出亂子等十二個問題，國內矛盾的方方面面講全了。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到十三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破例地請黨外人士參加。毛主席先後召開了五個座談會，對文化、教育、科技、藝術、宣傳各方面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并于十二日發表講話，講了整風、形勢、教育、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等方面的問題。毛主席還到天津、上海等地瞭解形勢、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

在作了充分準備的基礎上，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并于五月一日在《人民日報》發表，全黨整風正式開始。

根據校黨委的整風計劃，整風運動共分4個階段：學習提高認識階段；鳴放階段，這階段要召開各種人員的座談會，幫助黨整風；黨內整風及檢查階段；整改階段。我想這樣的安排是根據中央、市委的指示精神安排的，按照中央的精神，共產黨整風結束後，各民主黨派也要整風。

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旬的學習階段很正常。學習中央文件，報紙社論、評論，談認識，黨內學，全校教職工也學。教職工的學習，每週兩個單元（原先的政治學習每週一個單元，整風學習另加了一個單元）。知識分子經過思想改造運動、肅反運動，講話都比較謹慎，即使

聯繫實際，也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

五月八日後，中央統戰部召開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會議內容此後陸續披露，談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從工作上的缺點錯誤引申到黨的領導以及所謂體制問題，提出了黨天下問題、政治設計院問題、平反委員會問題等一些非常原則的問題。

與此同時，中央在一些重點高校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召開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黨撤離學校、實行教授治校等等。到5月底，清華、北大等校學生寫大字報，提出要大鳴大放辯論，并在校際進行串聯。如天津大學的學生到北大、清華串聯、演講、交流鳴放經驗，北京大學哲學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到處演講，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說“馬列主義是團團轉理論，怎麼說怎麼有理”。有人號召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迫使共產黨改變政策、改正錯誤。極少數人的講話、意見，經過報紙的傳播、廣播電臺的渲染，似乎共產黨的天下要完了。

我們當時也搞不清楚，總覺得不正常，形勢已經偏離了整風的軌道。但黨沒有指示，我們也祇好多看少說，有的老師問我對形勢的看法，我祇講似乎偏離了方向，對具體問題不表態。

我想，中央決定開門整風，是基于波匈事件後，希望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使黨的各級領導正視缺點錯誤，并改正之，在中國不要出現類似波匈兩國出現的問題，并以這種方式解決黨內外的矛盾，形成一種毛主席所希望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但整風運動形勢發展到這種局面，是出乎意料的。5月下旬，黨委傳達了中央指示精神，一方面肯定了開展整風以來各方面對黨的批評，主流是好的、中肯的，對於我們認識自己、改正缺點錯誤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少數人有反黨情緒，發表煽動性言論，企圖把人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我們要注意，讓他們繼續充分地講，不要急于反駁、批判，到適當的時候再解決。中央精神使我心裏有了數。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



麼？》，講的是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發表不同意某些人的觀點受到匿名信的威脅。社論指出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這是開始反擊的信號。六月中旬，《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七月初，又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全國的反右派鬥爭展開。開始講右派分子占 1%~3%，積極向黨進攻的人全國也就幾千人。後來又說全國有幾萬人，最後定成右派的全國有 55 萬人。

我們學校第一次被定為右派的祇有幾個人，主要是行政部門的，我們動力科沒有右派，有兩位老師被劃為中右。其中一位是熱工學老師趙希卞。他在學習會上發表了一些不合時宜的意見。開始主要講民主自由問題，以後受社會的影響，對黨天下的論調頗感興趣，認為現在一切部門、單位都是黨的領導，非黨幹部有職無權，不能調動積極性。對知識分子政策也頗有微詞，認為黨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知識分子有用時要團結，不滿意時就要改造了，知識分子無所適從……，他自認為會被劃成右派。結果沒有，喜悅之情溢于言表。趙希卞老師暑假辦了婚禮，請全科同僚吃喜糖。趙老師處于未被劃成右派和新婚的喜悅中。

開學後仍沒有什麼問題，大約是 11 月份，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通知學校，上報右派名額不夠，需追加 3 名。學校黨委經研究，在被劃為中右的人員中，挑了 3 人上報，我科的熱工老師是其中之一。結果他被定為漏劃右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記得很清楚，宣布他為右派時，他剛講完課回教研室，手上都是粉筆灰，當聽到他被定為右派後，頓時暈倒在地、口吐白沫，醒來後，痛哭流涕。他說，要定應該在暑假前定下來，這樣我可以不結婚，現在婚也結了，這不是害人家嗎？這位老師以後調石家莊鋼廠工作，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多麼悲慘的故事，然而現實！

從我親身經歷的整風反右全過程看，我認為資產階級右派確實存在，在鳴放後期，對黨、對馬列主義、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確實存在。我到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看大字報，有些內容

確實令人髮指、十分惡毒，所以反右是必要的。但由於對右派勢力估計得過於嚴重，受到那個百分比的影響，加上一些領導把自己看成是黨的化身，把別人對自己提意見說成是對黨進攻。所以造成了反右鬥爭的擴大化，這也是事實。

如上面所講的，我的熱工老師被補劃右派，就是受到百分比的影響所致，認為北京電力學校右派比例太小，故開學後又加劃了幾個右派，達到一定比例纔算反右結束，上級纔驗收合格。這哪里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把一些人的政治生命當作一些人玩數字遊戲的玩物，既荒唐又可惡！

我校人事科張得志科長，小八路出身，在黨委召開的座談會上，對校長的幹部政策提出意見，說校長往往對人不對事，對印象好的人與印象不好的人政策不一樣，他形容是“糖球鼻涕政策”。對有些人像對糖球一樣，含在嘴裏，妥為保護；而對另一些人，則像對鼻涕一樣，一把甩掉。就因為這條意見，最後被定為右派。他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後來摘帽時，他不同意摘，說自己根本不是右派，沒有帽子可摘，祇有平反沒有摘帽可言。直到我調離學校，仍堅持不摘。他到處上訴，也是石沉大海。張科長是給校長個人提意見，被視為攻擊黨的幹部政策，被定為右派。

所以我認為進行甄別，為錯劃成右派的人平反昭雪是完全應該的，黨也應該從中吸取教訓。政治運動中的擴大化錯誤一犯再犯是值得深思的，但對反右派運動一風吹，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違背歷史事實的作為，祇能被看作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

整風反右後，開展了“向党交心”的活動，學生、教職工個個都向党交心。學生在小組會上談，教師在教研室談，職工幹部在科室談，把自己的一些思想、言行、別人不知道的想法、做過的錯事統統說出來。除了談事情、想法外，還要挖思想根源，認識深刻的作為典型擴大範圍宣講、相互促進，認為講得不夠的，就進行個別談話，小組會幫助。這個活動，比黨內整風還要深入，實際上是全民整風。

### (三) 在大躍進的日子裏

進入一九五八年，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黨中央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技術革命上來。一九五七年的整風、反右、向党交心，人們的思想處於緊張狀態，工作也以政治運動為主。雖然沒有停課，但教師教課、學生聽課都不太專心。運動結束，可以全力地從事該做的工作，農民種地、工人做工、學生學習、教師教課等等。這一變化，符合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願望。政治學習談得最多的是如何把工業、農業生產搞上去，把科學技術搞上去。後來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也是大得人心的，大家都希望儘快地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使人民過上好日子，不再受帝國主義欺侮，這是革命先烈為之奮鬥的目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希望實現的目標。

在全國大躍進的歡呼聲中，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學校傳達了電力部的決定：為滿足電力建設事業的需要，決定成立北京電力學院，在德勝門外小營建校。並決定，在新校舍建成前，先在北京電力學校原址辦校，大學本科、中專同時招生，統一領導。

為適應新的形勢，校黨委決定，成立動力、電力、電廠化學三個系，建立系黨支部，領導各系的建設與教學工作。我被任命為動力系黨支部書記，電力系教師陳秉堃任電力系支部書記（後調任水電部教育司副司長，水電出版社社長、黨委書記），物理教師安勃任電廠化學系支部書記（後調東北某大學工作）。他們兩位是1953年的大學畢業生，入黨時間較早，我是中專畢業生，工作纔兩年，入黨纔三年。

讓我擔此重任，我感到如履薄冰，一沒有理論水準，二沒有資歷，三沒有工作經驗。系裏的教師，大多是我的老師。我該怎麼辦呢？領導談話後我一夜未眠，苦苦思索。不幹是不行的，服從組織安排，不能說不幹，祇能趕鴨子上架，更勤奮地學習，多看馬列的書、毛主席的著作；虛心向老師們學習，更努力地工作，多請示彙報。我想祇要努力，就會慢慢地熟悉工作，何況領導就在身邊，不懂就問，儘可能避免犯錯誤。那時我仍不想放棄業務，仍然教課，叫“雙肩挑”。

我以三位校長為榜樣，與教師、學生打成一片，有事（包括對工作的想法）和他們商量，瞭解他們的工作、學習情況及需要，儘可能幫他們解決問題。我發現老師們仍以對學生的態度對



與張保衡老師（中）、孫國柱老師（右）合影，二〇一三年五月于北京

待我，一方面尊重黨支部的決定，一方面也經常提醒我應注意的問題，使我感到沒有因工作的變化而改變我們之間的關係與感情，這給我極大的鼓舞與信心。

我非常感謝我的老師們，是他們教育我，培養我，而後又鼓勵我、支持我、幫助我做好各項工作，他們永遠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好朋友。幾十年中，我到北京，都會去拜訪老師們，而老師們出差到武漢，也一定會來看我。在我人生中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會伸出熱情的手拉着我問寒問暖，到北京時會熱情地招待我，家宴不斷，讓我處於老師的懷抱中，處於朋友的擁抱中。此時此刻，沒有了痛苦與煩惱，祇有友誼與歡樂。

黨中央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號召後，報紙、廣播不斷地報導各地工農業生產情況，人們意氣風發，勞動熱情高漲，發揮了極大的創造力，到處放衛星。如糧食產量當時政府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是四、五、八，即黃河以北地區達到畝產 400 斤，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地區達到畝產 500 斤，長江以南地區達到畝產 800 斤。而 1958 年有些地區放的衛星，畝產已達萬斤，甚至幾萬斤的，說小孩子可以在稻穗上走，還有幾千斤重的豬。

說實話，我當時是不信的。我是農村出身，種過地，養過豬，怎麼



可能畝產萬斤、養出幾千斤重的豬呢？難道豬比牛還大？政治學習會一片懷疑聲，大家最後的結論是，報上講了，不可不信；我們沒有見過，也不可全信。工業上也有放衛星的，但不如農業上突出。

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突出了鋼產量，十五年超英趕美，鋼鐵是關鍵，稱為元帥。元帥要升帳，指標是在一九五七年 535 萬噸的基礎上，1958 年翻一番，達到年產 1070 萬噸。但到一九五八年七月底，纔生產出 380 萬噸，計劃一定要完成，于是就發動群眾來幹，這就是大煉鋼鐵的由來。

全黨動員全民動員，各行各業都來煉鋼。學校也不例外，各系都建了小高爐，由師生輪流煉鋼。黨委提出書記掛帥，開展評比。

第一次評比，動力系產量落後于電力系，受到院領導的批評，在大會上說：“動力系沒有動力。”我很失面子，沒有完成任務，對上不好交代，下對不起群眾，於是決心改進設備，加強領導，迎頭趕上。我三天三夜沒有睡覺，與師生一起，苦幹三晝夜，終於超過了電力系。

第二次評比，我們得了第一，我睡了一天一夜纔醒來。那段歷史，既刻骨銘心，也覺得很滑稽。

我們沒有學過鋼鐵專業，不懂煉鋼，就憑出去參觀過土法煉鋼，回來一講，就建小高爐，就煉鋼。煉出來的到底是鋼還是其他什麼，沒有標準，沒有檢驗，看到有鋼花出來，就認為煉好了。這些“鋼”被拉走了，算在 1070 萬噸當中。到底有沒有用，不得而知。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是全方位的，工業、農業、教育、文化藝術、技術革命、水利建設，甚至除四害（老鼠、蒼蠅、蚊子、麻雀——後來改為蟑螂）、農村的公社化運動都有指標。所有這些方面的事情，都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的。政治熱情高漲，氣勢磅礴，各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如教育的發展，農業的豐產，技術革命的開展解決了不少生產中的難題，農村水利建設成就顯著，全國實現公社化更是一大奇跡，等等。

但也造成了不少的失誤，如大煉鋼鐵，浪費嚴重，破壞了一些林業資源；勞動力轉移到煉鋼鐵，使一九五八年的農業沒有豐收。一時

間浮誇風、共產風刮遍全國，一部分人產生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祇有沒想到的，沒有做不到的”這種唯意志論思想和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蠻幹作風。對於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歷來評價不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產生的原因，我認為在主觀上是為了儘快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使中國早日富強起來，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侮；在客觀上，由於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新的生產關係的形成為生產力的提高創造了條件，思想上、政治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經過整風、反右，取得了勝利，激發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熱情。所以在黨中央作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技術革命上來的決定時，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超英趕美符合人們的願望。把大躍進說成某人的狂熱空想是不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大躍進本身符合歷史發展要求，沒有錯。

我認為錯就錯在高指標，高指標造成了全民大煉鋼鐵；高指標形成了從上到下的浮誇風；高指標造成瞎指揮、說謊話；高指標造成了黨風的腐敗，不實事求是、欺上瞞下，為了保自己，編造謊言，打擊、排斥講真話的幹部，使黨內幹部不敢講真話，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反對歪風邪氣，祇能講一個觀點，聽一種意見。高指標的產生，是上下互相影響的。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風氣下，各級領導對指標層層加碼，提出比中央和毛主席要求更高的指標，反過來又影響到黨中央和毛主席，進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此幾經往復，提出的指標也就越來越遠離實際了。根據《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的材料，完全可以證實上述論斷。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和英國共產黨主席波立特、總書記高蘭會談時講：“中國在十五年後將超過英國。我們今年的鋼產量是 520 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後將達到 1200 萬噸（一九六二年），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後將是 2000—2500 萬噸（一九六七年），第四個五年計劃之後，也就是十五年之後（一九七二年）將是 4000—4500 萬噸。”高蘭說：“十五年後，（英國）頂多增加到 3000

萬噸。”毛主席覺得十五年趕超英國有把握了。

可到一九五八年的五、六月間，把鋼產量的指標一提再提，趕上英國的時間由十五年改為二至三年，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屆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通過了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通過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原計劃十二年），還通過了“苦幹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

六月六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中央報告，認為華北地區的鋼生產能力，一九五九年底達到 800 萬噸是可能的。由此毛主席在報告上批示“一九六二年，可產 6000 萬噸鋼”。

六月十六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向中共政治局報送“二五”計劃要點，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任務是：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

同日，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向中央報送“二五”財政計劃要點，談到糧食增產時稱“今年麥季增產已經達到 350 多億斤，比 1957 年全年糧食增產的數字 150 億斤還要多 200 億斤”。

六月十七日，副總理兼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報告，一九五九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水準。據此，毛主席在報告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祇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

六月十九日，毛主席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是 530 萬噸，今年能不能翻一番？王說可以，這樣就按 1100 萬噸布置了。毛主席後來說：“開始是 600 萬噸，第二本賬是 700 萬噸，第三本賬是 800 萬噸。”這裏的幾個指標是不同時期提出的，副總理薄一波最早的報告中提出一九五八年鋼產量為 624.8 萬噸（第一本賬）；四月五日國家經委根據各地報來的產量彙總指標為 711 萬噸（第二本賬）；五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的 800 萬噸到 850 萬噸稱為第三本賬。

六月二十一日，冶金部黨組報告：從各大協作區會議的情況看，明年（指一九五九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 3000 萬噸，1962 年的生產水準可能達到八九千萬噸以上。

六月二十五日，副總理譚震林報告，華東四省一市（閩、浙、蘇、皖、滬）今年糧食產量可能達到一千二百幾十億斤，比去年增產 500 多億斤。原先設想的 4—5 年完成的任務，一年就完成了。全國糧食的產量估計可達到 5000 億斤以上。

這就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後一個月內發生的情況。

指標的報告者，都是主管部門的最高領導人，中央、毛主席不相信他們又能相信誰呢？這些領導人又是聽各省的彙報，他們不相信省裏的負責人又相信誰呢？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出在中央向下壓指標，根據需要而不是根據實際來定指標。上面定的指標，下面說完成有困難，輕則批評幹勁不足，重則批判右傾保守，幹部考核、升遷均與完成指標有關。在這雙重壓力下，下級不能也不敢違背上級的意志。所以實際情況是上面的指標分到下面去，層層加碼；下面再將已經加碼的指標再加一層報上去，省裏又把經過雙層加碼的指標報中央；中央又以此為基礎來制定新的指標。于是指標越來越高，離實際情況就越來越遠。以上記述可以說明這一點，我自己的經歷也可佐證這一點。

北京電力學院大煉鋼鐵時，市委大學工作部給的任務是 60 噸，黨委把任務分配到下面變成了 80 噸：動力系 25 噸、電力系 25 噸、電廠化學系 15 噸、行政部門 15 噸。我系建了三個小高爐，我又要求每個高爐必須定為 10 噸。

北京市委布置的任務，具體到生產單位的小高爐，指標提了兩次。在黨委布置任務的會上，書記問我能完成多少噸，我說超額完成 25 噸。其實此時既沒有生產設備，也不懂得生產技術，心裏是無數的，完全憑着必須超額完成任務的信念和不要被扣上右傾保守帽子的想法而表態的。

學校負責原料供應、後勤保障，我們負責煉鋼。于是去參觀學



習，建小高爐，日夜堅守小高爐旁，直到完成任務。大家關心的是指標，今天完成多少、還有多少。我想各地的情況大同小異，高指標的來歷就是這樣的。

對於高指標及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幹部群眾不是沒有看法，但公開反對的沒有，不同意見也聽不到。為什麼會這樣？中央一級的領導人瞭解全局，掌握全局，難道不瞭解實際情況嗎？不是的。祇能說，在那種形勢下，一是不能說，二是說了也沒有用。

另外就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這與整風反右有關，本來整風的目標是反對三個主義的，但右派的進攻中斷了整風。反右派鬥爭使得整風運動草草收場，把對領導人提意見混同為向黨進攻，使本來存在三個主義的領導人認為自己是右派進攻的目標，不去深入檢查並改正自己的錯誤，反而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堅持並擴大錯誤。而群眾認為黨的領導人就是黨，不能對他們提出批評意見，同時也不敢提反對意見，怕被扣上右傾、反黨的帽子。

這種情況後來多次出現，如 1959 年的反右傾，本來廬山會議是糾左的，因彭德懷的問題而轉為反右傾。因此不僅沒有克服 1957 年前後產生的左的錯誤，反而加速了左的錯誤的滋長。文化大革命中，對一些幹部的衝擊，對幹部改正錯誤，到群眾中去，與群眾打成一片，克服官氣、驕氣、嬌氣是有好處的。但文革被徹底否定後，他們成了反文革的英雄，並在文革中受衝擊為榮，將受到的衝擊當成政治資本，對自己的缺點、錯誤不僅不改，而且有新發展。這是廣大群眾有目共睹的事實，也是深刻的教訓，因為沒有認真總結、吸取教訓，所以一再出現這種情況。

意大利共產黨領袖陶裏亞蒂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的悲哀在於他們始終把成績歸于活着的、在臺上的領導人，而把錯誤和缺點歸于已經下臺或已經死了的領導人。這個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 (四) 嘗試教育改革

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〇年)冬，北京電力學院校區在北郊清河

鎮小營初步建成。師資和設備根據需要和可能分成大學和中專兩部分，大學部搬到清河小營校址，中專部仍在西直門外北下關北京電力學校原址。我到大學部工作，仍任動力系黨支部書記（專職）。

一九六三年寒假結束，開學不久，黨委書記找我談話，要我到電廠化學系任支部書記，原因是原支部書記與系行政領導關係不融洽，已經很難開展工作了。鑒于我在動力系五年的工作中各方面都比較滿意，特別在處理與老知識分子關係方面很有成效，所以黨委決定調我到電廠化學系去迅速改變那裏的局面，把工作搞上去。

說實話，我捨不得離開動力系，因為對專業比較熟悉，人際關係較好，工作也較順利。到新單位不僅人際關係要重新打開，專業也不熟悉，加上電廠化學系由于黨政關係長期不融洽，教師夾在中間很難處，多數教師兩邊不得罪，除了份內事，對系裏工作不太關心。這種情況，中層以上領導都知道。

系主任王杏卿是我的化學老師，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畢業，解放後回國，是我國電廠化學學科的奠基者之一。她工作認真，有事業心，也有個性，對看不慣的事就要說，不唯唯諾諾。與她的關係一旦搞僵，就很難扭過來。我怕去了後重蹈前任的覆轍，有點不想去。但黨委的決定又不能違背，祇得硬着頭皮去上任。

到任後，頭三個月作調查研究，弄清問題的所在，瞭解教師們的想法和系主任的想法。在此基礎上，黨支部制定了一個三年規劃，總的要求是：團結全系師生，進行教學改革，建設一個適應國家發展需要的電廠化學學科。方向是：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改革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

第一年着重調整各方面的關係，把教師的思想調動到教育革命上來，以共同的奮鬥目標來緩解相互之間的各種矛盾，在此基礎上進行一些教改前的準備工作，如讓基礎課教師、普通課教師學習專業知識。電廠化學是為發電廠動力設備服務的，是處理好煤、水、油的一個專業。教師不瞭解所服務對象的設備結構及其對煤、水、油的要求，怎麼能服務好呢？

第二年，師生到北京東郊熱電廠進行教學、生產、科研的實踐活動。通過生產活動，既能和工人同志打成一片，學習工人的優秀品質，提高思想覺悟，也能從生產中發現問題，經過研究來解決問題，提高師生的業務水準。

第三年，提出一整套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大綱、教學方法、考試方法、畢業論文實戰等方面的改革方案。

我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在調研中發現，所謂黨政矛盾、教師之間的各種矛盾、教師積極性不高，根本原因是系裏沒有一個中心任務，而這個任務又必須是大家都關心的，這樣纔能把大家的注意力、積極性調動起來，有了共同的奮鬥目標，都致力於一個目標，一些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電廠化學是新的學科，北京電力學院是全國第一個建立這一學科的，當時有好幾個學校派教師來進修、學習。這個專業需要深化、完善，這是王主任和全系教師的共同願望。故一提出教育改革目標，立即得到王主任及其他老師的支持，學習和工作的積極性都非常高。

北京電力學院選址清河小營，因為那裏已經建了電力部的一個研究機構——技術改進局。當時主管教育的馮仲雲副部長還計劃在小營建一個 20 萬 kW 的熱電廠，作為電力事業的教學、生產、科研的三結合基地。電力部技改局局長兼任電力學院的副院長，便于人員、實驗室的借用、調動。我們到東郊熱電廠搞教改，也是源于此設想。

上述方案經黨委同意後實施，第一年效果非常明顯，電廠化學系不再是一盤散沙了。大家團結一致、目標明確、奮發向前，顯得生氣勃勃。第二年（一九六四年）新學期開始，分批組織教師到東郊熱電廠參加生產，瞭解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準備現場教學。暑假後組織學生下廠進行現場教學、參加生產勞動和有關的科研工作，一方面為課程改革作準備，一方面為今後的三結合教育摸索經驗。電廠方面也熱情支持，可以講各方面都比較順利，按黨支部預定的計劃進行着。

正當我們如火如荼地進行教學改革探索的時候，水電部教育司正進行部內院系調整的準備工作，準備把北京電力學院的電廠化學

專業及電力系的高電壓專業調整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以加強後者電力專業方面的力量，使之水利與電力兩條腿平衡，把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打造成全國重點大學。

我是在寒假結束前（一九六五年初）纔被告知的。兩位書記找我談話，我毫無思想準備，當時還在想寒假後教改如何深入。我問：為什麼這樣決定？北京電力學院七個專業，是一所比較完整的電力方面的高等院校。現在把電廠化學專業調走，電力學院就有頭無尾了。而該專業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已經建立起來了，他們的不少老師在我們這裏進修過。再說，教學改革已初見成效，這一調動，就前功盡棄了。

書記說，院黨委原來考慮電廠化學專業是要留下的，教育司來人找××、×××談話後，改變了原來的決定。他還說，我們不想讓你走，想了很多辦法，如去搞四清運動、系裏設代理書記。但對方指名道姓非要你去不可。我們堅持，後來他們告到部裏，部裏指示為使調整順利進行，要顧全大局，動員張建成去武漢。書記的話，後來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當時到北京辦理接收工作的韓德勇同志（後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組織部長、紀委書記）所證實。他在回憶錄《一路走來》中這樣寫道：“在我們跟北京電力學院進行交接時，他們學校的幹部科科長提出，在這兩個專業的教師和專職幹部中要將張建成留下，其餘的人員都來武漢……後來好像是由教育司給北京電力學院打了招呼，纔把張建成爭來的。”

我知道北京電力學院的領導很賞識我，想把我留在北京，因為部裏出面講話，知道留不住，纔找我談話。這就是為什麼直到一九六五年初纔找我談話的原因。其實他們在我到武漢後，仍想爭取我回北京電力學院工作。文化革命中，梁超書記三次南下武漢，希望我到保定去（當時北京電力學院已遷往保定，改名華北電力學院），直到後來教育司出面，雖未調成，但我心裏感謝北京電力學院的老領導和部領導對我的關愛！

寒假前，終於公布了兩個專業調到武漢的事，宣布了到武漢的教職工名單，決定春節前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報到，寒假後學生到武漢



水利電力學院上課。

宣布後，教師中稍有震動，但因全系師生都到武漢，所以大的問題沒有。因這次調動，電廠化學專業的教改就此夭折，師生都感到遺憾。我雖然口頭上講到武漢後繼續進行，但心裏明白，到武漢後，我已不可能再和大家一起搞教改了。這是我此生的憾事之一。

## (五) 告別北京

從宣布調往武漢到正式啟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其間動員、做思想工作，實驗設備裝箱、發運，家具托運，還要進行學期考試等，相當緊張。直到一月二十日左右，纔松一口氣。

此時我纔想起自己雖在北京學習、工作十二年，但許多地方還未去過，此一別，不知何日再來。於是安排了兩天到北京各地轉一轉，如天壇、先農壇、紫竹院，以及東單、西單等商業繁華地帶，還專門到前門大柵欄吃了一餐北京風味的小吃。

長城是來不及去了，祇好等以後有機會再去。如今我已年近八旬，仍未到長城一游。“不到長城非好漢”，大概是應去而未去，所以到頭來一事無成，碌碌一生。但從另一側面可以說明，我在北京的十二年是全力以赴地學習和工作的，很多地方有機會去，却總因學習、工作而放棄，總以為以後會有機會去的，當時也未想過會這麼快離開北京。

告別北京，感慨良多。上海是生我、養育我的地方，是我的故鄉。鄉音難改、故土難離，對我來講，千真萬確。所以近年來我每年要回上海老家住一個月，看看老朋友，陪陪我父母的亡靈，是一種無法回故鄉生活的自我安慰。北京是給我知識、給我政治生命的地方，是我成家立業，結婚生子，逐漸成長、成熟的地方，說是我的第二故鄉，一點也不為過。

告別北京，同樣產生了當初告別上海到北京讀書時的感覺，惜別！不過那時認為讀完書會回上海。如今無論從認識上、經歷上都比過去大大長進了，也就沒有了再回北京的奢望。此去不會複返，所

以特別感到依依不捨。

北京讓我認識了很多共產黨人，他們的行動讓我深化了對共產黨的認識，從而確立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決心，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學生中的共產黨員，大多為轉業軍人或調幹生，他們年齡偏大、學習基礎較差，但學習認真、刻苦，把搞好學習當成是黨交給他們的任務。另一方面，他們也把幫助同學進步看作是他們應盡的義務。所以在同學有思想問題、有困難的時候，他們一定會犧牲自己的休息、學習時間，幫助這些同學提高思想認識、解決具體困難。這些黨員在班上威信都很高，為了讓他們能有更充裕的時間學習，領導上沒有安排他們當班幹部，但他們都主動地幫助班幹部工作。

我是班上的團支書，班上不任班幹部的黨員同學是我的“上級”，我總喜歡和他們討論研究工作、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也總是熱忱地幫助我。

我所接觸的老幹部，無論是校領導，還是部裏的一些領導，他們多數是身經百戰的老戰士，也有少數是出生入死的地下黨員。他們都對工作認真負責，對群眾平易近人，不擺領導架子，對幹部則要求極嚴，生活上與群眾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食堂用餐，排隊打飯買菜，與群眾同桌吃飯，有說有笑，都是以幹好工作為標準。每到晚上，總可以見到領導同志在學生宿舍、教工宿舍中轉來轉去。

領導帶頭，群眾怎麼會不積極工作呢？電力部負責學校工作的副部長（先是馮仲方，後是張季農）及教育司的領導，經常到學校來瞭解情況，實地解決問題，聽取各方面的彙報，包括我們學生實習情況的彙報，他們都認真地聽，并作記錄，不輕易打斷別人的發言，顯示出對彙報者的尊重。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級領導在聽取彙報後，總是問“需要我們做些什麼工作？”好像他們不是領導，而是為彙報者服務的。後來我認識到，其實這正是一個共產黨人應該站的位置，即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勤務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可惜現在再也難見到這樣的

領導幹部，更聽不到這樣的話了。

我從這些共產黨人的身上，看到了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他們沒有自己的私利，階級的、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為了階級的、黨的利益可以犧牲個人的一切。

我參加中國共產黨，意味着把一切交給了黨，事事處處要為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想，跟着黨，和人民群眾一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終身。我至今仍在為此而努力，我不會背叛自己的信仰，不會忘却自己的入黨誓言。

北京給我創造了鍛煉與成長的機會，中國共產黨通過北京電力學校（院）的黨組織及學校各級領導，始終關注、關愛我的成長，使我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及世界觀，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認識世界，認識社會發展的歷史，認識社會變革的歷史規律，並以此來指導自己的行動。

黨一直關懷我這個貧農的兒子，從入學的第一天起，黨通過她的戰士——共產黨員關懷我的一舉一動，指導我如何認識事物，如何正確對待困難，如何正確對待自己，而後又耐心地、孜孜不倦地培養教育我成長為一名共產黨員。

剛參加工作，從預備黨員轉正為正式黨員後三個多月，就讓我擔任教師黨支部委員，參與學校教師隊伍的思想建設與組織建設，給我以鍛煉的機會。

一九五八年，北京電力學院成立，各系成立黨支部，安排我擔任動力系專職支部書記，獨當一面，為我創造了更高層次的鍛煉機會，又讓我到北京市委黨校學習，以提高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水準。每次迎接外賓，“五一”、“十一”大型活動的標兵工作，由我組織和負責，鍛煉了我的組織能力。

如果說我在工作上曾經取得過一些成績，工作能力有所提高，都是組織上給我機會鍛煉的結果。

黨組織和領導上對我的關懷與培養不僅在思想上、工作上，而是全方位的。例如，一九五八年夏天我結婚，從房子到傢具、結婚典禮

都是領導上安排的，校長親自參加婚禮。我愛人的工作調動，也是領導主動辦的，我沒有提出，也沒有寫過申請。

一九五九年我愛人從東北到北京電力學院探親，黨委宮志堅書記見到後，問我想不想讓愛人到學校工作，我說當然希望她來北京。宮問我，你愛人是學什麼的？我說是學醫的，現在撫順東部醫院工作。她說，你叫她到醫務所上班。我說手續還沒有辦，怎麼上班，宮書記說，你不要管了，我叫人事科去辦，你告訴他們單位地址就可以了。就這樣，我愛人從此在北京電力學院上班，一切手續由人事科辦理，她的行李也是由她的同學寄來的。

一九六〇年春節前，我和愛人送我母親回上海，在上海親戚家母親突發中風，送華山醫院搶救。我請求學校借錢，學校當天電匯 400 元（是我當時工資的 8 倍），解了我燃眉之急。我家經濟一直比較困難，組織上逢年過節主動給我補助，雖然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但這份心意讓我感激不盡。



一九六〇年北京電力學院參加北京市文教群英會的代表合影。前排左起：趙振起、張建成、史繼昌、劉秉松、安渤，中排左起：李德貴、孟照朋、魯公亮、曾聞問、刁其玉、陳秉堃，後排左起：孫景德、劉慶富、張希照、郎恩富、孫照星



在政治待遇上，組織上更是處處為我創造機會。周總理作的關於中蘇問題的報告，我是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聽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累斯頓交響樂團在人大會堂演出，學校祇有兩張票，組織上讓我去；北京市文教群英會我是正式代表，全國文教群英會我是列席代表；每次迎接外賓群眾歡迎、中央領導人游園、中央領導人逝世吊唁活動、人民大會堂宴會、國慶十周年上觀禮台觀禮等等都有我的份。很多事不是人人都有機會的，我有機會參與，讓我感到幸福，既開闊視野，也深感組織上對我的信任與關懷。

北京與共和國一樣，十二年中突飛猛進，馬路變寬了、變平了；汽車多了、馬車少了；高樓多了，十大建築屹立在長安街兩旁；商業更繁榮了，蔬菜品種多了，米、面多了，人口多了等等。變化日新月異，叫人看不夠。

我在北京的十二年，祖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現今要離開北京了，思緒萬千、依依不捨、無可奈何，祇有默默地思念、祝福。

## 四、新的崗位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早上 7 點多鐘，列車停靠在武昌火車站，從北京調整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教職工連同他們的家屬，以及寒假未回家的兩個專業的學生，一起來到了武漢，在車站受到了以張莠承副書記為首的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各級領導的熱情迎接。

### (一) 印象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是水利電力部重點建設的高等學府，是培養水利電力事業建設人才的搖籃。學院位于武昌東湖之濱、珞珈山畔，北臨東湖，南依珞珈山，與著名的武漢大學相鄰。校區綠樹成蔭、四季有花、風景秀麗，漫步校園，使人心曠神怡。我們從北方的冬天來到此地，這種外在環境的變化，給人以一種溫馨、舒適的感覺，使離別北京的抑鬱心情也有所舒展。我兒子張益民當時剛滿 5 歲，一下車看到綠色的草地就去打滾，那種開心的樣子，至今難以忘懷。

整個校園是東西長南北窄，布局合理有序，從東到西依次為學生生活區（包括學生宿舍、學生食堂、運動場、體育館等）、教學區（包括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實習工廠等）、行政辦公區（包括行政樓、司機房、衛生院、印刷廠等）、教工生活區（包括教工宿舍、教工食堂、教工俱樂部、郵局、銀行、商店、糧店、煤店等），在校區，一般生活用品均能買到。

對於這樣的工作、生活環境，我是滿意的。既來之，則安之。我將在這裏戰鬥與生活，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將一如既往、全力以赴，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教育事業添磚加瓦！這是到新工作崗位後的第一印象。

黨委為歡迎我們的到來，專門開了一個歡迎會。在行政樓會議室開的，主要參會者是各級領導幹部。我們初來乍到，誰也不認識。張蕪承副書記講話後，我也代表北京來的教職工講話，表示在黨委領導下，服從安排，努力工作，不辜負黨的期望，基本上是表態性質的。

教務處長揭曾佑教授的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前身是武漢水利學院，是由全國 8 所高等院校的水利專業合并而成，成員來自全國各地。但到武漢後，在黨委領導下，大家團結一致，心裏沒有了以前單位的情結，祇有武漢水利學院，所以學校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學校黨委是團結的，對大家是一視同仁的。希望北京來的老師們、同志們在黨委領導下服從安排，有問題通過組織系統反映，不要在背後議論，更不要找你們原來的領導談，防止搞宗派活動，這是不允許的。

這是一種警告！警告誰？當然是警告我，不要搞宗派活動。這次會議給了我另一印象，武漢和北京不一樣，要謹慎從事。

北京電力學院的那種上下關係、同事關係，在這裏會產生誤會。因此，我要求北京來的同志，今後有什麼事不要找我，找你們現在的領導，也不要到我家裏來串門，我也不會到你們家去，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我不知道揭曾佑處長的講話內容是他自己的想法，抑或有人授

意，但後來發生的事，讓我感覺是有人以宗派主義的情緒先發制人，讓人不能對他們的安排說三道四。

如北京來了兩位系主任，一位是電力系系主任戚秉一，一位是電廠化學系系主任王杏卿，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後，兩位系主任儘管業務水準、工作能力均高于武漢的老師，但他們祇能當一般教師；北京來的電廠化學專業的老師都在武漢老師的領導下，儘管武漢的這些老師是在北京培訓過的。

對於這樣的安排，北京來的同志有看法。據我所知，武漢方面既未徵求過北京方面領導的意見，更沒有徵求過調來武漢工作的同志的意見。

誰有不同意見、有想法，就扣以宗派情緒的帽子。我這纔弄明白揭曾佑處長講話的真諦。

概括來講，到武漢後的印象是，外在環境比北京好，內在環境與北京不一樣，有一種姑娘出嫁到婆家的感覺，要夾着尾巴做人。

## (二) 新的工作崗位

北京來的兩個專業均歸于三系（電力系）建制，我被安排擔任系黨總支委員、分團委書記，負責學生方面的日常工作，受系黨總支、院團委雙重領導。各年級的政治輔導員（專職）是我工作的助手，他們多數是分團委的委員。

對於組織上安排的工作，我是欣然接受的，因為學校的一切工作，都是為着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進行的，也就是圍繞着培養學生進行的，我能直接做學生工作，覺得很有意義。同時，這項工作也不陌生，過去在系裏當領導，也要抓學生工作，比起北京的工作，這裏更單純、專一了。

一九六五年新學年開始，大約九月下旬，黨委組織部潘平科長找我談話，告訴我，黨委決定調我到院團委工作，原團委書記朱冠先同志要調任其他工作，所以要我立即到任，並告訴我，“提”我為副科級。

我這纔知道，在北京幹了 8 年的“中層幹部”、系級領導原來是個

“白丁”，在這兒什麼也不是！在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召開高校中層幹部會，讓我去參加；黨內傳達重要文件，中層以上幹部參加，也讓我。現在看來，北京電力學院的做法，可能是為了方便我的工作，也可能是對我法外施恩。

對於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領導上的安排，我很感激，讓我到團委工作，說明領導上對我是器重的，因為團委是黨委培養、鍛煉幹部的地方。

到任後，黨委張芾承副書記和我談了話，主要講團委工作的重要性。他說，團委主要做學生方面的工作，是學校的半邊天。學生工作做好了，學校工作的一半就做好了。他希望我繼續努力，把團委工作做好，同時指示我籌備第六屆團代會，起草工作報告，籌畫團代表選舉、新一屆團委成員的選擇，工作進展情況向黨委報告，工作報告要經黨委討論。他肯定了我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後的工作與表現，說黨委對我是信任的，並寄予厚望。

到團委後，首先熟悉環境與工作。聽同事的介紹，團委工作什麼都管（指學生方面的工作），思想，學習，吹、拉、彈、唱，吃、喝、拉、撒，意思是學生的事情，什麼都得管。

根據黨委的要求和同事們的介紹，及我在系裏工作的經驗，我把學生工作的方方面面分成幾條綫，既抓住重點，又要面面俱到，不留死角。

重點是抓學生的思想教育和學習，這條綫由團委→分團委→輔導員來完成，團委分工由我負責主抓；學生生活、文體活動、宣傳活動，這條綫由團委→學生會有關部（生活部、文體部、宣傳部）來完成，由團委副書記王紹良同志主抓，團委宣傳部長吳冠英同志配合；學習毛主席著作以及面上情況的瞭解，由團委組織部長屠莉莉同志負責抓。

為保證學生能安心學習，要做好各方面的協調工作，與福利科保持聯繫，保證學生浴室的開放，搞好伙食；與保衛科聯繫，保證學生區的治安；與體育教研室研究，如何開展學生體育活動及保證體育器材的供應等問題；與衛生科聯繫，為方便學生看病，在學生區開展巡診活動，為保持學生區清潔衛生，定期打藥消毒等。



為使各項工作落到實處，我們團委幹部都要到學生中去，每人要抓一個班的點，要住到學生宿舍去，在學生食堂用餐，與學生同活動。團委安排團委幹部顏國旗一個人值班。

我們提倡抓兩頭帶中間的工作方法，這些措施的貫徹執行，使我們既能瞭解面上的情況，也能及時掌握在學生中發生的問題，工作比較順暢，黨委也較滿意。

學生思想工作的重點是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通過政治課的系統學習、通過各種活動，讓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解决好為什麼學習、為誰學習的問題，使學生努力、刻苦地學習，培養嚴于律己、艱苦奮鬥的作風，做到團結一致、共同進步。所以我主張政治思想工作應該落實到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的實處，讓學生以學習為主，全面發展。

我和一系（農水系）分團委書記程勵同志抓了一個學用毛主席思想比較好的典型，這個學生是農水四年級的李貞儒。說是“抓”，因為他不是“培養”出來的，而是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中“湧現”出來的。

程勵同志發現後，對我講了李貞儒的情況：他是班幹部，學習成績一直很好，社會工作也不錯，特別是積極主動地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指導自己的行動。

開始時，我是抱着瞭解實際情況的心態去找李貞儒交談的，經過幾次交談，發現他學的東西不少，理解得比較深入，特別是運用矛盾論、辯證法于業務學習上很有成效。這很符合我的想法，于是我和程勵同志商量要總結李貞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經驗，并作為典型在全校推廣。

材料整出來後，我向張荊承副書記作了彙報，他很支持。我們讓李貞儒先在系裏介紹他的情況，反應很好，又在全校講，同學們受到啟發，在學生中掀起了一股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熱潮。

團委把李貞儒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上報給團省委，李貞儒被評為湖北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在全省有關會上作了報告，有一定的影響。李貞儒因此成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知名人物，也因此讓他的人生開始披上了悲喜劇的色彩。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當作修正主義的苗子受到學生的批判。我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後，在學生中申明，李貞儒這個典型是我整出來的，是我一手樹起來的，他沒有錯也沒有任何責任，有錯，責任在我，大家可以批判我，不應該批判李貞儒。同學們聽了我的話，從此再也沒有批判過李貞儒。

文革結束後，李貞儒返校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工作。可能是因為學生時期的影響，也可能是由于他各方面條件較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很快被提拔為黨委常委、組織部長、黨委副書記。

地位變了，環境變了，他放棄了自己成長過程中視為法寶的毛澤東思想，從而一再犯錯誤，陷入泥潭難以自拔，最後走上了絕路。

可惜啊！一顆多好的苗子，在成長過程中，“蟲子”進入了他的肌體，由于護林人認為“蟲子”無關緊要，祇要樹能長就行，于是周圍“蟲子”越來越多，而肌體內的“蟲子”膽子也就越來越大，終于使這棵本來已經病得不輕的樹枯萎了。這是李貞儒放棄了毛澤東思想、放棄了思想改造的必然結果。這是他的不幸，然而護林人的責任是無法推諉的。因為是你祇看表面、不看實質，容忍“蟲子”吞噬樹木的肌體，最終導致樹木的枯萎死亡！

其實如李貞儒者，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就出過好幾個，全省、全國不知有多少！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目睹發生于眼前的一切，痛苦之情難于言表，無可奈何。悲哉！

在學生思想工作中除了抓好先進典型外，對所謂後進學生的工作我也十分重視。因為做好後進學生的工作，是我們的責任，使學校培養的學生都能符合國家的要求，為國、為人民效力，如果有學生跟不上形勢，掉隊了，那是我們沒有盡到責任。所以當我聽到輔導員講某同學如何不好、思想如何落後時，我總要親自找本人談話，瞭解情況。

根據我在北京工作的經驗，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所謂落後分子、思想反動等，其實并非如此，通過交談、溝通，很多情況是不屬實的，有些是無限上綱的。即使有些話、有些事是真的，不同的處理方法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這些情況在武漢、在北京都有。北京電力學院六四屆電廠化學專業有一位畢業生，平時輔導員說他落後，我找他交談，瞭解到的情況不像反映的那樣。這個學生是上海人，思想比較活躍，性格直率。不管你是誰，他有不同看法，就要和你辯論。輔導員認為他自高自大、自以為是、不尊重老師，對他反感。我却認為這樣的學生不錯，敢于講話，敢于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們應該提倡。輔導員在他的畢業鑒定中寫上了他自己的看法，我在審查時否定了，要他重寫。我說，畢業鑒定對於一個剛走上工作崗位的人是多麼重要，不能憑自己的喜好來寫，要實事求是地寫。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上海電力局見到他（同學聚會），他說，張老師，要不是你把我的鑒定改了，我這輩子可就完了。此時他任電力局一個處的處長。另一位同學講：張老師，分配時，你大筆一揮，我到了上海，有了今天，如果揮到邊區，那就是另一種情況了。

此後，我想得很多，我們的工作涉及到青年人的未來。往大裏講，涉及到國家的未來。處理得好，為國家培養了一個人才；處理不好，為國家建設設置了一個障礙。

在北京電力學院動力系工作時，我系一個青年教師偷看女生洗澡被學校抓住了。在討論處理意見時，我堅持不能以流氓論處，青年犯錯誤要給以改正錯誤的機會，不能公開，不要擴大影響。一公開，這個教師一輩子抬不起頭，對今後的戀愛婚姻都會有影響。不能因犯了這次錯誤影響他一輩子。領導同意我的意見，并決定交由系裏處理。他痛哭着說：一失足成千古恨，這輩子完了。我對他的錯誤進行了批評，要他從思想上檢查，今後不要再犯，并建議他離開學校。後來他調到某出版社，結婚生子，工作很好，進步很快，最後職務是出版社總編輯。他也一直很感謝我，其實我們並無私交。

我在任何時候都不同意把犯有錯誤的人一棍子打死，這對於個人及社會都是沒有好處的。我們有些做思想工作的人并不瞭解人的思想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我們的任務正是要創造這樣一種條件，使人的不正確思想向正確方面轉化，以便有利于社會的發展。

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三系水動專業有一個學生叫譚伏生，湖南人，下面彙報說他有反動思想，而且很頑固。我找他交流，發現他的問題很簡單，也很實在。簡單講就是：說為人民服務，為什麼領導與老百姓兩重天？

他家在農村貧困地區，家裏生活很困難，據他講，他們那裏的老百姓經常餓飯(吃不飽)，但當官的都吃得好、住得好。中央經常國宴招待外國人，中國人吃不飽，好東西讓外國人吃了，想不通。老百姓整年在地裏勞動都是應該的，為什麼領導難得到地裏一趟，做個勞動的樣子，前呼後擁，拍照登報，還要拍電影放給大家看，想不通，他特別舉了劉少奇到湖南視察的例子(那時劉少奇是國家主席)。譚伏生的話就成了反動思想。學校保衛科準備上報省公安廳(作為反動學生)，我反對，并自告奮勇去做工作。

經過幾次交談，我感到他說的問題都存在，反映了毛主席早就批評的現象：進城了，有些領導做官當老爺了。文革中我更深入地認識到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官僚資產階級，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群眾，出門前呼後擁，擺樣子調查，看望群眾、勞動都要照相登報，顯示與眾不同、高人一等。譚的反映有正確的一面，另一方面，譚在思想上陷入了絕對平均主義的思維而無法自拔。他認為既然共產黨說一切為了人民、為人民服務，那麼領導與群眾應該一個樣，一樣的勞動、一樣的生活，他鑽進了牛角尖。我找他談過不下 20 次，我們之間可以爭論、討論，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

後來文革開始，學生思想工作由黨的系統來管，我也就沒有再到學生中去。聽說他神經錯亂、跳樓自殺，我很內疚，因為我沒有盡到責任，沒有把譚伏生救過來。

教育者先受教育，教育者的人格、品德應該受到人們的認同與尊重，教育者應該身體力行，應該具備教書育人的基本條件。我從進入學校起，特別到北京後，注意學習老革命的革命意志和人生品德，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修煉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我要求自己、也要求學生不謀私利，對違反公衆利益與原則的事



要敢于反對與鬥爭，要做老實人、辦老實事。

但要做到這些，有時是要吃虧的。記得在我負責學校總務工作時，有一批新房子分配，黨委討論決定了分配的條件，由我負責執行。找的人很多，我都明確按條件排隊，有就有，沒有就沒有。黨委安排我一套三室一廳住房，我拒絕了。因為我負責分房工作，自己先安排了，那就無法工作了（我當時與一位老師家合租一套三居室房）。我沒有私欲，所以腰杆子就硬。後來有三位院領導給我寫條子，要我考慮某些人的要求。我在黨委會上提了意見，我說分房條件、分房文件是黨委討論通過的，我是執行者，祇能按文件辦，否則牽一髮而動全身，有一個不合條件，工作就無法正常進行。你們給我寫條，我不執行是抗上，執行了就違反黨委的決定，而且工作無法進行下去。我該怎麼辦？寫條子的領導不吭氣，沒有寫條子的要求我堅決按黨委的決定辦。會後，三位領導都收回了條子，我知道得罪了他們，以後會有小鞋穿的。

電化六四九二班班長陸和寶，是一個學習成績、工作能力、思想品德都很好的學生，我介紹他入了黨。到工作崗位後由于表現突出，很早就被提拔擔任領導職務，但在電廠領導（廠長、黨委書記）崗位上停滯了。一九九三年我到青島辦事，路過濟南去看他，他時任黃台電廠廠長。吃飯時，他的秘書說：您是廠長的老師，廠長陪您吃飯，親自安排車子、住宿。省裏領導、部裏來人，廠長從來不陪客的。這種情況，我以前聽說過，看來是真的。飯後送我到住處聊天時，我問他，根據你的條件，早該到省局了，怎麼老在原地不動？他說，這要問你呀。我說，與我有關嗎？他說有關係：“在學校時，你是怎麼教育我們的？我就是按你說的做。有些領導來電廠，工作是次要的，也解決不了多少實際問題，來了吃、喝、玩少不了，走時還要拿東西。我就看不慣，除工作接觸外，其他的我不管，也不陪，他們怎麼能喜歡我呢？”我說，這麼說我害了你了。他說，不，我願意！這樣踏實。後來聽說一位從山東電力局調水電部當領導的說，像陸和寶這樣的人不能再提拔，太不懂事了。

由此可見，頂風，特別是頂領導的不正之風是要冒風險的，個人的利益會受到一些影響的，這就不難理解現在官場的風氣了。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第六屆團員代表大會經過幾個月的籌備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召開，我在會上作了工作報告。經過討論，通過了報告，選舉了新一屆的委員會。我被推選為第一副書記（缺書記），王紹良為副書記，我也就正式成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團委的領導人了。

由于團委同志的努力，及各系分團委和輔導員的辛勤工作，學生會幹部及各班團支部的積極工作，更由于黨委的領導及大力支持，學生工作顯得朝氣蓬勃。學習毛主席著作形成了熱潮；業務學習成績普遍很好；文體活動開展得紅紅火火；文工團各隊積極開展工作、排練節目，定期為學生演出，高校匯演成績優異；體育大隊各代表隊成績不斷提高，武漢地區高校運動會總成績保持前三，排球隊獲冠軍；群眾性體育運動開展得也很好，每天早晨，特別是下午四點以後，操場擠滿了鍛煉的學生；游泳運動更為突出，每次渡長江，儀仗隊總由我校師生擔任，我校的冬泳隊更在武漢市首屈一指。向解放軍學習，展開環境衛生競賽，宿舍明亮，被褥都要疊出棱角來，窗框、門框不能有灰塵，治安情況也好。總之學生中各方面情況令人滿意，我又熱愛上新的工作了。

### （三）出席團中央座談會

一九六六年春節期間，王海容向毛主席彙報了學生中的一些問題，後來毛主席給王海容寫了一封信，談了對學校教育工作、學生上課、考試等方面的意見。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在北京召開了部分高校團委書記、部分省市團委學校部長座談會，學習毛主席給王海容的一封信，並討論學生工作方面的一些問題。

參加會議的有三十多人，主要是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團委書記，一些高校比較集中的省市如四川、上海、陝西、湖北、山東等，每省（市）2人，一人是省（市）團委學校部長，另一人是高校的團委書記。湖北

省是我和團省委的范部長去的。

座談會由團中央書記楊海波主持，傳達了毛主席給王海容的信。楊海波要求我們安下心來，用一周的時間學習討論，領會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把主席的思想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以後的會議一直是小組會，京外代表為一個小組，約十來個人，楊海波也經常參加我們的會。

毛主席給王海容的信，內容主要是從教育思想到教學方法的一些指導性意見，以及對考試、學制、調皮學生的看法等等，內容與後來公布的毛主席一九六五年春節關於教育的談話大同小異。

毛主席認為，現在學制太長，讀到大學畢業要讀十六七年，又脫離實際，他主張學制要縮短，要砍掉一些課程，學習要與勞動生產結合，學生要懂點工、農、商、兵，學校工作轉變學生思想是第一位的。

談到教學方法時，毛主席認為教學方法要改，現在用劃一的內容向學生灌輸，學生是被動的，沒有主動性、自主性，更沒有創造性。他認為先生在課堂上講課囉囉嗦嗦，講得不好，要允許學生打瞌睡。毛主席說，你講得不好，還一定要人家聽，與其睜着眼睛聽着沒味道，還不如睡覺，可以養養精神，休息一下腦筋。

對於考試問題，毛主席說，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出一些偏題、怪題整學生，我不贊成，要徹底改革。他主張公開考題，讓學生自己看書，自己研究，考試可以交頭接耳，可以相互討論，無非是自己不懂，問了別人，就懂了，就有收穫。在講到所謂調皮學生時，毛主席認為，有些學生不聽老師的話，就認為是調皮，有的學生與先生看法不一樣，有自己的看法，也被認為是調皮，這是不對的，學生打架，也不要緊，祇要大打瞎別人的眼睛。

毛主席給王海容信中的內容不止這些，時間長了，很多記不起來了。參加會議的記錄本（其中有我抄的此信的全文）在審查時被抄家拿走，不知去向。

總之，當時聽了傳達後，很是激動，感到毛主席日理萬機，對學校工作瞭解得那麼細緻，講的話都符合實際情況。小組討論非常熱烈，大家認為，毛主席的話都說到學生們的心坎裏去了，希望團中央正式

發文向學生傳達。經團中央研究，楊海波在會議結束時講，不發文件，可傳達到學生幹部。

回校後，我先向學院黨委作了彙報，黨委決定在青年教師及學生幹部中傳達。傳達後，反應非常強烈。

毛主席的這些思想，早在一九二一年就表達過，他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指出：“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殘踐人性，人的育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能迥別，學校則全不管究這些，祇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學校乃襲專制皇帝的餘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起來。祇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祇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

毛主席從出發點到立足點都着眼于如何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社會主義建設的人才，所以他主張應該德、智、體全面發展，學校工作要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第一位。首先明確了人生觀，明確了學習目的，纔能主動地、刻苦地學習。學校應該給學生創造一種生動活潑的學習環境，而不是灌輸式的、千篇一律地死讀書的方式。要尊重學生的人性與人格，引導他們生動活潑地、創造性地學習、研究，在接受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創造。

為此，就要改變現有的課程設置、學制、教學方法與考試方法，鼓勵學生的創新思維，鼓勵學生提出與發表不同的見解進行討論，對沒有真才實學的先生、沒有自己見解的先生、祇知照本宣科的先生、講課講得不好的先生們的講課，學生可以不聽、可以打瞌睡，以促進先生們提高水準，講出真才實學，講出自己的見解。考題要公開，學生考試可以看書、可以交頭接耳、可以討論，以達到弄懂的目的，廢除以學生為敵人，出偏題、怪題整學生的做法。凡此種種，是反現行教育制度的潮流。

試想，如能真的實行毛主席的這些思想，學校將是何等的生動活潑，對學校領導、對教師將會提出挑戰，迫使他們改變觀念，提高水準，從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將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

可惜，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貫徹執行，而文化大



革命雖然從學校開始，也高叫要進行教育革命，然而也僅僅是講講而已。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根本沒有觸及到學校的體制，至于文革以後，教育全盤西化，再加一點封建主義的孔孟之道，味道如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 (四) 工作團隊

我從一九六五年一月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工作，到一九六六年六月開展文化大革命，有效工作時間為一年半，其間在系分團委工作半年多一點，到院團委工作將近一年。無論在系裏工作或是在學院團委工作，使我很難忘懷的是我們的工作團隊。

那時我們都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忘我工作。雖然工作上也有分歧、也有爭論，但都是為了工作，不存在個人恩怨。我們目標一致，步調一致，努力完成黨委交給我們的任務。

我雖初來乍到，工作沒有他們熟悉，文化程度沒有他們高，能力也不比他們強，但他們都無條件地支持我的工作，我們之間很快成為朋友，成為工作中的志同道合者。因此，我在一個新的環境中不感到陌生，工作得以順利地進行。我要感謝他們！

在三系一起工作的有劉國靖、牛國華、莊春岫、楊書榮、蘇躍庭、黃俊柏、王玉蘭、段希健等同志。這些同志，後來多數調離了學校，有些在文革中因觀點不同分屬不同的派別，甚至在省教育系統的大會上奉命批判過我，但我對他們的感謝、懷念，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曾一起為共同目標戰鬥過，我們愉快地合作共事、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共同取得成功的歷史是磨滅不掉的。

院團委名義上有 6 個人，除我之外，有副書記王紹良、組織部長屠莉莉、宣傳部長吳冠英、辦公室顏國旗，還有一位負責留學生工作的丘沐平，他在團委辦公室上班，政治學習在團委，但工作由院辦主任管，與團委無關。所以團委實際上是 5 個人，每人都有一攤工作，每人都抓一個點，工作點面結合，從面上瞭解全局，發現傾向性問題，

從點上解剖麻雀，找出解決的辦法，總結經驗，推廣到面。

從團委幹部到分團委、輔導員，絕大部分住在學生宿舍，吃在學生食堂，活動在學生中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蹲點班。學生工作雖然繁雜，包括政治思想、業務學習、文體活動、社團活動、吃喝拉撒、環境衛生、治安保衛等等，但我們有條不紊，工作十分出色。靠什麼？靠的是目標明確、行動一致，靠的是不怕艱難、踏實工作，靠的是上下齊心、團結奮鬥。

團委幹部、輔導員平時很少休息，為了趕寫報告，經常會整夜加班幹，從不叫苦叫累。我們不光是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在生活上也相互關心。團委幹部中，王紹良、吳冠英、顏國旗是單身漢，所以我們已經有家的人有機會就請他們到家裏聚聚，喝點酒，放鬆放鬆。有時在屠莉莉家，有時在我家。記得有一次在我家，吳冠英愛吃肉，我做了一碗紅燒肉，他吃得最多。酒足飯飽之後，還剩半碗肥肉，王紹良與吳冠英開玩笑，如果吳冠英把肥肉都吃下去，他就去買香煙。吳冠英說，買兩包煙、5斤蘋果，他就吃下去。王紹良說可以，祇要都吃下去，他就去買。我怕吳吃壞肚子，勸他們不要為吃打賭。但他們杠上了，誰也不讓步。結果吳冠英真把半碗肥肉吃下去了，王紹良二話沒說，出去買了兩盒煙（飛馬牌）、5斤蘋果，把大家樂得忘乎所以。

在文革初期，王紹良、吳冠英先後結了婚，團委的同志幫助張羅。記得大家分別買了一些雞、鴨、魚、肉，自己動手做拿手菜，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慶賀。顏國旗何時結的婚，我不知道，因為我後來被隔離審查多次，他不便通知我，所以我沒有當面祝賀顏國旗新婚之喜，實在是一件憾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團委的同志共同經歷過煎熬，經常一起討論形勢、討論黨的政策，最後決定，一起支持革命小將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文革過程中，我們始終站在一起，後來造反派遭到清算，大家又一次次地受衝擊、受煎熬，既要檢查自己，又要揭發批判我這個帶頭人，揭得不符合要求、批得不深過不了關。為了過關，就要言不



四十七年後再聚首，都老了。王紹良(左)、吳冠英(中)、張建成攝于二〇一三年

再沒有一起聚過。我和王紹良主要是進學習班檢查，以後又升級進“五不准”學習班受審查。最後我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王紹良受到黨內警告處分，以後轉入業務領域，成為水利史專業的教授；屠莉莉後來成為中層領導幹部(處級)；顏國旗退休前是副處級；吳冠英于一九七一年調離學校，到銀川糖廠工作，由于他的突出表現，很快就入了黨，之後提為黨委宣傳部長，進一步提為寧夏回族自治州農墾局副局長。

上世紀九十年代吳冠英請我到銀川去聚會。承蒙吳冠英、李祚英夫婦熱情招待，我到了賀蘭山脚下西夏國的遺址，看到了沙湖風景區的美景。沙壩南是江南水鄉的景致，沙壩北則是風吹草低見牛羊



一九九八年五月，與闊別二十七年的吳冠英在銀川沙湖合影留念

由衷，說些違心話。此中滋味，可想而知。因為我自己也是這麼過來的。有時我感到愧疚，因為我，纔使我的朋友受到如此折磨。

軍宣隊、工宣隊進院後，我們團委的同志被分配到不同的單位學習，

的北國風光。我也看到了河西走廊肥沃的土地，如果我年輕 40 歲，定會到那裏去從事農業開發。銀川之行，我終身難忘。我感謝我的朋友吳冠英給了我這樣的機會。

團委同志們後來的發展說明，他們是有才幹的，不僅當年團的工作幹得很好，以後的工作也幹得很好。王紹良的智慧與才幹、善于與群眾打成一片的作風，吳冠英的思維敏捷、超群的組織能力，屠莉莉的沉着穩健、堅持原則，顏國旗的好學上進、默默工作的老黃牛精神，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從他們那裏學到了很多，我真的很懷念他們。雖然文革後，我們接觸不多，但碰到時總感到很親切，相互問個好，這也就夠了。在我的腦海中，我們團隊的每個人仍在繼續努力工作着。不論你在何處，不論你在幹什麼，你曾經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團委的幹部，曾經一起經歷了中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



## 文革篇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對於我們的國家，對於我自己、我的家庭來說，都是永遠不能忘懷的。它改變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軌迹，也改變了我前進的軌迹，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方方面面。

我生在舊社會，成長在紅旗下，兩種社會的對比是十分鮮明的。因此，我崇敬、感激前輩們的革命行動，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卓絕的戰鬥，犧牲了無數的革命先烈，為我們打下了一個新的中國。我願為此接着戰鬥，加入中國共產黨，願意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獻身。我常常哀嘆為什麼不早些出世，可以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投身于轟轟烈烈的革命戰鬥。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們這一代人享受着革命前輩、革命先烈浴血奮戰創造的勝利果實，一帆風順。我以為祇要跟着毛主席、共產黨走，就可以走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走向人類的徹底解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我思想上是沒有準備的，行動上也就跟不上。我努力學習，當我比較清楚地認識了這場革命的任務、方法之後，就積極地投身進去，慶幸自己可以跟着毛主席進行一場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鬥爭。然而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體會到革命不是講故事，不像電影中表現的那麼浪漫。革命是艱難的，要做出犧牲，要付出代價。文化革命被扼殺、否定了，付出的代價是非常沉重的。

衆所周知。我作為一個積極參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幹部，自始至終參與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文化大革命全過程。我願如實地將情況反映出來，讓後代瞭解文化大革命的真相。

## 一、文革初期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何時開始的，說法不一，有人說從批吳晗開始，有人說應該更早，也有人說從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開始，這個問題，留給文革史專家們去考證。

我直接接觸到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院黨委副書記張芾承從廣州開會回來，在行政樓三樓會議室召開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通知》，因為這個《通知》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過的，故簡稱為“五一六通知”。

會議傳達了中南局召開會議的情況以及陶鑄的講話，會議參加人員有黨委成員、各總支書記。張如屏院長也從休養地趕回來參加會議，說明會議的重要性。

這次會議，對我及與會者震動很大，知道中央出了大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被端出來了，中央決定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矛頭指向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場政治風暴要來了。

會上，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講了話，大意是：他雖然身體不好在外地休養，但學校的情況是知道的，重大事情張副書記都向他作了報告，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應由他負責。並強調，學校工作都是按省委指示辦的，黨委一班人是團結的，工作是努力的，要大家相信黨委能領導好文化大革命運動。

我此前沒有參加過黨委會會議，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時間不長（一年多），對領導層情況也不清楚，所以感到張如屏院長的講話向大家傳達了一個信息：學院黨委是沒有問題的，請大家放心，相信黨委能領導好文化大革命運動，如果學校有什麼問題，由他擔着。這就為大家壯了膽。

在這次會上，宣布成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非常意外的是，我是成員之一。我不是黨委成員，也不是總支書記，根據

以往的經驗，政治運動的領導成員都是由黨組織的領導人擔任的。

這次任命的小組成員共有 5 人，他們是：張如屏、張芾承、常樹蔭、李喜爾、張建成，其中祇有我不是黨組織的領導人。後來我想，大概因為我是負責學生方面工作的，政治運動，學生是大頭，所以讓我進小組便于工作，同時也說明了黨委對自己是信任的。

文革領導小組成立後，沒有專門開過會，沒有研究過如何具體開展文革運動，祇是在黨委研究文革問題時讓我列席黨委會。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省委工作組進駐我院，學校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也就不復存在了。

武漢地區高等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與北京有所不同。北京在聶元梓等 7 人大字報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廣播後，群眾很快被發動起來，大字報鋪天蓋地，一部分人把矛頭指向單位領導和北京市委，一部分人則反對把矛頭指向領導，認為那是右派向黨進攻。

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派工作組進駐大學、中學領導運動，把領導權控制在自己手中。工作組抓教職工及學生中的右派、反革命，這樣就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鎮壓下去了，這就是所謂“五十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撤銷了工作組，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又出現新的高潮。

武漢在運動初期，一切按湖北省委的安排及指導辦。武漢大學把校長李達、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打成“三家村”，大字報也很多，各校都去聲援與學習。各校初期的大字報，多為轉抄，表態支持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對本單位領導涉及較少。

湖北省委決定派工作組進駐高校和中學，名為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實為到各單位抓右派、抓反革命，即所謂抓“游魚”，同時組織紅衛兵，開展掃“四舊”。工作組似乎也把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但矛頭指向與“五一六通知”背道而馳。

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武漢地區少數受毛主席接見的學生回到武漢，開始成立戰鬥隊，

把鬥爭矛頭指向黨委及工作組，運動纔慢慢開展起來。

所以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比北京的運動慢了幾拍。

### (一) 省委工作組進院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湖北省委工作組進駐我院，領導文化大革命。組長是武漢郵電學院的一位處長，叫李鳳翔，是抗日時期參加革命的幹部（即三八式幹部），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經過接觸，我的感覺是李組長很直率、工作有熱情、平易近人、沒有什麼心計。

在接到湖北省委工作組即將進院的通知後，張蕪承副書記召開了由黨委成員、總支書記、黨員處長參加的會議，我也參加了。張副書記在傳達了湖北省委的通知後，要求我們熱情地歡迎工作組的到來，聽從工作組的領導，如果他們說了不利于黨委的話，做了不利于黨委的事，不要公開反對、辯論，絕不要頂牛。他分析說，工作組來後，與黨委的關係有三種可能：一是對黨委不相信，撇開黨委，他們單獨搞；二是與黨委一起，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三是當着我們的面是一套，背後另搞一套，我們要有所準備，努力爭取第二種情況。

張蕪承副書記說，為了便于工作，黨委決定由李喜爾（黨委委員，保衛科長）負責向李鳳翔介紹情況，照顧好工作組的生活，瞭解李組長的情況及想法，以便我們配合他工作。必要時，也可以向他表態，文革結束後，歡迎他留在水院工作。他要求在座的人不要主動找工作組說話，他們找你們瞭解情況，該說的就說，不該說的不說。這個要求也要向積極分子打個招呼。

參加會議的人，都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都知道此次文化大革命來勢兇猛，就怕跟不上形勢而犯錯誤，更怕運動會搞到自己頭上。所以在張副書記講完後，大家紛紛議論開了，不知下一步怎麼搞，擔心工作組來了，不聽我們的，祇聽下面的人說，那就不好辦了。總之，心裏無底，有些怕，因為在座的都是學校內的當權派啊。

其實張蕪承副書記比誰都害怕，他是主持學校工作的人，雖說有張如屏院長頂着，但工作都是他做的，如果有問題，他是首當其衝的。



但他是幹部的主心骨，心裏再有想法，講話也要理直氣壯。他說，大家放心，工作組是按省委指示辦的，黨委也是按省委指示辦的，祇要我們配合工作組的工作，一定會合作得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下午，我們這些人參加了與工作組的見面會。李鳳翔組長講話直截了當，直率地交了底。他說：我們工作組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工作，黨委原來的工作班子與工作計劃不變。我們是相信黨委的，我們是一家人，不要分彼此，有事共同商量，把水院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對此表態，大家熱烈鼓掌。

李組長接着說，有一點給大家講清楚，工作組是省委派來的，所以在面對群眾的時候，工作組要顯出獨立性，有些問題的表態可能會與黨委有出入，這是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例如群眾給黨委貼大字報，我們工作組祇能表示支持，但不等於我們不相信黨委，不支持黨委的工作。工作組不能壓制群眾給領導提意見。如果工作組與群眾也對立起來，那誰來做工作呢？

會議結束後，大家的表情都是開朗的、笑嘻嘻的，因為最擔心的工作組來院是整領導班子的這一猜疑肯定不存在了，心中的石頭落地了。

我的感覺也不錯，工作組、黨委目標一致，我們這些人祇要根據領導指示去做就行了，不會犯大錯誤。如果兩個班子對着幹，我們夾在中間，日子就難過了。

現在回想起來，工作組來，是協助黨委把抓右派的工作做好，保證領導權不會落到右派手中。一個老闆、兩塊牌子、兩個班子共唱一台戲，這台戲的名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戲文主要是：把教職員工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學生中的右派挖出來。為此，“學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學校黨委沒有問題的，由黨委領導，學校黨委領導不了的，由工作隊領導。”（引自陶鑄給趙紫陽的信，見徐海亮編著《東湖風雲錄》第24頁，銀河出版社2005年版）。

當我們瞭解了省委派工作組的用意後，就比較容易理解李鳳翔組長表態的含義了，也就容易理解工作組從進院到7月份中央表態

撤工作組前的一系列表現了。

十二日上午，全院師生員工在院體育館開會，一是歡迎省委工作組進駐我院，二是動員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運動，是進一步發動群眾的動員會。

李組長在會上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同學們起立並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有學生喊起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有些學生激動得流下了眼淚。李組長號召大家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揭發、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形形色色的表現，要挖深批透，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他表示，工作組一定和廣大革命師生一起，排除各種阻力，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動，歡迎大家向工作組反映情況。

為了表示把運動搞好的決心，工作組宣布從今天起停課鬧革命。當師生聽到這個決定時，又一次全場起立，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我們當時不清楚停課決定是由黨中央、毛主席作出的，以為是校黨委、省委工作組的決定報省委批准的。所以認為省委、校黨委的決心都很大，群眾情緒高漲。

六月十三日，即我院停課鬧革命的第二天，報紙上公布了“武漢大學揪出李達、朱劭天、何定華‘三家村’”的新聞。全市轟動，很多單位敲鑼打鼓到武漢大學聲援，熱鬧非凡。學生們都去看大字報，回來後結合我院情況，寫揭批大字報，掀起了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第一個揭批高潮。在學生宿舍區、從學生宿舍到行政大樓的路旁都建了大字報欄，都貼滿了大字報。有看大字報的，有抄大字報的，有外校來看的，人來人往，非常熱鬧。工作組首戰告捷。

## (二) 揭、批高潮

工作組進院後的一周內，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化大革命中揭、批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學術權威的時期。

這是工作組號召這麼做的，大家也相信工作組，師生中沒有分成

兩派，因此相互間沒有什麼爭論。

揭、批的對象從輔導員到總支幹部、院黨委成員，行政上從科長、處長到院級幹部，教師中從講師到教授，當時還真有點革命的氣氛。

政治輔導員不敢到學生中去，基層領導也很少在群眾中露面。有這樣那樣問題的行政各級領導，被揭、批得有點灰溜溜的，抬不起頭。給我的感覺，當時的形勢與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的形勢相似。

從揭、批的內容來看，實質性的內容還不多，都是一些表面現象。對所涉及人員來說，平時與師生接觸較多的基層幹部占多數，核心領導層基本未涉及，大致可以分為這幾個方面：

學生的大字報，一部分涉及政治輔導員的工作作風、思想品德，尤其以工作作風為多。因為學生平時接觸最多的是政治輔導員，思想工作、生活管理等都由政治輔導員經手，輔導員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學生的前途，如鑒定內容、入黨入團、畢業分配等，都由輔導員說了算。學生平時對輔導員是敬而遠之（少數學生幹部除外），但對有些事的處理是不滿的，特別是談話、做思想工作，往往上綱上綫。所以運動一來，輔導員就首當其衝。

一部分大字報內容涉及教育革命或對教師、學校的意見。運動初期，真誠的青年學生認為文化革命就是要搞教育革命，所以在大字報中關於教育革命的內容占了相當比例。對領導的政治問題，多數是問句式的、不肯定的。如：武漢大學有三家村，我院是否有？張如屏、張蕪承、張瑞瑾是不是水院的三家村？等等。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主要領導是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主持學校工作的副書記張蕪承、主管教學科研等業務工作的副院長張瑞瑾、主管學校後勤工作的副院長梁百樸，即水院的“三張一梁”，此時祇有梁百樸遭到大字報公開的揭發、批判。

有人說是黨委領導把梁百樸拋出來當替死鬼的，也有人說他本身就有問題，是被群眾揭發出來的。其中內幕不得而知。

行政部門的大字報主要是揭發幹部在困難時期的多吃多占，當時學校在潛江辦了個農場，他們利用工作方便及職權多吃多占，指名

道姓地點出農產品分給了哪些領導，誰在什麼時間送去的。把幾個老科長揭得灰溜溜的。

在幹部方面，很快把矛頭集中在副院長梁百樸和黨委原宣傳部長、時任黨委辦公室主任的胡緒珍兩個人身上，說梁百樸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胡緒珍是修正主義分子，外號“羊部長”，因他在困難時期養過羊，公然在校園裏牽羊吃草，因此而得了個“羊部長”的稱謂。

梁、胡二人認為是黨委主要領導為保自己把他們當替死鬼拋出來的，因為他們的某些歷史情況是組織部長馮萬秋透露出來的。但主要領導人却不承認有此事（我曾經問過張如屏院長，他說沒有此事）。

梁百樸是一位老同志，土改時任湖北省麻城縣縣長，後任湖北省委書記的姜一當時是縣委書記。梁在當地很有人緣，反映較好。一九七六年，我在總務處任職期間去麻城處理一起車禍，與縣交通局長談起梁百樸時，他很敬重梁。梁百樸曾任湖北省供銷總社副主任，後調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一直擔任黨委委員、行政副院長，主管後勤工作。

梁百樸平易近人，人緣不錯，在學校不是核心領導，對學校的走向沒有什麼影響。批他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主要有兩條理由，一是他的妻子傅尚志同志家庭出身資產階級（時任我院附屬小學校長），梁百樸曾陪傅尚志給其父母上過墳；二是說他喜歡跳舞，文革前特別是困難時期經常舉辦舞會，每場必到，資產階級思想及生活作風嚴重。這些事情現在看似乎不是問題，可在當時就是問題。

梁百樸因此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批判與折磨，心靈受到了創傷。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至十月間就表態支持造反派，得到了造反派的保護，成立院革委會時結合進院革委會任常委。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省委組織部發文任命梁百樸為院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因病逝世，享年 68 歲。

梁百樸逝世時我正被隔離審查，沒有權利參加他的追悼會，沒能最後送他一程，可謂終身遺憾。不管別人怎麼說他，我敬重他。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一九六七年“七二〇”前的一段困難的日子



裏，一起戰鬥過，我們是同一戰壕的戰友。

胡緒珍是我院的一位秀才，黨委宣傳部長，文筆及口才均很好，是搞理論工作及文字工作的材料，曾是張蕪承副書記的得力助手。水院的人都知道，張蕪承副書記有兩個得力助手，或叫左右臂，一文一武，武的是李喜爾（保衛科長），文的就是胡緒珍部長（後來是常樹蔭）。

胡緒珍部長是南下幹部，講究外表，經常是一身筆挺的中山裝（當時沒有人穿西裝），尖頭皮鞋擦得很亮，頭髮上油，梳得光亮光亮的。他很注意保養，個子不高，但顯得有風度，敢講話，作報告時常加進一些自己的觀點。他在困難時期養羊，與眾不同。所以在運動中被上綱上綫，認為他從政治上到生活上都“修”了，被扣上修正主義的帽子。

當時揭、批胡緒珍大字報很多，聲勢不小。被批了一段時間後，胡緒珍“瘋”了，說話顛三倒四，問他什麼都“不知道”，能吃的東西什麼都吃，即使很髒的也吃，什麼地方都坐或躺，有水的地方也這樣，最後連尿和屎都拉在褲子裏。

不少人懷疑他是“裝瘋”，想蒙混過關。在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組織的批判會上，在造反派組織的批判會上，他都和真瘋子一樣，叫人無可奈何，最後也就沒有人去理他了，更談不上關心他。

我一直不相信他瘋了，據我和胡緒珍工作中接觸看，胡是一個心胸開闊的人，這樣的人不會瘋。加上他多次參加政治運動，很有經驗，知道群眾說的是不算數的，最後由組織定案纔算數。

我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說過這個想法，後來反倒勸造反派不要再把胡緒珍抓來批鬥了，讓他在家養着。有時我碰到張越（胡的夫人），問老胡的情況，她總說還那樣，但在張越臉上看不到悲傷和無奈的表情。我就說，你好好照顧他吧，該看病就去看病。

軍宣隊第一任指揮長宋國英在校工作期間，他的“病”有好轉，但沒有全好；樊馬義指揮長來校後，他的“病”好得很快，不僅穿着又整齊了，能自己走路了，還主動找軍宣隊領導談問題，而且記憶很好，在黨委成員的學習會（揭蓋子會）上，胡能系統地發言，揭了不少問題。樊指揮長說，水院黨委祇有一個半好人，其中一個好人就是指胡緒

珍。一九七一年抓“五一六”的時候，軍宣隊對他委以重任，讓他負責水院造反派頭頭丁家顯的學習班。丁是一系學生，文革中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勤務組組長、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委會主任、武漢鋼二司副司令、武漢市革委會常委。

樊馬義指揮長走後，他要求調走，後調到市二輕局任辦公室主任。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讓張越找我，希望我能到他家去，老同志見見面。我去了，他談了自己的工作，談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一些人和事。他希望我經常去玩，不要背包袱，相信組織會實事求是的。中午在他家吃了餃子，我想這大概是他對我在文革中沒有落井下石、有時還關心他的身體情況的回報吧。

不管怎麼說，我和胡緒珍之間沒有個人恩怨，工作配合挺好。他的那些事被說成是修正主義有點過分。再說即使是裝瘋，這麼長時間，做得這麼逼真，那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也很理解和同情他。至于是不是真瘋了，祇有他自己知道。

在轟轟烈烈的揭、批中，有些人被沖暈了，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但黨委及工作組始終是清醒的。一方面號召大家揭批，另一方面組織人關注大字報的內容，將有關人寫的大字報抄下來，準備適當時候反擊用。

在工作組進院前，校黨委要求各總支對所在單位師生員工進行摸底排隊，並說這是省委指示的。所謂摸底排隊，就是劃分左、中、右。

左派是運動的依靠對象，中間派是爭取對象，右派則是打擊對象。對有問題的人，要整材料。平時的言論、行動都要寫入材料中，可以從“四清”運動中“割尾巴”時自己的交代材料中找有用的東西，以便下一步運動需要時用。

在排隊時，要分院重點對象、總支一級的對象。要控制人數，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學生每個班級在3個人左右，則全院在250人左右，大約占學生總數的8%。當時聽說中南局有位領導估計，現在高校中右派的比例在10%左右。以後清查“五一六”時，我院“五一六”分子的比例也在8%左右，這大概不是巧合。

從運動開始，省委負責人講的“現在的形勢是五七年加五八年的形勢”，在黨委掌握的左派中廣泛傳開。所以，在大揭、大批的過程中，黨員骨幹、學生骨幹寫大字報的比較少，他們的精力集中在關注大字報的內容及由誰所寫上面，大概與“五七年加五八年”的形勢估計有關，這是當時的特點。

張荊承副書記在講這句話時沒有發揮，也未解釋。我當時的理解是右派分子將利用文革之機向黨進攻，我們要有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所以要摸底排隊、整材料，以備反擊右派時使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後，第二年開展向党交心運動，人人過關，交待自己的思想活動，特別要說清在右派猖狂進攻時的思想與態度。這樣估計形勢是要告訴左派，要立場堅定，在運動中少說話，多觀察動向，準備反右派。

現在我的理解是，當時黨委主要領導人宣傳“五七年加五八年”，是為了恐嚇少數派：你們不要向黨委提意見，否則五七年就是例子，反黨（我就代表黨）就是右派。其目的是壓制群眾運動，拉一部分人來保自己。

這裏要交待清楚一個問題，即團委是抓學生工作的，那麼在文革初期，團委幹了些什麼？整學生材料以及後來的反擊階段，團委幹了些什麼？

從運動一開始，黨委明確文革運動由黨委——總支——支部這一黨的系統一元化領導，學生工作由政治輔導員直接向總支彙報，由總支布置工作，團委協助黨委瞭解學生動態。這樣團委從運動開始就沒有了具體工作、具體任務，也沒有參與在學生中摸底排隊、整材料的工作。團委的人也從學生點撤了出來。

我想，這是造成團委的幾個人在文革中看問題比較客觀、比較超脫，甚至同情學生，造反派的學生願意找團委幹部談心、爭取團委幹部支持造反派的重要原因。

### （三）反擊

大揭、大批的形勢是工作組進院後形成的，來勢猛，矛頭指向幹

部、教師、領導層，這就引起了校黨委一班人的疑慮：工作組組長李鳳翔是不是說一套，做一套？矛頭是不是對着黨委來的？

通過李喜爾與李鳳翔交談，發現李鳳翔沒有對着黨委的意思，而是要通過大揭、大批，弄清楚右派的動向，便于今後更有目標地進行工作。這樣，張菑承副書記他們就放心了。

但此時左派感到壓力很大，有些頂不住了，要求領導表態，有個別的左派學生思想開始動搖了。於是黨委加強了對左派的思想教育和控制，在左派會議上，強調目前的形勢是“五七年加五八年”；強調工作組是在院黨委領導下工作的；強調四個緊跟，即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緊跟省委、緊跟院黨委。有一個基層領導回去後又加上了兩個緊跟：緊跟黨總支、緊跟黨支部，變成了六個緊跟。強調王任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中央文革的副組長，王任重沒有問題，省委也沒有問題，我院是緊跟省委的，所以院黨委也沒有問題。現在聽起來，這種形而上學的邏輯多麼可笑荒唐，但當時的左派却把它當成了聖旨、緊箍咒。

### 1. “六一八”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晚上，一系（農田水利工程系）總支書記許志方（一九八四年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院長）召開系範圍內的左派骨幹會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封到會者為左派，要求大家相信省委、相信院黨委，要大家注意動向，要“頂得住”。

參加這次會議的六三四四班核心小組副組長郭明正（團支部書記）認為這個會有問題。他想，運動剛開始，怎麼就封了一批左派？這和毛主席講的精神不一樣；第二，運動剛開始，怎麼就知道省委、校黨委沒有問題呢？所以有同學問他開會內容，他就將會議內容泄露了。六三四二班的董建平等十幾個同學當即寫了一張大字報《一個大陰謀》，披露了“六一三”會議的內容，在學生中引起了轟動。上千人在學生八舍前集會，要求一系總支書記許志方到會說明情況。過了一會兒，有人出來說：“郭明正造謠，根本沒有這件事，郭明正興風作浪，破壞運動，有意製造混亂。”要求把郭明正揪出來。



局面頓時混亂起來，兩邊各執一詞，相持不下。最後系工作組長出面，說此事由工作組進行調查，會給大家一個交待，混亂局面纔得以平息。這是水院文革史上的第一次群眾性的自發集會。

上述事件後不久，在電力系（三系）宿舍（一舍）門口也發生了一起震動學生的事件。三系又發生了一次群眾性的集會，六一級學生李廣文站在一舍大門的兩陽棚上告訴參加集會的同學們，各班的核心小組（這是運動開始成立的領導運動的組織）成員在抄大字報，準備“秋後算賬”。這時在一舍門口聚集了很多學生，院學生會主席祁萬恒（黨員）也站到兩陽棚上對大家說，根本沒有這回事，李廣文這是造謠。這時電力系的另一個學生蔣繼清（六四級）正從食堂提着一壺開水回宿舍，走到一舍大門時聽到祁萬恒的話，就說李廣文沒有造謠，真有這回事。在大家的鼓動下，蔣繼清也站到兩陽棚上，告訴大家：他在看大字報時，兩個其他系的學生幹部在邊抄大字報邊議論，說要反右了，×××大字報的內容已經夠上右派條件了。這一次集會的結果，最後把矛頭直接轉向了院黨委。

水院的形勢開始緊張起來，同學中的情緒開始升溫。前段時間積極寫揭批大字報的同學，感到上當受騙了，產生了對黨委領導、工作組領導的怨恨情緒。而院黨委與工作組則認為右派進攻開始了，要找出幕後指使者，也加緊了活動。

六月十七日上午，黨委副書記張荋承、工作組組長李鳳翔共同到省委彙報運動情況，聽取彙報的是省委書記處書記許道琦。許聽完彙報後指示：形勢很好，但有逆流，對個別人適當時候可以反擊一下。

六月十七日下午，張荋承副書記召集總支書記及有關人員開會（我也參加了），說了到省委彙報情況及許書記的指示，準備安排反擊，壓一下右派的反動氣焰。他要求大家理直氣壯地到群眾中去，瞭解情況，做思想工作，特別是做中間派的工作。強調輔導員要勇敢地到學生中間去，掌握學生動向，爭取群眾，孤立右派。他還明確了反擊的對象，一系任郭明正，二系徐海亮、晏成禹，三系李廣文、劉靜生，這五人都是學生。

這裏要講一下二系所謂“徐一晏反黨集團”的產生過程。徐海亮是二系(水建系)六二二一班的學生(現為教授,文革史研究學者),從高中時代起,與同學陳德春(陳毅元帥的侄子)對現行教育體制有看法,經常討論一些政治問題。上大學後,陳在北京,徐在武漢,經常有書信來往,探討反修和國內形勢方面的問題,商議上書中央和毛主席。學校知道後,上綱為他們要搞“亮一春共和國”,說徐海亮要當“總理”,所以徐海亮早就成了在黨委掛了號的人物。工作組李組長傳達了毛主席關於教育革命的指示後。徐很受鼓舞,認為毛主席的指示說出了自己的心裏話,所以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六月十四日在二系黨總支副書記寇宜春召集的六一、六二年級部分學生的會議上,寇書記說自己有點怕。徐問他怕什麼,接着同學們都問:“你怕什麼?是不是怕群眾?”寇書記認為“徐海亮終於跳出來了”。六月十六日熄燈前,徐在洗臉室門口碰到六二〇一班的晏成禹和六二〇二班的陳應科,他們對輔導員、班幹部按兵不動感到奇怪,認為運動要向前推進。六月十七日中飯前,二系三年級學生在二系宿舍(七舍)前聚集,熱烈議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晏成禹站在臺階上呼籲:運動不能冷冷清清,要推動,火力要猛、要集中。徐海亮此時由五教學樓過來,正巧碰到學生聚會,當有人說到校廣播台有問題時,有領導講風涼話,徐說這個人是楊文忠(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就這些事,通過拼湊,就成為有意破壞文革的“徐一晏反黨集團”。

反擊的對象各系都有,方法是由福利科、機械廠組織工人寫大字報,讓工人說話。大字報要在十八日天亮前張貼在各處大字報欄,8點以後,校廣播台要反復播送工人大字報,然後各系組織揭、批會,發動群眾批鬥那幾個重點人物。

這次會上張芴承副書記明確講,這次反擊不是抓右派,抓右派的時機還未到,這祇是壓一下右派的反動氣焰。張芴承副書記對福利科長張瑞禎說,食堂工人文化低,你們科裏要幫助他們,題目要醒目些,如“工人說話了”、“我們有話說”等可作為標題。

張科長是一個“三八”式的老革命,工作勤勤懇懇,對領導總是畢

恭畢敬。後來我到總務處工作，他對我這個年輕領導也是這樣，所以我一直很敬重他。

他領受任務後，和科裏幾個屬下到學生食堂，一夜未眠，寫、抄、貼大字報，十八日凌晨，在學生宿舍前、學生食堂、行政大樓大字報欄到處都張貼了《我們有話說》、《工人說話了》等大字報，學生宿舍附近出現了帶紅袖章的巡邏人員。不到 8 點，院廣播台開始播工人大字報。

各系領導、政治輔導員等都到學生宿舍，不用說，李喜爾的保衛科也忙碌得很，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早飯過後，有的以年級為單位，有的以系為單位，對“造謠生事”、“破壞文革運動”的郭明正、徐海亮、劉靜生、晏成禹、李廣文等進行調查、揭發、批判，下午以班為單位進行討論，有問題的就檢查自己。前段時間貼了輔導員大字報的、貼了領導大字報的、“說了錯話”的學生紛紛檢討，有的當即去撕掉自己的大字報，有的在合寫的大字報上塗掉自己的名字，還有寫血書、大哭表示悔恨的，不一而足。緊接着就一批“四個緊跟”、“四個保衛”的大標語及大字報貼滿校園。

六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一夜之間兩重天，這就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自文革開始後有組織的第一次反擊，亦稱“六一八”事件。

## 2. “七一五”反右

“六一八”反擊後，表面平靜了，大字報少了，特別是揭、批領導的大字報幾乎絕迹了。但實際上陣營分明了，鬥爭更加尖銳了。黨委、工作組組織各總支進一步摸底排隊、整材料，切實準備反右派鬥爭。

學生雖然沒有公開分裂為兩派，但經過“六一八”反擊後，所謂左派和有問題的人之間陣綫清楚了，大多數中間群眾表面上站在左派一邊，又偷偷地同情所謂有問題的同學，而那些被批判的同學以及同情他們的同學，則私底下的議論更深入、更頻繁，這部分同學就是以後公開站出來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作鬥爭的少數派。

與此同時，一系的任乾健（任弼時的堂侄子）、陳寧二位同學，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跑到北京告狀去了。他們想找王任重告狀，

告省委、告院黨委的狀，希望這位毛主席的好學生、中央文革的副組長能為民做主。他們當時不會知道，省委、黨委所做的一切正是王任重指使的。任乾健、陳寧被從北京送回學校來并受到控制。他們的告狀引起了王任重對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重視，把水院作為一個左派與右派爭奪領導權的典型。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王任重給湖北省委寫了一封信，信中認為武漢大中學校的運動處于三種情況：“1.像武大，左派隊伍初步形成，右派面目已被群眾識破，開始向右派大批判。這種單位中學也有，但不多。2.水利電力學院，正處于大暴露階段，左右派正在爭奪領導權，中間派在搖擺，左派領導尚未形成，右派還沒有孤立。目前這種單位占多數。3.前幾天的農學院，少數右派掛帥，轉移鬥爭目標，企圖把運動搞亂。有的中學也有這種情況，但不多了，也不難解決。”

王任重認為：“多數學校像水利電力學院類型，左右派正在爭奪領導權。目前着重研究解決這一類型單位，暴露牛鬼蛇神，徹底鬥倒鬥臭右派分子。”“首先打擊最猖狂最兇惡的敵人……有的是幹部、教師或大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來。水院可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

這就是有名的王任重“七三”指示，成為湖北省委指導文革運動的方針。後來張體學省長公開宣示省長不當去當右派的“勞改隊長”，加上王任重書記在“七三”指示中提出的“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他們認為足以震懾群眾不敢亂說亂動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湖北省委副秘書長劉真奉命組建工作隊進駐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領導運動。顯然，水院的運動升級了，受到了省委的格外重視。

根據王任重的指示，水院屬于要着重研究和解決的單位，所以工作組升格為工作隊。工作隊成立黨委，領導水院的運動。工作組是在學院黨委領導下工作，工作隊黨委是領導，學院黨委就不起作用了。

張如屏、張芾承為工作隊黨委成員，劉真任黨委書記。劉真說：



“我是帶着反右的任務來的。”至于哪些人是右派，批鬥哪些人，如何控制這些人，黨委、保衛科早已有計劃，祇要劉真批准即可實施。七月十四日，黨委召開左派秘密會議，正式布置反右派，布置學生連夜趕寫批判大字報和標語。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反右派運動正式開始。在工作隊黨委的號召與組織下，全院掀起了揭發、批判、鬥爭右派分子的運動，當天就貼出了大批指名道姓的右派分子的材料，有的雖沒有戴右派帽子，但人們一看大字報內容就知道這些人在劫難逃了。

郭明正、徐海亮、任乾健、劉靜生、晏成禹、李廣文等人當然是首當其衝，留蘇回國的張庭英老師、物理老師羅守琳成為教師中的重點人物，從生活到思想都被“揭發批判”。被點名的學生、教師、幹部都在本單位接受批判，而且還要交待“罪行”。

學校的重點人物主要是跳得高的學生，郭明正因泄露左派會議內容成為破壞文革的罪人，任乾健因到北京告狀成為重點，他們被打成“任郭反黨集團”。徐海亮本來就“有問題”，文革中又跳出來挑動群眾、破壞文革，自然就成了重點，批判他的大字報居然由政治教研室支部書記起草，指定學生抄寫、貼出。這些人自“七一五”後都被控制和看守起來，到哪里都有人跟着，他們失去了自由。實際上每個班裏都有幾個人被控制起來。這些人都是準備打成右派的，即學校排隊時已被劃為“右”的那些學生，如三系六四七二班，僅七月十五日當天就有蔣繼清、劉紹姜、王洪傑三人失去了自由，七月十七日，又增加了李啟鑫，該班共有4人被控制，失去了自由。

### 3. “七一七”逮捕郭明正

反右開始後，為了進一步造成對敵鬥爭的氣氛，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工作隊黨委召開全院師生員工大會，由湖北省公安廳公開逮捕郭明正，宣布郭明正是“持刀行兇”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法辦。

一個接一個的白色恐怖行動，的確造成了水院最高級別的恐怖氣氛。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陰影的籠罩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

力下，被點名批判的人有的精神崩潰了。

張庭英老師割腕自殺身亡，羅守琳老師跳江自盡，有個學生被說成“精神分裂”，關到了武漢精神病醫院。張、羅兩位中青年教師，才華橫溢，本可以為人民作出巨大的貢獻，却因為頂不住這樣的恐怖氣氛離我們而去了。令人不解的是，造成他們死亡的人因為後來不是造反派而沒有受到追究。兩位老師會死不瞑目的，而設計這種連環白色恐怖的人，即殘害了無辜生命的人，如果他的良心還在的話，會終身不得安寧。

郭明正“持刀行兇”案，不僅是一樁冤案，而且是某些人一手導演的誣陷案。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郭明正是農田水利專業三年級學生，出身貧農家庭，從入學到被捕前，連任三年的班團支部書記。文革初期，被總支任命為班核心小組副組長（班上有個黨員，擔任組長）參加“六一三”左派會議。他認為左派要在鬥爭中形成，怎麼能在運動剛開始時就把一部分人封為左派呢？雖然他自己也被封為左派，但他對這種做法仍然想不通，便把自己的想法對同學說了。他還寫了一份大字報《什麼是革命左派》，闡明自己的觀點。別班同學揭了“六一三”左派會的內幕，郭明正就成了會議泄密者，被認為是他引起了上千人的集會，造成同學的思想混亂與同學間的矛盾。領導對此非常不滿，郭明正就由左派變成了右派。他雖然遭受批判、鬥爭、控制，但有些人仍不解恨，還要置他于死地。

在搜索集郭明正材料時，有人發現了可利用的材料。經過是這樣的：七月四日下午，郭明正與同班同學董紀明、張耀先、王景貽、吳明榮一起游泳回來後到食堂用餐，發現他們用餐的飯桌上有一把菜刀（是廚工用後忘了拿走的），董紀明先拿起來玩了一下，接着郭明正也拿起來玩了一下。張耀先在旁邊，王、吳二同學也在旁邊，然後董紀明說，不玩了，碰着人不好，就把菜刀送到工人師傅的房裏去了。接着大家用餐，誰也沒當回事，本來也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可過了十幾天，保衛科整理的材料是這樣寫的：“郭明正伸手拿起了那把刀，在桌子上拍了兩下，流露出殺人的凶相，惡狠狠地叫道：我殺了你（指張

耀先)。刀在脖子邊(幾乎碰到了)就要砍下去。張耀先毫無懼色,當時在場同學極為憤慨,張怒視并冷笑,并準備拼個你死我活,郭纔未敢下毒手。”

張耀先後來對同學說:“我本來沒有意識到郭明正想殺我,是領導幫助我用階級鬥爭觀點分析,提高了覺悟,纔逐步認識到的。”事情經過非常清楚,根本不存在所謂“持刀行兇”,“持刀行兇”一說是編出來的,然後誘導當事人認可(提高階級鬥爭覺悟後纔“想”起來的)。除當事人外,還有董紀明等三個證人,可他們祇要當事人,不要證人,這就是省公安廳的辦案風格,也是院保衛科的辦事風格。

水院的老人都知道,水院有一支“神來之筆”,它可以無中生有,它可以移花接木,它可以捕風捉影,它也可以顛倒黑白。它說有就有,即使沒有也有;它說黑就是黑,即使紅的在這支筆下也會變成黑的。這支“神來之筆”在水院屹立幾十年,整倒了很多,也殘害了很多。不信,你可以查一下,經這支筆寫出的案情,有多少是實事求是的?

郭明正案即為一例,我自己也領教深刻。當然,即使是“神筆”也是有人操縱的。按主子的意思去描繪纔能達到主子的要求,纔能“不褪顏色、永駐青春”。但我以為不要去怪“神筆”,他也是被人利用的。然而,終究是出賣良心的奴才,人格、筆格之類是沒有的,自然也就沒有了靈魂。

#### (四) 工作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湖北省委工作隊領導下,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反右派鬥爭,造成嚴重的白色恐怖,有的學生和老師被批鬥,有的被捕入獄,有的被送進精神病院,有的自殺。

此時毛主席在何處?在想什麼?此時的毛主席在武漢,就住在東湖客舍,就在水院對面幾百米遠的地方,中間就隔着東湖一角。毛主席要是看到了這個情景會怎麼想呢?他顯然不知道發生在幾百米之外的事情,一手遮天的王任重騙了他老人家。

七月十八日，即郭明正被抓的第二天，毛主席回到了北京，聽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彙報，也聽了中央有關人員的彙報。他對中央負責人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祇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綫，為人民服務，實際却是走資產階級路綫，為資產階級服務。”“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工作組阻礙革命，必然成為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綫的錯誤。”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兩天中毛主席接連找中央文革成員、中央領導人和各大區第一書記談話，談到工作組問題時，毛主席說：“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的。阻礙革命勢力，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他坐山觀虎鬥，學生跟學生鬥，擁護工作組的一派，反對工作組的一派。群眾對工作組意見不讓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電話，打不得電報，寫信也寫不得……”“我們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總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頭上來。”[《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24頁]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決定》。

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及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宣布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

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講了話，“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的名言就是在這次會上講的。

會後，將會議的錄音分發到各省、市播放，我院是在電影場聽的錄音。至此，工作組也就壽終正寢了。由它發動的“反右派”鬥爭初戰告捷，還沒有來得及向縱深發展，就夭折了。這給了湖北省委、學院黨委、工作隊狠狠的當頭一棍。

七月二十九日開始，水院停止了反右派鬥爭，停止了對“右派”的監視，撤銷了對重點對象的控制。

工作隊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善後，一是準備作個檢討，二是組織選



舉文化革命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必須是他們確認的左派，院黨委不起領導作用了，省委工作隊要走了，但權必須掌握在他們信得過的人的手裏。這也是湖北省委的意思，工作隊組建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任務是壓倒一切的。

武漢高校與北京高校的文革運動在工作組問題上有差異，北京是在北京舊市委垮臺、很多高校的領導成了“黑幫”以後，由中央決定，新市委出面派出工作組，目的是要控制領導權，維持他們想要的那種秩序，把運動控制在可控的範圍內，定了許多條條框框。當群眾運動突破了他們的條條框框，他們就認為是要篡奪領導權，是破壞文化革命。於是他們組織反干擾（如北京大學等）、抓反革命（如清華大學等），形成了群眾與工作組的對立與鬥爭，所以在北京，抗拒工作組進駐、趕工作組出門的事到處發生。當市委宣布撤出工作組後，群眾又不讓他們走，要他們交待問題，對他們執行的資反路線進行批判。

而在武漢，在我院，工作隊由省委統一派出，他們進校後與原領導班子結合在一起，目的是來反右派的，但表面上却裝出是來推進文化革命運動的。所以工作隊初期受到廣大師生的歡迎與信任，主動向他們反映情況，有問題找工作隊，把工作隊看成是依靠。但從反擊右派開始，有些人對工作隊有看法了，有人要到北京去告工作隊的狀。隨着反右派深入，發展到抓人、整死人的時候，對工作隊不信任的人增加了，不少人終於看清楚了，工作隊與黨委是一夥的，但對工作隊撤與不撤抱無所謂的態度，既不趕也不留，很平靜。工作隊進院有效時間約 50 天（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這 50 天裏，工作隊與院黨委一起，主要工作是抓師生員工中的右派，從摸底排隊，發動揭、批以引蛇出洞，直到全面反右，其結果在水院整死 2 人，抓 1 人，院重點批鬥 4 人，各系、各部門點名批判一百多人。更為嚴重的是，在廣大師生中造成了派別差異，工作隊封了一批左派、鬥了一批右派，這為在以後的運動中形成派系鬥爭、特別是革與保的鬥爭播下了罪惡的種子。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沒有具體的任務，又能參加一些重要會

議，處于一種觀察者的地位。我來院工作一年多，主要是做學生工作，對學校工作、對領導不十分瞭解，所以很少講話，更不出頭露面。對抓學生中的右派，我有思想準備（我也有一九五七年的經驗，加上對文化大革命并不理解），但對工作隊所整的具體人的一些材料總感到牽強附會，特別是對郭明正，他是團幹部，我的確懷疑材料的真實性，又不能干預，更不能表態。另外，我認為右派應該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任乾健跑到北京反映情況，怎麼能說是右派呢？這一切，讓我無法積極投入運動，因而顯得沉悶。

與此同時，各種思想傾向的學生都來找團委同志交流與溝通，使院團委顯得與別的部門有所不同。由此產生的後果是，領導對我的信任度下降，有些會議不叫我參加了，我也就逐步被邊緣化。

## 二、文化革命委員會

### （一）成立院文化革命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接見中央文革成員，在談到工作組時，毛主席說：“主要是改變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不那麼革命的人也參加一部分。誰是壞人？壞到什麼程度？如何革命？祇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得。他們到了那裏，不搞革命。”[《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23頁]。毛主席的講話成為湖北省委工作隊撤走後，把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交給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根據。

在決定撤走工作隊後，黨委與工作隊全力以赴組織選舉產生水院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為了體現大民主的精神，在選舉之前進行了大辯論。主要是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前階段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有沒有問題，二是關於候選人的推薦與辯論。

關於前者，八月十六日趙紫陽傳達陶鑄指示說：“華東、中南地區……，各省是否犯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看是否實行反擊，如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那就是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反之就不是。”（《東湖

風雲錄》第44頁)。據此,湖北高校,特別是水院這樣的重點院校,不僅反擊了,還抓了右派、抓了人、死了人,怎麼能說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呢?可湖北省委及學院黨委、工作隊黨委認為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左派也隨之跟進,堅持說大方向正確。

在辯論過程中,農水系的丁家顯、韓同良、韓玉琢三位同學以三個貧農的兒子的名義給水院工作隊隊長劉真寫了一封公開信,悲壯陳詞,申明青年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是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參加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參加反修防修,奪走資派的權,何罪之有?而工作隊黨委的反右鬥爭把矛頭對準了青年學生,大大打擊了熱心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學生的積極性。

他們三人在水院成立了第一個戰鬥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戰鬥隊,在衝擊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中,始終成為水院的排頭兵。在當時,丁家顯等同學的觀點是少數,多數人是以學生幹部為主的所謂左派及其影響下的中間群眾,他們的觀點則是工作隊成績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關於文化革命委員會人選問題,自然是左派學生為主,名單是由工作隊黨委確定的,在幹部人選問題上,曾經在我和李喜爾之間有過爭論。

一批北京來的同學,用幾十張大字報介紹我的情況,推薦我為文化革命委員會成員,附和者也不少。事先我不知道,大字報出來後,我找陸和寶(後任山東黃台電廠廠長,現已退休)和駱應龍(後任徐州電力局黨委書記、局長,現已退休),要他們把大字報撤下來,因為我知道工作隊黨委定的是李喜爾,怕領導上誤會,以為我想取而代之,在背後搞小動作。

一天以後,一大批推薦和擁護李喜爾的大字報貼出來了,並有些不同意我作候選人的大字報,認為我來院不久,對學校情況不熟悉,前段運動中表現一般,不夠積極主動等等,一看就知道寫這批大字報是有組織的行動。

最後選舉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失敗了,李喜爾勝利了。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化革命委員會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成立了。主任委員祁萬恒，共產黨員，三系（電力系）學生，院學生會主席；副主任委員李貞儒，共產黨員，湖北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一系（農水系）學生；薛傳殿，共產黨員，二系（水建系）學生，系學生會主席。

這三位學生我都熟悉，文革前各方面表現都很出色，畢業後都擔負了重要的領導工作。薛傳殿曾任西北電力局副局長；李貞儒曾任水院黨委組織部長、副書記，後調海南大學任校長，在任上因故自殺；祁萬恒聽說也在某單位任領導職務，因無聯繫，情況不詳。

## （二）破“四舊”

破“四舊”是院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後領導的第一件事情。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群眾大會，也就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

會上林彪講話，號召“要打破一切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簡稱“破四舊”。

北京的紅衛兵響應號召，立即行動，掀起了一場震驚中外的破四舊運動。凡帶有封建色彩的名字都改掉，店鋪、道路改名的也很多，你不改，紅衛兵就去砸；廟宇及菩薩也不能幸免，被砸、被毀的不少，殃及很多古迹文物；大街上看到所謂的奇裝異服、長頭髮，就要強行剪掉，有的被剃陰陽頭（即一半剃掉、一半留着）；對所謂學術權威、曾任過國民黨高官者、滿清遺老以及地、富、反、壞、右的家庭進行抄家，沒收封、資、修的物品如金銀財寶、字畫。

總之，搞得這些人家提心吊膽、人人自危，呈現了一片打、砸、搶的景象。後來我聽我的老同學張一純說，張治中將軍為避免抄家時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竟把他的舊軍裝、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相關的合影、字畫、書信，以及他到北京時帶在身上的一些物件統統燒掉、處理掉，以致後來出版他的回憶錄時這些資料未能載入，實屬可惜。

破四舊的風由北京吹到武漢，省、市委也行動起來，改路名、改店



名之風盛行。學生中改名字之風更盛，如有一學生把“壽眉”二字改為“解放”，有個同學把名字改為“衛東”，這就符合時代要求了；還有一學生為了體現參加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與資產階級鬥爭到底的決心，改名為“怕啥”，他姓曾，就叫曾怕啥，在學校此名字一直很有名，很響亮。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我院紅衛兵在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對院內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進行了大規模的抄家活動，這時出面抄家的紅衛兵是官辦的，由院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這批最早的紅衛兵後來被稱為“三字兵”，屬於保守派，不是後來造反派的紅衛兵。

因此，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打砸搶是前期的“三字兵”所為，而非造反派所為。這一點，不少人被蒙騙了！一些文人墨客，所謂的文革研究者，一提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打砸搶，就把污水潑到造反派頭上，說造反派搞打砸搶。事實上那時根本沒有形成造反派，武漢地區（包括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是這樣，北京地區也是這樣，全國也都一樣。

學校抄家三天，抄到的東西着實不少，有金銀財寶、書籍、字畫、生活用品，如郭暄教授從美國帶回來的電熱毯，當時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祇知道是通電被子，一通電，被子熱了，那時沒有暖氣、沒有空調，這被子是很奇特的。還有張如屏院長的老戰友送給他的一支獵槍，被認為是做官當老爺、變修的證據。

抄來的物品，堆放在行政樓三樓會議室中，組織大家參觀。一方面讓大家受教育，另一方面展示破四舊的成果。這種情況，我在一九五〇年見過，那是土改時期農民協會抄地主家的浮財。

抄來的東西，後來是怎麼處理的不得而知。據反映，金銀細軟都沒有退回原主，張院長的獵槍也未退回，找了好久也未找到。因為這支獵槍是他的一個戰友送給他的，他很珍視這支槍，直到老院長離世也沒有找到。

總之，這些東西找不到了。物質不滅，總有人拿走了，但因為這

不是造反派幹的，所以也就無需追查，更不必立案。連死了人都可以不追查，何論物品。

這裏要澄清一個問題，關於紅衛兵運動的問題。

現在有些人把紅衛兵運動中曾經出現的打、砸、搶、抄、抓、武鬥等等一系列罪名統統扣到造反派頭上，這是某些人的蓄意所為，為的是醜化造反派，達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文革初期在北京一些中學出現了紅衛兵組織，如北京 101 中學、清華附中、北師大附中等學校，這些紅衛兵的組織者、領導者多是高幹子弟，他們講究家庭出身，提出了“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的概念，提倡血統論，北京工業大學譚力夫極力鼓吹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就是這種血統論的典型論調。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師生時，北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宋任窮女兒）向毛主席獻紅衛兵袖章，從此老紅衛兵聲稱毛主席是他們的紅司令。此後北京掀起了“破四舊”的熱潮，普遍發生抄家、侮辱人格、打人、抓人、關牛棚、批鬥、戴高帽子游街等情況，他們的手段是極其殘忍的，所謂“黑五類”人員及其子女，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致殘，有的被強制遣送回原籍。進而發展到批鬥學校領導、老師、工作組成員，有的被害致死，有的戴高帽子游街，開批鬥會更是普遍的現象。

這股風很快吹遍全國，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各地在當地領導機關的組織與支持下，在學校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也進行“破四舊”活動，也搞打、砸、搶、抄、抓。就武漢市及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來講，這些都做了，但沒有北京激烈。

這個時期還沒有出現造反派組織，把文革運動初期發生的一些問題，說成是造反派的“罪惡行徑”，要麼是無知的張冠李戴，要麼就是無耻的蓄意誣陷。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是“官辦”性質，也叫官辦紅衛兵，他們是保省

委、保黨委、保工作隊的保守組織。在北京，有些人走到了極端的地步，如北京的東、西城糾察隊，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主要成員是高幹子女。他們橫行霸道，置黨紀國法于不顧，對看不順眼的人，想抓就抓，想打就打，搞得人心惶惶，最後被公安機關取締，骨幹分子被抓捕。這批人執行的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形左而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用心極其險惡。

二〇一三年底、二〇一四年初，北京上演了兩場鬧劇，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炒得沸沸揚揚。這兩場鬧劇的主角，一是陳小魯（陳毅之子），二是宋彬彬（宋任窮之女），他們是文革初期在北京搞打、砸、搶、抄、抓的那幫人中的代表人物。陳小魯是北京西城糾察隊的頭頭之一，宋彬彬不僅在北京搞“打擊一大片”，還受王任重的指使帶了一批人到湖北武漢狠抓“南下一小撮”（指從北京到武漢串聯、主張“炮轟湖北省委”的學生，湖北省委主要領導稱他們為“南下一小撮”），保湖北省委，破壞湖北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武漢人對此記憶猶新。陳、宋二人對在文革中被他們批鬥而致殘、致死的校領導、老師道歉，有錯認錯，這本是無可厚非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同歷史階段，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人多得很，人們認識了錯誤，向被害人賠禮道歉，我也做過，別人也向我道過歉，這種例子在我們學校很多。為什麼說陳、宋二人的道歉是鬧劇呢？因為他們的道歉是沒有誠意的，不實事求是的。陳、宋等人在文革初期的行為與“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文革宗旨背道而馳，他們的行為是破壞文化大革命，怎麼能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呢？無論按五一六通知精神或按公安六條規定，都應受法律的制裁。他們搞打、砸、搶、抄、抓，視人命如草芥，禍害社會，殃及全國，後果十分嚴重。五一六通知不允許他們這麼幹，那麼到底是誰讓他們幹的？一批中學生有這麼大的膽子，這麼大的能量？沒有後臺誰能信？宋彬彬到武漢來，擺出一副北京來的大人物架式，到處指手劃腳，省委及各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革初期的官辦組織）待為上賓，是因為她是奉王任

重的旨意南下的，沒有王任重這個後臺，宋在武漢也就寸步難行了。因此，我認為，陳、宋要認罪，必須講清楚，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所在，他們殘害的絕不止學校的幾位老師和領導，他們應當揭露真相，讓人民群眾在四十八年後的今天，看到文革初期他們破壞運動，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歷史真相！這不是一句空洞的道歉，還冠以“反思文革”的詞句就能解決的。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想從陳、宋鬧劇中進一步抹黑文革的圖謀也不會得逞。

以陳小魯、宋彬彬為代表的一部分幹部子弟，文革初期在北京施行的暴行，破壞性很大，影響面甚廣，就是“五十天”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典型表現。這些人中的骨幹分子，本應該在文革結束後受到清算，承擔法律責任。然而因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人都受到了保護，不少人進了各級領導班子，有些人發了大財。為什麼會這樣，也到了該還歷史真相的時候了！不能再讓這些人繼續招搖撞騙了！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官辦紅衛兵，是學院“破四舊”及對“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進行打、砸、搶、批、鬥的急先鋒。在革命群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過程中，他們改頭換面，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武漢各高校在省委組織下，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成立了武漢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後稱一司）。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被衝垮後，保守派的紅衛兵瓦解了，武漢一司也垮了，絕大多數成員轉向造反派，參加由造反派組織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極少數堅持原來立場的人，在學校無法立足，遂與工廠的保守組織——職工聯合會結合，參與他們的活動，一直發展到參加百萬雄師。“七二〇”事件後，他們怕被抓、被打，有一段時間就躲到農村去了。

武漢地區高等學校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份出現造反的組織——名稱各異、不相統屬的戰鬥隊，十月份各校成立造反派聯合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十月二十六日成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開始領導廣大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進攻，矛頭直指湖北省委，主要是王任重。各校的鬥爭矛頭指向工作隊及校黨委的主要領導，從來沒有把鬥爭的矛頭指向群眾。按中央五一六通知



精神辦事，不會也不可能發生打、砸、搶、抄、抓的違法違紀行動。就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來說，造反派從來沒有抓過人、關過誰牛棚，更不存在打、砸、搶、抄的事情，這是經得起調查的。

由此可見，不能籠統地說所有紅衛兵都是打、砸、搶、抄、抓分子。兩大派紅衛兵組織是有本質區別的，他們的目標不一樣，鬥爭矛頭不一樣，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不一樣，對待群眾的態度不一樣，對犯有錯誤的幹部的態度也不一樣。保守派的紅衛兵組織是按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辦事，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他們支持、保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保不住的時候，就破壞文化大革命，大搞無政府主義，對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擾亂社會秩序。造反派的紅衛兵組織反其道而行之，聽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揮，依靠群眾，把鬥爭矛頭牢牢地指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而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而今，一些仇視毛澤東思想、仇視文化大革命、仇視造反派的人，企圖把水攪渾，把保守派紅衛兵的錯誤強加到當時還不存在的造反派頭上，這祇能欺騙那些沒有經歷過文革時代的年青人，一旦把他們的詭計戳穿，這些人的醜惡嘴臉就大白于天下。

### (三) 抓“南下一小撮”

文化大革命進入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各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均已成立，在省委領導下，開展了破四舊運動，水院也一樣。

九月上旬，水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研究如何批判工作隊的錯誤，要把工作隊的負責人叫回來作檢查和接受批判。到底是讓李鳳翔回來，還是讓劉真回來，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按當時的情況，李鳳翔似乎傾向於少數派，而劉真當時是緊跟省委的，站在多數派一邊。經請示省裏，回復是要回去兩人都回去，要不回兩人都回。

事情還沒有解決，武漢發生了一件未曾預料到的事情，即北京學生南下串聯到了武漢，掀起一股批判湖北省委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

浪潮。

于是省委領着各校的多數派，同南下學生進行鬥爭，驅趕這些前來“點火”的學生，掀起了一股大抓“南下一小撮”的熱潮。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完全打亂了省委和各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計劃步驟。

在南下的北京學生中，以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趙桂林為首的一批人，是來煽風點火的（當時叫煽文革之風、點革命之火），矛頭直指湖北省委，認為湖北省委在文革中壓制不同意見，鎮壓群眾運動，把不同觀點的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把武漢的文化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綫錯誤。他們要求省委公開檢討，號召武漢地區的學生起來造反，這就觸怒了省委，于是決定反擊，把這些人稱為“南下一小撮”。

趙桂林等人來後不久，有一批北京的中學紅衛兵也到了武漢，領頭的是宋要武。她在北京是很有名的，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見紅衛兵時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主席詼諧地說了一聲“要武嘛”，于是宋彬彬被稱為“宋要武”。他們是王任重請來的，是來保省委的。

省委和各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對這兩批人的態度是絕然相反的，拒絕接待前者，對後者則熱情接待。前者祇能在各校少數派中活動，他們在湖北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設立了聯絡站，以後北航、清華都有學生到來，成立了“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成為武漢各校少數派的後盾，也是少數派的資訊中心。

湖北省委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把抓“南下一小撮”作為中心任務，從九月一日起，連續召開省委常委會、常委擴大會，研究形勢和對策，不斷請示王任重，指示湖北大學搞“呼籲書”，稱北京來的“一小撮”是一股“逆流”，說這些人在北京呆不下去了，跑到武漢來搗亂，把水攪渾，企圖渾水摸魚，破壞湖北、武漢的文化大革命。省委號召人們行動起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堅決支持湖北省委的正確路綫。

接着，武漢市以群眾名義發出了“緊急呼籲信”，內容與湖北大學

的“呼籲書”大同小異。每天晚上在省委門口組織多數派紅衛兵與“南下一小撮”和支持他們的武漢少數派學生辯論，唱《湖北省委好》的歌，跳《湖北省委好》的舞。

我到湖北省委門口看過一次辯論會，說是辯論會，實際上是圍攻南下學生，以多壓少，北京學生講話時，多數人起哄。

我們學校在抓“南下一小撮”的過程中，除了派部分師生參加辯論外，有兩件事當時很有影響。一是湧現出了所謂“省長的好兒女”，學校有幾個學生提出“保衛好省長張體學”，據說張體學以後接見了他們，少數派嘲笑他們是“張省長的好兒女”。另一件事是我院學生周宏（周小舟的兒子，是“張省長的好兒女”之一），有一個關於保衛湖北省委的演講，在武漢三鎮播放，影響很大。

在抓“南下一小撮”過程中，九月十二日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造反派稱之為“大專兵”）在武漢大學成立，湖北省委、武漢軍區領導仿效中央領導人乘三十輛敞篷吉普檢閱，以震懾、威嚇南下學生。

王任重指示湖北省委要查清南下學生的名字，以便運動後期處理。張體學聲言，這些人運動後期要劃為右派，弄到湖北來勞動改造，他不當省長了，要當他們的勞改隊長。

九月十五日，湖北省委在洪山禮堂召開大會，張體學“代表三千萬湖北人民控訴”南下學生趙桂林等，並宣稱：“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引起了武漢三鎮更廣泛的辯論，圍攻南下學生的事件增多，一時三鎮氣氛緊張，這種形勢一直延續到九月下旬。

直到從北京傳來有關領導的講話，說南下學生到武漢宣傳文化大革命是革命行動，不要再次把矛頭指向學生，抓“南下一小撮”纔開始降溫。

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事與願違，火種不僅沒有撲滅，而且越燒越烈，南下學生不斷增加。省委的剿殺行動，反而使得武漢學生更多地到南下學生的大本營湖北大學去找南下學生交流，看他們寫的大字報，瞭解更多的資訊。通過大辯論，許多問題更清楚了，武漢革

命風暴的能量越積越大，一旦時機成熟，就會噴發出來。這是湖北省委及王任重沒有預料到的，更是各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沒有預料到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對於促進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 (四) 文化大革命的轉機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九月，基本上是先由黨委領導，後由工作組、黨委共同領導，矛頭向下大揭大批，然後是省委工作隊黨委領導反右派，最後由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破四舊、抓“南下一小撮”，這些都是由湖北省委領導的、有組織的運動群眾。

到八月底，少數對黨委、工作隊不滿意的學生，到北京上訪、學習、看大字報，接受了毛主席的檢閱；也有一些戰鬥隊成立，但人數不多，沒有話語權，沒有公開地向省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運動基本上沒有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進行。

南下學生的串聯，與多數派、省委的辯論喚醒了一些學生的革命鬥志，但總的來講還沒有形成組織力量，一盤散沙，各自行動，也就沒有力量，與北京的運動相比，差距很大。

我以為，從當時情況看，主要是缺乏革命的組織與革命的動力，不少人在觀望、猶豫。這是關鍵時刻，向前推一步，群眾運動就真正發動起來；往後退一步，群眾運動就會被鎮壓下去。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央要求省委組織武漢部分師生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

院文化革命委員會接到省委通知，着手從組織上、思想上、物質上做準備工作，決定以班、系、行政各處為單位成建制到北京。除少數審查不合格者（如認為右派學生、有反動思想的人、當權派等）外，基本上都可以去，我是屬於不准去北京的，表面上說我是當權派，實質上是認為有背叛黨委的嫌疑。

院文化革命委員會強調組織紀律性，到北京後，要以集體活動為主，特別是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看大字報，一定要集體去、集



體回，到北京也是集體去、集體回。物質上，除派人到北京準備吃、住、交通等條件外，在武漢準備了校旗、彩旗等物品及聯繫列車。全院師生幾千人，浩浩蕩蕩上北京，組織工作是很繁重的。

文革前，類似的組織工作，離不開李喜爾和我，此次我是旁觀者，無事一身輕，李喜爾則忙得團團轉。師生大部隊走後，學校顯得非常冷清，我也落得休息了幾天。

到北京去的團委的同志回來後，給我講了到北京的活動情況。“十一”前，主要是準備參加十一國慶活動，參加國慶慶典，見到了毛主席。學生的情緒都很激動，這可以想象。

我在北京工作時，每年都要擔任這方面的組織工作，每年看到一年級的新生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情景，他們拼命地呼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激動得流淚，回到學校後，互相談論，給外地的同學、給父母寫信，報告他們見到毛主席的喜訊。我們到北京的師生也都會有同樣的感受。

問題在於“十一”過後。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參觀，看大字報，去的時候還好，回來的時候就不聽招呼了，很多人自由活動，有的走馬觀花，有的仔細看，還要抄，有的去找老同學，無法統一回去的時間。

更重要的是，同學們到北京，受到了真正的群眾運動的影響，與湖北、水院比對，感到湖北省委、水院黨委、工作隊黨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文化革命委員會則是省委執行資反路線的產物。有些學生在北京時就成立了戰鬥隊，表示回漢後要積極戰鬥。

這次赴京參加國慶活動，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乃至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的轉捩點。從此以後，人們把鬥爭矛頭指向了湖北省委、水院黨委、工作隊黨委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向了王任重。

少數派開始組織起來，與多數派（保守派）形成了分庭抗禮的局面，進而發展成為多數派，逐步掌握主動權，在鬥爭中形成了一個派別——革命造反派。

院黨委、工作隊黨委、院文化革命委員會都靠邊站了，由革命造反派領導全院師生員工向資反路線發動全綫進攻。

### 三、造反派在鬥爭中成長

一九六六年國慶後，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的師生大多數按省委要求按時返回學校，大約 20% 的師生仍留在北京，他們中的不少人參加了十月六日召開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其中有後來成為我院造反派學生領袖的丁家顯、王新民（農水系三年級學生，文革中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勤務組副組長、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委會副主任）等人，當時他們受到極大鼓舞。

從此，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了質的變化。

首先，明確了鬥爭的大方向——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發起猛烈攻擊；鬥爭矛頭也集中指向了幾個主要領導——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張體學、校黨委書記張如屏、副書記張荊承、工作隊黨委書記劉真。

其次，明確了鬥爭要達到的具體目的——為在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學生平反，銷毀所有黑材料，為郭明正平反；為了摧毀資反路綫的統治，造反派懂得必須組織起來，統一行動，不斷地壯大自己的隊伍，必須獲得話語權（宣傳陣地）。

從此，開始了水院風起雲湧的鬥爭熱潮。造反派把矛頭指向了省委、院黨委及省委工作隊黨委的當權派，而以文化革命委員會為代表的多數派則堅定地站在當權派一邊，反對和阻止造反派的一切行動。

於是，形成了群眾中革與保的兩派鬥爭。

#### （一）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

學校的少數派在北京見到了毛主席，又到有關學校參觀訪問、學習，參加了在京學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也參加了有些學校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大會，耳聞目睹，大開眼界。回到學校後，這些人一方面轉抄了大量的中央領導人關於批判資反路

綫的講話、中央領導在誓師大會上的講話及有關學校批判會的報導，另一方面着手進行批判資反路綫的具體行動。

### 1. 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誓師大會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我校由少數派組織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誓師大會在體育館召開，除少數派人員參加外，中間群眾去得比較多，會議由丁家顯主持，張荊承副書記等領導人被邀請參加大會并坐在主席臺的一側，另一側則是少數派的領導者。

會上各造反組織代表講話，表決心，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鬥爭到底。會上介紹了中央有關領導的講話和北京批判資反路綫的情況。

最後，張荊承副書記講話，表示運動初期犯了錯誤，向被傷害的革命群眾賠禮道歉，誠懇接受革命群眾的批評，願意與革命師生一道把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會場由少數派的同學維持秩序，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氣氛。

這次誓師大會的意義在於造反派第一次由自己組織群眾集會，不僅合法而且請院領導到會并講話。從此造反派不再聽任黨委、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擺布，而是獨立地、主動地組織群眾、領導群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開火，宣告造反派登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舞臺。

誓師會後，由少數派組織的北京文化大革命情況介紹會在六教學樓的階梯教室召開，參加的人很多，走廊裏站滿了人，說明人們對文革的關心，說明人們已經改變了一段時期把不同意見的少數派看作是洪水猛獸敬而遠之的態度。不管你是誰，祇要講有關文革的事，大家都願意聽。我也是屬於這一類的人。

參加北京國慶活動回校以後，少數派幹了三件事，一是出一批大字報，介紹中央領導講話，介紹北京運動情況。二是組織召開批判資反路綫誓師大會。三是召開北京文化大革命情況介紹會。這三件事就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使少數派獲得了群眾的好感與信任，取得了運動的主動權。而多數派的領導人回校後無所作為，在等待省委的指示，脫離了群眾，陷入了被動。

## 2. 抄黑材料, 促批判資反路綫深入發展

運動初期, 院黨委在省委指示下, 整理了一批師生員工的黑材料, 以便在反右階段使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反右派時已經用了一部分, 很快就剎車了, 但所整的黑材料仍在, 少數派師生對此十分在意。

黑材料問題, 成為當時雙方關注的焦點。

在少數派師生看來, 查抄黑材料, 一是為了以此事來教育群眾, 證明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是如何鎮壓群眾的, 說明階級鬥爭的殘酷性。二是為維護自身的利益, 這些黑材料如放到檔案中, 不予清除, 則將禍害一輩子, 所以大家十分關心。

對當權派來講, 這批黑材料掌握在手裏, 處于兩難的境地: 交給革命群眾, 就會證明自己鎮壓了群眾運動, 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當然不能交出去; 握在手裏不交, 若被少數派發現了, 就會罪加一等。所以有些人開始私下裏處理掉一些黑材料。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 全院批判資反路綫進行得轟轟烈烈。有一天晚上, 有人發現行政大樓某單位有人在燒東西, 便報告了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丁家顯立即組織人到行政大樓, 發現有人在處理黑材料, 于是要求當事人交出沒有燒掉的黑材料。但對方說沒有黑材料, 丁家顯下令撬開櫃子, 搜出了不少由各系上報的黑材料。

這對院黨委、各總支來講則是致命的一擊。黑材料是黨委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的鐵證, 從而也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鐵證。

燒毀、轉移黑材料是違背中央指示的, 丁家顯又以此次抄黑材料為基礎, 掀起了從班到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高潮, 這對於教育中間群眾十分有效。此時水院的保守派紅衛兵(“大專兵”、亦稱“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已經陷入被動, 無所作為, 但其組織結構和骨幹成員依然相當完整。

## 3. 搶奪廣播台, 建立宣傳陣地

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初的一天晚上,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行政大



樓裏發生了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直接的大規模的衝突。

造反派要占領設在行政大樓四樓的廣播台，“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保守派）則組織人保衛廣播台，雙方發生了直接衝突。

造反派為什麼要搶奪廣播台？院廣播台被稱為黨委的喉舌，廣播的內容除報刊社論等重要文章外，主要是廣播保守派觀點的稿子，造反派的稿子一律不予播出。原來廣播台的工作人員，稍有不同意見，則被清除出廣播台，如徐海亮、宋志榮、劉萍、伍必慧等先後均被清除。

造反派認為，廣播台應該為文化大革命服務，應該廣播批判資反路綫的稿子。丁家顯等人認為廣播台掌握在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手裏，應該把它奪過來，讓廣播台為革命路綫、為革命派服務。

丁家顯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研究奪取廣播台的戰鬥方案。會上決定由王傑生、韓同良組織 30 個人主攻，丁家顯率領造反派增援。

造反派搶奪廣播台的打算，早為“大學校”所掌握，祇是不知道何時動手。他們調集“大學校”的學生及部分工人進駐行政大樓，24 小時有人值班。

造反派為了麻痹對方，動手的當天晚上在體育館召開批判資反路綫大會。中途，王傑生、韓同良帶人沖入行政大樓。守樓人員還未反應過來，他們已沖到頂樓廣播台門口，由于廣播台門口的樓梯很窄，人多沒有用武之地。廣播台的人頂住門，沖不進去。接着，廣播員向全院廣播：“緊急呼籲！緊急呼籲！現有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正在搶占廣播台，全體革命師生趕快行動起來，保衛黨的宣傳陣地、保衛廣播台，堅決粉碎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陰謀。”

很快，聽到廣播的人湧到行政大樓，工人沖進去把王傑生他們拽下來，逼到三樓。王傑生、韓同良等商量，攻不上去，也不能退出行政大樓，要乘機在行政大樓搞個據點，于是進入三樓西頭大會議室據守。大樓外面，丁家顯率領大隊人馬增援王傑生等人，但“大學校”的人馬也已到達，互相僵持着。又不能硬沖，怕造成人員傷亡，後來丁家顯與王傑生取得聯繫，指示王傑生堅守行政大樓，待機行動。到下

半夜，雙方人員逐步撤走，行政大樓門口由屬於“大學校”的工人把守，學生不能隨便出入。

三樓的造反派不能從行政大樓的正門出入，第二天他們設法做了個軟梯，人員出入、食品及水的供應均經軟梯來解決，行政大樓的工作人員可以經大樓門口出入上下班。

就這樣相持了半個月以上，隨着文革的形勢越來越有利于造反派，“大學校”中的學生、工人開始分化，無心堅持與造反派鬥下去，廣播台纔順利地為造反派掌握，開始了內容全新的廣播。水院的老人對學生廣播員宋志榮、劉萍的播音是記憶猶新的。

在相持階段，我得知有人在策劃用總機房蓄電池的硫酸腐蝕軟梯（從三樓下垂的軟梯，要經過總機房的窗戶），以切斷造反派進出行政樓的途徑。我聽後感到問題比較嚴重，搞不好會摔死人。在一次造反派學生來訪時，我要他告訴有關人員，軟梯用時放下，不用時收起來，結果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批判資反路線取得勝利，“大學校”垮了，造反派一統水院天下，武裝部的劉妙先被批鬥，有人打了他，說他想用硫酸腐蝕軟梯，要害死革命小將，並將他“開除黨籍”，強迫黨委組織部長燒掉劉的入黨志願書。

這給劉妙先極大的打擊，嚴重地造成了劉妙先的心靈創傷。雖然我不知道腐蝕軟梯的這個策劃人是誰（我聽到的是“有人”，沒有講誰），也沒有給造反派講過是劉妙先，不知道其他人給造反派講過沒有。但我給造反派出過點子，肯定引起了他們的警覺，他們會想到我的“點子”不是空穴來風，于是追查。所以這事我應負一定的責任，也向劉妙先表示歉意。

#### 4. 為郭明正平反

郭明正事件是水院文革初期院黨委、省委工作隊黨委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的最典型案例，也是他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案列。

因此，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造反派必然要提出為

郭明正平反這一問題，而那些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包括王任重、省委和院黨委中的某些人），則要千方百計地阻礙為郭明正平反，鬥爭異常激烈。

把郭明正打成反革命，而且公開逮捕，本身就違反了“十六條”的精神，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突出表現之一，何況郭明正根本不存在所謂“持刀行兇”問題，那是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為了自身利益而編造的一個謊言。

在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形勢下，黨委應主動提出為郭明正平反纔對。然而當造反派提出“立即釋放郭明正”、“為郭明正平反”的要求後，有關人員却說：“郭明正是省公安廳抓的，黨委無能為力。”“你們可以向省公安廳反映。”

造反派到省公安廳要求放人、平反，得到的答復是：“郭明正是學校報上來要求抓捕的，既然抓了，就要按司法程序進行調查、取證，哪能說抓就抓，說放就放。”“有什麼問題讓學校來談。”

總之，學校推給省公安廳，省公安廳推給學校，他們玩推磨戰術，忽悠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工作隊黨委書記劉真在全院師生員工大會上作檢查，為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的幾個學生“平反”（口頭）、賠禮道歉，要他們上臺去拿被整的材料（他們沒去），但就是不提郭明正的問題。

這說明，領導上的檢查也好、平反也罷，都不是真正認識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危害性、嚴重性，更不打算認真改正。他們祇是在應付，因為中央說錯了，要檢查，要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革命群眾平反，所以他們纔不得不檢查、平反。

但觸及他們靈魂的東西就不敢去碰，也不願去碰。因為像郭明正這樣的案子平反了，將會使有些人暴露出極其醜惡的靈魂。

省裏解決不了，無奈的造反派決定派代表團上訪。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代表團出發了。

到北京後，他們向中央文革及有關首長遞交了郭明正案件的材

料，希望中央首長接見聽取面訴。在等待接見期間，他們兩次參加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活動，兩次見到了毛主席，同時到北京高校學習、參觀，開闊眼界。

在此期間，學校與省委知道了造反派已派了為郭明正平反代表團赴京上訪，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釋放了郭明正，釋放的理由不是抓錯了，而是因為郭明正“出身貧農，在獄中表現好，可以教育、寬大處理”。省公安廳副廳長徐耕耘親自談話，對郭明正說：“他們（指到北京上訴的人）這些人是受過打擊的，想出口氣。你回去後要把握運動的大方向，不要搞這件事了，因為這是個人的事（指平反）。”“現在有些人在給你翻案，你要慎重地對待這個問題。運動反復是很大的。”

他們在玩權術，他們心裏很虛，知道一旦上告到北京，北京肯定會下令釋放，所以他們先把人放了。北京叫放人，他們早已放了，說明已經改正錯誤了。但對郭明正本人，對水院的廣大師生，決不能說黨委、工作隊錯了，省公安廳錯了；祇是因為郭明正出身好，進去後表現好，可以教育、寬大處理，所以纔釋放的。也就是說把郭明正打成反革命是對的，抓他是對的，現在放他也是對的。既然沒有錯，當然也就沒有平反之說了。

郭明正被釋放出來後，造反派把他送到北京與上訪團匯合，成為上訪團的一員，可以有機會直接向中央領導控訴院及省兩級有關人員對他的殘酷迫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9時，謝富治副總理率公安部、最高檢察院的有關領導接見了上訪團，謝副總理與上訪團成員一一握手，詢問名字，問老家在哪里，很親切。聽取了上訪團的彙報及郭明正的控訴後，謝副總理表態，郭明正是好同志，應該平反，他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在整個會見中，謝副總理與郭明正握了四次手。謝副總理當即決定，由公安部向省公安廳打電話，最高檢察院向省檢察院打電話，明確告訴他們，要為郭明正平反。上訪團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如果省委、院黨委按公安部、最高檢察院的指示辦，為郭明正同學徹底平反，對所犯錯誤作個檢討，事情也就完了。但對於堅持資產



階級反動路線的少數人來講，他們還要作拼死的抵抗、垂死的掙扎。

省委要人、書記處書記李衍授得知公安部及最高檢察院的指示後，不甘心地說：“他們坐在北京也不下來調查，聽了片面之詞就做決定。”李的這一表態，院裏的某些人心領神會，立即組織反對為郭明正平反的上訪團赴京。上訪團的關鍵人物董兆花（郭明正班上的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黨員，“大學校”的中堅分子）當時正在徒步長征，學校即派出小車將其接回。保衛科到省公安廳複製了郭明正案件的全部材料。他們到北京後找到公安部、最高檢察院，遞交了證明郭明正有罪的材料，反對公安部、最高檢察院的決定，要求撤回為郭明正平反的指示。他們到北京就是為了“反平反”，但他們的行為是逆歷史潮流的，所以不會得逞。接待站接了材料，接待員聽了他們的敘述，要他們正確對待，勸他們回學校參加運動。當然更不會有中央領導接見，他們的北京之行以失敗告終。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郭明正案件，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鬥爭是何等的激烈、尖銳、殘酷，又是何等的艱難。

郭明正作為一個學生左派、團支部書記、班領導小組副組長，因為講了在運動初期黨委封左派是不對的，竟然被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坐牢 107 天。

在中央指示此舉錯誤、要為郭明正平反後，省委有關領導抵制、鼓勵學校派出“反平反”團上訪，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這說明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不會甘心失敗，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他們還要作垂死的掙扎，還要進行瘋狂的反撲。正如毛主席所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而對於革命者來說：“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從參加北京國慶活動返校到十二月底，經過三個月的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揭露院黨委、工作隊黨委整革命群眾的黑材料及

“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執行資反路綫的事實，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復復的一系列事件，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什麼叫鎮壓群眾運動，什麼叫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什麼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什麼叫兩條路綫的鬥爭。一系列的事實使大家具體地看到了，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從而教育了廣大群眾。

保守派的“大學校”從組織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轉到了造反派一邊。原來堅定的人，也開始懷疑省委、黨委中一些人言論、行動的正確性，於是開始逍遙起來了。“大學校”已經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員會也在鬥爭中靠邊站了，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隊伍壯大了，在鬥爭中組成了各種兵團，相互支持，形成了有戰鬥力的組織，掌握着運動的大方向、主導權，控制了學校的宣傳陣地（廣播台與院刊）。造反派已經在政治上、組織上、宣傳上都處于主導、主動的地位。

## （二）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組織簡介

### 1. 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群眾組織

武漢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一司，是由省委、各院校黨委、院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組織的官辦紅衛兵。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成立，總指揮崔建瑞（武大數學系總支副書記，湖北省委樹立的左派樣板），政委是湖北大學學生漆林（後任湖北省計劃委員會主任、國務院三峽辦副主任）。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二司，除華中工學院、華中農學院、湖北大學外，所有武漢地區大專院校均參加，還有不少中學也參加了二司。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成立，司令是武漢測繪學院學生楊道遠（共產黨員，後任武漢測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副司令為武漢機械學院學生方保林（後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學生丁家顯（後任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

武漢地區東方紅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成立，即三司，由各高校中所謂“同意二司觀點、不同意二司做法”的學生組成，一些中學也有三司的組織。

一司屬於保守組織，俗稱“大專兵”、“三字兵”。二司是革命造反組織，一九六七年四月後稱“鋼二司”。三司開始是中間派組織，後來逐步滑向保守，三司中的許多學生造了司令部的反，一九六七年四月成立“三司革聯”（革命造反聯絡站），脫離三司，成為造反組織。

華中工學院、湖北大學、華中農學院的造反派獨樹旗幟，以本校造反派自成組織（華農有一部分造反派參加二司），即新華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司令部新華工）、新湖大（新湖大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新華農（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新華農東方紅總部），合稱“三新”。一些中學生也參加了“三新”，稱為“三新中學總部”。

除學生組織以外，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的教工造反派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學校工人造反派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

## 2.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組織的演變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水院第一個造反組織成立，名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戰鬥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當時《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的標題），隊長丁家顯，副隊長韓同良（一系學生，後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勤務組副組長、院革委會副主任）；還有六三四一班的“千鈞棒”戰鬥隊（後改名“靈魂深處鬧革命”），領導人王新民。它們後來都成為水院造反派的旗幟。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三系學生王傑生（後任院革委會常委）等在北京參加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回校後成立了“八三一”總隊，並在總隊內成立“八三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王傑生任總隊領導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負責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八三一”總隊第一個提出來並建立組織的，此後武漢地區大中學校造反的紅衛兵都稱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以區別於官辦的“紅衛兵”（三字兵）。

九月，水院造反派成立了很多戰鬥隊，如“紅色尖刀”、“反修防修”、“造反有理”、“星火燎原戰鬥團”（由六五七二、六五七三、六五九二三個班造反派組建）等。這些戰鬥隊以後都成為各兵團的骨幹力量。

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三系學生李廣元等組織了跨系、跨專業的各戰鬥隊的聯合體“紅色造反聯絡部”，統一步驟、統一行動，顯得很有氣勢、很有力量。丁家顯與王傑生等商量，兩家合并成立“井岡山兵團”。王傑生把“八三一”中一部分人拉到“井岡山”，他本想讓“八三一”總隊全部加入“井岡山”，但遭到一些戰鬥隊的反對，於是“八三一”一分為二，一部分跟王傑生一起加入“井岡山兵團”，負責人是丁家顯、王傑生、韓同良等。“八三一”總隊另一部分人加上後來加入的戰鬥隊，組建成了“八三一兵團”，負責人有嚴菊明（二系學生，後任院革委會常委）、陳大鈞（二系學生，後任院革委會委員）、李秀英（女，二系學生，後任院革委會委員）等。“紅色聯絡部”經過整風後，由李德俊（三系學生，紅旗兵團一號勤務員，後任院革委會常委）、黎良能（二系學生，黨員，後任院革委會常委）、賴文德（一系學生，紅旗兵團勤務員，後任院革委會委員）等負責，並成立了“紅旗兵團”。二司成立時，

三個兵團都加入了二司。這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前造反派組織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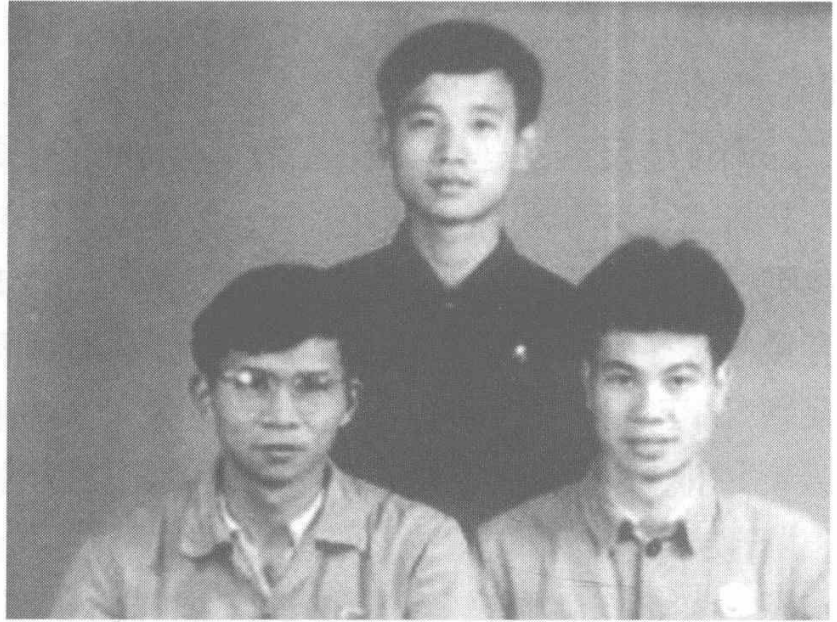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開始，“大學校”逐步分化，十二月，趙三其（黨員，三系學生會主席，造反兵團一號勤務員，後任院革委會常委）等組織了“造反兵團”，加



紅旗兵團負責人合影，前排左起：劉繼法、王新民、李德俊、李全德、王耀波，後排右起：黎良能、賴文德、李祥洪。攝于一九六七年



入二司行列；胡延漢（二系學生，後任水院三司革聯一號勤務員、院革委會委員）領導部分三司成員，與二司并肩戰鬥。十二月，基本完成分化與組合，大約有 80% 以上的學生參加了造反派組織。



教工中則成立了紅左起：賴文德、王新民、李德俊。一九六六年攝于水院教工與紅工兵，與二司學生一起戰鬥、一起行動。在“三新”樹旗後，我院簡稱“紅水院”，以後在武漢三鎮的廣播台稱為“紅水院廣播台”，院刊名為“紅水院”，校旗除正規的“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外，還有“紅水院”大旗。“紅水院”的名聲在武漢三鎮不亞于“三新”。

截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二司紅水院總部所屬組織如下：

井岡山兵團：四百人左右，負責人丁家顯、王傑生、韓同良等；

紅旗兵團：一千五百人左右，負責人李德俊、黎良能、賴文德等；

八三一兵團：三百五十人左右，負責人嚴菊明、何遠統（一系學生，後任院革委會委員）、陳大鈞等；

造反兵團：五百多人，負責人趙三其等；

三司：二百多人，負責人胡延漢等；

紅教工：七百人左右，負責人嚴國良（教師，後任院革委會常委）、柳濤（幹部）、陳鑒治（教師）、劉國柱（教師）等；

紅工兵：二百八十多人，負責人熊德才（工人，紅工兵一號勤務員，後任院革委會常委）、柯善交（工人，後任院革委會委員）、羅及時（工人）等。

各兵團人數、成立時間原來都有記錄，二司紅水院總部組織部都有詳細記載。總部的活動，水院大事記也有記載。後來這些材料都

被抄走了，最後不知去向。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後與武漢大學合併，文革材料均被處理。我曾找過有關部門及有關人員詢問，均稱不知。實在可惜！一個階段的重要歷史資料就這樣被毀了，所以各兵團成立時間及人數是不確切的，僅供參考。

為了加強領導，統一認識，統一指揮，加強戰鬥力，各兵團領導協商，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成立紅水院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丁家顯任指揮長，韓同良、王新民任副指揮長，協調各兵團的行動，兵團與指揮部的關係還不是隸屬關係，仍以各兵團獨立作戰為主。

隨着形勢的發展，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管轄與領導各兵團，實行總部的統一領導，對上則屬二司司令部。總部下屬包括學生的五個兵團及紅教工、紅工兵，即全院所有造反派組織。

總部設勤務組，組長丁家顯，副組長王新民（紅旗兵團）、韓同良（井岡山兵團）、張建成（革幹）。下設作戰部，部長王紹良（革幹），副部長王文忠（井岡山）；政治部，部長趙三其（造反兵團）；辦公室，負責人李秀英（八三一）。

紅水院總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院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即宣告取消。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冊學生近四千人，在編教職工約一千三百人左右，學生與教職工的比例約為三比一。一九六六年底，師生員工加入造反派組織的人數約占總人數的80%左右，這充分說明了廣大師生員工是積極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也說明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不是偶然的突發事件，而是植根于廣大群眾要求變革的願望中。這種願望隨着文革的興起噴發出來，成為不可阻擋的群眾運動，在青年教師及學生中尤其如此。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以首先在學校興起，武漢水利電力學院80%左右的師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其內在原因是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為廣大師生所接受，“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的號召，成為這一代知識分子自覺承擔的使命。而廣大師生參與一九六三年開始的城鄉“四清”運動，則從現實階級鬥爭中受到了生動的教育。

在我的記憶中，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共有三次群眾性的教育革命活動。

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央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對教育部門的教條主義，右傾保守思想，教育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實際的錯誤進行了批判。毛主席發出了“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的指示。全國高等學校掀起了以思想革命化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主要內容的教育革命熱潮。青年教師和青年學生是這次革命熱潮中的主力軍，他們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開展了在思想領域中拔白旗、插紅旗的群眾運動，對自身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揭露和批判，爭做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時，對學校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右傾保守的錯誤進行揭露與批判，還對教授、學術權威們的思想作風進行了揭露與批評。在此基礎上，師生開赴工地、工廠與工人階級、與生產勞動結合，向工人階級學習，在生產實踐中學習，發現問題，結合專業特點，師生共同討論課程內容，編寫新的教材，力求符合生產實際的需要。師生意氣風發，參加過那次教育革命實踐的同志，至今記憶猶新。在這次教育革命實踐中，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他們中的一些骨幹當年畢業時被留下來充實教師隊伍。如水院青年教師陳伯臨、周穆英等人，這批人中多數成為文化大革命中比較早的造反者，成為紅教工的骨幹。

第二次是一九六四年。根據教育部門的安排，進行了一次比一九五八年更進一步的以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為主的教育革命群眾性實踐活動。一九六四年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春節談話，專門對學校的課程、教學、考試等問題進行了批判，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在談話中提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身體健康，提出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反對培養學生死讀書，指出歷來的狀元就很少真正有好學問的。說“學生只是成天讀書，不搞點文化娛樂、體育活動，不能跑跑跳跳、打

球、游泳、看点电影，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毛主席在《改革學校課程設置和講授方法》一文中指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于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一九六四年夏，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提出了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毛主席批示：青年一代，要打敗老一代，我們的未來就是他們的。不要為名望、知識所懼怕，青年要敢想、敢說、敢做，要從各種狹隘的限制中解放出來。毛主席的這些話都說到青年師生的心坎裏了，我們倍受鼓舞。根據毛主席的教導，這次教育革命有重要突破，就是把學生放到主體地位，任課教師到學生中去，與學生同吃、同住、同活動。各班成立教改領導小組，把關心教育革命的學生吸收到領導小組裏來。師生一起討論課程改革、課程內容，學生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批判舊教材，用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觀點闡述科學理論，學生李家沛批判英語課程，學生徐海亮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講授理論力學、水力學、土力學等課程，學生登臺講課，師生共同討論教案，新鮮事物不斷湧現。當然，這中間會出現一些問題，但方向是正確的。師生團結一心按毛主席指示的方向進行教育革命，充分調動受教育者的主觀能動性，變被動為主動，體現出主人翁思想。這些做法，實際上是造了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反，造了所謂師道尊嚴的反，造了傳統教育體制、方法的反，造了教師主宰學生、權威說了算的反。這種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和做法，對培養青年師生敢想、敢說、敢做的革命精神有着重大的意義。

第三次教育革命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

一九六五年六月，毛主席對徐寅生《關於如何打乒乓球》一文作了批示，指出“小將們在挑戰”，在學生中組織了學習、討論。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主席對一個文件批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請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此指示被稱為“七三指示”）。一九六六年春節後，傳達學習了毛主席給王海容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五



月七日毛主席批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指出：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以上這些毛主席的光輝思想，進一步激勵了學校革命師生進行教育革命的積極性和自覺性。這些指示也就成為文革中師生自覺進行教育革命的動力。

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央下達了復課鬧革命的文件。院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立即引導廣大師生復課鬧革命，在鬥、批、改辦公室的具體領導下，許多班級自行選擇課程，編寫與翻印教材，請老師上課；有的師生到工地、農村邊作調查，邊上課，邊討論改革教學內容。在這一輪教育革命中，帶有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各系成立了教改串聯會，如“聯合拼命”串聯會、“鋼砸聯”等，提出了砸爛專業界限，水利不分專業，與電力融合起來，對各種方案進行大辯論。有人將各系對教育革命的態度比作農村各階級，說一系（農水系）是貧下中農，態度最積極；二系（水工、施工系）是中農；三系（電力系）是上中農、富農，對把各專業融合在一起，砸爛原有專業界限很不積極。這場教育革命吸引了很多老師參加，包括很多老教師，態度非常積極。

工宣隊進駐學校，在整頓秩序、學生全部分配離校後，於一九七一年春，在中央統一部署下，招收工農兵學員，這是按毛主席有關學制要縮短、課程砍掉一半、從工農兵中選拔學員的指示進行的教育改革，步子跨得比較大。學制由五年改為三年，課程削減五分之二，學生由地方推薦，主要從工廠、農村中選拔，文化考試成績不作主要錄取依據，這一大跨度的教育改革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失敗後即被取消，恢復到文革前的教學方針。

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符合青年教師及廣大學生的要求，我向青年教師、學生幹部傳達毛主席給王海容的一封信時那種熱烈的反應可以證明，工作組長李風翔傳達毛主席五七指示時長時間熱烈鼓

掌可以證明，宣布停課鬧革命後長時間起立鼓掌可以證明。他們對舊的教育體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反感、不滿，在主席思想的熏陶下，要求變革的反潮流精神一旦時機成熟，就會迸發出來。而學校各級領導，受舊教育制度影響較深的老教師，則對此憂心忡忡，怕變革會帶來各種負面影響，所以他們在改革面前顧慮重重，裹足不前，甚至有意無意設置障礙，使得青年教師、學生積極分子感到壓抑。

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從一九六三年初開始的。從防修反修出發，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發動了“五反”運動，限定在城市施行。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成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文件。在這個文件中，提出了農村社、隊要進行“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工分、清理財務”，“四清”運動由此開始。隨着“四清”運動的深入發展，劉少奇根據王光美在桃園蹲點的工作經驗，領導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的決定(草案)》(後十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五年元月，兩次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集中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問題，討論中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一步步地公開化。毛主席批評劉少奇提出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是“四清與四不清是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此謂交叉論)。毛主席說：“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批評了“後十條”中提出的依靠工作隊、扎根串聯、大兵團作戰、打殲滅戰等神秘化的地下工作方法，提出要相信和依靠群眾大多數、幹部大多數，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毛主席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四清”的內容變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這個文件糾正了前段運動中出現的運動依靠工作隊神秘化的地下工作方式，不相信群眾及幹部的大多數，搞打擊

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形“左”而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三屆學生(六一、六二、六三三個年級的學生)及近半數的中青年教師參加了湖北省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中揭發出來大量階級鬥爭的現實教育了廣大師生，宣講二十三條讓廣大師生進一步理解了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而社會主義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初步認識到毛主席革命路綫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區別，一是鬥爭矛頭指向，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整群眾；二是對待群眾的態度，是相信和依靠群眾，還是打擊群眾。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暴露了黨內基層組織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組織上的一系列問題，也暴露了黨的高層(中央)在對待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矛盾。兩條不同的路綫，為黨內開展兩條路綫的鬥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作了鋪墊。薄一波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劉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開始明顯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毛澤東傳(1949—1976)》第1383頁)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廣大師生經過貫徹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實踐及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踐的洗禮，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對革命的矛頭指向，對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對鬥爭方式方法等都有了新的經歷和體會，為即將到來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熱了身。

### (三)煎熬的兩個月——造反的心路歷程

從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兩個月，是我思想上受煎熬的兩個月。在這期間，中央領導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講話，通過各種管道傳到學校，清楚地表明湖北省委、院黨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鎮壓了群眾運動，把革命群眾打成了反革命。與此

同時，造反派對資反路綫的揭露和批判，更把學校某些人執行資反路綫的反動性和頑固性暴露無遺。

在這種情況下，我該何去何從？團委的同志們都看着我，表示與我共進退，更加重了我的思想負擔。如果我決定錯誤，將不僅影響自己，也將影響到團委其他同志的前途，因此我思想鬥爭異常激烈。

從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當時的實踐來看，我應該站出來公開支持造反派，但就是不敢輕易邁開這一步。究其原因，歷次政治運動的影響、組織觀念高于一切、私心雜念這三方面都有。

運動初期，從省委負責人提出“現在的形勢是五七年加五八年”到院黨委摸底排隊劃左中右，從工作組進院“打擊一大片”到反擊“右派進攻”，我認為與“五一六通知”精神不符，加上我對學校情況不太瞭解，所以處于被動消極的狀態。我對被整的同學表示同情，對少數派不反感，無敵意。

我的態度，必然影響到團委同志們，這種情況，黨委領導和少數派學生都看在眼裏。這造成了黨委領導對我、對團委的不信任，而少數派則認為我們是同情他們的，是可以爭取的對象。少數派不斷有同學到團委來與我們談心，介紹北京的情況，被在團委辦公室對門辦公的黨委負責人所窺見，進一步加深了黨委對團委、對我的不信任。

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旬，我們基本上被邊緣化了，這又加深了我們對黨委（包括工作隊黨委）違反“五一六通知”精神、整群眾的不滿。

這樣相互作用的結果，我們與黨委的關係逐漸疏遠，而與少數派（即以後的造反派）的感情逐漸接近。之後，院黨委不讓我參加大專兵（即官辦紅衛兵），不讓我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限制我外出串聯等等，已經注定了我與黨委分道揚鑣的必然性。

歷次政治運動的影響和長期形成的組織觀念，使我即使看到了黨委領導人的錯誤，也不敢毅然決然地與之鬥爭。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影響太深刻，我的老師、我的同學被打成右派，不就是因為響應號召、大鳴大放，給本單位領導人提了意見嗎？再說我是共產黨員，按黨章規定，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行動上必須與黨組織保持



一致，組織上要服從，我不能與黨委背道而馳。這兩個包袱使我在兩個月中受盡煎熬。我怕運動有變化、有反復，一步棋走錯，那麼這輩子也就完了，私心雜念又成了我的第三個包袱。

團委副書記王紹良同志在文化革命前已到中央團校學習，文革初期，團中央向北京市中學派工作組，他就被任命為一個中學的工作組組長。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工作組撤銷，他回到學校，給我們和部分學生介紹了北京的情況，與武漢的運動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很早就主張造反，團委的多數同志也主張公開表態，我一直壓着，老講要看看再說。

看什麼？我希望黨委領導能夠跟上形勢，改正錯誤，領導群眾進行文化大革命，這樣我就可以不在組織問題上犯錯誤。我當時認為，運動後期，所有幹部，特別是黨員幹部，都要向組織上作出交待，交出答卷：你在運動中幹了些什麼。即使你的觀點是正確的，但違反了組織原則，這一條也是不可原諒的，這是我黨幹部考察中主要的一條，即所謂組織觀念，何況，將來審查你的就是你的領導。

當幹部的都知道一個原則，運動中觀點的不同，是認識問題，祇要你沒有行動，那麼運動後期至多是個教育問題，排隊時可能是個中或最多是中右；而在組織原則上犯錯誤則是立場問題，那就要受到黨紀的處理，重則會被推到敵人的陣營中去。

這就是為什麼運動初期，黨員特別是黨員幹部都不動，到中期，知道錯了，也不參與造反派活動而當逍遙派的主要原因。

這也就是我期望黨委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用實際行動來支持造反派的原因。

但形勢的發展，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你不打，他就不倒”。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即使在事實面前仍不願認錯，更不願意改正。

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水院的形勢已經十分明朗，整群眾的黑材料曝光，郭明正平反，“大學校”垮臺，少數派轉化為多數派，但黨委中的少數負責人仍無悔改的表示。我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團委的

同志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要我明確表態：下一步該怎麼辦？

我想作最後的努力，我說，我找張荋承副書記談一次，視情況作決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我同張荋承副書記進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換意見，我的用意是說服張副書記認錯，主動領導群眾鬧革命，擺脫被動局面。

我很誠懇地把我的看法和盤托給了他，從摸底排隊、認為文革是“五七年加五八年”的形勢、反擊所謂右派進攻，到抓郭明正，再到兩位教師自殺，我認為我們違背了“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當然，責任在省委、在王任重，我們祇是執行者。因此，祇要深刻地檢討和誠懇地接受群眾的批評，是可以取得群眾諒解、取得運動主動權的。黨委應該站在群眾運動的前列來領導運動，不能像現在這樣被動挨批，黨委失去了對運動的領導權，也就失去了對學校的掌控能力，後果不堪設想。

最後我提出需要我做什麼，我會全力以赴，我祇求黨委能站起來。

張荋承副書記主要是聽我講，我講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張荋承副書記說：“你講得對！黨委執行省委指示，現在看來犯了錯誤，我很痛心。我現在思想很亂，身體又不好，想檢討也理不出個頭緒來。你能不能幫助黨委起草個檢查提綱，越詳細越好。明天上午8點開黨委會討論一下，準備作檢查。”說畢，他痛哭流涕。

當時把我搞糊塗了：他哭得那麼傷心，是感動了？委屈了？還是真認識到錯誤了？事後證明，都不是，是演戲！

但我當時的確受了感染，認為張荋承副書記的確認識到錯了。我當即答應他，今晚一定把提綱列出來，明早送到他手上。

我一夜未眠，起草了一個檢查提綱，第二天早上7點送到張荋承副書記家。

我慶幸自己做了個正確的決定，認為既推動了運動的進展又避免了自己犯組織錯誤。到辦公室後，我向團委的同志們彙報了我與張荋承副書記的談話內容與結果，大家也松了一口氣，我們等待着黨委的深刻檢討。

等了三天，不見動靜，我就去找一位知情人打探消息。他對我說：“你上當了，張書記是要摸你對黨委的態度，他拿着你寫的東西對大家講，張建成的觀點我摸到了。”

我聽後，真是晴天霹靂，矇了。怎麼會這樣！他的誠懇、他的痛哭都是騙我的，都是為了要掌握我的觀點。

其實我的觀點早就表明過，黨委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估計錯了（不是“五七加五八”），整群眾錯了（應整黨內的走資派）。黨委是執行省委指示、是執行者，希望黨委認錯、改錯，站起來主動領導運動。我沒有任何隱瞞，也沒有個人要求，何須來這一套呢？

吃一塹、長一智，經此一擊，讓我認識到政治鬥爭的複雜性與殘酷性，憑主觀意願是無濟于事的。我決心公開支持革命造反派，但仍然心有餘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造反派給我送來一張傳單，是周總理談關於如何對待群眾運動的。

傳單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段話是：“在群眾運動中，共產黨員不能站在群眾的對立面，也不能站在旁邊指指點點，而是要參加進去，引導群眾，影響群眾，使群眾運動中可能產生的錯誤影響縮小到最低限度……”我以為周總理自己是身體力行的。

這篇講話給了我啟發，給了我公開站出來的勇氣，也成為我公開站出來後的行動指南。當然，由于自己水平有限，沒有全面理解總理的講話精神，以後在處理與造反派中一些同志的關係上發生了偏差，造成不良後果，這是後話。

真誠被耍弄，我對黨委中的某些人徹底失望，使我決心脫離這個集團，跟着毛主席鬧革命。周總理的講話，給我指明了對群眾運動應有的態度和應起的作用。

所以，我決心公開站出來和造反派一起戰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我召集團委全體同志開會，講了我的想法，並告訴大家，這是個人行動，不是組織決定，因此各人自願選擇，同意的大家一起幹，不同意的可隨便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幹，目前情況，團委實際上已不起作用了。

會上除丘沫平外，其他人都表示要一起幹。丘表示不參加戰鬥隊，因長期夫妻分居，希望調動工作，後來如願以償，調到他的老家廣東去了。

我們團委的5個人加上總機房的周世友成立了“革命戰士”戰鬥隊，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發表了造反聲明，表示要與造反派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

在站出來之前，我作了縝密的思考，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群眾運動中由于人員複雜，水準、性格不一，可能會發生很多問題，所以一方面要把可能產生的錯誤影響縮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要做好頭頭的工作；二是站出來後，學校發生的一切問題，將來都是要查清楚的，而我必然成為主要責任者，因此要時刻注意發生的一切，並且要記錄下來，以便運動結束後向党作出清白的交待；第三，在黨組織停止活動、領導靠邊站的情況下，我要力爭學校不發生大的事故，特別是人員傷亡事故，保證學校儀器、設備、電力設施、供水設施以及房屋的安全，以便運動結束後將學校完整地交給黨。我的這些想法，後來證明是自討苦吃，自己把自己放到火上烤。

我們站出來最大的影響是一批原“大學校”的成員，其中很多是團的幹部、學生黨員，宣布脫離“大學校”，參加造反派的行列，成立了“革命造反兵團”。至此，“大學校”不僅從思想上而且從組織上瓦解了，造反派在水院占了絕對多數，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鬥爭取得了初步勝利。

#### (四)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中的幾件事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過程中，我認為沒有出現大的問題，造反派比較講究政策，對幹部、對所謂的學術權威，沒有發生過暴力行動。批判時讓他們站到主席臺上受教育，曾經出現過掛牌子、戴高帽，但很快糾正了。

我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後，參加了各種批判會，除了接受教育外，也注意造反派執行政策的情況，認為有不妥之處，就和造反派頭



頭溝通，取得了一些成效。這讓我認識到周總理講話的深刻含義。

下面幾件事，既說明了我當時的思想情況，也說明了丁家顯等造反派領導人是講道理、講政策的。

### 1. 關於開除黨員黨籍、燒入黨志願書的問題

深入批判資反路線中，揭出了一些駭人聽聞的事。如前面講過的劉妙先說要用硫酸腐蝕軟梯的麻繩（我認為說說而已，未必真會幹），群眾聽了很氣憤，提出要開除他的黨籍，在批判會上他遭人打了。丁家顯宣布開除劉妙先黨籍，並要黨委組織部長馮萬秋當場燒掉劉妙先的入黨志願書，馮萬秋照辦了。這樣做是黨委成員在現場討論通過的，黨委成員都同意開除劉的黨籍，由馮萬秋燒掉入黨志願書。此前，因私自處理黑材料，遭批鬥後被開除黨籍的已有兩人，一是三系黨總支書記朱冠先，另一人是行政部門的倪慧慈。

看到發生這一切時，為什麼沒有人出來講清道理，這是不合處理黨員程序的，黨委成員及馮萬秋部長為了某種原因，也不堅持原則。

我到六教學樓找到丁家顯，說了自己的想法。我說：劉妙先有錯誤，可以批判。打人是武鬥，不可以，開除黨籍更不可以。因為現在黨組織停止了活動，組織處理要放到運動後期。再說處理黨員是黨組織的事，群眾組織是沒有這個權利的。燒志願書更不可以，也不解決問題，僅為了出口氣，這樣做會讓人笑話的，志願書燒了以後還可以補起來。我們這樣做，看起來很革命，很過癮，但却很幼稚，我希望以後不要這樣做。丁家顯接受了我的意見，本來準備再處理兩人，後來停止了。

文革結束後，倪慧慈、劉妙先補填了入黨志願書，朱冠先是院黨委委員，檔案在省委組織部，志願書沒有被燒掉。

### 2. 關於批判班幹部的問題

在批判資反路線過程中，各班級批判的對象主要是班上的團幹部（尤其是支書）和學生中受過表彰的積極分子，認為這些人是修正主義的苗子。如李貞儒，他是院團委推薦的湖北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在班上反復受到批判。

我聽說後就主動到他們班上與李貞儒一起接受批判，同學們問我為什麼要這樣，我說，李貞儒是個學習很優秀的學生，他學毛選也很積極主動，用毛主席思想指導自己的學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認為要推廣，於是總結了他的事迹，推薦到省團委，被樹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因此而產生的不良影響或者錯誤，應該由團委、由我來負責，不能由李貞儒負責。我還說了此中道理，李學毛選用主席思想指導學習，他個人並沒有想以此獲得什麼名譽，他祇想把學習搞好，問題是我們這些人發現後，要把他樹為典範，讓大家向他學習，於是人為地拔高了他的形象，有些事就不實事求是了，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所以問題應該由團委、由我來負責，從某種意義上講，李貞儒也是受害者。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起來了，把一個批判會變成了討論會。從此再也沒有人批李貞儒了。

祇要我知道哪個班批團幹部，我一定會主動去，而且請大家批判我。因為團幹部在班上的工作，一部分是由團委直接布置的，一部分工作是由輔導員布置的，輔導員布置的工作，大部分也是由團委布置下來的。所以大家對團支部有意見，除某些工作方法外，應該由團委、由我負責，請大家揭批團委和我，不要把矛頭指向團幹部，他們與你們一樣都是學生，當了幹部，多了一份社會工作，他們沒有報酬，是義務為人民服務。有不恰當的地方，可以提出來，讓他改正，讓他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要搞批判會、鬥爭會，這不僅傷了同學之間的和氣，還會產生負面影響，以後誰再敢擔任吃力不討好的社會工作？不同意見要交換，不要對立。

我清楚，在當時的形勢下，批團委、批我是不可能的，而批班上的團幹部，更多的原因是因為文革中，團幹部中的多數人聽省委、聽院黨委的話，整過少數派，反對過造反派。所以我的作為，不僅要保護基層團幹部，也要化解兩派之間的矛盾。

我對於群眾、幹部在文革中的表現，持理解的態度。由于經歷不同，地位不同，看問題的視角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人與人之間差異

是很大的。保守派保省委、保黨委，因為歷史是這樣過來的，也是這樣要求的。學校一直教育我們要聽黨的話，黨是由各級組織體現的，不聽省委的、不聽院黨委的，那怎麼叫聽黨的話？王任重錯了，省委跟着錯了，院黨委的工作當然是按省委的指示辦的，所以也就跟着錯。“抵制錯誤領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所以我一直認為，錯誤路線應由中央和省委兩級負責，基層組織是負不了責的，祇能是接受教育、跟上形勢。群眾更談不上犯路線錯誤的問題，僅僅是對問題的認識或對事實的認定不同罷了。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在運動前、運動中、運動後，對不同認識的幹部、群眾一視同仁。有人在形勢有利于造反派時向我檢討，我不僅不聽，而且批評他們的態度。告訴他們問題不在他個人身上，他們也是受害的，大家要共同提高認識，緊跟毛主席幹革命。

我認為，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要求各級幹部，原來的骨幹、積極分子去認識、去造反，這是唯心主義的，根本辦不到的。黨員造黨組織的反，是史無前例的，也是聞所未聞的，怎麼能文革一開始就要求共產黨員、黨的各級幹部做到這一點呢？新民主主義革命用了28年，黨做了多少艱巨的工作，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纔取得勝利。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要求人們就認識清楚，並且能主動積極參與，而革命的對象就是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這個要求顯然太高了，也不切合實際。

我理解他們，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過來的。胡耀邦曾在一個有關“揭批查”工作的會議上說過一段話，大意是：對造反派特別是造反的幹部，要實事求是地分析。文化革命初期，如果毛主席用了我，我也會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因為從一開始把我打倒了，我就成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了。胡耀邦當時是負責“兩案”的總頭目，對“兩案”所造成的大量冤案及以清查“三種人”為名對造反派的鎮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他說的這段話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我自己也想過，如果我不是從北京電力學院新調入水院的，運動一開始，黨委讓我在第一綫指揮反擊、反右，我肯定成不了造反派。我也曾想過，如果我仍在北京電力學院，那麼在打黑幫時也可能成為

被打的對象了，也就不可能成為造反派。雖然是“如果”，但這種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 3. 關於胡承群反江青言論的問題

大約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間，我聽說抓了一個現行反革命，他反對江青，準備報案。

我趕到紅水院總部，看見胡承群坐在那裏，旁邊有兩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守着。我當即找到丁家顯，問他準備怎麼處理，丁說，他罵江青，這屬於現行反革命行為。班裏已經批判了，準備報案。

胡承群也是學生幹部，我雖然不熟悉，但知道在文革中他是保守派一邊的人，對某些問題有看法，認為是江青所為，因此說了江青的壞話，但說他是現行反革命，我認為過頭了。

我把自己的看法向丁家顯說了，我說，青年人，思想不通，說些過頭話，雖不對，也可理解，批評教育是應該的。如果以現行反革命報案，抓進去，那可是毀了一生，要慎重對待。丁家顯考慮後同意了我的看法，說讓班裏批評教育。

### 4. 保護唐懋官老師

唐懋官老師，我沒有接觸過，也不認識。一九六七年一月間，有一天下午，唐老師和他教研室的戰鬥隊負責人及三個外單位人員到總部找到我。我問，有什麼事情？外單位的人說，唐老師在文革初期在他們單位放了很多毒，現在要把他揪回去接受批判。教研室的同志不同意，雙方意見分歧，爭吵不休。最後對方要求到總部協商解決，希望我們同意放唐老師回去接受批判。

我把教研室的同志拉到旁邊，詢問了唐老師的情況，他說唐老師人很老實，大家關係也不錯。

我對外單位的人說，唐老師是紅水院的人，有什麼問題你們可以反映、寫材料，由我們來處理，沒有必要到你們單位接受批判，他一不是你們單位的領導，二不是你們的工作組成員，沒有理由回去。他講的錯話，做的錯事，可向我們講，我們按情節處理，我們要對本院教職工負責。即使是學生，也不能任意讓外單位拉去批判。請你們理解。



對方看我態度堅決，也就走了。

我想唐老師如果被他們帶走，那不知要吃多少苦頭，所以我的決定是不放人。由此，我想到應該保護全院師生員工，不准外單位隨意將我院師生員工帶走批判，並將此意見在戰鬥隊隊長會上講了。

我造反後，到武昌市汽運五站去過半個多月，一則是接受工人階級教育，與工人相結合；二是為了促進工人運動的發展，宣傳文化大革命，壯大工人總部（武漢地區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的隊伍，與保守的職工聯合會進行面對面的鬥爭。我院很多人當時都到了工廠，對促進工廠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和王紹良進入紅水院總部工作，我擔任勤務組副組長，王紹良擔任總部作戰部部長。從此，我更感到責任的重大，兢兢業業，一心投入到總部的工作中去。

我公開支持造反派後，與造反派各兵團頭頭接觸多了，對他們的瞭解也就多了。與原來那些學生幹部相比較，造反派頭頭的特點是獨立思考、敏感性強，這些在群眾運動中衝殺出來的領袖人物，堅毅、勇敢、果斷、能吃苦、口才好、文筆好、有組織工作才能，令我欽佩，特別是丁家顯、王新民，更為突出。

丁家顯除了上述優點外，對黨的政策接受能力很強，一旦接受，就堅決地去實行。他在省市造反派大聯合過程中表現突出，受到周總理的關注和表揚。我對他總的印象很好，認為他是在鬥爭實踐中湧現出來的學生領袖，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我很希望自己能幫他成就一



二〇一三年在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與丁家顯會面時合影

番事業。我勸他不要到外面去活動，要專心把學校的工作做好。我也勸他要與井岡山的“高級群眾”保持距離（原因後面講）。他不僅沒有接受我的勸告，反而引起了誤會。這是造成後來他和我分裂的原因之一，我既痛心又惋惜。

#### 四、部隊支左與文革形勢逆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布《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決定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主要特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裏奪權。……在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的奪權鬥爭中，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

在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毛主席、黨中央決定派解放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派、支持奪權鬥爭，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正如《決定》指出的：“這場奪權鬥爭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十七年來猖狂進攻的總反擊。這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決定》中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解放軍）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該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決定》非常明確，但實行的結果却事與願違，不少地方的部隊領導違背了《決定》中所規定的方針，他們支持甚至組織保守派，瘋狂地鎮壓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革命造反派，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破壞奪權鬥爭。

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經過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拼搏後，形勢一片大好。但在武漢軍區介入後，形勢急轉直下。

從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開始，到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漫

長的五個月中，他們取締工人總部，大肆抓人，壓迫二司、九一三，分化造反派隊伍，拉一派打一派；扶持百萬雄師，對造反派實行武力清剿，實行白色恐怖；公然抗拒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發動“七二〇”兵變，扣押毆打中央代表，從武漢逼走毛主席，真是喪心病狂，這也說明了階級鬥爭的複雜性與殘酷性。

正如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所指出的：“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強大的，頑強的。”“由于阻力比較大，鬥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麼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革命群眾，特別是年青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 （一）“一·二六”奪權與“二八”聲明

一九六七年年初，受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與啟發，武漢地區的造反派也開始了奪取省市領導權的準備工作。

湖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張體學也嘗試有條件的交權活動。據楊道遠回憶錄《奉獻》一書所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張體學派張華、劉真（省委正、副秘書長）到紅樓找工總、二司、九一三、紅工兵、紅教工等造反組織負責人，商談有關交權及聯合辦公的問題，但由于職工聯合會（工人中的保守派）的衝擊，沒有談成。

“一·二六”奪權我沒有親身經歷，僅根據當時聽到的情況和近年看到的資料，簡述如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晚，由工總牽頭，邀請二司、九一三、工造總司、新華工、新湖大等十幾個組織在武昌紅樓開會，商討成立“毛澤東思想湖北地區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意圖向上海工總司學習，把湖北的主要造反派組織聯合起來，然後向省、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

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造反派連續開會研究成立

總司令部問題，最後一致同意成立“毛澤東思想湖北地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通過了成立《宣言》，並決定成立辦公室、抓革命促生產小組、省市奪權小組等三個機構，但沒有落實總司令部及各機構的組成成員。

二十六日上午，各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在湖北大學召開會議，討論由新湖大準備的奪權方案。在討論中，對革委會名額的分配產生分歧，二司認為“三新”各一個常委，二司祇有一個常委，那是不公平的（因二司是除“三新”以外各大中學校造反派的聯合體，單位多、人多）。在會上，有些人對工總、二司不滿，認為它們造反早、人多勢眾，看不起小組織，看不起後來造反的組織，搞大國沙文主義。有人進而提出工總組織不純，工總頭頭修了（南下造反大隊的張立三提要“砸爛工人總部”）。二司的代表與工造的代表相互指責，二司的周孔信講工造是賣燒餅油條的，不能參加省裏的奪權。工造司令吳焱金則宣稱“與二司水火不容、有你無我”。最終導致二司宣布退出奪權。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奪省委權的奪權大會如期在省委禮堂門口廣場召開，宣讀了《奪權公告》、《告全省人民書》。與此同時，二司司令部通知有關總部，派人把省委、省政府及下屬各機關的公章奪過來交司令部。

我院總部是參與者之一，紅旗兵團、井岡山兵團參與了此次奪公章行動，下午4時左右，奪得各種公章一口袋（麵粉口袋），歡天喜地回來，交到總部。

我當時不明就裏，認為這是很幼稚的行動，對興高采烈的同學們說，奪公章不叫奪權，只要省委宣布老公章作廢，這些公章就沒有用了，奪了公章不能用，又背上個包袱，何苦呢？後來纔知道，因二司退出了聯合奪權，不讓奪權者奪得公章，所以搶先一步把各機關的公章奪了，司令部集中後交給省軍區保管。

一月二十六日晚到二十七日晨，以工造總司為首的一些組織，召開奪權大會，宣布奪市委、市政府的權，並發表了《奪權宣言》和《通令》。



工總、二司、九一三、紅教工、紅工兵等組織事前均不知情，工造總司排斥武漢地區影響最大的工總、二司等造反組織，使原先產生的分歧與誤會更進了一步。于是二司聯合工總、九一三、紅工兵、紅教工、省直紅司等組織，通令《湖北日報》、湖北人民廣播電臺不准刊登、不准廣播有關“一·二六”奪權的消息及《奪權公告》，并于當日（二十七日）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一·二六”奪權無效。“一·二六”奪權以失敗告終。

“一·二六”奪權失敗後，武漢三鎮出現一股批工總、二司、九一三的逆風。“工總、二司大方向錯了”、“工總、二司頭頭修了”、“工總組織不純”、“九一三領導班子有問題”、“砸爛工人總部”等大標語遍及武漢三鎮。

在這樣的背景下，二司、工總、九·一三負責人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開會研究形勢，認為武漢出現了一股攻擊、分裂革命造反派的逆流，目的是破壞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破壞奪權鬥爭，幕後是有黑手（走資派）的，一定要進行揭露和反擊。會上決定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要發表一個聯合聲明，把武漢地區目前的形勢講清楚。會上決定由二司起草聲明稿，二司把任務交給丁家顯。

工總、二司、九一三等組織認為武漢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後字二四八紅野、紅衛軍、紅工兵、紅教工、中學紅教工、《長江日報》毛主席路綫戰鬥兵團，北航紅旗、西軍電（臨）、哈軍工紅色造反團聯絡站等十二個單位，以後在“二八聲明”上簽字的就是這十二個組織。

丁家顯召集有關人員，主要是井岡山的“高級群眾”，開形勢討論會。會上丁家顯介紹了武漢地區目前的情況，特別是“一·二六”奪權過程及失敗後出現的攻擊工總、二司、九一三等組織的形勢。大家在討論中認為，目前出現的情況，肯定有黑手，記得當時提到老幹部李守憲操縱某個組織奪了省公安廳的權，上躡下跳。另外也聯繫到王任重、張體學的表现，認為走資派聯合并利用了保守派中的頑固派，一些“職工聯合會”及“大專兵”的成員，迫于形勢參加了造反派。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托派，他們打着革命的旗號，反對和攻擊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那是最危險的，他們起到了走資派、保守派想起而沒有起到的作用。當時會上有的指某某組織、有的指某某人，指名道姓，言之有據。

我對社會上的情況不甚瞭解，主要是聽別人講。討論會開過不止一次，當時我不知道開會的目的是為寫聲明作準備，以為是為提高骨幹的認識。後來“二八聲明”發表，而且是由井岡山兵團骨幹雷志茂執筆的，我纔想起形勢討論會的一些內容。

“二八聲明”在《長江日報》發布後，造反派內部的分歧在社會上公開化了。聲明中點了工造總司的名，把工造總司說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別動隊，起到了“職工聯合會”不能起的作用；暗指造反派中某些人是托派、機會主義者、半路出家的投機商等，這些觀點及用詞，無疑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加深了相互之間的矛盾與誤會。

“二八聲明”的出臺，客觀地說，無助于這些分歧與誤會的解決，却被走資派、頑固堅持資反路線的人所利用，用來分裂造反派隊伍，分化瓦解造反派，進一步直接殘酷地鎮壓革命造反派。

二月十八日，武漢軍區發布了“嚴正聲明”（即“二一八聲明”），稱“二八聲明”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是與《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所指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奪權”的大方向背道而馳的，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進行策劃的，是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

武漢軍區的聲明並未緩解雙方的矛盾，而是支一派壓一派，使雙方的矛盾更為尖銳，形成了以“二八聲明”劃綫的所謂香花派與毒草派。

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司、工造總司以及衆多的以本單位為基礎的革司、聯司等為毒草派，受到武漢軍區的支持；而工人總部、九一三、二司、紅教工、紅工兵等則為香花派。

兩派正式拉開距離，成為相互鬥爭的對象，而把走資派、頑固堅持資反路線的人放在一邊，去爭論“二八聲明”是香花還是毒草，使親者痛、仇者快，武漢軍區某些人則達到了目的，正策劃着進一步的行動。

二一八聲明發布後，為了加強對以工總、二司為首的革命造反派施加壓力，武漢軍區一方面用直升飛機在武漢三鎮散發軍區聲明，另一方面部隊全副武裝，刺刀上槍，頭戴鋼盔，乘坐軍用卡車，在武漢三鎮示威游行。到我院游行的有二十多輛全副武裝的軍車，口號是：“二八聲明是大毒草”、“工總、二司頭頭修了”。

在這種高壓態勢下，工總、二司、九一三等組織進行整風，頭頭們除了聽取本組織成員的意見外，還到武漢三鎮街頭徵求群眾意見，同時向群眾謝罪。

武漢又一次深陷白色恐怖中，革命造反派想念毛澤東，院內到處可以聽到“紅軍想念毛澤東”的歌聲。

## （二）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與為工總翻案

毛主席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支左，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明確指示要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而不能支持保守派。此時武漢地區與全國各地一樣，在批判資反路綫過程中，造反派發展壯大，保守派從萎縮到瓦解。

部隊介入地方後，各地以種種理由，壓迫、鎮壓、分化造反派，組織新的保守派改頭換面與革命造反派對抗，以致發展到武力鎮壓造反派，最終不得不由中央出面解決。

全國很多省都經歷這一過程，這就說明不是部隊內部個別首長或少數地方領導的認識問題，也決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在上層，有人利用毛主席指示，用部隊介入地方的機會來反對文化大革命。

大軍區一級的聲明、公告、通告之類，有關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都要經過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批准的。據說，武漢軍區的“二一八聲明”以及後來發布的“三二一通告”、“六四公告”都是經過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批准的（見吳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 頁）。

武漢軍區介入地方後，鎮壓造反派的步子走得很大，力度也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下旬，中央發文決定部隊支左；一九六七年二

月十八日發布“二一八聲明”；二月二十一日宣布漢口高級步校造反派為反動組織，其他軍事院校造反派的命運也一樣；三月二十一日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發布，取締工人總部，在此之前的三月十六日晚至十七日晨，全市統一行動，把工總總部及各分部頭頭五百多人抓捕入獄。

從武漢軍區介入地方到把工總打成反革命組織，時間僅兩個月。這兩個月，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又回到了並超過了運動初期“五十天”的恐怖狀態。

一片白色恐怖，革命派遭到了逮捕和鎮壓。

### 1. 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與取締工人總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發布通告，宣布從即日起，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一律解散，並明確了對待不同人員的政策，包括對待工人總部中反革命分子及其後臺的政策，對待工人總部中一小撮反革命頭目的政策，對待工人總部中地、富、反、壞、右等牛鬼蛇神的政策，對待工人總部中群眾的政策等。

“三二一通告”同時公布了附件“‘武漢地區工人總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共十大罪狀。這些罪狀都是口號式的寫法，一看就知道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人們要問：在沒有對工人總部進行調查之前，在沒有宣布工人總部為反革命組織之前，為什麼把工人總部的負責人以及下屬組織的負責人都抓捕入獄，難道他們都是反革命嗎？武漢軍區公布的工人總部中反革命分子，是一個、兩個？還是一百個、二百個？這十大罪狀是一個人的，還是一百個人、二百個人的，抑或更多人的？你既然已經掌握了工人總部中的反革命分子，依法抓起來就是，與工人總部的組織、群眾何干？為什麼要解散幾十萬人的群眾組織？為什麼要在通告中單列一條對群眾的政策？

這一切說明，武漢軍區取締工人總部，不是因為工人總部中有反革命分子，更不是工人總部為反革命分子所操縱，而是他們仇恨無產階級革命派，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蓄意之舉。這與後來知



道的北京懷仁堂所發生的被稱為“二月逆流”的事件是遙相呼應的。

“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是“工總”的全稱。在那個年代，在武漢地區，組織名稱前有“毛澤東思想”五個字即表明是造反派。工人總部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成立大會在洪山禮堂召開，湖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省長張體學參加了大會并授旗。

工人總部的起始階段，得益于新湖大紅八月戰鬥隊及新華工紅色造反團的支持與幫助。剛組建工總時，他們非常注意戰鬥隊員的出身及平時的表現。據我所知，工人總部下屬幾個主要單位的頭頭都是響當當的共產黨員，如武漢鍋爐廠的沈復禮、武漢重型機床廠的胡崇元、武昌鑄鋼廠的胡厚民、漢陽軋鋼廠的夏邦銀、武漢電信局的方景清、列車電業局武漢基地的張耀忠等，這些人後來大都成為工總的領導人。這樣的班子怎麼能說工人總部是“壞分子”當權呢？

“三二一通告”附件《罪行》中說，工總市電信局分部“控制要害部門的 38 人，全系國民黨員、偽軍官、特務、地主、封建把頭、右派分子等社會渣滓。”

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電信局是要害部門，進電信局工作的人都要經過政審的，更不要說電信局內部的要害部門，審查會更加嚴格。再說，解放後，經過鎮反、肅反、審幹、反右派、企業“四清”等運動，怎麼可能還會有這麼多專政對象控制了電信局部的要害部門？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武漢電信局在文革前就被敵特分子把持了，那就是武漢市委的問題了。

我想這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就是武漢軍區領導人為把工人總部打成反革命組織而編造的謊言，編得太離奇，以至于傷到了武漢市委。

工人總部是由後來成為新派的新華工、新湖大支持、幫助組建的，按理也應成為新派，為什麼後來成為鋼派的主要力量呢？第一，因為新華工、新湖大分別祇是一所學校的造反組織，而二司是全市性的學生組織，人數多、能量大，工人總部也是一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所以與二司的聯繫也就緊密些。第二，經省委安排，工總、二

司、紅教工、紅工兵等組織均在武昌閱馬場紅樓辦公，因此聯繫自然就多了。第三，主要是思想觀點一致，對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認識一致，行動一致，因而成為武漢地區文化革命的主要力量，“二八聲明”後，這些組織都成了香花派，而新華工、新湖大則成了毒草派。

“九一三”戰鬥兵團是武鋼、一冶的造反派組織，本來是工人總部的一部分，後來獨立出去的，他們的思想觀點與工人總部一致，所以武漢地區造反派中的鋼派以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為主要代表，一九六七年五月後稱之為“三鋼”，而新派則以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工造總司為主要代表。

## 2. 二司的處境

武漢軍區《二一八聲明》發布後，鋼派受到三方面的壓力，一是武漢軍區；二是以職工聯合會和大專院校紅衛兵為代表的保守派；三是造反派中的新派，即毒草派。他們均以批判“二八聲明”為藉口，集中攻擊“三鋼”。主要帽子是“大方向錯了”、“組織不純”、“頭頭修了”，提出要改組二司，要砸爛工總。在這種外部形勢下，“三鋼”內部也出現了不和諧的聲音，對領導產生不信任，懷疑是不是做了“三鋼”戰士不知道的事情，會不會把“三鋼”帶上絕路等。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二司於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召開了第一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大會，會上討論了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認為黨內走資派拉一派、打一派，企圖搞垮工總與二司，所以二司要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紅代會確定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策略。例如，不與解放軍辯論，不和解放軍直接發生衝突，在辯論和衝突中有解放軍介入時，要呼“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的口號等。

會上決定組織第二套領導班子，如果一綫領導班子被抓，二綫班子就頂上來，不能讓二司“群龍無首”。這些內容在紅代會結束後向下作了傳達。

紅代會後，二司司令部決定整風，成立了整風辦公室，開始是關門整風。

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傳來了中央文革小組工作人員閻長貴的談話，要求二司好好學習《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對照“二八聲明”，有錯就改，不要堅持錯誤，反托派是錯誤的。這個消息傳來，給香花派當頭一棒。二司戰士有的沉默不語，有的則把氣撒到頭頭身上，認為是他們把二司帶到了絕境，要求司令部向大家講清楚。

于是造成了司令部的開門整風。為表示願真誠地改正錯誤，司令部的頭頭及主要工作人員上街向群眾“請罪”，連續十多天在武漢三鎮不停地向群眾檢討，求得群眾的諒解，這在當時白色恐怖下的武漢，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綫。

三月十六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找楊道遠談話，對楊道遠進行教育，說二司不講政策、不守紀律，毛澤東思想太少。說一司的紅衛兵守紀律，聽話。說楊道遠反對他們，要奪軍權。楊道遠一一予以反駁。最後他們要求楊道遠要好好學習，把二司整風搞好，把隊伍整頓好，把二司帶好，帶起來。

武漢軍區領導接見楊道遠的談話，說明軍區沒有想把二司打成反革命，二司有救了。這一情況傳達後，大家的心情也就穩定下來了，松了一口氣。

然而好景不長，三月二十一日，武漢軍區發布通告，即“三二一通告”，取締工人總部，宣布工總十大罪狀。後來聽說早在三月十六日晚、十七日晨，逮捕了所有工人總部的頭頭及下屬各分部的頭頭，二司戰士剛放下的心又提了起來，擔心不知何時厄運會降到二司頭上。所以，二司戰士要求二司頭頭把問題說清楚的願望更加強烈。

三月下旬，司令部整風辦公室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召開“二司頭頭對質會”，就是三頭對六面，當面質疑，當面把問題講清楚。那天晚上，參加會的人很多（各校都有人），對質會的矛頭主要對着丁家顯。

我在體育館的後面，聽不太清楚講話的內容，多數時間是在問丁，丁作答，楊道遠也講。關鍵問題是關於與軍隊內造反派的關係，是否插手了軍內的事，是否參與了反軍亂軍等，丁作了否定的答復。

楊道遠講，丁家顯與軍隊的人聯繫多，是工作上的需要，是司令

部的分工，與丁家顯個人無關，他的工作情況，司令部是知道的。這樣纔解了丁家顯的圍。

對質會後，丁家顯輕鬆了一些，我却多了一層憂慮，丁家顯在司令部與外面的人接觸多，社會上什麼人都有，被利用了問題就大了。我起了勸阻丁家顯不要在社會上活動的念頭。

我與丁家顯交換意見，從對質會談起，講到社會上的複雜，萬一被利用，被拖進某個陰謀活動，那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犯了錯誤連怎麼犯的也不知道。我希望他辭去二司副司令的職務，回學校把單位的文化革命搞好。丁家顯說，現在的形勢，要退也退不下來，二司處于困難時期，怎麼能在這個時候退縮呢？我覺得他講的也有道理，希望形勢好轉後考慮我的意見，他不置可否。在以後的時間裏，我又多次提出不參與外面的活動，全力把學校工作搞好的問題，他還是既不同意，也不拒絕我的意見。我意識到，他是不會放棄司令部及外面的工作的，也就作罷了。

客觀地講，在這段時間，二司整風也好，組織二司戰士學習《紅旗》三期社論也好，主要是迫于當時的壓力與形勢，並沒有認真地學習，總結經驗教訓，特別是對“二八聲明”中所反映出來的“唯我獨革”、“唯我獨尊”思潮，把不同意見的戰友罵為“托派”、“機會主義分子”、“半途出家的投機商”、“‘造反’奸賊”等，認識不夠，或者根本沒有認識，更談不上清算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所以在形勢變化後，這些思潮又會冒出來，造成造反派內部的不和，進而造成造反派內部的派性鬥爭。

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造成的影響，與軍區領導的願望相反，他們以為鎮壓了工總，壓迫了二司、九一三，就可以為所欲為，把武漢地區的文革運動控制在自己的手裏，讓二司與一司的“紅衛兵”一樣，“守紀律”，“聽話”，任他們擺布。

正好相反，革命小將意識到，軍區的某些領導人并不是要幫助造反派改正錯誤、缺點，更好地投入到文革運動中去，而是要鎮壓、搞垮造反派。工總被鎮壓了，骨幹被抓了，二司也被整得半死不活了，已



經沒有什麼戰鬥力了，這是走資派鎮壓群眾運動、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伎倆，必須挺起胸膛，投入戰鬥。

正在這時，我們得到了北京懷仁堂事件的消息，北京開始反擊“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是譚震林，一些老師們也在其中。消息並說，這股逆流是全國性的，各地支左部隊普遍支保，鎮壓造反派。這個消息，使我們頭腦清醒起來，認為武漢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和北京、和全國聯繫在一起的。武漢也有“譚震林”，就是武漢軍區的陳再道。為鬥爭策略的需要，不點名，稱其為“武老譚”。

四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

革命小將聽到廣播後奔走相告。大家組織學習，萬分激動，再也按捺不住。

我校紅旗兵團首先發起游行示威，一千多人的隊伍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出發，經武漢大學、武漢測繪學院到華中師範學院，一路上高喊“打倒譚震林”、“打倒武老譚”、“為工總翻案”、“二司戰士想念毛主席”等口號。

為了表示二司是整不垮、嚇不倒的革命造反派組織，賴文德等同學邊走邊說，應該把二司稱為“硬二司”；到了武漢測繪學院校區內，又有人說“硬二司”不好聽，應該稱為“鐵二司”；在華中師範學院校區內，經商議，認為鋼比鐵硬，應該叫“鋼二司”。

這次游行，不僅使二司挺起了腰杆子，明確了鬥爭目標，也給二司起了個響亮的名字——“鋼二司”。

這個名字後來為司令部所接受，正式將二司稱為“鋼二司”。隨後工人總部稱“鋼工總”，“九一三”稱“鋼九一三”。於是武漢“三鋼”加上“新華工”、“新華農”、“新湖大”“三新”，名聲響徹全中國，也傳布到全世界。

### 3. “香花”、“毒草”兩派殊途同歸，共同反擊“二月逆流”

武漢軍區《二一八聲明》後，香花派遭到武漢軍區、原保守組織職工聯合會和武漢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中毒草派這三股力量的批判與圍攻，香花派受到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武漢軍區“三二一通告”發布，取締工人總部，從總部到分部的頭頭被抓，幾十萬人的革命群眾組織被打成反革命，工人戰鬥隊員在各企業遭批鬥，有的挨打，有的被整得有廠不能回，有家不能歸。與此同時，保守力量十分活躍，死灰復燃。

毒草派中的群眾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裏，感到不是滋味。一部分人認為這是武漢軍區以批“二八聲明”為由，是要鎮壓整個造反派。毒草派中的造反派在工礦企業同樣受到清算，同樣被弄得有廠不能回，工造總司、新湖大等單位收留了不少這樣的人。

事實是最能教育人的，新派（即毒草派）提出了“為戰鬥隊員平反”的口號，即工總“壞頭頭”不能平反，工總廣大戰鬥隊員要平反。二司和九一三等香花派則提出“堅決、徹底為工總翻案”的口號。

兩派對待工總問題的態度，有原則的區別，但對武漢軍區壓制造反派、呵護保守派的看法趨於一致。

三月中旬以後，新湖大、新華工的戰士們分別到二司的主力單位武漢測繪學院、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華中師範學院等學校游行，支持二司戰友（當時二司處於“抬不起頭”的困難時期），高呼“我們想念二司戰友”、“向二司戰友學習”、“向二司戰友致敬”等口號，給了二司戰友極大的鼓舞。

這是香花派、毒草派兩派學生消除隔閡、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的宣示，不僅是對兩派群眾的宣示，也是對武漢軍區某些執行資反路綫的領導人的宣示。

在這個問題上，新派的戰友們爭取了主動，他們一旦認清了形勢，堅決地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糾正自己的錯誤，這是需要勇氣的，他們在兩派團結起來共同對敵這一點上，當時確實功不可沒。

因為在那種形勢下，他們的行動不僅給以二司為代表的受壓迫的造反派戰友以鼓舞和力量，重新站起來投入戰鬥，而且給“武老譚”以迎頭痛擊。

以後的事實證明，擊敗“武老譚”在武漢掀起的“二月逆流”，兩派的團結是多麼重要，團結起來的力量是多麼強大。

隨着北京反擊“二月逆流”鬥爭的展開，《人民日報》四二社論的發表，在“為工總翻案”、“打倒武老譚”的目標上，兩派終于達成共識，團結起來，一致對敵。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二司、三司等，聯合在武昌體育場召開“打倒劉、鄧、陶，批臭黑修養”誓師大會。保守組織中學紅衛兵、大專院校紅衛兵戴着袖章、打着旗幟，列隊進入會場，企圖破壞大會。大會主持人叫他們退出，他們仗着“武老譚”的支持，堅決不退出。無奈之下，造反派轉移到湖北大學開會，這标志着三新與“武老譚”的徹底決裂。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二司第二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大會在洪山禮堂舉行，三新代表、工人代表、革命幹部代表、外地造反派代表先後發言。他們一致表示，二司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支持二司的一切革命行動。

會議決定，二司的稱謂為“鋼二司”。會上還公布了對工人總部的《調查報告》，批駁了“工人總部十大罪狀”，明確了“堅決為工總翻案”的鬥爭目標。

四月二十六日，鋼二司在武昌體育場召開慶祝二司成立半周年大會，武漢地區和外地造反派數萬人參加大會，會後舉行盛大的游行。隊伍從武昌體育場出發，過長江大橋，經保守派勢力控制的漢陽，高呼：“下定決心，為工總翻案，工總起來，武老譚完蛋。”“打倒武老譚，解放全武漢。”“打倒劉、鄧、陶。”一路上受到武漢群眾的熱情支持與歡迎，路兩旁站滿了群眾，游行隊伍在掌聲與歡呼聲中前進。群眾給大家送茶水、送點心，真是感人，有如當年紅軍重回蘇區的場面。很多小將激動得熱淚盈眶，沒有經歷這個場面的人是很難想像當時的感人場面的。

這是武漢地區造反派在“二八聲明”後第一次大聯合行動，也是反對“武老譚”、為工總翻案的第一次大游行，也是第一次公開向“武老譚”挑戰。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革命造反派在武漢三鎮舉行了規模空前

的幾十萬人的大游行，慶祝國際勞動節，誓死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次游行由三新、二司、工造總司、工人總部聯絡站、三司革聯等16個組織組成的指揮部統一指揮。

這次游行打出了“鋼二司”、“鋼工總”、“鋼九一三”三面大旗，從此“三鋼”名號響徹江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武漢市大中學校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成立；五月八日，武漢市工礦企業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成立；五月中旬，由兩個指揮部共同組建了武漢市反擊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大聯合總指揮部，統一組織指揮武漢地區反擊“二月逆流”和“為工總翻案”的鬥爭，總指揮由新湖大的張維榮擔任，副總指揮由二司楊道遠和工造總司吳炎金擔任。

至此，歷經曲折，武漢地區的造反派走到了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信念與目標，在統一組織領導下，進入了更為艱難、更為驚心動魄的鬥爭階段。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外地來漢的造反派成立了“鋼工總五湖四海兵團”，與武漢造反派并肩戰鬥。五月十八日，高等學校革命幹部聯絡站成立（簡稱革幹聯），由武漢測繪學院黨委第一書記毛遠耀任一號勤務員，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及劉庚申（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中層幹部）等同志參加了革幹聯，我院教師胡震宇是革幹聯的工作人員。湖北省、武漢市及武漢市各區也在此期間成立了革命幹部聯絡站。革幹聯的成立，給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增添了新的力量，使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更加有力。

“武老譚”氣急敗壞，撕下了假面具，明目張膽地與黨中央、毛主席對着幹，組織、恢復保守組織，指揮他們以武力鎮壓造反派，從此武漢進入了腥風血雨的鬥爭時期，革命造反派稱為抗暴鬥爭時期。

#### 4. 紅水院——武漢抗暴鬥爭的根據地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前身是武漢水利學院，簡稱水院。在武漢高校中，排在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之後，位列第三，全國重點大學，小有名氣。



文化大革命中，水院是二司的主力之一，在抗暴中又成了造反派的根據地。因為華工、湖大、華農的造反派稱為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所以水院就稱為紅水院。大旗上是“紅水院”三個字，學校設在武漢三鎮的廣播站稱為“紅水院廣播站”，小報叫《紅水院》，夏天學生穿的背心、汗衫上也印上了“紅水院”三個字，在外地設立的聯絡站也叫“武漢紅水院聯絡站”。

紅水院在武漢很有名，受人尊敬。在外地也小有名氣，很多學生給我講，“七二〇”後，在外地，你說自己是鋼二司紅水院的，就會受到接待、招待，要求幫助辦什麼事也會得到積極協助。賴文德對我講，他到一個地方去瞭解某同學的家屬情況，沒有開介紹信，告訴接待人員自己是武漢紅水院的，對方就給他看了有關材料。

聽起來不可思議，但現實就是這樣。在文化大革命中，紅水院為什麼這樣紅？我想有下面幾個原因。

第一，水院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以後，已經是造反派的一統天下。水院在批判資反路線過程中，對保守派群眾個人，沒有進行批判鬥爭；保守派瓦解後，很多人要求加入造反派，造反派都表示歡迎，沒有歧視，一視同仁，一起投入到批判資反路線的鬥爭中去；在“二月逆流”中，原保守派也沒有太大反復。所以紅水院的基礎比較穩固。

有了穩固的後方，纔能使戰士們無後顧之憂地在前方作戰，纔能充分發揮戰鬥力。紅水院能夠在黑雲壓城的情況下，首先衝殺出去，與穩固的後方有極大的關係。

第二，紅水院消息靈通，宣傳攻勢強，有關資料多。在反擊“二月逆流”中，紅水院成了造反派的資訊中心之一，影響極大。

紅水院在北京有兩個聯絡站，由紅旗兵團、井岡山兵團建立的，以後受總部作戰部管理。北京發生了什麼事，中央領導人講什麼話，我們很快就可以知道。

紅水院在武漢三鎮重要地段均設有廣播站，及時把最新動態、最新消息告訴廣大群眾。

我們不僅在北京有很多人跑動態，在武漢也有不少同學跑動態。

總部作戰部、各兵團都有動態組，瞭解各方面的情況，向總部、向兵團報告。例如百萬雄師攻打造反派占優勢的學校、工廠或據點，我院總有人及時趕到現場，及時發回進展情況的動態報告。“七二〇”事件時，我們動態組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險進入武漢軍區大院，目睹王力挨批挨打的過程。當時我整天在總部注視事態的發展，每隔半小時就收到一份動態（有時書面、有時口頭）。

由于信息量大、及時，又能及時通過紅水院廣播站告訴武漢三鎮的群眾，所以影響就大。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僅造反派群眾渴望聽到紅水院廣播站的廣播，中間派、保守派群眾也希望能從廣播中瞭解形勢。所以紅水院廣播站一開播，就會吸引大批群眾鴉雀無聲地聽。

《紅水院》報也極受歡迎，印量每期在萬份以上，有的報販提出要由他們來發行，我們沒有同意，我們是免費散發，主要是宣傳毛主席革命路線。

第三，在抗暴中，紅水院是武漢的“延安”，是造反派的根據地。無處可躲、無處可去的鋼工總戰鬥隊員，鋼九一三戰鬥兵團的人連同他們的領導人李想玉、夏邦銀、胡崇元等均到紅水院暫住，最多時有一萬多人，我們管吃管住。他們被百萬雄師用武力趕出工廠、據點後，就跑到紅水院，有如到了解放區，有些人激動得流淚。他們到紅水院後，由他們的領導組織他們學習與戰鬥，我們不干預，祇在後勤方面給予保障。這種充滿革命情誼的經歷，至今很多人仍記憶猶新，老朋友見面仍念念不忘。

第四，重要時刻，各主要造反組織都烙上了紅水院的印記。“二八聲明”是工總等十多個組織的領導人在紅水院開會決策的，起草人是紅水院的雷志茂；二司第一屆紅代會是在“二月逆流”猖獗時在紅水院召開的，與二司總部頭頭“對質會”也是在紅水院召開的；二司戰士第一次上街游行，喊出“打倒武老譚”、“為工總翻案”的是紅水院紅旗兵團，喊出“鋼二司”的也是紅水院紅旗兵團；抗暴時期工總總部、九一三總部遷移到了紅水院，他們的很多戰士也吃住在紅水院；鋼二司副司令、革命小將丁家顯在衝擊資反路線時是闖將，在大聯合時能

顧全大局，受到周總理的表揚，他是紅水院的人。以上種種，是紅水院在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中頗具影響的主要原因。

武漢軍區發布“三二一通告”後，一方面鎮壓、壓迫、瓦解造反派，另一方面扶植、復活原保守組織，將原中學紅衛兵、大專院校紅衛兵、職工聯合會的人馬改頭換面組織起來，在武漢市人民武裝部直接操控下，組建了以復員退伍軍人為主的基幹民兵組織“紅武兵”。這些保守組織遍及武漢三鎮和各工礦企業，聲勢很大，組織紀律性也強，成為百萬雄師中的主要力量。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在武漢軍區的策劃下，百萬雄師聯絡站（簡稱“百萬雄師”）正式成立。從百萬雄師成立之日起，武漢就進入了百萬雄師血洗、清除造反派的武鬥階段。

百萬雄師的文革作為，基本就是武鬥，從基層到上層，均有現役軍人具體指導，並配備了軍用卡車、柳條帽、長矛、洋鎬把、鐵棍等裝備，是一支有武裝、有組織的准軍事隊伍，造反派根本無法與之抗衡。

造反派雖然鬥志昂揚，視死如歸，在百萬雄師的進攻面前不退縮、不投降，不少人被打死打傷、被抓，場面既壯烈又殘忍，但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底，漢陽、漢口基本上沒有了造反派的立足之地。

百萬雄師一個廠一個廠地掃，一個據點一個據點地打，造反派祇有躲到武昌的幾所大學中。

從七月初開始，百萬雄師計劃攻打武昌的大學，用他們的話說：“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圍剿二癩子（即二司），鏟平九一三。”

他們所謂的過大江，就是由漢口、漢陽過江進攻武昌，目的是徹底剷除“三鋼”，也要鏟平“三新”，他們同樣進攻了新華工和新湖大。

六月三十日進攻新湖大時，他們使用了改裝的裝甲車，沖進了新湖大校園，打死3人，打傷數十人，抓走了一些革命群眾。如不是8199部隊及時趕到制止，傷亡會更大。

自從“百萬雄師聯絡站”成立之後，從五月十七日就開始用武力大規模鎮壓造反派，隨意毆打革命群眾。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宣傳

部一九六七年八月編《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對此有記載，摘錄如下：

五月十七日，打傷在漢陽公安局靜坐的學生數十人；

五月二十日，到武漢市二醫院行兇打傷九十餘人；

五月二十一日，百萬雄師上街遊行，遭到沿路群眾的嘲笑與責難，從漢水橋到利濟路沿途打傷群眾一百多人；

五月二十二日，在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國棉二廠等單位打傷造反派三十多人；

五月二十三日，進攻武漢三中，傷數十人；

五月二十四日，砸新華工漢陽廣播站，砸“五一七”事件（即百萬雄師毆打在漢陽公安局靜坐學生事件）火線指揮部，傷近百人；

五月二十七日，百萬雄師在二十中附近撕大字報，搶造反派的廣播器材，發生衝突，當場打死二司學生張昌森，這是百萬雄師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當眾殺人；

五月三十一日，武鋼工校二司學生數十人被打傷；

六月二日，百萬雄師進攻水泵廠，打傷造反派二十多人，進攻武漢郵電器材廠，打傷三十餘人，衝擊武東工總豎旗大會，打傷 22 人；

六月四日，清除駐武漢市委的造反派組織，百萬雄師正式進駐武漢市委大院，建立全市指揮中心，同一天，武漢軍區發布“六四公告”，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確，重申不得為工總翻案，於是百萬雄師清洗造反派的行動進一步升級；

六月五日，清除國棉二廠造反組織，進攻財經學校，端掉二司及新湖大“紅八月”反逆流聯絡站，打傷 21 人；

六月六日，清除二司、新華工等駐漢陽區委聯絡站，在場的學生都被打傷，殺死肉聯廠工人杜世順；

六月八日，進攻第二機床廠，打傷三十多人，綁架 14 人，毆打新湖大支農返校學生，傷一百二十多人；

六月九日，進攻居仁門中學，傷數十人；

六月十日，攻打漢陽造紙廠、礄口文化園、礄口汽配廠，傷二百多



人，死 6 人；

六月十三日，攻打 3506 工廠；

六月十五日，進攻水塔，在循禮門鬧事，死 10 人，傷者無數；

六月十七日，攻打財貿大樓、中南旅社、人民文化園（民衆樂園），死傷數十人；

六月二十三日，攻打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司門口險峰大樓；

六月二十四日，這一天是武漢文革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們攻打了武漢水運工程學院，攻打工造總司司令部，攻打漢陽軋鋼廠，共打死 35 人，打傷數百人，抓走造反派一百多人；

六月二十六日，攻打武漢機械學院（漢口）；

六月三十日，攻打人民文化園（民衆樂園），打傷數十人。

至此，漢陽、漢口已無造反派立足之地，所有廣播站、聯絡站均撤回武昌。

紅水院在抗暴鬥爭中共傷 7 人，包括八三一兵團負責人、總部勤務組成員嚴菊明，動態組成員鍾光超老師（後調廣東佛山，任佛山市委書記、市長），他們都是被百萬雄師的長矛刺傷的。

六月中旬，陸續有工總、九一三等組織的成員來我院，有熟人的找熟人解決吃住問題，沒有熟人的乾脆找總部解決。

六月二十日左右，丁家顯找我商量，工人總部的臨時班子、九一三的領導班子也要撤到紅水院來，無處可去的造反派戰友會有更多的人來水院，問我有什麼意見。

我想，來了肯定會有許多麻煩，拒絕是不現實的，所以我建議總部開個會，統一認識，建議討論兩個問題，一是工總、九一三總部遷來水院及無處可去的造反派戰友來院的問題，二是紅水院自身的備戰問題。當時已經感到水院必有一戰。

總部開會，認識比較一致：武老譚鎮壓造反派，不是對哪一個組織，而是對整個造反派隊伍，是反對文革、反對毛主席的問題。所以從大局出發，必須無條件地接納工總、九一三，這樣可以緊密“三鋼”間的聯繫，加強對抗暴鬥爭的領導。他們來校後，由學校解決吃、住



前排左起：蔣兆慶、朱愛華、丁家顯、柳英發、胡秀娟，後排左起：張建成、王傑生、蔣繼清，攝于二〇一三年十月

的問題。

因為是夏天，教室、走廊到處可以住。做飯問題，食堂說可以解決。關於備戰問題，由作戰部部署，要早作準備。到七月上旬，住到紅水院的工人造反派有一萬多人，這是水院歷史上學生食堂吃飯人數最多的時期，但是很有秩序，分期分批地吃。

我去過幾次食堂，問工人同志有沒有問題，每次的答復是沒有問題，所以我也未進一步瞭解。這麼多人吃飯的錢、糧票是怎麼解決的，以後也沒有人來要我簽字報銷，幾次審查我也沒有與我算過這筆賬。後來聽說，“七二〇”後，由總部勤務員李德俊起草了一個報告交水電部，錢和糧票是由水電部解決的。

關於戰備的安排，我瞭解的情況是這樣的：總的指導思想是設兩道防綫，第一道防綫是在三個路口設障礙物，在水果湖方向的橋頭（當時有橋）停放平土機（施工實驗室有一台大型平土機），阻止百萬雄師車隊進校；東邊在航海俱樂部方向，挖溝擺路障讓汽車過不來；從南面過來要經過武漢大學，首先與武大交火，我們在附小附近設障，阻止車隊進入。第二道防綫是以四、六教學樓為界，把來犯者阻止在此界之外，確保教學區及學生生活區的安全。辦法是由高壓教研室設計高壓電網，情況緊急時，在進入教學區的路口設置高壓電網和高壓水泵，阻止任何車輛和人員通過。這個方案雖然很殘忍，可能要死人，但對“敵人”的威懾力很大。同時由化學教研室研製土地雷和燃燒彈，在兩道防綫上都可以用。

當時的看法是：既然“敵人”膽敢來進攻我紅色根據地，那就要讓他付出血的代價。後來想想很後怕，如果百萬雄師真的進攻紅水院，那戰鬥一定非常激烈，因為百萬雄師認為紅水院是“牛鬼蛇神”的集中地，他們又是得勝之師，這最後一役，必然出動大批武鬥精英，拼死進攻。對造反派來講，這是我們最後的根據地，又是造反派的精英彙聚地，所謂仇恨滿胸膛，必然也會拼死一戰。如果百萬雄師祇用冷兵器進攻，未必能取勝，但死亡人數一定不會少。真如此，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工總的朋友們聽了我們的防禦計劃和試製地雷、燃燒彈的情況介紹，很有興趣，也觸動了一些戰鬥隊員的神經，他們也想製造武器，就到實驗室去要東西。當時化學教研室、電工教研室都問我怎麼辦，我說什麼也不能給，否則就失控了，亂套了，實驗室也會被破壞。于是我給各教研室、倉庫發了通知：“外人不得進入實驗室、倉庫，不能將實驗室的設備、原材料、倉庫的物資私自動用。各戰鬥隊必須派人在實驗室、倉庫二十四小時值班，出了問題，由戰鬥隊隊長負責。”

這通知首先遭到井岡山一些“高級群眾”的反對。他們來找我，要我開放實驗室，讓工總的朋友進實驗室製造武器。我講了不能開放的理由，我說，學校的實驗室，教學設備誰也不能動，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否則，運動結束，如何向黨交待？你們走了，可以不負責任，我是要負責任的。除非我離開總部，否則誰來講也沒用，我會堅持到底。

過一會兒，他們帶了幾位戰鬥隊員來了，一上來就揪住我的衣服（當天我穿的是襯衣），用匕首指着我的胸口，問我開不開放實驗室。我說不能開，把理由說了一遍。拿匕首的人說，人命快沒了，百萬雄師進攻學校也會破壞一空，你倒想得遠。再說，我們造武器，正是為了保衛學校的安全，你是不是造反派？是不是二司的？我們懷疑！為什麼反對我們？你在幫助“百匪”！你今天要不同意，我就一刀捅了你。

正在這緊張的當口，工總頭頭夏邦銀、胡崇元他們來了，叫戰鬥隊員把匕首放下，有話好好說。他們聽了我的解釋後，表示同意我的意見，批評了那幾個戰鬥隊員，說我們已經給紅水院的戰友帶來了很

多麻煩，沒有紅水院的支持，我們生無立錐之地、死無葬身之地。要服從學校的安排，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並要他們向我道歉。我說算了，出發點是好的，以後有話好好說。後來我聽說這幾個人是武漢重型機床廠的，先到實驗室碰了壁，就去找井岡山的人，井岡山的“高級群眾”一聽就來找我，碰了壁後不甘心，把武重的戰鬥隊員帶來搞橫的。辦公室的同學一見這陣勢嚇壞了，就去找工總的頭頭。如果夏邦銀、胡崇元等人沒有趕到現場，真不知道會是什麼結果。

在激烈的反擊“二月逆流”和抗暴鬥爭中，有一位學生一直跟隨在我身邊，他叫張純球，是造反比較早的二司戰士。他說是自願當我的“保鏢”，保護我的安全。從一九六七年三月到一九六七年八月，半年時間中，他寸步不離，不僅保護我的安全，還照顧我的生活，經常把飯端到總部讓我用餐，還隨時提醒我當天要做的事。我很不好意思，幾次讓他回班上去活動，他堅持不走，我很感激他。因為歷史的原因，我不知道他分配到了什麼地方。等我的問題處理後，想起張純球，總希望能見他一次面，但一直打聽不到他的消息。

本世紀初，打聽到他在西北。我到西安去，在陝西省電力局工作的同學說，陝西肯定沒有這個人。後來我到甘肅去，找到在甘肅省電力局任教育處長的校友，他幫我找到了張純球，張在甘肅平涼電廠，離蘭州幾百公里。他當即給電廠打電話，想叫張純球到蘭州來，事不湊巧，張出差了，要幾天纔能回廠，我祇好作罷。這是我平生的憾事之一。此書在做最後修訂時，張純球從北京打來電話，他是從他的同班同學蔣繼清處得知我在找他，並從蔣那裏知道了我的電話號碼。他在電話裏說他一生平安，一直在平涼電廠工作，現已退休，到北京看望孩子，不日回平涼。聽到我受處分不理解，他說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沒有理由處分我，並說一定安排時間到武漢看我。我十分高興，期待這一天早日到來。

### (三) 關於幹部問題

從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到二月底，湖北省、武漢市的主要領導幹



部，都集中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

一九六七年四月，在造反派遭到武漢軍區領導人鎮壓的形勢下，水院老院長、黨委書記張如屏亮相，支持造反派，反對武漢軍區領導人鎮壓群眾運動。對這兩件事，我應該有所交待。

### 1. 省、市委主要領導幹部在紅水院的日子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階段，造反派（主要是二司、工總）把以張體學為首的省、市委主要領導幹部控制起來，集中安排在這兩個組織的辦公所在地——紅樓居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任重被揪回武漢，也安排在紅樓，由各大系統輪流批判。各組織、各單位之間，經常發生“搶人”事件，在紅樓居住不安全。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王任重先轉到水院居住，接着張體學、姜一、趙修、韓寧夫、張旺午、王海山、李衍授、宋侃夫、劉惠農、陳扶生、史子榮、張華等二十多人，也都到了水院，集中住在行政大樓，由井岡山兵團的余傑華等幾個人看管，負責他們的生活、安全，陪同他們到外單位接受批判。

他們來之前我不知道，來了以後，丁家顯告訴我，要我配合安排好他們的生活。他說，這批人一方面要接受群眾的批判、接受教育，也要組織他們學習，互相揭發批判。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表現中發現願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的革命幹部，為“三結合”準備條件。

我聽了以後感到革命小將們成熟了，做今天的事想到明天，這是令人高興的。

我領命到他們住地去過兩次，主要看生活上需要解決什麼問題，到教工食堂談過他們的吃飯問題。住宿條件不太好，除王任重、張體學有床以外，其他領導都是地鋪，房間裏有火爐，保證暖和。每餐三個菜，飯菜由教工食堂送到住地。因為保密的原因，儘量不讓他們在群眾場合露面。有病時，王、張二人由衛生科派醫生出診，其他人有人陪同到校醫院看病開藥。

到外單位去接受批判，必須由二司司令部開條子，沒有條子是不放人的。有時身體不好也不放。各單位來人，由余傑華接待，安排去

的時間。外單位的人不能事先與被批判者聯繫，也不知道他們關在何處。這樣做主要是為了保密。

余傑華對他們一視同仁，很關心他們的健康，如果有病，就不同意放人。如有一次長辦聯司要批判王海山、李衍授，他們身體不好，來人即使有二司司令部的批條，余傑華也不放人，並做來人的思想工作。對王任重也是如此，王任重在接受批判時常被打，余傑華發現王任重每次接受批判，總愛穿一件新的軍大衣，便建議他不要穿新的，換件舊的。他聽了余的建議，此後就沒有挨打。每次批判會上，經常有人讓王任重低頭、坐飛機，余傑華就主動上去假裝按住王任重，實際上是扶住他。由于余傑華的悉心照顧，這些老同志在水院住得很安心，有吃有喝，沒有人來打擾，安靜，有病可以看病。所以他們感到很好，平時可以學習毛主席著作，可以交流對文革的看法。

文革結束後，余傑華的單位在審查他入黨時，發函向這些老同志調查，余傑華獲得了一致的好評，入了黨。如王任重的材料稱：“我感謝余傑華同志。”余傑華還經常到張體學等同志家裏去玩，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在省委領導同志集中住校期間，學校組織他們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主席著作，討論對文革的認識，聯繫實際，面對面揭露、批判王任重的錯誤。他們也有委屈，認為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副組長、中南局第一書記，是毛主席身邊的人，總以為他的話肯定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肯定是中央文革的意見，誰知道他的講話、指示、信件都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違背文化大革命要求的，結果讓大家都犯了錯誤，讓省委、市委都陷進去了。

通過學習、討論，面對面揭發批判，使這些老同志提高了認識，與造反派的對立情緒也緩解了，有的同志表示要與造反派戰鬥在一起，團結在一起。張體學的心情也好起來了，又開始談笑風生了。張華主動談了一些省委幹部及王任重的情況，對二司瞭解省、市委幹部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武漢軍區姚喆副司令帶着王任重的秘

書(姓喬)來水院,說接周總理指示,要接王任重去治病。小將們堅決按總理指示辦,把王任重交給了姚副司令(姚寫了條子:“接王任重到陸軍總醫院治病。”)。臨走時,余傑華告訴姚副司令,張體學也在這裏。三天后,喬秘書來水院,說奉總理指示,要將張體學送到北京去,我們也二話不說,把張體學交給了喬秘書。所以張體學對此一直心存感激。一九六八年六月我到省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拜訪張體學時,他還專門談到此事。

我們後來纔知道,要王任重看病,接張體學到北京,都是毛主席的指示,總理奉主席指示辦的。王任重在水院期間,給毛主席寫過幾次信,由中央文革記者站的記者和二司駐京聯絡站轉給中央,王的夫人也給毛主席寫信,說王任重身體不好,需要醫治。

毛主席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在王任重夫人給他的信上批示:“我意應說服紅衛兵,讓他就醫,紅衛兵需要,視病情許可,隨叫隨到。”二月十一日,周總理接見西安代表時講: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來,休養一個時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不見,昨天我纔給軍區下命令,限時找到,今天纔把人交出來。

我們不知道總理在十天之前就要人,我們是軍區一來人就交人的。

這中間有人在搗鬼,不按總理指示辦,反誣陷我們不交人,以便讓總理認為我們不聽招呼,搞無政府主義,其用心十分狠毒。

王任重、張體學走後,其他領導人也陸陸續續離開水院,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所有領導全部離開了。

當時中南局的李爾重此期間也住在我院,但他住在學生一舍的1108室。他怎麼來的,誰把他弄來的,又何時走的,我就不清楚了。

四月份,王任重被保守派搶走批判,二司組織力量把王搶回來,仍住我院六教學樓,二十多天后離開水院。

## 2. 張如屏在造反派處逆境時亮相

張如屏,安徽壽陽人,一九〇七年生,一九二五年八月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同年十一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懷疑張是共產黨而被捕入廣州南石頭監獄,受盡折磨,堅貞不屈,

沒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一九二九年底由壽縣老同盟會員李雨林保釋出獄。

他回到壽縣後，組織領導當地的游擊鬥爭，曾任游擊大隊政委、區委書記等職。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抗大學習，學習結束，黨中央組織部長陳雲親自找他談話，派他回安徽開展敵後抗日鬥爭，任安徽工委組織部長。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在指揮攻打鳳陽縣城的戰鬥中負傷，董必武派人送他到武漢治傷，八月，奉周恩來指示，送他到延安繼續治療。一九三九年他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一九四一年一月調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任組織部幹部科科長，部長是胡耀邦。一九四二年，調任晉綏軍分區武委會副主任。一九四五年秋，他奉命赴東北，十二月任吉黑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一九四七年九月任合江省委秘書長兼社會部部長，張聞天為省委書記。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奉命組織南下工作團，任支隊長、政委，到江西後，任省委委員、宜春地委書記。一九五二年調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人事部第一副部長，一九五三年任中南行政委員會民政局局長。一九五四年經國務院任命為武漢水利學院院長、黨委第一書記，一九五八年當選為湖北省委委員。一九六七年九月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九年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書記，一九八一年增選為全國五屆政協常委。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在北戴河因病逝世，享年 76 歲。

老院長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上半生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反動統治而戰鬥，歷盡苦難，五次負重傷，下半生為培養新中國的建設人才而努力奮鬥。

文化大革命中，初期執行省委、王任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運動，隨着運動的深入，他認識到了問題所在，毅然改正錯誤，在造反派處于困難時期，在武漢軍區領導人高壓政策下，他不畏強暴，公開表態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他譴責武漢軍區少數領導人鎮壓學生運動，表明了自己的高風亮節，說明他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幹部、好戰士！

他不僅言論上支持造反派的鬥爭，行動上也有積極的表現。一



九六七年五月中旬，他親臨武漢市公安局前新公校的絕食鬥爭現場，看望與慰問參加絕食鬥爭的革命小將，並捐獻糧票和款項。他的行動，給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二司戰士以巨大的鼓舞。在湖北、武漢，張如屏有很大的影響，特別在幹部隊伍中更是這樣。

對於老院長支持造反派的行動，我十分高興，也不感意外。因為在他明確表態以前，我們有過多次交談。我感到他對我並不反感，對造反派也不反感，而對王任重、張體學却頗有微詞。對武漢軍區介入地方支左後的所作所為，他從看不懂到反感，最後表示反對，這個過程大約經歷了四個多月的時間，對老院長來講，肯定也是一個痛苦的煎熬的過程，我是深有體會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我決定公開支持造反派之前，到老院長住所找他，這是我第一次到老院長家裏去，有些膽怯，是鼓足勇氣去的，也是瞞着團委的同志去的，怕他們反對。我去的目的，也和找張蕪承副書記談話相似。

我談了對學校黨委在文革中所犯錯誤的看法，告訴他我準備站出來支持造反派。他聽後並不驚訝，淡淡地說，黨委是按省委指示辦的，一九五七年的影響太深，是我們犯錯誤的重要原因。另外，文化革命怎麼搞，的確不清楚，現在這樣搞法，與過去任何一次政治運動不同，所以不理解。你看各校的領導都一樣，要說錯，都犯了一樣的錯。他說着苦笑了一下。關於我要站出來支持造反派的問題，他說，站在我的立場上，我不好表態，不能說反對，也不能說支持，因為我也不清楚這樣做到底對不對，你自己決定，認准了就去做，不要有什麼包袱。但是作為一個幹部，一個共產黨員，任何時候要有黨性，不做壞事，不害人，要做對學校、對群眾有利的事。

我認為，老院長講的是真話、大實話。臨走時，他送我到院子門口。第一次和老院長交談，感到他平易近人、親切，不做作，不講套話。我不由想起與張蕪承副書記談話的情景，感覺與這次談話截然不同，因而對老院長有一種親近感。

此後，凡得到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傳單、消息，我都會上山去（老

院長住在小山坡上，到他那裏去都說是上山)對他講，把資料給他，有時也介紹一下武漢的形勢。

武漢軍區“二一八聲明”後，我到山上與老院長討論形勢，他總的看法是造反派的“二八聲明”有缺點錯誤，被軍區某些人抓了辮子，但軍區的做法也太過分了，動用解放軍武裝示威，飛機撒傳單，這種做法是異乎尋常的，是對敵鬥爭的態勢。

看得出來，老院長在為造反派擔心。軍區“三二一通告”出來後，取締工人總部，抓了那麼多人，老院長就氣憤了，認為軍區這樣做不對，說他們在犯我們犯過的錯誤。他們支左、軍管，權力更大，將來犯的錯誤也可能更大。

武漢測繪學院黨委書記毛遠耀是毛主席的堂侄，他與老院長熟悉，他們有聯繫，一起研討過文革形勢。兩人在武漢高校革命幹部聯絡站成立之前(四月中旬)公開發表聲明，表示反對武漢軍區個別領導人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的行徑，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

小將們熱烈歡迎，到處都是“熱烈歡迎老院長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堅決支持張院長的革命行動”等大字報、大標語。張院長在此時此刻站出來，對水院的造反派是極大的支持，而對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則是沉重的打擊與震懾，水院在二月逆流中沒有反復，與張院長此舉不無關聯。

張如屏的亮相，在丁家顯為首的井岡山“高級群眾”圈裏的反映並不熱烈，和我們團委造反時他們那種興高采烈的情景形成一定的落差。

我也不好問，祇感到有點奇怪。自我解釋為運動初期以張院長為首的院領導給了他們太多的苦難，還沒有解氣。

後來在成立革委會時，他們對張如屏任革委會副主任也不積極，顯得無可奈何，直到一九六八年校內兩派鬥爭爆發，闖派(丁家顯派)把張如屏打成叛徒，我纔意識到他們從一開始就對張如屏不信任，認為張的歷史有問題。

我不知道丁家顯等人是從哪兒瞭解的情況，于是我就通過有關

人員去瞭解丁家顯怎麼會有這樣的認識，結果得知是張體學告訴丁家顯他們的。張如屏是叛徒一說，其源蓋出于此。

這一消息我從胡厚民處得到了證實。胡厚民說，“張體學向丁家顯布置要抓張如屏叛徒時我在場。”後來余傑華也告訴我，張體學在水院居住期間（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二月）曾3次講張如屏是叛徒，要我們整他（指張如屏）。

由此可見文化大革命的複雜程度，背後有人挑動，就會引起群眾組織之間或組織內部兩部分群眾之間的鬥爭，就會把陣綫搞亂。

後來我問過老院長兩個問題，一是關於叛徒問題，二是關於張體學幾次三番要整張如屏（文革初期在體育場開大會，張體學省長作報告就說過：你們學校領導中有沒有走資派？有沒有叛徒？有沒有蛻化變質分子？大家都應該去查一查。我當時就感到有所指）到底為什麼？

對此，老院長都作了具體的答復。關於第一個問題，他說，一九四一年中央社會部（康生任部長）截收到國民黨特務機關發出的一份電報，得知特務機關派到解放區的人有張如屏等十餘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他進行了審查，審查中沒有發現任何問題。組織部長陳雲親自找他談話，說明了審查情況，說組織上對他是信任的，以後再也沒有談起過這件事。說到第二個問題，老院長笑了，說這要去問體學同志，他平時叫我張大哥，好像很尊重我，他不會這麼幹吧。我說，我已瞭解證實，確實是他讓丁家顯幹的。他仍半信半疑地說：“我就是省委開會時，對省委工作提點意見，對體學同志也提過意見，別的沒有什麼。”他仍然有些不相信張體學會給他潑髒水。

從老院長亮相後，我們的接觸就多起來了，我有些想不通的問題，總向他請教。我把關心老院長的健康與安全作為自己應負的責任。這樣的老同志，全國已經沒有多少了，文革後一定要安全地、健康地將他交給黨。

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六月，在武漢軍區領導的支持下，百萬雄師對造反派進行武力清除，全市武鬥四起。百萬雄師除了打殺造反派外，

還到處抓支持造反派的幹部。

為了老院長的安全，我安排他七月中旬從武漢出發，走九江經上海轉道到北京，直到武漢安全了纔接他回來。

在水院兩派鬥爭中，他被打成我派的黑後臺、叛徒。有人要他承認我是舊黨委派到造反派中的內奸，他堅稱沒有這回事。後來有人又逼迫張荊承副書記交待此事，張副書記也拒不承認。

軍、工宣隊進院，我被審查，被打成“五一六”骨幹分子，張如屏同志被當成走資派批鬥、監督勞動。但我們彼此瞭解、信任，都不去相信某些領導的講話，有機會就在一起交流。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又被審查，打成“三種人”，批、鬥、抄家、監督勞動，老院長又走上了領導崗位。但他對我並不另眼相看，我們有機會還是一起交流，他多次留我吃飯。我們無話不談，成了忘年交。

省委領導幾次找我談話，要安排我的工作，我都拒絕了。我希望離開水院回到北京母校，老院長隨我的意，不強留我。當我告訴他，焦德秀部長問我為什麼非走不可時，我講了兩條理由，其中一條是有關張荊承副書記的。他聽後對我說：“建成啊，你太年輕了，對高級幹部的政治生活不瞭解，這樣要惹禍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在他去北戴河休養前一天，要其夫人陶靜冰主任找我。我與院長談了整整一個下午，從他來學校的情況談起，說到文革及文革後，說到對一些幹部的看法。他教育我，將來無論在哪里工作，都要堅持黨性原則。在說到張荊承時，他說：“你們的看法是對的（指我、陳傳綱、黃鳳林曾對老院長說過：你對張荊承的看法是不對的），他現在大權在握，把我也放在眼裏了。我幾次請他來談學校的情況，他都說忙。有一次我連打幾個電話請他來，他來後也不坐，說要開會，敷衍了十來分鐘就走了。我要他抓緊時間解決你的問題，以便早日安排工作，他要我不要管這件事。看來你的問題在學校解決有難度，等我休養回來後，我會到部裏去一趟，談一下你的事，回武漢，我會找省委去談，你不要着急。”在我起身告別時，老院長痛心地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看錯了張荊承。”



老院長的此次談話竟成了他留給我的遺言，我向他告別也成了訣別。老院長逝世的消息傳來，我痛徹心肺、欲哭無淚。但我在被審查期間，不能堂而皇之到靈堂拜祭，因為會碰到很多老院長的生前友好，都是高級幹部，多有不便。我祇好在一切結束後去看望他的親屬，表示慰問。我也不能去參加老院長的追悼會，因為我沒有資格（追悼會是省裏組織的）。老院長若地下有靈，定會原諒我的“不敬”，因為我身不由己，我想老院長會理解我的苦衷，會諒解我的無奈。

#### (四) “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發生的武漢“七二〇”事件是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轉捩點。

##### 1. 黨中央、毛主席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的戰略部署

根據徐海亮著《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的記載，以及我的親身經歷，排列毛主席、周總理到武漢後的活動日程及武漢每天發生的情況，就能具體地透視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七月十三日

毛主席召集中央軍委和文革小組成員開會，宣布要南巡，就地解決武漢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會上沒有具體討論武漢文革中的問題，也未作什麼結論。這次毛主席南巡的安排與歷次不同，一是陸、海、空三軍首長同行，由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負責；二是汪東興布置要多帶警衛部隊，並提出要有為了保衛毛主席的安全不惜流血犧牲的充分準備。足見這次南巡非同尋常，有可能遇到艱難與危險。

當晚，周總理給在四川解決文化大革命問題的謝富治副總理打電話，要他和中央文革的王力、余立金（空軍政委）及北航紅旗小將十四日必須趕到武漢，執行任務。

七月十四日

凌晨 2 時半，周總理、李作鵬（時任海軍政委）離京飛武漢，由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政委蕭前接機。總理指定劉豐負責保衛中央首長的安全，由劉豐通知陳再道到武空與周總理見面。隨後周總理到

東湖賓館親自安排、檢查、布置保安和接待工作，把賓館職工中百萬雄師的人換成了另一派的人，把賓館內梅嶺一號、二號的警衛部隊換成中央警衛團的部隊。可見周總理對武漢情況非常瞭解，一開始就把陳再道和百萬雄師、8201 部隊排除在接待、保衛毛主席的任務之外。

中午，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北航小將井岡山、尹聚平、胡慧娟以及文革小組工作人員張根成、記者吳介之等一行到達武漢王家墩機場，李作鵬接機。到東湖賓館後，周總理立即召見，告訴他們，主席今晚到武漢，叫他們來主要是協助保衛毛主席的安全。總理還說，武漢駐軍過去是謝富治指揮的部隊。

毛主席當晚到達武漢，同來的有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等。

當晚 10 點多鐘，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及有關人員到湖北大學看大字報，湖大學生認出謝、王二人，一下子就傳開了：毛主席派人來了！次日全市都知道北京來人了。總理據此作了臨機處置，說：“這也有好處，群眾不再猜為什麼東湖賓館的燈亮了。現在就說謝、王、余來了，可以掩護主席。”并當即親自布置正式通知軍區支左辦公室，請他們發通知。

七月十五日

上午，毛主席在東湖賓館聽取華北、西南、中南情況的彙報。下午，周總理在東湖賓館百花一號召集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到會者近 30 人，聽取武漢軍區有關文革情況的彙報。晚上，謝、王、余等到華中工學院看大字報，并在該院電影場向師生員工發表講話，謝、王兩人講話要點有二，一是要文鬥，拆除工事，群眾離開據點回單位去，收繳武器，立即停止武鬥；二是要求大家坐下來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文化大革命現階段的一系列政策，保證四大民主能夠正常地進行，使得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前進。

是日，謝、王、余到武漢的消息已在武漢三鎮傳開。

在漢口武勝路一帶百萬雄師與造反派的游行隊伍發生武鬥，百萬雄師精銳的“雷達兵”、“閃電兵”、“霸王鞭”、“翻江龍”、“鐵臂搖”等專業武鬥隊均投入了戰鬥，據王紹光《理性與瘋狂》一書介紹，此次武鬥中造反派死 10 人、重傷 37 人、輕傷 80 人。

七月十六日

上午，周總理向毛主席彙報，毛主席指示工總要平反，所抓頭頭要釋放。下午，總理繼續主持軍區黨委擴大會議聽彙報，傳達主席指示，做軍區主要領導的思想工作。軍區政委鍾漢華後來在檢查中說：在十五、十六兩日的彙報中，中央首長的插話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心不死，又把後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要中央聽聽下面的意見，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陳再道後來回憶說：“彙報的第二天，我和鍾漢華商量，認為他們（指周總理等中央首長）是帶着框框下來的，解決武漢問題的盤子早已經定好了，彙不彙報都是一個樣。”可見陳、鍾此時的情緒是抵觸的。

深夜，謝、王、余等到礄口區 3506 工廠（軍需工廠）百萬雄師聯絡總站，做百萬雄師頭頭的工作，要求他們：一、立即停止武鬥；二、停止煽動性宣傳；三、撤除所有的工事；四、不准使用交通、生產工具；五、不准挑動農民進城；六、不准攔車，所有崗哨必須撤除；七、保證不同觀點的人有“四大”權利。百萬雄師頭頭稱：“叫我們單方面回去，等于叫我們投降，舉手投降的事我們不幹！各群眾組織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團也平等對待。”雙方話不投機，會見僅二十多分鐘就結束了。

這天，二司、三新、三司革聯組織了渡長江活動，然後在漢口舉行了游行，受到漢口市民的熱烈歡迎。這是自六月下旬造反派被趕出漢口後首次在漢口的大規模游行，場面的熱烈讓人感動。很多人熱淚盈眶，游行隊伍經過水塔時，百萬雄師的高音喇叭也高呼“向二司的革命小將學習”、“向紅水院革命小將學習”等口號。那天我們很擔心會出現百萬雄師的襲擊，但一切順利。後來瞭解到，因“七一五”武

鬥，百萬雄師受到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的“批評”，要他們停止武裝衝突，以創造良好的氣氛向中央代表團彙報情況，解決問題。

百萬雄師在武漢三鎮刷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強烈要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

七月十七日

上午，毛主席聽取彙報，研究武漢問題，毛主席指明了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對於群眾組織，毛主席說：“湖北有可能要先進些。‘三新’、‘二司’，你壓嗎？越壓越成鋼了。對工總那麼整，不商量，就是有問題嘛！整工人造反派，就是有意識搞的。工人總部要平反，沒有放的頭頭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對‘百萬雄師’繼續保持名稱，做工作，進行教育，可以轉過來，搞入正軌。三派要達成協定，發表個聲明。”對於武漢軍區，毛主席說：“起草一個稿子，發表一個聲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錯。凡是有錯誤，不管是大錯誤還是小錯誤，祇要承認了錯誤，統統不打倒。承認錯誤了，再打倒，那就是他們的錯誤了。陳再道祇要承認錯誤，打倒也不行，我們是來給他保駕的。”

按照毛主席的方針，軍區領導、百萬雄師轉彎子，承認錯誤，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武漢軍區、陳再道繼續領導武漢地區的文革運動，三派群眾組織（“三鋼”、“三新”、百萬雄師）搞個協議，發表個聲明（我個人理解應該是關於停止武鬥方面的聲明）。這裏的關鍵是陳再道與武漢軍區要承認錯誤，轉彎子，然後做好百萬雄師的工作，沒有這個前提，一切都談不上。

根據毛主席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周總理在下午繼續主持召開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繼續聽取彙報，繼續做武漢軍區主要領導人員的工作。陳再道說：“開了幾天會，總理講了，不是真通。……總認為他們看到那方面，沒有看到這方面，沒有看到全面。”鍾漢華問陳再道，我們怎麼彙報？誰去講？陳說，你去講，還要堅決，不能動搖。在總理提出一些與軍區彙報材料不同的情況時，陳再道對總理說：“你們調查嘛！”當總理拿出武漢市人武部關於從廠礦調工人集中訓練搞武鬥的文件時，巴方廷回答，這個文件是假的，並拿出了鑒定報告，



頂撞、欺騙總理，沒有一點改正錯誤的誠意。

凌晨 1 時，謝、王、余等到武漢測繪學院鋼二司司令部，與二司小將見面，同時要鋼工總、鋼九一三的人也一起參加會見。他們首先談了在華工談過的兩個問題，即一是停止武鬥、封存武器、撤除工事；二是坐下來學習，學習中央文件及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接着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對於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是反動組織，也要做深入細緻的工作。”

我認為，主席的這一指示針對性很強，中央代表團到湖大、華工、武測，目的很明確，要造反派高姿態，採取主動，停止武鬥，學習政策和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提高政策水準，為解決武漢問題做好準備，特別是在中央對武漢問題表態後要正確對待武漢軍區領導及百萬雄師的廣大群眾。也就是總理講的，中央表態後，造反派可能會報復百萬雄師，這方面的工作由中央來做。所以直到十七日前，周總理、謝副總理、王力等一方面在做武漢軍區、8201 部隊、百萬雄師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做三新、三鋼、三司革聯的工作。

七月十八日

武漢軍區召開軍區二級部部長以上幹部會議，由周恩來總理作總結報告，講了湖北的形勢、文革發展歷程、各群眾組織的情況以及“二八聲明”、“一·二六”奪權、軍區“二一八聲明”、“三二一通告”、“六四公告”等問題後，講了八條結論性意見：

(1) 武漢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責任由陳、鍾負，建議進行自我批評；

(2) 工人總部要平反，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要釋放。工總、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

(3) 凡群眾組織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

(4) 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復，這個工作中中央幫助來做；

(5) 紅三司是傾向保守派一邊的群眾組織；

(6)軍區要作農民的工作，不要進城來參加武鬥；

(7)軍區要作好部隊教育工作，教育下屬單位支持造反派，長期的影響，不做這工作是不行的；

(8)所有群眾組織要整風。

總理最後講，軍區錯誤改了就好了，對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總理的講話內容是經過毛主席審閱批准的，周總理就解決武漢問題的講話是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當時陳再道并不知道毛主席就在武漢。他聽後，情緒極端激動，把軍區整的工人總部的材料給總理，并要總理去調查，說讓他支持三鋼、三新、三司革聯是想不通的。他還說毛主席早就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軍區戰士的大多數、群眾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說：“周鬍子，你有什麼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他指着總理講稿說：“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總理也拍着桌子說：你不要以為我們拿你沒有辦法。

這個會開了一天，晚上8時，周總理帶陳再道、鍾漢華見毛主席，主席親自給他們做工作，讓他們回到革命路綫上來。周總理在主席接見陳、鍾完畢，于23點半離漢返京。

送走總理後，謝副總理和王力、余立金、劉豐、蕭前及北航革命小將等人到紅水院，謝、王在接見群眾時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周總理再三交待武漢軍區領導，他的講話不要向下傳達。但鍾漢華同意8201部隊蔡炳臣政委立即將會議內容傳達到團以上幹部，引起8201部隊幹部的思想混亂和不滿，用鍾漢華自己的話說：“這是‘七二〇’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

七月十九日

下午3時到晚上，在軍區小禮堂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由謝富治傳達總理講話，王力講文革的理論問題，陳再道、鍾漢華作檢查，會議開了近9個小時。在王力講話時，8201部隊師長牛懷龍要求發言，

被制止，牛退出會場，後蔡炳臣政委亦離開會場。

周總理講話內容已在 8201 部隊傳開，並由此波及地方，特別是百萬雄師。下午，部分指戰員到軍區大院造反，要求澄清總理講話。百萬雄師主要領導人從獨立師得知毛主席、周總理都在武漢，試圖找毛、周說理。他們與 8201 部隊中一些人在武漢鐵路局和軍區討論，並決定揪鬥王力，組織衝擊東湖賓館。

軍區師以上幹部會結束，鍾漢華又一次違反規定，要蔡炳臣快向下傳達，分秒必爭，擴大到排以上幹部、支左人員。鍾漢華後來說：“這是‘七二〇’反革命暴亂爆發點的第二把火。”由於陳、鍾等人長期在部隊和百萬雄師中灌輸錯誤思想，在沒有做好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宣布為工總平反、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三鋼和三新是革命組織及大聯合以三鋼和三新為核心、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等四點結論，很多人一時無法接受，情緒激動，“七二〇”事件的發生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說：“七二〇”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王力在紅水院講話錄音在武漢街頭播放後造成的。這是無稽之談。第一，在王力到紅水院講話之前，8201 部隊、百萬雄師，也包括陳、鍾、牛、蔡、巴等各級部隊領導，對中央代表團已表示不滿，百萬雄師在武漢三鎮刷了很多標語，陳再道公然頂撞周總理並拍桌子威脅總理；第二，王力講話中沒有講上述四點。然而“七二〇”事件中，8201 部隊、百萬雄師上街武裝游行，衝擊東湖賓館，揪鬥王力，要質問的就是上述四點結論。

當晚湧向軍區大院的人越來越多，百萬雄師成立了“專揪王力指揮部”，謝敏華（百萬雄師頭頭之一）任指揮長，楊以才（省直聯司頭頭）任副指揮長，指揮部地點設在武漢鐵路局七樓。

武漢空軍採取了措施，調動部隊，加強了機場警衛力量。

七月二十日

零點 30 分，武昌公安局何××、劉××等 14 人首先衝擊東湖賓館北門，高喊“我們要謝富治、王力接見”。軍區保衛科王振英科長帶人攔住，相持不下。

3 點左右，8199 部隊政委張昭劍帶一個排進駐東湖賓館保衛中

央首長。

4 點多，謝富治決定叫陳再道、鍾漢華到東湖賓館，陳一進門就說：“靠你們做工作囉，我是無能為力了。”

5 點 40 分，從賓館西門沖進一批百萬雄師人員，他們上身赤膊、下身短褲、大口罩蒙臉，手裏拿着長矛，叫喊要王、謝出來。謝副總理同意接見，後到外面草坪上坐下談話。緊接着，沖進來一批端着衝鋒槍的 8201 部隊的軍人，槍口直對着謝、王等人，有人沖進王力房間搶材料。沖到草坪的人首先碰到陳再道，誤以為是王力，揮拳就打。陳大叫：“我是陳再道，不是王力。”軍人將王力抓來毆打，并毒打中央代表團的張根成及北航小將。張昭劍接到電話，迅速趕來，肋骨也被打斷。王力等人被架上車，車隊向軍區開去，時間是七月二十日上午 7 點 20 分。

早上 5 點半以後，已經有幾十車人沖進了賓館，有百萬雄師的、有 8201 部隊的、也有軍隊院校的，秩序非常混亂。而毛主席就住在鬧事區的邊上。陳、鍾在現場，不去制止，反而講“我是沒有辦法啦！”他們一點不為毛主席的安危着想，喪心病狂。

王力被押到軍區二號樓三樓 46 號房間，受到圍攻、批鬥，王力始終按中央精神回答問題，又一次遭到毆打。

鍾漢華見此狀痛哭，并磕頭勸阻，說：“你們這是幹什麼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都無效。

毛主席得知王力被綁架，責令陳再道、鍾漢華放人，并負責把王力找回來。下午 3 點左右，在孔慶德副司令員、張昭劍等策劃下，王力獲救，被護送到 8199 師部。王力多處受傷，腿骨被打斷。

上午 10 點以後，武漢三鎮有各種車輛幾百輛上街，其中軍車上百輛、消防車 27 輛、改裝的裝甲車 10 輛。車上 8201 官兵全副武裝，百萬雄師人員則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武裝游行示威，高呼口號：“四點指示是大毒草”、“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斃余立金”、“打倒王力”、“王力從中央文革滾出去”、“王力滾出武漢”、“毛主席不要受王力蒙蔽”、“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



撮混蛋”、“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等。車隊經過湖北大學時，一軍官開槍，部分車輛沖進校園，毆打學生，重傷 3 人，死 1 人。游行示威在三鎮延續一整天。

中央得到了武漢事變消息，林彪、周總理召開會議，決定周總理再次赴漢處理，重中之重是確保毛主席的安全。

下午 3 點左右，總理從北京起飛，原計劃停王家墩機場，軍區領導接到總理要來武漢的通知，組織了 25 車的 8201 部隊官兵及百萬雄師群眾，沖進機場，說是歡迎，實質是要扣留總理，逼迫中央改變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

陳再道得知總理要來武漢的消息後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麼樣？還不是與王力一樣。”

據此，劉豐立即報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吳立即通知機組改道在山坡機場降落。

5 點到山坡機場。天黑以後，總理換便服、戴墨鏡乘車到東湖賓館。

在周總理的精心安排下，二十一日凌晨 2 點，毛主席安全抵達王家墩機場。連日奔波的總理這時纔鬆了一口氣，中央代表團的同志也都放下了心裏的一塊大石頭。

七月二十一日

上午 9 點以後，毛主席乘專機離開王家墩機場赴上海，陪同主席到上海的有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等。這是毛主席建國以來第一次被逼離開他的住地，中央規定主席出行不坐飛機後被逼第一次坐飛機，他很生氣，說自己住到賊窩去了。

周總理完成主席轉移後，就安排平息事件的工作，由三軍首長分別與所屬在漢單位做工作，以穩定局勢。

東海艦隊過境部隊發表《嚴正聲明》說，我東海艦隊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反革命暴亂！

下午 2 時，劉豐在 8199 部隊師部找到王力，總理聽後說：“謝天謝地。”周總理與中央代表團全體成員一起吃了晚飯，決定立即返回

北京，王力從 8199 部隊出發，中央代表團從東湖賓館出發，兩路人馬“化妝”後，打着百萬雄師的旗子，闖過百萬雄師設立的層層關卡，順利到達山坡機場。總理到山坡機場後，就問：“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見到王力後，二人緊緊握手，總理抱住王力，抱了又抱，激動地說：“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

上午百萬雄師在 3506 工廠開會，研究奪權。俞文斌（百萬雄師一號頭頭）說：“昨天王力一講，使我們很被動，我們要變被動為主動，我們醞釀了一下，打算奪省、市委的權。”

下午，百萬雄師組織力量控制武漢的水陸交通，防止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決武漢問題。

這一天武漢形勢依然緊張。在武漢造反派的根據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武漢大學、武漢測繪學院、華中師範學院等幾所高校，由于百萬雄師揚言準備進攻，為避免造成人員傷亡，各總部均疏散師生員工，未離校人員很多晚上就在山上過夜（各校附近均有山）。

七月二十二日

凌晨 5 點，中央代表團專機從山坡機場轉飛到漢口王家墩機場。上午總理在機場召集軍區的葉明、孔慶德，武漢空軍的劉豐及 8199 部隊領導、北京來漢人員開會，部署武漢的工作。

令葉明、孔慶德住到 8199 師部，主持武漢軍區的工作，轉告陳再道、鍾漢華“趕快表態，爭取主動”。

總理要空軍立即調部隊進駐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武漢大學、武漢測繪學院、華中師範學院等院校保護革命小將。

關於武漢問題，毛主席作了許多考慮，主張總理及中央代表團“還是早點離開（武漢）好。”“若總理、軍區負責人、群眾代表談，談不成可能被包圍，還是早離開好。談不攏，會提什麼條件？人扣在那裏強迫簽字，讓承認他們是革命組織。現在不僅是武漢的問題，是全國的問題。”“這類事情已有了幾個軍區——青海、內蒙、四川。同時，還有許多軍區處于湖北的狀態——江西、湖南、河南……軍隊要來一個分化……”主席想到武漢事件牽扯面相當大，影響南京軍區、福州軍

區，他主張武漢問題按軍區領導犯錯誤來處理，他知道如果陳再道有什麼決心，自己和周總理、王力也出不來，可見陳並沒有下過死命令。王力在他的“反思錄”中說，主席後來冷靜時，作出了新的分析，認為武漢“七二〇事件”“不過是要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

北京在林彪主持下，制定了具體措施。第一步，以中央名義調陳再道、鍾漢華進京；第二步，起草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第三步，北京開百萬人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回京，全國各地集會、游行，聲援武漢。毛主席通過汪東興指示：陳（再道）是蠢人，頭腦簡單，思想反動，離開（指主席自己）以後，北京採取的措施是對的。

下午中央代表團飛回北京，總理讓代表團專機先走，他處理一些問題後也乘專機回京。為了親自迎接中央代表團，讓代表團專機在機場上空盤旋。5 點左右，總理專機到達北京西苑機場後，代表團專機纔降落，總理等中央領導熱烈歡迎代表團平安回到北京，到西苑機場迎接中央代表團的有好幾萬人。

百萬雄師繼續游行示威，出動車輛約 1500 輛。軍區支左辦公室及 8201 部隊準備有關材料，以便到北京談判用。8201 部隊政委蔡炳臣說：群眾發動起來了，迫使武漢軍區檢查公告不能發表，創造了以三新二司為一方、軍隊和百萬雄師為另一方去北京談判的條件。到北京談判沒有材料是不行的，要求下屬在 5 天之內，最好在 3 天之內搞一個響當當、硬梆梆的材料。

武漢周邊部隊調動在進行中，主要是空 15 軍和 8199 部隊。

七月二十三日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上廣播了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受到中央領導及北京各界群眾熱烈歡迎的消息。武漢全城輿論大嘩，造反派奔相走告，紛紛從避難處所返回原單位。有的地方刷出了“公雞下蛋了，工總翻案了”的大標語。

空 15 軍和 8199 部隊開始控制武漢市主要制高點，控制城市交通要道及重要機關、單位。

總理指名的幾所高校由 15 軍負責，凌晨全部到位。

中央給武漢軍區來電，令陳再道、鍾漢華、傅傳作、劉豐、吳世安、周志剛、趙蘭田、溫錫、張緒、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等 12 人于 23 日或 24 日到京。

8201 指戰員、百萬雄師群眾思想混亂，有些 8201 戰士公開向市民謝罪。

七月二十四日

凌晨，陳再道、鍾漢華一行飛抵北京，在京西賓館受到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衝擊。

中央文革碰頭會決定，25 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大會（百萬人大會），聲援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歡迎謝、王回京。康生傳達毛主席指示：同意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百萬雄師’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一小撮壞頭頭”的提法。毛主席對汪東興說，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間，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在“七二〇”事件上所採取的一切措施。他還要楊成武回北京轉告陳再道三句話：一是有錯誤就檢查，二是注意學習，三是注意安全。

百萬雄師頭頭開會，決定武器不上交，組織不散，如果抓百萬雄師的人，加倍還擊。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他們認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受了蒙蔽，祇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沒有公開表明觀點，百萬雄師就不投降、不散。

白天，百萬雄師出動百餘輛卡車上街游行，呼喊“打倒陳再道”、“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的口號。晚上，百萬雄師一萬多人攻打武漢體育學院，體院革命派固守行政大樓，用訓練用的假手榴彈威嚇對方，用 38 支小口徑步槍阻擊，打死百萬雄師 1 人，百萬雄師久攻不克。駐武漢大學的部隊聞訊趕到，制止了一場屠殺。

七月二十五日

駐漢三軍指戰員佩戴各造反派組織的袖章，乘坐幾百輛軍車在武漢三鎮示威，呼喊：“向三鋼、三新、三司革聯學習”、“向三鋼、三新、三司革聯致敬”、“打倒陳再道”等口號，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長了



革命派的志氣。

晚上，三鋼、三新、三司革聯、外地來漢造反派及解放軍指戰員三萬多人在武漢測繪學院操場集會，憤怒聲討陳再道。

毛主席親擬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武漢部隊）公告可以發表；對於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祇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過彎來；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機報復；要警惕壞人搗亂，不許破壞社會秩序。

毛主席還審定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該信於七月二十七日正式發表）。武漢部隊“公告”中將“七二〇”事件稱為“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中央來信高度讚揚武漢造反派：“你們為着保衛毛主席親自領導、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出非常巨大的業績”。“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塗地”。“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開始了”。

下午，首都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回到北京”大會，林彪親自主持，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全數參加大會，聲勢浩大，聲援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聲討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林彪本來不想參加的，後又決定參加，打電話給中央文革小組：“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會，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覺得參加利多。”

七月二十五日北京百萬人大會，確實如林彪所說，增加了左派的威力，向右派示威，加速了右派的瓦解。“七二〇”後，全國軍民天天

游行示威(武漢也一樣),支持武漢的革命派,聲討陳再道。林彪主持的首都百萬人大會,也就對武漢“七二〇”事件公開表了態。百萬雄師的失敗已無話可說,他們中的骨幹分子及在武鬥中傷人、殺人者害怕報復,撤至郊區,後又逃到地縣,這也是百萬雄師總部在解散前的安排。百萬雄師的十三個頭頭,從七月二十七日開始,陸續被逮捕。

## 2. 武漢“七二〇”事件中的紅水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我院在武漢三鎮的宣傳陣地已全部撤除,我們的主要任務已轉入準備迎敵,搞防禦方案,準備防禦工事及武器;同時廣泛瞭解武漢文革情況,及時向北京反映,瞭解中央文革對武漢問題的態度,瞭解百萬雄師的動向,特別注意他們何時進攻武昌的幾所高校。

我們的動態組人數多(有兵團動態組、教工動態組、總部作戰部直屬動態組),力量強,從北京到武漢發生的事件,能夠立即匯集到總部。這期間,動態組人員冒着酷暑、冒着生命危險,活動在各個地方,包括百萬雄師的地盤。

我從七月上旬開始,已經日夜在總部堅守。七月十四日,謝副總理、王力到湖北大學看大字報,與新湖大學生接觸,我們當晚就知道了。

在總部的人聽到這一消息,着實興奮了一陣,我也將此消息告訴了山上(井岡山兵團所在地在六教學樓的頂端,丁家顯在校時,大部分時間在井岡山兵團,所以我們要與丁家顯聯繫,就說與山上聯繫)。

當時我們的感覺是中央派他們來瞭解情況,準備解決問題,認為武漢問題已經排上了中央的議事日程。這對長期處於武漢軍區及百萬雄師高壓下、處於武鬥威脅下的造反派來講,絕對是個好消息。

對於為什麼第一訪問地是湖北大學,也有議論,有的認為可能是中央文革重視新派;有的則說,湖北大學受了攻擊,死傷3人,所以先去瞭解武鬥情況。

總之,在總部的學生既興奮,又猜不透中央的精神,更不知道毛主席、周總理已經到了武漢,而且要就地解決武漢問題。謝、王十五日到新華工,十七日凌晨到武漢測繪學院,傳來的消息都是談要停止

武鬥，撤除工事、封存武器；第二是要學習中央政策與毛主席著作。

我當時的想法是，中央首先是解決武鬥問題，通過學習，大家冷靜下來，再到北京去談（許多省都是到北京去談的），認為摸到了一些脈搏。同時，我們從沒有挑起武鬥，從未去進攻百萬雄師，我們祇做了一些防禦的準備，防備百萬雄師的突然襲擊。到十七日，我們還看不出中央文革對各派的態度。但思想上確信是支持我們的，工總肯定會翻案。

這一時期，我們主要是準備迎敵，等待中央文革公開表態。十七日二司司令部通知封存長矛等武器，創造和平氣氛迎接中央解決武漢問題。

七月十九日凌晨，大約1點左右，我和王新民正在總部與同學們談天，突然湧進來很多人，大多數穿着軍裝，領他們到總部來的同學把謝富治副總理引導到我和王新民面前，說謝副總理、王力同志來看我們了；又指着我們對謝副總理講，這是我們的頭。我與謝握手，他又介紹了王力、余立金、劉豐、蕭前等人。我請他們坐下，並叫辦公室的同學電話通知丁家顯過來。我向謝副總理講了武漢的武鬥情況，說我們學院沒有學生死亡，但被打傷了7個人，現在嚴菊明、鍾光超等還在醫院，並帶他們看了傷者留在總部的血衣。

謝副總理說，首先要制止武鬥，這是不允許的。把工人集中起來搞武鬥，更是不允許的。看完血衣我準備繼續談我院的情況時，丁家顯帶着工總、九一三的人來了，後面跟了很多學生、工人，一下子把總部堵得水泄不通。我怕首長受到擠壓就去維持秩序。丁家顯與首長們談了些什麼，我沒有聽見。

後來首長同意接見大家並講話，廣播台立即廣播通知，大家一聽是謝副總理、王力同志來院接見大家並講話，已經睡覺的師生潮水般湧向體育館。加上工總、九一三的人，體育館根本容納不下。丁家顯和王新民陪着謝、王等去體育館，我已渾身濕透、精疲力竭，沒有力氣擠進體育館，就躺在體育場地上聽他們講話。聽到不斷地傳出暴風雨般的掌聲，具體內容聽不清。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謝富治(中)代表中央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對武漢文革表態,右為鋼二司副司令丁家顯

會見結束後,我回到總部向在裏邊聽的同學打聽首長的講話內容,他們說總的印象是支持造反派的,態度很明確。特別是王力講話,把我們稱為戰友,說武漢有一支鋼鐵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說毛主席、中央文革是支持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這一稱謂在當時實際上就是指革命造反派。

對於謝、王提出的無產階級祇有解放全人類纔能最後解放自己,要團結大多數,以及不要打擊報復等內容則議論不多。

十九日,謝副總理、王力、劉豐等在紅水院接見三鋼革命群眾大會上的講話錄音,在紅水院反復播放,省直紅司的人也在社會上播放了,影響很大。

我們不知道從十五日到十八日,總理主持召開了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并于十八日作總結講話,明確了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與政策,引起部隊一些人的反彈。

十九日一天沒有什麼新的資訊傳來,造反派在等待着中央的正式表態。傍晚時分,動態組的同志打回電話,說有情況,看到百萬雄師及部隊開着車到軍區大院,他們不敢進去,大院裏人很多,進進出出,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我要他們繼續觀察,晚上 11 點左右,又一動態組成員反映,看到百萬雄師的人向東湖賓館方向去了,通往賓館的路被百萬雄師的人控制了。這時我感到可能真有事情要發生。首



先想到他們可能要控制中央代表團，不讓造反派接近，以便向代表團灌輸他們的觀點。但我相信中央代表團是不會偏信他們的。

二十日上午9時左右，動態組李家沛同學從軍區趕回學校向總部報告，王力被抓了，在軍區大院批鬥，院內都是8201和百萬雄師的人，造反派的人一旦被查出就遭到毒打。李家沛是帶着百萬雄師的袖章進去的，沒有人認識他，他就混到樓前看到了王力挨打、挨批鬥的場面。得到這個消息，我們大吃一驚，斷定發生了大事。

快10點時，中央代表團成員、北航紅旗尹聚平到了總部，邊哭邊向我們講述從昨晚起到今天早晨所發生的事情。她是今天早晨7點多一起被抓上車的，送到軍區大院去。由于百萬雄師的人抓到了王力，都興高采烈，一路高呼口號，尹聚平也跟着喊口號，所以車上的人對她不在意了，在一個路口停車，她就乘機跳下車，跑到路邊一戶人家裏。女主人熱情地接待了她，她先喝了水，然後問女主人到紅水院怎麼走。雖然尹聚平十九日晨到過紅水院，但不知道怎麼走。女主人給她畫了路綫圖，她一路問一路走，將近10點纔找到我們。她哭得很傷心，主要擔心王力、張根成的安危。尹聚平通過我們總機與北航的韓愛晶通了電話，報告了武漢的情況。我們也立即向北京聯絡站通報了武漢的情況。

周總理的聯絡員（對外稱記者）姚克強于十九日晚住到我院，他剛從北京回來，百萬雄師到記者站抓人，他就到我院來住。我們把他安排在馮國棟教授家裏，馮教授愛人馮笑梅是堅定的造反派，住她家很安全。他來後給了一個電話號碼，要我們安排專綫，保證隨時能通電話。作戰部長王紹良與總機房聯繫，告訴總機房與電信局的聯繫方法，要求隨時保持暢通。

姚克強立即向北京作了報告。二十日上午10點以後，有3個電話從紅水院打到北京，及時向中央提供了“七二〇”事件的情況。

以後幾天，我們不斷地向北京報告情況。二十一日上午，中央代表團成員、北航紅旗的胡慧娟也來到了紅水院，與尹聚平匯合，我們派人把她們送到東湖賓館。

二十一日得到情報，百萬雄師要來攻打武昌幾個大學，徹底消滅造反派據點。總部開會決定疏散，並且立即進行。會上決定，除留200名護校人員，廣播台、總機房、司機房、食堂留必要的人外，行政人員、教工、學生都走，無處可去的人，可以躲到珞珈山上去。

我留下值班，開始大家不同意，認為沒有必要冒險。我堅持留下，我認為我走了，如學校發生不測，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我不好向師生員工交待。如果我在護校中犧牲了，證明我盡了自己的責任，所以這個責任我必須負。最後他們也同意我留下了。考慮到聯繫時需保密，丁家顯、我、王新民編了代號，分別為001、002、003，他們二人指定專人與我聯繫。

經過緊急動員，任務很快落實了，留下的同志都有一些悲壯的感覺，為革命事業獻身的時間到了，大家很鎮定。

進紅水院的路都設置了障礙，安排了觀察哨，我自然仍然在總部，晚上住到教師孫沛華家，他家人已疏散，從教工7舍到12舍十分安靜，似乎祇有我們二人。我一早起來，四處巡查，沒有發現異常。

二十二日一天在緊張中度過，動態組不斷發來電話通報，8201部隊、百萬雄師武裝游行，消防車、改制的裝甲車、軍用卡車、戰備卡車都出來了。解放軍都是槍上刺刀，頭戴鋼盔，車頂上架設機槍。百萬雄師則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殺氣騰騰。

我們聽後更為緊張，我定時和二司武漢大學總部聯絡，詢問武大方向有何動向。他們回答沒事，我心裏稍微鬆快一些。就這樣，在忐忑不安中，在不斷與外面通話中度過了白天。一到晚上，以前熱鬧、歡騰的校園變得死一樣的沉寂、恐怖，校園中除巡邏隊外，見不到人，所有的房子都是黑洞洞的，沒有一點光亮，更沒有生氣。我們又在這種恐怖的、提心吊膽的情況下熬過一個晚上。

二十三日凌晨，我在總部（這晚我沒有到孫沛華家住），有同學帶着幾個解放軍同志進來，一位軍人自我介紹：“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7252部隊團長岳祿佐，奉周總理命令率部隊到紅水院保護革命小將。”

在恐怖和絕望中來了救命恩人，你會有什麼感覺？沒有經歷過

的人也許理解不了，在場的學生和我都哭了起來。我緊緊地握着岳團長的手，一邊流着淚，一邊訴說我們的遭遇和感受，感謝親人解放軍來保護我們。

我通知廣播台，打開廣播，報告喜訊，通知大家到行政大樓前歡迎解放軍。岳團長說當務之急是要熟悉學校地形，控制制高點，並說百萬雄師可能隨時會來進攻。

我陪岳團長到行政大樓前，留校師生已經在與部隊同志握手、交談，很多同學都在哭。這些自願留下護校、準備犧牲的男子漢，怎麼都如此脆弱呢？這是激動、感激、宣泄！沒有如此經歷的人是不會理解的。

我陪岳團長到學校各處瞭解地形地貌以及建築結構，決定在行政大樓、圖書館、六教學樓以及學生二舍樓頂上架設機槍。有了安全保障的師生們，二十三日晚上睡了個好覺。

二十五日首都百萬人大會召開，二十六日早上廣播後，武漢問題也就明朗了。外出避難的師生紛紛返校，學校又呈現出歡騰與生氣。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潮到來了。

## 五、“七二〇”後的幾件事

### （一）“八一”渡江事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為了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武漢地區和外地來漢的造反派與駐漢部隊一起，組織渡長江活動，盛況空前，參加此次渡江的人數據稱在五萬以上。由於至今仍然沒有查明的原因，造成死亡一百餘人的慘案。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參加渡江的有二百多人，犧牲 15 人。他們是：尚全勝（六四四五班），陳大珍（女，六五九二班），鄧貴喜（六二三一班），曾冬仙（女，六三四五班），林和倫（女，六一七五班），王家椿（六一〇四班），陶世譚（六二七二班），魏吉皆（六二七二班），黃文傑（六一〇三班），楊玉潔（女，六三四五班），譚志彪（六三三一班），曾邦

齊(六二八一班),左可仁(六二三一班)。彭伏秋(女,洪山中學初三學生),李蘭(女,洪山中學初二學生)。彭、李二位中學生參加了紅水院“紅旗”兵團,所以隨水院同學一起渡江。

由于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貢獻突出,加上游泳技術過硬,此前在渡江活動中多次擔任儀仗隊,所以此次渡江活動指揮部仍然指定紅水院人組成儀仗隊,紅水院女子民兵排 35 人為儀仗隊後的“紅燈照”方隊,排在渡江大軍的最前面。他們被後面的混亂隊伍擠壓下水,是被壓死踩死的。紅水院成為此次慘案中的重災戶。

那天我在總部,帶隊的是總部勤務組的副組長王新民。大約在下午 1 點鐘,我接到王新民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出事了。他說渡江秩序十分混亂,我們的同學被擠壓下水,各自過江。他在後面,沒有下水,不知道其他人的情況,現正在江邊守候。

我聽後,感到可能會有嚴重的事情發生,叫張純球到外面看看,有渡江同學回來立即告訴我。

下午 3 點多鐘,同學們陸續返校,我們立即按參加渡江人員名單逐個核對。到晚上 8 點鐘,仍有一些同學沒有返校。

我感到問題嚴重。總部開會,聽取了王新民的彙報,大家認為至今未回的同學,除了兩個中學生外,都是外地人,渡江結束後應該返回學校,因此發生不測的可能性比較大,決定由王紹良組織人到江邊守候、打撈。王新民也要去,因他一整天參與渡江活動,身心俱疲,我勸他不去,他非要去不可,說他責無旁貸。

此事報告給駐軍首長,岳團長決定派一個班保護前去,由高排長帶領。隨即乘車到渡江出發地——武昌大橋頭。

晚上 12 點左右,王紹良來電話,已有屍體浮出江面,并打撈上幾具屍體,穿着印有“紅水院”字樣的背心(男)或汗衫(女)的,能夠確認是我們的同學,但面目難以辨認。之後陸續通報,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到天亮時,我院犧牲的人數已增加到 10 人以上。到八月二日中午以前,增加到 14 人,但我們核對名單確定未歸人數為 15 人,還差 1 人。直到下午,下游報告,發現一具穿着“紅水院”背心的屍體,我



們立即派車去辨認并運回。這時，失蹤人數與屍體數相符。

我們將屍體送往武昌殯儀館，通知死者家屬來院處理後事。總部成立了治喪委員會，丁家顯任組長，進行治喪與處理後事的工作。丁家顯、王新民面見武漢軍區領導，要求他們徹查此事，嚴懲肇事者。

我的任務主要是接待親屬并做好工作。

在我接待的家屬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林和倫的哥哥和鄧貴喜的母親，他們都心痛欲絕地向我訴說林、鄧二位逝者的種種優點和家人對他們的期望，邊說邊哭，有時我也跟着流淚。

林和倫的大哥，年紀四十左右，號啕大哭。林和倫是家裏的小女兒，從小乖巧，學習優秀，很得家人，特別是父母的疼愛，如沒有文化大革命，應該于一九六六年七月畢業，父母期盼女兒能回到上海工作。此次遇難的消息如果告訴父母，他們會受不了，回去不知該怎麼向父母講。

我擔任過電力系的分團委書記，和林和倫是老鄉，林又是學生中的積極分子，所以和林和倫很熟悉，有過多次交流。他哥哥的訴說、痛哭，我也隨之動容流淚。

八月二日家屬開始到校，八月七日陸續離去，我一直處于痛苦之中，精神壓力大，治喪結束，我已經身心俱疲。

八月六日，我校在體育館莊重地舉行了追悼大會，沉痛哀悼在八一渡江慘案中犧牲的 15 名戰士。

來自武漢市及全國各地的革命派戰友及解放軍官兵六千余人參加了追悼會，丁家顯致悼詞，各方代表講話，追悼會隆重莊嚴。12 點半，紅水院戰士捧着戰友的遺像，抬着花圈，高舉挽聯，冒着酷暑，徒步前往長江大橋橋頭，到戰友殉難地致哀，外單位革命派及解放軍官兵一同前往。

中央文革曾有指示，要徹底查清慘案原因，但最後却不了了之，也無人過問這件事，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中一樁懸案。當時普遍認為是有人故意搗亂，而組織工作及現場指揮的混亂是造成慘案的主要原因。

根據《紅水院》報記者的調查及當事人的回憶，此案疑點很多，綜合如下：

(1) 渡江人員龐雜，這次渡江人員計劃為五萬人，是武漢市自有群眾性渡江活動以來從未有過的。這麼大的渡江隊伍，沒有嚴格的審查，沒有嚴密的組織，不少渡江人員是看到海報后自行前來的。

當時的形勢是，“七二〇”剛過，造反派興高采烈，百萬雄師中不少人不服，部隊中也有不少人沒有轉過彎子來，在這種情況下，渡江組織者（主要是部隊幹部）如此放鬆警惕是不合情理的。

(2) 渡江指揮部決定，在渡江前開誓師大會。在研究確定大會會場時，大多數與會者主張在武昌體育場開會，然後列隊到武昌橋頭下水，這樣不會引起渡江下水處的混亂。如把會址設在渡江下水處，則渡江的五萬多人與觀看的群眾擠在一起，容易引起擁擠，造成下水的混亂。

但個別負責人決定將會場設在渡江下水處，又沒有嚴密的組織工作，發生下水處的擁擠與混亂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

(3) 渡江指揮部決定從八月一日早上4點開始戒嚴，却到5點多鐘纔開始，而且戒嚴隊伍人員很少，根本控制不了人員的自由進入。

在戒嚴隊伍到來之前，場內已聚集了不少人，這些人是別有用心還是熱心的觀眾，誰也講不清楚。

(4) 渡江隊伍進入渡江人員集結區域，原規定要報到簽名的，但渡江指揮部突然改變決定，宣布不需要報到簽名了。

當天到底哪些單位、多少人進入了集結區域，無人知曉，事後調查也沒有任何依據。

(5) 紅水院游泳健兒在渡江隊伍的最前面，離江水最近。到達不久，突然湧進一批身穿黃背心的人，擠在儀仗隊和“紅燈照”隊的旁邊，儀仗隊和女子民兵排被擠到了下水處最後的臺階上。

在這危急關頭，現場指揮的負責人用報話機與渡江指揮部聯繫，要求整頓紀律，規定下水隊伍的順序，建議寧可推遲下水時間，也要整好隊伍，維持好秩序，否則就要出問題。

這一合理建議被渡江指揮部負責人拒絕，在現場混亂不堪的情

況下，却發出了下水渡江的信號彈。接着有人喊“冲啊”，大批人群向前湧，冲向臺階，儀仗隊及女子民兵排被紛紛推入江中，後面的人不斷地向他們的頭頂上踩去。

在這種情況下，現場指揮向渡江總指揮彙報情況時，這位總指揮指示“不要停止下水，繼續渡江”。

從上述疑點可以看出，渡江組織者一開始就沒有認真地組織此次規模超前的渡江活動，為別有用心的勢力製造事端創造了極為方便、有利的條件。從渡江當日的安排，到發生混亂前後，總指揮的態度似乎是有意推動事態向釀成慘禍方向發展。

我們不知道當時負責此事調查的有關當局是如何調查的，是如何向中央交待的，但一直沒有給武漢人民一個明確的交待。

我院死了 15 人，從沒有人來調查過，也沒接到過調查結果。

本來我們準備為 15 位戰友建立一個紀念碑，碑址選在八教學樓東側（現高壓大廳處），基礎已打好。後來軍宣隊、工宣隊進院，在第二任指揮長樊馬義的指揮下，把紀念碑的基礎炸掉了。

這就是渡江慘案的結論。我憤慨！我悲痛！然而却無可奈何。

## （二）“八一〇”大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晚，在我院體育場召開了一個“全國支持武漢，武漢怎麼辦？”的大會，除本地造反派，全國各地在漢的造反派也參加了會，人數據說上萬。

這次大會的組織者是鋼工總“五湖四海兵團”和我院井岡山兵團的某些人。紅水院總部沒有正式討論過，我事前不知道，也沒有參與此次大會的任何組織工作。實際上，我此時仍處於“八一”渡江慘案的悲痛之中。

八月十日那天晚上，沒有人通知我參加大會，我和總部的李秀英及張純球在總部辦公室。

大會結束後，王紹良（總部作戰部長）回到總部，說了一些會場上的情況。他告訴我們，大會是他主持的，參加的人很多，發言的人談

了關於“全國支持武漢，武漢怎麼辦”的問題。據說這個問題是中央文革的林傑提出來的。會上的傾向性意見是武漢的造反派翻身以後，應該去支持那些仍然受到壓迫的造反派戰友。

我當時對王紹良講，你不該去參加，更不該主持這個會，因為組織這個會議的不是總部，我們對有些情況又不清楚。王紹良當時說，他是被×××拉去主持的，講稿是×××給他的（×××是總部的作戰部副部長，井岡山兵團參與此次大會的組織者）。

在我的思想上，既不是司令部下達的任務，又沒有經過總部討論，一個兵團的某些人與校外人員組織如此規模的大會，題目又是如此之大，尺度是很難把握的，我們就不該參與。

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亂軍”大會的真相。

“八一〇”大會到底是如何提議的？目的何在？真正的組織者是誰？我至今不清楚，可是在整我的時候，說這個會是丁家顯和我策劃組織的，成為我反軍亂軍的罪狀之一。既然由我策劃組織，我却不參加會，還批評王紹良去參加主持這個會，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丁家顯去了沒有我也不清楚，他沒有在會上講話，這是事實。根據我對丁家顯的瞭解，如果是他組織的會，他一定會去參加，也一定會講話的，所以我估計他也沒有參加這個會。那麼，兩個策劃組織者都不參加會，怎麼說得通呢？

### （三）關於“搶槍”問題

“八一〇”大會後不久，二司司令部開會，傳達中央關於武裝左派的指示，商討各總部分別到武漢各區武裝部接管武器的問題。

我記不起來是誰到司令部開的會，在總部會上，傳達了有關內容，其要點是：毛主席、中央文革提出要武裝左派。北京已經行動了，謝富治給北航紅旗發了兩千支槍。要保衛勝利果實，防止階級敵人的反撲，必須要武裝左派。司令部分配給我總部的任務是接管漢陽區人民武裝部的武器裝備。

經過討論，決定由我和王新民、趙三其帶人去。我們立即組織人



員(主要是紅旗兵團的人)乘卡車前往。那是八月的一天,大約 10 點多鐘到漢陽區人民武裝部,但武器已被其他單位拿走。我即電話向總部彙報,又給司令部打電話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接電話的人回答:你們先回去,司令部正在想辦法,如搞到了武器,會分一部分給你們的。我和王新民、趙三其商量,先讓人和車回校,我們帶張純球等幾個同學和一輛車到漢口看看形勢。我們先到水塔看大字報,大多是揭發批判市人武部指揮百萬雄師武力鎮壓造反派。

下午 1 點左右到市人武部,發現人很多,進進出出。由于“七二〇”事件,市人武部已成為被重點衝擊單位,各處均已零亂不堪。看到一人武部幹部被打得頭破血流,躺在牆角處呻吟,沒有人管。我覺得這樣對待解放軍是錯誤的,就讓兩個同學送他到醫院去治療。

我們走出市人武部的時候,看見有幾人拉着一位人武部幹部,問他人武部的武器放在哪里,那幹部講,人武部的武器早給人拿走了,人武部確實沒有武器了。他問那幾個人是哪個組織的,答“是九一三的”。那幹部說,你們可以到漢陽赫山武器庫看看,那裏可能還有武器。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決定由王新民帶車跟九一三的人走,同時立即電話向總部通報了情況。我和趙三其、張純球等 6 時左右回到學校,聽說武器已經運回來了。有一千多枝槍和很多子彈,都放到了院人武部武器庫,門口由解放軍把守。

後來聽王新民說,他們跟九一三的人到赫山武器庫,已經有人在搬武器了,他們也裝了一車回來。王紹良說,接到我們的電話後,總部開會研究決定去試試。與駐軍首長岳團長商量,為確保安全派一個班的武裝解放軍同車前往。我們準備出發時,王新民回來了,他告訴我們行車路線。在那裏,武器很多,由管倉庫的人指引搬運。回校後,由解放軍負責看管、維護,我認為這很好。經岳團長同意,給勤務組成員每人發了一枝手槍、五發子彈。

槍枝經解放軍檢驗維護後,組織全院師生進行軍訓,由部隊組織實施,教官認真負責,學員嚴守紀律,刻苦訓練。操場上整天口令聲、步伐聲、歌聲不斷,雖然天氣炎熱,紅水院人不怕苦不怕累,按照教官

的要求，一絲不苟地進行訓練。這樣的組織紀律性，這樣的精神狀態，讓駐院官兵很感動。新華社記者來院採訪，拍了師生軍訓的照片，并發了通訊，在《人民日報》頭版進行了專題報導。軍訓的最後一個訓練科目是實彈射擊，我們組織師生進行實彈打靶，每人打三發子彈，我第一次實彈射擊，打了二十七環。

中央“九五”命令下達後，武漢市警備區動員各單位上交武器。我院是全市第一個全數上交武器的單位。我們組織隊伍，敲鑼打鼓，一路步行到警備區。張緒司令員對此十分滿意，表揚紅水院的革命師生最聽毛主席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貢獻，這次執行中央“九五”命令又帶了個好頭。

以上就是所謂搶槍的全過程，這也成為了我反軍亂軍的罪狀之一。

#### (四) 關於到市人武部辦聯絡站問題

市人民武裝部幹部被打得頭破血流，倒在牆角處無人關注的一幕時刻在我腦海中出現。我感到“七二〇”以後，一部分造反派的報復心理既不利于文革的正常進行，也不利于部隊的穩定，對在“七二〇”前犯過錯誤的百萬雄師的廣大群眾、8201 部隊及人民武裝部的部分官兵轉變思想極為不利，而此時擔任武漢地區支左任務的部隊領導又顧及不到這些問題。

于是我就想到市人民武裝部辦個聯絡站，一方面組織官兵學習中央指示，提高認識，轉變思想，迅速取得原支左單位群眾的諒解，一方面要阻止毆打解放軍的行為。

我與趙三其(總部政治部長)交換意見後，他也同意，于是我們帶了幾個同學到市人民武裝部建立紅水院聯絡站。

我們去的時候，武漢市人民武裝部已有 8 個聯絡站了，包括文藝界的、中學生的、漢口高級步校的。由于紅水院在武漢地區的名聲，我們去後很快成為了“核心”，其他單位的聯絡站都主動來聯繫掛鉤，介紹情況。

第二天，武漢市人民武裝部的幹事許訓詞找到我們，主動介紹了

人武部在“七二〇”前支左的情況以及和百萬雄師的關係、內部人員組成、“七二〇”後人員的思想情況，並明確表示願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但不知怎麼做，找誰聯繫。與他有同樣想法的目前還有兩個人，有一位姓趙的同志，另一位記不起來了。

我認為這是好的開端，當即邀許訓詞等三位同志到聯絡站見面，希望他們公開表明態度（寫大字報），然後組織大家學習中央文件、《人民日報》社論，聯繫實際批判人武部領導的錯誤，教育官兵轉變心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要求他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等待。

第三天，開了一個人武部官兵的全體會議，各聯絡站的人也參加，許訓詞主持會，我講了一下形勢，要求人武部的同志自己解放自己，在學習、揭發、批判中轉變立場，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我建議由許訓詞等3人小組領導大家學習，內部揭發、批判，聯絡站的同志不干預。

這樣，在我們去人武部3天之後，人武部的活動有了組織，方向也比較明確了，大家也很高興，似乎有人管他們了。

當時社會上對百萬雄師中的一些人、對支左官兵進行揭批和清算，在學校不明顯，但在工廠比較厲害。一些不講政策的人往往拳腳相加，人武部直接支左的單位有五六個，支左人員不少，經常被叫回去接受批鬥，有的去了就挨打。本來這些同志已經知道自己錯了，學習也很認真，發言也很積極，但被工廠叫回去批鬥、挨打後，態度就消極了，許訓詞等同志感到很為難。

我們請其他聯絡站的負責人和市人武部領導小組成員一起研究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決定以市人武部領導小組及紅水院聯絡站的名義，邀請市人武部支左單位造反派負責人座談，這個座談會由許訓詞主持。座談的內容是：如何幫助市人武部官兵穩定情緒，投入到揭批陳再道及人武部主要領導巴方廷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來。座談會上我主要講了政策方面的問題，特別強調要學習，聯繫實際揭批，要穩定大家的情緒，讓大家感到我們的方向是一致的。各單位要

支左人員回去受教育，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反對，但又不能經常叫回去，這樣會影響人武部的正常學習與工作，對運動不利。

最後一致同意，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市人委禮堂，各人武部支左單位聯合召開一次批判資反路綫大會，市人武部全體參加，人武部領導及支左負責人接受批判教育。這次會議後各單位不得再讓支左人員到單位去受批判。

我認為此方案很好，既滿足了支左單位群眾的要求，又能使人武部的學習有序地進行，不受地方的干擾。最後我強調了會上要文鬥，不要武鬥，嚴禁打人，各單位的頭頭也表態同意。

我為了確保會場的秩序，防止武鬥的發生，八月二十五日，我從學校調來一百多人，乘兩輛卡車 8 點半準時到達會場，坐在前面。他們的任務是一旦發現有人武鬥，就呼口號：要文鬥，不要武鬥。如果臺上出現混亂（多人上去打人）立即上臺制止。

大會進行過程還算順利，多數人沒有動武，有兩個人動手，打了一位人武部的領導同志和領導小組的趙同志。我發現後立即上臺制止，台下“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後來再未發生武鬥。大會以後，各單位遵守了他們的口頭承諾，再沒有發生把支左人員叫回去批鬥的情況。

在聯絡站期間，高級步校聯絡站負責人白華甫（後調任恩施軍分區任參謀長）有一天找我，說人武部的資料管理人員找他，稱人武部存有與百萬雄師聯繫（包括電話聯繫）的記錄本，很多單位去要。他認為放在人武部不安全，希望轉到高級步校去。白華甫說，晚上轉移，希望得到我們的幫助，在轉移過程中如果有人要搶材料，希望我們幫助制止。我同意了，但在轉移過程中沒有發生搶材料的問題，我們也就沒有插手此事。

八月二十七日，負責武漢地區支左工作的 15 軍參謀長梁仁魁，到武漢市人民武裝部視察，聽取了領導小組的彙報，召開了人武部有關人員的座談會，瞭解到過去十來天發生的變化，很是滿意，專門來到紅水院聯絡站，當面向我們道謝，感謝我們在人武部所做的工作，



感謝我們在那種混亂的情況下，幫助穩定了部隊。我表示希望上級領導關心人武部的工作，人武部的同志都願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都是一些很好的同志。梁參謀長說前段時間顧不上，以後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梁參謀長來人武部，意味着上級領導已經關心人武部的工作了。人武部內部已經穩定了，我們來人武部的目的已經達到，我校在人武部的聯絡站于8月底前撤離回校。

我們在人武部的時間不到半個月，主要工作是穩定人員情緒，組織學習，阻止外部的亂揪亂鬥，成效是顯著的，得到了人武部內部人員的贊揚，也得到上級領導的表揚。

然而在抓“五一六”和文革結束後的所謂清查中，我在人武部的上述活動成了反軍亂軍的罪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 (五) 關於各地紅水院聯絡站問題

“七二〇”事件以後，湖北省各地、市、縣，全國各地許多城市出現了紅水院聯絡站，這些聯絡站紛紛來信來電，要求總部給他們寄有關資料，支持他們的工作。

這些聯絡站，並不是總部派出的，都是自發成立的，既不屬於哪個兵團，也不屬於總部。

聯絡站的成員很複雜，大部分屬於所謂逍遙派，一部分是屬於原保守派，還有少數造反派。這些學生和教工多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後，武漢形勢比較緊張時離開武漢返鄉的，分布在全國各地。

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中央表態後，各地都舉行集會支持武漢造反派。返回各地的武漢學生和教工都成了香餈餈，當地群眾請他們介紹武漢的情況，當地造反派要求他們支持。可這些回鄉學生和教工對武漢形勢的發展并不十分清楚，而且表態須得到總部的同意，所以紛紛來信來電請求總部承認他們的聯絡站，給他們寄資料。其中一些人原屬於“大學校”（保守派），對“大學校”已失去了信心，趁機轉向造反派，也積極地參與各地的紅水院聯絡站，這些情況是作戰部

長王紹良在總部會上彙報的，各地聯絡站來信來電的處理由作戰部負責。這些來電來信並沒有反映各地紅水院聯絡站發生衝擊軍隊和軍事機關的情況。

這就是“七二〇”事件後各地成立聯絡站的真相。

在清查“五一六”和清查“三種人”運動中，說我策劃組織了“八一〇”亂軍大會，會後派出大量人員到全國各地建立聯絡站，支持各地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掀起了亂軍的高潮。真是無稽之談。

## 六、成立紅水院革命委員會

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穩定局勢、建立新體制和新秩序的關鍵，也是深入進行鬥、批、改的關鍵。

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必要條件是：各群眾組織必須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幹部，這兩條在紅水院都是具備的。

紅水院的各個兵團都屬於總部統一領導，可以說是一統天下（當時內部沒有分裂）。院級革命幹部有張如屏（書記兼院長）、梁百樸（副院長），中層幹部有張建成、王紹良、劉庚申等。學院內的基本條件已滿足了建立革命委員會的要求。在客觀方面，由于紅水院在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社會各方特別是警備區、空司支左辦公室（此時是我院的上級領導）也要求我們儘快成立革委會。我們向警備區、空司支左辦公室、水電部寫了報告，并很快得到批復，同意成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命委員會。

接下來的事情是協商革命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任、主任的名單，這件事是籌備革命委會過程中最棘手的，它涉及各兵團的利益，即所謂權力分配。

本想按照巴黎公社的辦法進行群眾選舉，後來想到問題比較多，特別是涉及到哪些人有選舉及被選舉權的問題，如參加百萬雄師的人該不該有這個權利？還涉及到各兵團人數問題，如紅旗兵團的人數占了造反派學生總數的近一半，井岡山兵團則祇占 1/5 左右，如普

選的話，這些矛盾不好解決。在討論中有的主張大民主選舉（普選），有的反對，最後一致同意協商。

參加協商會的人除總部成員外，還擴大到各兵團的負責人。在討論委員條件時，強調對文化革命運動的貢獻，即所謂造反越早，貢獻越大，這按當時的情況原則上也是說得過去的，但這樣一來，把一些優秀的學生、幹部、教師、工人排除在外了（因為他們站過來的時間比較晚）。在討論到分配名額時，紅旗等兵團提出以人數比例分配，井岡山兵團堅決反對，最後同意以“基本公平，照顧歷史”的原則安排。以上這些問題的討論雖有分歧，有爭論，但最後“原則”上取得了一致。

真正的爭鬥是在哪些具體的人參加革命委員會的問題上，分歧很大。協商會的分歧很快擴展到群眾中去，這是文化革命中常見的，缺乏組織紀律，沒有保密觀念可言。大字報鋪天蓋地，對幹部和群眾代表的人選、對各兵團名額分配等發表不同的意見。祇看大字報的內容，就可以知道是哪個兵團的意見。

從一九六七年十月中旬到下旬的十來天裏，都在圍繞着革委會人選問題大討論、大辯論。

在幹部方面，一些人認為，張如屏有歷史問題，不能擔任革委會副主任，提出由梁百樸擔任。另一些人則認為，張如屏的歷史問題，已由中央作了結論，沒有問題，應該擔任副主任，並闡述了革命領導幹部擔任革委會領導的重要性，認為梁副院長雖然站出來較早，但無論從思想、理論水準，還是工作能力上看，均不宜擔任革委會的主要領導。

在委員條件上，井岡山兵團主張看貢獻，提出防止有人摘桃子；以紅旗兵團為首則提出革命不分先後，主要看他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是否得到群眾的擁護，提出革委會是全院師生員工的，不是哪個兵團、哪一家的。雙方的說法其實都有所指，沒有捅穿而已。這些提法、指責都成為日後派性鬥爭的內容。

經過十多天的爭論與協商，最後一致同意革委會委員 37 人，其中幹部 4 人，教職工 4 人，工人 2 人，學生 25 人，軍代表 2 人暫缺。

我記起來的名單如下：

學生委員 25 人：丁家顯、韓同良、侯建華、華勤堂、王文忠、唐學斌、彭年香、李鴻傑、伍必慧(女)、黃琦、余傑華、王傑生、周克強、龔解放(壽眉)(以上屬井岡山兵團，共 14 人)、王新民、黎良能、李德俊、賴文德、余振芳(以上屬紅旗兵團，共 5 人)、嚴菊明、何遠統、陳大鈞、李秀英(女)(以上屬八三一兵團，4 人)、趙三其(造反兵團，1 人)、胡延漢(三司革聯，1 人)。

幹部 4 人：張如屏、梁百樸、張建成、王紹良。

教職工 4 人：顏國良、章少強、陳鑑治、于文蘭(女)。

工人 2 人：熊德才、柯善交。

革委會常委 15 人(軍隊幹部 1 人，暫缺)：

丁家顯、韓同良、侯建華、華勤堂、王傑生(井岡山 5 人)，

王新民、李德俊、黎良能(紅旗兵團 3 人)，

趙三其(造反兵團 1 人)，

張如屏、張建成、梁百樸(革命幹部 3 人)，

顏國良(教師)，

熊德才(工人)。

革委會主任：丁家顯。

副主任：張如屏、張建成、韓同良、王新民(軍隊幹部暫缺)。

革委會組織機構：

辦公室：顏國良。

政工組：張建成(兼)、趙三其。

組織組：唐學斌。

宣傳組：華勤堂、陳伯強。

鬥、批、改辦公室：王新民(兼)、王紹良。

後勤組：梁百樸、于文蘭、熊德才。

革委會成員確定後，立即報送有關部門。空司支左辦公室主任武繼元(後任武漢軍區空軍司令員、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要我到他辦公室談情況，主要是談幹部問題。給我的感覺是，上面比較重視幹



部問題，而對學生委員則無所謂。談話結束，武主任問革委會什麼時候成立，我說如果支左辦公室同意，我們準備在十一月上旬成立。最後，武主任說，你們報的名單可以宣布，什麼時候開會告訴我們，我們要到會祝賀。

我一聽，知道上面同意了，回來就向丁家顯和勤務組彙報了情況，並決定在十一月九日開成立大會。當天，紅水院到處彩旗招展，鑼鼓喧天，來的人非常多，各級領導機關都派人來了，各群眾組織都派了代表，許多單位也來了人，水電部發來了賀電。會議隆重熱烈，這一天是紅水院的盛大節日。

在摧毀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上海出現一月風暴之後，武漢地區的造反派也曾嘗試過奪取省市大權。由於各個組織不顧全大局，都想在新政權中多取得一些席位，以便為本組織多取得一些利益，鞏固自己取得的“勝利成果”，不惜爭權奪利，明爭暗鬥，造成了奪權的失敗，引發了公開的派性鬥爭，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拉一派，打一派，各個擊破。這個教訓在“七二〇”後，被忘記了。

紅水院革委會的成立過程，再次說明了非無產階級思想一旦時機到來就會興風作浪。雖然各兵團出發點有所不同，有的爭席位為了取得更多的權力，認為祇有自己掌權纔是最可靠的，別人進入革委會是想摘桃子；有的認為祇有權力分散，不被一派所壟斷，纔能確保權力不被濫用，纔能保證新生政權的穩固，但從根本上來講，都認為祇有自己纔是最正確的，自己是最革命的。雖然當時沒有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局面，但後來證明，這種思想終究會發展到不惜分裂革命隊伍、勢不兩立的局面。

## 七、一九六八年的派性鬥爭

紅水院是造反派一統天下，丁家顯是紅水院的學生領袖，這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在紅水院沒有人想替代他成為領袖，他不僅在學校、在綱二司中享有威望，在中央也是掛了號的。周總理很關

心他，表揚他在武漢地區革命派大聯合中所起的良好作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張瑞瑾副院長在北京彙報葛洲壩建設工作時，周總理問張副院長：“小丁現在的情況怎麼樣？”應該說，在這種良好條件下，不該發生派性鬥爭。但事實是紅水院與武漢很多高校，與全國很多高校一樣，在取得文化革命初步勝利之後，造反派內部分裂成了勢不兩立的兩派。

水院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不久，兩派公開分裂鬥爭，一直延續到解放軍、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進駐學校為止。

我回顧與思考了水院派性鬥爭的由來與發展，分析了產生派性的根源以及派性鬥爭能否避免等問題，有些想通了，有些至今無解。

因為這個問題太複雜，“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毛澤東傳（1949——1976）》第 1431 頁]黨派之間的鬥爭，黨內的路綫鬥爭，不叫資產階級派性鬥爭，因為他們之間的政治觀點不同，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所以叫階級鬥爭。

第三世界國家擁戴我國進聯合國，聯合國開會的場面很像我們文革中兩派鬥爭的會場，但那是和帝國主義的鬥爭，所以也是階級鬥爭。其實也可以叫派性鬥爭，因為是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一派對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另一派的鬥爭。

在文革中的派性鬥爭被稱為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那就是兩派都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都是錯誤的。按毛主席關於派性的說法，“清一色是沒有的，世界上就沒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這種觀點就是派性。”（上書第 1513 頁）這裏講的派性應該是資產階級派性。

在文革中，造反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不應視為資產階級派性，因為他們之間的鬥爭是路綫鬥爭中出現的派別之爭，他們所代表的利益是不同的，所以當時中央支持造反派而不支持保守派。造反派內部的派別鬥爭則不同，他們雖然也有某些觀點上的不同，但採取了不是經過討論、辯論提高認識的方式，統一到毛澤東思想上來，統一到當

時中央的戰略部署上來，而是以唯我獨革的思想來壓垮對方，清除對方，因此往往採用不正確的方法，不顧大局，為了小團體的利益和一己私利，不惜破壞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破壞團結，破壞和干擾中央的戰略部署。這種鬥爭，沒有無產階級利益可言，成為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這種鬥爭，對人民沒有好處，對國家沒有好處，祇對階級敵人有好處，所以必須堅決反對。

紅水院一九六八年的兩派鬥爭，其發展軌迹與各地的派性鬥爭大同小異，從觀點的差異開始，接着懷疑對方的動機，然後不指名地批判對方的某些觀點和做法，進一步公開矛盾，拉隊伍對着幹，最後發展到公開分裂，給對方戴上各種帽子，指責對方有壞人操縱，打擊支持對方的幹部，將對方置于死地，為此不惜無中生有，造謠誣陷，甚至武鬥，兩派勢不兩立。

### (一) 派性鬥爭的由來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革命造反派，在衝擊資反路綫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組織，學生中有五個兵團，即井岡山兵團、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造反兵團和三司革聯。井岡山兵團中老造反派比較多，他們的能量比較大，政治敏感性較強，在相當長時間內，他們在紅水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起着主導的作用。八三一兵團、紅旗兵團中也集中了一批老造反派，他們人數較多，在運動中衝鋒陷陣，實際工作做得比較多，較能團結中間群眾。造反兵團和三司革聯則造反較晚，他們對瓦解原保守派組織起了很大作用，這部分人比較靠近紅旗和八三一兵團。紅教工兵團和工人兵團中一部分造反較早的人與岡山兵團聯繫較多，思想比較一致。這種情況，在文革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觀點與思想體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 1. 認識上的差異是派性鬥爭的思想基礎

井岡山兵團中有一批人被稱為“高級群眾”，他們中的多數人並沒有擔任什麼職務，然而都是井岡山的核心力量。他們努力學習，特別是學馬列原著，辯論時能說會道，引經據典，極具煽動力，寫文章時

筆鋒犀利，極具戰鬥力。在文革初期，他們起着組織者、戰鬥者的作用，在井岡山內部有很大的影響力，對丁家顯的影響更不可低估。他們經常在一起研究問題，分析討論形勢，然後寫文章，組織大字報，或進行辯論。他們與外界聯繫較廣，資訊多，所以在一段時間裏成為水院文革的帶頭羊，特別是在衝擊資反路綫的鬥爭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這過程中，他們形成了一個觀點，認為十七年裏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全面奪取黨、政、財、文大權，也就是後來在派性鬥爭中說的要改朝換代。從這種認識出發，他們總擔心隊伍中出機會主義者、摘桃子派，對幹部，對學生黨員、團幹部存有戒心，一直發展到“二代紅就是二代機(機會主義)”的論點，把大批與之共同戰鬥的戰友推到對立面。在校內如此，在社會上也同樣會產生這種效果。武漢地區一月奪權失敗，部分造反派組織發表“二八”聲明，把造反派中某些組織打成托派、右傾機會主義者、摘桃派，就是這種思想觀點的體現，“二八”聲明就是井岡山兵團的“高級群眾”分析了當時形勢後寫成的。

以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領導層為代表的多數師生，則認為十七年應該一分为二，毛主席革命路綫的正確領導是主導的，因而在各條戰綫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同時，劉、鄧路綫干擾了毛主席正確路綫的貫徹執行，在某些戰綫影響非常大，如文藝、教育、新聞出版等戰綫，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到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奪回被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分子竊取的部分權力，要在各方面清除劉、鄧資產階級路綫的影響，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能順暢地貫徹執行。因此，他們反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主張教育幹部，批判他們的錯誤，讓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同時要團結廣大群眾一道革命，這個觀點在水院的師生員工中占了大多數。

這兩種觀點的分歧，在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鬥爭中顯現不出來，各組織之間團結一致，互相配合，共同對敵。一旦資反路綫被擊



潰，各造反組織的對立面消失或暫時消失，觀點的分歧就會顯現出來。武漢地區的一月奪權、水院成立革委會過程中有關幹部的爭論、名額的爭論，都反映了這一點。

這兩種觀點的分歧，不僅在水院存在，在武漢地區造反派內部存在，在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中也都存在。客觀地說，我院井岡山一些人的觀點更符合當時的形勢及中央文革的要求。在清華大學團派和四一四派兩派鬥爭中、上海工總司與上柴聯司兩派的鬥爭中，中央文革的一些人是支持團派與工總司的，甚至支持他們用暴力摧毀對立面，這對在全國各地形成大規模的派性鬥爭及武鬥是有影響的。可以說，造反派內部認識上的差異是形成派性鬥爭的思想基礎。

## 2. 山頭的存在是派性鬥爭的組織基礎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的紅衛兵的興起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在衝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過程中，水院各種組織風起雲湧，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沒有統一的領導，各自為戰，班上幾個同學觀點相同就成立一個戰鬥隊，寫大字報，學習討論問題。隨着形勢的發展，造反派中有些人認為組織起來纔能更具戰鬥力，於是成立了兵團，兵團都是跨系的，原則是自願，你這個戰鬥隊參加哪個兵團，由戰鬥隊自行決定。兵團成立後，由兵團領導各戰鬥隊的工作，學校形成幾個兵團，各自獨立，不存在誰領導誰、誰大誰小的問題。以後武漢地區成立了二司，各校在二司司令部領導下進行鬥爭。為解決集中領導問題，校內各兵團聯合組成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總部設勤務組，對上接受二司司令部的領導，對下領導各兵團，各兵團為戰鬥與活動單位。形式上已經統一了，但原組織仍然存在，即山頭還在，領導人之間的某些分歧與矛盾很快會在本組織中傳播，各組織又往往把山頭利益放在不適當的位置，或沒有擺正本組織的位置，引起其他山頭的不滿等等，都會引發山頭之間的矛盾。

由于歷史原因，井岡山兵團中的“高級群眾”把自己的功勞看得多了一些，經常忽略了其他兵團的作用，總部指揮不了井岡山，井岡山可以獨自組織活動，老大味很濃，或叫做唯我獨左、唯我獨革。這

種情況，在衝擊資反路線後期已有反映，到“七二〇”後，表現更甚，其他兵團的領導人頗具微詞。丁家顯忙于司令部及社會上的活動，回來也多與他的“高級群眾”在一起，或是到總部開會，與普通的群眾、與其他兵團的負責人接觸、溝通越來越少，這在群眾中也有些微詞。其他兵團的領導，特別是紅旗兵團的領導認為自己造反也不晚，貢獻也不小，加上人多勢眾，反映出對井岡山不服氣、不滿意、不買賬的態度，這就是成立革委會之前的狀況。

我認為，這個階段祇是認識上的不同，在各群眾組織之間有些矛盾，這是正常現象，不屬於資產階級派性的範疇。但這些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決，任其發展，則成為資產階級派性鬥爭的根源與基礎。

不幸的是，這些矛盾在以後的日子裏引向了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時間長達半年之久。

## (二) 派性的發展與鬥爭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內部的兩派鬥爭經歷了三個階段。

### 1. 成立革委會的爭議，兩派矛盾表面化、公開化

兩派之間的分歧擺到桌面上來，並且陣綫清楚，是在成立革委會過程中。學生中以井岡山兵團為一方，以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造反兵團、三司革聯為一方，教工中造反較早的與井岡山兵團聯繫密切的人站在井岡山一邊，但人數不多，多數人站在紅旗兵團一方。爭論的焦點有兩個：一是幹部問題，張如屏能否結合，誰是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二是革委會中學生席位的分配問題。

井岡山方面認為，張如屏有歷史問題，不宜擔任主要領導職務；梁百樸副院長造反早，應該是我院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應該擔任主要領導職務。關於進革委會的學生代表，不應按兵團人數比例分配，而應該視其在文革中的表現，老造反派更有條件進入革委會，他們在文革中衝鋒陷陣，對文革有貢獻。

而以紅旗兵團為代表的一方認為，張如屏的歷史問題中央早已查清，已有結論，他一直是我院的一把手，所謂歷史問題是國民黨的

離間計，張如屏沒有什麼歷史問題，因此理所當然是我院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不僅能進革委會，而且要擔任主要領導。梁百樸可以結合，由于其自身條件，能力有限，所以不宜任主要領導。關於學生委員名額的分配，要公平，在不能普遍選舉的情況下，由各兵團推舉，而且各兵團分配的名額多少，既要考慮歷史情況（指造反先後的問題），也要考慮照顧面的問題。

爭論的最後，雙方各自作了讓步，井岡山兵團同意張如屏任革委會副主任，梁百樸任常委；紅旗等兵團對學生名額作出很大的讓步，在 25 個學生委員中，井岡山兵團有 14 人，占學生委員總數的 56%，而井岡山兵團的人數祇占各兵團總人數的 15% 以下。

在成立革委的過程中，兩派陣綫清楚，在協商爭論過程中，雙方都觀點明確，態度堅決。雙方在會上爭論，會外發動群眾支持自己的觀點，形成了會內、會外兩派鬥爭的局面。慶幸的是最後各自作了讓步，這也證明了雖然兩派的鬥爭存在，有時很激烈，但祇要處置得當，雙方以大局為重，各自退讓一步，矛盾是可以緩解和解決的。

## 2. “三反一粉碎”時兩派鬥爭升級

兩派鬥爭的升級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後，中央端出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發出了“三反一粉碎”的號召，即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粉碎右傾翻案風。中央發文件，報紙發社論，來勢很猛。

此時武漢地區的形勢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二月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我院丁家顯進入武漢市革命委員會任常委。在省市革委會成立前後，武漢軍區領導一再強調要反對資產階級派性，群眾組織要聯合，強調團結，抓革命，促生產，強調解放幹部，強調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批判資產階級派性，批判無政府主義。群眾組織的頭頭均進入省、市兩級革委會後，群眾組織已無用武之地，實際上已處于停頓狀態。

我院的形勢也是這樣，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成立革命委員會後，也強調了革委會的一元化領導，批評無政府主義，要求按班、系建

制進行學習、活動，提出復課鬧革命。不少班級開始上課，他們自選課目，自請教師上課，多數學生願意學習，老師也願意教書。有的專業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查，到工地、到電廠、到農村，為今後的教育革命作準備。同學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教育革命方面來，遠離了文革中形成的戰鬥隊、兵團。紅衛兵總部雖然仍存在，但已失去了昔日領導運動的地位，回歸到群眾組織的位置。

院革委會的工作人員多為原來各辦公室的幹部，學生中的革委會委員除了開會研究、決定問題時到行政大樓，平時沒有具體工作，就回到各系活動。以上這種形勢給人的感覺是文革結束了，一切又回到了老樣子。

革委會雖然結合了一些新人，但起主導作用的仍然是原來的老幹部，群眾代表僅是開開會，聽聽彙報，發揮不了他們原來設想的呼風喚雨的作用。特別是一批文革中的積極分子，沒有進入權力機構，回到班級感到不習慣與失落。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三反一粉碎”，一部分文革中的積極分子感到歡欣鼓舞，認為非常及時，非常必要。他們認為無論從武漢地區看，還是從學校情況看，自從大聯合、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出現種種倒退現象，特別是解放幹部後，讓幹部們抓工作，造反派靠邊站了，說明復辟回潮很嚴重。他們認為，中央所以提出“三反一粉碎”，說明了翻案風的形成，是因為革命隊伍中存在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在中央是楊、余、傅等人，地方單位也肯定有人。

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一些人討論形勢後認為，“三右”的代表人物就是張建成。

在革命委員會的學習會上，井岡山兵團的委員有計劃、有準備地發言，不指名地把矛頭指向張建成，把強調革委會一元化領導，提出復課鬧革命、回到班系鬧革命等都視為復辟回潮的表現。他們提出，革委會的權掌握在投機分子手中，群眾代表祇是擺設，因而得出結論：革委會的權不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紅旗等兵團的委員則針鋒相對，批駁對方的論點，認為堅持革委會一元化領導、復課鬧革命等提法是中央提出的，不是我們的創新。復課鬧革命，學生不回班級、不回各系去又怎麼復課？這些人認為，學校革委會的權掌握在革命派手裏，革命委員會好！好得很！

對方回應說：好個屁！

這就是以後好派、屁派的來歷。

可以看出，在第一個回合的較量中，井岡山一邊的委員是有準備的，有理論根據，有分析，上綱上綫，而紅旗一邊的委員是無準備的，談問題時就事論事，沒有從理論上闡明自己的觀點。革委會內部的爭論很快就擴散到群眾中，雙方就開始了有組織的爭論與鬥爭。

隨着兩派爭論和鬥爭的激化，井岡山人把對立面稱為小爬蟲，也叫“爬派”，而把自己這一派稱作“闖派”。而紅旗兵團把對立面稱為“屁派”，把自己稱為“好派”。

為記述方便，下面將兩派分別以“闖派”、“好派”相稱。

總括起來，“闖派”在闡述“三右”的種種表現及“三右”的根源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兩代紅就是兩代機”。什麼叫兩代紅？即文革前是紅人，文革中還是紅人，這種人就是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分裂主義者，他們在舊黨委時期，為了向上爬，巴結黨委的領導，做了很多壞事，他們不是為了革命事業，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是機會主義者。文革中，為了保自己，逃避群眾對他們的清算，也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打着造反的旗號，鑽進革命派隊伍，他們的目標同樣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這種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投降敵人，在革命派內部拉一派，打一派，搞分裂主義，必須把這種人清除出革命隊伍。

這個論點，觸怒了很多人，因為在造反派內部，尤其是在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造反兵團、三司革聯中，有不少學生黨員、團幹部、班幹部，在對方眼中都成了“兩代紅”，也就成了“兩代機”。

我相信“闖派”的這個論點，并非指一般的學生幹部，而是指張如屏、張建成、王紹良等人，但已陷入派性鬥爭的群眾就不這麼認為了。

“好派”對“闖派”也上綱上綫了，稱“闖派”的理論是極左的，他們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打着革命的旗號，實際上是搞無政府主義；在組織上則是山頭主義，唯我獨革、唯我獨左，以我為中心，搞山頭專政，破壞團結，破壞革命事業，如不回頭，會滑到革命的對立面上去。

可見雙方都認為自己是革命派，而對方則已滑到革命的對立面上去了。此階段，在廣播台及《紅水院》報的宣傳方面，“闖派”占優勢，因為他們掌握了這些宣傳工具；但在大字報方面，則“好派”占優勢，因為他們人多。這階段的鬥爭，屬口誅筆伐的文鬥。

### 3. 進入資產階級派性鬥爭階段

兩派鬥爭進入第三階段，成為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

資產階級派性鬥爭的特點是，不講理性，不講政策，唯派別利益為重，不惜發生武鬥。

進入資產階級派性鬥爭的轉捩點，是發生了劉忠潮事件。

劉忠潮同志是一位從事過地下工作的老黨員，解放後黨派他到蘇聯學習，回國後在我院從事教學工作。劉老師老實本分，師生關係、群眾關係很好，文革中造反較早，兩派鬥爭中屬於“好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芙蓉國裏盡朝暉》中，發表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性質的新論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中央正式提出了清理階級隊伍的任務。

“闖派”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說劉忠潮在從事地下工作時叛變了，把劉忠潮抓了起來，逼劉承認是叛徒。劉老師不承認，就遭到毒打，打斷了三根肋骨。劉老師叫救命，被路過行政大樓的學生聽到，立即報告了兵團頭頭。“好派”立即開會，決定救人，圍住了行政大樓。“好派”攻，“闖派”守，雙方相持不下。

我知道後，怕雙方武鬥，發生更大的問題，就給空司支左辦公室打電話，請求幫助。很快支左辦來了人，並帶來一車解放軍，把劉忠

潮救了出來，并立即送醫院救治。

這是一起突發事件，人們沒有思想準備，人們想不到會對一位忠厚老實的老師下手，并且被打成重傷。雙方不是從事件中去吸取教訓，改正錯誤，而認為是階級鬥爭的殘酷無情、階級鬥爭的複雜性所致。

“好派”則還以顏色，在“闖派”中尋找對象，很快找到一個工人，叫郭啟賢，屬於“闖派”。他在國民黨時期當過保長，屬於“清理對象”，於是“好派”把他抓起來，關在學生八舍的三樓。郭啟賢怕挨打，當夜爬窗逃走，結果摔斷了腿，被人發現後將其送往醫院救治。

這就釀成了劉忠潮和郭啟賢這兩起事件，雙方都打着清理階級隊伍的旗號，抓了對方的人，都造成重傷，加深了兩派的矛盾。

接着又發生了批鬥于文蘭事件。于文蘭是我院衛生科的護士，院革委會委員、後勤部副部長。在兩派鬥爭中，她是“闖派”中比較突出的一個，被稱為“革命闖將”，在革委會後勤工作中，她被認為處事不公。“好派”藉口她為原右派丈夫翻案，為中科院武漢水生生物研究所當權派成解（成解的夫人張綠茵是于文蘭的領導、衛生科副科長）翻案等問題，組織批判會，採用誘騙手段，把她騙到圖書館進行批鬥。“闖派”知道後，組織救援。“好派”則用高壓水龍頭予以阻攔，并將高壓水槍對準于文蘭噴射。雙方僵持不下，最後仍由支左辦公室來人解救。

此事使“闖派”群眾情緒激動，認為是我策劃的，開始指名道姓，提出“張建成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革命兩面派”、“是分裂紅水院革命派的黑手”，要求“把張建成掃出革委會”，并組織人追打我，砸我的家。從一九六八年七月開始，我已不能公開露面，也不能公開活動，祇好住到熱工實驗室隱蔽起來。

此後，雙方都提高了戒備，“闖派”還組織了應急用的以工人為主的專門隊伍，也曾發生過幾次衝突，但沒有形成規模性的武鬥。

進入七月，“闖派”對我的批判與打擊升級，公開提出了“打倒張建成”的口號，并採取如下措施：第一，抓了張如屏和張蕪承二位書記，逼迫他們承認我是由舊黨委派入造反派的內奸，二位書記堅持沒

有這回事，關了一周放人；第二抄了我的辦公室，希望能抄出證明我是舊黨委打入造反派的內奸的材料，當然也一無所獲；第三，由丁家顯親自出馬開會，發公開信，提出了“打倒黑手張建成”、“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張建成”、“把張建成掃出革委會”的主張，公開了他的態度，表明了他與我決裂的立場；第四，在武漢三鎮刷“打倒張建成”、“張建成是三右的代表人物”、“張建成是分裂紅水院革命派的黑手”等大標語，在全市造打倒張建成的輿論。

這些措施沒有效果，反而引起了“闖派”中一些群眾的反感，以張吉祥為代表的一些“闖派”群眾發表聲明脫離“闖派”，倒向“好派”。形勢對“好派”有利，於是提高了批判“闖派”的調子，集中批“以我為中心”的“多中心論”，矛頭指向丁家顯，說他要搞“丁氏獨立王國”，搞“丁氏專政”。

這時發生了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原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常樹蔭亮相支持“闖派”，這對“闖派”無疑是雪中送炭。我聽後百思不得其解，常樹蔭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亮相呢，而且亮到了少數派“闖派”一邊？經過分析，我認為“闖派”提出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提前到來”、“改組革委會”等口號符合常樹蔭的想法，這個曾站在保守立場的中層幹部，認為自己不能再站錯隊了，於是採取這個行動。

常的亮相，觸怒了“好派”，在體育館組織了大型批鬥會，有人還打了他，給他扣的帽子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二月逆流的黑幹將”、“‘闖派’的黑後臺”。

這再次說明了派性鬥爭沒有理性，不講政策，不顧大局，祇有派別的利害關係，你站在我這邊，就是好幹部，革命的，站到對立面，則是壞人、反革命，就要打倒；為了派性鬥爭的需要，搶旗幟，清理階級隊伍，祇清對方的，不清自己隊伍中的；大批判中，給院領導及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掛牌，在武漢三鎮游行；學習毛主席著作、馬列著作，不是用來提高自己、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而是用來對付別人，批判別人，這種貼標籤式、手電筒式的學習方法，在派性鬥爭中大行其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紅水院的派性鬥爭，基本上以文鬥為主，小的肢體衝突發生過，但沒有大的武鬥。在劉忠潮事件、于文蘭事件中，以及搶廣播台時，發生過群體事件，但都由支左辦公室出面化解了，沒有形成實質性的群體事件。這是不幸中的萬幸。

後來“好派”自己辦了廣播台，並以鬥、批、改辦公室名義出版《紅水院報》。革委會已名存實亡，無法開會，更不能統一領導，兩派各行其道。上級發到革委會的會議通知、各種票證都是兩套，由支左辦公室安排，兩邊都照顧到。這些方面沒有產生衝突，但整天的高音喇叭聲吵得人不能安生，群眾敢怒不敢言，越到後來，逍遙派越多。

正如毛主席所說：“他們之所以逍遙就是他們反對打內戰，不願意搞武鬥”。[《毛澤東傳（1949——1976）》第 526 頁]派性鬥爭停不下來，是因為兩派的頭頭總總想分個高低，來證明自己的正確。

### （三）我的反思

紅水院兩派的鬥爭，從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一九六七年九月算起整整一年，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兩派正式分裂，到工宣隊進院也有半年時間。造反派組織是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間形成的，這樣算起來，派性鬥爭的時間占了一半。

痛心啊！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浪費了一年的大好時光，傷害了兩派的廣大群眾，拖了文化大革命的後腿。我每想起，痛心疾首。

全國情況亦然，由于造反派內部的鬥爭，很多地方發展到大規模武鬥，毛主席的計劃無法實現。文革失敗後，我們有些人說，如果毛主席晚走幾年就好了。試問，如果文化革命按主席計劃三年完成，那麼就有七年的鞏固時期，那將是什麼情況？從這個角度講，文革久拖不能結束，文革的失敗，造反派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也應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紅水院不可能影響全局，但反映出問題的實質。雖然原來的兩派早已不存在了，但本着各自多做自我批評的精神，審視我們過去的所作所為，吸取教訓，給後人以借鑒，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之一，

更是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責任。

### 1. 沒有擺正位置

兩派鬥爭的焦點人物是我，我怎麼會成為“闖派”的鬥爭對象呢？

兩派鬥爭的時間點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但我和井岡山兵團“高級群眾”間的不和諧，在一九六六年底就開始了。

我支持造反派是源于對形勢的認識，對毛主席、黨中央指示的無條件服從、緊跟。我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已經持造反派的觀點，這很多人都知道。

但公開地在組織上與造反派站在一起，是受周總理講話的影響，但自己沒有完整地準確地理解總理講話的實質——共產黨員不能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面，也不能站在旁邊指指點點，而是要參加進去。我把“引導群眾，影響群眾，使群眾運動中可能產生的錯誤縮小到最低限度”作為自己造反的任務之一。這樣就把自己置于群眾運動之上去觀察、發現問題，然後向群眾指出這不對、那不應該，告訴他們該怎麼做，成了群眾運動的指導者，成了站在群眾運動旁邊指指點點的人。

我剛造反時，受到了造反派師生的熱烈歡迎，井岡山的“高級群眾”們也熱烈歡迎我，他們的形勢討論會也請我去參加，這說明當時我們之間沒有隔閡，他們沒有把我當外人看待。丁家顯也歡迎我，有事找我商量，我們之間也很談得來。

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對我的看法有所變化，因為我告訴他們批判資反路線時不能開除黨員的黨籍，更不能燒入黨志願書，告訴他們對犯有錯誤的同學批判要適可而止；他們要批判團幹部，我就去讓他們批判我，因為班裏的團幹部是聽我指使的，弄得批判會開不下去；他們要對幹部審查，我主張已有結論的不要再審查等等。凡此種種，使他們感到我不是和他們一起搞文化大革命，而是來糾錯的，是來保護幹部和犯錯誤學生的。

同時，我生怕群眾運動中出現過火行為，即所謂“左”的觀點與行動，所以指導思想必然是右傾的，這樣在討論分析形勢時和丁家顯以

及他的“高級群眾”之間產生了觀點上的分歧，就不足為怪了，他們進一步就會懷疑我的造反動機。

在我與他們的接觸過程中，我瞭解到這些“高級群眾”思想很敏感，善于思考問題，而且確有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的思想，對別人往往另眼審視，所以當他們在“三反一粉碎”中把矛頭對着我，我可以理解，的確不感到奇怪。

因此，我造反時的指導思想、位置沒有擺正，是造成日後井岡山“高級群眾”對我不滿的重要原因。當然，丁家顯及其“高級群眾”們的問題也是存在的，也要進行認識與總結。

## 2. 處置不當使矛盾不斷升級

我與“闖派”之間的隔閡與矛盾，在我進入總部工作後有所體現。

總部指揮不了井岡山兵團，他們祇聽丁家顯一個人的，其他兵團的頭頭多次對我談過這個問題。因為這中間涉及到我與他們的關係，所以我不是面對現實，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是回避，少接觸。這種態度，必定使矛盾進一步加深。

在抗暴鬥爭的後期，我感到自己祇是處理具體事情的，而且是丁家顯吩咐下來的的事情，如省市幹部轉到我院來的問題，工總、九一三戰士來校避難及兩個總部遷到學校來的問題等，事先我是不知道的。來了以後，山上的人告訴我，要解決吃飯問題、辦公地點問題、住宿問題等，我就要去一一落實。“七二〇”後的“八一〇”大會，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安排的，怎麼定下來的，却要總部去搭台拉電綫，我就不幹了，說誰組織的誰去辦。

我已感到矛盾越來越大，我仍沒有去直面現實，與丁家顯溝通，而是採用躲避的辦法。“七二〇”後到武漢市人民武裝部辦聯絡站，除了去解決人武部幹部被亂揪亂鬥的問題外，回避矛盾也是原因之一。我和趙三其談過，他也有同感，所以我們兩個都去了，要不是為成立革委會的事，我真不想回校。

一九六八年三月，兩派已有拉開架勢的趨勢，我很怕陷進去出不

來，有意徹底回避矛盾，到上海去當逍遙派。四月底五月初，我到空司支左辦公室找武繼元主任，向他彙報了學校情況，特別彙報了在兩派鬥爭中，我處的地位讓我非常難辦，所以要求同意我到上海休息，離開這是非之地。

武主任聽後很生氣，嚴肅地批評我想當逃兵！他說，水院出現的問題，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個別的，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挺起腰杆對錯誤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你却要從鬥爭前綫溜走，當逃兵，這是不允許的。

接着，他把武漢地區的形勢講了一下，他說，革委會成立後，應該削平山頭，在革委會一元化領導下搞鬥、批、改，抓革命，促生產，學校應該復課鬧革命。但是無政府主義、山頭主義、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爭席位等資產階級思想和小團體主義，弄得鬥爭不斷，爭論不休，正常工作不能進行。不鬥行嗎？不鬥能有安定的局面嗎？

總之，他堅決反對我回上海，要我堅守崗位，有困難他會幫助我，支持我。

自“七二〇”後，我把空司支左辦公室視為我們的上級領導，有事就向他們彙報，把他們的話看作是上級的指示，所以我接受了武主任的批評，打消了離校的念頭。

在我受到“闖派”攻擊的情況下，我不是到山上去聽取意見，坦誠交流溝通，從大局出發，多做自我批評，誠意地指出對方存在的問題，求大同，存小異，團結起來搞好學校的鬥、批、改。我也不去做“好派”的工作，而是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公開站到了“好派”一邊，與“闖派”鬥爭，成了派頭頭，從此失掉了做兩派工作的條件與機會。

由于我的公開介入，派性鬥爭愈演愈烈，如果我採取了在任何情況下不介入派性鬥爭、虛心地聽取對我的意見與批評、多做自我批評、不支持派性鬥爭的態度，我想紅水院的局面就不會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兩派。

因此，我認識到我造反後位置沒有擺正，出現問題後又處置錯誤，是造成水院兩派派性鬥爭的重要原因，我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3. 用“唯我獨革”來反對別人的“唯我獨左”、“以我為核心”，越反問題越多

毛主席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33頁〕

我們審視過去，檢討過去，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告訴子孫後代，希望他們不再犯我們犯過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中要學習、繼承的東西很多，從派性鬥爭中我感到一個重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問題，它是派性鬥爭的組織基礎，是以我為核心、搞獨立王國的組織基礎。

山頭（各個組織）是革命運動初期，因革命需要應運而生，它對革命的推進是有貢獻的，但革命深入到一定階段，它又會阻礙革命事業向前發展，因此，到一定時候就要削平山頭，剷除山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曾經有過許多山頭，大革命時期到長征時期，有紅一方紅軍、紅二方紅軍、紅四方紅軍以及各蘇區的武裝等；抗日戰爭時期，有新四軍、八路軍以及各根據地的武裝；解放戰爭時期則有一、二、三、四野戰軍以及各地的地方武裝，可說是山頭林立。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央領導，在各個時期都穩妥地擺平了山頭，消除了山頭主義、宗派主義，使全黨統一在中央領導之下，這是很了不起的。

縱觀中國歷史，封建王朝經常出現地方割據，不聽中央號令，以下犯上的事經常有之。民國時期，蔣介石用盡手段，費盡心機，實際上沒有解決軍閥割據、各自為政的問題。

祇有在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真正解決了統一的問題，要統一就得削平歷史形成的山頭。

要解決山頭問題，第一，領導人必須大公無私。蔣介石把自己的中央軍作為嫡系，處處照顧，武器裝備、待遇比雜牌軍好，打仗時讓雜牌軍沖在前，中央軍在後，所以無法解決山頭問題。第二，各山頭的

領導人必須顧全大局，局部服從全局，犧牲小我而成就大我，一句話，要從人民利益出發，否則分贓不勻，爭吵不休，直至打架。第三，領導人要有高超的領導藝術，要承認山頭，纔能削平山頭，要公平對待，合理安置有關人員，有時要照顧某些山頭的利益，纔能徹底鏟平山頭。

我們再看看文化革命中，各派死抱住自己的山頭不放，為自己的山頭多爭些利益，以文革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別的組織，要以自己為核心實現大聯合，所以總聯合不起來，即使表面聯合了，心裏不服氣，所以爭論不休，戰鬥不斷。

比起我們的前輩，看看他們是怎麼對待功勞的？他們是怎麼對待事業的？他們是怎麼對待黨的領袖的？我們應該感到臉紅，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應該好好學習，好好改造自己，這也是總結文革教訓時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

## 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進駐學校時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以蒯大富為首的“團派”武力抗拒工宣隊進駐，並打死了5名工宣隊員。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澤東緊急召見聶元梓等五大領袖，嚴厲批評說：“（文革）搞了兩年了，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但你們是搞武鬥。”毛主席指出：“現在我們採取了一個辦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們再搞，就用工人來干涉，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是輪到一些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北京五十九所高校全部進駐工宣隊。在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統一部署下，工宣隊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進駐我院。

從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的談話來看，我認為毛主席派工宣隊進學校，目的是制止武鬥，消除資產階級的派性，進行鬥、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時間大概在一年左右。

但事與願違，從工軍宣隊進院到軍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個月；再到工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鬥是鬥，主要是鬥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謂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東西，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眾來監督幹部和教育幹部等等，這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意願。

對於工宣隊的功過是非，同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各的看法，這是很正常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對同一事物有不同視野；站在不同的立場，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進駐我院的軍宣隊共三屆，三位領導人擔負了不同的任務，也就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 （一）宋國英時期（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九年九月）

軍工宣隊的第一任指揮長是宋國英，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標準的老軍人風範，對人和藹，處事嚴謹，政策水準較高，工作認真。他在我院工作一年，得到了師生員工的好評。

他在學院期間的工作，主要是消除派性，清理階級隊伍，整頓紀律、秩序。這一屆軍宣隊的成員，除宋國英外，還有副指揮長石昭庭、馮紹林和趙洪閣、趙文政、龔茂祥、田文海等機關科級幹部，軍代表配置到院部、處、系各級。工人宣傳隊由武船鑄鋼廠、武昌車輛廠派出，鑄鋼廠的夏勝階、車輛廠的葛台鑫擔任副指揮長。

工宣隊進院後，第一件事是組



一九六八年九月代表院革委會  
接受毛主席贈送給軍工宣隊的芒果



與王紹良(左)、段希健(右)在毛主席贈送的芒果前合影留念

織全院師生迎接毛主席送給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非洲芒果，場面非常熱烈，夾道迎接，迎到體育館，召開全院師生員工大會，我代表院革委會參與迎接芒果，并照了相。此後，掀起了忠于毛主席的熱潮，

向毛主席表決心、獻忠心，并開始了早請示、晚彙報活動。

### 1. 舉辦革委會成員學習班

一九六八年十月初，工宣隊指揮部決定，將革委會委員拉到山坡機場辦學習班，說是為了避免干擾，實際上是為了發動群眾、背靠背揭發批判各派頭頭的資產階級派性。

工宣隊進院後的第一個戰役就是打一場揭批資產階級派性的戰役，清除資產階級派性，以便今後能順利地進行鬥、批、改。

在山坡機場的革委會成員學習班上，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著作與一系列最新指示，對照我們的言行，進行自我批評，認識資產階級派性的危害性，揭露與批判我們自身的錯誤。

為了使學習班能正常進行，也為了使批判資產階級派性能深入進行，宋指揮長和主持學習班的趙文政都找我談話，希望我認識錯誤，帶頭揭露和批判派性，特別要多做自我批評，并要求我做好“好派”委員的工作，少講別人，多講自己的錯誤，不要在學習班中再進行派性鬥爭。

我對於軍工宣隊進駐學校，從內心是歡迎的。兩年來沒有直接領導，每走一步都要自己思考該怎麼做，唯恐走錯一步。“七二〇”後，我事事向武漢空軍司令部支左辦公室彙報請示，視他們為領導，



但終究不是直接領導。一年的派性鬥爭，搞得我有家不能回，與群眾隔絕，身心俱疲，所以軍工宣隊來了，由他們領導學校的一切，我是高興的。因此對於宋指揮長的談話要求，我是接受的。

按照他們的要求，我對王新民等“好派”委員進行傳達，我自己也認真考慮了學校兩派鬥爭中自己一方所應承擔的責任。我確實認識到自己應負的責任，如果自己不公開的站到“好派”一邊與“闖派”公開鬥爭，那麼水院的派性鬥爭就不會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地步。

我在學習班作了檢查，得到了軍代表的肯定。委員們在發言中也都聯繫本派、聯繫自己實際作了自我批評，沒有發生頂牛現象。

總的來講，學習班是和風細雨的。學習班的伙食不錯，山坡機場在曠野中，視野非常廣闊，休息時的活動主要是散步和聊天。

我認為，這次學習班執行了毛主席講的“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的指示，大家思想上比較輕鬆，沒有挨整的感覺，與後來辦的各種“五不准學習班”是不一樣的。

在此期間，我們全體學習班成員到武漢中南民族學院聽了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主要是關於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以及十二中全會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議。最讓我們高興的是，聽到了幾句毛主席的講話錄音：“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大家心情激動，回山坡後討論了好幾天。

在山坡機場的學習班進行了個把月後，大概在十一月上旬，學校接到六二級、六三級學生要畢業分配的通知，指揮部決定結束學習班。

回校後，六二、六三級的委員一起參加畢業分配，六四、六五級的委員回班上課。

## 2. 清理階級隊伍

工宣隊進院後，首先進行揭批資產階級派性，學生復課鬧革命。接着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重點是在教職工中進行。工宣隊進院，革委會靠邊站，不說取消，但也不起作用。

說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實際上是軍隊幹部控制一切，決定一

切，院、系及行政部門和處、室一把手都是軍人。

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我們都一無所知。協助軍宣隊工作的、做具體事情的，都是由軍宣隊指定的人，主要是一些原行政部門的幹部，有保衛科的、組織人事部門的、各系黨政系統的，這批人在文革中一般是屬保守型的，他們中的一些人此後成為整造反派的骨幹力量（各級專案組成員）。

清理階級隊伍具體如何進行，我不得而知，學校表面看來還算平靜，實際上內緊外松。

有歷史問題、家庭問題的人都進行審查、外調，在此過程中有兩人自殺身亡。一個是財務科長葉正富的妻子、圖書館館員熊玉林，上吊自盡；另一人是一系總支書記許志方的父親，投湖自盡。他們的具體情況我不清楚，大概是歷史上有點問題，怕查到自己，而一時想不開走了絕路。

我們學校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 20 人，兩人是運動初期黨委抓右派時自殺的，兩人是工宣隊清理階級隊伍時期自殺的，一個學生因思想錯亂而從學生宿舍樓頂上摔下來死的，15 人是“八一”渡江時犧牲的。所有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與造反派均無直接關係，因而從未被追查過，也沒有人對此負責。

在清隊過程中，動員群眾互相檢舉揭發，軍工宣隊根據群眾的舉報內查外調。我聽說總務處基建科科長逢佐洲被人舉報，說逢曾經說過，他被敵人抓去後，在獄中如何英勇地與敵鬥爭。於是懷疑逢科長歷史上有被捕的事，但查看檔案又沒有這段歷史，因而進一步懷疑逢科長隱瞞歷史，於是派人到逢佐洲原屬部隊進行調查，發現逢佐洲自參加革命一直在部隊服役，轉業後到學校，根本沒有被捕過。指揮部找逢佐洲談話，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在吹牛時講過在獄中鬥爭的事，認為那很光榮，實際上根本沒有被捕過，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我們常說吹牛不交稅，逢科長的吹牛可使指揮部花費了不少精力，也花了國家不少的錢。行政科長陳旭，解放前曾經脫過黨，組織上早就有結論，而且又重新入了黨。在清隊中，有人懷疑他有其他問

題，要其交待并進行外調，最後還是原結論。

宋指揮長為此向陳旭當面道歉，這說明了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指揮部很認真，不放過任何疑點。同時說明指揮部比較講政策，重調查研究，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和揭發。對做得不妥的地方，能向當事人當面致歉。這與後任指揮長的工作態度及工作作風是有區別的。

### 3. 實行軍事化改革，進行軍事化管理

工宣隊進駐學校後，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在組織上及領導系統上的改革，實行軍事化編制，進行軍事化管理，以實現迅速改變學校面貌的目的。

學院下面成立四個大隊，原一、二、三系分別改為一、二、三大隊，行政管理部門成立四大隊，大隊下面設連、排、班。機關設四個組：辦事組、政工組、教育革命組、後勤組。

各大隊的行政領導由工宣隊員擔任，大隊政委和機關四大組的組長均由軍宣隊員擔任。

學院一級設立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指揮部（簡稱工宣隊指揮部），指揮部指揮長宋國英（解放軍），副指揮長石召庭（解放軍）、馮紹林（解放軍）、夏勝階（工宣隊）、葛台鑫（工宣隊）。

湖北省成立“文教戰綫指揮部”，正副指揮長均是解放軍，是學校工宣隊的上級領導機關。

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後，從省到院校由部隊一竿子插到底。地方革委會靠邊，不起任何作用，原革委會中的學生都回到班上，工宣隊認為無大問題的革委會工作人員仍留用，如原革委會辦公室主任顏國良仍留在辦公室，柳濤等仍留在政工組工作，增添了一些文革前在機關工作的人。

原在革委會工作的職工，若非機關幹部，一般都回原單位。如後勤部的二位副部長于文蘭、熊德才，前者回衛生科，後者回機械廠。

這些組織上的變化，是按既定方針進行的，堅定而迅速。從此，由解放軍領導學校的一切，廣大師生員工由學校的主人變成了被改

造的對象。他們按照軍人的要求，早上出操，開會要列隊進入會場，列隊離開會場，開會前要唱歌等等。

我從山坡機場學習班回來後，由于指揮部沒有安排我具體工作，基本上閑着，有時指揮長找我去談話，主要是向我瞭解學校幹部情況，我都如實地談了我的看法，有時也徵求我對某項工作的意見。

總之，在工宣隊進院後，除了參加學習班，沒有其他具體的工作，工宣隊既不用我，也沒有整我。

#### 4. 拉練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我院師生進行了一次拉練活動，從學校出發，步行一周，到達湖北省麻城縣乘馬區，與當地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改造非無產階級思想。五月底回到學校，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這次拉練活動的指揮長是宋國英，我被任命為副指揮長，負責前站工作。這次活動，完全按部隊行軍的模式進行，每天行進 60 里，每人背行李包，到宿營地後，用餐、洗腳、挑泡（即把腳上的水泡捅破，以免脹痛，影響第二天的行軍）。到宋埠休息一天，進行文藝演出，瞭解當地情況。到麻城縣城又休息一天，同樣進行了文藝演出。我院文工團的節目很受當地群眾的歡迎。第 8 天纔到我們的駐地乘馬區，此地與河南新縣交界，是老蘇區。

我是負責前站工作的，配有 1 輛摩托車，唐冠傑（學校司機班班長）開車。後勤配有卡車，伙房用具裝車後連同工作人員先期到達宿營地，準備大部隊的用餐、用水。

過去我對部隊行軍路綫、宿營地安排等感到很神秘，這次自己親自嘗試，學到了不少東西。首先是要看懂地圖，大體上確定距離，這樣路綫及宿營地就心裏有數了。到宿營地後，要查看房子、地形，確定指揮部位置，儘量借用倉庫等大房子，這樣大部隊到達後容易安排。後勤保障一定要跟上，祇有讓戰士吃好、休息好，處理好各種問題，纔能保證部隊正常行軍。

這次拉練一路順利，宋指揮長對我們的前站工作很滿意。他是



個很嚴肅的軍人，平時很少贊揚人，這次却着重表揚了我們。

乘馬區是老蘇區，是大革命時期的拉鋸區。據當地老百姓介紹，大革命時期，共產黨與國民黨拉鋸，殺對方的人，幾次拉鋸，乘馬地區的人死了二分之一以上，狗吃死人肉，後來吃紅了眼，見活人也要吃。

解放後修了公路，但很少有汽車經過。據老百姓講，1956年王樹聲將軍回乘馬，帶了兩部電影拷貝和一部放映機，他們祇看過這兩部電影。我們的摩托車經過村莊時，大人、小孩都出來看，狗則拼命追趕，因為見得少，感到新奇。那裏的生活很艱苦，很少有肉吃。

我們指揮部駐地的大隊幹部，請指揮部的領導吃飯，我也參加了，8個菜，除了炒雞蛋外，基本上是蘿蔔做成的，我們後來稱它為蘿蔔宴。

還有一件事需要說一下，我們到乘馬時，正值當地開展清理階級隊伍，每天見到多次敲鑼打鼓的報喜隊。我們向當地幹部打聽，他們告訴說，過去祇知道革命過程中村裏死了不少人，但不知道怎麼死的。這次清理階級隊伍中清出了叛徒，他們交待了被自己出賣的革命同志，於是這些犧牲的同志就成了烈士，就要上門報喜，要修墳樹碑，所以熱鬧。每清出一個叛徒就會產生一批烈士，這在其他地方是見不到的。

拉練活動因為武漢地區的“反復舊”運動越演越烈而草草收場。

### 5. 武漢的反復舊運動

這次拉練活動，我原以為是鬥、批、改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原先計劃好的。後來瞭解到不是這樣子的，原因是武漢市四月中旬由原工總、工造、九一三三個工人造反組織的頭頭掀起了一股反復舊的風，軍區領導怕學生摻和進去更難辦，所以決定把學生拉出去，遠離武漢市。

事實上，學校還有人，還會相互聯繫。五月中旬以後，武漢反復舊的消息已傳到鄉下，顏國良給我來信，說武漢的反復舊運動越來越高漲，要我回武漢領導運動。我既未回校，也未回信，因為我認為工宣隊進院後，有什麼問題應通過工宣隊來解決。省革委會已成立，有什麼問題，應該通過省革委會來解決。搞群眾運動逼領導解決問題

的時期已過去了，不能再亂了。後來顏國良又趕到我們在麻城的駐地，說再不回去，學校就要亂了，亂起來後就只好收拾了。

說實在的，我是真怕又亂起來，有事沒有事都扣到我頭上，所以決定回校看看，讓唐冠傑連夜送我回校。半夜到家，第二天到學校看看，大字報不多，我就放心了。

我見了宋指揮長，彙報了我回來的原因，看問題不大，我提出馬上回麻城。宋指揮長講，回來了就不要去了，大部隊也很快就要回來了，因為中央已在着手解決武漢的反復舊問題。

不久，五二七指示(中發[69]28號文件)下達，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關於解決武漢反復舊問題的報告”，批評了反復舊運動。

指示中指出：“在社會上錯誤思潮和無政府傾向的影響下，提出所謂‘反復舊’運動，把矛頭指向省、市革委會，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把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置於一切之上。這樣做，是不符合毛主席關於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和一元化領導的教導的。”

五二七指示對省市革委會也有所批評，指出：“由於缺乏經驗，他們沒有很好地試點，抓典型，總結經驗，落實政策，以點帶面，在工作作風上又不夠細緻謹慎。這些缺點、錯誤應該糾正”。

可見中央對湖北的領導和造反派頭頭都有所批評。反舊複運動是錯誤的，把矛頭指向省、市革委會，指向解放軍，指向革命幹部，這就違背了毛主席關於大聯合、三結合、一元化領導的教導，與中共九大精神不符。

引起反復舊的原因，領導上有責任，對缺點、錯誤應該糾正。

然而在貫徹五二七指示過程中，領導上不總結經驗教訓，不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而一味地批鬥反復舊運動的頭頭。這還不夠，又把華中工學院學生魯禮安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成立的“北斗星學會”，十二月成立的“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及其刊物《揚子江評論》稱為“北決揚”反革命組織，并向中央寫了報告。

中央於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發下了《中共中央對武漢問題

的指示》，被稱為九二七指示。

根據湖北給中央的報告，九二七指示把“北斗星學會”、“決派”稱為“地下組織”，“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藉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稱《揚子江評論》是“反動刊物”，對主要編寫人要嚴肅處理。該指示點了王盛榮、干毅、周嶽森的名，要立即逮捕，依法懲辦。

這樣就有了進一步鎮壓造反派的利器。在貫徹九二七指示的過程中，把整個造反派都裝入了“北決揚”這個所謂“反革命組織”的籬筐中去了。以後在中央學習班又大力清查“五一六”、“北決揚”，進而擴展到湖北全省，影響所及幾十萬人，成為湖北歷史上最大的冤、假、錯案，這是後話。

武漢地區反復舊運動的時間僅一個多月，引起這麼大的震動，由中央出面解決，此後對造反派的影響又這麼深廣，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我認為首先是大形勢的變化。一九六九年四月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中共九大的召開，標志着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此時強調團結，強調革委會的一元化領導，強調擁軍。而軍隊已在全國各省市包括中央直屬機關各部委掌權，可說已一統天下，祇聽毛主席、林彪的號令。

在此形勢下，反復舊把矛頭對着省、市革委會，對着以曾思玉、劉豐為代表的所謂軍政權，能有好果子吃嗎？有人說，軍隊幹部也確有問題，為什麼中央就看不到呢？看到了又怎麼樣？中央講的是大局，你攪了這個大局怎麼會支持你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局是要發動群眾，衝擊資反路綫，衝垮資產階級司令部，中央要瞭解的是群眾受壓的情況，對各地當權派反映的群眾如何不講理、如何破壞抓革命促生產是一概不理的，當時的當權派也感到委屈。

在中央那裏，誰不按大局需要辦事，誰就沒有理。

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形勢，是需要穩定，需要一元化領導，你衝擊

就是不顧全大局，有理的事也就成為沒有理。而曾、劉他們在中央面前說幾句檢討的話就主動了，回到湖北後就按他們的想法去做了，因為尚方寶劍在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反復舊的矛頭直指他們，如今中央表態，反復舊錯了，他們怎麼會放過你呢？祇會把火越燒越旺，直到把你燒死為止。

第二，造反派被壓制。在軍隊掌權以後，造反派組織已不復存在，在揭批派性、清理階級隊伍過程中，對造反派頭頭、骨幹分子已進行了批判，有的還進行了鬥爭，有些已立案審查。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水塔貼出了朱鴻霞（原鋼工總一號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李想玉（原鋼九一三一號頭頭、市革委會副主任）、吳焱全（原工造總司一號頭頭、市革委會副主任）三人聯名的大字報《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立即轟動武漢三鎮，一夜之間在三鎮轉抄張貼。他們的街頭演講，聽眾少則幾千人，多則幾萬人。工廠不平靜了，社會動蕩了，這一切出乎軍隊領導的預料。這是向軍方的挑戰，證明了武漢地區造反派有力量發動這個挑戰。

武漢造反派曾經經歷了陳再道時期的鬥爭，“七二〇”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與表揚，在全國有相當的影響，所以中央相當重視武漢的問題。

反復舊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旬開始發生，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指示，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楊道遠（原鋼二司一號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張立國（原新華工一號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到北京解決武漢問題。

五月二日，中央通知，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常委以上的22名群眾組織代表，到北京解決問題，可見中央對解決武漢問題的重視。直到解決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五二七指示”出臺，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央領導多次接見代表，徹夜長談，花費了幾多心血，希望武漢問題能合理解決。

周總理對曾思玉說：“曾思玉同志，你們都在這裏，回去要做細緻



的工作，可不能壓群眾。”曾思玉說：“堅決按中央指示辦事，堅決按總理意見辦事。”（吳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第 122 頁，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09 年版）回武漢以後，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你不僅挑戰了軍隊領導的權威，而且使他們在中央領導面前、在軍隊同僚面前失了面子，能不要你好看嗎？

第三，反復舊不是湖北首創，更不是獨此一家。全國最早的是山東，由王效禹發動的，他是省革委會主任、濟南軍區政委。其他地方也有反復舊的，但湖北搞得比較大，影響也大。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與當時形勢有關。

軍隊掌權以後，批資產階級派性，矛頭肯定是對着造反派的；清理階級隊伍，很多單位也把矛頭對着造反派，起用了一些保守派人員做清隊的工作；解放幹部，使大批幹部走上工作崗位，革委會的群眾代表成為“擺設”，於是出現了“軍隊幹部掌權以後，鬥、批、改就變了味”的說法，鬥是鬥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資產階級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級革委會，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臺，將走資派扶上去。（上書第 106 頁）出現了“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名存實亡，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上書第 107 頁）所以胡厚民說：“武漢的問題，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復舊，實質是復舊和反復舊、復辟和反復辟、奪權和反奪權的問題。”（上書第 110 頁）

這就是武漢反復舊的由來。反復舊實際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提前到來。不難設想，如不加以制止，將是新一輪動亂的開始。如果學校的學生不去拉練，而與工廠的工人結合一起搞反復舊，那情形可想而知。所以中央必須及時地堅決地予以制止。

壓迫越深，反抗越烈，鎮壓也就越堅決，這就是政治！

一九六九年六月，我和王新民到湖北省革委會向張體學彙報工作，是預約的，從上午十點一直到下午四點左右，中午張體學請我們吃飯，抽掉了他好幾包大前門香煙。

我們主要向體學同志彙報了學校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談了幹部問題、反復舊問題，談了我們的看法。我和王新民都認為，中央九

大開過了，省、地、市，各學校革委會都成立了，不應該再亂了，省革委會應該領導鬥、批、改，抓革命，促生產。他同意我們的看法，坦率地談了自己的思想變化過程，也談到了在水院的日子。

給我的感覺，張體學平易近人、坦率、誠懇，對主席感情深，對文化大革命理解比較深刻，的確是一位很好的革命領導幹部。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向張體學彙報工作。

## (二) 樊馬義時期(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一九六九年九月，工宣隊進行了一次大換班，指揮長宋國英離校，樊馬義接任。工人也全部換了，由國棉三廠、青山熱電廠派工人進駐我院，鑄鋼廠和車輛廠的工人全部回廠，工人副指揮長由國棉三廠的吳玉清師傅(女)擔任，時間不長，又由國棉三廠的朱三梅(女)接任，工宣隊員均換成了原保守組織的成員(第一屆工宣隊員多數是造反派)。

指揮長樊馬義與宋國英的作風也絕然不同，這屆軍、工宣隊從進院開始貫徹五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以後又進一步清查“五一六”分子，時間長達兩年多，全部精力用于整造反派。

有人說，這屆工宣隊進院的目標與任務，就是要徹底整垮造反派，進來的人、起用的人都是保守派的，鬥爭的對象都是造反派。

兩屆工宣隊員的思想迥然不同，進院後工作的內容也完全不同。從這些方面來看，上述議論也許不無道理，這究竟是軍人政權有意所為還是巧合，我們不得而知。

樊馬義是山坡機場基地主任，正師級，據他自己介紹，是山西李向陽式的人物，即地方上響當當的抗日游擊隊隊長、抗日英雄，後來參加部隊。情況到底如何，我不知道。

據我和他的接觸，樊指揮長文化程度不高，主觀性很強，作風比較粗暴，不僅對地方幹部如此，對部隊幹部也這樣。他喜歡聽好話、奉承話，誰若不聽他的話，或違背了他的意願，你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他還有點沽名釣譽，愛出風頭，文化水準不高，却愛寫文章登小報，不

懂詩律還要寫詩，理論水準不高，曲解毛主席的話，稱為“活學活用”。如講知識分子政策，毛主席講“團結—教育—改造”，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教育和改造，達到團結的目的，樊說是“改造—改造—再改造”，他說對知識分子就是兩個字：“改造”。我和吳冠英（院團委宣傳部長）指出這是違背主席思想的，與他辯論，他辯不過我們，最後說：“你們懂個屁！”

我有時想，像樊指揮長這樣的軍事幹部，指揮打仗也許是一把好手，但讓他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確實難為他了，也許是當時形勢的需要纔派他來的。

我在樊指揮長任內做了兩件事，一是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的畢業分配，二是組織領導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京劇團排練、演出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合起來半年時間。其餘時間住“五不准”學習班及在“五七”隊勞動改造，還差一點被他送進監獄。

### 1. 北京中央學習班

九二七指示第七條說，中央決定在北京開辦湖北省和武漢市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經過一個月左右的準備，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以工人組織造反派頭頭和各工礦企業單位造反派頭頭為主組成的學員隊伍千余人開赴北京。

十一月底，各校造反派骨幹近三百人組成兩個學生連，又開赴北京參加中央學習班。我校去的人除我之外，還有王紹良、于文蘭（護士）、劉庚申、陳伯強、胡震宇、雷志茂、龔解放（壽眉）、伍必慧、李鴻傑，軍代表龔茂祥，一共 11 個人（其中雷志茂已分配工作，調回參加）。這樣，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湖北班的人數，包括學員與工作人員、軍代表等共有一千六百人左右，地點在空軍學院。

我們離開武漢前，軍代表對我們說，中央學習班是黨中央辦的，有機會參加中央學習班是很光榮的，希望你們珍惜，在北京好好學習，提高認識，回來後以新的面貌投入戰鬥。歡送的場面也很熱烈，張體學等領導同志親自到車站送行。到北京時，先期去的學員列隊歡迎我們，軍代表也說了同樣的話。

但當我們正式成為學習班的成員時，情況就不一樣了，管理人員說的內容也不一樣了。首先宣布“五不准”，即不准打電話、不准打電報、不准寫信、不准外出、不准串聯，然後要我們安心學習，檢查錯誤，總結教訓，把包袱放在北京。

哪有進黨校（領導講中央學習班是黨校性質的）實行“五不准”的？其實講的人和聽的人心裏都有數。

中央學習班是個統稱，全國很多省在北京辦學習班，與我們同時在空軍學院的就有內蒙班（學員是領導幹部）、四川班。

負責湖北班的中央領導有陳伯達、謝富治、紀登奎、李作鵬等，我祇見過陳伯達和謝富治來過學習班。

湖北班建立了臨時黨委，黨委書記為張昭劍，成員有軍區副參謀長王步青、軍區某部部長劉海江及省委宣傳部部長陳扶生。後來學習班把我調到材料組協助工作，揭批楊道遠。我與王步青、劉海江、陳扶生聯繫較多。張昭劍平時見不着，他開會時來一下，作過指示後就走，顯得特別忙，坐不住，所以我沒有與他談過話。

在北京學習班，我印象中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比較平和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指示，大家談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哪些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言行。迫於黨中央、毛主席的威信，大家本着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信念，認真地檢查自己，放包袱，這階段可以說成是洗手洗澡，造反派頭頭人人有份。在這階段的後期，漸漸把矛頭指向各群眾組織的頭頭，如學生連重點是批楊道遠，工人那邊則是批胡厚民、李想玉、吳焱金等。

為了調動階級感情，組織過一次吃憶苦飯，一次到農村勞動。這兩次活動，都是事先學習討論，談憶苦、勞動的重要性，事後談心得體會，完全是形式主義一套。所謂憶苦飯，吃的是窩窩頭（用玉米麵做的），我在北京生活十幾年，天天吃這個東西，沒有感到苦，那時北京70%是粗糧，所以吃窩窩頭、貼餅子、玉米糊是很平常的事，到了學習班，就成了憶苦飯。

陳伯達等中央首長多次來學習班。陳伯達特別做作，脫掉外衣，



露出有補丁的襯衣，坐在地板上，叫楊道遠坐椅子，說司令、頭頭都是首長，他是小小老百姓（後來聽說在工人連也是這樣），意思是造反派頭頭都把自己當成了大官，不聽指揮了，他也指揮不了。我體會，他是要頭頭們好好反思，在學習班好好檢查自己。

第二階段是在春節前，抓所謂的現行反革命。三個工人組織一家一個，即工總的劉萬泰、九一三的張鵬程、工造總司的王錦銘。組織大會批鬥這些人，當場逮捕，武裝押送回武漢。這出乎很多人的預料，學習班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階級鬥爭的氣氛也濃烈起來。

第三階段是學習班的重頭戲，也是湖北省領導要達到的主要目的，即揭開“北決揚”、“五一六”的蓋子，抓出這兩個反革命組織的幕後操縱者和後臺。

陳伯達講，“北決揚”、“五一六”是湖北帶來的。也就是說，湖北向中央報告，湖北有這兩個反革命組織，這次學習班上要解決這個問題，陳伯達他們也同意了（所謂中央同意了）。因而學習班臨時黨委更加肆無忌憚，有恃無恐。

學習班臨時黨委是軍區領導任命的，學習班每天有簡報送湖北，曾思玉、劉豐實際上是湖北班的真正領導。

我是在第三階段由學習班黨委決定調材料組工作的。當時明確，凡是組織活動，我就回連隊去，平時到辦公室上班。所謂活動，如開大會、聽報告、看文體表演、參加中央通知的大會或接見等。連、排、班的學習、批判會、講用會等一般都不回連隊。

我在材料組的主要任務是瞭解、熟悉、整理楊道遠的材料，不管哪個連、哪個人，凡是揭發、批判楊道遠的材料，我都要瞭解。

後來王步青副參謀長告訴我，黨委決定讓我做批判楊道遠的系統發言，所以要瞭解、熟悉楊道遠的所有材料。

這也說明在學習班整楊道遠是早就決定了的，並不是因為楊道遠是“北決揚”、“五一六”纔整他，而是因為要整他，纔把他打成“北決揚”、“五一六”。

我懂得這個道理是在一年之後，那時我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

子，並且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五一六”的組織者。我這纔懂得了那些反對文化大革命、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傢伙，無時無刻不在做鎮壓造反派的美夢。他們利用中央學習班這個平臺，用捏造的事實欺騙中央的某些領導，也利用人們相信中央及對中央的敬畏心理，以清查“北決揚”、“五一六”為名，把造反派一網打盡。他們設計騙局，打一些人，拉一些人，各個擊破，最後統統清除，以達到他們徹底剷除異己的目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逐步領悟到的。

整楊道遠是學習班領導的既定方針。一九七〇年春節過後，就着手準備批楊道遠的材料，主要由各連隊組織人準備，我的發言稿則是由學習班黨委親自抓的，親自討論過四五次，調子由張昭劍定，具體工作由王步青、劉海江抓，經常參加討論研究的有劉海江、陳扶生，還有武漢軍區政治部的兩個幹部。

定的基本調子是：“北決揚”、“五一六”兩個反革命組織是一回事，目的相同，手法相同，人員交叉；他們的目的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在文革中他們始終把矛頭指向軍隊，搞亂軍隊，搶槍亂軍，妄圖建立反革命武裝；楊道遠是湖北“北決揚”、“五一六”的總負責，他通過兩條綫與王、關、戚聯繫，一條是魏繩武（武漢市委機關造反派頭頭）——宋洛（武漢市委宣傳部幹部，吳傳啟好友）——吳傳啟——王、關、戚，另一條綫是二司駐京聯絡站——林傑——王、關、戚；楊道遠的理論基礎是他的“二論”，即“階級鬥爭演戲論”，“路綫鬥爭循環論”；結論是：必須對楊道遠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肅清流毒，把湖北的“北決揚”、“五一六”兩個反革命組織徹底清除。

張昭劍對楊道遠定的調子，我半信半疑，說楊道遠的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不信。對楊是否參加了兩個反革命組織我半信半疑，因為我不瞭解。但從領導講話到有些人的揭發，似乎確有其事，因為揭發者都是楊身邊的人或與楊聯繫密切的人。關於楊道遠的“二論”，他的確講過，在連裏也批過。

總之，我是本着對楊道遠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肅清流毒的宗旨來梳理材料的，當材料不充分時，向領導提出立論材料不足，但第二

天，最多三天之內，就會給我提供充足的材料，即根據需要而逼、供、信，得到所需要的材料。

我對楊道遠的大批判發言長達兩個小時，從方方面面對楊道遠進行批判，領導很滿意，後來把我的發言錄音在湖北全省播放，通過我的口，告訴人們楊道遠是湖北“北決揚”、“五一六”的總負責人，他參加文革的目的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證據充分。

雖然我對楊司令瞭解甚少（文革中我是他的下屬，卻沒有直接聯繫接觸過），我所講的內容，都是領導上提供和下面揭發的，沒有我自己的任何材料，但系統地、完整地告訴人們“楊道遠何許人”的是我，我講了那些想整死楊道遠的人不能公開講的話，我做了那些想整死楊道遠的人不能公開做的事。

雖然我的發言對楊道遠的最後遭遇不會有什麼影響——就像我在文革中儘管小心謹慎，也不會改變最後遭遇一樣，因為對我們這些人的處置，不是在於你有什麼問題，犯了什麼罪，而是因為你是造反派——但我對自己在中央學習班的發言始終不能釋懷，這是在文革中幹的最蠢的一件事，成了那些處心積慮整造反派的人的幫兇。我對楊司令深感內疚，對受我講話影響的聽眾表示歉意。

後來在為楊道遠翻案的過程中，我不僅寫了聲明，聲明我對自己所講的內容一無所知，全是領導上提供的，我也盡了我的努力，配合方保林、李莉、劉漢武的翻案工作，算是一點贖罪表現吧。

中央學習班的生活安排得很好，特別是伙食方面，開始一天1元2角伙食費吃不完，後改為每天1元，仍大量浪費。四川班有一個學員因吃得太多而脹破了胃，送到空軍總醫院動手術。

我們不少人都長胖了，我本來是瘦長個子，回來時就成了胖子，體重達到90公斤左右。于文蘭本來就胖，此時更胖了，特別是肚子大，人們以為她懷孕了，有人問我為什麼不讓她回武漢生孩子。

學習班除了揭批“北決揚”、“五一六”以外，也參加了一些中央組織的活動。一九七〇年四月初，中央領導人在首都體育館接見中央學習班全體學員，因總理忙，我們等了兩天。會上周總理講話，其他

中央領導也參加了。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全體學員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首都百萬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大會，毛主席、林彪參加了大會，林彪宣讀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五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文藝演出，這是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 28 周年而組織的活動，是專門為中央學習班的學員演出。儘管之前作出了種種規定，進行了討論、表態，還是出了問題，一是煙頭隨便丟，燒了地毯，二是摘了桃樹上的桃子（塑料做的）。為此第二天幾個學習班開會查找作案人，後來聽說是四川班的學員幹的。四月間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太空奏響《東方紅》樂曲，學習班組織觀看衛星經過北京的情況，並組織討論。這一切說明，當時中央對學習班的學員是關心的。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講一個小故事。四月份，我因病住空軍學院的醫院，同室來了一個廚工，他是技術能手，經常被抽調到人民大會堂從事國宴的工作。我問他伙食搞得這麼好，學校是否貼了錢？他說沒有貼錢，學校領導說，你們學習班的同志都是地方上的各級領導，所以我們全心全意地把伙食搞好，把生活保障好，讓你們安心學習好，回去更好地抓革命促生產。我想空軍學院領導不會自編一套說詞，一定是開會時上面講的意思。

中央學習班於一九七〇年六月底結束，我們回到武漢黃浦路兵站，又住了幾天。這幾天沒有什麼事，領導上讓我們討論表態回去後怎麼辦。我估計，之所以要留幾天，是要給各單位安排時間，這批人一回來，將掀起一個全省範圍抓“北決揚”、“五一六”的高潮。

## 2. 長陽鬥、批、改基地

離別學校七個多月，回到學校，顯得特別安靜，冷冷清清，昔日熱鬧的校園已見不到了。

聽留守處的人介紹，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學校師生到羅田縣（一大隊）和長陽縣（二、三、四大隊，指揮部）參加鬥、批、改，附小和幼稚園改為全托。我妻子王漱蘭因是醫護人員，被抽調到幼稚園工作，所



以我回校時，還能看到孩子和妻子。

指揮部命令我們第二天就到長陽指揮部報到。我們第二天一早出發，坐學校卡車，下午到了位于長陽縣三洞水的指揮部，還沒有來得及看看指揮部所在地的情形，指揮部通知我們集中學習（後來說是五不准學習班），于是立即被送到離指揮部有一定距離的一個小山包上住了下來，與學校任何人沒有來往，與當地老百姓也沒有任何接觸。

白天學習、交待、檢討，休息時到小山包四周玩，山下有小溪，小溪中有青蛙、小螃蟹，有時還可看到蛇，溪水很涼，但我們去時是盛夏，光了腳玩，可以消暑。

學習班是接着北京學習班的內容，深入貫徹九二七指示，批極左思潮，挖“北決揚”、“五一六”，上聯楊道遠、胡厚民，下掛學校文革中的人和事，有事的自己交待，知道別人的事就揭發批判。

因為學習班中沒有特定的對象，所以還是以學習、啟發為主，逼、供的情況還不明顯。

軍代表也感到為難，學校的這點事，從工宣隊進院後的山坡機場學習班，到中央學習班，現在又是長陽學習班，翻騰了多少遍，但是還要翻，真是無奈。

一到開會，愁眉苦臉，一到休息日，纔露出點笑容，有時相互間說說笑話，一起玩鬧，就這樣打發時光。

半個多月後，指揮部讓我回三洞水搞六四級、六五級的學生畢業分配工作，我離開了那個小山包。他們還要繼續學習，何時結束的這個學習班我也不知道。

一九七〇年七月間，中央通知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指揮部研究決定成立畢業分配辦公室，樊指揮長兼任主任，我被任命為副主任，負責這兩屆學生的畢業分配工作。我算是指揮部機關工作人員了，從此與機關工作人員一起上班，一起學習，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學生畢業分配辦公室除我外，還有吳宏家等工作人員，做聯絡工作和畢業分配中的具體工作。各大隊成立畢業分配小組，具體分配工作由各大隊負責。

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方案，與六二級、六三級不同之點在於，六二級、六三級學生除少數直接分到省局或基層外，多數被安排到部隊農場進行鍛煉，在農場過渡一二年後再分配到單位去。六四級、六五級的分配方案由部裏下達到省局或基層單位，而且絕大多數分到電力系統，包括農水、治河專業的很多人也分到了電力系統工作，這就是這兩屆學生中學水利的後來很多在電力部門工作的原因。

畢業分配工作中沒有碰到什麼難題，一則學生都願意早點離開學校，二來此次分配方案比他們的師兄、師姐好，所以心滿意足了。在畢業分配中，學校決定留一批學生，40人，按樊指揮長的說法是摻砂子，條件是根正苗紅，文革中不能是造反派，人員由各大隊確定，報指揮長審定，不經過辦公室。另一個問題是由指揮部決定，個別學生要在學校留一段時間，等問題搞清楚後再走（暫時不走，但要分配到位）。這兩件事我都知道，但我不能插手，也無權過問，這是樊指揮長親自告訴我的。我也清楚此中的緣由，所以很樂意不插手，不過問。

有一件事，我當時不知道，後來聽說在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時，關於學生政治態度的鑒定材料，指揮部曾有統一的要求，在寫法上分為下列九種情況：

- ① 對毛主席有極其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
- ② 對毛主席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
- ③ 對毛主席有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
- ④ 對毛主席有無產階級感情；
- ⑤ 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
- ⑥ 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
- ⑦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說了一些錯話，做了一些錯事；
- ⑧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政治錯誤；
- ⑨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政治錯誤。

按上述九種情況給學生作政治結論，這樣的事情，我這個畢業分配辦公室副主任是無權參與的，更無權過問了！

在畢業分配工作中，我祇過問了一件事。畢業分配開始不久，有

當地老鄉找到辦公室，說她女兒與某學生好上了，請求把他留下，成全他們。此後又有兩個學生找來，說了類似的問題。經過瞭解，他們確實已經談戀愛了。長陽這個地方，山多，水好，男人下地幹活，女人在家操持家務，所以女孩子都長得很好看，白白嫩嫩的。學生住在老鄉家，時間一長產生了感情。

我報告了指揮長，希望同意照顧這種關係，出乎我的意料，樊指揮長同意了我的意見。于是我與部裏聯繫，調整了分配計劃，在長陽水利局與電力局多留了3個人，其他地方則少了3個人。

還有一件事，畢業分配結束，學生回校，羅田打來電話，一輛滿載學生的卡車在返校途中翻了車，引起了長陽指揮部的一陣不安情緒。我更是擔心出人命，所以一直守候在電話機旁，直到報告說沒有人員傷亡，祇有幾個同學輕傷纔放心。

一九七〇年七月中旬畢業分配工作結束，學生陸續回武漢，然後離校，我們仍留在三洞水。之後指揮部撤回武漢，教職工也返漢，我被指定留下善後，約九月間纔返回武漢。

我與樊馬義指揮長之間的真正接觸是到指揮部工作以後，因工作關係，要經常請示彙報，在一起學習。聽同事們介紹情況，看到他待人處事的某些方面，感到他的性格、作風、處事方式與宋國英不一樣，他們的水準也不一樣。

我比較看好宋國英指揮長，他沉穩，遇事不急不躁，談話和風細雨，講道理，所以和宋談話一般不會引起爭論，而是心悅誠服地同意他的看法，即使批評了你也沒有壓力。

樊馬義指揮長不一樣，他祇要聽到不同意見就急，就要批評，就要扣帽子，甚至講粗話，對人對事容易下結論，好訓人，不僅對地方幹部，對軍隊幹部也一樣。他既不尊重別人的意見，也不尊重別人的人格，想批就批，想罵就罵，比如他說：“馬列主義教研室沒有一個好人”，“院黨委祇有一個半好人”，“水院的人都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對知識分子要改造、改造、再改造”等等，大家都覺得不可理喻。

樊馬義指揮長也有優點，他性格開朗、直率，有話就說，如他對我

講有關留校學生的挑選及推遲離校學生的事不讓我插手過問，說在明裏，這就很好，不然我作為畢業分配辦公室的副主任，會有意無意地過問一下，那就會犯錯誤了。又如，在學生畢業分配結束後，他告訴我：“你的問題沒有完，不要認為工作了，就沒有問題了，回去還是要辦學習班的”。讓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疑點未除，指揮部是不會信任我的，要我做一些具體工作是因他們需要，工作一完，仍然是嫌疑人一個，要夾着尾巴！

學校師生到長陽縣、羅田縣，說是搞鬥、批、改，實際上是林彪的一號命令造成的。這兩個地方都是山區，樊馬義指揮長提出要在長陽縣建校，大家以為是笑話，但他是認真的。

他去看了好些地方，也曾在辦公室議論過。有人提出長陽連塊大一點的平地都沒有，教室建在哪里，實驗室建在哪里，操場建在哪里等等問題時，他說，你們說的是按照舊學校的那一套，仍然是資產階級辦學的那一套。延安是怎麼辦學的，各解放區是怎麼辦學的，你們什麼也不懂，按資產階級那一套來談論建校，我們有什麼共同語言？他還說：“建什麼體育場、體育館！天天爬山，比什麼運動都好。教室可以建在山坡上，學校不一定集中建在一處，可以分散建。”可見樊馬義指揮長是動了腦筋的。

他對不同意見，往往上綱上綫，提到階級鬥爭、反毛澤東思想的高度，所以到後來也就形成了一言堂。

在長陽縣、羅田縣，教職工和學生都住在老鄉家，參加勞動，搞些政治學習，教育革命是沒有搞的。

聽說指揮部的重點工作是抓舊黨委的學習班，主要是揭、批舊黨委的問題。張如屏、梁百樸不能參加學習班，他們要勞動改造，其他黨委成員都參加。

胡緒珍特別活躍，揭發、批判都很積極，而且不留情面，深得樊馬義指揮長的好感，他講黨委祇有一個半好人，其中一個好人就是指胡緒珍。

胡緒珍是黨委委員，前任宣傳部長，後任辦公室主任。文革初



期，受到衝擊，開始“失語”，不會講話，以後發展到“失禁”，大小便不能控制，拉在身上，最後發展到“失常”（瘋了），這“三失”使他逃過了一些劫難。

工宣隊進駐學院後，他病情開始好轉，清理階級隊伍時開始能講話，但不連貫，以後還主動請求與指揮部負責同志談話。

樊馬義指揮長來到學校後，胡緒珍的病基本好了，可以揭發問題了。在舊黨委學習班上則是積極分子了，從長陽回校後，在抓“五一六”分子時，被委以重任，負責丁家顯學習班（丁由雲南調回來辦學習班）。樊馬義指揮長調走後，胡緒珍便申請調到武漢市二輕局，任局辦公室主任。

對胡緒珍在文革中的這種喜劇性的變化，有人說是裝的，為的是逃避運動，有人說是真病了，至今仍是個謎。

上世紀八十年代，胡緒珍通過他夫人張越找到我，要我到他那裏去玩，說是老朋友見見面。我想了半天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也可能是在他病後，我碰到張越就問問胡的病情，要她好好照顧他，有病要到醫院去治療。同時，在總部會上，我說胡緒珍已經這樣了，以後不要讓他陪鬥了，在會上做些怪樣子，引人發笑，影響效果（有一次讓他來陪鬥，他放了一個響屁，弄得轟堂大笑），所以後來他一直在家養病，估計這些事張越對他講了。我從北京調來武漢後，我們之間工作關係處理不錯，因此他聽說我遭遇不幸後，想慰藉一下，請我到他家吃餃子。

我去後，他很熱情，問了一些老同志的情況，介紹了他的工作，說以後需要什麼東西可以找他，我們之間的個人問題都沒有深談。

指揮部辦的舊黨委學習班，開始人人過關，以後是重點揭批，最後矛頭指向兩張——張如屏、張芾承。

張芾承在學習班挨批，觸及靈魂，結束後被掛了起來，送三大隊監督勞動。

張如屏連參加學習班的資格都沒有，被當作敵我矛盾，進行勞動改造。在過竹橋時，因晃動不敢走，祇好爬過去，他有嚴重的糖尿病，痛苦可想而知。

舊黨委的成員們，應該有親身體驗，造反派是怎麼樣對待他們的？有過這樣的揭、批嗎？有過人人過關嗎？有過侮辱人格的勞動改造嗎？

有的人為什麼在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時，在一九七七年的“揭批查”中，說造反派迫害老幹部？這樣的人，良心是被狗吃掉了呢，還是根本就沒有良心？

大隊人馬返校後，我和少數後勤人員處理善後事宜，過了半個月的好日子。之所以是說好日子，主要指伙食好、行動自由，前者因食堂積餘很多，不僅糧食積餘多，副食也存了不少，伙食費也有相當的節餘，這些都是從入伙人員口中摳出來的。

徐遠照（教務處幹部）管伙食，老叫喊食堂虧了，一旦停辦，發現積餘很多，於是大家給徐遠照起個外號叫“徐扒皮”。我們留下的人，在半個月中隨意吃（那時什麼都要票，定量供應）。

指揮部走了，軍代表、工宣隊員也都走了，我們除收拾東西，處理與地方上的事情外，沒有人管束，沒有政治學習，沒有早上出操、念語錄之類的事情，所以感到特別輕鬆，整天有說有笑的，這樣的好日子到九月中旬就結束了。

### 3. 差一點被樊馬義送進監獄

回到學校後，指揮部讓我到政工組的組織組當副組長，韓德勇是組長，政工組長是軍代表趙洪閣。

說是當組織組副組長，實際上是坐冷板凳，主要是學習。

沒有過多長時間，大約在十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家裏做午飯，保衛科有人來通知我，說樊馬義指揮長找我，而且要馬上走。此時我家裏也沒有人，我以為有重要事情找我，就放下手中的活，到指揮部去了。

來人把我領到行政大樓二樓東頭原檔案室的房間內，順手把鐵門關上，房間裏有幾張床，牆上貼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等標語，工人余松田等已在房中。接着把我的皮帶解下收走，向我宣布：“指揮部決定，辦張建成‘五不准’學習班，交待問題。”

下午，有人把我的被褥、洗漱用具送來了，我就莫明其妙地被關起來了。

從這天開始，我失去了人身自由，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失去自由。

中央學習班也“五不准”，但人多，大家在一起，無所謂，山坡學習班也如此。但這次不同，我被4個人看管着，6個人的專門班子對付我一人，那陣勢的確有些嚇人，那是對我實行專政的架式。

剛纔還是指揮部機關工作人員，組織組的副組長，轉眼成了階下囚。

下午一上班，來了6個人，其中工宣隊1人，軍宣隊1人，學校專門搞專案組的4個人。

學習班正式開始。軍代表講，所以要辦我的學習班，是因為我有嚴重的問題沒有交待，希望我抓緊時間，主動交待，這是給我的機會，不要錯過。然後其他人講話，要我端正態度抓住機會，主動交待，爭取寬大處理。

最後要我表態，我說，我在文革中的問題，已經講過多次，也寫了材料，想不起來還有什麼嚴重問題沒有講，請大家幫助，是什麼問題請告訴我，讓我提高認識。

於是大家就打我的態度，以後每天都如此。他們要我交待嚴重問題，我說沒有了，要我寫，我也寫不出來，然後批我的態度，這樣前後有半個多月時間。

十月下旬的一天，上午11時左右，樊馬義指揮長端着個茶壺來到學習班，面色通紅，一來就喊：“張建成，你給我滾回去！你根本就沒有資格住學習班。”

我又一次被搞懵了，我犯了什麼罪，連參加學習班的資格都沒有了？

我問樊馬義指揮長，你到底要我交待什麼問題？文革中的問題，我在山坡機場學習班、中央學習班都講了，關我半個多月，我確實不知道還能交待什麼。

樊說：“你給我滾！半個多月，你一個字也沒有寫，一件像樣的事也沒有交待，你根本不配再辦學習班，回家好好反省，不要上班了。”

我一聽，完了，工作又沒有了，學習的資格也沒有了。但能離開

學習班，我還是求之不得的。

我說：“真的讓我走了？”樊說：“你滾吧。”

他先走了，我也收拾東西回家。

我背着被褥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保衛科的一位負責人，他對我說，樊指揮長放你走了？我說，他叫我滾，說沒有資格辦學習班，好像火氣很大。讓我來學習班突如其來，讓我出學習班也是突如其來，真不知道這位樊指揮長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於是，他把詳情告訴了我：樊指揮長在一個記錄本中，發現了一條反動標語，發現筆迹是你的，於是先把你關起來，給省裏寫了報告，要逮捕你。今天上午，省文教戰綫指揮部韓副指揮長來到學校，找樊指揮長談話，批評他辦你的學習班，既不請示，也不彙報。韓副指揮長說，張建成是保護對象，辦學習班都不允許，你還要寫報告逮捕他？有什麼問題，找張建成瞭解清楚就行了。你不調查研究，就憑這個（指記錄本）抓人，虧你想得出來。韓命令樊立即放人，韓指揮長現在還在指揮部等着呢。

我這纔弄清楚來龍去脉。原來在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以後，在學生一舍前的馬路上，發現了一條反動標語，有人向總部報告了此事。我立即去現場看，並報告支左辦公室，他們來人照了相，指示我們擦掉。我把情況記錄在總部的日志上，以後在我的筆記本上也作了記錄。我為了在文革後能明白地向黨交待學校發生的一切，所以重大事件都作了記錄，我不僅記了反動標語的內容，也寫了處理過程。

樊馬義指揮長看到了記錄內容，他知道這標語不是我寫的，所以在寫給省裏的報告上說我擴散了反動標語，屬反革命行為，要求逮捕我。這實在是欲加之罪啊！

#### 4. 奉命組建京劇團

從學習班回來，樊不讓我上班，我祇好待在家裏。

大概在十一月下旬，有人通知我到指揮部，說指揮長找我。

這次談話沒有前幾次的火藥味。樊馬義說，你現在沒有事，老在家待着也不好，給你找個事幹，組織個京劇團，演革命樣板戲《智取威



虎山》。

我一聽，頭就大了，心想，樊馬義啊樊馬義，你不把我整死是不會甘休的。上次的事沒有整死我，現在又找個演戲的任務給我，這不是成心要我難看嗎？從北京到武漢，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沒有文藝細胞，讓我搞劇團，這不是有意整人嗎？我說，不行，我不懂文藝，更不懂演戲，請另找他人。

他一聽，就把臉沉下了，說：“誰把革命學習好再去革命？革命都是在幹中學習，這是任務，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元旦必須演出。”

要一個月演出《智取威虎山》，專業劇團也是夠緊張的，何況我們從人到物，什麼都沒有。我再次請辭，強調有困難。他態度更加強硬，說這是命令，不能討價還價，有困難你去解決，他祇要求元旦看到演出。

他是以組織名義壓我，我就無力反抗，祇有爭取好的條件。于是我提出，要我搞可以，但你需滿足我幾個條件，否則我堅決不幹。他問什麼條件，我說有四點：第一，演、職員由我定，指揮部不能干預，我要調的人，各大隊要無條件放；第二，政治學習每週為一個單元，時間由我定；第三，劇團預算你批准後，我簽字算數，不要再經過其他人批；第四，我要請專業導演，接送要用小車，有時購置東西需用車，由我直接和司機房聯繫，不需經其他人批准。他聽後想了一下說，你提的條件可以答應，但你必須在元旦演出。我說你能滿足我的條件，我保證完成任務。我算了一下時間，用5天時間完成組團工作，一個月時間排練，元旦演出是有可能的。

從指揮部出來，我就到三大隊去找肖泳華（電力系老師），他喜歡文藝方面的活動，請他幫我出出主意。他聽說要演樣板戲，就來了精神，給我介紹了不少人，也出了一些主意。聽說教務處的肖壬生搞過導演工作，我又去請教她，用了一天時間考慮方案，先解決四方面的人，一是導演，二是演員，三是樂隊，四是舞臺布置、效果、服裝等。

導演組，請湖北省戲劇學校的一位老師，校內則由肖壬生出任；

演員組，由肖泳華出面尋找，也可公開招；樂隊方面，唐冠傑是鼓手，是樂隊指揮，學校中玩樂器的人他都熟悉；後勤（舞美方面）由蔣文海（電力系的教輔人員）、吳冠英負責。三天之內，人員均已到位。

我們從湖北省戲劇學校請來了賀玉欽老師，他既當我們的老師又兼導演。他聽說我們請他幫助排戲，非常高興、熱情。

那時沒有報酬，來去小車接送，晚上有夜宵，白天管飯吃。他在一個月的時間裏盡心盡責，講戲、排戲，經常親自演唱或做示範。

我認為，我們能按時演出，賀老師功不可沒。可惜的是，自他走後，再沒有聯繫過，因為等劇團解散，我又進了學習班，以後又在五七隊勞動改造。雖然我心裏老想去看他，但不敢去，怕連累了她。

演員人選，很多人是我沒有想到的，他們的演技的確不錯，如岑華生（實驗員）演李勇奇，張澄信（教師）演小爐匠，黃金堂（教師）演座山雕等，都非常到位。有的同志唱功也很好，如演少劍波的吳榮樵（教師），演楊子榮的汪厚禮（教師）、馬駿（教師），動作乾淨利落，就像專業演員；樂團中唐冠傑（工人）的鼓，朱有常（職員）的鑼，梁克讀（教師）的京胡，蔣兆慶（教輔人員）的嗩吶都有一手；蔣文海、吳冠英更是舞美天才，不到二十天把《智取威虎山》所需的服裝、道具、音響效果設備準備得一應俱全。絕大部分道具都是群眾自己做的，我真沒有想到會這麼順利。

到十二月底，賀老師認為可以演出了，我就向樊馬義指揮長報告，我們已準備在元旦作彙報演出。樊聽了半信半疑，問我有把握沒有，我說從排練情況看，應該不會有大的問題。

一九七一年元旦前夕，在體育館準時演出了《智取威虎山》，效果不錯，各方面反映都較好。

演出成功，感慨甚多。

首先，我感到了群眾的智慧與力量，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有人說我能幹，幹一樣是一樣，連京戲都能在一個月內演出，不簡單。其實我什麼也不懂，就是創造了一個能發揮大家作用的平臺，發動群眾，激發群眾的智慧與熱情，共同做好一件本來不易做到的事情。

其次，當時的形勢對我們十分有利。長時間的學習討論，大家非常厭煩，如今有一個脫離這個環境的工作，能讓人全身心投入進去，大家十分樂意，就連省戲校的賀老師，聽說請他來排戲，也一口答應，而且再三向我表示，一定完成任務。從學校各大隊挑來的演職員更是如此，從早到晚，一天排練十幾個小時，從不叫苦叫累，反而感到心情舒暢，說明群眾需要的是腳踏實地地幹，而不是整天、整月坐着空談。

再次，目標能凝聚人心。目標明確，大家齊心協力朝目標努力。我們在練習、排演過程中，不管哪個組，目標都是在我們的條件下使演出盡善盡美，所以大家都關心每個組的工作，都關心每個人的工作，一人有難，大家安慰、鼓勵、幫助。焦澤偉（教師）演小常寶，有一句高音唱腔開始上不去，大家都焦急，一邊安慰小焦，一邊幫她出主意，最後上去了，大家都高興。劉昆山（實驗員）演副官，在解放軍攻進威虎廳時，他中彈後，要雙腳插進座山雕的椅子背，動作難度很大，屢屢失敗，在他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大家的幫助下，最後終於完成了任務。服裝、舞臺美術、音響效果，大家群策群力，最後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

完成元旦演出任務，我請求分配其他工作，樊馬義指揮長說劇團還沒有完成任務，要繼續排練，到時要外出慰問演出。

我祇好帶着大家繼續上午、下午、晚上刻苦訓練，做到“精益求精”。大家聽說要準備外出演出，劇團不散，都很高興。

我們排練一段時間後，指揮部安排我們到山坡機場，武漢空軍司、政、後機關，漢口後勤基地等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各部隊都派相應的領導接待與陪同，一般都是團職幹部，接待都很熱情，招待也很好。春節前後又到了工人宣傳隊派出單位——國棉三廠等進行慰問演出。春節後，樊馬義又派我們到京山縣鄢郝公社進行慰問演出，那是我院教職工插隊落戶的地方。當時天氣很冷，又下小雨雪，兩場演出看的人不少，我們有些演員則着涼感冒了，因為演出時祇能穿演出服。前後演了近十場。

到4月份演出結束，劇團解散。

新的一輪政治鬥爭正等待着我們，劇團人員回本單位參加清查

“五一六”。我首當其衝，劇團中有不少原是造反派成員，他們也跟着沾了火星。

### 5. 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一年四月，《智取威虎山》劇組完成任務後解散了。

樊馬義指揮長對我說：“張建成，你的問題沒有解決，繼續辦你的學習班，你要老實交待問題。”

就這樣，我又進了清查“五一六”學習班。

我是單人學習班，在學生二舍。陪我吃、住，負責監管我的有4個人，都是工人中的左派（原保守派）。

成立了專案組，專案組的任務是誘供、逼供，要我承認是“五一六”分子，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五一六”集團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我當然不承認這些莫須有的指控。

于是就打態度，在整個學習班過程中，打態度占的時間有一半左右。

開始是逼我承認“五一六”表格的問題，說學校的“五一六”分子都填了加入“五一六”的表，這張表是我在六四〇一班教室開會時發下去的。他們問我這些表格現在何處，表格是哪發的，我說根本沒有填過什麼表。過了十幾天，專案組的人對我說，弄清楚了，表格是學校印刷廠印的。

後來我纔知道，為了搞到所謂表格的證據，首先在印刷廠職工中施壓，在高壓下一位女工“承認”有此事，于是把朱天之（負責技術工作）關起來逼供、誘供。一周後朱天之承認了印過這種表格，說表格交給了王平。于是又把王平關起來逼供，無奈之下，王平說總部拿走了（指水院紅衛兵總部）。這樣就說明紅水院確有“五一六”，都填了表，表是本校印刷廠印的，有多人作證。總部拿走後在六四〇一班教室開會，張建成主持會，由丁家顯發表；有人證明，開會那天，我穿的是什麼衣服、什麼鞋，因此這成了鐵案。

專案組說，你不承認也沒有關係，祇要三人以上作證，你不承認也可以定案。我說，從來沒有聽說過“五一六”的事，更沒有填過什麼



表。總部成立後，祇填過一張表，叫“戰鬥隊情況表”，此表在總部存放，由組織組唐學斌等人保管的，應該可以找到（總部資料均由工宣隊抄走了）。

為“五一六”表格的事，折騰了一個多月。儘管專案組的人說有表，是鐵案，但始終沒有證據，後來轉而查罪行，說罪行是關鍵。

“五一六”的罪行主要是反軍亂軍和反周總理。有了這兩條，你是“五一六”就跑不了。

首先要我交待是如何組織反軍亂軍的。

我說，我一直很尊重解放軍，擁護解放軍。“七二〇”後，我和岳團長的關係很好，工作配合也很好，以後與空司支左辦公室主任武繼元關係也很好，工作上也互相配合。我到人武部辦聯絡站，就是為了維護軍人的安全和穩定軍事機關，得到了 15 軍梁參謀長的表揚。“九五命令”一下來，我們第一個向警備區交槍，得到了表揚，怎麼會反軍亂軍呢？

這就惹怒了專案人員，說：明明是反軍亂軍却說成是擁軍了，“八一〇”大會是你參與組織的吧？搶槍有你的份吧？人武部首長的批鬥會是你參與組織的吧？還有水院駐外地的聯絡站反軍亂軍這一條，你的罪行很大，證據很多，證人也不少，我們收到了不少揭發材料。你反軍亂軍是鐵證如山，罪責難逃。

接着要我交待是如何整理周總理材料的，這任務是誰給的，整好了材料後又交給誰了，都整了些什麼內容的材料。

這簡直太荒唐，太離譜了！

我問他們，你們想幹什麼？要打倒我，關押我，隨你們的便！但侮辱我不行。我敬重周總理，崇拜周總理，我把周總理當作楷模，我怎麼會反對周總理呢，更談不上去整什麼材料。你們有材料就拿出來定罪，沒有材料就不要這樣逼人。

于是就批判我的態度，在不同範圍內進行批鬥，最多的口號是：“張建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如果說在前階段，我願意檢查自己，把問題說清楚，比較配合專

案組的話，到了這個時候，我清楚他們要置我于死地，為達此目的，造謠、誣陷，什麼都做得出來。既然如此，我也沒有必要再檢查自己了，也沒有必要再與他們爭辯了。

我告訴他們，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們認為我是“五一六”，那我就是“五一六”；你們認為那張戰鬥隊情況調查表是“五一六”的登記表，那就是“五一六”的登記表。

其間，樊馬義指揮長找我談過一次話，總的意思是要我老實交待，批評我的態度。

他談了兩點，我永世不忘，一是說你在北京學習班講了那麼多“五一六”、“北決揚”的事，回到學校就沒有什麼交待的了，講得過去嗎？二是說你整周總理的材料不是我們無中生有，有人揭發檢舉，是你的同夥揭發的，你整的材料給他看過，他對材料還提出了修改意見。你不要認為你不說，別人也不會說，你想保別人，別人不會保你，你們幹的那些事，全國、全省都在查，學校也在查，大家都在交待，就你一個人咬緊牙行嗎？清醒點，痛痛快快地竹筒倒豆子，都講出來，包袱放下了就會輕鬆了，不要去考慮今後怎麼處理，那是組織上的事，你祇考慮如何把問題講清楚。如果你堅持不合作態度，堅持頑固立場，那不會有好結果。

我估計是專案組彙報了我的情況，所以樊馬義親自出面做我的工作。但我祇能退到“你說是就是”的地步，不能再退讓了。

這樣一直相持到林彪出逃摔死溫都爾罕。

林彪死後，有一段時間專案組的人很少來，後來監管我的師傅偷偷告訴我，他們聽了傳達，林彪逃走時飛機掉下來摔死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專案組纔給我傳達，謝德煥（專案人員，後任院黨委副書記）問我是否感到突然，要我談看法。

我說不突然，他們說，我們都感到突然，你倒沒有感覺？林彪是你們的後臺，你們後臺死了不感到悲傷？

我說：我所以不感到突然，是因為階級鬥爭的嚴酷性，任何情況都可能發生，今天是革命的，明天可能成為反革命。至于說林彪是我

們的後臺，根本談不上。你們不是說是林副主席親自領導和指揮你們抓“五一六”的嗎？怎麼他又成了我們的後臺呢？

說得他們啞口無言。

林彪死後，省裏的曾思玉、劉豐慌了神，他們都上了賊船。曾是活黨，劉是死黨，沒有精力再來抓我們了，學校也不知道該如何辦。

一直拖到十一月底，結束學習班。

學習班結束時，專案組的人也沒有說我是不是“五一六”分子。我被不明不白地發配到學校五七隊監督勞動。

學校清查“五一六”的運動，是省裏統一部署的。早在中央學習班時，在學習班黨委的高壓下，我校有兩個學生先後承認自己加入了“五一六”，所以學校後來把丁家顯調回來辦他的學習班。

教工造反派骨幹中最先突破的是紅教工一號頭頭、院革委會常委、辦公室主任顏國良。他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還揭發張建成整了周總理的材料，給他看了，他也提出了修改意見。同時交待了六四〇一班教室開會發“五一六”登記表的情形，細緻到他左邊是誰，右邊是誰，他們穿了什麼衣服和鞋子，張建成主持會議，穿的是什麼衣服和鞋子。

指揮部根據這些交待與揭發，再去向有關人員誘供、逼供，所以很多供詞都差不多。表面上看，說的事實都一樣，實際上是這些內容都是由專案人員說給被審查對象聽的，大家為了過關，都按專案人員說的去寫，這是極端惡劣的手法，危害極大。如果上面來檢查，大家的口供都差不多，就會信以為真，造成冤、假、錯案。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就說過：“專案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我看搞專案小組很危險。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聽塗說的。”[《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60頁]

毛主席講得多麼深刻！學校的專案組不就是這樣的嗎？經過他們的“分析”、“研究”、“重點突破”、誘供、逼供、信供，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四百多師生員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占全院

師生的 8%左右。

這裏涉及到一批學生，他們已走上工作崗位，學校的一封信函，就把他們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并要求他們的工作單位進一步審查和逼供，對他們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影響了他們的工作與使用。有的被送進了監獄，如分到江蘇的肖名珍；有的被逼至死，如六一級水能動力工程專業學生陸植鈞。陸植鈞畢業分配到雲南省供電部門，工作能力強，表現突出，率先在雲南省實現了 220 千伏綫路帶電作業，受到表彰。單位接到學校的函件稱他是“五一六”分子，于是對他進行逼、供，陸植鈞不堪受辱，也想不通，最後跳樓自殺，以示抗議。

那些造成這些惡果的人(包括專案組成員)，是否應該反思一下，總結一下，自己到底該怎麼去做一個正直的人，一個不去禍害別人的人。

湖北省清“五一六”(加上本地特產——清“北決揚”)，被審查的人有六十多萬，全國則有上千萬。

這麼大一個冤案、假案、錯案到底是怎麼造成的？為什麼最後不了了之？

在為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平反成風的年代，唯獨對“五一六”的冤、假、錯案置若罔聞，好像從未發生過似的，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認為祇有一個解釋：報復！

湖北軍人政權中從上到下有些人對造反派是心存芥蒂的，“七二〇”事件讓軍人受到過傷害，但中央肯定了造反派，不好以此說事，所以抓住“兩清一批”的機遇，大肆實行報復，要把造反派一鍋端，連根拔除。而部分保守派骨幹成員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幹部，同樣對造反派耿耿于懷，時機一到，則以專案組成員及“兩清”運動骨幹的身份趁機大肆報復。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對新中國建國以來歷次運動中被整的人，實行落實政策，平反昭雪，對文革中的老幹部、保守派人士的案件都翻了個底朝天，唯獨對造反派挨整的案件不予理會，這正說明了他們對造反派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不僅不平反，還變本加厲地把造反派作為“三種人”予以清除，而



定罪依據正好是取自清查“五一六”時的材料；新的領導人建立的專案組，其成員又正好是清查“五一六”時的專案人員；清查“三種人”的對象，又恰好是清查“五一六”時的對象，這難道是巧合嗎？不是，這是必然！因為不管在什麼時候，堅持反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人，對積極響應毛主席和黨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從一開始就視為敵人，所以他們一有機會就會竭盡所能，要置造反派于死地。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着人們，包括造反派中很多骨幹，也因此而影響他們對當時中央、甚至對毛主席的信任。他們認為這是卸磨殺驢，因為清查“五一六”有中央文件，有毛主席的批示，有周總理的講話，時間延續數年，涉及成千萬造反派成員，讓人不得不想，到底是誰之過？

讓我們從事情的發生、發展到結局中來尋找答案。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正式發表。

六月四日，北京鋼鐵學院學生張建旗與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頭目劉令凱等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成立“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下一階段主要矛頭是打倒周恩來，所以集中力量在國務院各部委散發反周傳單。

六月六日，張建旗等人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在此之前，唐聞生、王海容就外交部部分人提出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向毛主席寫了信，明確表示反對。

毛主席于五月二十九日在信上批示：“林彪、周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毛主席的批示十分明確，把攻擊周總理定性為極左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五一六兵團”搞了一個“八九戰役”，他們在北京很多地方張貼傳單攻擊周總理。

八月下旬，“五一六兵團”被取締。

“五一六兵團”從建立到取締前後不到三個月，人員不足百人，活動地點都在北京。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姚文元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中首次公開了“五一六兵團”問題，並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指出他們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毛主席在修改文章時，加了一段話：“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祇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一六兵團”頭子張建旗等人被抓，這似乎已經告一段落了。

一九六八年工宣隊進駐北京大專院校後，發生了支一派打一派的情況。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他們支持反對周總理、與“五一六兵團”搞在一起的“六一六”，而打擊了反對“六一六”的“紅旗大隊”。章含之是“紅旗大隊”的成員，她利用見毛主席的機會，告了“御狀”。毛主席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外語學院。毛主席決定派 8341 部隊進駐外語學院。

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的清查“五一六”專案組，在全國沒有動作，清查範圍主要在北京。

一九六九年五月和一九七〇年二月，毛主席先後指示：“除了殺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我說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五一六陰謀集團是一個秘密組織，數量很少，很快就發現了，揭發得早，頭子關起來了。不要亂挖，面不要太寬了。批判還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指明了“五一六”集團的操縱者是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緊接着，二月二十八日林彪指示：“軍隊是專政的工具，我們要深挖五一六，一個也不能漏掉。”

這說明無論是中央文件還是林彪本人，都在背離毛主席的思想。把清查“五一六”作為一個政治運動來搞，不僅在北京搞，還要推向全國。

北京大抓“五一六”分子，有人懷疑蒯大富是“五一六”，反映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說：“既然有懷疑，把蒯大富叫回來問問就行了嘛。”可遲群把蒯騙回北京（說請蒯回來參加四屆人大），當作“五一六”分子關起來，一關就是5年。北航也把第一個反對“五一六”兵團的韓愛晶關了起來。北京一些單位在清查中死了人。

毛主席在群眾來信中看到了一些情況，批示：“‘五一六’是極少數，早抓起來了，是不是沒注意政策，請市委酌處。”

此時，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抓“五一六”分子，對毛主席的指示、提醒，聽不進去，而地方上的大員們正愁沒有合適的理由全面打擊造反派或自己的對立面，抓“五一六”分子則是個機遇。

湖北省清算反復舊未能將造反派徹底整垮，又抓了個“北決揚”，但畢竟是極少數“土產”，群眾瞭解情況，可以騙上面，可騙不了下面。“五一六”陰謀集團則是“舶來品”，群眾搞不清楚，而且據說是搞隱蔽活動、地下活動的。這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啊，有人就利用這個機會散布謠言，說什麼“五一六”的材料轉移到了湖北，“北決揚”是“五一六”的一個分支，“五一六”的資料櫃在湖北，鑰匙在楊道遠手裏等等。

于是在中央學習班大抓“五一六”時，把楊道遠、胡厚民打成湖北“五一六”、“北決揚”的總頭目，向中央報告，湖北不僅有“五一六”分子，而且人數很多，進而各單位逼、供、信，到處都是“五一六”，造反派骨幹都是“五一六”，支持造反派的幹部都是黑後臺，這樣就可以達到一鍋端的目的。

湖北是如此，全國也是一樣。

湖北在“兩清”中被打成“五一六”和“北決揚”的有六十多萬人。

一九七二年，張體學在洪山賓館對原武漢機械學院學生劉漢武說：湖北整“五一六”、“北決揚”搞了六十多萬人，確實打錯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北省委辦公廳轉發的《中央領導同志關於湖北問題的批示要點》中明確指出：湖北省的“兩清”工作發生

了嚴重錯誤。

一九七九年十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處理北、決、揚一案的請示報告》（經省委批復同意）指出：作為認定“北、決、揚”反革命組織的主要依據即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事實已不存在，而且公開發表的“決派宣言”不能認定為反動綱領，因此，“北、決、揚”不能定為反革命組織。

湖北省整了六十多萬人，抓了很多人，死了不少人，原來這兩個反革命集團都是子虛烏有的，都是捏造出來的，這能說是認識問題嗎？

中央關於湖北的九二七指示是根據武漢軍區的報告發出的，而武漢軍區的報告明明寫着“北、決、揚”的幕後操縱者是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盛榮、反革命將領干毅、老特務周嶽森，而且在中央指示前的九月十九日已逮捕歸案，這不是欺騙中央是什麼？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毛主席對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曾思玉說：“你那裏有‘北、決、揚’，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過了一點。還是要寬大為懷嘛。”毛主席祇講“北決揚”，沒有講“五一六”，寓意深刻。

曾思玉一直壓着不傳達，直到一九七三年底離開湖北，還是沒有傳達，不僅不糾正錯誤，還繼續深挖，這不是明目張膽地不按主席指示辦嗎？明目張膽地對毛主席耍兩面派嗎？

由以上綜合的情況來看，在全國大抓“五一六”，還是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藉着毛主席對北京外國語學院問題的批示做文章，他們把個別擴大到一般，把局部擴大到全局。

對毛主席關於不要亂挖，不要搞逼、供、信，要注意政策等指示，他們聽不進去，而是捏造事實，謊報軍情，欺騙中央，取得尚方寶劍，到下面大搞逼、供、信，大開殺戒。對上則封鎖消息，即使被毛主席看出來，當面批評，也堅持不改。他們的目的，祇是一個，就是要把造反派斬盡殺絕。

這樣的人中央有，地方有，軍內也有，他們勾結在一起，欺騙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某些話來販賣自己的私貨，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彪摔死後，在清查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的過程中，樊馬義也被拉扯上了，說他堅決執行了林彪的軍黨軍國論。劉豐是林彪死黨，武漢空軍就成了重災區。樊馬義指揮長被送進了“五不准”學習班。

他進了學習班，我出了學習班。

聽說他不服氣，與領導上頂得很凶。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據上級指示辦的，錯了首先由上級負責。

他說，按你們（上級）的要求，造反派會一個不剩，我在水院還留了幾個。這也是實情。

樊馬義指揮長肯定有所“創造發明”，例如他說“水院不槍斃幾個是不行的”、“水院不把張建成打倒是不行的”、“水院的人都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等等，這些不會是上級指示的，但他做的大部分工作應該是按上級指示辦的。

所以我聽後也有幾分佩服他敢頂上級的精神。

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出了問題把責任推給別人，特別是推給已經下臺的。例如湖北的問題就推到了劉豐身上，因為他是林彪死黨。水院的問題則推給樊馬義指揮長，因為他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風。我認為這是不對的，該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

樊馬義指揮長在學習班待了半年，回到山坡基地後就不上班了，天天釣魚。有人曾去看望過他，他不刮鬍子，鬍子長得很長，天天曬太陽，曬得很黑。大概是因為鬱悶、心情不好，所以在他不該走的時候，就走了。

他在學校時，我對他有看法，感覺他不講理，唯我獨尊，整人不遺餘力，但他的結局，我很同情，覺得不該是這樣的。一方面這是中國式的政治所致，同時也是他的性格所致，他應該也屬於歷史悲劇人物之一。

## 6. 五七隊監督勞動

學校成立五七隊，讓教職工輪流到五七隊勞動，是工宣隊指揮部搞鬥、批、改的成果之一。五七隊的名稱是源于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對總後勤部一個報告的批示，稱為“五七指示”。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

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主席在這裏講的是教育革命，是如何培養學生。此時學校裏已經沒有學生了，教師中有一些已被安排到京山縣插隊落戶去了，大多是全家去的，不準備讓他們返校了。這時祇有組織在校教職工輪流參加勞動，改造思想。

我到五七隊時，第一批人員剛集中不久，說明五七隊剛開辦。朱冠先是隊長，宣布我是屬於監督勞動的，平常不准回家，每週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上報到。我住在學生八舍一樓的西頭，每天伐樹、種菜、管魚塘。

參加勞動對我來說一點也不苦，我身強力壯，農民、學徒出身，幹活是難不倒我的。比起“五不准”學習班，輕鬆多了，加上監督我勞動的人都是熟人，他們中大多數人幹活都不如我。

食堂師傅對我特別照顧，打飯、打菜總比一般人給得多，特別是菜裏的肉，打菜的勺子晃動幾下，肉都進入勺裏。有一次隊長說，怎麼你的飯、菜比我的多，我說一樣的，是你心理作用（那時吃飯要交糧票，都希望多給一點）。

我當團委書記時，在學生宿舍住，在學生食堂吃飯。有時為研究學生伙食問題，和師傅們交流，所以師傅們瞭解我。領導上說我是反革命，他們不相信，他們不能抗爭，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我，向我表示了他們的心意。我內心感激他們，也感到溫暖。

不知什麼原因，五七隊搞了兩期（四個月）就沒有人來了，留下了陳克順（總務處幹部）、廖炎臣（工人）、黃時利（工人）、黃鳳林（武裝部幹部）和我幾個人，種點菜、管管魚塘，活很輕鬆。我仍然是監督勞動，所以祇能在星期六下班後回家。

那時沒有電視，下班了無事可做，晚上更沒有事，我就開始種菜，並學會了釣魚。與黃鳳林一起，白天釣鱔魚，晚上捉鱔魚，叫做白天“願者上鉤”，晚上“強迫服從”。

那時的鱔魚多，又大，凡有水的溝裏都有。魚塘邊上有一小間廢

棄的抽水機房，房中水深 30 多厘米。黃鳳林有經驗，讓我找些樹枝、稻草放進去，一周後，將水排掉，一屋子的鱔魚，整整一桶，後來幾次少一些，但每次都有。我們在五七隊自己做飯吃，鱔魚太多，吃不完，拿回家也吃，吃得我再也不想吃鱔魚了。

我一年四季的菜都種，不少人知道我種菜，不請自去採摘，碰到了說一聲：聽說你種的菜很好，弄點嘗嘗鮮。碰不到也拿了就走了。好在我種得多，星期六回家總可以帶一些回去的。

在五七隊我學會了“自得其樂，苦中求樂”的辦法，這對我在今後的逆境中求生存非常有益。

一九七三年的下半年我離開了五七隊。

### (三) 吳紹文時期(一九七二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五月)

吳紹文原任武漢空軍司令部通訊部部長，樊馬義被送進軍區辦的學習班後，吳來院接替樊的工作，任指揮長。

吳紹文在院工作期間，我和他未談過話，沒有任何接觸。

後來的情況說明，吳在院期間，主要是政策調整期，逐步使學校工作走上正軌。

一九七一年春季開始招收少量工農兵學員，招生人數逐年增長，學校教學工作向正常發展，同時學校幹部逐步得到解放。

一九七二年九月成立了院臨時黨委，吳紹文任黨委書記，魏承厚、崔連貴任副書記，他們是外單位調入我院的領導幹部。後又調入梁道平(原武漢機械學院副院長)，解放了我院原副院長張瑞瑾，任命他們為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三年三月解放了原黨委副書記張蕪承，任命為臨時黨委副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三年七月，調入密加凡(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任院革委會副主任。

至此，一切工作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從一九七二年九月開始，工宣隊指揮部已不再領導一切了。黨委書記是軍代表吳紹文，副書記 3 人，革委會副主任 6 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委會，有其名，無其實，因為委員都被

隔離審查，至今未解脫，副主任張如屏、張建成都被當作敵我矛盾排除在外，所以此時的革委會沒有委員，沒有群眾代表，祇有上級任命的主任、副主任。

到軍宣隊一九七四年撤出我院為止，對我院原領導幹部“三張一梁”，解放安排了張芴承（副書記兼副主任），張瑞瑾（副主任）；對張如屏、梁百樸二人仍掛着，對他們的歷史問題，經多次長時間的審查，仍是原來的結論，但仍不解放。之所以這樣，我認為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文革中支持了造反派。

在這4位領導幹部中，張如屏在水院的幹部中很有威信，他的道德風範是有口皆碑的，又是為革命事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他歷史上的問題，早在延安審幹中由中央組織部作了結論，陳雲部長親自與他談了話，此後歷任要職。說是有歷史問題而不解放，無法服人，祇能解釋為，一是他支持了造反派，二是省裏有人作梗。直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張如屏纔恢復了院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張瑞瑾是國內外有名的泥沙專家、學術權威，在政治上一直與黨保持一致，應該屬於黨內的專家，學校師生對他反映都比較好。

而群眾意見比較大的是張芴承，他却較早得到了解放。

梁百樸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解放，被任命為革委會副主任。

學校的中下層幹部到一九七四年吳紹文離開學校時，已全部安排了工作。

對於參加了造反派、在“兩清一批”中受到審查的教職工，除個別別人外，也都安排了工作。王紹良被任命為校機械廠廠長，我也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被任命為院人防辦公室的副主任（後任主任），從事“深挖洞”的戰備工作。

所以，我認為吳紹文時期是一個政策調整期，吳指揮長本人比較低調，工作做得不少，却從不張揚。

我雖然沒有和他交流過，但他給我的印象還不錯。吳紹文于一九七四年五月被免去黨委書記職務，率軍宣隊撤離學校。學校工作由黨委副書記魏承厚主持。



## 九、正式安排工作時期 (一九七三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底)

從一九七三年八月到一九七六年底的三年半時間，是我在文革中被正式安排工作的時期，是我努力工作、發揮才幹的一個時期，其間經歷了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兩次運動。

### (一) 在院人防辦公室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三年八月，院黨委副書記魏承厚找到我到行政大樓談話。魏副書記先談了他到水院後，聽不少人說起過我，反映不錯，在五七隊勞動期間的表現也可以，所以黨委決定讓我出來工作。

談到工作，他說現在要準備打仗，所以省、市、區及各大單位都成立了人防辦公室，負責挖人防工事。接着說毛主席指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偉大意義，讓我到人防辦任副主任，負責規劃我院的人防工事，並組織實施，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找他。他叫我先考慮一下如何起步。

我回到五七隊，講了領導與我談話的情況，黃鳳林表示願跟我到人防辦工作。

經過一番調查、瞭解後，我給黨委寫了報告。報告根據對學校地形、土質及各大樓地下室位置的調查，初步確定了人防工事的走向。在人員方面，提出需要增加規劃設計人員、挖掘機設計人員、施工中的混凝土技術人員，以及爆破技術人員、技術工人等，並建議規劃設計、混凝土施工、爆破方面的技術人員從有關教研室抽調。我點名要陳士良（動力系教師）和黃覺民（學院機械廠技術員）負責機械設計，爆破工為修繕隊的許繼元（他以前搞過爆破工作）。黨委派吳國棟老師來做規劃設計工作並負責人防工事技術方面的事務，混凝土技術人員派來牛光庭老師，爆破方面派來周祖仁老師，以後又來了江慶嶽。

這樣，我們人防辦有固定人員 4 名，借調人員 5 名，分別進行人

防工事規劃設計、掘進機(現在叫盾構機)設計製造、混凝土被覆材料施工、現場爆破清土等工作。大家各負其責,工作全面開展,一九七四年初正式開挖。

我院人防工事的規劃,是由西向東沿家屬宿舍到行政大樓、教學樓、學生宿舍挖主幹道,高二點四米,寬二點二米,半圓形拱頂,鋼筋混凝土結構;由主幹道到各家屬區、教學樓地下室、各學生宿舍均為支道;在主幹道兩側挖房間,包括指揮所,糧、水儲存室,風機房,醫務室,病房以及進洞師生休息室等,戰爭時所需要的設施儘可能齊備。

我們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到湖南長沙、湘潭、株州、衡陽等城市考察學習後,在規劃中又加了一項平戰結合的要求,計劃人防工事建成後,利用地道恒溫的特點,夏天可以抽地道裏的冷空氣來滿足住房、教室、辦公室、飯廳等場所的供冷要求。這是湖南人在平戰結合上做出的貢獻,我們去參觀時感到非常舒適,所以有此修改。

施工方面,初期採用爆破、清土、混凝土磚拱形被覆,一天1米的進度。

開始大家都說完不成,我說由我帶班一周,如能完成就定一天1米的指標,如完不成再議。

我組織了兩班人員,白天班打炮眼,爆破,清土清場,第一天要加班,到第五天,下午3點多鐘就完成了任務。晚班從運混凝土磚開始,到被覆結束,7個小時可以完成。

于是,我們決定在正常情況下,每天1米的進度必須保證,遇有塌方搶險,另當別論。

一九七四年年中,挖掘機製造完畢,投入使用後仍為一天1米的進度,這是為確保安全所必須,因為一旦挖出新的斷面,土層極易風化,時間稍長,就會自動剝落或造成塌方,所以開挖後要立即被覆。

挖掘機使用了不到三個月,在行政大樓前遇到了大塌方,把機器埋了,祇好開頂,將挖掘機吊出,以後就不敢使用了。因為機器長度在2米以上,被覆的坑道是在挖掘機後面的1米距離,即挖掘機所處位置,已經出土了,這2米多長的坑道祇能在第二天再掘進1米時,

纔能被覆 1 米，這 1 米實際上已經過 3 天的風化。經地質教研室老師研究，認為這種土質經過兩到三天的風化，很難保證不剝落，塌方的危險性很大。

實際上挖坑道的兩種方法都有危險。用爆破方法，最大的危險是有啞炮。每次放炮，祇要少了一響，我的心就緊張起來了，直到排除啞炮為止。而使用機械，最害怕的就是塌方，在處理行政大樓前塌方的過程中，我差點送了命。

在人防工作期間，我給自己定了一條規矩：凡遇有排險的情況，我要站到最前面，不摸清情況，決不讓別人上前。

這次我和人防辦幹部蘇青山去觀察塌方的情況，評估是否有可能搶救過來，我讓劉世清同志（水電組工人）盯着坑道上方。當我正在察看情況時，劉世清突然看到有一小顆土粒從上面掉下來，他大叫一聲，危險！沖進險區一把把我拖出，我剛被拖出，幾噸重的土從上往下掉，真是險！我撿回了一條命，生死就在一瞬之間。

為了減少塌方的危險，一方面施工時建立了觀察員制度，專人負責察看開挖時被覆斷面土層變化，一有情況，施工人員必須立即撤出，同時立即報告辦公室；另一方面，改進施工技術。

當時國際上比較先進的施工方法是噴錨技術，就是在需被覆的地方，先植入鋼筋，然後將混凝土高壓噴射到被覆的地方，混凝土很快凝固並與植入的鋼筋（即錨栓）固定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這樣又快又省時間，可有效防止開挖面的風化塌方，同時也節省了勞動力。

這項技術是楊壽昌老師提出的，他給我詳細介紹了情況後，我非常感興趣。設備主要是大型空壓機和噴槍。

我到武漢市人防辦公室搞來了空壓機，通過水電部搞到了噴槍。楊壽昌老師指導，江慶嶽負責施工，果然不錯。後來武漢市人防辦也使用噴錨技術，江慶嶽被請去負責技術指導。

此後我國在水利工程、坑道工程大規模採用噴錨技術，江慶嶽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成為各水利工程局和鐵路施工部門的座上客。他的基礎就是在水院人防工作中打下的。

人防施工的勞動力，一是抽調部分教職工輪流勞動鍛煉，二是學生輪流參加，所以工農兵學員中有不少人認識我。採用噴錨技術被覆後，就不需要師生員工參加了，由專門班子施工。

人防施工很辛苦，又髒又累，我想給他們搞點糧食補助，學校批了。又想建個洗澡的浴室。當時因為缺煤，學校每週開放一次澡堂，而我們需天天洗澡，幾次協商都解決不了。

正在一籌莫展時，我一位中學同學杜一華（空軍某師訓練科長）從山西出差來武漢見我。他在長治煤礦支左，來武漢與有關部門商談長治向武漢供煤的問題。我向他提出，能否幫我解決點煤，他問要多少，我說 50 噸。他立即給我寫了一張條子，叫我到武漢市煤炭公司找經理，他會解決的。我第二天就去了，經理見條子就答應了。經理辦公室的另一位負責人說，一要就是 50 噸，你那麼痛快？經理說，杜代表的條子，你能不同意？那時我不懂得社會上的那些關係，聽了後，覺得老杜面子好大。

從此人防辦有了自己的澡堂，而且天天可以洗，知道情況的老熟人有時也會來洗澡。春節前我們會開幾天“小竈”，以滿足有關人員的需要。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武漢市人防辦公室在我院召開人防工程規劃交流會，參加會議的有湖北省有關部門，武漢市各區、局，大型廠礦、高校、駐漢部隊的人防辦公室負責人一百多人，由我向會議報告了我院人防工程規劃及施工情況。

張蕪承副書記講了話，特別強調了黨委對人防工程的重視，派一位革委會副主任專門負責人防工程的規劃與施工。

我聽了以後，感到莫名的惆悵，這個時候，我又成了革委會副主任。工宣隊一進院，我這個革委會副主任就靠邊站，從那時到現在，根據他們的需要，我已經臨時充當了 3 次革委會副主任。

第一次是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要我負責，樊馬義指揮長說，你是革委會副主任，就當畢業分配辦公室副主任，他當主任。工作一結束，我又進學習班。



第二次是組織京劇團，到各地慰問演出。為了證明領導對樣板戲的重視，宣布由革委會副主任張建成親自抓，親自帶隊到部隊、農村、工廠慰問演出。我也着實風光了一陣子，各單位都派負責人接待，陪我吃飯，陪我看戲。此事結束了，又把我送進了學習班。

這第三回又因挖洞，引起了省、市有關部門的重視，開現場會，學校很光榮，我又當了一回革委會的副主任。但不知道這工作結束後，我的結局又當如何？

我知道，領導上是不得不安排我做點工作的，因為上下都有反映，老在五七隊勞動改造是不行的，但對我是絕對不會放心的，也不會放手的。例證就是我院的人防工作，年年是省、市先進單位，先進個人也有好幾位，但我不能代表學校出席表彰大會，我也沒有資格當選人防先進個人。

這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伎倆，應付上面和欺騙群眾的手法，我算是領教了。

人防工程現場會結束不久，我被調總務處工作，人防工作由陳傳綱接手。我雖然不負責人防工作了，但因為有感情，還是經常去人防辦玩，與陳傳綱、黃鳳林聊聊。我們三個人也說得來，經常一起到張如屏院長家去聊天，成為很好的朋友。

## （二）批林批孔運動中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兩報一刊”社論《元旦獻詞》中提出了“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綫的頭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把批林和批孔連在一起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轉發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轉發的《通知》中說：這個材料“對繼續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綫的極右實質，對於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綫方面的教育會有很大的幫助”。中央明確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實質不是左，而是右。

由于湖北從一九六九年，以批左為旗號，以“兩清一批”為手段，瘋狂地鎮壓造反派。林彪事件後，仍堅持批左，說林彪是造反派的後臺，繼續鎮壓造反派。

可以想像，元旦社論和中央一號文件，對造反派來說是多麼重要、多麼有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農曆正月初三），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一萬多人到會。中央領導周恩來等均參加了大會，這意味着批林批孔運動將在全國展開。

一九七四年的頭一個月，從“兩報一刊”社論到中央一號文件，再到中央直屬機關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批林批孔的來勢迅猛，各級領導有些措手不及，造反派也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這場運動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也弄不明白，怎麼突然搞出個批林批孔運動。

校黨委領導對運動摸不着頭腦，除按照省委安排組織學習以外，總想瞭解點情況。魏承厚副書記找我，問我對批林批孔運動有什麼想法，有些什麼消息。當時我正忙于挖洞工作，對外邊情況一無所知，所以也講不出什麼想法。他說，省委在二招開座談會，你抽點時間可以去瞭解一下，有什麼情況告訴我。

這就是批林批孔初期的實際情況，領導不清楚，我們也不清楚，他要我去摸摸情況，我也想去瞭解一些情況。

### 1. 打聽省座談會消息

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間，省委第二招待所（地點在武昌首義路）熱鬧非凡，湖北省委召開的省、市革委會群眾代表，工代會成員以及有關人員的座談會在此舉行。

各地、縣、武漢很多單位一些原造反派頭頭，也擁到這裏探聽消息，像現場採訪的新聞記者，看到裏面出來一個人就圍上去，探問座談會內容，什麼領導參加了，講了什麼，什麼時候放胡厚民、楊道遠等等。大家最關心的是省委領導對解決“兩清”問題的態度。

中科院武漢分院物理研究所的袁作斌介紹了會議情況，好像現在的記者招待會。大部分人聽後就走了，有少數人還在門外等，希望能見到有關領導以便直接反映情況。袁作斌要大家有什麼材料可以交給他，他會轉交給有關領導或有關部門。我們也寫了有關水院“兩清”情況的材料交給袁作斌，他是否轉交給了領導，我們不得而知。

我每次都是和王紹良、胡震宇同去的，我和王紹良同與會人員不熟悉，胡震宇原在革幹聯工作，對社會上的人比較熟悉，所以每次都邀他同往。我們一共去了三四次。

有一次我決心等夏邦銀（抗暴時在水院見面較多，故較熟悉），結果真等到了。我問夏，省委有沒有決心解決“兩清”中的問題，夏說，看來趙書記（辛初）有決心解決。

我每次都將瞭解到的情況向魏承厚副書記作了彙報，他也很需要這方面的資訊。

受魏承厚副書記指派，我到二招聽了幾次“新聞發布會”，見了一次夏邦銀，日後就成為我與“四人幫”黑幹將夏、朱、胡關係密切的“鐵證”。

## 2. 努力爭取為“五一六”冤案平反

我們在批林批孔中希望解決的問題，祇有一個，就是為“兩清”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師生員工平反，上送材料，與院黨委領導談話，到向省委反映情況，都是為了這個問題。

我們的態度是，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很多學生都背了這包袱，傷心地離開學校，有的學生因此而坐牢，如分到江蘇的肖名珍同學；有的被逼致死，如分配到雲南的陸植鈞同學。

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依靠省委、院黨委，現在形勢不一樣了，省委、院黨委都恢復了，不能再用文革初期的辦法了，既要解決問題，又要安定團結，矛頭不要針對專案組人員。

水院黨委的領導，除張蕪承外，都是外面調來的，對“兩清”問題是超脫的。張蕪承也沒有參與“兩清”的工作，也是超脫的。因此我們認為存在着解決“兩清”問題的有利因素。

對領導不能攻，而是反映、彙報情況，讓他們瞭解“兩清”中的問

題，取得他們的支持。以上這些是我的觀點，也是水院在校造反派頭頭的共識。

我到省委宣傳部反映水院“兩清”中的問題及我們的態度，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親自聽取了彙報，他對此給予肯定，並要我做好被整的人的工作，相信省委會解決“兩清”中的問題。我把這些情況通報給了在雲南的丁家顯。

焦德秀告訴我，湖北的“兩清”工作肯定擴大化了。這是我第一次從省委領導口中聽到承認“兩清”工作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後來纔知道，毛主席早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就對曾思玉說：“你那裏有‘北、決、揚’，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過了一點。還是要寬大為懷嘛。”

我們的這些觀點，黨委副書記魏承厚、崔連貴等都是肯定的，我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堅持這樣的認識。

為了領導好批林批孔運動，黨委決定成立院批林批孔辦公室，黨委宣傳部長常樹蔭任主任，任命我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總支書記任組長，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師為組員。主要任務就是為“兩清”中的冤、假、錯案平反，處理黑材料。

學生中的重點人物，派專人去平反，處理材料。一般人員去函平反，請單位幫助處理。一些原專案人員也積極參加了這項工作，原保衛科長李喜爾到江蘇處理肖名珍同學的問題，組織部的韓德勇到雲、貴、川歷時 1 個多月處理學生中的平反問題，都卓有成效。被平反的學生，多數對學校很感激。

學校教職工中的問題，由各總支負責處理。總的來說，處理得比較順利。

### 3. 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幾件事

#### (1) 關於為楊道遠翻案問題

鋼二司的戰友們為楊道遠翻案的事，我並不清楚。一九七四年四月下旬，李莉（武漢測繪學院學生，二司政參部情報組成員）來找我，對我說，他們正在給中央和省委寫一份有關楊道遠的材料，對過



去揭發楊的一些不實之詞需要有旁證材料，這樣纔有說服力。因為我在中央學習班揭批楊的大會上說楊是“五一六”在湖北的代理人，所以要我寫一個否定的材料，我當即同意。

我受某些人的利用，被他們當槍使，陷害、攻擊楊道遠，一直感到愧疚。現在有機會向中央、省委說明真相，我當然樂意接受。同時，李莉要我轉告陳伯強（水院政治課教師），請他寫一份關於《武漢事件》的寫作與出版情況，我也答應了。

我在材料中聲明，我在中央學習班的發言中有關楊道遠“五一六”及其他問題的材料，是由學習班黨委提供的，我不瞭解情況。陳伯強的材料證明他編寫與出版《武漢事件》一書與楊道遠無關。

我認為，在運動中由于某種原因說了假話、錯話，予以更正是負責任的態度。說假話有罪，改正錯誤、說真話是無罪的。

文革後整我，結論材料中說我“參與策劃為楊道遠翻案，指使陳伯強等人為楊道遠寫出多份翻案材料”等等，與事實相差多麼遙遠！

一九七四年四月方保林回武漢，五月他召集原二司各校頭頭在武漢大學圖書館開座談會，我也去了。

他瞭解到我院把批林批孔運動與解決“兩清”問題密切聯繫起來，而且依靠黨委解決問題，效果較好，要我在會上談談情況。我把我們的指導思想與做法作了介紹。

這一情況從組織原則來講是不合適的，因為群眾組織已不存在，方保林名義上雖然是省革委會常委，但已離開湖北到外地工作，所以召集這樣的會當然無法可依。

但是，方保林作為原鋼二司的副司令、湖北省革委會常委，看到原鋼二司的小將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極大傷害，他關心着他們；他從哈爾濱回漢，瞭解到我院對此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希望各校都能解決，他的心理壓力會小一些，開個座談會交流一下，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理解。我正是理解了他的想法，纔欣然參加座談會，也講了話。

後來整我時，說我主持了為楊道遠翻案的原二司各校頭頭的會，

他們高抬我了，我沒有資格主持和召開這樣的會。

也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四五月間，劉漢武（武漢機械學院學生）向我借一份《紅水院》報，說是要寫鋼二司的歷史材料，想瞭解各總部的活動情況，我認為這是好事，就同意借給他。

結果，此事又和為楊道遠翻案連在一起，說我“提供了一套載有楊道遠領導鋼二司建立豐功偉績的《紅水院》小報，為他寫翻案材料用”。

牽強附會，捏造事實，這是一些整人能手的一貫伎倆。

## (2) 關於黨委領導造反問題

批林批孔運動中，曾發生過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很多單位的領導，以黨委的名義到軍區、省委造反，原來的保守派骨幹大多支持這種做法。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以張芾承副書記、侯發亮常委為首，也組織一些人，乘大卡車到黨、政、軍首腦機關去造反。

對此我是堅決反對的，這股風怎麼刮起來的，不得而知。此前祇感到一些人提出殺向社會，希望社會上亂起來。

我院在辯論形勢時，過去偏保守的要殺向社會，過去造反的人却提出“立足基層，關心社會”的口號。以後的行動也是如此，偏保的造反去了，造反的都留在學校按兵不動。

這種情形，從正面理解是對形勢的估計問題。主流派（領導層和他們的骨幹隊伍）認為批林批孔運動既然是批右的，而且任務之一又是為被整的造反派平反，這種形勢與文革初期的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相似，生怕又一次站錯隊，於是率先殺向社會，造領導機關的反。他們又一次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成為文革史中一大笑料。馬克思曾經說過：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 603 頁）。這不正是我院某些領導人的寫照嗎？

此時的形勢，是強調一元化領導，通過批林批孔，有組織有領導地解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具體要解決“兩清”中的錯誤。

我想，如果造反派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殺向社會，造黨、政、軍首腦機關的反，那將是多大的罪過啊！而那些所謂的主流派到軍區、省委造反的行為，却什麼事都沒有。而造反派即使不殺向社會，不造反，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在整我時，說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制定了“立足基層，關心社會”等反革命策略，說我是反革命兩面派！

在黑白顛倒的年代，有地方說理麼？更何況這個口號根本不是我提的，是有人在形勢辯論會上針對“殺向社會”的口號提出來的。

### (3)關於四人大字報問題

批林批孔運動中，有一張四人大字報，即姚德勝、王紹良、熊德才、張建成四人署名的大字報，其中引用了毛主席在“批陳整風”時說過的“甩石頭，挖牆腳，摻砂子，拔釘子”。引起了一些人的擔心，主要是行政大樓中的一些人。

這張大字報是姚德勝起草的，王紹良看後給我看，我看後要他把這句話刪掉，我說用在這裏不合適，這是毛主席對敵鬥爭的手段。他沒有告訴我是我們合寫的大字報，結果不僅這句話沒有去掉，還代我簽了名。貼出後有人反映“搞得人心惶惶”，我確實感到不妥。于是我在幹部會上，黨委、革委會聯席會上，兩次作了說明和檢討。

後來此事成了我的罪名：“為改變基層組織的領導權製造輿論，造成幹部群眾的進一步對立”。

### (4)關於任院批林批孔辦公室副主任的問題

成立院批林批孔辦公室，任命我擔任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分別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師任小組成員，這是黨委的決定與安排，事前也沒有和我商量過。

一九七七年整我的時候，硬說是在我們的壓力下纔這麼做的，目的是要篡奪批林批孔的領導權，逼迫黨委按我們的要求進行批林批孔。

我又一次領教了什麼叫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 (5)關於給王新民寫信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也被用來大肆批判，并被用來做我拉幫結派、篡黨奪



與王新民(左)一九六七年冬攝于水院

權的“證據”。

他們說，我和王紹良給原總部勤務組副組長王新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批林批孔的大權掌握到我們手中來了”，“正準備納新、提幹”，“祇要我們在水院有一點權力的話，我總要設法把你調回學校來的”。

我感到信中的口氣不像是我的，當時希望他們把原信給我看，但他們就是不拿出來，因此我懷疑是編造的。特別是第一句，當時我們一直主張依靠黨委來解決問題，黨委不同意的事是辦不成的，我們的目的是希望通過組織，

正式為被打成“五一六”的師生平反，除此以外，別無它求；“納新、提幹”是一九七六年“轉彎子”時期出現得比較多的一種說法，所以我認為一九七四年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提法。

至于把王新民調回學校的想法我是有的，因為王新民的確是一位優秀的人才。他學習很好，文革開始時，他是大三學生，除主修英語外，還自學了日語和俄語，這在學生中很少見。在總部工作時，我與他接觸多了，感到他工作能力很強，文筆很好，群眾關係也好。我是一個很愛才的人，



與王新民(左)二〇〇〇年春攝于深圳



所以我認為這樣品學兼優、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工作能力強的優秀人才，應該作為革命事業接班人。

不僅是王新民，我還看中了賴文德，賴的特點在學習上并不突出，但其刻苦耐勞、任勞任怨、兢兢業業地工作、熱心為群眾服務的態度感動了很多人。文革中很多困難的場合都有他，夏天光着腳參加游行，我認為這樣的人搞行政、總務工作絕對是一把好手。此外，還有如趙三其、駱應龍、陸和寶，他們在校時已是共產黨員，學習、工作、人品都很好，這樣的人應該當教師，為人師表。

事實證明，這些人後來到社會上都很不錯，擔任了各方面的領導工作。學校某些人容不得他們，其他單位自有慧眼識英才。

王新民在江蘇興化市擔任職工中專副校長，賴文德成為福建省電力勘測設計院的副總工程師，駱應龍擔任徐州電力局的局長兼黨委書記，陸和寶曾任濟南黃台電廠廠長，後任省電力局下屬某單位的黨委書記，趙三其任南方電力公司副總經理。

有機會把優秀的學生調回學校，把我這樣的想法說成是拉幫結派、篡黨奪權，這難道不是無稽之談嗎？

如果某些人強加給我的罪名成立，那麼水電部教育司的領導，華北電力學院的領導，省委宣傳部的領導，省委常委們，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魏承厚副書記、崔連貴副書記、張莠承副書記，都有拉幫結派、篡黨奪權的嫌疑，因為他們有的要我去，有的要留我，有的參與了提拔我。就連張莠承書記也對水電部教育司高之梁副司長說：“張建成是個不錯的幹部，有政策水準，有工作能力，群眾關係也好，學校需要他。”這能說張莠承是拉幫結派、篡黨奪權嗎？

我沒有權力把什麼人留下來，把什麼人調進來，僅僅是想想而已，就被安上拉幫結派、篡黨奪權的罪名。那些有權力留下什麼人，有權力調進什麼人、提拔什麼人的領導，應該反思一下，被你們認為是接班人的、提升為學校主要領導的幾個人，由于貪污受賄，生活腐化，自殺的自殺，判刑的判刑，相比之下，你們應負什麼責任，擔什麼罪名？

我堅信，上面提到的王新民等同學，他們決不會做這些事！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我依靠黨組織，做好原造反派的工作，為廣大被打成“五一六”的師生平反昭雪盡了自己的責任。

而對於我自己的問題，我沒有關心過，也從未向領導提出過，材料也沒有處理掉，祇要大家的問題解決了，我的心就安了。

這段時間，我的主要精力仍在人防施工方面。

學校平安地渡過了這一風浪，當時無論是省委宣傳部、省文教辦公室，還是學校黨委，對我都是滿意的，並且贊揚有加。我因此而得到了省委某些領導人的看重，之後屢次要提拔我（我都拒絕了），學校也開始考慮對我的工作安排問題。

誰能料到，一九七七年整我時，批林批孔中的一舉一動都成了罪狀，而且都和“四人幫”、“夏、朱、胡”聯在一起，都和拉幫結派、篡黨奪權聯在一起。領導人要我做的事，不管對錯，都要我承擔罪名。

難道政治真的這樣“無誠實可言”麼？真是這樣殘酷無情麼？真的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麼？我對此持否定的態度。

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首先要明確的是，政治鬥爭就是階級鬥爭、路綫鬥爭。路綫不同，階級立場不同，對同一事物就會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結論。

誠實的政治家提倡實事求是，事實本身不能編造，不能隨心所欲地去改變事物的本來面目。對事實本身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決不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地改變事實真相。政治鬥爭也講究人道主義，如戰爭中不虐待俘虜，審查中不搞逼供信，不得打人、侮辱人格等等。

一個單位的領導人本身人格有問題，他就不會按政策辦事，他要瘋狂地報復，他要置你于死地，他就會捏造事實，編造文字，就會搞逼、供、信，就會有病不讓你看病，不讓你休息，因為他本來就想置你于死地！

毛主席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來信上批示：“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可見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不是個別的。

### (三) 在總務處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一天，魏承厚副書記找我談話，黨委決定調我到總務處工作。魏書記說，你擔任黨政一把手，蘇敏是副書記，胡平為副處長。我服從組織安排。

十二月初在六四〇一教室召開總務處全體員工大會，梁道平副主任宣布了對我的任命，擔任總務處長、三總支書記。

到總務處工作，對自己是個挑戰。總務處的四大科長，人稱“四大金剛”，都是三八式的老黨員、老資格；副書記蘇敏也是老資格，是組織部長馮萬秋的愛人；胡平是轉業上學的，他和總支秘書肖恢先學歷比我高、資格比我老，因此我做好了碰釘子的準備。

好在當時的政治形勢對我這個小兵還算有利，批林批孔剛結束，人防工作搞得有聲有色，新來的領導人魏承厚、崔連貴、梁道平、密加凡都熱情地支持我的工作。

#### 1. 抓總務工作指導思想的教育

我到總務處抓的第一件事，是解決總務工作的指導思想問題，即總務工作的對象與目的。這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教務部門與總務部門經常產生矛盾的根源也在這裏，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存在，北京電力學院也存在。

我長期在系裏工作，對此體會很深，雙方都不理解、不諒解對方工作的艱難，祇希望對方能滿足自身的要求。我在系裏工作時曾想過，把兩個部門的工作人員適當對調，也許可以解決這一矛盾。

教務部門認為，總務工作是為教學、科研服務的，是為師生員工服務的，因此應該滿足教務部門提出的錢、財、物的要求。

而總務部門認為，教務部門看不起總務部門，特別是看不起工人，處處事事高人一等，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張口要錢、要物，我們哪兒弄去？不能滿足要求就告狀、罵娘。這樣就積累了一些對立情緒。

我認為問題出在認識不明確。總務工作是為培養國家建設人才服務的，具體對象是學生，教務部門也是同一目標，不過總務部門要

做好培養學生的後勤保障工作，要讓他住好、吃好、休息好，要有好的環境，做好衛生保健工作，做好交通運輸、食堂、生活設施的保障工作，一句話，讓學生能集中精力學習，成為國家的有用人才。而教務部門，則是按照國家規定的目標，培養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用人才，在思想教育、業務學習、體育鍛煉等方面實施有計劃的培養，教師則是實現這培養計劃的主要力量。因此，總務部門也應該為教師們的食、住、行、生活環境等創造儘可能好的條件，兩部門不存在高、低之分，祇是工作分工的不同，目標都是一致的。在部隊，沒有後勤保障，前方就無法打勝仗，這是顯而易見的。到了學校，這個道理就搞不清了，後勤部門仗着管錢、管物的特點，往往近水樓臺先得月，引起師生及教務部門的不滿是常事。

所以我認為不管是後勤部門還是教務部門，都要把認識統一到培養目標上來，服務于同一目標，這樣纔能互相配合、互相理解、同心協力。而總務部門尤為重要的是，要把保障工作、服務工作做到位，把為師生服務好的口號叫響，要批評那些認為做服務工作低人一等的思想。

這一工作，在總務部門進行了一個月左右，先是總支委員統一思想，然後在黨內統一認識，在全體員工中討論，最後由各單位提出為師生員工服務好的措施。衛生科提出了到學生宿舍巡診的措施，每天下午在學生宿舍巡診，學生反映很滿意，小毛病可以就近看，也不需掛號。行政科提出了主動檢查修理房屋門窗及水電設施的措施，同樣深受群眾的歡迎。福利科在研究如何提高服務質量時，提出了定量(定量供應的主、副食)到口的服務要求，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具體困難：煤炭供應緊張，祇能免強維持伙食用煤，浴室開放、開水供應、增加主副食品種等都有問題。車隊提出了運輸力量不足的問題。

群眾積極性很高，想把各方面工作做好，但要有一定的物質條件作保證纔能實現，這是實事求是，我認為應該努力解決。

## 2. 抓增強後勤保障能力

為了提高後勤保障的能力，我到總務處後的第二件工作，就是努



力解決緊缺物資的供給及增加必要的設備。首先解決煤的供應，在缺煤的情況下，幾千人的單位，學生和教工浴室每週均祇能開放一次；開水定時供應，不能敞開供應；食堂的主副食品種很少。要解決這些問題，都離不開煤。

我到煤建公司洽談，經理（為解決人防用煤，我們已經認識了）告訴我，要增加煤的供應是不可能的，武漢市生活用煤和工業用煤都非常緊張，高等學校是重點供應單位，也祇能保證吃飯問題，其他問題都無法解決。他說，煤不是沒有，而是運不過來，我們派人在鐵路部門住下來，天天催促，也無濟于事。我問煤在何處，他說在鐵路部門的轉運處，那裏的煤有的是，就是沒有車皮運過來。

據此，我提出建議，改用卡車運。經理說沒有那麼多卡車，我說可以發動各大單位出車運煤，由轉運站運到武漢煤場，運煤單位與煤建公司分成，運費由煤建公司出，單位的煤款也照付，這樣兩全其美，既解決了武漢市的用煤問題，也解決了各大單位的用煤問題。

經理認為這辦法可行，當時決定我們出 4 台車，運一個月，煤的分成比例為 7:3，即煤建公司得 7 成，學校得 3 成。我算了一下，一個月下來，學校可以解決 350 噸煤。

院領導也同意這一方案，我向水電部寫了報告，申請 4 輛卡車，部來電讓我們到“三三〇”工程指揮部領車。

我們規定了運煤司機除按出差補助外，每人每天再補助 8 毛錢，司機們也很高興。運煤一週後，我和幾位老科長帶了紅燒肉、肉包子等食品去慰問司機，看到他們不怕苦、不怕髒的那種幹勁，大家深受感動。

用煤問題由于車隊同志的努力，終於解決了。

學校每年要組織師生到外面拍 X 光片，檢查肺部健康狀況，一般都在春天。車隊每天派車，教務處要安排調課，衛生科的人要做組織工作，更是忙得不亦樂乎，還要花費一筆開支。

我瞭解情況後問科長賈慶智，這些年為什麼不買一台 X 光機？有了 X 光機，既方便、又省錢。回答是申請了，說沒有錢。其實一台 X

光機，當時的價格是六萬元，幾年的外出檢查費也夠買一台X光機了。

我問財務科長呂翠蘭，她也說沒有錢買。于是我找老財務瞭解歷年來的財務狀況，她無意中告訴我，學校賣舊報紙的錢有十幾萬元，好多年了，每年增加，現在大概有14萬多元，並說，這個錢處長可以動用。

我決定從此款中抽出6萬元買一台X光機，從此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了X光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體檢了，教務處也不用再為此調課了。

### 3. 瞭解情況，抓主要矛盾

教職工的住房年年建設，但總是不夠分配，青年人結婚，解決不了住房，有的有了孩子還沒有房住。就是說，家屬宿舍的建設滿足不了學校發展的需要。

基建科逢佐洲科長說，部裏撥款太少，水院家屬宿舍面積偏小，老房子都沒有客廳，六八型設計了客廳，祇能放個飯桌，六九型擴大了一點，仍然連個大沙發都放不下。設計室的同志告訴我，因為造價限制了，他們也沒有辦法。

瞭解情況過程中，我發現經費使用上也有些問題。在分配經費時，往往由總務部門提出教學經費、科研經費、基建經費、行政開支經費、工資等項目的撥款數，本來教學、科研、基建、工資等經費是部裏戴帽下撥的，是按學校師生員工人數及國家規定撥款的；而行政開支等費用由學校計劃的，但行政開支往往伸縮性大，不夠了，就從教學科研經費中擠出來，這是形成教務、總務部門矛盾的主要原因。

人防工程開始後，花了不少錢，但這些原來是沒有計劃的，就得擠其他的錢。按照財政部、建設部等部門的規定，人防建設是列入基本建設範圍內，規定基本建設費中有一定比例（可能是百分之五）用于人防工程建設，可我們學校基建預算中從未列入人防工程建設費，祇好擠其他經費。

以上這些問題，都需與部裏有關部門溝通。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到北京與水電部有關部門溝通，提出了增加家屬宿舍建設投資及宿

舍戶型擴大客廳設計的意見，還提出了人防建設經費追加撥款、增加科研經費及有關實驗室建設費用等問題。有關部門基本上滿足了我們的要求，當即批准了我們當年的追加預算（人防建設和實驗室建設）。

#### 4. 住房公平、合理分配

在北京工作一個星期，滿懷喜悅回到學校，學校領導也很高興，既要到了錢，又為今後增加建設投資鋪了路。

在我離校的一週中，發生了一件事：衛生科的一位護士準備結婚，房管部門將十一舍3樓一間朝南的有陽臺的地板房分配給她。這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司機中有不少已結婚、甚至已有了孩子仍未分到房的，情緒非常激動，說要等我回來討說法。

我一回到學校，第二天就收到了他們的信，要我講清楚，為什麼結婚多年、甚至有了孩子的職工分不到房，而還未結婚的已經分到了房？為什麼房管部門說沒有房可分配，而今却有了房？

我經過瞭解，得知此事是管房產的逢科長與衛生科的賈科長暗箱操作的結果，總務處的二位負責人則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我估計是有人打了招呼的）。

需要分房的有8個青年，他們有的已結婚多年，有的已有孩子，以總務部門的職工居多。他們的眼睛盯着我，看我如何處理這件事，既期待又懷疑。

我把此事視為糾正總務部門幹部隨心所欲，把所掌握的權力用來做交易、送人情的不正之風的突破口。此事既要嚴肅處理，又要不傷及各方面的自尊，更要合理地解決，使各方滿意，特別是涉及兩大金剛及總務處的負責人，更要慎重，弄不好會翻船。因為我在學歷、資歷上都比不上他們，工作經驗也比不上他們，更是一個挨整至今未徹底脫帽的犯錯誤的幹部，也沒有後臺，祇要有風吹草動，我就站不住腳了，所以我對此事的處理必須格外小心。

好心的肖秘書要我慎重，主張對總務處的兩位負責人批評一下就可以了。我覺得這樣處理會傷了群眾的感情，也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

我先找逢、賈兩位科長談話，講清事情的經過，賈科長主動承擔了責任。在討論如何解決時，賈科長說若收回已分的房子，對那位護士打擊太大，因為鑰匙已給她本人了。我問逢科長，還有沒有其他的房子可用安置已婚職工，需 8 間。他說無法解決，還有一二間，多了也解決不了。

我心裏有了底，就召開了總務會議，專門議此事。會上我講了總務工作的重要性與公正性，它的所有工作都會影響到全院師生員工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影響到每個人的利益，不怕物資少，就怕分配不公，引起群眾的不滿。接着就這件事批評了兩位處領導和兩位科長。

解決的辦法是，逢科長設法把 8 位已婚職工的住房解決了，十一舍的房子就分給那位護士，如解決不了，收回。還有的兩間，按工齡長短、家庭具體情況（如已有孩子的要照顧），分配給他們住，迅速平息由此引起的不滿情緒。

逢科長提出，把學生八舍一樓東邊改造一下，可以整出 10 間房，建臨時的公用廚房和公用廁所。

我同意這一方案，經領導批准，不久就解決了 8 位職工的住宿問題，他們很高興。

一九七六年的下半年，學校有幾幢宿舍竣工，住房分配政策由黨委討論決定，由我主持住房分配工作。

房源 160 套（電影場旁五幢宿舍），兩室一廳，廳很小（六八型）。現在的人們是看不上眼的，可當時非常搶手，兩居室還有一個廳，衛生間、廚房間齊備，很多人都希望能分到一套。

分房是件很複雜的工作，涉及每位教職工的切身利益，要精確計算每人的各種條件，然後將哪些人可以遷入新房、哪些人可以遷入空出來的舊房進行排隊。要很細緻，不允許出差錯，否則工作相當被動。分房工作也很繁瑣，找的人特別多，在關鍵時候我不能住家裏。

在分房的兩個月中，我無法休息，還要頂住各方面的壓力、漫罵，搞得精疲力竭。

令人難忘的有兩件事。一是有的院領導給我遞條子為某些人要



房子，有的領導直接口頭給我打招呼，說“××找了我，說他應該有條件分新房，你們考慮一下”。我感到很難辦，于是在黨委聽取住房分配工作彙報時，我提出：分房政策是黨委通過的，我要嚴格執行，如違反就是黨性問題、違紀問題。領導打招呼，我們就很難辦。希望各位領導諒解、支持我們的工作。宮雨屏書記說，堅決按黨委通過的原則辦。這就頂住了來自某些領導的壓力。

二是來自群眾的壓力。這種壓力往往帶有派性，更難辦。一位原“闖派”的職工申請調房，因條件不夠，房屋分配小組沒有同意，他就指着我的鼻子罵我搞派性，搞報復，怎麼解釋也無濟于事。一位原“好派”的老師申請新房，因條件不夠沒有輪到她。她沖到我辦公室罵我忘本：“大家把你抬到領導的位置上，你就把大家忘了。”這些事我早就料到會發生，但真的發生了，還是感到委屈。

#### 5. 按政策辦事，為職工排憂解難

在總務處工作期間，與工人接觸較多，深感學校工作離不開工人，工人的生活是最艱苦的。他們工資低、人口多（孩子多），很多工人的愛人都在學校做臨時工，收入微薄，他們下班後就去種“自留地”，這些地都是在不毛之地開墾出來的，經過2到3年的種植和施肥，成了不錯的菜地。人們祇看到他們的收穫，每天有新鮮蔬菜吃，經常有人反映：×××種自留地，群眾有意見；×××用公家的東西做自留地的圍欄，等等。

我對領導、對教師們講，也在總務部門職工會上講：不要祇看到他們收穫了多少，要看到他們工作一天后，還要去開墾荒地，還要澆水施肥。教師、幹部拿着扇子乘涼，他們却汗流浹背在勞動，有勞動就有收穫，不勞不獲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們的工人同志家裏人口多，收入少，靠自己的辛勤勞動給家裏減輕點負擔有什麼不對？

有人鼓動綠化科在開墾好的菜地上種樹，一時間在各處菜地裏都撒上了石灰圈，等着挖洞栽樹。我發現後告訴管綠化的同志，若有計劃地綠化栽樹，無可非議；若為了不讓工人種“自留地”而為之，則不可取。你們栽樹為什麼不在沒有種菜的地方去栽，偏要在工人們

辛苦幾年開出來的一點菜地裏栽樹？

工人同志的家屬是學校的臨時工，她們找我反映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每年都有臨時工轉正，為什麼我們學校一直沒有轉正的？後來居委會的胡主任也反映了同樣的問題。

我就到人事部門詢問，并要求看有關文件。工作人員給我看了水電部的文件，水電部每年給我們 20 個臨時工轉為合同工的名額，據此推算，我們學校的臨時工早就該全部轉合同工了。

但我發現，當時學校祇轉了兩位臨時工，一位是人事科長的夫人，另一位是後來任命的保衛科長的夫人。我當時很生氣，問人事科丁科長為什麼會這樣？他叫我去問黨委。

我無奈，祇好約居委會主任一起到湖北省勞動廳談。省勞動廳接待我們的一位處長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睡醒了？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年年辦，我們叫你們來辦，你們也不來。”我祇有檢討、賠不是。

經過協商，省勞動廳最後明確，同意按中央精神補辦，為四十五歲以下的職工家屬、臨時工辦理轉正手續。

據此，為五十多位臨時工中符合條件的三十多人辦理了轉正手續，她們知道後歡呼雀躍，有人甚至叫我“張青天”。

其實這是黨關心職工群眾的一貫政策，我僅僅是按政策辦事而已。至于我院人事部門為什麼長期拖着不辦，而祇辦了兩位科長的夫人，其原因不得而知。丁科長要我去問黨委，我也沒有去問。他這樣說是推托呢，還是另有隱情？祇有當事者心裏明白。

每當我看到當年因年齡限制而沒能轉正的老嫂子們，現在既無退休金，又無醫保，生活非常艱難時，我心裏總有一種內疚之感，總覺得沒有把事情完全辦好。

總支秘書肖恢先同志告訴我，我們學校還有 12 位子弟(知青)在五三農場勞動，家長們都希望我把他們的子女弄回來。知青回城沒有問題，問題是工作安排。我考慮這 12 位子弟的父母很多在總務部門工作，就決定由我們消化。經學校領導批准後，這些孩子都回來了，并安排在總務處工作。不久，他們中的一些人申請報考大學，基層

領導不同意，說他們把學校當跳板，花九牛二虎之力剛調來，屁股還沒有坐熱就要走，不行，起碼幹兩年。我覺得青年人希望讀書是好事，于己于國都是有利的，我如數批准了他們的申請。他們也都考上了大學，有些人後來當上領導幹部，有的成為技術骨幹、專家。直到現在，有時碰到我，他們就會說，當初要不是你支持，我們可能還在食堂呢。

學校在武漢市東西湖東山頭有個農場，農場勞動力主要依靠輪流到農場勞動鍛煉的教職工，平時管理人員較少，有時會出現勞力斷檔，農場工作就會受到很大影響。我也曾計劃派些固定人員長住農場，把農場盤活，使農場真正成為學校的副食品生產基地。

我在總務處工作期間，經常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如何把農場辦好。農場工作比學校艱苦，生活上也有諸多不便，平時又不能回家，所以一般的職工都不願意長期在農場工作。要想使農場恢復生機，工作人員能安下心來工作是關鍵，工作人員能安下心來在農場工作，除非解決他們的切身利益，把他們的家人也調到農場去。

由此出發，我們的解決方案是，將家在農村、長期分居的職工家屬（連同孩子）調到農場，該職工也調到農場工作。一方面解決農場工作人員的穩定問題，也解決了他們長期兩地分居的困難；另一方面也解決了農場的勞動力問題。家屬在農場工作也給報酬，當然這是以自願為原則的。

我們公布這一方案後，不少職工申請，經多方考慮，選擇了一些農場工作需要的職工家屬調到農場。

本想經過一段時間幫助其解決戶口問題後，進而轉為正式職工。後來因我被隔離審查而未能完成心願，但看到他們的戶口問題解決了，雖然沒來得及解決他們的工作問題，但他們的孩子都是城市戶口，讀書、當兵、就業一視同仁，過得很好，我心裏還是很高興的。

那時沒有天然氣，教職工家裏做飯、燒水都用煤，每人每月發煤票，定量供應。學校裏有一售煤點，但祇供應煤球，不賣蜂窩煤，可大多數家庭都用蜂窩煤，而蜂窩煤最近的供應點在洪山煤店（現石牌嶺亞貿廣場後面），路遠，人多要排隊，每月買一次煤需一天時間，不少

人半夜去排隊，有的甚至頭天晚上就去排隊，第二天上午把煤用板車拖回來。我每個月買煤都是晚上去排隊，爭取第二天上午 10 點前買到煤，11 點左右把煤拖回來，中午前把借來的板車還回去。因此，每個月為買蜂窩煤要排一夜的隊，再用半天的時間買煤、運回，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為解決教職工買蜂窩煤難的問題，我主動找洪山煤建公司聯繫，請他們將水院的售煤點擴大，除供應煤球外，也供應蜂窩煤。洪山煤建的答復是：除非在水院建蜂窩煤生產點，否則無法解決。對這個答復，我清楚地意識到，是要學校解決房子、設備、水電等問題，由他們來生產、銷售。那時的煤是專營的，其他單位是不能自行生產、銷售的。經研究，我們與洪山煤建公司達成了共識：由學校負責擴建售煤點的廠房，購置生產蜂窩煤的設備；由洪山煤建負責設備安裝，組織生產，保證供應。我們很快完成了廠房建設（簡易廠房），花三萬多元買了一套蜂窩煤生產設備。煤店的擴建，從談判到正式投產，祇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教職工在校內也可以買到蜂窩煤了。學校的老職工們不會忘記，當時，這件事辦成，確實使教職工從此不再為買蜂窩煤發愁了，解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

我在總務處工作 1 年多一點，對接觸到的人和事很有感觸。

首先，他們多數是學校底層的群眾，他們的思想狀況、生活狀況與教師、幹部不同。他們任勞任怨做的事都是被看作是小事、瑣事，都是為別人服務的事，默默地為別人做飯、燒水、修門窗、造房子、開汽車，為別人治病、打針、做清潔衛生、綠化校園，學校的所有人離不開他們。而他們工資最低，住的房子最差，是學校最下層的人，可他們無怨無悔。一旦你為他們做了點事，他們會感恩戴德，老記着你。

我認為，這樣的人是可敬的，可愛的，應該尊重他們，關心他們，儘量為他們做些有益的事，讓他們感到自己與教師、幹部是平等的，都是在為培養國家建設人才工作，都在貢獻自己的力量，應當感到自豪。

第二，總務部門是掌握學校師生員工食、住、行、醫療、環境衛生、財務等各方面物資的部門，這些部門的領導人，可以處置他掌管下的



物資。對群眾來講，他說有就有，他說沒有，就會有充足的理由說沒有。對這些幹部特別要進行為人民服務的教育，對待師生員工要一視同仁，不能以自己的親疏、好惡來處理問題，更不能假公濟私，否則貽害無窮。

以我的經驗，管錢的人，他手裏一定會掌握着一些計劃外不公開的錢；管房子的人，他手上一定有幾套房；管伙食的人，他的倉庫裏一定是有結餘的；在醫院裏一定有好藥。

應該講這是必須的，但是要透明。這些人往往欺騙群眾，也欺騙領導，所以總務處有人說科長們領導處長，是不無道理的。如果處長是個官僚主義者，那更是如此。

我經過一年多的調查、摸索，大體上摸清了總務部門家底，科長們是騙不了我的。

正當我準備進一步改進工作時，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政治形勢變化使我失掉了這個機會。

#### (四)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央發了4號文件，發表了毛主席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講話(整理稿)。

毛主席講了階級鬥爭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講了一些老同志的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却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結論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

分錯誤，兩個錯誤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

毛主席對鄧小平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

毛主席也指出，鄧還是人民內部問題，與劉少奇、林彪還是有一些區別。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節前後，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以悼念周總理為名的群體事件，中央認為鄧小平是事件的後臺。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這個決議是符合毛主席在4號文件中的講話精神的。可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是黨中央、毛主席發動的。

毛主席對鄧小平是非常看重的，對他的評價很高，一九七三年底復出後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一月八日，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經毛主席提議，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在一月中旬召開的四屆人大會議期間，鄧小平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之後，由於周恩來總理的健康原因，由鄧小平主持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認可與支持，鄧小平是不可能擁有如此大的權力的，這說明了毛主席對鄧小平的倚重。

但鄧小平在整頓的名義下，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在無奈的情況下，為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祇有把鄧小平清除出中央，並發動群眾揭露與批判他的錯誤。

這就是一九七六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由來。

之後，中央又召開了打招呼會議，指示各省、市領導要轉好彎子，對革委會要補台，“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

這就有了湖北省委和各單位黨委的轉彎子，對工代會、各級革委會如何補台的討論和舉措。這些討論與舉措同樣是自上而下層層布置的。

一九七六年對我來講是十分忙碌的年份，剛到院總務處任上，而且黨、政工作都要抓，既要處理日常工作，又要調查瞭解，弄清情況，加上分配住房這樣的事，所以對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事情，我並沒有太關心。另一方面，安排我搞人防工程後，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我的特點是，任何工作我都希望把它做好，一步一個脚印，每走一步都應留個脚印。而對文革中反復出現的運動已無多大的興趣，對於揭發誰、批判誰更沒有興趣。

如果說還有一點要求的話，祇希望黨組織能夠為受打擊的人平反，對造反派一視同仁，不要把造反派視為二等公民，另眼相看，除此以外別無他求。

對我個人而言，領導祇是利用，但并不信任，這是最讓人痛苦的。如能同意我調離湖北，我會謝天謝地。

因此，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我主動做了兩件事，被動做了兩件事，這4件事以後都成為整我的罪狀。

#### 1. 主張依靠黨委解決問題，反對搞大民主

一九七六年六月間，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風波波及我院，有些人主張發動群眾搞大民主。我生怕鬧出亂子，便請兩派（“好派”、“闖派”）中的骨幹坐到一起談形勢，做工作。會是在陳伯強家開的，我反對發動群眾搞大民主，主張有問題通過黨委解決問題，現在形勢不同了，黨委領導一切，中央領導一再強調要加強一元化領導，毛主席指示要“以安定團結為好”。經過爭論多數人同意我的看法，個別人反對，會後祇有徐約鈺一個人在校內刷了幾幅大標語，群眾也沒有跟着跑。

我認為目的達到了，同時將情況向崔連貴副書記彙報了，領導也認為做得很好。

這件事以後成為我拉幫結派的依據。

這是我主動做的。後來想想，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學校亂起來，別人犯錯誤，關我什麼事？可又一想，人人都是這個態度的話，那麼這個黨、這個國家還有救麼？

## 2. 審批革委會主張兩步走

一九七六年七月間，黨委書記宮雨屏找我談話，有兩件事徵求我的意見。一是關於革委會補台問題，是一步走還是兩步走？二是要我考慮造反派中哪些人需要安排工作。

一步走的意思，是原有革委會中合適的成員與新增的成員一起向省委報批；兩步走的意思是先報批原先的革委會成員，再報批新增的革委會成員。

我回來後找王紹良等極少數人談了，並徵求他們的意見。

在黨委擴大會上討論革委會問題時，我提出分兩步走，理由是一步走等於不承認原先的革委會；兩步走，先審批原先的革委會，這是文革的新生事物，是文革的成果，領導要承認。

宮雨屏書記主張一步走，理由是如果兩步走，那後增加的革委會成員是否要經過先審批的革委會的討論？將來問題會很多。

為這個一步走、兩步走的問題，學校討論了好幾回。我堅持兩步走。由於意見不一致，結果半步也沒有走。

關於造反派需安排工作的人，我向黨委推薦了兩個人，一是原“闖派”的工人頭頭、革委會常委熊德才，可安排到機械廠（學校實習工廠）任副職；另一人是原“闖派”的陳伯強老師（政治教師、共產黨員），可安排到宣傳組工作。當時主管人事工作的副書記崔連貴說，這兩個人已經考慮安排了。

這兩件事都是在黨委徵求我的意見時，我提出的意見，以後又成為我攻擊黨委、篡黨奪權、拉幫結派的依據。

## 3. 關於到湖北大學見彭勳的問題

一九七六年八月的一天晚上，鍾興錦（政治課教師）、王紹良和我3人，到原湖北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秦憲政老師家玩，這是鍾興錦幾次約請後纔成行的。



文革中，我和秦憲政認識，鍾老師原是湖北大學的，與秦是同事，他們談起我在水院的情況，秦托鍾約我去玩。

我因忙一直未能成行，第三次約請，因白天沒有時間，就定了晚上去。去時正好碰上彭勛在秦家吃飯，彭參加了湖北省委召開的襄樊轉彎子會議。他很健談，介紹了會議情況，結論是省委特別是趙辛初書記、趙修書記有決心解決問題。基本上是他一個人講了二十來分鐘，然後說有事就走了。

我與彭勛在北京中央學習班見過，沒有交談過，人稱彭油嘴（這綽號據說是張體學起的），此次見面，我覺得名不虛傳。

在秦家與彭勛相遇，是偶遇還是秦憲政的刻意安排，我不得而知。

這件事成為我與“四人幫”爪牙密切聯繫的證據，同時還和華中工學院的趙文成批朱九思聯在一起，真是跳進黃河洗不清！

#### 4. 關於在全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上的發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學院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黨委宣傳部長常樹蔭要我在會上發言，我說一是沒有時間準備，二是不知講什麼好，推辭了。他第二次找我，我又拒絕了。第三次找我，他說黨委的決定，你必須要發言。

以組織名義壓人，這是共產黨最厲害的一手，組織決定祇好答應。我問常樹蔭講什麼，他說你參考報上講的就可以了（他是應付差事），我說，那我就抄報紙了。結果我找了幾份報紙，主要是按《文匯報》一篇文章的內容拼湊成了一篇發言稿，在會上念了。

黨委在這個會上宣讀了湖北省委對我的任命文件，任命我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事先沒有人對我講有這樣的安排。這篇發言後來被說成是我的“就職演說”，反對鄧小平，鼓吹“走資派還在走”。

以組織名義壓我發言，我又不知道那天宣布對我的任命，怎麼就成了“就職演說”？那天發言的人，包括黨委副書記張荊承，誰不在批鄧小平？誰不講“走資派還在走”？這句話是毛主席講的啊！

如此整人，我還有活路麼？

## (五) 關於我的提拔問題

關於我的提拔，是後來整我時重點追查的問題，涉及到對我的結論。這個問題是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的兩年中發生的，應該有所交待。

從一九七五年開始，湖北省委多次考慮，讓我擔任廳局職工作，直接找我談話有3次。

第一次是一九七五年六月份，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余英找我談話，是學院黨委通知我，並派車送去的。余副部長在住院，談話地點在同濟醫院的高幹病房。

此次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湖北省委決定調我到湖北省體育工作委員會工作。余副部長說：你前任省委工作組組長，帶領工作組進駐省體委，進行整頓，建立新的領導班子，現在×××在體委搞得工作無法開展。整頓完後，你留在體委工作，擔任黨委書記兼體委主任。

我感到突然，體育工作專業性較強，我是門外漢，加上余副部長要我到體委後，把×××拉下來，×××又是國內外知名運動員，他的隊友在國家體委擔任要職。我自認勝任不了，當面拒絕了。

第二次是一九七五年底或一九七六年初，也是余副部長找我談的，地點在湖北省委宣傳部。這次讓我到武漢化工學院任黨委書記，我也以種種理由推辭了。

第三次是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找我談話，時間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地點在省委宣傳部辦公室。談話時，焦部長的秘書（姓王）也在場。

焦部長先問了我現在的工作及學校的情況，接着說：“省委研究了，讓你擔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副書記，二把手。讓張芾承帶兩年，兩年後，他退下來，你到第一綫，全面負責。這兩年中主要由你抓工作，張芾承掌舵。”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我不想幹。

因為焦部長知道我兩次推辭了省裏的安排，聽後有點不高興地說：“幾次要安排你的工作，你都不同意，以為你不想離開學校，所以

省委決定讓你留在學校工作。你又推辭，到底是什麼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我對焦部長講了實話（當時認為焦是代表了上級組織的）：我不想在湖北工作，更不願在學校工作，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在學校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又參加過派性鬥爭，我知道派性是很頑固的，對於反對我的一派來講，即使我按黨性辦事，他們也會說我有派性；對於本派的人來講，我當了領導，他們找我解決問題，我秉公處理，他們會罵娘，所以我祇有離開學校，離開湖北，纔能徹底遠離派性的糾纏。第二，我和張芾承同志有些合不來，一起工作怕會鬧矛盾，這對我們兩人和學校工作，以至對上級領導都不好，所以我不想繼續在學校工作。

他讓我講出我的想法，我說想到華北電力學院去，那是我的母校，校領導歡迎我回去，學院黨委書記梁超同志曾三次來武漢要我回去，水電部也有這個意思。我一九六五年調來時，學校就不放，後來水電部領導講，先過去，以後再回來，所以華北電力學院一直在要我回去。

關於對張芾承書記的看法，我講了他的優點，也講了他的缺點（我認為的缺點），主要講了三條，一是待人不誠懇，作風不正派。我列舉了文革初期，我真心希望黨委檢查自己的錯誤，取得群眾的諒解，然後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而張芾承裝作非常痛苦的樣子，痛哭着要求我為他起草一個檢查提綱，但第二天在黨委會上，他拿着我一夜未眠寫成的提綱說，摸到了張建成的觀點，並從此把我排斥在體制外。二是工作上考慮個人過多，因此對其他人既不放心，又不放手，政治運動一來，又不勇于擔責，這很傷幹部的心。我也舉了些例子，比如他平時讓張如屏到外地休養，運動一來，就把張院長接回來做擋箭牌，這也給張院長彙報過，那也給張院長報告過，其實學校工作是他一把抓的，出了事就都是張如屏的。三是親一些人，疏一些人，這一點我來的時間短，體會不太深，是聽一些老水院的人講的。我的性格又是喜歡直來直去，見不得弄虛作假，因此我怕時間長了，會發生矛盾。

焦部長說，工作問題，省委已經討論決定了，不要再推辭了，調動的問題暫時也不要考慮。至於張芾承的問題，我找他談一次，要他支

持你的工作。要搞好團結，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你回去等着，文件很快會下達的。

最後我表態：既然省委已經決定，我服從，幹兩年，兩年中我會全力以赴把學校工作做好，兩年後請組織上考慮放我走。

回到學校後，我向張如屏院長彙報了情況。他聽後說：“建成啊，你太年輕了，不瞭解高層政治生活的情況，不該將對張芾承的一些看法對焦部長講，這樣會被誤會，認為你告了他的狀，弄不好要吃虧的。”

其實，我也怕焦部長對張芾承講後引起誤會，我第三天就找張芾承書記談了對他的一些看法，他表示接受我的意見，對有些事作了解釋，並再次在我面前流了淚。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可能焦部長已經與他談過話了。

對我的提拔，是經過了兩年多的全方位考察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份，省委組織部、宣傳部聯合考察組來我院，找各方面的人談話，瞭解我的情況，開了專案組人員的座談會，瞭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也找我本人談了話，瞭解我的過去，以及對當時形勢的看法。我當時認為是要解放我，後來聽說黨委正式向省委寫了有關我的材料。

為什麼會對我的安排這樣興師動眾呢？我估計兩種因素起了推動的作用，一方面由於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表現，省委宣傳部領導比較滿意；另一方面，當時學校調來不少新的領導同志，他們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認為我這個人還可以，因而向上面介紹了我的一些情況。於是省委啟動了有關程序：基層組織推薦、上級相關部門考察、找本人談話等。

對我的任命文件是鄂發(1976)20號，那是一個任命一批幹部的文件，文件中祇有兩位新幹部，除我外，還有一位是長陽縣的赤腳醫生，被譽為中國赤腳醫生之父的覃祥官，他被任命為省衛生廳副廳長。

後來，在對我的審查過程中，以篡奪水院的黨政大權作為重要內容，要我交待目標是要整張芾承、奪張芾承的權，並明確要上聯焦德秀、王秘書，下掛崔連貴、梁道平。

於是，我想起了老院長說的話。



其實我根本不想在水院待下去，怎麼還會上下串通奪水院的黨政大權呢？水院的領導人也清楚，水電部要調我到華北電力學院去，我自己也多次申請調走。那麼為什麼要說我陰謀篡黨奪權呢？說到底還是兩個字——報復。

要置你于死地，無中可以生有，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是一個響應毛澤東主席及黨中央號召，起來反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群體，它的成員主要是基層的工人、學生及一部分幹部，在鬥爭中他們屢遭鎮壓，但他們堅持鬥爭。

毛澤東主席逝世，他的接班人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致使文化大革命遭到失敗。造反派這個群體進一步遭到鎮壓與清算，成為建國以來被整時間最長、受迫害最深的群體，成為共產黨內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和替罪羊。

造反派是無辜的，他們響應共產黨及其領袖的號召，起來造走資派的反，何罪之有？他們在鬥爭中有過錯誤和缺點，也有過過激行為，但與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及由他們操縱的保守派比較起來，祇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這天大的不公正和種種冤、假、錯案是權力造成的，至今仍被權力掩蓋着、壓制着。相信歷史終將會以鐵的事實還造反派以公道。

而那些以鎮壓造反派為榮、以鎮壓造反派得以升官發財的人，有的已經受到了唯物辯證法的懲罰。那些至今仍自以為得計的人，也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 十、“四人幫”被抓後發生的事

### （一）從“四人幫”被抓所想到的

#### 1. 不贊成用武力解決“四人幫”問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委員江青、政治局委員姚文

元(王、張、江、姚“四人幫”)被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中央領導人抓捕關押,國內外震驚。

毛澤東主席逝世後,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新的時代將走什麼樣的路綫、實行什麼樣的政策?都是人們關心的問題。但用抓捕關押持不同政見者的辦法來開啟新的時代,出乎人們的預料。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各次路綫鬥爭還沒有這樣的先例,這個辦法也是毛澤東主席堅決反對的。

“四人幫”被打倒後,中央組織全國各地游行慶祝,報紙、電臺、電視臺廣泛報導。人們興高采烈地慶賀“四人幫”被抓,喝慶功酒,吃螃蟹(以示“四人幫”橫行霸道,似螃蟹橫行一樣)。我也被這種熱情所驅使,每次游行走在最前列,高呼口號,學習討論時也發言表態擁護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但冷靜下來後,總覺得這樣做欠妥。

我對“四人幫”既沒有仇恨,也沒有太多好感,與他們從未有過任何瓜葛,歷次參與解決武漢問題的中央領導中從沒有“四人幫”,因此,武漢問題似乎與“四人幫”無關。相反,對謝富治就不一樣,因為“七二〇”事件的處理、中央學習班湖北班他都參與過,他平易近人,正面講問題,從不亂扣帽子,後來聽說他把工資的大部分交黨費,家裏陳設一般,生活很簡樸,所以印象很好。

“四人幫”,王洪文除外,作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他們在跟隨毛主席進行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貢獻的。對江青,我感到太狂傲,亂表態,給毛主席惹了很多事,不宜擔重任,最好還是退到後面去;對張春橋,上海學生反對他,說他有歷史問題,他支持攻打上柴聯司,因此我并不尊敬,認為張春橋、姚文元的文章寫得不錯,可以做些理論方面的工作,不宜當中央領導。所以,讓他們下臺我是贊成的。但我又認為,他們幾個人是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積極支持者,從開始到現在,支持文革的人就他們幾個人了,其他人都陸續下臺了,現在毛主席剛過世不到1個月,就把他們抓起來,是不合適的。再說,就算他們犯有嚴重的錯誤,也可以通過組織程序由中央委員會撤掉他們,批判他們。

把反對者抓起來的辦法，不是共產黨的辦法，也不是毛主席的辦法。我當時認為，這個先例一開是不好的，對用武力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是不贊成的。

## 2. “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歷史現象，共產黨也難以避免

歷史上的政治鬥爭都是勝利者是對的，一切由他們說了算。而失敗者總是錯的，他們再也沒有話語權，任人宰割，歷史的真相到底如何，誰也弄不清，因為後人聽到的祇有一面之詞。這大概就是“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邏輯結果。

這種情況，共產黨也不例外，很多被打倒的歷史人物，祇有看到了他們的回憶錄或被平反昭雪時，纔有另一種說法。

我們再也聽不到劉少奇自己的說法，再也聽不到林彪自己為什麼要逃跑的說法了，因為他們都已經死了，沒有留下書面的材料。

“四人幫”會說些什麼呢？江青在法庭上為自己作了辯護，講了很多與公訴人指控完全不同的內容，但法庭不會採信。一個被打倒的人，說的話又有誰能信呢？誰要是信了，那就是立場問題。

所以在我被打成“四人幫”幫派骨幹、背負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罪名的時候，誰能相信，我與“四人幫”不僅沒有任何牽連，甚至對他們是有看法的呢？

我的一切行為，都被說成是秉承了“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的旨意；一切行為的目的，被說成是為了篡黨奪權；所作所為，被說成是反革命兩面派手法。

他們對上報的、對下說的、大字報寫的、廣播說的、小報登的、批判會上講的，都是謊言、謠言，但誰也聽不到我的辯白，聽不到我對事實真相的闡明。

這是中國政治的悲劇，也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從上到下存在的、應當認真總結的經驗教訓。

## 3. 抓捕“四人幫”是重大的政治行動，除了除掉政敵以鞏固自己的權力之外，往往意味着政治方向的改變

毛澤東主席逝世不到一個月就採取行動，把包括毛澤東夫人在

內的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員，不經任何組織程序，動用武裝部隊抓捕、關押，本身就說明問題的嚴重性與緊迫性，說明這些人早有準備，祇是在等待時機，主席一死，時機已到，迫不及待地採取行動。

因此，我的感覺告訴我，抓捕“四人幫”不是最終目的，也不會到此停步。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對的。

抓捕“四人幫”後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所謂有牽連的人就是指那些積極支持與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人——造反派中的骨幹，所謂有關的事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清查的結果，必然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抓“四人幫”是手段，目的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從而為新的政治路綫鋪平道路。否定了文革路綫，也就否定了毛主席建國以後所堅持的路綫，從而肯定了劉、鄧路綫，這樣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實行劉、鄧路綫。

華國鋒是個悲劇人物，毛主席把重擔交給了他，當時國人也對他寄予厚望。在一些人的吹捧和鼓動下，他為了一己私欲，為了鞏固他作為黨和國家的領袖地位，抓捕了“四人幫”，以為既清除了自己的政敵，又博得了一部分反對文革的人的歡心，成為全黨、全民的領袖。後來發現是被利用了，但為時晚矣！最後也逃不脫被趕下臺的下場。

有人說華國鋒背叛了毛主席，是叛徒。我認為，他是地位起變化後，在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吹捧和鼓動下，為達到鞏固地位的目的，而被人利用。當他明白過來時，已身不由己。縱然他為一些人做了他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為一些人的事業立了功，然而華國鋒本人畢竟是在文革中升遷的，所以這些人還是不會放過他的，必須要把他趕下臺。這是華國鋒當初不會想到的，他下臺後至死不講話，但每年兩次帶領家人到毛澤東紀念堂瞻仰毛澤東，最能說明他的心態。

對於上述三個問題，當時祇是有些粗糙的想法，曾經和極個別人討論過，這個人就是賴文德。他此時正好返校參加一個業務方面的培訓班，到我家聊天，大家談了些看法，別無他意。可他老兄在他同班同學家吃飯時（該同學留校工作），也講了些與時局不協調的看法，該同學在學習會上以“有人說”開頭講了一些觀點。于是上頭再三要



他交待這“人”是誰，他被逼無奈，全盤交待，把賴文德交出來了。於是又逼賴文德，要他交幕後指揮，當然指我，但賴沒有和盤托出，所以在審查我時這作為一個重點問題，始終不放過。賴文德不能繼續在培訓班學習，返回原單位，材料轉過去了，也就成為清查中的主要問題之一。

一九七七年寒假以後，隨着中央“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運動的開展，大火逐步燒到了我的身上，由“半工半讀”（即一邊工作，一邊參加學習班交待）到“走讀”（停止工作，全天學習、交待，但還可以回家），再到開黨委擴大會揭發批判，最後到“住讀”，省委批准“離職審查”，關進隔離室，逐步升級。

每次升級，主要領導都要找我談話，說黨給了我機會，但我的態度不端正，交待不徹底，升級是自己造成的，希望我抓住機會，不要再滑下去了。這些都是謊言。

早在抓捕“四人幫”公開後不久，黨委書記宮雨屏就找朱冠先談話，告訴他，準備到總務處工作，說張建成看來是不行了。可見把我從“半工半讀”逐步升級到“住讀”，祇是按程序推進，掩人耳目而已。目的就是要告訴人們：張建成所以走到這一步，都是他自己找的，領導上是拉他的，是給他創造了機會的，是他自己不珍惜。多麼卑鄙的謊言，既要整死你，又說是你自找的。

其實我早就有思想準備，我的命運早在決定參加文革運動時就已經注定了。

## （二）從“半工半讀”到黨委擴大會

一九七七年三月下旬，我被宣布進入“半工半讀”階段。

此前黨委書記宮雨屏找我談話，稱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學校很多問題涉及到你，為了給你創造一個說清楚的機會，決定給你辦學習班，邊工作邊學習邊說清問題，提高思想，檢查錯誤，取得群眾對你的諒解。

我把它起名叫“半工半讀”，學習班時間不固定，人員不固定（相對而言），即每次在學習班交待問題、接受幫助教育和揭發批判時，人

員有多有少，每次參加的人是有變動的，除後來成為專案組的幾個人外，其他人根據需要經常變動。

我的交待不能達到黨委的要求，于四月中旬開始，升級為黨委擴大會議的形式，讓我進行交待檢查，參會人員擴大到支部書記一級，幾十個人。

黨委書記說，這是給我創造機會。會上我交待檢查，骨幹們揭發、批判，加上“苦口婆心”的勸說，仍達不到要求。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十日，我兩次正式交待檢查，接受揭發批判，黨委認為態度不端正，避重就輕，所以向省委寫報告，申請對我進行離職審查，成立專案組。

九月二日，省委發出批復文件(鄂發[1977]119號)：同意對張建成實行離職審查。

九月十六日下午，我被正式隔離審查，關押于學生二舍一樓，從此失去自由達半年之久。

在“半工半讀”及黨委擴大會議期間，要我交待的問題綜合起來有10個方面，而這些問題我永遠無法交待清楚。因為有些根本就不存在，有些雖有其事，但他們想要得到的却與事實嚴重不符，所以我的“交待”與“檢查”始終無法達到他們的要求。因而在半年中，我永遠是“態度不端正”、“立場沒有轉過來”，進而整我的方式步步升級。

這十大問題是：

1. 關於炮打周總理、整理總理材料問題。

我說這是編造的謊言，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魏承厚、崔連貴、張蕪承三位副書記在與我談話時，已明確這個問題不存在，怎麼現在又提出來呢？他們說，三位書記講的是“五一六”組織的問題不存在，但不等于整總理的材料不存在，到底存不存在，你自己清楚，必須老實交待，拖不過去，也滑不過去。

2. 反軍亂軍問題。

要交待如何策劃“八一〇”大會，如何配合“四人幫”抓軍內一小撮，如何策劃在全國辦亂軍聯絡站，如何策劃揪鬥人武部領導，如何

組織搶人武部的機密檔案。

3. 與“四人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的聯繫，與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記者的聯繫，有多少次？都說了些什麼？送過什麼材料？領受了那些旨意？回學校是如何貫徹的？

4. 校內的幫派體系問題。

在歷次反復（他們把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說成是反復）中，校內的幫派體系是怎麼活動的？策劃了些什麼活動？哪些人參加？開過一些什麼會？參加會的人員有哪些？研究了些什麼問題？都講了些什麼話？

5. 如何配合“四人幫”在學校篡黨奪權？

在校內準備揪哪些人？哪些人下臺，哪些人上臺？新建班子是些什麼人？

6.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是如何策劃壓黨委成立雙批辦公室，並以此辦公室替代黨委的？如何策劃了口號報？（此問題密加凡同志在會上作了實事求是的說明，口號報是魏書記讓秘書李鴻義起草的，與我無關。）“五一六”名單是如何逼迫黨委公布的？

7. 一九七六年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是如何組織批宮（兩屏）揪張（弗承）的？如何組織搜集張書記材料的？如何進行內外勾結、配合行動的？（這個問題強調要上聯焦德秀、王秘書，下聯崔連貴、梁道平）。

8. 一九七六年進行了哪些幫派活動？除與夏、朱、胡聯繫外，要交待與彭勛、方保林、謝華之（武漢大學學生、三司革聯負責人、省革委會常委）、田洲安（武漢大學鋼二司負責人）等人的聯繫，說了些什麼？聯繫多少次？哪些人在場？

9. 如何策劃為楊道遠翻案的？開了幾次會？哪些人參加？寫了些什麼材料，交到哪里去了？交待武漢大學圖書館會議的情況，哪些人參加？說了些什麼？決定了些什麼問題？

10. “四人幫”垮臺後，對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持什麼態度？如何看待“四人幫”的垮臺？與別人講了些什麼？與賴文德到底是什麼關

係？對他講了些什麼？

這 10 個問題，有些在一九七一年清查“五一六”時就反復查過，有些是一九七四年後發生的。可以看出，這些問題是黨委主要領導人事先整理好後交給參加會議的人，因此發言提的問題千篇一律，都沒有什麼事實依據。

我根據事實該否定的否定，該說明的說明，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達到黨委主要領導的要求。

### (三) 隔離審查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下午，黨委正式向我宣讀省委關於對張建成實行離職審查的批復文件，接着將我關押到學生二宿。

宣布我的專案組成員共 12 人，組長李喜爾，以下是謝德煥、費培根、劉正清、林稼祥、羅紹軍、趙師傅（工宣隊員）、朱元新、方和明、胡庚新、陳貽華、余松田。後 5 位主要是看管我的，與我同吃同住（星期六他們輪流回家休息）。我隨身所帶物品以及皮帶、鞋帶均收繳，說是為了保證我的安全；接着抄了我的家和我的辦公室，所有筆記本、日記本和一切認為有用的材料均拿走了，並寫了收條（至今未歸還這些物品，我去查問，說找不到了）。這一切和逮捕收監沒有什麼不同，僅僅是關押地點不同，還有伙食費由自己承擔罷了。

法院規定，在判刑後，隔離審查的時間（包括“兩清”時隔離審查時間）可以折抵刑期，這證明了當局從法律上承認隔離審查相當於收監、坐牢。

隔離審查開始，性質發生了變化，即由人民內部矛盾轉為敵我矛盾。當天晚上的廣播，喊出了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張建成”的口號，在我名字前必加上“四人幫”幫派骨幹分子的定語。

對我的態度也變了，專案組來主要是審訊，要我老實交待。

接着學校以系、處為單位揪鬥，全院批鬥，進一步又在文教系統進行批鬥。批鬥時都由民兵押送，上臺“坐飛機”。

我每天的活動主要是接受批鬥，接受審訊，寫交待材料。不能早



睡，每天拖到零時左右。如果睡早了，就會批評你不學習，不思考問題，不認真交待，態度有問題，所以有時要呆坐到 12 點後纔睡覺。

在隔離審查期間，要我交待的內容，按 10 大問題，逐個細化。辦法是加壓逼供，引導誘供，疲勞戰，心理戰，除了沒有用刑以外，其他的辦法都用上了。

例如要我承認整了周總理的材料，先說我的問題嚴重得很，現在各方面都在揭發，你的同夥都在被審查，他們為了自身利益，都交待了，你不要抱幻想，現在已經有幾個人揭發了你整過總理的材料，你還要頑固下去，祇有死路一條。

又如和夏、朱、胡的聯繫，說我們學校歷次反復都與夏、朱、胡有關，你不僅自己與他們直接聯繫，還派人和他們經常聯繫，你和他們之間的聯絡員×××已經交待了，你還想隱瞞到什麼時候？

他們講的所謂聯絡員是胡震宇，是革幹聯管省市幹部問題的，他與各群眾組織的頭頭都很熟悉。在壓力下他承認“是張建成派我去的”（否則，他自己要承擔責任），於是胡震宇就成了我與夏、朱、胡的聯絡員。其實胡震宇什麼時候去的革幹聯，他在那裏幹些什麼，我都一無所知。

一九七四年我與他一起去了二招，另一次是丁家顯回武漢後，省委很重視，要院黨委找到了家顯。魏承厚書記要我幫助黨委瞭解丁家顯在哪里，省委要找他。我也不知道，很着急。胡震宇說，可以去問胡厚民，也許他知道。我問他：胡放出來了（他早被關押，我不知道他已放出來了）？胡震宇說，出來了，現在在同濟醫院休養，祇有少數人知道。於是我和王紹良請他幫忙一起去，見到胡厚民，詢問丁的下落，胡說丁到地、縣去了，但具體地點他也不清楚。回校後，我向魏書記如實作了彙報。

我與胡震宇幾次出去，均是與其他人一起去的。專案組查了很久，查不到我和夏、朱、胡聯繫的確切證據，於是改用虛構的聯絡員的說法，想以此證明我與夏、朱、胡的密切聯繫。

又如對張菑承書記的問題，他們用半個月的時間審訊我反對張

蒯承、揪張蒯承的所謂罪行，要我交待如何與崔連貴、梁道平內外勾結反對張蒯承，如何布置搜集張蒯承的“奇談怪論”，而且說，這一切是我布置姚德勝搞的。

我說：“你們說的，我都不知道，如果他們說有，我要求面質。請你們告訴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什麼人在場，我布置了這個任務？姚接受任務後，搜集到了張蒯承的什麼‘奇談怪論’？材料交給了誰？有誰能證明？”

我還說：“我也從來沒有和崔、梁一起策劃什麼‘批宮揪張’，這都是某些人想像出來的。

“我對張蒯承是有看法的，那是我個人的問題，與其他人無關。在文革中幾派都提打倒張蒯承，我不同意。我認為張不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綫的提出者，而是執行者，有個組織原則問題，上面來的東西，下面能不執行嗎？因此他是提高路綫鬥爭覺悟的問題，不是打倒的問題。我在‘八一八支隊’（一個專門審查學校幹部的組織）的講話，可以證實這一點。在那時我都公開保張蒯承，怎麼可能在被任命為副書記後提出揪他呢！

“張蒯承在文革中愚弄了我（要我起草檢查提綱），我對他有看法，不想與他共事，那是另一碼事。

“至于與崔、梁二人的關係，原來是上下級關係，後來也成了朋友。批林批孔前，我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繫，也未談過話。”

事實上，當時他們是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我是挖洞的，祇跟魏副書記有接觸，因為他是管人防的。同時我認為魏忠厚老實，輕言細語，對誰都是笑嘻嘻的，印象不錯，所以有問題願意與他談。安排我工作後，我每過一二個月就找魏書記談我調動工作的問題，我希望調到華北電力學院去，但他總是既不說不行，也不說行，應付我。

梁道平副主任原在北京機械學院當領導，後調武漢機械學院工作。文革中，武漢機械學院撤銷，梁調我院任職，他家在北京，單身一人住教工二舍。因為我也是從北京來的，所以我們之間特別說得來，對武漢有同感。我很同情他，勸他調回北京，他說北京是出來容易回

去難。我想起自己，也確是如此。有時我請他到家裏吃飯，我們之間成了很好的朋友。梁道平是個忠厚人，他什麼人也不得罪，祇做些領導上交給的工作，不爭權奪利，不說三道四，我對他的人品很尊敬。把他牽涉到“批宮揪張”的“陰謀”中去，不僅是天大的笑話，也是對梁道平黨性與人格的侮辱，他這種遭遇的唯一原因是與我關係好。有時我感到很對不起他，讓他不明不白地捲入了與他毫不相干的漩渦。

崔連貴副書記原是華中農學院的領導，文革中調我院任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他耳背，外號崔聾子。我們是在批林批孔中認識的，第一次接觸他是以副書記的身份向我瞭解學校的幹部情況，我如實談了自己的看法。之後接觸就多起來，有時大家到他家聽他吹“山海經”，常客是梁道平、李鴻義、張志龍、我。他喜歡談他的過去，談他與某些領導的關係，也喜歡談聽到的小道消息，我聽到的也會講，但從來沒有談過什麼“批宮揪張”的問題。

我對“批宮揪張”的提法是哪里來的百思不得其解。宮雨屏原是湖北省計量局的局長，人很有風度，我對宮雨屏書記很尊重。在我和他共事當中，祇有一件事違背了他的意願，那就是審批革委會一步走、兩步走的問題，除此之外，我沒有反對過他的任何決定。

怎麼在審查中，說我對宮意見很大（此說達半年之久），進而說我策劃“內外勾結”、“批宮揪張”？

對張荊承我是有些看法的，這些看法我對省委宣傳部焦德秀部長講了，跟張荊承也當面談過，所以他們認為我要揪張，要讓張下臺。涉及到焦部長、王秘書、崔連貴（聽說他在黨委會上與張爭吵過）、梁道平，故在審訊時，逼問我是如何策劃反張的，要上聯焦、王，下聯崔、梁。

但“批宮”的說法，則連影子也沒有。唯一的解釋，就是把“批宮揪張”聯在一起，即反對黨委一、二把手，是為了篡黨奪權，可以順理成章地把我說成野心家，置我于死地。同時，以“批宮”引出“揪張”的實質，他們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坐實“揪張”。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代表湖北省委同我談話，是張荊承記恨並要整倒我的主要根源之一，所以要上聯焦、王（其實，王祇是焦的秘書，與他毫無關係）。

所謂“批宮揪張”，實質上是某人的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把宮拉扯進去，祇是一道具而已，用以掩蓋其內心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那個年代，祇要把自己說成是被“四人幫”及其爪牙迫害的，那就是革命者，就是英雄，一舉兩得，既可打倒張建成，也可抬高宮雨屏和張芴承的身價。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對我進行逼供。

他們還逼迫我的朋友們揭發我是如何策劃反張芴承的，開了些什麼會，給你們布置了些什麼任務。并誘供說，張建成對教育革命怎麼看？張書記是抓教育革命的，張建成攻擊張書記搞回潮，對你們講了些什麼？

在高壓、攻心、誘供的情況下，我的某些朋友，有的編造了一些他們需要的材料，有的把自己做的事推到我的頭上以求過關。

我理解這些朋友的處境，真正應該對此負責的，是專案組及其上級領導人，是他們策劃并實施了這一切。

在我被隔離審查期間，我向專案組組長李喜爾提過三個問題，他的答復令我啼笑皆非。

問題一：黨要求黨員嚴格地執行黨的紀律，對於黨的決定，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在行動上不得有任何反對的表示。試問，文化大革命是不是黨中央決定的？共產黨員應不應該執行中央的決定，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應不應該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應不應該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你們把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按中央指示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打成反革命，把對抗中央決定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捧為真正的革命者、英雄，這種顛倒歷史的做法，今後怎麼還能統一黨內의思想和行動？

李喜爾的回答是：我們並沒有講你們參加文化大革命錯了，也不是對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評功擺好，而是查你們與“四人幫”的關係，如何按他們的旨意利用文化大革命來迫害老幹部，進而篡黨奪權，也就是查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

問題二：在批鬥我的會上，特別是在外校的批鬥會上，蘇耀庭（三



系政治輔導員)的發言是一派謊言,哪有事實依據?我幾次向你提出,不要搞欺上瞞下的勾當,你為什麼要堅持這麼做?將來怎麼收場?最後向党、向群眾怎麼交待?

李喜爾的回答是:批判會上的發言,不能要求群眾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他們的發言不作為將來結案的依據,他們有些話是沒有根據,說大了,但我們不能阻止他們講。

問題三:你們老是逼問我,批林批孔中四次到二招去幹什麼,是誰指使的。我問你,批林批孔及反擊右傾翻案風過程中,你經常到我家去打聽外面的消息,你要幹什麼?誰指使你的?我的心情與你的心情是一樣的,想瞭解中央對湖北有什麼指示及省委的態度,怕再次犯錯誤,所以大家相互打探所瞭解的情況,這完全是屬正常的行為。

李喜爾的回答是:行為一樣,但目的不一樣。

我無話可說了,同樣的打探消息,在我是反革命的,在他是革命的。我還能說什麼呢?

由此也可以看出專案組的指導思想,他們根據領導人的指示,從一開始對我的問題已整理了材料,從“半工半讀”到隔離審查,目的是要落實這些材料,逼我交待承認,逼我的朋友揭發、編造、栽贓,為達此目的,他們用盡了各種手段。

我這裏并不是指責李喜爾和他的專案組,他們也是奉命行事。事實上我和老李私人關係是不錯的,我欣賞他的才幹、工作魄力。在我提出病退時,他力勸我幫他一段時間(此時他已提拔為副院長,管行政、總務一攤子,即我離職前的工作內容),并提出希望我重新申請入黨。在他不幸得了癌症後,我也到醫院探望過他,祝他早日康復。我眼前也時時浮現我們合作共事、互相密切配合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在無休止的審訊、批鬥、寫材料的重壓下,我的精神和身體都急速下滑,十一月中旬開始發高燒,體溫在攝氏40度上下,專案組讓醫生出診,給我打針吃藥,急速退燒,因為此時正是文教系統輪流批鬥我的時刻,不能缺席。藥性一過,又高溫,前後半個月,批鬥不停止,審訊不停止,交待不停止。

我的心臟變化很大，脈搏每分鐘達 100 次至 120 次，我從十二月七日開始作記錄，兩周內都沒有降下來。有時呼吸困難，晚飯後到體育場散步（4 人陪同），從體育場到學生食堂不到 100 米長的斜坡，需休息 3 次纔能走完。

在這種情況下，曾經想到過死，一了百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心，黨不理解我，文革中盡力所做的工作，黨不承認，忠心被說成是禍心，好心被說成是壞心，無處評說，滿腔冤憤，決定不再講話，不再寫材料，想見家人一面後自行了斷，到毛主席那裏說理去。

我請某醫生轉告我愛人，告訴她我病得很重，本意是想讓她來見一面。某醫生回衛生科後是否告訴了我愛人我不知道，但很快由專案組派人陪同我到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現為武大中南醫院）內科看病。

接診大夫姓曹，是我院曲本泉老師的愛人，我們認識。經檢查，曹大夫輕輕地告訴我，你的心臟問題較多，體質也虛弱，應該住院治療。但學校不同意，也不同意給你開假條，祇能給你開點藥，按時吃，自己注意休息，如果病情有發展，馬上要求來醫院。對曹大夫的表白與囑咐，我非常感激，她讓我瞭解了實情與某些人的無情。

回校後，我仍採取不合作態度，專案組認為我出現了反復，連續幾天打態度。如果說在隔離審查開始階段，我還願意回憶一些問題，並將回憶到的情況告訴專案組，希望說清情況早日解脫。在文教系統批鬥及我病後對我的態度，證明已將我視作敵人，因此我決定不再想問題，不再寫材料（包括外調材料）。大不了一死了之，人死都不怕了，還怕什麼？

陪同我住在隔離室的 4 位青年人，都是轉業軍人，當年是樊馬義要來摻砂子的（40 名留校學生，40 名轉業軍人，共 80 名），對學校情況特別是文革情況瞭解不多，奉命辦事。

開始時，他們執行紀律很認真，時間一長，他們瞭解的情況也多了，他們也參加外調，但調查不到什麼有用的材料；他們聽學校教職工談我的情況，也知道了一些事實真相。所以，他們認為這樣搞有問題。

因此，這幾位“看守”在感情上逐步發生了變化。他們開始與我交談，問我學校及有關人員的一些情況（在專案組人員不在場的情況下），同時也告訴我一些他們的看法。他們說，我們跟着出去外調你的情況，都說你不錯，什麼問題也沒有調查到。

他們為了調節我的生活，帶來了撲克牌，晚上帶我到體育館看球賽。久而久之，有些情況傳到專案組，於是加強了對我的監控。一天晚上，我們正打撲克牌，被發現了；還有一次到武大體育館看打籃球，也被監控人員發現了。

一九七八年春節後，專案組把朱元新、胡庚新、陳貽華調走了（方和明早就調走）。

換了新的人看管我，從此又變得“嚴肅”了，又對我進行了批評教育，說我拉攏腐蝕專案組工作人員，態度極不端正，又加了一條罪狀。

我和朱元新、胡庚新、陳貽華却成了好朋友，直到現在（陳貽華已于二〇一一年去世）。

為什麼被領導視為依靠對象的調來監管我的人，開始也視我為敵人的人會起變化呢？

那是因為在工作中，他們發現自己親身經歷的、親耳聽到的、親眼看到的不像領導講的那樣，因而認為領導上那樣對待我是錯誤的。由於他們的地位無力改變現狀，所以祇能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我，讓我安心，讓我愉快地度過沒有人監視的時間。

這讓我想起了電影中、小說中講的，反動派把共產黨員說得似洪水猛獸、青面獠牙，他們的基層人員（如看守等）與共產黨員接觸後，感到事實并非如此，思想起了變化。

可悲的是在革命勝利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我們的某些共產黨員，利用謊話與謠言來欺騙他們的工作人員。一旦謊言與謠言在事實面前被擊破，工作人員的思想起了變化，這些領導不僅不檢查自己的可耻行為，却給下屬扣上“立場不穩”的帽子。

通過這件事，我更堅信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堅信群眾的大多數，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從一九七八年二月下旬開始，對我的批鬥停止了，廣播也不以我的問題為主了，逐步減少了批判我的內容，後來根本就不提了。專案組人員來的次數越來越少，也不讓我寫材料了，但管制并未放鬆。我判斷審查可能要結束了，進入處理階段了，反正已經橫下一條心等着處理。

後來纔知道，省文教辦公室來通知：“張建成是內部問題，不能按敵我矛盾搞”。這個消息當然是有人悄悄告訴我的，于是我就等着下一步怎麼處理。

直到四月下旬，李喜爾對我說，隔離審查結束，有些問題你要繼續想，想起來了寫材料交給我們，下一步安排你到農場勞動鍛煉，一邊勞動，一邊繼續考慮問題，提高認識，轉變立場，真正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你先回家休息幾天，由學校派人送你去農場。

在省文教辦公室的關心下，我的隔離審查終於結束了。

#### (四) 農場監督勞動

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後，我被送到武漢市東西湖區東山頭農場，宣布為監督勞動(李喜爾說是勞動鍛煉)。

這說明對我還是採取敵我矛盾的處理方式，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後，右派分子屬監督勞動，學校對我的處理顯然與省文教辦的精神不符。

東西湖東山頭農場，是我在總務處工作期間，重點考慮并想以此解決部分職工家屬工作問題的地方，當時我作為領導曾來此調研，也安排了一些職工和他們的家屬到農場工作。

現在，我被當作敵我矛盾處理，送來監督勞動，農場的職工和他們的家屬對我很熱情，都叫我老張，他們沒有把我當敵人看。在農場的兩年中，他們對我很照顧，不僅在生活上照顧我，在勞動中也一樣。

我一生中，在農場的兩年是最舒心的，無拘無束，每天勞動一兩個小時，其他時間都由我自己處理，也沒有人要我交待問題。

東西湖東山頭農場河道交錯，有大大小小的湖泊、池塘。在這裏，我學會了“打甲魚”和釣魚，每天自己做飯，青菜到職工的自留地里弄，魚是自己釣的，蛋是撿到的，生活很豐富。



農場分配給我的任務，是負責幾十頭豬的粗飼料加工，即把花生藤、麥秸、稻草等粉碎成飼料。活兒很髒很累，但每天勞動時間短，粉碎一兩個小時，可以管兩天以上。夏天、秋天每天要撈一板車水草，在一般情況下，每天早上6點到8點就可以完成任務。

這個工作，沒有人願意做，因為東西湖是有名的血吸蟲病高發地區，撈水草是要下水的。所以場裏決定承包，我很願意接受，有不少人勸我不要做。我那時對自己以後的事已經置之度外，不考慮以後的事，所以領導安排叫我做，我就痛快地接受了。

撈水草的樂趣是經常可以在河邊、湖邊的草中撿到鴨蛋，秋收後在涵洞中幾乎每天可以撿到被黃鼠狼吸了血的死鴨子，可以摘蓮子和菱角。農場和村裏的孩子看我拉着板車回來，就興高采烈高呼：“張伯伯回來了！”他們知道我這裏有蓮子和菱角。我每週從武漢回來，總要帶些粒子糖給他們吃，所以我在農場時，孩子緣也特別好。

我每天的工作是，一早起來，粉碎飼料，撈一板車水草，早飯後出去釣魚，一上午可以釣七八斤雜魚，下午睡一覺起來殺魚，大的醃起來，小的分給各家。以後我拜師學習“打甲魚”，這是用一種相當於釣魚竿的甩竿，可以把魚綫甩出幾十米遠，在甩出去的綫端系上四五個特製的鋼絲鈎，把在水中冒頭的甲魚（鱉，也叫王八）鈎上來，俗稱“打甲魚”。這比釣魚好玩，我學會後就很少去釣魚了。這種活動，一直陪伴我度過了上世紀的八十年代。

在農場勞動期間，有兩件事讓我不能忘懷，在我處于人生低谷時期，在監督勞動期間，讓我感到了溫暖，讓我認識到，祇有真心付出，纔有真心回饋。

我在農場的兩年中，得到了農場職工在吃、住、勞動等多方面的照顧。我沒有種菜，職工家的自留地裏的菜，都是對我開放的。他們要我想吃什麼自己去摘，有好吃的，有時叫我去一起吃，有時送到我的住地。夏天乘涼時一起聊天，他們從來不把我當作“犯人”，甚至不把我當犯錯誤的人，而是當朋友。

他們是學校總務處的職工，也有少數工農兵大學生留校的幹部，

為解決他們夫妻分居而安排到農場工作。他們瞭解我是什麼樣的人，知道我對工作、對群眾關心的問題是怎麼處理的，所以他們不相信領導上講的那一套。到了他們的地盤，他們就以自己的方式來處理與我的關係。

他們的這些情感也傳到了東山農場（屬東西湖區管）的職工中，我們素昧平生，不少職工對我總是另眼相看，看到我在小河溝裏釣魚，他們會叫我到他們管的大魚塘去釣，說那裏的魚大又多，小河溝的魚小而少。冬天乾塘，集體抓完魚後，有人下去抓剩下的魚，我也脫掉外褲要下去，東山農場職工就把我攔住，不讓我下去，說：下去冷，你年歲大了，不合適。他們就拿幾條魚給我。其實我就是感到好玩，不是想吃魚纔要下去的，但他們的關心使我感動。

我搞飼料粉碎，有些老百姓要我幫忙，我都會熱情幫助。兩年中，我在當地百姓中交了好幾個朋友，我回校後，他們還經常帶些土特產來看我。

我與本院農場職工、東山農場職工的友誼，不是建立在任何利益關係的基礎上，完全是建立在相互信賴的基礎上，因為我對他們是真心的，他們對我也是真心的。

第二件事，就是每週在農場與學校之間的往返，學校派卡車接送，司機朋友總是把駕駛室中副駕駛的位置留給我，而且祇讓我一個人坐。我不好意思，但他堅持要我坐。

有一次，一位農場領導先坐進了駕駛室（這位領導原先是司機房的汽車修理工），司機讓他下來，他不肯，發生了爭執。領導問：為什麼不讓我坐？司機說，有人了。問：誰？答：老張。領導說，車頭裏可坐兩人，我和老張都可以坐。司機說，老張個頭大，兩個人坐不下。愣是把農場領導趕到後面車廂裏去了。

我怕矛盾激化，司機和我都不會有好果子吃，勸司機讓領導下來坐。司機說，你不要管，車頭裏讓誰坐，是司機的權利，誰也管不着。從此以後，駕駛室的座位再沒有人搶了。

後來聽說，這位農場領定向黨委告了司機一狀，說他劃不清界

綫，也告了我的狀，說我在農場籠絡群眾。但一直沒有人找我和司機談話，每次接農場教職工回校的司機是不固定的，但他們對我的關心都是一樣的。有如在五七隊勞動時，食堂師傅給我多打飯、多打肉一樣，他們在用自己的方式關心與保護一個他們心目中的好人。工人師傅對我的態度，在我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依然一樣，可見他們對我是真心的，我衷心地感謝他們。

我本是農家子弟，幹農活不陌生，40多歲正當年，所以農場勞動對我來說並不覺得累、苦，比起隔離審查要愉快得多。在那種人際環境中，我過得十分舒適自由，真希望能和真誠相待的群眾生活在一起，不希望再和勾心鬥角的領導們打交道。

一九八〇年四月底，時任黨委組織部長的韓德勇找我談話，大意是：接省文教辦公室通知，讓你從農場回來，恢復組織生活，在問題未處理前，由學校安排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身體不好，也可以休息，如果想到外地去轉一轉，也可以。韓部長問我有什麼要求，我首先感謝組織上的關心，提出休假3個月，回上海老家休養，韓表示同意。

就這樣，我在省委文教辦公室（學校的上級機關）的關懷下，又一次從學校的監督勞動中解脫出來，恢復了組織生活。文教辦曾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不同意學校某些人把我打成敵我矛盾，我被定為人民內部矛盾。我對省委文教辦的關懷永記在心。

從農場回來，我先到上海老家休息，後接到張一純寄來路費，要我到北京去散散心。于是我到北京、到北戴河游覽，心情大為改觀。



一九八〇年天安门广场留念

接我兒子到瀋陽部隊當兵的流政委也來信，要我到部隊去散散心。我真的十分感謝一純老友和流政委（師級）等人對我的關懷，他們的關懷對於儘快撫平我受傷的心靈是很有幫助的。

八月初，學校分配我到基建處材料組，材料組又讓我到木工廠幫助工作。我知道實際上是讓我到木工廠勞動，再一次讓我看到了學校與上級領導對我態度的不同。我在木工廠勞動一直到一九八七年病退，但我不屬於木工廠的人，而屬於基建處材料科。

## （五）結論材料拉鋸戰與最後的處理

### 1. 結論材料之爭

審查之後，處理之前，必須有一個審查結論的材料，這個材料必須經被審查者認同簽字畫押纔能有效，在此基礎上作出處理決定，經上級主管部門批准，就可以結案了，這是程序。

隔離審查結束，我被送到農場監督勞動，專案組着手進行結論材料的起草。

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第一稿材料出爐，交我過目，要我簽字。我看後，不同意簽字。因為材料中除炮打周總理、整總理材料沒有列入外，其他九大問題盡列其中，大部分內容不僅無中生有，而且無限上綱，如所謂的搶槍問題、策劃搶人武部機密材料問題（高級步校拿走了材料，當事人白華甫在受審查時也沒有這條罪狀）、組織批鬥人武部領導問題、篡奪批林批孔領導權問題等等，莫須有的罪名一大堆。據此，我寫了一份意見書上交。

專案組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給我看第二稿結論材料。我仍不同意簽字，又寫了意見書上報。

一九八二年學院紀委成立，我的案件由專案組轉交給紀委處理。紀委由專職副書記陽鈞負責。

一九八三年二月四日，陽鈞給我看第三稿材料。我再次寫材料重申我的觀點：材料與事實嚴重不符。

一九八三年八月，陽鈞拿來第四稿結論材料。我依舊寫了申訴



材料, 并指出: 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編造的謊言作為我的罪證, 為什麼要用掐頭去尾、移花接木的方法把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情況下與不同人員的談話, 編成一條條罪狀? 為什麼我幾次申明無中生有的東西繼續編入材料? 為什麼既不給我看所謂揭發材料, 也不同意與檢舉人對質? 為什麼不到我提供的當事人處調查取證?

一九八三年十月, 陽鈞給我第五稿結論材料, 繼續堅持他們的一套, 我又寫了第五次申訴材料, 堅持我的申訴。

材料拉鋸戰進行了五年之久, 沒有得到解決。距離太大, 無法簽字, 也就無法做結論。

其間我要求復查, 要求按黨的政策辦事, 毫無結果。

陽鈞是個老同志, 工作認真, 他很無奈, 有一次對我說, 你的事, 我也不瞭解, 你提的問題, 我對他們講了, 他們不同意, 我也沒有辦法。他指的他們, 是指當時的某些領導及專案人員 (主要是張芴承、李喜爾、謝德煥)。

## 2. 要求復查、對質, 按中央規定的政策辦事

一九八〇年五月上旬, 我找張芴承書記談話。

首先彙報了我的思想情況, 然後請求黨委對我的問題進行復查, 儘快作出處理。對前兩次專案組整理的材料, 我簡要予以說明, 對整出這樣的材料表示不理解。

說到後來, 我激動起來, 提出請張芴承書記召開水院的老職工會議, 讓我有機會澄清事實, 或者我與張芴承書記在會上有問必答, 兩個小時就夠了。整我幾年, 給我兩個小時就可以說明問題, 也可請揭發檢舉人當面對質。我堅信撒謊的人、造謠的人在群眾面前會顯原形。

張芴承批評我不相信組織, 態度不端正, 這樣下去是危險的。

我說, 我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 不能無中生有。你們說我是省管幹部, 由省委決定, 黨委無權對我做出決定, 可材料是黨委整出來上報省委的, 省委是根據黨委報的材料和黨委的處理意見作為處理依據的, 所以關鍵還是在黨委。你整的材料不實事求是, 我反映了, 也解決不了。讓群眾來評評理, 你又說我態度不端正, 而且很危險。在

我看來，無非在政治上要置我于死地，罷我的官，不准我革命，“臣本布衣”，我本來就是農家子弟，老百姓一個。工作是領導上安排的，又不是我自己要的。至于革命，是自願的，沒有人強迫我，也不可能阻止我參加革命。另一方面無非是在經濟上卡我，我苦慣了，稀飯鹹菜照樣生活，讓他們山珍海味去，我有一個腦袋兩隻手，不給我工作，我也會活下去，繼續革命。

這次談話非常不愉快，不歡而散。從此我對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不抱任何幻想。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我到省委文教部（在洪山路省教育廳大樓內）反映情況。王振中處長接待我，我向他詳細談了我的情況和學校兩次材料內容存在的問題，請求省委對我的問題進行復查。

王處長態度很好，對我反映的問題作了記錄，表示對我的問題有所瞭解，會督促學校進行復查并儘快處理。之後，文教部通知學校對我的問題進行復查。

試想，問題是由學校搞出來的，又通知他自己進行復查，怎麼能解決得了呢？一個單位發生的問題，上級不派人來調查處理，而叫本單位處理，怎麼會有另外的結果呢？所以我對省委文教部的請求也未能奏效。

一九八二年以後，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我的問題交由省紀委處理，省委宣傳部、文教部都再也不能插手了。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切實保障被審查者的正當權益》，評論指出：保障被審查者的正當權益的一項基本內容是允許他們講話。具體講有這樣幾個方面：（1）調查案件時要調查訪問被審查者本人；（2）證據材料要和本人核實、對質、聽取意見；（3）證明材料祇有經過查證屬實之後，纔能用于定案，作為處理人的依據；（4）審查結論要和本人見面，并保障被審查者不服而申訴的權利；（5）上級組織或機關對於不服者的申訴，應認真及時地調查研究，公正裁處，并將結果答復本人。評論又指出：黨章第四十一條規定，黨組織對黨員作出處分決定，應當實事求是地查清事實，

所要作出的處分決定和所依據的事實材料必須同本人見面，聽取他說明情況和申辯。國家有關法律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有核對證據材料，要求重新調查、鑒定結論的權利。

我當時認為這是中央的精神，對照一下，學院黨委、省紀委一條也沒有做到。

我拿着《人民日報》找陽鈞談，請他按《人民日報》評論文章辦理。

我問他：我的申訴材料是不是報到省委了？

他說：報不報，報什麼材料，由黨委決定，我們辦。我不能也無法告訴你我們向省委報了什麼材料。

我又問：我能不能到省紀委去直接反映我的意見？

他說：你到省紀委去反映情況，是你的權利，我不會說不讓你去或讓你去，你自己決定。

我說：進省委大院要介紹信，沒有介紹信進不去。

他說：介紹信我不能開，我給你開了介紹信，不等于我支持你去省紀委了嗎？你不要為難我。

我又提出：想看看你們作結論材料的依據，有些事能否重新作些調查？

他說：為了保護檢舉人的安全，我們不會讓你看檢舉人寫的材料。至于要不要重新調查，視情況而定，不是誰說調查就調查的。

我說：你講的東西似乎與《人民日報》評論文章不一致。

他說：我們按文件及上級指示辦，不按報上哪篇文章辦，這是原則。

這時我纔發現，陽鈞書記是個太極高手，一套完整的官話，滴水不漏。

黨委方針已定，你怎麼辯白，一次一次寫申訴材料，他穩坐釣魚臺，材料管它真假，不變。省委文教部同意復查，叫黨委查，當然等于沒有說。想到省紀委直接反映情況，不給開介紹信，進不去，無門。

看來我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祇有任他們擺布。

### 3. 水利電力部出面解決在材料上簽字的問題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院級幹部，屬於湖北省委和水電部共管的，

幹部的任命、調動，都需經雙方協商。但黨的關係、政治運動則由湖北省委管理。

我的案子屬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又是省紀委負責管理，所以水電部不能插手，祇能向學院黨委瞭解情況，建議黨委快些處理。因為水電部有意將我調往華北電力學院工作，而華北電力學院的領導更希望早日解決，幾年不解決，他們希望水電部出面協調。

水電部教育司的司長、副司長每次來武漢，總要瞭解一下我的問題處理進展情況。從司長們給我講的內容來看，他們似乎受騙了，我也因此上當了。

有一次許英才司長來武漢開會，我請他幫助解決，他說：你不要急，我們一直在和水院黨委協調，會解決的。

高之梁副司長來武漢，專門到我家裏看我，說張(弗承)書記對你的評價很高，說你有政策水平，有工作能力，群眾關係也好，學校需要這樣的幹部。高副司長說我對張書記有誤解，張書記對我的評價不錯。我說，我們不爭論，看結果。

一九八三年十月，紀委整出第五稿材料，我仍拒絕簽字，並寫了申訴材料。

十月下旬，水電部教育司陳秉堃副司長來武漢找我談話，從他談話的內容及行程匆匆來看，似乎是專程來的，來的目的就是動員我在材料上簽字。整黨在即，我的問題也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

陳副司長對我說：“部裏研究了你的事，你在材料上簽字，爭取早日解決，學院黨委的意思是給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處理後馬上調到華北電力學院，三個月內由部裏撤銷處分。”

我問陳副司長：“這是部裏的意見，還是你個人的意見？”

他說：“我個人能作這樣的擔保嗎？”

但我擔心這是個圈套。我說，你看過材料嗎？他們整的材料很多是無中生有的，是想把我一棍子打死，我擔心一旦簽字，生米煮成熟飯，我就說不清楚了。

陳副司長說：“不要擔那麼多的心，各方面都談好了(指水電部黨



組、華北電力學院、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沒有問題的，儘快簽字，爭取早日解決。”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答應了。

陳副司長完成任務後，第二天就返回北京。

我考慮了幾天後，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在第五稿材料上正式簽字。

我簽字的內容為：

基本同意結論材料，有些情節有出入，附上說明材料壹份。

張建成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陽鈞通知我到紀委去，是要我在黨委“關於張建成同志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上簽字。處分決定是：“撤銷黨內一切職務，並建議撤銷一切行政職務（保留副科級待遇）。”

圈套、欺騙！又一個天大的圈套和欺騙！這與陳秉堃副司長講的處分內容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天壤之別！

如果不是圈套，那一定是學院黨委領導欺騙了水電部領導和陳秉堃副司長。我堅信是後者，因為陳秉堃副司長沒有必要與學院黨委領導合起來騙我簽字。

誣陷、造謠、關押、批鬥，逼、供、信，監督勞動，長達數年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我都領教過了。

某些人為泄私憤，利用手中的權力，欲將我一棍子打死，置黨的政策和客觀事實于不顧，一而再、再而三地編造謊言，欺騙上級領導，欺騙群眾。

他們還配擔任黨的一級組織的領導嗎？他們還是共產黨員嗎？

事已至此，我強壓憤怒，簽下了以下內容：

接受給予我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決定，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希望作歷史的分析，對有些錯誤的結論偏重或不確切的地方，過去多次寫過材料。總結經驗教訓，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對共產主義事業忠貞不渝，努力學習，奮力工作，

為四化建設貢獻自己的餘生。

張建成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處分決定是由學院黨委直接作出的，既沒有和我本人談過，也未聽過我的申述，沒有開支部大會討論，也沒有經過總支委員會的討論，這一切都是違背黨章規定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由中共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十條規定：對黨員的紀律處分，必須經過支部大會討論決定。第四十一條規定：黨組織對黨員作出處分決定，應當實事求是地查清事實。所要作出的處分決定和所依據的事實材料必須同本人見面，聽取他說明情況和申辯。決定後如果本人不服，可以提出申訴，有關黨組織必須負責處理或者迅速轉遞，不得扣壓。

我寫過 5 次申訴材料，不知轉交了沒有，問紀委副書記陽鈞，他說不能告訴我；要向上級反映，他不開介紹信而無法進入省委大院。黨員的權利、申訴的權利就這樣被無情地剝奪了。

#### 4. 結果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通知我到院紀委辦公室，當時有院黨委常委、組織部長李貞儒，紀委副書記陽鈞，三總支書記黃敬庭三人在場，由李貞儒宣讀了省紀委的鄂紀審（1984）54 號文件：關於張建成所犯錯誤處分的批復，

全文如下：

中共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委員會：

你們《關於張建成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錯誤的處分問題》收悉。經省紀委常委討論，省委常委會同意，決定給予張建成開除黨籍的處分，並建議撤銷原任一切職務。

中共湖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李貞儒宣讀完文件後，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保留意見。

李貞儒和陽鈞說：我們也認為這樣處分重了。

中共湖北省紀委文件

鄂紀審〔84〕54號

☆

關於張建成所犯錯誤處分的批复

中共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委員會：

你們《關於張建成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錯誤的處分問題》收悉。經省紀委常委討論，省委常委會同意，決定給予張建成開除黨籍的處分，並建議撤銷原任一切行政職務。

中共湖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抄送：省委辦公廳、省委組織部、省委教職部、省政府辦公廳、省勞動人事廳

中共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委員會  
文 件

水電院黨字〔84〕第119號

★

秘密

轉發湖北省紀委《關於張建成所犯錯誤處分的批复》的通知

各總支：

現將湖北省紀委鄂紀審〔84〕54號《關於張建成所犯錯誤處分的批复》轉發給你們，請傳達到全體黨員。



抄報：水電部黨組，中紀委駐水電部紀檢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旬，我找李貞儒，請他明確我所犯錯誤的性質，我是不是屬於“三種人”，屬於其中的哪一種人？根據何在？整黨文件中明確，即使是“三種人”，祇要改了，也不開除黨籍，為什麼要對我如此處理？

李貞儒回答說：省委沒有說你是“三種人”，我們也沒有說。開除黨籍的處分，我們也認為重了，到整黨後期再講。黨內有不少人也在問，要我們公布材料。現在不要去談它，談也沒有效果。

我也找時任黨委書記的常樹蔭（作處分決定時，他任黨委書記），詢問對我處理的理由。

常樹蔭書記說：“對你的處理是‘平衡’出來的。”

我進一步問：“什麼叫‘平衡’出來的？與誰‘平衡’？”

他說：“不要問了，講不清楚的。”

他還說：“現在的共產黨，你離開了也好，我也想離開。”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退黨？”

他哈哈一笑。以後他到美國去安度晚年了，最後因患癌症在美

國逝世，這也算是一種“離開”的方式吧。

對於我的處理，從黨委的一些人到學校的一些中層幹部，以及普通的教職工都有看法，但得不到解釋，我更是雲裏霧裏，他們都似乎有話要說，但不能明說。

我是坦然的，不管對我如何處理，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裏，我的所作所為、主流方向是問心無愧的，對得起黨，對得起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六千多名師生員工以及他們的家屬。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到二十二日，北京召開了第五次全國“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中發(1982)9號文件批轉了座談會紀要。

會議認為：“兩案”中受審查人員的問題，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從全局來說，終究是一場政治鬥爭。……對“兩案”受審查人員問題的處理，採取“從寬從緩”的方針……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進行處理。……對受審查人員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的，要慎重掌握。

會議認為，……在工作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有的地區和部門對受審查人員的處理定性偏高了一點，處分偏重了一點，也有搞錯了的。

湖北省委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召開了湖北省第四次全省“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貫徹中央精神。座談會認為中發(1982)9號文件完全適合于湖北，重申了方針政策，重申了有些地區和部門定性偏高了一點，處分偏重了一點。

在這樣的形勢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湖北省紀委應該慎重對待，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我想這是湖北的老習慣、老毛病。

早在一九七一年，毛主席就指出，湖北清查“北決揚”的工作“又搞過了一點”，當時省委領導不傳達，繼續深挖細找，大抓“北決揚”、“五一六”，導致建國以來最大的冤假錯案。

這次，湖北省對待“兩案”受審查人員的處理問題，雖然口頭上講也存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央指出的，有些地區、部門定性偏高了一



點、處理偏重了一點、也有搞錯了的問題，但實際上繼續從重定性、從重處分。

湖北省紀委不調查，不研究，不聽受審查人的意見，祇看下面報上來的材料，不管材料是真是假，不管是有意報復還是弄虛作假，祇要是下面報上來的，就照樣批復。這樣做的黨性何在？原則何在？政策何在？良心何在？

之所以會這樣，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樣做符合他們的需要，使他們得到心理上的滿足。他們對文化大革命“革了他們的命”恨之入骨，于是徹底清算文化大革命，清算那些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特別是支持造反派的幹部。所以上下配合，利用權力，把需要打擊、報復的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否則無法解釋，明知是假材料，拼湊的材料，無限上綱的材料，却當作處理的依據。也無法解釋，從一開始就按領導定的調子整材料，搞逼、供、信，挖材料，目的究竟是什麼。也無法解釋，昨天還是政策水準高、工作能力強、群眾關係好的好幹部，形勢一變，就成為野心家、兩面派、“四人幫”的幫派骨幹，要置之死地而後快。

這就是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一些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在我被處理後，不少人為我惋惜，勸我到上面去反映。水電部管紀檢的同志也帶口信，要我有機會到北京去談談。我都沒有去，我深知，去也解決不了。一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是一個新的禁區，“牽一髮而動全身”，問題太多太敏感，誰也不敢去觸碰這個“雷區”；二來，我的問題雖有特殊性，但它是寓于共性之中的，打着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的旗號，即使有公報私仇的嫌疑，但圈在“兩案”審查的圈子裏，已經被圈進去了，要想從這個圈子裏突圍，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圈子是禁區，祇有解禁了，纔能出來，不解禁，誰也無能為力，這是中國政治的特色。

在對我整個審查過程中，湖北省委宣傳部、湖北省文教辦公室

(之前為省文教戰綫指揮部，之後為省文教部)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和湖北省紀委的態度是不同的。

省委宣傳部的負責同志，特別是余英副部長為我的問題到處作說明，甚至講“批林批孔以後，張建成的一切活動，宣傳部都是知道的，如有什麼問題，由宣傳部負責”。他也曾和省紀委的同志頂撞過，為此，受到了省委個別領導的批評。

省文教辦領導兩次出面解救我。我去省文教辦反映情況，王處長的態度讓我感到與學校領導不同。

設想，如果我的問題，由省委宣傳部或省文教部處理，或由水電部黨組處理，都不會是這種結果。

一九八四年省紀委的工作人員進行大調整，多數人是由地、縣調來的，省委領導人也換班了。他們對學校的情況、對我的歷史情況并不清楚，祇知道我是一個水院的重點審查對象。他們聽的是水院領導的彙報，看的是水院領導提供的材料，他們聽不到、也不想聽我的申訴，他們以水院黨委申報的材料為依據，水院上報的材料，又是為了置我于死地而整出來的假材料。這樣上下結合，加上權力的運用，你還有活路麼？就是到上面反映了，他仍然讓水院黨委查，能查出新的結果嗎？

因此，我認為在這禁區不解禁的情況下，個人將是無能為力的，雖然對我這樣的處理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甚至是死不瞑目的，但確實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 (六) 解析

說實話，寫這一節回憶內容，我很糾結。一方面，要想說清楚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後的許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對一些幹部、教職工、學生痛下殺手的原因，就要講清楚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的行為準則，以及這個利益集團對內對外的矛盾與鬥爭，當他們達到目的後又是如何構建他們的獨立王國的。不管他們內部為了權力而鬥爭，矛盾有多大，但他們

始終執行着“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幹部政策。因此，必須把他們的所作所為，盡我所知寫出來。另一方面，涉及到的主要當事人，如張蕪承、常樹蔭、李喜爾都已作古，人死了，一切均已消失了，他們的過錯也不必再追究了，對死人說三道四，在我們民族的習俗中是不厚道的。因此，很糾結、很猶豫。

朋友們多次主張我寫，我勉為其難，僅就我瞭解的情況作一交代。

### 1. “三張一梁”與“鐵三角”

“三張一梁”是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前的院級領導人，他們是：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黨委副書記張蕪承，黨委常委、副院長張瑞瑾，黨委委員、副院長梁百樸。

“三張一梁”中，梁百樸副院長不屬於領導核心，重要問題的決策，特別是有關人事安排問題，不會讓他沾邊。梁副院長分管學院總務工作。

張瑞瑾副院長是國內外著名的泥沙專家，業務水準高，分管教學與科研工作，在教師中有崇高的威望。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對黨委的決定堅決執行，屬黨內專家。他不參與領導人之間的鬥爭，祇做好本職工作，所以黨委主要領導人對他很放心。

張蕪承副書記，河南人，解放後在河南某地委工作，任辦公室主任（另一說是地委秘書長）。一九五三年調武漢大學水利學院，任辦公室主任、黨支部書記。不少老人一直稱呼其“張主任”，原因在此。後提升為武漢水利學院黨委副書記，成為張如屏的助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因張如屏身體不好，故由張蕪承主持學校工作，成為學校的實際掌權人物，因而在文革中也就成了焦點人物。文革後被任命為黨委書記，成為學校名副其實的掌權者，主宰學校的一切。

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是武漢水利學院成立時，由國務院任命的。張如屏是一九二五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一心為革命工作，從不謀私利，對己嚴，待人寬，團結師生，努力建設學校，提高教學質量。學校發展很快，他在師生中享有崇高威望。他注意培養新生力量，放手讓他們工作，他常說“用人不疑”。由于長期從事艱苦的革命工作，

損害了健康，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的健康狀況惡化，糖尿病很嚴重，住院治療與外出休養較多，學校工作放手給張荊承主持。我于一九六五年初調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後，基本上見不到張院長，文革開始後纔有機會與老院長接觸。他在文革中開始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一九七九年被任命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第一書記、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後又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委，一九八一年退居二綫，任學院顧問。

“鐵三角”是指張荊承、常樹蔭、李喜爾三人的關係，以張荊承為主帥，常、李二人為文臣武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鐵三角”實際上是掌握學校權力的核心人物。

張荊承充分利用了張如屏身體不好、大多數時間不在學校的機會，採取欺上瞞下的手法，排擠打擊持不同意見的、認為會影響自身地位的幹部，精心培育聽他的話、跟他走的人，在幹部中逐步形成一種風氣，把他的話奉為“聖旨”，違背他的意志，不聽他的話，就會受到排擠，甚至遭到無情打擊。張如屏發現這些情況時，為時已晚，他想解決，要到水電部、湖北省委反映情況，可還未去，却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在北戴河療養院突然逝世。

一九八三年七月，張如屏準備去北戴河療養的前一天，約我談了一下。當談到張荊承時，他很痛心，說：“你們（指張建成、陳傳鋼、黃風林）是對的，我對張荊承看錯了。原先以為他就是有個人主義的毛病，現在看來不完全是這個問題。他是老毛病不改！他表面上尊重我，實際上是利用我。我有病不在學校，他主持工作，對下說一套，對我又說一套，實際上是按他的那一套辦。現在我清楚了，他打擊排擠對他有意見的幹部，提拔重用聽他話的人，搞宗派活動。把于浩（曾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辦公室主任）調走，他對我講是部裏（水電部）的決定，後來我纔知道，是他自己要這麼做。部裏是調常樹蔭，他對部裏講我不同意，要把常樹蔭留下來，換于浩。部裏就同意換人，我和部裏都被他騙了。我是很相信他的，放手讓他工作，支持他的工作，有什麼事我給他擔着。李俊武、胡緒珍對我說過他的一些



事，我做工作，要他們支持張芾承，你們談對張芾承的看法，我也是這麼勸你們的。現在看來，是我錯了。現在他坐在黨委書記的位置上，把我都不放在眼裏了，我現在還是部裏、省裏任命的學校顧問，有些事想找他談談，他不來。有一次，我連打幾個電話，他來了，站着說了十來分鐘就走了，他說要開會，根本不願意談。學校的問題不願意談，你（指張建成）的問題叫我不管。看來，你的問題，學校的問題，在學校是解決不了啦。我準備北戴河休養回來時，到部裏談一談，回到武漢，也要到省裏談一談。”老院長嘆了一口氣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看錯了張芾承。”

我聽後真是很震驚，因為老院長從來不在我面前評價別人。今天談到張芾承時，語氣如此堅決，而且準備到部裏、省裏去談，他已經深思熟慮了。在他這個地位的領導同志，作出這樣的決定，說明他確實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有責任向組織上反映並要求解決。

李俊武副院長專程到北戴河看望張如屏，老院長對李副院長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看錯了張芾承！”李俊武回來後對我講了，也對朱冠先等同志講了。可見老院長對我講的話，並非心血來潮的氣話，而是對歷史的反思。老院長能說出這樣的話，顯示出他的高風亮節，更表現出共產黨人的使命與責任高於一切的崇高品質。

常樹蔭，南下幹部，一九五三年調武漢大學工作。一九六五年前任三系（電力系）黨總支書記。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常樹蔭調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宣傳部長，原宣傳部長胡緒珍調任黨委辦公室主任，原黨委辦公室主任于浩調往吉林電力學院。這樣就實現了張芾承既排擠打擊了他認為的對立面，又提拔了親信的意圖。此後，常樹蔭成了張芾承的得力助手和接班人。張芾承下來後，常樹蔭接班，任黨委書記，一方面傳承了張芾承排擠打擊對立面、提拔扶持親信的宗派主義的一套做法，另一方面為權力，又與張芾承及其另一親信之間展開了鬥爭。

李喜爾，文革前任保衛科長。他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集體被俘，停戰後遣返回國，轉業到我院。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工作積極。保衛科

長的工作特點，一是忠于黨組織的領導人，二是對敵鬥爭觀念強，辦案堅決執行領導指示。張芾承是學校的實際掌權人，李對張忠心耿耿，辦事幹練，工作能力較強，自然就成了張芾承的得力助手。政治運動中李喜爾衝鋒陷陣、一馬當先，平時由他掌管治安，是張芾承在任何時候都離不開的人物。文革後，張芾承將其提拔為黨委常委、副院長，成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真正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

“鐵三角”都聲稱尊敬老院長、關心老院長，其實他們關心的是送老院長離開學校去住院，或者到外地休養。他們也會到老院長的休養地探望，請示彙報工作，但對老院長的實質性關心之舉是沒有的。老院長對家庭、子女、私人的事，再困難也從不向組織上提出，自己想辦法克服。他們就利用老院長的這一特點，對老院長的困難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從不關心，更不用說幫助解決了。

老院長家住與武漢大學相鄰的山包上，上下班要走一段坡度大、級數多的階梯。他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走路既危險又費勁，用車接送則需穿行武漢大學，繞一個大圈子，極不方便。張芾承從未想過解決這一問題，為老院長出行提供方便。

在我任總務處長時，找武漢大學黨委書記紀輝，協商解決老院長出行的問題，請武漢大學讓一條路，由我院木工廠到老院長的住處修一條通道。紀輝書記同意我提出的方案，他認為應該為老院長的出行提供方便。雖然書記的決定遭到武漢大學基建處領導的反對，但他還是堅持從武漢大學的山坡上劃出一條路基給我們，也就有了現在十一教學樓門前的那條路。兄弟高校的領導都這樣關心老院長的出行問題，為什麼張芾承就無動于衷呢？

張如屏有四個孩子，老人在安徽老家，老二張家良在武漢同濟醫院，老三張皖中在四川三綫軍工廠工作，老四張延中，部隊退伍後分到鐵路系統工作，在機車上燒鍋爐。老院長沒有一個孩子在身邊，靠親戚大嬸照顧夫婦倆的生活，後來大嬸在文革中走了，又把陶靜冰主任的侄子請來幫助照顧。當權者有誰想過，幫老院長調一個子女回來，照顧老兩口的生活？學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職工身邊無子女

的，可以調一子女來學校工作；職工子弟從部隊轉業復員的，可安排到學校工作。為什麼老院長就不能享受這些政策呢？在學校領導中，除了張如屏，還有誰有這種情況？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老院長夫婦身體不好，無人照顧，其夫人陶靜冰向學校提出希望把張延中調到身邊，張蕪承這纔不得已同意將張延中調回，以工人身份到實驗室工作。張延中高中文化程度（武昌實驗中學畢業），當過兵，做過工，到學校後努力學習，鑽研業務，不僅把實驗室管理得很好，還輔導學生做實驗，而且能安裝、維修各類電器，如電視機、實驗室的測試儀器等。在這一時期，從工人中提升處級幹部、科級幹部，更多的人被提升為技師，而張延中則無人問津，得不到應有的升遷，直到退休仍是一名工人。老三張皖中在三綫工作，其單位地處四川的大山溝裏，他四十多歲時患急性黃疸型肝炎，由於沒有條件及時得到治療而死亡。他們的遭遇，不用說與張蕪承等領導的子女相比了，學校裏普通幹部有哪一個的孩子有如此結局呢？

以往老院長每次外出休養，都由學校派醫務人員或由他女兒張家良（同濟醫院內科主任醫師、黨支部書記）隨往。一九八三年老院長到北戴河休養，領導不同意派人，也反對借調張家良隨行，無奈之下，祇好由老伴陶靜冰和兒子張延中陪同前往。正是因為此次沒有醫務人員隨行，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張如屏院長是因痰塞住氣管，現場沒有人懂得如何排除而窒息致死的。

誰之過？張如屏院長的突然去世，應該由那些反對派醫務人員的人負責！這些勢利之徒因張如屏已經離開領導崗位，對他們沒有利用價值了，就連表面的虛偽的關心都沒有了。他們對老院長如此狠毒，是因為老院長是他們實現野心的障礙；是因為老院長已沒有利用價值了；是因為老院長在文革中支持了革命小將，直接觸及了他們的既得利益。隨着地位及權力的變化，他們對老院長的態度，由表面的、虛偽的走向了其原本的真實，證明了老院長的判斷和結論是正確的。

## 2. 張蕪承的組織路線

以張蕪承為首的“鐵三角”，對得罪了他們的人或有可能動搖他

們權力基礎的人，會給予不遺餘力的致命的打擊和報復，對那些不聽話或違背他們意願的人，也會明裏暗裏整。他們玩弄的權術無以復加，整了你，你還沒有話說，上級和局外人也無話可說。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這種氛圍中，幹部們即使有意見也不敢有所表示，更不用說反抗了。而有些人則投其所好，巴結、拍馬，迎合其需要，求得升遷與提拔。任何一個外來幹部，都是呆不住的，不是被壓得喘不過來氣，就是被調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自建院開始，直到文革後，幹部隊伍始終是在圍着張芴承的那些人中間選擇調整，而從外單位調進學校的幹部，只要不是張芴承主張調來的人，不管你是什麼地位、級別，一個也呆不住。文革中先後調進五位廳局級幹部，文革後全部走人，學校班子仍是以張芴承為首的“鐵三角”，而且更鞏固、更公開、更加隨心所欲。

下面幾個例子，可以從另一個視角解讀張芴承的幹部路線和用人策略。

于浩同志，山東人，南下幹部，在張芴承、常樹蔭之後調到學校工作，任水院黨委辦公室主任。他為人忠厚、直率，有意見就講、就爭。張芴承對上報喜不報憂、對下壓制不同意見的做法，他有意見，當面對張芴承提出過，這樣就得罪了張芴承，而受到排擠。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水電部通知，調常樹蔭到吉林電力學院（常是東北南下幹部）工作，張芴承不想放常樹蔭走，常也不願意離開水院，于是就把于浩調走。張芴承對張如屏說，這是部裏的意見，而對水電部講，這是張如屏的意見。張芴承用兩面欺騙的手法，得到了水電部和張如屏的同意，遂了張芴承和常樹蔭的心願。當于浩得知要調他去東北後，在行政大樓裏大罵張芴承卑鄙，這是當時黨委辦公室的人都知道的事。張芴承為了平息于浩的不滿，欺騙于浩說，他到吉林電力學院是去任黨委副書記，并要他馬上去報到。于浩到吉林電力學院後仍任黨委辦公室主任，曾寫信希望調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却被張芴承拒絕了。後來，于浩通過水電部調到華北電力學院，任黨委辦公室主任。



張芴承欺上瞞下、偷梁換柱將于浩調走，是一個一石二鳥的計劃。

這涉及到胡緒珍的問題。胡緒珍是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原是張芴承的左右手、文臣。但胡緒珍敢講真話，有時對張芴承也敢頂撞，讓張芴承感到胡緒珍不好駕馭，不聽話，所以要換馬，而要換的人就是常樹蔭。因常樹蔭有把柄在張芴承的手裏，所以常對張芴承是百依百順的，非常聽話。常樹蔭在中國人民大學研修班學習過，是才子，文足以頂替胡緒珍，忠則大大超過胡緒珍。張要把常樹蔭調到身邊，就把胡緒珍從宣傳部調到辦公室，遠離權力中心。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講，于浩都必須走，把位置騰出來。

胡緒珍在文革初期被拋出來，他與梁百樸副院長的歷史問題，是組織部長馮萬秋講出來的。馮萬秋是一個老組織部長，在部隊時任軍黨委的組織部長，沒有上級的暗示或同意，他敢這麼做嗎？胡緒珍的夫人張越對我講過，老胡得罪人了。得罪了誰？為什麼事？我沒有問。胡緒珍被拋出來後，揭發、批判的火氣很猛，根據歷次運動的經驗，這是黨委領導要整他的信號。於是，胡緒珍很快就病了，講不出話了，瘋了。他不是要躲避紅衛兵小將的衝擊，而是躲避要整他的人的鋒芒。這就不難解釋，工宣隊進院後，他不瘋了，病也漸漸好了。在黨委學習班上，他積極地揭蓋子，特別是揭露了張芴承的很多事情，因而樊馬義說他是黨委裏的一個好人。當形勢發生變化時，他發現張芴承倒不了，知道自己難有好結果，就要求調離學校。在文革中，胡緒珍的所有舉動，都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問題所在，應當避開什麼人的進攻，他應該攻擊誰，又應該如何防備遭受進一步的打擊報復，他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胡緒珍是個聰明絕頂的人。

常樹蔭有把柄在張芴承手裏，這是老院長對我講的，至于是什麼把柄，他沒有講，我也沒有問。後來纔知道，是常樹蔭犯過生活作風的錯誤。此事發生後，張芴承包庇常樹蔭，既不准知情人講出來，也不進行組織處理。由此，常樹蔭對張芴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常樹蔭掌權後就不一定了），成為張芴承的得力助手，進而成為張芴承的接班人。

常樹蔭是我的老領導，我從北京調到武漢，安排我到三系（電力系）任分團委書記、總支委員，當時常樹蔭是總支書記，是我的直接領導。在三系，大家背地裏叫他甩手掌櫃，他是當家人，但不怎麼管事，向他彙報工作，他總說你們看着辦。總支開會，很少研究工作，祇是布置任務，而這些任務又大部分是上級布置下來的。別人告訴我，常書記在寫書，所以很少來辦公室。我當時的感覺是，這位總支書記有點不務正業，我在北京工作時是看不到這樣的總支書記的。後來我到院團委，他也很快當了黨委宣傳部長，我很擔心他仍和在系裏的表現一樣，這個部長怎麼當？我也弄不清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提拔幹部的標準是什麼，因為我那時并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所以纔覺得不可思議。

一九八三年底、一九八四年初，張芴承又演了一出一石二鳥的活報劇，既打壓了違反他意願的人，又為他要提拔的人清除了障礙。

水利電力部決定，在長沙電力學校的基礎上，組建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該院的主要領導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選拔。

首選人員是朱冠先，檔案已調水電部。一九八四年春節前，水電部教育司司長許英才找朱冠先談話，要調朱冠先到長沙，組建水電師範學院。朱冠先表示服從組織安排。但張芴承不滿意，春節過後，他以學院顧問的身份（此時剛從書記位置上退下來），進京到水電部游說、做工作，結果調院黨委副書記龔詢潔到長沙，朱冠先落選了。這樣，既打壓了朱冠先，又為高進珊（原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後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副書記、書記）登上高位鋪平了道路。

朱冠先是我的前任院團委書記，以後曾任三系總支書記、總務處長等職。他為人忠厚，群眾基礎好，工作認真負責，踏實肯幹，曾是張芴承的重點培養對象。文革初期他執行院黨委、工作隊黨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按指示銷毀過一批黑材料，被革命小將批鬥，並“開除”黨籍，之後沒有參加任何派別活動。這樣的條件，在八十年代被選為接班人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水電部領導審查選中朱冠先。但朱冠先在文革初期，有兩件事違反了張芴承的意願，得罪了張芴承，所

以在張芴承重新掌握權力以後，就對朱冠先趁機實施報復打擊。因為朱冠先在文革中沒有任何把柄可抓，所以祇能施以壓制。

朱冠先得罪張芴承的兩件事是：其一，工作隊要撤出學校，省委指示各高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以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此時，黨委已靠邊站。張芴承為了繼續掌握權力，就要派人進入文化革命委員會，張芴承想派朱冠先進去。可朱冠先因家庭出身原因，不願拋頭露面，沒有同意，并提出說：張建成可以，家庭出身好，又是團委書記。張芴承對此不滿，因他對張建成一直存有戒心（外來幹部）。張芴承第二次找朱冠先談話，動員他參選，朱仍拒絕。後不得已派李喜爾參選，因李喜爾鎮壓學生運動一馬當先，在學生中口碑不好，沒有把握選上，所以張芴承把朱冠先作為第一人選。朱冠先的拒絕，讓張芴承很惱火，對一個權力至上的人來講，部下不聽指揮就是對他權力的挑戰，何況此時黨委靠邊站，朱的拒絕就有了背叛的嫌疑，這使張芴承刻骨銘心，永不忘懷。

其二，在體育館的批判會上，有人揭發張芴承的妻子在六十年代藉外出招生為名，到四川去探望其兄長。此事被上綱為張芴承利用職權，假公濟私，以招生為名，讓其妻到四川探親訪友，游山玩水。揭發者為證明此事不假，指名朱冠先上臺作證，因為朱冠先是此次四川招生組的負責人。朱冠先如實說：有此事。這件事被張芴承視為背叛，大逆不道，而且是在張芴承失勢挨批的情況下的背叛，更令他記恨在心。

這兩件事足以讓朱冠先在張芴承的心裏打下烙印，不要說提拔，就是平時工作中也會給穿上小鞋。張對朱冠先的打壓此時並沒有完，在以後的工作中及常樹蔭接班後繼續進行着。

高進珊，文革前是一般教師。在第二任軍工宣隊指揮長樊馬義任內，成立了張芴承專案組，對張芴承進行審查，除了校內問題、歷史問題外，還有一個特務嫌疑的問題，這使張芴承很緊張。高進珊是張芴承專案組成員，因某種緣故，張芴承對高進珊非常感激。張芴承的特務嫌疑解除後（特務張芴承，確有其人，經查證落實，與張芴承書記

同名同姓，此張莠承非彼張莠承），高進珊就成為張莠承家的常客，兩人關係也就非常密切。張莠承要報恩，曾對人說，要讓高進珊接班。

當時的班子情況是，張莠承退下來後，由常樹蔭接任黨委書記一職，副書記龔詢潔、高進珊。張莠承希望常樹蔭之後，由高進珊接班，但高進珊的前面還有龔詢潔，因而，龔詢潔就成了高進珊接班的障礙，所以，必須把龔詢潔調走。於是，就有了上述張莠承一石二鳥的傑作。一九八四年九月，龔詢潔調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任院長，高進珊成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唯一的黨委副書記。這樣，既打壓了朱冠先，又為高進珊的接班掃清了障礙。

韓德勇，山西人，全國解放前參加工作，以後調幹入學，一九五八年畢業于武漢水利學院（即後來的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留校工作。我調到水院後，他一直在黨委組織部工作，官至組織部長、院紀委書記。韓德勇為人忠厚老實，沒有架子，平易近人，說話輕言細語，工作認真負責，群眾關係好。一提起老韓，不少人都說：“老實人，沒有害過人。”這句話對於一個官員，特別是管幹部的官員來講，是相當好的評價。現在人們對官員好壞的評價着重于經濟上是否貪污受賄，清廉的官員被視為好官。當時人們對官員的評價，則重視對工作的態度和是否害過人這兩點。韓德勇是屬於群眾評價高、口碑好的一類，所以他的官運也是平穩上升的，但在正處級這個臺階上止步了。其重要原因是做了兩件得罪張莠承的事，失去了張莠承對他的信任。

一是對張建成問題的態度。韓德勇始終認為，張建成在文革中沒有做過害人的事，對張建成的問題看重了，處理不當（他在其回憶錄中仍堅持這一觀點）。這與張莠承的觀點是相悖的。

二是原組織部長馮萬秋到省委反映情況，韓德勇陪同前往。韓德勇的本意是馮部長年歲大了，怕一個人在路上有什麼閃失，作為馮萬秋的接班人，陪老領導一程也是無可厚非的。馮萬秋的革命資歷比張莠承老，級別比張莠承高，同為學校顧問，張莠承的權力不減、待遇不減，而馮萬秋却什麼也沒有。他不服，因此到省委去反映情況。在張莠承看來，他們是去告狀的，是韓德勇和馮萬秋共同反對他。



這兩件事，韓德勇認為完全是正常的事，張芴承則認為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在張芴承掌權後期與常樹蔭接班後，韓德勇遭到了冷落，這在部分幹部中是有議論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成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是湖北省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災區。校黨委殘酷鎮壓學生運動，把那麼多學生打成右派，並捏造事實，把學生郭明正打成“持刀行兇”的現行反革命，逮捕法辦。在白色恐怖中，學校有人自殺，有人被送進精神病院，響應工作組號召揭露過黨委某些人問題的師生，人人自危。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些師生的言行觸動了他們的權力基礎，所以他們要百倍地加以打擊報復。

張芴承主持水院的工作，控制着水院的權力，指揮着一切，功勞是自己的，問題是別人的，不願意也不敢承擔自己應擔的責任，這一特點在文革中體現得非常充分。文革即將開始時，一般人都清楚一場政治風暴即將到來，張芴承把張如屏院長從休養地接回來，宣稱黨委的一切工作、一切決定，都是請示了張如屏的。言外之意，就是在運動中如果揭露出什麼錯誤、什麼問題，都由張如屏承擔責任。而張如屏從黨性原則出發，願意並且能夠承擔領導責任。張芴承的這種作為，在中層以上幹部中是有目共睹的。

文革中張芴承指使一些人銷毀黑材料，當革命小將發現後對這些人進行批判鬥爭，甚至要求開除這些人黨籍時，他不僅不站出來承擔責任，反而在黨委成員碰頭會上同意群眾的要求，開除了朱冠先、倪慧慈的黨籍，倪慧慈的入黨志願書被當場燒毀。這是廣大群眾親眼目睹的事情。又如，張芴承在打學生右派時，親自布置張瑞禎發動食堂工人寫大字報、大標語進行反擊，題目是他定的，並要張瑞禎組織幹部幫助工人寫、抄大字報。福利科的幹部在張瑞禎科長的帶領下，一夜未眠，寫出了“我們工人有話說”、“工人說話了”等大字報、大標語，完成了張芴承交給的任務。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張瑞禎科長因此受到批判、鬥爭，甚至被毆打，張芴承就在臺上，看着張科長為他受過，他却無動于衷，不站出來說明真相，承擔責任。這些代

他受過的幹部為什麼不揭露事實真相呢？因為他們怕，一旦揭露出來，就意味着背叛了他，就會受到無情打擊和報復。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幹部都知道張荊承整人的手腕，所以寧可自己吃虧，也不敢招惹他。

張荊承一九五三年從河南隻身來到武漢，同時期來的還有于浩、常樹蔭、王文斌等人。一九五四年成立武漢水利學院，張如屏來院工作，以後陸續調來了李俊武、于儀卿、馮萬秋等老同志。在這批處級幹部中，有的資歷比張荊承深，有的級別比張荊承高，張荊承在武漢又沒有後臺、人脈，却在短短幾年間脫穎而出，鶴立雞群，成了學校的二把手、學校工作的實際主持人，從此開始編織自己的網絡，建立張荊承王朝，最終連張如屏都不在他的話下。何以如此？這是不少人提出的問題。

我以為，下列三個因素成全了張荊承的權力夢：

第一，才氣和幹勁是張荊承實現權力夢的素質基礎。張荊承是有才氣和幹勁的幹部，我沒有看到過張荊承公開發表過的文章，但他的報告提綱，我是多次見過的，都是他自己寫的。張荊承的工作報告，多數是他自己寫提綱，報告很流暢，很有煽動性，邏輯性也很強，正因為不是照本宣科，所以報告顯得較生動，這沒有一點才氣是做不到的。張荊承工作幹勁足，上班從不遲到、早退，晚上和星期天也經常在辦公室，這在領導幹部中不多見。張荊承事無巨細，祇要他關心的事，就一抓到底。中層幹部外出須經他批准，回來要向他彙報情況。學校發生的事情，他都要瞭解，所以他消息靈通。他的才幹是有目共睹的。正因為有才幹，所以獲得了張如屏的好評，纔從眾多處級幹部中把他提拔起來。

第二，張如屏的信任和放權，是張荊承實現權力夢的必要條件。張如屏在與我的談話中，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他（指張荊承）工作是積極肯幹的，也有一定的才幹和工作經驗，我當時認為他有培養前途。有人反映過他作風不夠正派，我認為有點個人主義的東西，不嚴重，他對自己的要求還是比較嚴的，所以我提出把他提起來。我這個人愛才，有才、有幹勁的幹部，我就重用，用人不疑，用了就大膽

放手讓他幹。現在看來問題出在我生病後，住院、休養的時間長，很少管學校的具體事，與其他幹部的接觸少了，祇聽他的彙報，我就信以為真。他在幹部問題上搞了不少名堂，利用我對他的信任，搞他的一套，不正派，我看錯了。”

其實，從五十年代末開始，張如屏已大權旁落，張荊承已處于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的地位。張如屏身體不好，不抓實際工作，處于原則領導的狀態，這是最容易被人利用的。張荊承就是利用了張如屏對他的信任與放權的機會，開始編織他自己的獨立王國。

第三，張荊承的權術運用，是實現他權力夢的重要手段。張荊承的權術運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善于抓住機會，條件成熟時，果斷出擊；需要忍耐時，他一定會隱藏起來；需要表現傷心的時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編造謊言時，他就大膽地編，達到目的為止。他對人當面叫哥哥，背後摸傢伙；他可以為親信包庇掩飾錯誤；他對上報喜不報憂，說假話，對下壓制不同意見，制裁反對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獨立王國。在這個王國裏，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他的一石二鳥計謀屢屢得手，除上述兩例外，前面提到的文革結束後整我時提出“批宮揪張”的偽問題，也是這一套路，既能坐實我“篡黨奪權”的罪行，又能把宮雨屏抬出來，造成不是他張荊承要整我的假像。他進而讓黨委成員人人過關，說他們被我利用來“揪張”，在人人自危的情況下，讓黨委成員與我劃清界限，使他們不能講公道話，否則就是與張建成同流合污。又如，他一方面向水電部教育司領導大談我的優點，造成領導上認為我反映張荊承的問題是我對他有成見的印象，另一方面却背着水電部領導往死裏整我。張荊承屢屢得手，得益于時機掌握得好，時機不到，他的陰謀就會暴露，時機合適，就能以大環境來掩蓋他的陰謀，這是張荊承的高明之處。

### 3. 一脉相承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水電部領導宣布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新的領導班子：黨委書記常樹蔭，黨委副書記龔詢潔、高進珊，張荊承當顧問。常樹蔭正式接班，高進珊也正式登堂入室，實現了張荊承

的初步願望。一九八四年九月，在張荊承的努力下，龔詢潔調任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院長，副書記高進珊的位置往前挪了一步，更接近張荊承所預設的目標。

常樹蔭接班後，與其前任一樣，也要構築自己的權力基礎。一九八五年他把李貞儒提為黨委副書記。一九八六年四月院黨代會後，李貞儒的排名在高進珊前面。這就違背了張荊承與高進珊的意願，於是出現了張荊承與常樹蔭之間、常樹蔭與高進珊之間的矛盾。在一九八七年矛盾尖銳時，高進珊曾揚言要把常樹蔭的老底揭出來，這當然是指張荊承掌握的常樹蔭的把柄，可見他們三者之間的關係。

一九八七年，李貞儒與辦公室打字員之間的不正當男女關係被揭露，兼任院紀委書記的高進珊要立案調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樹蔭則千方百計要保李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讓李貞儒死不承認，以為這樣就無法作結論。這一招沒有奏效，他就通過水電部人事勞動司干預（人勞司的韓司長與常樹蔭是中國人民大學研修班的同學），幾次都說材料不充分而不能定案。高進珊這邊依靠省紀委，由省紀委找李貞儒談話，李貞儒最後承認了，給了他個黨內處分，接着把他調到長沙鐵道學院。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高進珊取得了勝利，為以後的接班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同樣性質的錯誤，常樹蔭在張荊承的包庇下，風平浪靜，似乎沒有發生過，在群眾眼裏他是正人君子。時隔二十多年，在八十年代的形勢下，這種事發生在領導幹部身上，已司空見慣，却被搞得翻天覆地，上至省委、水電部，下至一般老百姓，弄得盡人皆知。李貞儒身敗名裂，何以至此？事實與過程說明了一切。在這裏，沒有原則，祇有權力鬥爭的需要。常樹蔭不是張荊承，高進珊的底氣在於張荊承的支持。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有一個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省紀委領導的賞識，但成了常樹蔭的出氣筒、打壓對象，這個人就是時任院紀委副書記、李貞儒專案組組長的朱冠先。在這個案件中，朱冠先並不是有意識地站在哪一邊，祇是對案件本身負責，由於他工作認真細緻，



獲得多方面的人證、物證，逼得李貞儒不得不承認。省紀委有關領導認為，李貞儒事件的材料在同類事件中是最充分的，由此認為朱冠先很適合做紀檢工作。此後不久，省紀委通知學校，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已具備了設立紀委專職書記的條件，望將人選上報省紀委審批。院黨委接到省紀委的通知後，立即把朱冠先調離紀委，安排到院工會當工會主席。常樹蔭在與朱冠先談話時，明確講院工會主席是副廳級，馬上上報水電部審批。與此同時，學校向省紀委上報了兩個當時與紀委工作無關的幹部。省紀委不能干預基層黨委的安排，但他們有權不批。因此，水院到最後也沒有紀委專職書記。

朱冠先幾次找常樹蔭詢問上報審批的事，常樹蔭拖着不辦。後來朱冠先直接給水電部教育司寫信詢問，許英才司長接信後作出批示，讓水院將工會主席級別一事上報水電部審批。水電部有指示，再也拖不下去了，學校祇好寫報告上報水電部，但一直沒有回音。後來弄清楚了，還是那位人勞司的韓司長壓住了，說人勞司討論了三次，沒有通過。其中的奧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沒有理由不辦的情況下，通過上級某位有關係的權力人物壓下來，既達到了打壓朱冠先的目的，又洗刷了打擊報復的嫌疑。在這點上，常書記的權術不比張書記差。在打壓朱冠先的問題上，幾位領導是統一的，所以上層沒有矛盾。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常樹蔭到點離休，高進珊接班任黨委書記，實現了張芾承的願望。

高進珊，武漢蔡甸人，一九六二年畢業于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留校任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文化大革命中在張芾承遭受審查、批判、落難的時候幫助過張芾承，張芾承重新掌權後，為報答高進珊，發誓要讓高進珊當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黨委書記。這種投桃報李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失敗後，到處都有，所不同的是，張芾承為確保高進珊能夠登上水院一把手的寶座，在排除其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時，親自出馬，不遺餘力，足見其之真心誠意！

高進珊上任不久，龔詢潔由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調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任院長。有一次在一座四星級賓館裏招待老同學的宴會

上，有同學問高進珊，龔詢潔為人老實，但能力似乎差些，你怎麼同意把他調回來當院長？高進珊笑着說：“這你就不懂了，能力差，好控制。”高進珊敢于這麼說，可能是因為老同學之間說話，沒有設防火牆，也可能因為他已大權在握，有些忘形了。後來的事實證明，高進珊控制不了龔詢潔，他們之間在很多問題上意見相左，矛盾不斷，弄得領導層不得安寧。高進珊書記在任上當然也會提拔一些他認為需要提拔的人，但有些事做得太過明顯了，遭到人們的非議，例如，把老鄉×××從工人提升為處級幹部，人們不是認為工人不能提升，而是被提拔者與書記間的關係過于密切，且其人在群眾中議論較多，這樣的提拔，顯得有失公允。

上世紀九十年代，正是改革開放的鼎盛時期，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下海之風正盛。高進珊書記能夠與時俱進，在抓權力的同時，不忘抓經濟，以適應時代的潮流。他支持投資紅桃 K 保健品公司、凱迪公司，讓那位工人處級幹部籌建股份制汽車修配廠。高書記在有些企業裏握有股權，特別是凱迪公司上市後，高書記的原始股為他增加了不少財富，當上了凱迪公司董事會的董事。學校在紅桃 K 投資 100 萬元，該公司發展後，董事長提出以 3000 萬元收購學校的股權。學校後來宣布，投入了 100 萬元，收入了 1000 萬元，即以 1000 萬元賣掉學校所持紅桃 K 公司的股權。人們好奇的是：對方出價 3000 萬元，而學校祇要 1000 萬元就賣掉了，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這樣做買賣的？其中的奧妙耐人尋味！

由于學校領導層的矛盾影響到學校的工作，也由于群眾議論太多，水電部將高進珊調到華中電管局任副局長，主管教育方面的工作。我認為，這對高書記絕對是一件好事。不管怎麼說，高書記是響應鄧小平號召，屬於先富起來的一類領導人。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三代掌門人，都為權力而鬥爭過，為構建自己的權力結構，排斥、打擊過于己不利的人，袒護、提拔過自己的親信，手段也差不多。有的成熟些，瞞天過海，掩人耳目，讓人看不清他的本來面目，被他賣了還在為他數錢；有的則讓人一看便知，還不夠成

熟。就三代掌門人的廉潔程度、工作能力來說，張荊承是無可挑剔的，客觀地說，三代掌門人一代不如一代。他們雖然經過了坎坎坷坷，在獲得權力上是勝利者，但最後都落得孤家寡人，群眾對他們議論紛紛，所以又是做人的失敗者，結局也是一樣的。他們三位從根本上來說，目的、方法、結局都是一脈相承的。

#### 4. 對我下毒手的原因

無論從哪方面講，我都不可能被開除黨籍，這是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絕大多數人的看法。我不想為自己辯解什麼，因為事實擺在那裏，功過自有評說。為什麼會對我下手如此狠毒，定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祇有張荊承、常樹蔭、李喜爾等人知道，他們是決策者、主持者、主使者。

在討論我的結論材料和處理決定時，不少人提出過不同意見。有人具體地提出：文革中的共性問題不能作為處理的依據，如批判幹部、學術權威的問題，呼喊打到×××的口號，相互打聽瞭解情況，武漢“七二〇”前後出現的批判軍隊幹部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在當時形勢下產生的共性問題。要處理的是那些利用文化大革命誣陷別人、打擊報復、搞破壞活動、殺人放火投毒等等個性問題，張建成沒有個性方面的問題，有的同志明確指出把張建成的問題看重了。但是，張荊承、常樹蔭、李喜爾等人根本聽不進去，堅持原來的觀點和材料。這說明他們三人（鐵三角）在整倒整死我的問題上立場和態度是一致的。

院紀委副書記陽鈞告訴我，他向領導反映了我的意見，他們不同意，反說我的態度不端正。

黨委副書記李貞儒說：我們也覺得處分重了，待整黨後期再說。省委沒有說你是“三種人”，我們也沒有說你是“三種人”。現在群眾要求我們公布你的材料，你不要去說，說了沒有好處。

黨委書記常樹蔭說：你的問題是平衡出來的，你離開了也好，我都想離開這個黨。

黨委常委、副院長李喜爾說：行為一樣，目的不一樣。

從上述幾位領導親口對我講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們根本說不清

我到底是什麼問題，依據什麼開除我的黨籍。

當他們知道幹部、群眾有看法，要求公布我的材料時，他們根本不會也不敢公布那些編造出來的所謂材料，也不讓我出去講。李喜爾在回答我的提問時講的所謂“行為一樣，目的不一樣”這句話，已清楚地表明，他們是先把我的定性為反革命，進而把我的一切活動都說成是為了反革命的需要，在對我的審查過程中、在結論材料中都體現出這一點。因此，一切問題都要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例如，批林批孔運動中，魏書記要我到二招去瞭解中央及省委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的精神與安排，我回來向黨委負責人彙報了，也對李喜爾講了。可在整我時、在結論材料裏就變成了“到二招與‘四人幫’幫派骨幹聯繫，按他們的旨意在學校開展批林批孔，篡奪批林批孔的領導權”。這就是他們的基本手法，反正已經定了性，要把你打倒，這是前提，有影子的就無限上綱上綫，沒有影子的事就編造、誣陷，這樣的材料能公諸于世嗎？他們編造了一系列關於我與“四人幫”在湖北的代理人、幫派骨幹一起篡黨奪權的“故事”，加上我又不承認、不老實、態度不好，其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想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個性的一面。

共性的一面，就是我本來是屬於他們陣營的，文革中支持革命小將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反，而這些人又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我在他們眼中成為大逆不道的背叛者，觸及了他們的權力和利益，他們是一些權力欲極強、個人利益至上的人，一旦有機會，就會進行瘋狂的打擊報復。他們極端仇視文化大革命，念念不忘王任重“槍打出頭鳥”的指示，這不是個人恩怨問題，而是屬於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範疇的問題。

個性的一面，則是他們各有各的打算。文革中張蕪承耍弄過我，我在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面前談過對張蕪承的看法，跟張蕪承本人也交流過。但張蕪承認為是我告了他的狀，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一有機會就對我進行打擊報復，在他看來是理所當然的；整我，而



不整“死”，在他看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為他瞭解，如果不開除我的黨籍，我一定能東山再起。若留在學校，總有一天他會下臺，怕我到時候報復他；若調到華北電力學院，他知道我去後，是該院黨委書記的第一候選人，如果以後調到部裏，成為他的上司，那後果更不堪設想。因此，他必須把我整“死”，以絕後患。其實，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不會也不可能對他進行報復，祇是想早點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罷了。

對常樹蔭、李喜爾兩人而言，除了擔心打不倒我、我會報復以外，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擔心我在臺上，他們就不可能受到提拔重用，當不了副書記、副院長，常樹蔭更怕從此當不了接班人。

對李喜爾、×××來講，他們是我專案組的負責人，如果整不倒我，那就是否定了他們的工作，更怕我反過來報復他們。

這些人不是唯物主義者，他們認為需要就是合理的，目的就是一切，實現的途徑是不擇手段。他們都有一種劊子手的心理，因報復別人而怕別人報復，所以祇有把別人徹底幹掉，他纔安心。這種劊子手心理，使他們喪失了理智，可以不顧事實，不顧政策，不顧幹部群眾的呼聲。他們為達到整倒別人的目的，可以造謠誣陷，可以無中生有，可以編造事實依據，可以搞逼、供、信。其實，毛主席早就看清了這一切，早就說過“專案組靠不住”。

根據我在文革中與這些人的接觸，我覺得他們是一些風派人物，沒有原則，沒有信仰，跟着權力、利益走。這種人在洋人入侵時，會不會成為漢奸就很難說；但當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他們肯定是擁護的，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因為整我有功，一些人彈冠相慶，升官發財，先後有五人提拔到廳級、副廳級的位子上。我不能說張芴承、常樹蔭的提拔是否與整我有關，但李喜爾、謝德煥、顏國良的提拔，肯定與整我成功有關。李喜爾、謝德煥還說得過去，因為他們是張芴承圈子裏的人，在清理三種人運動中，竭盡全力，按領導者的意圖，不擇手段整垮了張建成，給予他們獎勵也在情理之中。

而顏國良作為水院“紅教工”組織的一號頭頭、兩派鬥爭中的派頭頭、一個非黨員，怎麼會從一個白丁（非黨員、非幹部）升為廳局級幹部，很多人想不通。熟悉顏國良的人都知道，他在文革中有時左得出奇，有時右得要命，情緒忽高忽低，很不穩定，好激動。在抓“五一六”時，他是最早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並揭發了我院“五一六”的組織系統，揭發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組織領導者，除了反軍亂軍外，還整理了周總理的材料，給他看過，他還提出過修改意見等等。之後，他與造反派劃清界限，碰面時假裝沒看見。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又成為造反派頭頭，慷慨激昂發表演說，參加各類會議，包括派頭頭的會議。他向我檢討錯誤，表示決心跟着毛主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依然十分積極。“四人幫”被抓後，他反戈一擊，我們又成了陌生人，還是見面裝作看不見。對於這樣的風派人物，張荋承、常樹蔭看中了什麼？他們看中的，就是顏國良的隨風倒，看中的就是要從顏國良嘴裏講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顏國良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們的需要，肆意編造所謂的“證據”。他們在短短的幾年裏，讓他入黨，給他提幹，調他到教務處，後又升任處長，之後又推薦他擔任長沙水電師範學院的副院長，這就是他們對顏國良的獎賞。怎麼會有這種違反常規的超常提拔？顏國良除了揭發我是所謂“五一六”、整周總理材料外，不知道還幹了些什麼，令當局如此看重他、重用他，還不惜為提拔他向部裏謊報材料。水電部人勞司王副司長來學校考察幹部，到我家裏來看我，我問他對顏國良的情況是否瞭解，他問有什麼問題，我介紹了文化大革命中顏國良的情況。他說，不清楚，學校上報的材料中沒有這方面的內容。這就是他們的伎倆，要打倒的人沒有材料可以編造材料，要報答、提拔的人，有問題可以隱瞞不報，欺上瞞下，一以貫之。

##### 5. 失去權力以後

張荋承一九八三年底退出一綫，擔任顧問。讓退下來的領導擔任顧問，具有中國特色。顧問是個閑職，沒有具體工作，一綫領導交代下來需要顧問們辦的事，就辦一下，大部分是場面上的事。顧問不

需要每天按時上班，我體會，這樣做是讓老同志退下來後，有個過渡階段，調整心態，以便安度晚年。

但張芾承顧問依舊每天按時上下班，大小會每會必到，到會必發言講話，領導研究工作、聽彙報也必親臨，還要找人談話、瞭解情況，很是忙碌。這樣做給一綫領導的工作造成一些不便，但面對提拔自己的老領導，也不好破這個面子。時間長了，不免產生矛盾，說退下來了還抓着權力不放。連馮萬秋這樣的老好人都看不下去，跑到省委去反映，也有人向水電部反映，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水電部發文，免去其顧問職務。

張芾承離開黨委書記寶座後，各方面都發生了他意想不到的變化：門庭若市的家，立馬變得冷冷清清，很少有人上門了；書記的專車沒有了，他要用車，祇能用老幹部的公用車；到醫院看病，領導親臨、前呼後擁的特權沒有了。他曾感嘆說：我下來了，你們就不管我了！有一次他去北京，說是到部裏談工作，希望部裏派車到車站接他，教育司的同志回應稱，沒有車，坐計程車來。這一切發生得這麼快，又這麼現實、這麼具體，張芾承感受到了“人一走茶就涼”的苦味。在職、去職，一字之差，差別這麼大，他失落，他埋怨那些他包庇過的、培養過的、提拔過的人太無情，忘恩負義。此時不知道他是否想起過，他自己是怎麼對待張如屏老院長的？這叫一報還一報啊！

對一個權力欲極強、并用權力隨心所欲實現個人願望的人來說，失去權力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失去一切，尤其面對自己培養的接班人（常樹蔭、高進珊）的一反常態，由熱情討好變為冷漠，由向自己彙報、聆聽教誨變為嫌棄，他無法接受，心情不好，加上長期滿負荷的工作狀態，一下子變為無所事事的鬆弛狀態，身體各方面便發生了變化。張芾承在被免去顧問職務後不久，身體明顯差了許多，也蒼老了許多，到後來，走路要有人扶着，否則會倒下去，腰快彎成九十度了，前列腺手術後尿不盡，非常痛苦。我看着他被人扶着艱難地向校醫院走去時，那一瞬間，我可憐他、同情他，想起了他勤奮工作、熱情關懷團委工作的情景，也想對曾經受過張芾承恩惠的人大喊一聲：他為

你們費盡心血，把你們扶上了台，你們就對他不聞不問了？你們的良心何在？接着又想，張芾承這樣對張如屏，常樹蔭、高進珊又這樣對張芾承，將來他們的接班人又會怎樣對待他們呢？天曉得！

常樹蔭下來後徹底地離開了，因為學校已不設顧問的職務，他沒有理由留下來，再說高進珊也不會讓他留下來。他與一些老幹部一起辦了一個學校，工作人員有些是我院的退休人員。這個學校原先的領導人是李爾重，後來由常樹蔭主持工作，以後他把學校轉讓出去了，聽說結余了 80 萬元左右。一起參與籌建學校的人要求常樹蔭交出帳本，共同合理地處理這筆錢，為此，相互間發生爭執。該校的會計是常樹蔭請去的我院退休幹部陳××，他將帳本及現金拿回了家，對方隨即報案，警方採取行動，搜查了陳××的家，取走了會計帳本和現金，並拘留了陳××，搞得滿城風雨。此事眾說紛紜，有的說是陳××貪污，有的說是陳××代人受過。究竟如何，當事人不說，局外人不得而知。風波過後，陳××受到了不應有的打擊，原本健康的身體漸漸衰弱，前幾年離開了人世。常樹蔭夫婦後來到美國，與女兒生活在一起，因得癌症于幾年前死于美國。

李喜爾退下來後過了幾年好日子，後來也得了癌症，我到醫院去看過他。實事求是地說，他後勤工作抓得不錯。他整我，有完成任務的一面，也有他私心的一面。我幾次想與他談談心，回顧這段歷史，大家相識一場，彼此也存在有好感的一面，應該是可以談談的，但終未談成。我想，我有這份心，他未必有，過去這麼多年了，萬一話不投機，吵起來，那不是傷口上撒鹽嗎？何況他得的又是絕症。因此，我無法向他表達我的感受，也無法瞭解他當年那樣做的真實想法。他于二〇一〇年去世。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鐵三角”死了，而且都是得怪病死的，活着的時候，他們都知道自己得的病是無法治愈的，總有生不如死的感覺，因為死亡時刻威脅着他們。他們要整死的張建成却還活着，而且還在工作，這是上天的安排還是命運使然，或是別的什麼，誰也不知道。但我是清楚的，我沒有害過人，沒有做過對不起別人的事，所以



我任何時候都是坦然的，踏踏實實過我的清貧生活。

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權力是用來為革命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權力越大，對革命事業和人民負有的責任也就越大，越要小心謹慎地使用權力。如果一個人把追求權力作為目的，用自己所掌握的權力來對付有不同意見的或反對過自己的人，用來為私利服務，這樣的人肯定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而是變了質的共產黨人。

我經常想，文化大革命是否不可避免？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我們共產黨的幹部進城以後有些什麼變化？為什麼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官僚階級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通過解剖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這隻麻雀，再看左鄰右舍及我們的上面，我有答案了。我的結論是：毛主席真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億萬人民擁護并積極參與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

## (七) 傷痛

### 1. 給朋友帶來的傷痛

我被隔離審查後，我的很多朋友也被隔離了，如王紹良、章少強、陳鑒治、曾相金、陳伯強等。

逼他們交待與我的關係，要他們與我劃清界限，交待他們所瞭解的我的一言一行，例如開過什麼會，在什麼地方、什麼人參加，張建成都講了些什麼，從夏、朱、胡處領回旨意後，在學校是怎麼貫徹執行的，是怎麼“批宮揪張”的等等。

可以想像，朋友們多麼為難，朝夕相處、互相瞭解、相互信任的朋友，要以敵人對待，揭發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把大家商量的事，都推到一個人身上，是多麼的難！但不這樣，就過不了關。他們要根據專案人員的提示去冥思苦想，去挖掘，甚至要說些違心話，直到專案人員滿意。這種精神上遭受的折磨，祇有經歷過的人纔有體會，甚至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

我連累了朋友們，如果有些事我處理得當，也許不會造成這樣的

結果。雖然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沒有張建成，也會有李建成、王建成，也還會連累一批人，但他們畢竟是我的朋友，為我所累，給他們帶來了傷痛，我于心何忍！

學院黨委內部，也因為我，搞得不少人要“說清楚”與我的關係，有的還要檢討。崔連貴副書記、梁道平副主任、密加凡副主任等領導同志首當其衝，連李俊武因為與我關係較好，也必須交待揭發。

總而言之，此舉一石二鳥，以我為靶子，打擊那些被認為參與“批宮揪張”的黨委領導，同時也為了不讓這些人講公道話，搞得他們人人自危，與我劃清界限。一時間，我成了學校內陰謀集團的頭子，而這些人則是被我利用的，讓他們在黨委內講清楚與我的關係，揭發、批判我利用他們來篡黨奪權的陰謀，還說這是對他們的“關懷”。

某些人的權術運用到了極致。事後將這些被他們利用過的人一一調走，以恢復文化大革命前一手遮天的局面。這些老同志敢怒而不敢言，祇得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這些老同志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工作的時間不長，由于與水院文革及人際關係沒有瓜葛，所謂旁觀者清，對歷史情結是超脫的，對學校一些人的看法也是客觀的（他們作了調查研究），說了些讓有些人不高興的話，因而被扣上與我勾結起來奪權的罪名，要他們揭發我，也要我揭發他們，認為以此可以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但最後還是一無所獲，因為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

我連累了這些老同志，讓他們在水院不長的時間內，造成了磨滅不了的精神創傷。

在批鬥我的過程中，要求全院師生與我劃清界限，開展揭發、批判，有些群眾想不通，提出不同看法，或為我說了公道話，就會被扣上立場不穩的帽子，要檢討，甚至影響以後的提薪。汽車司機肖顯生同志，在學習時講了一句“張建成不是這樣的人”，就成為立場問題，領導上組織對肖顯生進行“教育、幫助”，實際是開小型批鬥會，還讓他交代與我的關係，最後影響到提薪。

因為講了與領導不同的話，遭批判、扣以立場有問題帽子的，在

教師中有之，在幹部中有之，在職工中也有，我向這些朋友們表示感謝與歉意。

學生因為我受株連的更多，特別是一些原“好派”的頭頭。王新民同學由于學校去函湖北遠安縣某化工廠，要求該廠對王新民進行審查，以配合對我的審查。該廠從王新民住處抄出一封我與王紹良給他的信，便以此大做文章，對他進行長期的審查與批鬥。一九八六年元月受到留黨察看兩年、撤銷技校副校長職務的處分。（王新民于一九六七年分配去後，由于各方面表現突出，入了黨，提了幹。）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他調離遠安回到原籍江蘇興化市。他受到的打擊與身心的創傷都是巨大的。

賴文德同學，在“兩清”中已受到株連，一九七六年回學校參加業務培訓，“四人幫”被抓後受到我思想的影響，在同學面前講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成為“現行”的對象，在學校辦學習班，搞逼供，讓他交待言論的來源，而且指明是從我那裏來的。逼供未果，取消他培訓的資格，送回福建，有關材料也一并送走，至使賴文德同學在單位又一次受到折磨與摧殘，身心受到極大的創傷。

被我株連而受到審查的還有黎良能（已逝世）、趙三其、陳大均等同學，在此一并向他們表示歉意。

在我受審查及遭處理期間，很多老同志對我表示關懷，我深受感動。張如屏老院長一直關注着事態的發展，他敦促張芾承抓緊處理，以便早日恢復我的工作，張芾承要



前排右起：賴文德、王新民、黎良能、李全德，後排右二何遠統、右三張建成、左一嚴菊明。一九六七年攝于水院



左起：李德俊、賴文德、李全德、王新民、王紹良，二〇〇〇年攝于廣州

他不插手此事。因此，張院長準備直接向水電部和湖北省委反映我的情況，後因突然逝世而未能實現。

王步青（原武漢軍區副參謀長）、陳扶生（原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等老同志見到

我的熟人時，都在打聽我的情況，為我的遭遇感到惋惜。

原湖北省教育廳長孔一，聽說不同意給我加薪後，認為不妥。他說，你們要提拔他的時候，把他說得完美無缺；現在又把他說得一無是處，連普調工資也沒有份，叫人不好想。

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余英，對我的問題極為關心，曾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因此遭到個別省委領導的批評。我從農場監督勞動回校後，在附近幾個魚塘打甲魚，余部長一早出來到魚塘邊散步，所以經常見面。當我聽說他因我的問題受到批評後，我請求他不要再管我的事了，我說：

“我的問題已經這樣了，我也無所謂了，涉及的問題，不光是文革的問題。你是知道的，我們黨的歷史上，藉着政治運動解決個人恩怨的多得很，而且很難解



左起：李功臣、賴文德、張建成、王新民、李全德，二〇〇〇年春攝于廣州



決。你為我受批評，如果有人想乘機整你，那就太冤了。”此後，我到東湖邊去打甲魚，儘量不與余部長見面。他離休後，我幾次想去看他，又怕給他惹麻煩，終未成行。現在他已離世，這也是我終身的遺憾。後來聽余副部長在新四軍工作時的老戰友、湖北日報的古振華老師說，他在與余英說起我時，余副部長說：“張建成是生不逢時啊！”

余英副部長是新四軍的老戰士，文革開始時任武漢市委宣傳部長，運動初期也曾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調到省委宣傳部。文革中我與他見過兩次面，都是在一九七五年，也都是為了談我的工作問題，我都拒絕了他。按理講，他應該對我不滿纔是，因為我“不識抬舉”，調我到省體委當書記兼主任我不幹，調到武漢化工學院當書記也不幹。我們之間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聯繫。

在審查我、處理我的時期內，學校的幹部審查處理工作已不屬省委宣傳部管，先由省文教辦（後來改為文教部）管，後由省紀委管，與他完全無關。他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去多管這個“閑事”呢？他對我說：“我可以不管，但于心不安。現在管運動的這些人，大多是從下面上來的，他們對歷史情況不瞭解，又不去作認真的調查研究，祇聽專案人員的彙報，這樣會傷到好人。我們對你瞭解，應該向他們介紹情況，他們說我包庇你，我包庇你幹什麼？無非感到你是個人才，有思想，有水準，有能力，群眾基礎不錯，如果搞錯了，那就可惜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讓我這麼做，我不後悔。”

多麼寬廣的胸懷，多麼強烈的責任心！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立黨為公、毫無私念的崇高品德，我深深地懷念他，并向他致敬！

## 2. 給親人帶來的傷痛

歷史上封建統治者，實行株連法，一人有罪，株連滿門，株連九族。日偽統治、國民黨統治時期，實行誅連法，建立保甲制，一人有事，不僅累及家庭，也累及鄰里，這是法西斯統治的手段。共產黨人堅決反對這種統治人民的法西斯手段，提倡一人做事一人當，誰犯罪，處理犯罪者本人，不能累及家屬。

然而在文革中及文革後對我進行審查、處理時，某些聲稱是堅定左派的共產黨員，却執行了與黨的路綫相違背的政策，株連我的家屬，使他們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和不公的對待，這種傷痛至今無法撫平。

我妻子王漱蘭，一九五五年畢業于江蘇省無錫助產學校，全班分配到東北各地，她被分配到遼寧省撫順市東部醫院任助產士，一九六〇年調到北京電力學院醫務室任護士，一九六五年隨我調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衛生科任護士。

她是一位賢妻良母型的知識女性。在家裏，她把所有的時間、全部的精力放在治家和管教孩子上，把一個經濟困難的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條，好讓我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使我從不為家務事、孩子們的吃穿操心。在我母親逝世後，有一段時間父親住在我家，為了讓我父親安心住下，她儘量照顧他的生活，有時借錢為他買煙酒。

在工作上，她全身心地投入，從不遲到早退，除本身業務工作外，打掃工作場所的清潔衛生、燒水、清洗用具、針具消毒等，什麼都幹。她業務能力強，打針不痛，是北京、武漢兩所學校的師生都知道的。她醫德好，服務態度好，也是盡人皆知的。不少師生都希望她給他們打針，領導幹部去了，甚至指定要她打針，需出診時也指名叫她去。

王漱蘭從不參與同事間的糾紛是非，別人對她講的事也從不散布。有位醫生說：校醫院祇有王漱蘭纔是真正的護士。對於這樣一位雖不能說是十全十美但却普遍受到人們贊譽的人，在我正常工作時，人人都說她好，不少人見到我就說，你的成績有一半是你夫人的。我也同意這種看法。衛生科的領導幾次在我面前誇王漱蘭。

然而在我受到審查後，有些人態度一下子有了 180 度的變化，這也不足為奇，因為人們怕受牽連。問題在于領導，不僅態度發生急劇轉變，而且處處、事事設置障礙為難她，甚至為了不讓她升職提薪，誣陷她有醫療事故。

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次提薪是普遍性的，在提名會之前，領導給與會者打了招呼：“不要提王漱蘭”。王紹魁醫生因故未聽到領導的招呼，在會上提出“王漱蘭可以提級”，并講了王漱蘭不少優點，說明夠

條件。結果王醫生受到牽連，自己也沒能提級。衛生科長賈慶智為了撫慰王醫生，到他家去做工作，說你怎麼能提王漱蘭呢，沒有政治頭腦，搞得自己也沒有提上。為此，賈科長答應把王醫生的學歷改為大學畢業，職稱改為醫生，以此來平息王醫生的不滿情緒。其實王醫生原本不是大學畢業，職稱也不是醫生，後來他堅持上業餘大學，取得了大學本科的醫學專業文憑，申請改學歷並成為正式醫生，賈科長就是不給辦，說要研究研究。這次為了緩和矛盾答應辦，一打一拉，最終的打擊目標就是王漱蘭。

有一次衛生科評先進，于文蘭提出，王漱蘭業務、醫德、表現都好，可以評為先進。衛生科某領導說王漱蘭有醫療事故，不能當先進。所謂的醫療事故其實是栽贓陷害。毛××給學生針灸，發生了醫療事故，這位科領導為了保護她的親信，不讓王漱蘭當先進，打擊王漱蘭，就把醫療事故的責任栽到王漱蘭頭上。實際上王漱蘭從不搞針灸，科領導及群眾都知道。丁和之在會上當着這位科領導和毛××本人的面，揭穿了事實真相，並直指毛××是道德問題。

在申請職稱的問題上，有關領導又一次施用權力，打擊王漱蘭。根據衛生部的有關文件，中專畢業的護士，工作一定年限後，可以考醫生，別的護士申請報考，都批准了，唯獨王漱蘭的不批，祇能考護師。在考副高職稱時，王漱蘭申請報考副主任護師。從各方面條件來衡量，王漱蘭是最符合條件的，科裏多數群眾也是這麼認為的，但領導不同意。一位從醫生提為副科長的同志對王漱蘭說，你的條件是科裏最好的，但被排擠了。

就這樣，王漱蘭的工資提不了，先進當不了，醫生當不了，副高職稱也被“擠掉了”，這些都是在某些領導一手安排和導演下完成的。

給王漱蘭的這些打擊，傷痛是可想而知的。以上祇是問題的一面，另一方面，給王漱蘭造成政治上的壓力和身體、心靈上的痛苦。衛生科要王漱蘭交待我的問題，並且就此“幫助”她，批判她。因為王漱蘭對我的工作從來是不聞不問的，無論是在北京工作期間還是在武漢工作期間都一樣。對文革中我的所作所為，她同樣一無所知。

我們之間有個約定，為避免給對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對對方的工作情況都不干預，不詢問。所以她實在講不出什麼材料，更講不出他們所要的材料，于是就“幫”她“提高認識”，批判她的立場，讓她與我劃清界綫。

同時，一向很少派人外出的醫務室，此時頻頻派王漱蘭下鄉，參加各種勞動。派她參加學生實習隊到水利工地；在嚴寒的冬天，派她到東西湖滅螺工地勞動；派她到花山插秧勞動；派她到人防勞動三個月；暑熱天派她到農場勞動三個月（暑假也被剝奪了）。

我們兩個孩子都還小，需要照應，以前都是她負責照顧的，我從未管過。我要交待問題，又要受批判，也無法管。她知道這一切，心如刀絞，但也無法，祇好苦了孩子。

這些沒有人性的傢伙，處處事事刁難王漱蘭，給她以心靈和工作上的打擊。然而在服務上、技術上還要儘量利用她，張芴承、張瑞瑾要打針，叫她去；衛生科長賈慶智得了癌症，住一九三醫院，提出要衛生科派人去特護，並且指名要王漱蘭去。既然王漱蘭立場有問題，不可靠，又為什麼要指名她去呢？他們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當自己有病的時候，就要找技術好、醫德好、服務態度好的醫務人員，于是就想到了王漱蘭。當他們看到張建成被審查、被處理了，被打倒了，就要讓他的老婆也不能有好日子過，纔能表示自己緊跟領導，表示自己是堅定的左派，纔能從中撈到好處，于是就要對王漱蘭下狠手、下毒手。

整王漱蘭，有些是領導上布置的，有些則是基層負責人自己創造的，真是一些卑鄙無耻之徒。在我與專案人員談話時，在與張芴承書記談話時，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托詞：你是省管幹部，你的問題我們都是按省委指示辦的，我們也決定不了你的問題，你的意見我們可以向省委反映。但我確信，這樣對待我的妻子，絕不會是省委的決定，更不會是中央的決定。

幾次對我的隔離審查和最後不公的處理，對我孩子造成的傷痛與影響是極其嚴重和深遠的，甚至波及到第三代，這是讓我最痛心與自責的事。



第一次隔離是在一九七〇年的十月份，樊馬義指揮長把我當成現行反革命，將我隔離起來，並申請抓捕我。當時，我被關在行政大樓原檔案室，每天早、中、晚由兩個人押着我到教工食堂用餐。

有一天我們去食堂用晚餐，我兒子與女兒在玩耍時見到我。他們看着我，眼睛睜得老大，很吃驚。我叫他們，他們一下子就跑開了。我非常難過，那時兒子纔 10 歲，女兒 7 歲，他們非常愛我，他們感到爸爸已多天沒有回家，為什麼今天在學校又不回家吃飯？而由人一前一後跟着到食堂吃飯？他們驚奇，不知所措，回去告訴媽媽，媽媽又能作何解答？後來，兄妹倆大概知道了些情況，幾乎每天那個時候，都遠遠地看着我被押到食堂用餐。這在他們小小的心靈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次是清查“五一六”，我是學校的重點對象，也波及家庭。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漱蘭被安排到嘉魚縣某水利工地勞動，我在家一面交待問題，一面照看孩子的生活。省委召開揭批胡厚民、楊道遠大會，時間 4 至 5 天，學校要我參加大會受教育，住在省委招待所，不能回家。

我對樊馬義指揮長說，兩個孩子還小（11 歲與 8 歲），要照顧，王漱蘭在工地，我走了，無人照顧。

樊說：你不去不行，晚上回來也不行。孩子問題，你自己安排好，這麼大了，要培養他們的獨立生活能力。

我要求將王漱蘭調回來，他也不同意。

上午談話，下午要報到。我無奈，要兒子照顧好妹妹，給了飯票，要他到食堂買飯吃，並帶他到食堂告訴他，哪里買主食，哪里買副食，到食堂邊上的打水處打開水。不准他燒火，同時買了一些饅頭，夠他們吃兩天的。請衛生科的某醫生幫忙照看。

等我開會回來，看到廚櫃中還有一個發霉的饅頭（那時沒有冰箱），熱水瓶中也沒有開水，給的飯票基本上沒有用掉。我問兒子這幾天怎麼過的，他說就吃了你買的饅頭，沒有買菜，每天用冷水洗臉洗腳，喝自來水。

我越聽越心酸，眼淚止不住往下流，把兩個孩子緊緊地抱在懷中痛哭一陣，發泄心中的委屈與怨恨。孩子有什麼錯，要遭這樣的罪？這樣的遭遇，會在孩子們的心靈上造成怎樣的感受？

接下來就是隔離審查我半年，父子、父女不能見面，大字報的揭發批判，廣播裏的點名批判，讓孩子感到莫名其妙。在孩子的心目中，他們的父親是一心撲在工作上、受人尊敬的好父親，不是反革命。

在學校裏，少數受他們家庭影響的小朋友，對我的孩子疏遠了，另眼相看了，個別老師對他們的態度也不如以前和諧了，在他們的心靈上感受到了父親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

第三次隔離是在文革之後的一九七七年九月到一九七八年四月，我作為“四人幫”的幫派骨幹被揭發、批鬥，聲勢浩大，大字報、廣播、電影場的幻燈片，全是批我的內容。更可恨的是高音喇叭對着我的家，天天喊着“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張建成！”“打倒野心家張建成！”“打倒反黨分子張建成！”“張建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連續幾個月，這給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什麼感受？

此時兒子已到部隊當兵去了，女兒在上初中，已經完全懂事了，她的同學們也懂事了。他們議論紛紛，女兒聽到了，與同學疏遠了，在家又安不下心來學習，心情十分煩燥。王漱蘭此時也處於高度的壓抑狀態中，她做家務，照顧女兒生活，女兒上學，回來做作業，母女倆幾乎無話可說，心靈受到煎熬與折磨。

在這樣的環境下，女兒的心態發生變化，性格也漸漸由活潑開朗變為沉默少言，與同學的聯繫、交談越來越少，祇是關在家裏埋頭“學習”，其實多數時間在發呆，想那些想不明白的問題。

學習班結束，我回到家裏，大家也默默無言，更沒有團聚的歡樂。我感到了女兒的變化，心裏十分難過。

我女兒是個活潑可愛的孩子，從小我十分鍾愛她。每天下班回家，她會跑過來要我抱，會雙手抱住我的脖子親我，我就抱她坐在身上，她就會又說又笑地告訴我一天的活動，聽到的話，所做的事，一邊說，一邊笑。此時此刻，她是幸福的，我更感幸福，所有煩惱都沒有

了。看到她現在的樣子，心裏十分難過，也自責給女兒帶來如此災難，造成如此的不幸。我感到無顏與女兒交談，更無權對她進行教育幫助，採取了回避的態度。

以後我到農場監督勞動兩年，女兒在高中上學，我一直採取鴛鴦政策，沒有認真地與女兒談過心，沒有向女兒講清楚所發生的一切的前因後果，讓女兒瞭解真相，也讓她瞭解我、理解我、諒解我，以解開女兒心中的疙瘩，解除女兒心中的疑團與苦惱，讓她正視現實。

這樣也許對我、對家人、對女兒都有好處，可我沒有這樣做，同樣沉浸在委屈與怨恨的情緒之中，不講話，整天悶悶不樂，加重了家中原有的沉悶氣氛。後來我認識到，這是我又一次犯的嚴重錯誤。

女兒於一九八一年高中畢業，進入大學法律系學習。

一九八四年我的問題省委作出處理，並發文至縣、團級單位黨委，又一次給女兒造成傷害。在大學時，她有一位好朋友，父親是武漢海軍工程學院的領導幹部，看到省委文件後，阻止他的孩子與我女兒來往，給我女兒極大的打擊。對女兒的傷害還未終結，畢業分配時，由於我的問題，學校不准她到法院工作，也不讓到律師事務所工作，在沒有徵求本人意願的情況下，將檔案送到了武漢市民政學校——一個沒有自己的校舍、學生及專業都很少的學校。當某律師事務所去學校商談要我女兒到該所工作時，學校說已經分配到民政學校了，理由是要將優秀的畢業生送到學校以便更好地培養民政人才。

這兩件事對女兒的打擊是致命的。她想要得到的東西，都是因為我的原因而不能得到。她的內心是何等的痛苦！她更沉默少言了，她與學校的朋友逐一停止了交往，也更孤寂了。

女兒是孝順的，心中有苦不說，對我仍然尊重孝順。現在我身上的衣服、腳上的鞋子，大多是女兒、女婿給買的，我們吃的東西很多是女兒、女婿寄來的。但我知道，女兒心中的苦還在，有些問題，今生今世無法解決。如工作問題，她希望做律師工作，不喜歡現在的教學工作，一旦工作中遇到問題，心中就會勾起不愉快。

她與我的關係，雖尊重、關心而不親切，中間似乎總有一層東西

隔着。我深知我給她帶來的危害太大了，這不是我想要的，但災難確實降臨到了女兒的頭上，給她帶來了終身的苦惱。

我不甘心，但又無能為力，無可奈何。

女兒，父親祇有請求你的理解與寬恕。

兒子于一九七六年底參軍，在部隊領導的關懷培養下，入黨提幹，兩度進入軍校培養，成為連隊的領導，成長很快。他因遠離學校，所以一九七七年以後發生的事，對他的影響小一些。

然而一九八四年對我的處理結果出來後，同樣對兒子的影響極為深遠，甚至影響到了第三代——我的孫子。

事情是這樣的：兒子在部隊與一位女兵（醫院護士）相戀。女孩的父親是該部隊的領導，後轉業到武漢市，她隨父也轉業到武漢，在醫院工作。她與我兒子的關係發展很順利，對方父母對我兒子也十分滿意。她也經常來我家，我們也十分滿意。一九八四年關於我的處理文件出來後，在她父母的壓力下，她與我兒子的戀愛關係也終止了。這對兒子、對我們家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兒子經過部隊的鍛煉，顯得比較坦然。後來她感到這樣做對我兒子不公平，決定與我兒子恢復關係，遭我兒子拒絕。我兒子說，既然你們家認為我父親有問題，我們不能交往，我們即使走到一起也不會有幸福。這實際上對雙方都造成了傷害。

後來通過朋友介紹，我兒子在武漢找了一位女朋友，一年後匆匆結婚。由于缺乏相互瞭解，也因對方健康原因及性格不合而離異。孫子由我們帶着長大，在成長過程中，由于缺乏父母的陪伴與關愛，致使我孫子的性格內向，不善社交，對他的發展肯定會有所影響。

用現在的語言講，我兒子是個帥哥，素質很好，思想、政策水準、工作能力都是不錯的，群眾關係也好，工作積極負責。在部隊帶領連隊立過集體三等功，個人幾次立功受獎，部隊希望他留下，但他想調到武漢，以便照顧家庭。

兒子轉業後，安排在武漢水利電力大學研究生部工作。由于工作成績突出，研究生部黨政領導建議提拔他，但黨委領導不同意，理



由是我兒子不是研究生畢業。這刺激了我兒子，他發憤攻讀在職研究生，取得了碩士學位，然而還是沒有被提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謂“研究生”的條件，是荒謬的藉口！當時研究生部的領導中也有不是研究生畢業的，而在此時被提拔的處級幹部中還有工人，院領導幹部中還有小學學歷的，這作何解釋呢？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是張建成的兒子。

在我的子女成長過程中，最需要父母關愛的時候，我正處于逆境，不僅不能給他們以父親的愛護與關懷，反而給他們帶來了不該有的傷痛，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打上了傷痛的烙印。在他們就業的時候，我不僅不能給他們以父親應給予的幫助，反而成了他們就業與升遷的障礙。

這一切不是我製造出來的，那些製造這一切不幸的人應該受到譴責與詛咒。但這一切不幸畢竟因我而起，我愧對我的妻子，愧對我的孩子們。

再次向他們說一聲：對不起，請原諒我。

### 3. 永遠的傷痛

一個立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青年共產黨人，在他的事業如旭日東昇的時候，響應領袖的號召，按照黨中央的決定，投身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在運動過程中，他和革命小將一起，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了殊死的鬥爭。

由于年輕，沒有經歷過如此複雜的鬥爭，不夠成熟，在鬥爭過程中，也犯有一些錯誤。但他決沒有害過人、犯過罪。

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他體驗到了鬥爭的嚴重性和殘酷性，他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提高，懂得了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主要危險來自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產階級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繼續革命。

這正是毛主席所期望的，通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讓青年人受到這方面的教育。至于在此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引以為戒，對今後的革命鬥爭會有好處。所以毛主席諄諄教導老同

志：“不要看不起兒童團，我們年輕時也犯過錯，有錯改了就好了。”毛主席是從培養青年的角度看待青年人所犯的錯誤，總是循循善誘，以教育為主。毛主席對老同志犯錯誤的態度也是這樣，即使犯了走資派錯誤，讓群眾沖一下，認識了，改正了，就可以了。

文革中，毛主席沒有處理過一個犯走資派錯誤的老幹部，即使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面人物鄧小平，不是也讓他復出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了嗎？但他要翻文革的案，搞復辟，毛主席纔忍痛撤了他的職，但仍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對劉少奇，毛主席說過，不僅仍留在黨內，還要進中央委員會。後來專案組查出他有歷史問題，是“叛徒”、“內奸”、“工賊”，所以纔決定開除出黨（劉的歷史問題，後來又說是有意陷害，平反了）。毛主席的胸懷，毛主席的政策，是真正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的胸懷與政策。

文化大革命失敗後，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上臺，背叛毛澤東思想，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清算與鎮壓。一部分人被判刑、監禁，一部分同志被開除了黨籍，開除了公職，很多共產黨人受到黨的紀律處分。在文革期間工作的、提拔的所有幹部，從中央到地方，幾乎一律罷官。與我在同一個省委文件中被任命的省衛生廳副廳長覃祥官，他沒有參加過造反，他是“赤腳醫生之父”，在第三世界的醫務界影響很大，在聯合國召開的第三世界醫學大會上作過報告，這樣的幹部，在文革後也被罷了官，送回長陽山區。抓“四人幫”的功臣、被捧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及他的得力助手汪東興等人，在被利用完了後，也被趕下了台。這絕非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人的胸懷！更為悲哀的是，在清算了文革後（文革的目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更加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公然背叛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下，恢復私有制，造就新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讓工人、農民重新回到受剝削、受壓迫的境地，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違背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使毛主席及革命先輩們為之奮鬥終生、多少革命志士為之獻身的偉大事業毀于一旦。

令人心痛，心寒，是我永遠的傷痛。但我也看到，我及我家人的傷痛，比起那些被判刑、被開除公職，甚至被整死的人及他們的親屬來，他們更悲慘，他們的傷痛比我更甚。

在此，我要講一個既淒慘又感人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裏，我的一位學生楊苑玲來到我家，向我哭訴了她一直想做而沒有完成的夙願。因為我是她的老師，把她從北京帶到武漢，相互間熟悉，畢業後她在江蘇蘇州一所中專教書。

這件事糾結了她二十多年，她有時為此睡不好覺，吃不下飯。她愛人發現她有心事，要她講出來，大家一起面對。開始她不敢講，怕傷害她丈夫及孩子，後來終於向丈夫、孩子講出了她的心事，她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同情她，支持她，要她勇敢地去她想做的心事，即使達不到預期目的，祇要做了，盡心了，心就安了。

于是她來到武漢，請求我的幫助。她的心事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中，她與武漢大學“三濤”（武大學生林濤、張濤、余松濤，均為二司政參部情報組成員）之一的林濤相識，進而相愛，愛得很深。抓“五一六”時，林濤被打成“五一六”的骨幹，送往湖北沙洋農場關押，要他交待“五一六”的材料及上下聯繫人員的名單。不久，他死在沙洋農場，既沒有向其家屬交待是怎麼死的，也沒有讓其家屬見到屍體，就埋掉了，埋在哪里也不告訴家屬。作為林濤的戀人，楊苑玲得到林的死訊後，悲痛欲絕，當即與林濤家屬聯繫，想瞭解林是怎麼死的，葬在何處，得到的回答是一無所知。

她哭着對我說：“張老師，一對熱戀的情人，突然被拆散了，沒有告別，沒有說一句話就離開了，我不知道他在何處，生不能見，死了去看看他也不行。林濤死不瞑目，我也不甘心。二十多年來，我日思夜想，總該為林濤做些什麼，想把他的屍骨找到，給他立個碑，逢年過節去看看他，這樣我纔能心安，讓林濤瞑目。這件事，我怎麼對我的丈夫講呢？簡直讓我要瘋了，年紀越大，這種感覺就越強烈，丈夫怕我得病，非要我講出心事不可，我實在受不了了，就把心事吐了出來。

丈夫通情達理，認為我是有情有義的女人，支持我到湖北來完成心願，孩子也支持，所以我來了，請您幫助我。”

文革中，我知道楊苑玲與林濤相愛，我也知道林已被迫害致死。但楊的敘述，還是使我十分震撼。我感動了，答應幫忙。我找到我的一位朋友，他的戰友是省信訪辦的負責人，請這位信訪辦的負責人給沙洋農場領導寫了一封信，請他們幫助楊苑玲尋找林濤的屍骨。

楊苑玲到沙洋農場後，得到了場領導的接待，安排了住宿，派專人、派車陪她調查。她在沙洋農場調查瞭解了一個星期，沒有任何結果。

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一是押送林濤去沙洋的不是沙洋農場的本地人，而是武漢去的部隊人員，當地人祇知道從武漢押了個重要犯人來，但不知道姓什麼叫什麼，更不知道他犯了什麼罪。後來知道此人死了，由部隊的人埋的，也知道大概的位置，但不清楚確切的地方。武漢來的軍人是哪個部隊的，姓什麼叫什麼都不知道。二是這些年沙洋農場經過改造，平整土地，面貌已大為改觀，無法確定原來的地方，挖了幾個地方，一無所獲。

楊苑玲帶着失望的情緒回到我家，我勸慰她：“你盡心盡力了，林濤地下有知，有你這樣一位紅顏知己，應該滿足了，瞑目了。如果你定要為林濤立個碑，可以做個衣冠冢，這在我國歷史上是常有的事。”她說，也祇能這樣了。

林濤的受迫害之死，死得不明不白，死後葬身何處誰也不知道，令楊苑玲及林濤的親友們痛徹心肺，成為永遠的傷痛。

在湖北，在全國，林濤們知有多少？給多少人、多少個家庭帶來了不可治愈的永遠的傷痛？這筆賬將永遠記在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的頭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偉大的創舉，它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偉大實踐，它使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聞風喪膽，它使億萬革命群眾受到了洗禮，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鍛煉，這是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

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失敗了，走資派對文革進行了清算，



對革命群眾進行了清算與鎮壓，進而背叛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恢復了私有制，讓工人、農民重新回到了受剝削、受壓迫的境地。這更進一步教育了人民，使人民進一步認清了走資派的本質及他們的兇殘本相，也就進一步提高了人民群眾對文化大革命偉大歷史意義的認識，這同樣是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

“在這裏并非終結，而祇是獲得組織上的開端的革命，不會是一個短暫的革命。現在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帶領着通過沙漠的猶太人。他們不僅僅要奪取一個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臺，以便讓位給那些善于對付新世界的人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468頁）馬克思的論述，可以幫助我們這一代人去深刻認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深刻認識我們這一代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鬥爭中的歷史地位。

讓我引用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開卷語，來結束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回憶。

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難的日子。

這是才華橫溢的年代，也是愚昧無知的年代。

這是信仰堅定的時期，也是懷疑一切的時期。

這是燦爛輝煌的季節，也是暗淡無光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擁有選擇一切的機會，我們其實一無所有。

我們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們正墜入萬劫不復的地獄。

## 游泳篇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潮流，在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幹部、技術人員、技術工人紛紛走向社會，或自己創業，或到經濟發達地區工作。與本單位的關係，大多不脫離，有的辦“留職停薪”；有的辦理借用手續，由借用單位支付一定費用給本單位，本單位則照常給被借用人員發工資，福利待遇也不變，借用期滿回到原單位；也有一些人乾脆辭職。這股潮流，當時叫“下海”。既然“下海”，就得學會游泳，否則會被淹死。學會了游泳的，是成功人士。失敗的，有的上岸，回原單位；有的則被淹得奄奄一息，元氣大傷，一輩子翻不了身；也有少數被淹死的，再也見不到他的蹤影。“下海”是十分形象的比喻。

我從一九八五年起也從學校走向社會，下海了！

我在大海中游了二十年，游得頭髮花白，游得筋疲力盡，有成功有失敗，學到了很多知識，結交了“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閱歷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精神上非常充實，物質上仍然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這段經歷同樣值得回憶與珍惜。

### 一、受聘武漢市青菱鄉工業公司

一九八四年七月，對我的處理下達，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水電部及華北電力學院領導的預料，原先的計劃及努力化為泡影，我本來抱有調回華北電力學院的希望，此時也徹底破滅了。

在經過一段痛苦的思想鬥爭後，我終於清醒過來，要面對現實。俗話說，過去再好，走不回去；前途再難，也要面對。我清醒地認識到，過去的路已到盡頭，一切從頭開始。天生我材必有用，此地不留人，總有留人處。我決定走自己的路，來證明自己對人民、對革命還是有用的，這樣又鼓起了繼續前進的勇氣。

但究竟下一步該如何走？我心中無數，因為我是一個從未出過學校門的幹部，對社會上的情況瞭解不多。到哪里去，該幹些什麼，如何干等問題，都沒有答案。

離開學校是肯定的，如何離開？是辭職，還是停薪留職？

正當我猶豫不定的時候，武漢市洪山區青菱鄉經委主任趙愛國找到我，動員我到青菱鄉工作，具體單位是青菱鄉工業公司，職務是顧問。辦法是借調，青菱鄉工業公司與學校簽合同，借調兩年，由公司每年付給學校一筆錢，我在學校的待遇不變，另外，青菱鄉工業公司每月給我補貼 80 元。我的任務是協助青菱鄉工業公司引進、篩選、確定建設項目。

這項工作，對我來講再合適不過了，而且不用辭職又可得雙份工資。我考慮後，第三天就答應了。

青菱鄉的領導怎麼知道我的，還瞭解我當時的處境，我就不得而知了。趙愛國主任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幹部，工作積極、認真，很好相處，後提升為副鄉長、洪山區信用社主任。我離開青菱後一直與他有聯繫，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

一九八五年的農村，對搞鄉鎮企業熱情很高，政治運動已結束，各級領導把精力放到了發展經濟上。各鄉都成立了工業公司，發展工業生產，增強集體經濟。為此，廣攬人才，引進項目，是各鄉領導的重要任務之一。我到青菱去的背景就是這樣。

到青菱後，按照我工作的老習慣，先作一番調查研究，瞭解青菱鄉的地域、環境、經濟、人文等情況，以便確定引進哪些項目比較合適。同時，我還給我在上海的朋友寫信，瞭解上海鄉鎮企業的發展情況及發展趨勢。我有同學在上海郊區擔任鄉黨委書記，他對情況很熟悉，對我進入角色很有幫助。

青菱工業公司的領導與同事對我很關心，也很尊重。他們知道我的情況，所以從不向我提起我過去的工作及文革方面的問題，給我創造了一個相對寬鬆的工作環境，我也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 (一) 引進活動房營造項目

一九八五年春，我到上海進行項目考察。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民經濟發展迅速，到處需要增加住房、倉庫，各工地需要臨時辦公用房，這樣，活動房建設需要量比較大。上海市寶山區羅南鎮人民公社的活動房營造公司發展很快，經濟效益也好，成立兩年後即在深圳開了分公司，業務量很大，而且成為寶山區在深圳的窗口，對寶山區、對羅南鎮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羅南鎮黨委書記常佩榮（後任寶山區工業局長、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我中學同學。在我考察中，他介紹情況、提供資料等，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經過調研，我覺得此項目比較適合青菱的情況，可以引進。因為此項目投資不大，技術難度不高，產品是混凝土預製件，到現場組裝，關鍵是根據場地情況進行房屋的結構設計。

回來後，我向青菱鄉的有關領導彙報了考察情況，建議引進活動房項目，並得到領導們的首肯。

第一個引進項目就此確定下來。接下來就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

為了節省引進成本，保證產品質量，我們從上海請了兩位工程師來武漢指導生產與負責活動房的設計工作。他們是上海航天局下屬一個單位的科技人員，一位叫王國元，是我的親戚，也是中學同學；另一位叫王順興。依照我到青菱的辦法，青菱與該單位簽了合同，借調1年，青菱付借調費，同時給兩位工程師發補貼。

活動房項目於一九八五年六月開始承接業務，當年底產值就達100多萬元（當時普通人的月工資僅幾十元）。出乎人們的預料，領導對這一成績十分滿意。

第一個項目引進成功，青菱人對我更是刮目相看，待為上賓。星期天會安排我到養殖場釣魚或打甲魚，工業公司派人陪同，有車接送，中午魚場還要負責招待，弄得我不好意思。



因為工作有成效，受到領導和所有人的稱贊與尊重，對我鼓舞很大，增加了我下海學游泳的信心與決心。

在評估這個項目時，到會領導一致看好，所以該項目由工業公司直接承辦，定性為鄉辦企業。

這一定性的有利方面是，領導重視，資金充足，管理幹部相對村辦企業的幹部能力要強一些，這些有利因素促使項目上得快，見效快。

但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因為幹部的任免由鄉黨委領導說了算，所以往往變動大，考慮人際關係多，特別是對某些發展勢頭好、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更是如此。

村辦企業的幹部頭腦中考慮的是把企業搞好，為村裏人辦點實事，同時對自己的經濟利益也有好處。而鄉辦企業的領導則不同，除經濟利益考慮外，還有個人仕途問題。村辦企業的幹部一旦到了鄉辦企業，就有可能到工業公司，進而到鄉里工作，到了鄉里就是吃“皇糧”了，成為公務員，可以旱澇保收。

我在青菱，接觸到一些鄉鎮幹部、企業領導人，這種意識非常強烈，不僅為自己考慮，還要為自己的親戚朋友考慮。農村幹部的吃喝風如此厲害，幹部競爭如此激烈，均與此有關。

青菱活動房屋營造公司開業半年，營業額就有 100 多萬元，在當時的確是少有的。突出的經濟效益，導致很多人想鑽進這個企業，爭當這個企業的領導。有些領導人也在考慮，怎麼把自己需要照顧的人安排進去。因而在企業負責人的任用上，德、才方面考慮少了，在利益方面考慮多了。

一九八六年春節過後，就宣布領導班子調整，原廠長調離，安排了一個當地人都知道有後臺的人當了廠長。我知道後，問工業公司甘開華經理，為什麼要這麼安排？他說是上面安排的，他也沒有辦法。

新任廠長上任後，工作沒有怎麼抓，而人事調動頻繁。會計換了，原來制定的財務制度不管用了，吃吃喝喝多了，不相干的人廠裏“招待”得多了。可想而知，前任廠長帶領大家創業的精神、幹勁沒有了，工作上懶散了，業務量也少了，流動資金逐漸被用掉了。

兩位工程師找我(因有其他項目上馬,我很少去),說這樣非垮不可。他們給廠長提意見,廠長不高興,估計會辭退他們。到一九八六年六月,這個廠長提出,上海的工程師可以不要了,廠裏自己就可以把工作挑起來,可以節省費用。就這樣,他把兩位工程師辭了。

接着就是產品質量出了問題,企業的信譽度下降了,更影響了業務的發展。到一九八七年底,這個企業便壽終正寢了。

此時,我已離開青菱快一年了,聽到此消息不感意外,祇覺得惋惜。

## (二) 引進電鍍加工項目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在活動房項目投產以後,我又從上海引進了一個電鍍廠的項目。

青菱鄉工業公司將該項目安排到紅霞村,該村在青菱鄉的最南端,當時屬武漢市的遠郊區。

電鍍項目屬於有污染的項目,上海正逐步將此項目向郊區轉移,業務情況較好。據此,我認為武漢市也必將會將電鍍項目向郊區轉移,我們可以先走一步。

工業公司領導認同這一分析,讓我們到上海找合作單位。我到上海考察了幾個電鍍廠,其規模情況都差不多,都願意到武漢合作開工廠,上海方出技術,武漢方出資金,利潤分成。

有一個電鍍廠的技術副廠長找到我,希望我同意他到武漢市幫助開工廠,全部技術他都能拿下來,從建設到投產三個月時間。其條件是,他的愛人(電鍍廠工人)一同去,同時不滿3歲的孩子也帶去,武漢方面安排適當的住宿條件,給一筆安家費,在漢工作期間每月發工資(工資比廠裏稍高一些)。我答應向領導彙報。

我當時認為,這有利于紅霞村獨資建廠,利潤全部歸村,技術人員的工資總是要付的,與電鍍廠合作,還要付管理人員的工資,所以我的意見是同意請這位技術副廠長到武漢幫助建廠并作技術指導,滿足他提出的條件。領導上同意了 my 意見。

紅霞村電鍍廠經過3個月的廠房改造、生產綫建設,于一九八五

年底正式投產。一九八六年不僅收回成本，且有盈餘，在當時的鄉鎮企業中是一個成功的項目。

一九八七年的收益更好，村裏有錢了，底氣也足了。在鄉里開會時，紅霞村的領導被高看一眼；在各村領導之間，他們也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高人一等，把電鍍廠的成功視為自己領導有方，功勞歸于自己。對建設、經營電鍍廠的上海來的技術人員，開始時還比較尊重、關心。

經過兩年的經營，紅霞村的領導覺得開工廠成功了，技術掌握了，對上海技術人員就不那麼關心、尊重了，甚至感到是包袱。這樣就引起了技術人員的不滿，一九八七年底，此人被另一家電鍍廠挖走。

紅霞廠的產品質量屢屢出現問題，業務量萎縮，經濟效益下降，最後也逃脫不了垮臺的命運。

青菱工業公司的領導曾經找過我，要我設法將技術人員請回來，我認為根本不可能，因為該技術人員傷透了心，是負氣而走的。他全力以赴，幫助紅霞村建立了這個電鍍廠，在經濟效益很好的情況下，不僅沒有感謝他，反而排斥他，他認為好心沒有得到好報。

按我的判斷，此人是請不回來的；即使願意回來，條件也會開得很高，村裏不會接受，所以我請他們另請高明。

### (三) 引進塑料製品項目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有人向我介紹有關塑料製品的項目。

負責該項目的是武漢新漢塑料廠的業務人員陳振武老先生，時年 60 多歲，他手下有一幫人，有搞機械及模具設計的，有搞工藝的，有搞原材料的，有搞設備及產品銷售業務的。

陳老向我介紹說，祇要有地方投資，從工廠設計、設備訂購、安裝調試、產品選擇、模具製作到生產原材料供應、生產管理、產品銷售，他們可以提供一條龍服務。

我當時認為這對鄉、村二級辦企業來講，確是個有利條件。他們還介紹了幾種產品，如革光器（擦皮革使之光亮的製品）、冰棒盒、龍

鳳杯(塑料酒杯)、雲香爐(宮廷中點香的器具)、音樂酒壺等。

工業公司領導聽介紹後認為可行，安排到青菱鄉光霞村建廠，為村辦企業，由村裏出資，陳振武等人負責建廠。

他們從溫州購買了5台注塑機(從25克到200克不等)，到貨後一看是舊的，引起光霞村領導的不滿。陳師傅強調舊注塑機便宜，說一樣可以用。接着模具設計、加工拖了很長時間，試車過程中，發現設備也有問題。把溫州人叫來修理，試生產過程中模具又不合適，要修改，總之從設備到試生產，每個環節都出現了問題，進度大大落後于合同規定的時間。

村黨支部據此作出決定，停止開工廠，並要陳老先生按合同規定賠償損失。我和經委趙愛國主任從中調解，一方面要求陳老找出問題，儘快解決，另一方面做村領導工作，建議再給一次機會。但張海濤書記(村支書)堅決不同意，最後趙主任決定，塑料廠搬到老橋村辦(趙的老家)，設備費由老橋村出，實際上，光霞村還是損失了不少。

塑料製品項目在光霞村的失敗，主要責任在陳老等人，他們話講得很滿，實際並非如此，使投資者失掉了信心。我也有責任，對陳老並不瞭解，盲目相信他們說的話。後來我瞭解到，搞模具設計的劉工，是武漢重型機床廠技工學校畢業的技術工人，時年40多歲，搞機械維修可以，搞模具設計缺乏理論基礎，稍複雜一些的模具設計有困難；搞工藝的熊工，是技術工人，曾在塑料廠工藝科工作過一段時間；陳振武老先生一直在塑料廠搞業務，所以各方面聯繫較廣，他下面的這幾個人購買設備和原材料、銷售產品都要得回扣。這樣一個班子，要把廠搞好，是有困難的。

我為自己不深入調查研究，輕信介紹，盲目上馬，給村裏造成了經濟損失而感到內疚。趙主任他們雖沒有直接批評我，但要我參加到小組中去，一定要把塑料廠搞好。我清楚，在老橋村再搞不好，不僅信譽盡失，而且會給趙主任帶來麻煩。

一九八六年，我們的工作重心放到了老橋村，塑料廠成了我甩不掉的包袱。



我全力以赴，協助小組工作，幫助解決困難，協調小組與村領導之間的關係，也要協調小組內部的工作，因為工作不順利，小組內部互相埋怨，扯皮的事經常發生。

我還要到處聯繫業務，打開產品的銷路，遠到廣州、北京，近去武漢各大商場。經過努力，革光器上市了，冰棒盒上市了，酒廠裝瓶輸送帶下邊的托條上市了。

後又增添了鍍膜機（當時是一種高新技術產品），可以用來鍍金、鍍銀。接着雲香爐做出來了，適應市場需求也做過塑料麻將牌，可以說產品不少，一時也很熱鬧。產品銷售雖沒有預期的那麼好，但定期有資金回籠。

各商場每個月結一次賬，所以每月都有資金回廠。廠裏有錢了，村裏開銷就方便了，當天回來的錢，第二天就劃走了，交電費、買肥料等，資金鏈經常斷裂。我又得為資金奔波，有時由陳老和我墊付，直到現在，我們兩人還有 5700 元的墊付款未收回（根本收不回來），那時的 5700 元相當于現在的十幾萬元。

到後來，我成了老橋塑料廠實際上的負責人，什麼事都找我，什麼困難都得由我來解決，我被搞得筋疲力盡。

在老橋工作一段時間以後，我深知依靠塑料廠讓老橋致富是不可能的。維持還可以，發財不可能，這是我的結論，但不能公開說。

為了給趙愛國主任掙面子，我想利用老橋村的自然資源使老橋富起來。老橋有一塊叫林場的地方，有果園、有魚池，山坡上修了一幢小樓，山坡前面是湖，小樓前開挖了一個池塘。這地方原先是為市領導建造的休息地，有些領導人夏天來此休息。

我認為這是一塊值得開發的寶地，可以建度假村，可以建旅遊景點，也可以搞農、林、牧、副、漁全面開發。如果有資本投入，一定是可以獲利的，這對老橋村、青菱鄉都會有好處。

我經人介紹認識了“武漢特約書刊批發部”的姚經理，向他介紹了老橋村林場的情況及我的看法，他聽後極感興趣，表示願意考慮投資。

姚經理是武漢地區下海較早、經濟效益顯著的成功者。從編寫

出版會計資料開始，到創辦“特約書刊批發部”，業務量很大，經濟效益很好，當時傳說他已是千萬富翁，所謂財大氣粗。

第二天去考察，他看後決定投資。是收購還是合資？是搞度假村，還是開發農、林、牧、副、漁？姚經理叫我提出意見，並作出相應的規劃，提出投資額度。

我向趙愛國主任作彙報後，又與他一起到老橋村，與支書、村長研究方案，最後提出了一個租賃的方案：由特約書刊批發部向老橋村租賃這塊地，每年向老橋村交租賃費及少量的利潤分成（當時提出10%—20%），老橋村可以旱澇保收，虧本時可以保租賃費，盈利時可以多得。

我感到在利益面前，鄉、村幹部的頭腦是清醒的，而且胃口不小。他們希望搞成一個集旅游，度假，農、林、牧、副、漁開發並舉的項目，以此來帶動老橋的經濟發展。老橋人可以到林場工作，旅游、度假人多了以後，可以帶動老橋的商業，讓農民富起來。

這些想法，我也同意。為此，我奔走于湖北省農業科學院、中科院武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各大賓館間，瞭解、請教有關養魚方面的知識、果園方面的知識、養什麼魚、栽什麼果樹，瞭解賓館設施，提出改造計劃及投資額度，最後寫出一個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交給姚總。他看後很滿意。

他要我起草合同，希望儘快簽約實施。為方便我的工作，也為表明他的誠意，他決定為老橋村買一輛小車。我看出他有誠意，而且急于實施，當時我并不知道他正被有關部門調查，急于要將資金轉移。等到合同條款雙方同意、準備簽約的時候，他的公司被查封，人也找不到了。後來聽說他被抓了，財產被沒收，以後不知去向，我再也沒有見過姚經理。

我感到遺憾，一則我與姚經理本可以成為很好的朋友，共同做些事情；二來老橋的項目如能實施，將給老橋人民帶來很大的好處，老橋將成為武漢旅游事業的一個亮點，我也有可能改變此後的人生軌迹。

老橋塑料廠在不死不活的狀態下經營着。到一九八六年底，我

的租借合同期滿，趙主任希望我續約，我已疲憊不堪，決定回校。我一走，陳振武小組也全部撤離，塑料廠由村裏接管。

在青菱鄉服務了兩年，搞了3個項目，前兩個是成功的，因為我對項目的市場情況比較瞭解，對實施項目的人瞭解，他們確有這方面的才能。至於後來不景氣以致倒閉，那是地方上的事，與項目本身無關。

塑料廠是個失敗的項目，原因很多，有資金問題，但主要是實施項目的人對項目本身并不十分精通，特別是小型塑料製品門類很多，產品選對了，就能把工廠盤活，產品選不對，則勞民傷財，工廠不能發展。我們一直沒有選對產品，雖然做了很多產品，但銷售量不大，成本都無法收回，更談不上盈利，害人害己，這是我下海後的一大教訓。

在青菱服務的兩年裏，我整天在農村與鄉村幹部、農民打交道，讓我看到了在學校看不到的東西，理解了、看懂了一些問題，學到了書本上沒有的知識，對社會有了初步的瞭解。

例如農村幹部（指村支部書記以上的公務員或准公務員），他們既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做着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工作，同時又是老百姓的太上皇，他們有“權”也有“威”，他們的話就是“聖旨”，他們的下屬與老百姓都得照辦，否則就會影響到幹部的升遷、老百姓的生活。

幹部們把工作與升遷聯繫在一起，因此把上級奉若神明，努力搞好與擺平各級關係，儘量掩飾本單位存在的問題，最腦火的是下屬或群眾越級上告（給領導上造成不好的印象，影響自己的升遷）。請客送禮（那時祇送煙酒、雞鴨魚肉之類的東西）、吃吃喝喝的風氣在農村中非常盛行，我也經常被叫去陪吃（我不喝酒，所以不陪喝）。

鄉村幹部工作辛苦，要管一個村、一個鄉的所有工作，所謂上邊千條綫，底下一根針。上面有這麼多部門，他們的工作都要落實到鄉、村一級。有黨務系統、工業系統、農業系統、公安治保系統、環境衛生系統、財政金融系統、教育系統、計生系統、民兵兵役系統等等。一個鄉就是一個社會，百姓的吃喝拉撒都要安排。

我當時想，一個稱職的大學校長未必能當好一個稱職的鄉黨委書記。這使我懂得了為什麼毛主席、黨中央一直教育幹部到基層去

鍛煉，並從基層幹部中選拔幹部的道理。

又如農民問題。農民是勤勞的、現實的。我本人來自農村，在農村生活 18 年，以為對農民是瞭解的，其實不然。我祇看到了為生存而奔波的農民（如我們村上的鄉親及我的父母），看到了組織起來的農民為農業集體化、為建設新農村努力奮鬥的一面，對於“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的含義領會不深，也沒有體驗。

我在青菱鄉的兩年工作實踐中，正好是開始土地承包的年代。青菱鄉是城鄉結合部，老年人種地養家，青年人游蕩、玩耍的多，村裏處處麻將聲。他們沒有錢花了，就騎自行車到漁場買魚，然後到城裏市場上出售，一次可以賺 20 元至 30 元，夠花一個星期，下周再去。如此來維持生計，這樣的人不在少數。

當然他們是通過自身的勞動賺錢，無可非議，但明顯表現出了缺乏生活目標，因而不去努力奮鬥，隨波逐流。

有一個人申請“萬元戶”稱號，當時當個“萬元戶”是很光榮的。村裏向鄉政府反映此人好逸惡勞、不務正業，後來一查，他的錢是打麻將得來的，結果不僅沒有批准他為“萬元戶”，還沒收了他的錢，因為這些錢是賭資，賭博是禁止的。

青菱鄉藕塘很多，但冬天挖藕的人都不是青菱人，而是比青菱人富裕的江浙人。我問當地人，為什麼不自己挖藕而要讓江浙人賺這筆錢？回答是：挖一斤藕有幾個錢？這麼冷的天誰幹？我問挖藕的人為什麼跑這麼遠來幹這種苦差事，他們說：冬天農閑，閑也是閑着，出來總可以掙點錢。

我們塑料廠的工人，經常為了走親戚不來上班，也不請假。你問他到那兒去了，他們說吃喜酒去了，有的說吃滿月酒去了，等等，反正這些都比工作重要。

凡此種種，反映了個體農民需要加強教育的一面。要想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需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加強教育，指明前進的方向，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奔向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如果一盤散沙，我行我素，所謂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祇是一句空話。



在青菱工作期間，再一個感受是市場經濟中（即使當時還是初步的市場經濟），經濟利益驅動的力量巨大，“有錢能使鬼推磨”。回扣、送禮在業務工作中是不可少的，否則就辦不成事。在談項目、銷售產品時，事情還沒有辦成，先問清有什麼好處。我也感受到企業是社會生存、發展的造血細胞，然而又是受盤剝最嚴重的地方，因而生存和發展也是最艱難的。

解放前我就聽說搞工業不如搞商業，搞商業不如搞金融。革命勝利後的毛澤東時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也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而今市場經濟、私營經濟又回來了，這個問題也就又出現了。

#### （四）辦書刊門市部

我在青菱工作期間，與郵局的一位朋友一起辦了個書刊門市部，但搞書刊發行時間不長。我們負責發行了武俠小說《碧血劍》，以後又發行了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惹了麻煩。因為這本書祇准新華書店賣，不准我們賣。我想不通，既然你可以賣，為什麼我們不能賣？我們為此與武昌區文化局杠上了，一氣之下就關門不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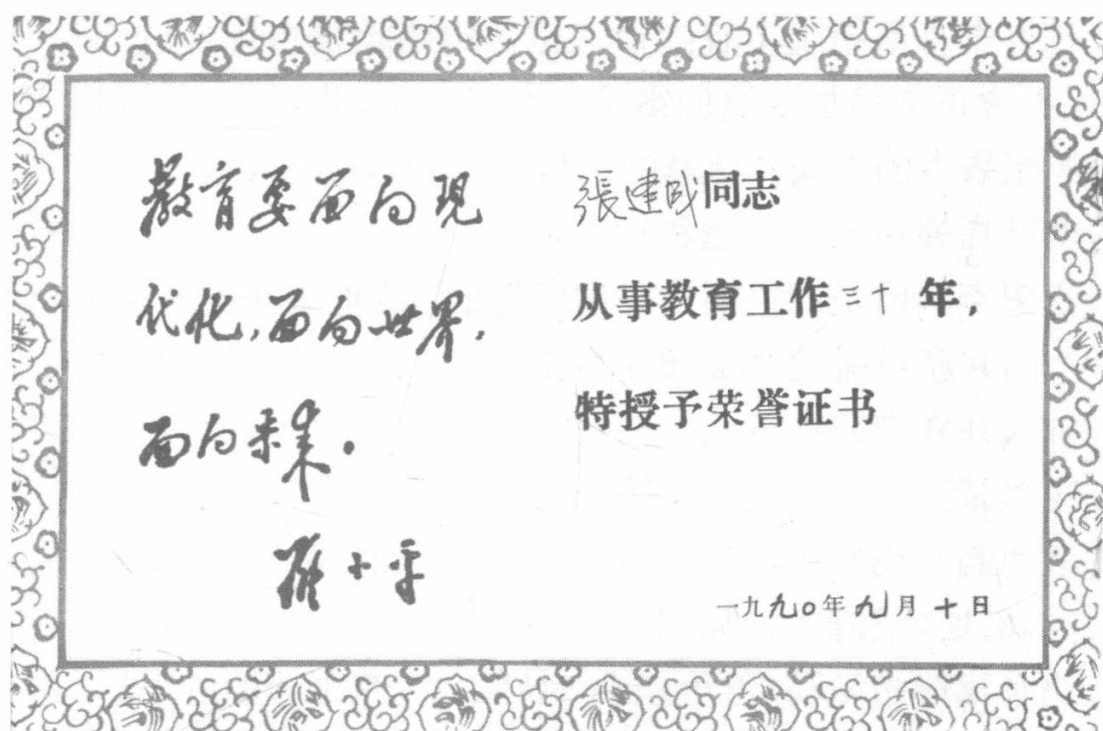
後來想想何必呢？在那個年代，你有什麼道理可講？道理在權力方，他們說行就行，他們說不行就不行。這說明我的思想不適應時代的潮流，即使自己不退出這個舞臺，也會被趕出來的。

## 二、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 （一）提前退休

結束在青菱的工作，下一步怎麼走又成了問題，回學校已沒有什麼意義。與其混到退休年齡，不如提前離開工作崗位，如能提前退休，既可獲得自由，又可以有老年的生活保障。

一九八七年我的工齡已超過 30 年，但年齡祇有 52 歲，還不到退休年齡。我寫了報告申請病退，時任人事處長的吳宏家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這麼早就退休，說病退是有條件的，不是想退就可以退的。



再說你的情況比較特殊，我作不了主，要請示領導。我說有心臟病、高血壓（當時還沒有檢查出糖尿病），工作有困難。吳處長說，你的情況我們瞭解，你在青菱幹得不錯（意思是身體狀況還可工作）。聽得出來，吳處長勸我不要那麼早退，是關心我。

後來我瞭解到時任黨委委員、行政副院長的李喜爾是我辦理病退手續的最大障礙，他希望我繼續工作。1987年春節期間，我到李喜爾副院長家拜訪他，向他彙報了兩年來在青菱鄉的工作情況，說現在合同期滿，節後回學校，申請病退，希望他支持。

我對他直說，對我作這麼不公正的處理，已經使我無處可去，而學校已經沒有了我的立錐之地，所以我祇有離開，對大家都好。

李喜爾副院長勸我不要退休，說現在的後勤部門都是一些新幹部，希望我留下來幫他帶一帶，對我個人來講，以後提工資、參加工資改革都不會有問題了，現在退休，工資太低了。他說我還是有前途的，對我的人品、工作能力、群眾關係大家都是肯定的，建議我重新申請入黨，他會幫助我。

聽起來他是真誠地挽留我，而且要讓我“起死回生”，但我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去意已決。

我對李喜爾副院長說：“這個黨決定開除我的時候，已經拋棄了我，我不會再申請加入這個黨了。在我心中，我仍然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我仍然會一如既往，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

我想李喜爾是聽得明白我的意思的。我把現在的共產黨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區別開來，你們開除了我的黨籍，但我仍然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我繼續對李喜爾副院長說：“你要我帶一帶新幹部，我以什麼身份去帶他們？搞好了，是領導的功勞，搞不好我負責，說我堅持錯誤立場，搞破壞，我纔不幹呢。”

他看我情緒激動，態度堅決，似乎已沒有再談的餘地了，最後要我再考慮考慮他的建議。

此後，人事處通知我，到湖北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現改為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保健科檢查身體，檢查結果，保健科蓋上了“高、管、心”的大印，經院衛生科驗證簽字，完成了病退的準備工作。

經領導批准，人事處吳宏家處長正式通知我“同意病退”，從1987年7月1日起正式退休，此前可以不再上班。我的退休工資為82元8角8分，寫在發給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幹部退休證上。

## （二）組建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在青菱工作期間，思想上逐漸形成了“農村需要科學技術”的認識。我覺得農村要富起來，農業要發展，鄉鎮企業要建立與發展，都離不開科學技術，科技人員下鄉大有可為。

因此，我想在服務期滿後建立一個民辦科研機構，以此為平臺，為農村提供科技服務，發展農村的工業、農業經濟，為科技人員提供服務，讓科技人員到廣闊天地中去施展才能，讓科技項目在農村轉化為生產力。

這些想法，和一些朋友談過，大家都贊同，並力促我主辦這樣一個民辦的科研機構。

### 1. 研究所為什麼落戶黃岡

兩個原因，一是環境因素，二是人員因素。

黃岡是革命老區，大革命時期的黃麻起義，就發生在黃岡地區的紅安縣和麻城縣。我們到麻城拉練時，得知該縣一個乘馬區，現役將軍就有一百多人。李先念主席的老家就在紅安，中央和湖北省的不少領導人都是黃岡地區的人，在大別山地區從事過革命工作的領導人更多。張體學就是在黃岡領導打游擊的，他逝世後，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黃岡烈士陵園中。

既然要科技扶貧，就應該到老區去，那裏的人民在中國的革命事業中作出了重大的犧牲，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一直非常崇敬老區人民，也願意為他們做點事情。同時，黃岡也是歷史名城，蘇東坡曾在此為官，寫下《赤壁賦》，故黃州赤壁有“文赤壁”之稱。

我把研究所的位址選在黃岡地區機關所在地——黃岡縣的黃州。

第二，是因為黃州有我所需要的人，便于我們開展工作。在青菱辦塑料廠時，熊工介紹了他的表妹夫方國璋到廠工作，他是搞機械維修的，小伙子工作很細心、賣力，技術也還可以，也能動腦子。廠裏機械、電器的運轉、修理都靠他一個人。

塑料廠搬到老橋後，方國璋的愛人、熊工的表妹陳琳也跟着到了老橋。我第一次是在陳老家見到她的，她與老橋村段書記一起來談塑料廠的事，我還以為她是老橋的婦聯主任，之所以有此誤判，是因為她落落大方，談吐自如，不像是外來人員。陳琳年輕時就來了武漢，他父親在青山從事理髮工作，她跟着別人學做衣服。她從小就在社會上闖，見識的人和事較多，所以比同齡人顯得成熟，比農村姑娘顯得大方。

方國璋原籍在黃岡市團風縣，在黃岡水利局工作，婚後夫妻分居兩地，此次藉着熊工的關係，把方弄到武漢工作，夫妻就團聚了，半年前生了個兒子，這樣一家三口都到了老橋。

老橋塑料廠剛起步，要不了多少人，于是我把陳琳安排到書刊門市部當出納，門市部關門後她又回到老橋，直到我離開青菱，他們也



返回黃州去了。

有了這層關係，他們也希望我把研究所放到黃州去，他們在那裏有親戚朋友，辦事方便些，同時他們也可以到研究所工作，解決吃飯問題。

我認為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武漢的人是不可能長期住在黃州的，我也是兩頭跑，大部分時間會在武漢。他們是黃岡人，可以照看所裏的工作。這也是我決定將研究所定址在黃州的重要原因。

## 2. 組建湖北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是由我發起、共5個人組成的一個集體所有制企業，成立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初次的注冊資金為1萬元人民幣，主要經營方式是科技服務。經營範圍是：科技開發，技術承包、轉讓、培訓、諮詢、中介服務。主管單位是黃岡縣科委，辦公地點在黃州賈家街。

研究所組成人員除我（法定代表人）外，都是學校的教授、副教授。有電廠化學學科的王杏卿教授，是我在北京電力學院工作時的搭檔，她是系主任，我是書記，院系調整時一同來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陳汝慶教授，他是搞熱能動力專業的，原是北京電力學院動力系的老師，是由西安交通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電力學院的，當時我任動力系的書記，所以我們是很熟悉的老同事；第三位是水利系的胡震宇副教授，當時已調葛洲壩水電工程學院任教，他在文革中參加“革幹聯”；第四位是尤書萍副教授，很能幹。

我請這些老師加盟黃岡所，是因為他們在其專業領域都有廣泛的聯繫，有的是該專業的創立者、權威人士，如王杏卿教授是電廠化學專業的奠基人、權威人士；陳汝慶老師在火電廠有廣泛的聯繫，他的學生在電力局、火電廠擔任領導和負責技術工作的很多；胡震宇和尤書萍都是水院有影響的人物，他們各方面交往都很廣，用現在的語言講，就是人脈關係廣泛，資源豐富。

我希望以此來開展研究所的業務，期望值很高。另一方面，這些老師對我也抱有希望，認為我能力強，辦法多，一定會把研究所搞得

興旺發達，大家也可以從中得益。

結果雙方都大失所望，我希望的老師介紹項目到研究所來沒有實現，大家希望的研究所辦起來在經濟上有所收益也未能實現。

為了把研究所辦成一個真正能為黃岡地區人民服務的科學技術平臺，光靠我們幾個人是辦不了的，科學技術涉及方方面面。故在研究所成立之前，我已經和有關單位或有關人員聯繫，他們將成為湖北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聯繫單位，成為研究所的兼職成員。有相關的項目請他們出面調查，拿方案，洽談，接下來後由他們負責技術服務或項目實施，所得收益按一定比例分成，大家都很願意。

根據農村工農業發展的特點，我走訪了武漢紡織研究所、華農食品科學系、湖北工學院發酵工藝及釀酒專業的老師、農科院及華農果樹栽培及主要農作物種植方面的專家。這些單位或個人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中旬都到黃州參加了研究所的成立大會，他們都熱情支持。

黃岡縣科委對研究所的成立是熱情支持的，在以後的工作中給了我們很多支持與幫助，創造了很好的工作環境，特別是科委包主任、張科長更是如此，我至今仍很懷念他們。他們經常主動與我們通消息，有時甚至親自到武漢來給我通消息、送文件，這種工作精神、作風值得我永遠學習。

### 3. 成立水處理服務站及友聯加工廠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成立前，估計到研究所成立後，不可能立即有業務可做，為了能維持研究所的正常運轉，如辦公室租金、人來人往的招待費用、差旅費、開展業務的費用、工作人員的工資等，一年至少要1～2萬元，必須有一個項目能夠正常盈利，支持這些必不可少的開支，纔能支撐研究所這塊牌子。

為此，在研究所掛牌前，我成立了一個“黃岡水處理服務站”，服務的內容是為工業鍋爐清洗水垢。很多企業都有0.5噸/時～2噸/時的小型工業鍋爐，用了一段時間後，水管壁上結了一層水垢，會影響傳熱效果，生產同樣的蒸汽量就會多損耗煤。水垢也會越結越厚，管壁因得不到水的冷卻，會因過熱造成爆裂（即爆管），會造成人員傷

亡和財產損失。

發電廠必須定期清洗鍋爐，但農村小型工業鍋爐由于氣壓不是很高，煤耗也不大，所以經濟損失從不算賬，一般重視不夠。等到水垢結厚了，發生了事故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水處理服務站的任務就是對此進行宣傳，引起人們的重視，進而幫助洗爐，清除水垢，提高效率，確保安全。

我們作了調查，黃岡縣有工業小鍋爐 50 多台，羅田縣有 40 多台，浠水縣有 50 台左右，英山、紅安少一點，各 30 多台，團風縣也有 50 多台，蘄春縣、黃梅縣、麻城縣各有 40 多台。

水處理服務站成立後，聘請水院的李老師、彭老師當顧問，由他們幫助培訓，現場指導。工作人員是方國璋、陳琳以及陳琳的兩個妹妹，方任站長。他們既好學，工作也努力，到各縣調查，去有關廠家作宣傳，與各縣的勞動局聯繫、溝通，都是他們做的。他們在技術上進步也很快，經過培訓、實踐一個多月，就掌握了操作工藝，一般情況下已可獨立操作。

到一九八七年底，洗爐三十多台，盈利一萬多元。

一九八七年七月，又成立黃岡“友聯加工廠”。雖然叫廠，實際上是祇有 3 個人的小作坊。用剪板廠的邊料壓制成直徑為六毫米、八毫米的鋼筋，用于農村建房。這個廠由陳琳當廠長，與水處理服務站統一安排勞力，水處理服務站要洗爐都去參加洗爐，沒有洗爐任務就到友聯廠參加軋鋼筋。

我沒有想着從這兩個項目賺大錢，祇求能維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開支。由于友聯廠的投資較大，是靠借錢辦起來的，加之這類生產單位多，購買原材料困難，原料不斷漲價，故未盈利。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成立初期，在經費與工作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方國璋、陳琳夫婦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他們相繼離開黃岡所，方國璋被黃岡縣勞動局收編，把水處理項目帶過去了，他成為勞動局正式工作人員，繼續從事水處理服務站的工作。

陳琳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女性，她有志向，有韌性，不怕苦，不怕累，總想做一番事業，并把事業做成功，不達目的不甘休。離開黃岡所後，她從事服裝生產與經營，到過俄羅斯，也到過東歐做服裝出口生意，并取得了成功，在武漢買了房，買了車，現在正籌劃做更大的生意。我祝她取得更大的成就。

#### 4. 科技扶貧

到黃岡去為老區人民做點事，進行科技扶貧是我的心願，將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作為平臺，讓各行業的科技人員為老區人民進行技術服務。

為此，我確實做了不少工作，在武漢，我們聯繫了各方面的科技人員，動員他們在必要時到黃岡去進行科技扶貧工作。我們與黃岡地區科委、黃岡縣科委聯繫，瞭解他們對科技扶貧的要求。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我跑遍了黃岡地區各縣、市，對各地的特色項目進行考察。如團風縣回龍鎮的紡織業，羅田縣的板栗儲存與加工，浠水縣的粉絲加工，黃州的蘿蔔種植以及山區的開發等。

每到一地，政府官員都熱情接待，表示支持與感謝。但與政府官員或業主說到技術升級需要投資時，他們都會告訴你，現在我們的產品很好賣，還沒有到急需改變的時候。這實際上是謝絕技術改造。

團風縣的回龍鎮，是林彪的家鄉，那裏的紡織業很發達，但很原始，很多家庭織布機都是原始的人工織布機，他們主要生產一些當抹布用的粗稀布。

我請武漢紡織研究所的3位工程師一起去考察，這3位工程師看後，提出稍加改造可以使產品升級1到2個檔次，經濟效益可大幅提升。

在與鎮政府官員座談時，提出技術改造方案，使產品升級，提高經濟效益時，官員的回答使我們目瞪口呆。他說，謝謝你們送寶上門，技改方案很好，支持你們的技改方案。你們先搞一部分試試看，確有成效了，老百姓都會要求改的，你們墊的錢我們也會一分不少地付給你們。意思是說，既然你們提出為老區人民做好事，那就先拿出錢來做，有成效，錢付給你；我們不滿意，那對不起，錢不付了。



我們到浠水縣去考查粉絲加工時，本想解決苕粉的脫色問題，當地也要我們墊錢先做，有效果付錢，沒有效果，對不起！

羅田縣產板栗，而板栗的儲存在當時是個難題，一般新鮮板栗祇能存放十天左右，涉及到深加工的問題。這是地區科委給我們的課題，希望我們研究解決。我請農學院食品加工系的幾位老師去考查，提出了一些儲存及深加工的方案，得到的回答同樣希望我們幫助解決資金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好像是統一布置似的，其實這是黃岡老區普遍存在的問題。

解放後，黨和政府對老區人民特別關心，每年要給相當數量的扶貧款及補貼。所以一說到扶貧就是給當地送錢，他們拿到扶貧款後並沒有辦什麼事業，而是用于生活補貼了。

所以儘管政府每年撥款，老區人民的生活仍舊沒有多大改善，反而養成了一有困難就想着向政府要錢的習慣。

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黃岡地區一些村鎮一個特有的現象，不少村雖然經濟不發達，農民生活比較貧困，但村裏有小吉普車。陪同人員介紹，這是用來跑武漢甚至跑北京用的。主要是逢年過節帶些家鄉的土特產到武漢、北京看望本地出去的領導，實際上是去要點項目，要點錢，大多是水利、綠化、修路的項目。這樣，全村人一年的吃飯問題就解決了。

在黃岡，有一個故事家喻戶曉，講的是解放初期，李先念調北京任財政部長，撥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給紅安縣，意在對家鄉人民為中國革命事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給一點報答，支持老區人民發展經濟，改善生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時的紅安縣委書記却說，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需要很多錢，我們紅安人民也都有一個腦袋一雙手，可以自力更生建設家鄉。他把這筆救助款退了回去。央行收到一筆退款，不知原委，報告了周總理，總理一查，知道是李先念所為，沒有聲張，祇給李打了個招呼。李先念的好心沒有得到好報，對此十分惱火，以後有人向他提到為家鄉建設出點力的問題時，他說，你去找×

××（即那位紅安縣委書記），他有辦法。李先念解放後過家門而不入，始終未回過紅安，那主張自力更生的書記也就一直沒有得到升遷。

這也說明從上到下，都認為政府給老區人民援助是應該的、天經地義的。

我也認為是應該的，但如何援助，是有講究的。援助的目的，是發展老區的經濟，幫助老區人民加快工農業建設，改善生活，而不是每年以各種名目給點錢，使人們養成有困難伸手要錢、等待救濟的習慣。

我給地、縣兩級科委提出建議，給老區的扶貧款及政府其他撥款，要以建設項目下撥，嚴格控制經費使用，要專款專用。不能僅給老區人民送魚，而更應該送魚竿，讓他們學會釣魚，這樣纔能常年有魚吃。政府每年給的錢不少，沒有用到正道上。科委的領導同志說，我們也想這樣做，但扶貧款由扶貧辦管，下面到省裏、中央要錢，縣、地區領導根本不知道，他們都是通天的。

我想，一些領導同志，因對家鄉人民、對家鄉的眷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家鄉人民是情有可原的。他們認為這是對家鄉父老、對老區的回報，但結果却使人們產生了依賴思想，不思進取，其結果與願望適得其反。當然，我這裏講的僅是一孔之見，並沒有貶低老區幹部、人民的意思。

科技扶貧的願望是好的，但僅是主觀願望而已。

一年的努力沒有成效，證明這種做法不合時宜，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耗費了精力和錢財，也拖累了不少武漢的科技工作者，真的給我打了一悶棍。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向何處去，我下一步該幹什麼呢？

### 三、研究生物有機肥料

#### （一）走自己的路

一九八八年的上半年，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走在十字路口，科技扶貧之路走不通，經濟上入不敷出。我們在考慮研究所向何處去，是

關門還是轉向，轉向又搞什麼呢？

我的性格是從不向困難屈服，所以關門的方案是不被採納的。

在此期間，我的一些朋友、同學、學生建議我走別的路，既輕鬆又有發展前景。

如一九八六年我到廣州去，我的好朋友、文革中的戰友、學生李德俊，他建議我留在廣州發展。他聯繫了一個單位——珠海第一建築公司，總經理請我吃飯，希望我留在廣州。我的任務是參加國內外項目的談判，住在廣州，月薪 500 元（一九八八年的 500 元相當於現在的多少？）。我婉拒了。如果當時留在廣州，現在是什麼情況很難預料了。李德俊後來搞房地產，3 萬元起家，早已成為億萬富豪了。

我有一位老同學是上海寶山鋼鐵公司的元老，時任辦公室主任，他建議我搞點鋼材生意，積累點開發資金。他說，寶鋼有鋼錠，武鋼有型材，他與武鋼老總關係不錯，搞點指標不成問題。當時實行價格雙軌制，一噸鋼材指標能賺 200 元至 300 元。我也拒絕了。

有學生來看我，看我那麼辛苦，一無所獲，建議我到各電力局、電廠走一走，很多電力局的領導、電廠的廠長是我的學生，搞點項目，多給點錢，很快就可以搞起來了。我也拒絕這樣做。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在某機場當經營處長，他聽說我搞肥料，對我說，幹嘛搞這種東西，我機場又不用肥料，想幫也幫不了你。你到海邊去養蝦，我給你 100 萬元，你每年給機場送 3 噸蝦，我既幫了你，又給機場謀福利，兩全其美。我也婉拒了。

我為什麼拒絕了朋友們的好意，甘願走一條艱苦而前途未卜的道路——最後證明是一條沒有成功的道路？瞭解內情的朋友說我太固執，放着陽關道不走，非要走獨木橋不可。我也經常問自己，到底為什麼？

回答是，我想證明自己是否有能力做成一些事，所以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也就是說走自己的路。

說實話，當時對錢的問題沒有想太多，根本沒有考慮所謂發財的問題。如果當時想到下海發財，肯定會接受朋友們的建議。

後來，當我認識到當今社會資本的功效與力量，沒有錢什麼事也辦不成的時候，已經沒有條件去弄錢了。因為我的同學、朋友都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退休的退休、離世的離世了。而廣州的那位朋友，我上世紀為辦公司向他借過錢，至今仍未歸還，所以不好意思再開口借錢了。

在我考慮下一步如何走時，想到應該去了解農村目前最需要解決什麼問題。在調查中，我發現農業生產中的一個重大問題：農民大量施用化肥，產量是提高了，但作物的品質下降了，土壤板結，地力下降，長此下去，農業生產面臨嚴重的問題。我希望能找到一種解決辦法。

想起了在回龍鎮考察紡織項目時，武漢市紡織研究所的安志遠工程師曾向我說起，他的伯父曾談起臺灣有一種肥料，效果很好，帶回來不少照片和一袋樣品，問我有沒有興趣研究一下。

此時產生了要研究這種肥料的念頭，我找到了安工，他給了我樣品及照片。回來仔細研究一下，覺得這種肥料既可增產，又可改良土壤，可以借鑒。

與研究所的朋友商量，他們表示支持。于是我決定研究一種集生物肥料、化學肥料、有機肥料于一體的生物有機複合肥，後來農民稱它為“三合一”肥料。

從一九八八年七月開始踏上了一條漫長的研究之路，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通過省科委的鑒定，歷時三年多。這個項目讓我和農業、農村、農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從農村出來，轉了一個圈，又回到農村，真是有說不出的痛快，雖苦猶甜。當你忘却一切，全身心投入到一個事業中去的時候，感到了自身的存在，自身的價值。特別是當科研工作一個接一個取得階段性成果時，我體驗到了“天生我材必有用”這至理名言的含義。它鼓勵我去克服一切困難繼續向前，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 (二) 漫長而艱苦的研究之路

研究“三合一”肥料，涉及很多學科，實際上是一個系統工程。無



前例可依，我手上祇有幾張肥效照片和一小包生物有機肥。

肥料對我來說是門外漢，要組織這樣一個多學科的科研項目，的確是困難重重。沒有經濟來源，幾次差點停擺。靠着團隊的團結一致，攻堅克難，在關鍵的時候又得到了湖北省科委及洪山電工研究所的支持，經過三年半的研究工作，終於取得成功。

當時世界上有3種肥料，即有機肥、化肥及生物肥料（菌肥），各有千秋。有機肥最好，但由於有效氮、磷、鉀含量低，所以使用量大，施肥所用勞力也多；化肥肥效高，但使作物品質降低，土壤板結，透氣性不好，地力下降，長期大量使用，對土壤及環境的破壞極大；生物肥即菌肥，本身不是肥料，但通過有益微生物的生命活動，可以促進土壤養分轉化，提高土壤養分有效性，增加土壤肥力，但微生物在土壤中的繁殖成長環境難以控制，菌肥的功效與菌落數量有關，所以生物肥料效果不穩定，因此單一使用生物肥料很難保證作物的穩產、高產。

讓三種肥料結合在一起，發揮它們的長處，克服它們的缺點，使三合一的新肥料能夠達到有利于農作物的增產、有利于作物品質的提高、有利于土壤肥力的平衡與增加、有利于保護土壤環境等諸多效果，解決目前單一使用三種肥料所帶來的問題，這是我們這一科研項目所要達到的目標。

為此就涉及到各種學科，如肥料學，土化學，微生物學及微生物的篩選、測試、培育、應用；也涉及到有機肥的種類和特性、發酵工藝；要為微生物在有機肥中生存繁殖創造最佳條件，就要確定其濕度、溫度、死亡溫度等一系列參數；還涉及土肥學及肥效試驗的方方面面；最後還要涉及到機械學科，因為工廠化生產必然涉及到機械結構、設計、製造等問題；試驗肥效時又會涉及到果樹、蔬菜、大田作物、經濟作物的不同特性等等。

本課題涉及科學門類之多，涉及人員之廣，一般課題是無法比擬的。我除了對機械略知一二外，對其他學科一無所知。當設計了本課題要實現的目標、研究路線圖以後，我自己也被嚇住了，到哪里去找這麼多科技人員？哪里來這麼多錢解決研究經費？但我決心已

下，祇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為了把握科研過程的全局，我向書本學習，登門向專家求教，可以說是廢寢忘食，學到了有關學科的一些皮毛。

從研究內容說，先從微生物開始，然後研究發酵（有機物），再進行三類肥料的混合造粒，進一步進行肥效試驗，最後進行工業化生產的研究。從方法上講，實驗室→小試→中試→肥效試驗→工業化生產。不解決第一步決不走第二步，一步一個脚印，不走回頭路（力求不反復）。每個階段吸收有志從事該項目研究的科研人員參加，既保證研究工作的深入進行，又可以節省經費。

### 1. 功能微生物的篩選、鑒定

所謂功能微生物，即是對我們所研究的新肥料有用的微生物——固氮菌、解磷菌、解鉀菌，還有幫助有機物發酵及除臭方面的微生物。

微生物無處不在，種類繁多，從中篩選出對我們課題有用的功能微生物，工程非常大。我到湖北工學院微生物教研室請求支持，請他們幫助解決菌種的篩選問題，訂立合同，要求三個月內完成篩選工作。

教研室胡征老師負責此項工作，胡老師從武大生物系畢業，業務能力很強，整個暑假都在實驗室工作。他首先將臺灣肥料中的微生物分離並篩選，選擇活性強、數量大的菌株。研究所也採集了一些樣品供分離與篩選。菌株的篩選可以說是海底撈針，實驗室擺滿了培養皿，有好幾百個。從一九八八年的七月初到十月份，共篩選出數量大、活性強的菌種三十多個，臺灣肥料樣品中有十來個。經交談，胡老師很願意參加課題的工作，成為課題組的第三位成員。除我外還有陳汝慶教授，他是黃岡所的副所長。

從篩選出的三十多株菌種中選擇有用的功能微生物，就要對每株菌種進行功能鑒定，確定它的屬性和功能。這個工作湖北工學院做不了，主要是沒有有關設備儀器。據胡老師說，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可以做。

我到該所找生物固氮研究室的主任王子芳教授，王教授聽我介紹了項目情況後，熱情地表示支持我們，同意做菌株功能鑒定。出乎

我的意料，王教授不僅答應做鑒定，還表示願派他的助理研究員、碩士畢業生魏輝直接參加課題組的研究，同時表示，如有需要，她研究室中有關固氮菌種可無償提供給我們。

王主任不僅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支持，而且使生物固氮研究室成為我們在菌種研究方面的後盾，更重要的是，她對我們精神上的鼓勵，使我們更有信心去攻克一個個難關，拓寬了我們的視野與聯繫範圍。

王主任的愛人李阜棣教授是華中農業大學微生物教研室的學科帶頭人。因王主任的關係，我們有機會得到李教授的指導，以後我們的菌種在華中農大長期保存。也因王主任的關係，我們肥料的肥效試驗進入國家“863”項目。

一九九〇年春節前，菌種鑒定結束，共篩選出 8 株功能微生物：兩株固氮菌、兩株解磷菌、兩株解鉀菌、兩株除臭菌。8 株功能微生物的培養基也相應確定，它們的屬性、形態都有結論。這個工作的功臣當然是魏輝，他在王主任指導下，默默工作了三個多月。

魏輝不僅業務好，工作認真努力，而且為人謙和低調，在以後的幾年共事中，大家都很喜欢他。後來他到國外讀博士學位，畢業後留在國外工作。

接下來的工作是做功能微生物的效果試驗，目的是弄清楚我們選擇的功能微生物有沒有效果，祇有證明有效果，纔能走一下步。

這個工作，我們是請湖北農業科學院的沈中泉、郭雲桃兩位副研究員做的。他們是盆栽試驗的專家，為此試驗設計了許多對照，我們不僅要弄清楚菌的功效，也要弄清楚菌肥功效發揮最好時的條件。

試驗結果，兩個結論：一是有效，二是菌肥和有機物共用時效果更好。這一結論，不僅證明了我們篩選的功能微生物是成功的，而且證明了菌肥與有機肥複合使用肥效更好。這一結論，為我們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 2. 申報立項

在功能微生物確定并肥效試驗成功後，我對該項目的成功已抱有極大的信心。此時，我們申請湖北省科委將這個課題列入正式的

科技項目，一方面可以解決點經費，同時列入政府正式的科技項目，更顯正規化，說話底氣就足一點。

我先向黃岡縣科委提出，科委同志讓我直接向省科委申報，需要他們做的，他們一定支持。原因是每年省科委撥給縣科委的科研經費很少，縣裏的項目大的給萬把塊錢，少的給幾千塊，我們的項目起碼要2萬元，縣裏肯定沒有錢，如到省裏申請，會戴帽下達，不占縣裏的經費指標。

我到湖北省科委找主管處長，他正在看材料，聽我彙報了有關項目的情況。我請教他如何申請立項，處長說立項要有條件，你的項目有一定的難度，你先寫個報告來我們研究一下再說。他對我說話時自始至終沒有抬頭看過我。

三天後，我去送材料，他還是在看材料，他讓我把材料放在桌子上，說研究後再說，仍然沒有抬頭看我。

我第三次去省科委，是向處長打聽，我們的項目研究結果如何？處長說還沒有研究，我說，這麼長時間了（兩周了）還未研究？他說要找專家們研究，他們這個有時間，那個沒有時間，要協調。叫我等專家們研究了再說。這次還是沒有抬頭看我，我也沒有看清他的相貌。

雖然我們說過三次話，如果對面碰到仍然互不相識，因為沒有照過面。我哀嘆求人之難。

我的一位學生在省科委任副主任，我不想麻煩他，三次碰壁後，我祇好去求他了。

第四次到省科委先找到這位副主任，他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他畢業後我們是第一次相見，互相談了些別後情況。他問我有沒有什麼事要他辦的，我就把生物有機肥項目向他作了彙報，也講了三次來科委申報立項的經過，請他幫助催一下，快點研究。他聽後明白了我的意思，要我等一下，並立即打電話請該處長到他辦公室來一下。處長來後，他介紹說：“這是我的老師，他有一個項目，我聽了覺得還可以。你們研究一下，是否可以立項，將結果告訴我。”我聽後，認為副主任的話講得相當有水準，他這樣一講，你不立項也不行了。臨走



時，處長對我說，你過兩天來科委。我知道有門了。

兩天後去省科委，此次情況就不同了，說了些家常及項目進展情況，並談到課題組成員。最後他說研究了一下，將你的課題列入湖北省重點科學技術項目計劃，資金 2 萬 5 千元，不用還的，能搞成最好，搞不成，你年齡大了也不要為難。

事情雖然辦成了，但給我的感覺不是滋味，好像立項撥款是人際關係的原因，而不是課題本身的品質。但也因此激勵我一定要搞成功，不能給我當副主任的學生臉上抹黑。

第一年款項 2 萬 5 千元於一九九〇年四月下達到黃岡縣科委，一九九一年又下撥 2 萬元作為肥效試驗的經費。

我對縣、地、省三級科委很尊重，項目進展情況與階段性彙報書面材料同時送給三級科委，讓他們瞭解我們的工作與進度，以得到他們的監督與支持。

我與省科委的主管處長從此相處很好，他也很關心支持我們的工作，組織鑒定會都是處長親自抓的。

為了解決經費問題，我也曾到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科委、中國農業科學院、化工部科技司去談過。

通過黃岡科委給國家計委的一位領導同志（黃岡籍）寫了一封信，我拿着這封信到國家計委找他。計委辦公室的同志拿着信去找這位負責同志，他沒有見我，寫了一張條子要我去找國家科委的一位負責人。

我到國家科委去，科委辦公室的同志接了計委負責人的條子，回來告訴我到計劃司去談，他們已有電話通知計劃司了。

因為有這層關係，計劃司的同志熱情地接待了我，給我倒水還讓我坐下談。我向接待我的同志（處長）談了項目情況，說現在碰到了經費問題，科研工作無法繼續下去。他聽後說，你的項目是個好項目，按目前的規定看，解決經費問題有難度，因為你的“三合一”肥料沒有“籠子”，目前祇有化肥和生物肥二個“籠子”，所以不好立項，也就無法撥款。他想了一下又說，你到化工部科技司去談談，看他們能

否幫助你解決，也可以到中科院計劃司去談一下，前者是管化肥的，後者是管生物肥料開發的。由他們幫我聯繫，要我第二天一定去。

我按要求第二天先到化工部科技司，他們認為這不歸他們管，他們祇管化工系統的科技項目，地方上的項目由科委管。到中科院計劃司同樣碰壁，又轉回到國家科委，那位處長建議回湖北省科委解決。他告訴我，國家科委每年給湖北科技經費幾千萬，你們這個項目應該沒有問題啊，叫他們擠出個十幾萬也就解決了。我一聽，這是在推磨，中央幾個政府部門都跑了，一無所獲。

由于有計委負責人的條子，接待我還算客氣。我看到一位滿頭白髮的科技工作者，從貴州趕到北京，也是談項目問題的。大概沒有什麼背景，輪到他時，不要說沒有水喝，也沒有讓他坐，站着談的。他說完，接待人員說，你這個項目根本不可能，回去吧，有問題找省裏談。他急得直想哭，可沒有辦法，祇好含淚而去，邊走邊說：我從貴州3天趕到北京，等了兩天，談了不到10分鐘，就一句話，回去吧！

哪能這樣辦事？北京之行，讓我領略到了什麼叫衙門作風，什麼叫官場！

### 3. 建立中間試驗工廠

功能微生物確定以後，我們在實驗室進行了有機物的發酵試驗，解決了有機物發酵的腐熟時間與功能微生物的關係，有機物中放入功能微生物不僅發酵快，而且除臭，微生物的繁殖速度也快，這些情況都是我們所希望的。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中間試驗廠，從菌種繁殖到有機物料的發酵、粉碎，複混造粒成為產品，也就是要小規模的生產，從中取得有效的資料與發現問題，產品可以進行農田肥效試驗，所以中試廠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很多科研項目，往往從實驗室直接走向實用，沒有經過中間試驗，到用的時候纔發現問題，也因此而中斷研究。所以，我堅持要建立中試廠，進行中間試驗。祇有在中試、肥效試驗成功的基礎上再進行工業化、商品化生產的研究，循序漸進比較可靠。

至此，研究工作已進行了一年半，費用六萬多元，用于發工資、支

付委托協作單位試驗的費用、差旅費等。這些錢都是向我的家人及朋友借的，可以說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申請科委立項已同意，但不知何時可以撥款，撥多少也不知道。建立中試廠刻不容緩，費用估算一下要 6 萬多元。如果中試成功，還要 3 萬元～4 萬元的肥效試驗經費、科學鑒定等費用，估計到項目完成還需 15 萬元左右。

不敢想像，對我來講如此巨額的費用從哪里來？祇求把中試廠建起來再說。我找到老同事章賢（電力系教師），他辦的“洪山電工研究所”業務不錯，盈利頗豐。老着臉皮向他開口借六萬元，他聽我介紹後，提出不用借，他參與投資，以後項目所需資金由他來解決，並派他的妻弟丁健夫與我一起工作，所需資金由他到電工所領取。

我簡直不敢相信，對我來講日夜操心而無法解決的經費問題，就這樣三言兩語解決了。

我十分感激章賢，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他慷慨地伸出了救援之手，項目的研究成功，章賢是功不可沒的。

有錢後，我們很快把中試廠建起來了，其中有整套的微生物生產設備和檢測儀器，有粉碎及造粒設備。在武昌南湖離省農科院、省土肥站不遠的地方租賃了廠房和有機物料發酵場地，有了自己的地盤和工作地點，我們團結一致，滿懷信心地繼續往前走。

中試廠的工作，是要規模化地生產功能微生物菌種，規模化地進行有機物的發酵試驗。

在試驗中要解決如下幾個問



中試廠成員。左起：許清波、許春生、張建成、丁健夫、魏輝、胡徵。攝于一九九〇年



南湖中試廠。攝于一九九〇年

題：確定有機物料の種類，特別是哪些有機物料適合功能微生物的生長；確定有機物料發酵過程中的溫度變化，特別是最高溫度，研究如何保證功能

微生物的存活；測試發酵後功能微生物在有機肥中的數量，這十分重要，因為要使菌肥發揮功效，數量是一個重要條件；要搞清楚有機物發酵的腐熟過程和必要條件，如水分要求、菌種放置的要求、有機物料堆放的要求、有機物料攪拌的時間要求等等；要解決有機肥乾燥、粉碎，三種肥料複混比例，肥料造粒成型對設備的要求和對水分的要求，對有機肥細度的要求，哪種造粒機合適，肥料顆粒的大小、長短、強度；還有肥料無機氮、磷、鉀的配比等。所有這些試驗，在中試廠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

特別令我們驚喜的是，在有機物料發酵過程中，糞便中的蛆、棉籽殼中的土蠶都會爬出來死在堆料邊，蒼蠅也會遠離有機發酵料，經過發酵後的有機肥鬆軟無臭，有一股清香的味道，這一結果是我們沒有料到的。

中試成功後，就走向項目研究的最後一步——肥效試驗。

為此，中試廠在附近找菜農免費試驗。有些菜農不敢用，說試驗中菜死了怎麼辦？為了讓菜農試用，我們承諾，如出現作物減產或死亡，損失由我們承擔。試用結果，菜農驚喜，我們更具體地看到了成果，試用的蘿蔔、白菜個頭大，外表光鮮好看。有一個菜農對我說：“你的肥料好是好，就是偷蘿蔔的多了，而且都是偷我的。”因為他用



我們的肥料種的蘿蔔特別粗大，半截露在外面，所以有人路過就拔一個，故有此說。增產的情況在菜農中傳開了，有人到中試廠要求買肥料，甚至要求高價購買。因為我們要準備在全省範圍內大面積田間試驗，所以肥料沒有賣的，讓他們失望了。

#### 4. 田間肥效試驗

“三合一”生物有機肥經過正規的盆栽試驗及某些蔬菜的田間試驗，證明確有效果後，決定於一九九一年進行大範圍的田間肥效試驗。

試驗工作由湖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簡稱土肥站）負責組織，按正規試驗進行。負責人為吳祖咏科長，他對這個項目極為支持，非常熱心，我們合作得很好，後來成為很好的朋友，至今仍有來往。

吳科長是學農業的，實踐經驗豐富，對業務非常熟悉。經過研究，省土肥站徐站長同意組織在六地市十五縣市四十五個點進行試驗。除此以外，我們請華中農大柑桔教研室在柑桔上進行肥效試驗，請農科院在其農場進行西瓜肥效試驗，請武漢市洪山區良種一場在花椰菜上進行肥效試驗，總計將近 50 個試驗點。每個點由我們提供肥料，另補貼 500 元經費。

各縣市土肥站負責試驗的同志到武漢開了兩次會，一次是布置試驗工作，一次是試驗結束後的總結。試驗方案由省土肥站制定，每個點上進行三方面內容的試驗，一是等養分試驗，二是等價試驗，三是“三合一”肥料的用量試驗。各試驗點規定了被試作物的內容，要求在試驗過程中仔細觀察并作詳細的記錄，收穫後不僅要測產量，也要測質量，每個試驗點要寫試驗報告。

我和吳科長在試驗過程中到各試驗點看過三次，各點都很認真，記錄很詳細。給我的感覺，農業戰綫上的科技人員比其他戰綫的科技人員辛苦、實在，不管颶風下雨、嚴寒酷暑，祇要工作需要，他們總在田頭。

我們下去時有兩次天氣晴朗，烈日當空，試驗人員在試驗田觀察，數長了幾片葉子，量尺寸。有一次下大雨，大雨一停，他們就下地看試驗田的作物是否受害了，能否補救，令我感動。

土肥站的上下關係都很好，縣站與縣站之間又如兄弟，我感到土肥站有如一個家，上面一布置，下面就照辦，下面有事，上面幫助。我幾次下去，都是一站接一站的通知安排，不讓你為吃、住、行操心。

我原以為，每個試驗點補貼 500 元已經不少，事實上各土肥站是在貼錢為我們做試驗。他們兩次到武漢的交通費、住宿費、差旅費，我們三次到試驗點時的招待費，對作物產量及質量的測試費，對農民土地的補貼費，加起來大大超出 500 元。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旬，各試驗點的工作基本結束，各地的報告也已陸續送到省土肥站。十一月底召開試驗總結會，到會同志都興高采烈，因為從各地的試驗情況看，各種作物產量都提高了，與等養分、等投入比較，“三合一”肥料的增產幅度都在 10% 以上，證明生物有機複合肥有增產效果。從品質測定看，作物品質均有所提高，西瓜的糖分增加一個百分點以上，甜酸比增加，所以就好吃；蔬菜的維生素、蛋白質含量有提高，幹物質增加；土壤中的有機質有所增加，完全達到和超過了我們的設計目標。

至此，可以肯定，項目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功。

這裏講一個故事。1994 年，沙市王橋建了生物有機肥廠，市長去檢查工作，吃了使用生物有機肥的西瓜，不僅甜，而且味正，就說“吃西瓜到王橋”，後來這句話被不少報刊引用。

我們給三級科委寫了情況報告和申請組織鑒定的報告。



肥效田間對比試驗。攝于一九九一年

## 5. 湖北省科委組織鑒定會

湖北省科委將鑒定會定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進行。課題組所有成員都投入了準備鑒定資料的工作中。

為做好項目鑒定的準備工作，我還完成了兩個重要任務。一是請湖北省衛生防疫站做肥料的毒理試驗，二是請湖北省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查新檢索。這兩項工作分別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和十二月二日結束。毒理試驗結論是：“生物有機肥無急性毒作用，無致病作用，無染色體誘變作用。”即無毒無害。查新檢索的結論是：“檢索國內近十年來的資料，未見有如本課題研製的集無機肥、有機肥、微生物肥于一體的粒狀有機複合肥的文獻報導……研製生產集三種肥料于一體的複合肥，對於改善土壤肥力、保持農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這兩項工作的完成與結論，讓我徹底地放心了，幾年的辛苦終於有了結果。

資料的整理工作于十二月上旬完成，付印裝冊、幻燈片製作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完成。課題組確定了在鑒定會上的報告人和回答與會者問題的人選。決定課題組5個人都上場，分別就有關專題作報告。答辯時，涉及的內容由相關報告人作答，其他人不插話，以免出現不必要的差錯。

報告內容與報告人如下：

“粒狀有機肥的研製與效果試驗”研究工作總結，報告人張建成。

微生物的選育及功能測定，報告人胡征。

粒狀有機肥生產用菌株的鑒定、功能和生長特性，報告人魏輝。

有機物料發酵工藝的研究，報告人張建成。

粒狀有機肥複混與造粒工藝的研究，報告人陳汝慶。

粒狀有機肥田間試驗，報告人吳祖咏。

由于有了充分的準備，鑒定會開得有條不紊。

對於鑒定委員的人選，省科委要求高水準的專家，經與各方協商後，決定聘請湖北省一流的農業專家、微生物專家、發酵工程專家參加。

生物有機複合肥料項目鑒定評審專家名單如下：

主任委員：王運華，華中農業大學副校長，土化專家，教授。

副主任委員：朱萃法，湖北省農牧業廳總工程師，教授級高級農藝師。

喻永熹，湖北省農業科學院土肥專家，研究員。

委員：章文才，華中農業大學，著名柑桔專家，教授。

李阜棣，華中農業大學農業微生物學教授。

陳漱澗，武漢大學微生物學教授。

李祥瑞，湖北省農牧業廳果樹專家，教授級高級農藝師。

沈中泉，湖北省農業科學院土肥專家，副研究員。

李德齡，湖北工學院發酵工程專家，副教授。

章文才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柑桔專家，本來想請他任主任委員，但他說年事已高(90歲)，還是讓王校長擔任為好。我到他家去過兩次，老專家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他很認真地看了我們送的材料，也到農大柑桔園大棚中察看了施用生物有機肥的效果，十分滿意。在鑒定會後，他拉着我的手說：你們為農業發展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要謝謝你們。

這一切，猶如昨日的事，印象十分深刻。可章教授早已離我們而去，雖是自然規律，但仍令我痛惜。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在生物有機肥項目成果鑒定會上作研制匯報

參加鑒定會的人很多，除了與研究工作有關的單位派人參加外，關心此課題進展的有關單位也派人參加，如武漢市蔡甸區農機局、湖北省沙市王橋農場、湖北省孝感土肥站，河南省鄧州市副市長及市經委主任肖



勁蒼，也專程前來參加會。

鑒定會由湖北省科委二處張處長主持，省科委副主任李連和參會。在我們報告後，委員們提出問題，我們一一作答。有的問題比較專業、特殊，如武大的陳教授、農大的李教授提出有關微生物方面的問題，當時連魏輝和胡征都講不清楚，就由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病毒所生物固氮研究室主任王子芳教授作答，因為該室是本課題研究的協作單位，所以她有權利和義務作答。

到後來，鑒定會成了研討會，專家們對本課題如何轉化為生產力發表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

鑒定會對本課題的鑒定意見如下：

本項目研究選題正確，設計新穎，具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特點，豐富了多元複合肥生產研究的內容和方法。粒狀有機肥的研製及肥效試驗成功，為充分開發有效利用各種有機肥資源開闢了一條新途徑，展示有機肥料生產工廠化、專業化、商品化的發展前景。鑒定委員一致認為，本項目研究已圓滿完成湖北省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預定目標，在國內同類研究中處於先進水準，建議作為科技成果上報。

應該說這一評價是不低的。最後省科委李副主任講話，對我們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要我們繼續努力，把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鑒定會的當天晚上，我怎麼也睡不着。我激動、喜悅、沉思、回憶。這一路走來的艱辛祇有我自己知道。這幾年頭髮都白了，這一切都是



項目鑒定會後，著名柑桔專家章文才教授向張建成表示祝賀

為了信念：為人民做點事，要證明我能為人民做點事。今天證明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證明了我可以為我的信仰繼續奮鬥。

這是我第一次主持一項科研工作。我把一無所有的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承擔的涉及如此衆多學科的研究任務完成了，充分發揮了我的組織才能，把這麼多不相干的單位、這麼多不相識的人員組織起來，向着一個既定的目標前進，而且走向了勝利。

我感到自豪，對我的不公平處理算得了什麼？開除我黨籍又算得了什麼？重要的是我不能因此倒下，不能因此喪失信仰、喪失信心。我證明了自己向張芾承表明的態度：革命是自願的，不是你們讓我革命我就革命，不讓我革命我就不革命了。我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要自覺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就要腳踏實地地做力所能及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我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盡我的責任，盡我的力量，這就夠了，其他都不重要。

我們的團隊，來自不同單位、不同專業，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各自努力完成自己擔負的任務，有困難自己設法解決，從不給別人帶來麻煩。不以工作時間計算，而是以按要求完成任務為目標，完不成就加班，從不計較得失。

我們沒有什麼固定的報酬，祇有少許補貼，有時還得欠着，從未有人因為待遇低而鬧情緒。許清波和許春生是新洲來的兩個年輕人，他們是來打工掙錢的，但他們也從未為待遇、為勞動時間提過任何要求，他們吃住在中試廠，沒有文化娛樂活動，不管白天黑夜，祇要工作需要，即使後半夜，也要起來測溫度、作記錄，從沒有怨言。

當時社會上已經鼓噪着利益至上、發財致富、給多少錢幹多少事的聲音，我們的團隊不為所動，仍然按照毛澤東時代的要求，工作第一，無私奉獻。

就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團隊，經過艱苦的努力，完成了被認為無法完成的目標。這是什麼力量？這是團隊集體的力量，這是無私奉獻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協作的凱歌，也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凱歌！

我回憶着一步步走過的歷程，科技人員的言談舉止歷歷在目。

為什麼不管認識不認識，祇要去談一談，就會被吸引住，就會主動表示願意與我一起去奮鬥？為什麼？這不是我個人的什麼魅力，而是項目的內容吸引了他們，是為農業、為農民、為發展農業生產服務的思想鼓舞了他們。

無論我到哪里，一介紹項目就會引起聽者的共鳴與支持。科學院病毒所的王子芳教授是這樣，農科院沈中泉研究員也是這樣，華中農大的好幾位教授，省土肥站的徐站長、吳祖咏等等都是這樣。

有這樣一件事，讓我難忘。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我到華中農業大學找土肥專家李教授。他很忙，承擔着國家及聯合國的多個研究課題。第一次沒有見到他，第二次他不在教研室，他的同事說在學校，我就在門外等。不久他從外面回來，我作了自我介紹，想請教他一些問題。他看我年紀較大、頭髮白了，就同意談一下。在樓外的草坪上坐下，給我 20 分鐘時間。我向他介紹了我們研究的課題，目前進入田間肥效試驗階段。我的主要問題是，請教他在田間試驗時應該注意什麼問題，試驗方案如何設計為好。他越聽越感興趣，等我講完，他說，張老師，我們進屋談。於是我們進屋。他給我泡了茶，我們談了整整一下午，他給了有關試驗方面的資料，並囑咐我以後有事就找他，並給了我聯繫電話號碼。

這充分說明了老科學家的事業心與責任心，本來祇同意談 20 分鐘的李教授，却談了一下午，因為他看到一種新肥料將對農業發展的影響，對土地的影響。他是土肥專家，當然會感興趣，而且會無條件地支持。第一次見面他就將有關試驗材料送給我，這就是毛澤東時代培養出來的專家的心，一顆為事業、為人民的心！

#### 6. 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課題組的同志們都為科研成果通過鑒定而高興，但他們沒有忘記任務還沒有完成，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是最後一道難關，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們按照省科委李主任的要求，馬上投入到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研究中去。

經過反復討論，認為要轉化為規模化、工廠化、商品化的生產，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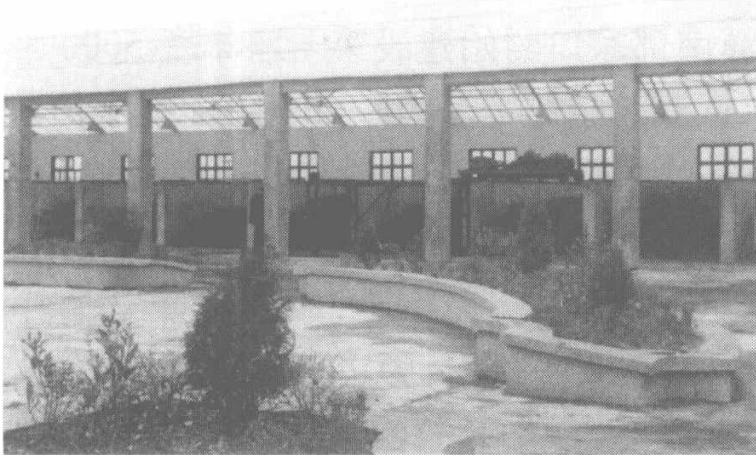
鍵要解決有機物料發酵的工廠化、肥料造粒設備的選型及改造、有機肥發酵料的乾燥三大問題。

有機料的發酵過程是有機料的腐熟過程，也是功能微生物大量繁殖的過程，涉及溫度、濕度、通氣翻拌等一系列問題。中試時用堆置的辦法、人工翻拌的辦法，少量是可以的，但規模生產中有機料發酵量大，占地面積大，人工用得多，而且勞動強度大，發酵初期階段有濃烈的臭味。這些情況使大規模生產成本太高，工人勞動條件太差，特別是無法解決下雨時大面積遮蓋的問題，所以必須使用機械化、工廠化生產。

我們的方案是設立若干個發酵槽，將有機物料堆置于槽內，投入生產菌種，發酵過程有專用的翻拌機（我們自己設計製造），按需要進行翻拌。發酵車間除投料、出料需要人力外，平時祇用一個人管理，他的任務是定時測溫度（微生物存活有溫度限制）和濕度，按規定指標開動翻拌機，這就大大地節省了工廠用地、用工，改善了工人的勞動條件，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

肥料造粒是工廠化、商品化生產的必需，而粉狀生物有機肥的包裝、運輸、施肥都會增加很大困難。更重要的是生物有機肥要施在作物根部附近的土壤中，纔能充分發揮其肥效，粒狀肥很容易實現這一點。

“三合一”的生物有機肥對造粒的要求是既要達到一定的強度，又不能使溫度超過限值，而這是一對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我們做了很多次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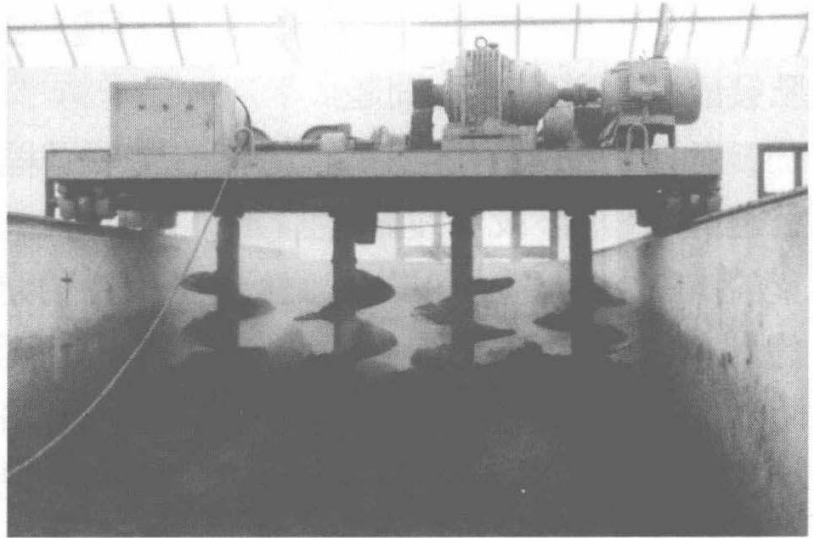
生物有機肥廠有機肥發酵車間

市場上沒有專用的有機肥造粒機，祇有化肥造粒和飼料造粒的設備。經過多種造粒機的試驗，肥粒強度不夠，都達不到要求，原因是有機物料和化肥、飼料的性能不一樣，纖維多、粗



糙，所以肥粒壓不實，容易破碎。

經反復研究試驗，我們採用加厚模板、加大模孔錐度的辦法，這兩項措施提高了肥粒的強度，同時摸索出有機料最佳造粒濕度的指標（即含水量），選定了定點廠生產有機肥造粒機。



有機料翻拌車正在工作

有機物料發酵後，含水分較大，不適合粉碎與造粒的要求，所以要將發酵料乾燥，最便宜的辦法是曬乾。這種辦法用工多，但可節省能源消耗，最大的問題是靠天吃飯，連續陰雨就要停產，夏天遇到陣雨就要搶收，冬天不易曬乾，影響生產。因此要實現工廠化生產，必須解決乾燥設備問題。

本來乾燥設備是常規產品，問題是為確保功能微生物在有機料中存活，必須實行低溫乾燥，這樣就給乾燥系統的設計帶來了極大的難度。

陳汝慶教授下了很大的功夫，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下半年解決了這一難題。至此生物有機肥的工廠化生產的設備與工藝已基本解決。

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在漢南鄧家口開始建設第一座年產 5000 噸生物有機複合肥料的工廠（武漢萬全肥業公司），一九九三年春節前建成投產，各項設備運行正常，驗證了我們的設計思想是正確的。接着在孝感、沙市王橋農場相繼建立年產 5000 噸的肥料廠，實現了科研成果的轉化。

在這裏我要再次提到章賢同志。在項目鑒定會後不久，丁健夫通知我，洪山電工研究所決定退出該項目。我提出目前無力償還電工所的投入，他說：章賢講了，我們是投資，不是借款，我們是自己退

出的，所以不存在償還的問題。

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我是去找他借錢的，他說投資，前後投入 10 多萬元，項目通過鑒定，成功了，他說退出，也不用還錢。

我祇能作兩種猜測，一是他有意支持我，又顧及我的面子，用這種辦法送我走出困境；二是他認為農業項目開發時間長，效益不如工業項目，所以他不想繼續投資。我想也可能兩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是什麼原因，我都是要真誠地感謝他。因為他在我最困難、最需要財力支持的時候，伸出了友誼之手，投入資金派人協助，送我走出困境，到達成功的彼岸。這種友情、恩德我是不會忘懷的。

為了完善生物有機肥的商品化生產，我們繼續做了如下工作：

制定了企業標準，經黃州市標準計量局批准，我們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布了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生物有機複合肥料企業標準。

于一九九二年八月申請發明專利，并被受理。

一九九三年在國家工商局注冊了“合力”牌商標，這是生物有機複合肥的專用商標。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湖北省農牧業廳頒發肥料新產品登記證，正式批准合力牌生物有機複合肥生產上市。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湖北省農牧業廳發布公告，宣布：合力牌生物有機複合肥產品自登記之日起，可以進入農業推廣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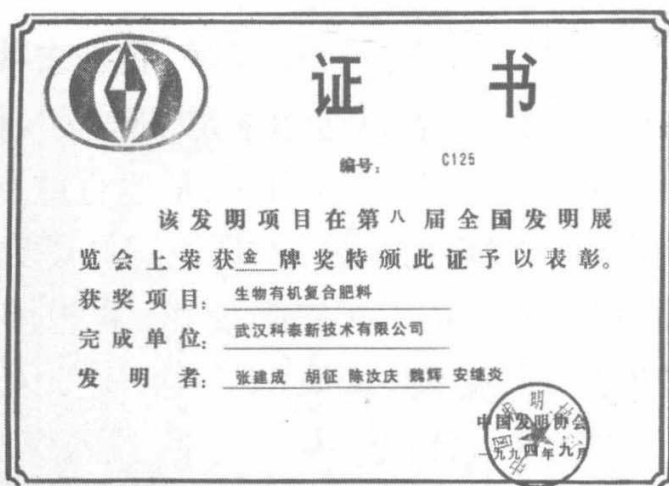
至此，生物有機肥的生產、產品銷售、質量標準、商標、專利等均辦理了法律手續。

### 7. 各方反應

項目鑒定後，《湖北日報》予以報導，并對項目作了介紹；漢南、孝感、沙市、河南鄧州、浙江平湖、四川南充等地建廠後，各地方報紙均作了報導。

《光明日報》從項目鑒定到建廠、產品應用情況三次予以報導。

一九九四年九月，由湖北省專利局推薦參加在青島召開的“第八屆全國發明展覽會”，本項目榮獲金獎。時任全國發明家協會主席的



一九九四年參加第八屆全國發明展覽會

武衡同志贊揚項目取得的成果，接見了我，并合影留念。

一九九四年九月項目獲獎後曾兩次被推薦出國展覽，一次是法國波爾多國際展覽會，另一次是印度一個農業展覽會。

《中國技術市場報》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發表專題文章《掀起中國肥料工業的第三次浪潮》，介紹生物有機複合肥的研製過程。

《發明與革新》雜誌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第五期，總第107期）發表了長篇報導《為了土地的奉獻》，雜誌封面刊登了張建成在第八屆全國發明展覽會上的照片，文章詳細講述了項目的研發過程及肥料的特點。

一九九五年五月，獲“聯合國技術資訊促進系統中國國家分部發明創新之星評選委員會”頒發的“發明創新科技之星獎”。

一九九五年夏天，應中央電視臺海外中心邀請參加“希望之旅”發明創造夏令營，製作“希望之旅”節目。我有幸在節目中向全國觀眾介紹生物有機複合肥，在央視二頻道、四頻道、七頻道多次播放。夏令營期間，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聶力同志（聶榮臻元帥之女）曾去看望營員，并與我交談，她說在青島見過我，也知道我的項目。她還與我合影留念。





中國技術市場報

1995.1.17 第四版

# 掀起中國肥料工業的第三次浪潮

## ——記生物有機複合肥料的發明者們

本報記者 李 豫

去年夏天，湖北省沙市市長說：“要吃瓜，到王橋”。一時間，王橋西瓜成了瓜中上品。也難怪它能享譽全城，誰吃上一口，都會贊不絕口，真甜！

以後，秘密被透露，原來是瓜农施用了一種顆粒狀的生物有機複合肥料。這是一種生物工程和環保工程的高新技術的結晶。這種新型肥料無臭、無害，具有高效、長效，改良活化土壤、提高作物產量和品質、促進作物早熟和增產。這種新型肥料不僅可使西瓜增加甜度，提高糖酸比，用於菜地，可增加蔬菜的維生素、蛋白質含量；用於葉片的種植，可使葉片的上中等葉增加20%。除作物品質得以提高外，與等養分化肥同等投入化肥相比，可增产10%至20%以上，並能使作物提前成熟3—7天。

這種既能大幅度地提高作物產量，又能改善作物品質，具有改良土壤肥的效果，還能節省化肥的生物有機複合肥料的發明者是湖北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所長兼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建成的和他的夥伴們。



農民們稱讚這種由有機肥、無機肥和功能性微生物菌複合而成的顆粒狀肥料為“三

合一”完全肥料。

1988年以來，在农村搞科技扶貧工作的張建成便想解決農業生產中存在的個大問題：農民施用化肥以增产，然而却造成了農作物及瓜果蔬菜的品質下降和土地的板結；農民想施用有機肥料以保證產品品質，可是，因有機肥雖然肥效長，且能改良土壤，但是單位重量有機肥中因含氮、磷、鉀養分太少，因而不得不大量施肥，既費工又不便。而施化肥簡便而且產量高。怎樣才能將這兩種肥料的優點集中，而使缺點得到克服呢？張建成冥思苦想著，到處尋找有關資料，並求師訪友，終於一個大膽的設想形成了——將有機肥和無機肥及功能性微生物菌複合在一起，使這種新型的有機肥既含有足夠的有機質和氮、磷、鉀養分，還有固氮、解磷、解鉀以防土壤板結。

設想易，實現難。然而，在高等學校甲科多年擔任領導職務的張建成有著一股強烈的事業心，靠著他長期練就的組織才能及在科技工作中的遠見卓識，他調動發揮專家們和部下的積極性、各自的专业才能，開始攻克這道難題。

1988年，他們研究的這一項目被列入湖北省科技發展計劃重點項目，並得到了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及湖北省農科院、省土肥所的大力支持，同年5月至1991年10月，先後進

行了功能微生物的選育、有機物料的發酵工藝和復混與造粒工藝的研究。

他們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從眾多的菌種中篩選培育出活性強、功效高、有應用價值的四類功能微生物，包括固氮微生物、解磷微生物、解鉀微生物和具有除臭功能的微生物。

之後，他們又完成了有機物料發酵工藝的研究，採取了有機物料（如雞糞、牛糞、豬糞等）發酵和功能微生物大量繁殖、次同步完成的工藝，既有利於功能微生物在肥料中的存活和在土壤中的繁殖，也有利於有機肥在微生物輔助下被植物更有效地吸收利用，同時也降低了生產成本。有機物料經發酵成為無臭味、疏松、中性的有機肥，不污染環境，這一技術的成功，無疑對環境保護起着良好的作用。

在選菌株和有機物料發酵工藝的研究後，張建成們一鼓作氣，又進行了有機肥、無機肥和功能微生物三者復混與造粒工藝及專用設備的研究，實現了有機複合肥生產的專業化、工廠化。在張建成他們創建的肥料工廠里，人們會看到這樣的奇跡：發着臭味、霉味的雞糞、牛糞、豬糞等進入造肥車間後，出來時便成了一点臭味也没有的小顆粒，然後通過生產線裝袋封口并貼上標籤。

1991年底，湖北省科委主持了“粒狀有機肥料的研製與效果試驗”的成果鑒定會，許多國內一流的土肥、微生物專家到會，經過嚴格的審查、論證，專

家們認為這一項目具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特点，豐富了多元複合肥生產研究的內容和方法，粒狀有機肥料的研製及肥效試驗成功，為充分開發、有效利用各種有機肥資源開辟了一條新途徑，展示了有機肥料生產工廠化、專業化、精品化的發展前景。專家們的這一論斷也被湖北省土肥站

組織的6地市15個縣區對蔬菜、瓜果、花生、棉花、烟叶和玉米等作物進行的田間試驗所證明。

1993年，張建成和大家發明的“生物有機複合肥料”首獲批准湖北省肥料新產品登記，湖北省農牧業廳發布了一號公告，而向全國推廣這一科技成果。現已建成四座年產5000噸的“生物有機複合肥料”廠，部分關鍵軟件及硬件技術超過國外同類技術，產品供不应求，企業效益成倍增長。另有多个工廠在建設和籌建中，區域遍布湖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廣西等省區。

張建成和他的專家夥伴們經過幾年的努力，終於使這項發明形成生產工藝合理可行、設備全部国产化、投資回收快、生產過程不產生污染的可成熟技術，而且原料來源广、數量多、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就地施用，不僅有可觀的經濟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不可估量的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有專家這樣認為：這種有機肥、無機肥和多功能菌肥于一体的新型複合肥料的問世，將掀起中國肥料工業的第三次浪潮。

在張建成及其夥伴的研究過程中，他們還得到台胞安維炎先生的大力幫助和支持，為了升發新一代肥料為人類服務的共同事業，他們共同創辦了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譜寫了兩岸同胞共創科技輝煌的友誼曲。在去年9月召開的第八屆全國發明展覽會上，張建成及其夥伴們的這一發明榮獲了金獎。

### 光明日報

1992年1月5日 星期二 第二版

## 湖北形成生物有機肥研產銷網絡

本報訊 記者 郭青 湖北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生物有機肥研製中心日前在咸陽市建成投產。

湖北省省有了包括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咸陽市生利公司在內的3家產銷企業，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初步構建了“生物有機肥”的研、產、銷、推、廣網絡。

“生物有機肥”是湖北省“七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項目主持人、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所長張建成任總技術負責人於1987年開始，就投入了這種肥料的研究工作，歷時4年，於1991年通過了成果鑒定，並被列入國家星火計劃。此後，他們又經過一年多的工

藝、設備研究，於1993年3月建成了第一座年產5000噸的生產廠。兩年，他們在與台灣企業家安維炎先生合作中，成立了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現在，企業建成的3座生產廠，年產量達1.5萬噸，年利稅可達300萬元以上。

這種“生物有機肥”是一種融有機肥、無機肥和功能性微生物菌三者為一體的複合肥料，具有高效、長效、改良活化土壤、提高作物產量和品質、促進作物早熟和增產等特點。二十多個田間試驗表明，施用這種肥料，與等養分或等價的化肥相比，平均增产10—20%，作物品質明顯改善。此外，作物還可以提前3—7天成熟。

日前，在武漢市農科所技術開發區召開的“農業高新技術項目交流會”上，湖北、河南、江西等省農牧廳均與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達成合作協議。“生物有機肥”技術已開始向三省轉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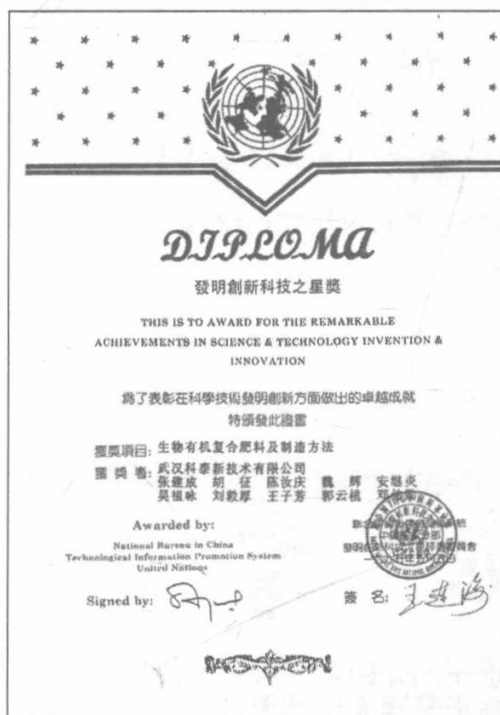
### 湖北日報

1992年1月5日 星期二 第二版

## 新聞簡報

### 我省新型農用複合肥料問世

本報訊 由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承擔的“粒狀有機肥料的研製與效果試驗”項目1991年12月30日通過了省級鑒定。這種新型複合肥料，集有機肥、化學化肥和微生物肥料於一體，有利於促進作物增產，提高作物品質，且能改良土壤，改善環境衛生。（張昂）



聯合國技術信息促進系統中國國家分部發明創新科技之星評選委員會所頒證書



一九九五年八月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希望之旅”發明創造夏令營與聶力交流



在中央電視臺“希望之旅”錄制大廳與夫人合影

### 四、成立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

生物有機複合肥的研究課題，最早的資訊來源于臺胞安繼炎先生。他對這一項目的進展情況非常關注，每年回武漢探親，總要與我見面，詢問進展情況。一九九二年底，他知道該項目不僅通過了湖北省科委主持的鑒定，完成了工廠化、商品化生產的轉化工作，而且在漢南建廠，他提出合資辦公司的想法。

經過幾次協商，他投資 10 萬美元，占股比例為 30%。有關生物有機肥料項目在建或將建廠的收入、知識產權歸合資公司所有，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中試廠歸合資公司所有，另出資 20 萬元人民幣現金。

合資公司名稱為“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註冊于武漢市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享受中外合資企業待遇。

### (一)公司的三大項目

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司成立時的慶祝酒會，也是安先生的生日宴會。

公司主要負責人是：董事長張建成，副董事長安繼炎，總經理張建成（兼），副總經理安繼惠（安繼炎的胞弟）。安子順（安

先生的大侄子）為董事、總經理助理，陳汝慶為董事、公司總工程師，魏輝為董事、總經理助理，胡征為董事、司職工程部。公司董事會由7名成員組成，台方3人，我方4人，會計由台方安排，出納由中方安排。以上是公司的人事情況。

公司下設工程部：負責生物有機肥項目的建設與經營，經理黃傑（湖北工學院老師）；開發部：負責新項目的開發，經理傅厚瑜（湖北氣象局工程師）；貿易部：負責商貿工作，經理王真榮（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教師）；辦公室：主任葉其瑤（黃岡汽車站駐武漢負責人、退休幹部），副主任王進（湖北省勞改局幹部）。

在第一次董事會上，除通過上述人事安排外，着重討論了公司的任務，確定了公司今後經營的三個項目。這是我事先準備并提出的，董事會一致同意通過。這三個項目就是：生物有機複合肥，乾式變壓



器，雙效農星液（農藥）。

### 1. 生物有機複合肥料

該項目是建立公司的基礎項目，自然是公司要重點抓的項目。我們是這樣考慮的：該項目每建一個廠，包括設計，指導施工、設備安裝、調試，直到生產出合格產品，服務費收入為 8 到 10 萬元人民幣。此外，技術使用費可以一次性買斷（30 萬人民幣），或利潤分成（10 年），比例為 20% 至 25%。建廠收入用于支持公司的日常開支，技術分成為純利收入。

當時漢南鄧家口的萬全肥業公司已基本完成建廠，孝感土肥站的康源廠剛開建，沙市王橋的津泰廠正在談，尚有河南鄧州市、福建、浙江、四川等地均已有建廠意向，形勢非常樂觀。完成這樣的安排是符合實際的，這一項目的實施即可確保公司能夠盈利。董事會決定安先生投資的 10 萬美元用于新項目的開發。

### 2.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

該項目是當時的新興產業，全國祇有廣東順德特種變壓器廠在生產，產品供不應求，認為是高新技術產品。

這個項目是由武漢變壓器廠的胡宗工程師介紹的，他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後回到武變從事變壓器的工藝及產品設計工作，申請了一個乾式變壓器綫圈製作的實用新型專利。他向我介紹了環氧澆注乾式變壓器的發展歷史與基本特點、今後的發展趨勢。他說，由于乾式變壓器能夠防水、防火、防塵，安全可靠，今後將普及城鄉，銷量很大，前景極好（現在證明了他的估計是對的）。由于進口設備價格昂貴（當時一套澆注設備要 1 千多萬元人民幣），澆注原料也控制在外國人手裏，所以成本比較高。如果我們自己設計製造澆注設備，解決環氧澆注料的配方，會給國家節省大量的外匯，變壓器的生產成本也可以大幅度下降。

我為他的熱情打動，特別是對研發國產的澆注設備及環氧澆注料，甩掉洋拐棍，我特別感興趣。我不信人家有的我們就搞不出來！我問他有沒有把握，他說有。問他要投入多少錢，他說 40 萬元至 50



萬元人民幣。我想這點資金還可以解決，於是向董事會提出了開發乾式變壓器的項目。董事們聽我介紹後，均認為這是一個有發展前途的好項目，同意列為公司開發項目。

### 3. 雙效農星液

這個項目是江西新建縣科協副主席余克鈞先生介紹的。余先生的女兒在我校上學，托我照顧，所以我們來往較多。他聽說我要辦公司，在找合適的項目，就介紹了他縣裏的一位科技愛好者吳貴華八年來研發的一種具有增產、殺蟲兩種功能的農藥，施用效果很好。因缺乏資金，一直是小敲小打，希望有人投資把項目做大。

我到江西去見了吳貴華，到了他的生產基地，訪問了一些農民，反映還好。我想我們搞了肥料項目，如果再搞個有效的農藥項目，那麼對農業的貢獻就更大了。既然吳貴華搞的農藥有既能殺蟲（主要是棉鈴蟲與紅鈴蟲）又能增產的雙重效果，所以我就給它起名為“雙效農星液”。這個項目同樣獲得了董事會的認可。

公司三個項目，兩個是農業，一個是工業，都是實用的有前瞻性的項目，符合高科技企業的要求。

三個項目中，一個有自主知識產權，兩個是引進的。當時我認為應該從社會上引進有前途的、比較成熟的項目，我們公司應該成為這種項目的助推器，注入部分資金，項目即能投入生產，產生效益，這叫“借雞下蛋”。設想得挺好，實施就不那麼容易了。

## (二) 實施情況

### 1. 生物有機複合肥

此項目建廠第一個是漢南鄧家口萬全肥業公司，于一九九三年春節前試生產成功，春節後正式生產，從此生物有機複合肥料項目有了實體，有了樣板。想建廠的單位和個人都會先到漢南廠去考察，眼見為實，我們在向客戶介紹項目時也有了底氣：不信，你去看！

孝感市土肥站早在肥效試驗時，就承擔了試驗任務，他們對肥料的效果確信不疑。萬全廠成功後，他們就籌建康源肥料公司，地點在



一九九四年參加津泰生化有限公司開業典禮

武漢市與孝感市的交界處，即府河孝感側河堤邊，遠離兩邊城區。他們對土建要求較高，占地近 10 畝，建築物除了廠房、實驗室、辦公室外，還建了一幢樓房，用于職工住宿（遠離城區，工人需要住在廠內）和

領導們的休閒娛樂，有較好的室內設施，還有麻將室和檯球室，廠區有圍牆，因此建設費用比較大。肥料廠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建成，開業典禮盛大隆重，農業部有關部門、湖北省農牧廳有關領導都參加了。

接着沙市王橋農場建廠。此廠是農場下設的企業，建廠前農場就做了充分的調查研究。先是肥效試驗，然後于一九九三年八月五日召開項目論證會，我親自到場作介紹。通過論證，經市里有關部門批准立項，籌措資金，最後決定于一九九三年底開建，一九九四年投產。

一九九四年又建了黃州台鎂肥料廠，是由安繼炎先生和黃州市糧食加工廠合資興建的。在建設過程中，由于糧食加工廠資金不到位，又把安先生的投資挪作它用，建廠又沒有計劃，引起安先生的不滿。安先生上告到黃州市政府，由政府協調該廠，到一九九五年上半年纔建成投產。由于黃州方領導沒有認真抓，致使該廠始終沒有形成生產能力。

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六年，先後在河南鄧州市、浙江平湖市、寧夏銀川市、四川南充市、福建等地建廠。這些廠規模大小不等，都是私營企業。其中河南鄧州市豐奇集團所建廠規模最大，經營較好，初建年產 5000 噸肥料，兩年中擴展到年產 1 萬多噸。銀川的董廠長經營有方，開始年產 1000 噸，穩扎穩打，逐步擴大，至今仍在生產，效益

不錯。

在這期間來公司考察的，打電話聯繫要求寄資料、寄肥料的很多，我的很多時間都用于接待、介紹項目、陪同考察。來考察的人多數是縣裏負責經濟工作、農業工作的領導和農場的領導。上海市派出了一個以陸處長為首的代表團來公司考察。臺灣有三撥人員來漢考察，擬在大陸投資開工廠，臺胞朱禹先生已決定在上海開工廠，後來條件未談妥告吹。日本有一家有機肥菌肥公司聞訊派三人代表團來公司考察座談，我們希望他們來投資，而他們提出合作推出他們的產品，同時希望我們提供菌種樣品給他們，我們當然沒有答應。

總之，這幾年中，生物有機肥項目在全國傳開了，轟轟烈烈地熱鬧了一陣，接待了很多人，寄過很多資料。多數人是真心想搞這個項目的，迫于資金解決不了，沒有成；有些人是以此名義來武漢公費旅游的；還有一些人則是科技販子，希望成為地區的代理，我在青島參加全國第八屆發明展覽會時簽了 8 份代理合同，除山東外還有東北、河北、深圳、廣西、安徽的。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七日，由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主持，召開了一個“農業高科技項目座談會”，邀請了省、地、縣三級科委的領導同志參加，參加座談會的還有江西、河北、河南等省市的有關單位領導。我們以此機會宣傳生物有機肥項目，擴大影響。項目在全國發明展覽會上獲得金獎，還獲聯合國技術資訊促進系統“發明創新科技之星”獎，中央電視臺的宣傳及有關報刊的報導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實施建廠後，我們感到該項目的推廣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順暢，存在不少問題。比較突出的是三個問題：一是投資過大，一個完全新建的廠（指從徵用土地到電源增容）投資在 500 萬元人民幣左右，這樣規模的投資，個體農民是無法解決的，而此時人民公社已解體，集體經濟開始改制，所以推廣就有困難了。二是生產設備存在不足，我們沒有有機肥生產的專用設備可選擇，都是借用其他行業的設備。有機肥生產的工况與這些設備原設計的工况不同，所以使用中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在粉碎造粒系統和乾燥系統。在粉碎造粒系

統中出現了堵和卡現象，嚴重時燒壞電動機；還有灰塵太大，我們設計的布袋除塵器不能滿足除塵的要求，給工人造成很惡劣的勞動環境。三是乾燥系統的問題，低溫乾燥造成能源消耗大和產量低。這些因素直接造成產量上不去及生產成本加大。這些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項目的推廣速度。

## 2.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開始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歐美等國，七十年代上海變壓器廠開始研製，但一直沒有大的進展，也沒有推廣應用。九十年代初，廣東順德特種變壓器廠引進了一套澆注設備，生產乾式變壓器，產品銷售很好，供不應求。那時訂貨先付款，半年後交貨，這樣引起了變壓器行業的關注。有些廠家也開始引進外國設備，使用外國的原料，產品價格很昂貴，環氧澆注變壓器的價格在當時是油浸式變壓器價格的一倍以上。

胡宗工程師的設想是用國產設備、國產原材料生產乾式變壓器。這是對的，但我們一無所知，完全依靠胡宗來實施這個項目，主動權完全掌握在胡宗手裏。胡宗說技術上完全有把握，從實施的過程看，他當時並沒有掌握這些技術，祇能說瞭解一些情況，等于是我們出錢，用我們提供的平臺讓他來進行各種試驗研究，取得資料後成為他的技術。最後雖然做出了一台樣機，但却不合格。這也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

公司決定開發乾式變壓器項目，希望胡宗能全身心地投入。他提出的條件是：先將他夫婦二人從武漢變壓器廠借調到科泰公司，然後調到政府機構或事業單位工作；買一套住房；存3萬元保證金；技術入股，股份占30%。我們研究後，基本上滿足了胡宗的要求，祇是占股比例由30%改為20%。在漢口復興村社區給他買了一套二室一廳的商品房，并與湖北省農牧業廳聯繫，以後將他調往有關單位。

我們花這麼大的力氣辦這件事，是因為看好乾式變壓器這個項目，希望胡宗夫婦能全力以赴地將此項目儘快實施并轉化成生產力。我們把這個項目的成敗看成是公司成敗的大事。



按照常規，實施項目的第一步要建廠，我們要求胡宗提出設備清單和建廠要求，以及產品設計圖。胡宗提出，變壓器生產與一般產品不同，先要生產樣機，通過鑒定。而要鑒定一個產品，必須對產品進行各種試驗，因此首先要做樣機，待產品通過鑒定後再考慮建廠。他建議在建廠之前先租賃設備，“借雞下蛋”，事半功倍。

我們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以為是為公司着想。他介紹說，武漢變壓器廠原廠長周仁生（音）在漢口有一個生產乾式變壓器的車間，設備基本上有，可以與他商量借過來用，先做樣機，這樣可以減少投入，縮短時間。我們約定了看廠房設備的時間，與周廠長談租賃方面的問題。

周廠長熱情大方，并表示一旦試製成功，他願意合作建廠，共同開發。談定租金一年4萬元人民幣，他們10個工人轉過來（其中2人自行離開，實際祇有8個人）。後來我們瞭解到，那位周廠長因經濟問題判過刑，出來後胡宗建議他搞乾變，搞了這套設備，招了這麼些人，但因缺乏經費搞不下去了。於是胡宗介紹把這些東西租給我們，以減輕周廠長的壓力。

從一九九三年三月下旬開始，胡宗進入做樣機的階段，確定的容量為160千伏安，電壓等級為1萬伏。從設計到做出樣機用了半年時間，到一九九三年九月下旬正式出樣機。

在此期間，下面的人反應很大，派去協助胡宗工作的尤書萍老師也給我反映，胡宗似乎心裏沒有底，老是變，對工人也沒有計劃安排，基本上是坐等（不知道要幹什麼）。我因不懂，不好表態，但一直關心着乾變廠的進展，從設計圖紙到繞綫圈到環氧澆注，我都是親臨現場，一待就是一整天。我要學習，我要弄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胡宗是搞變壓器出身的，他當然懂得變壓器行業的規矩，來不得半點虛假，所以在設計過程中反復計算，選用什麼樣的電磁密度，什麼樣的電流密度，什麼樣的鐵芯尺寸，電磁綫的綫規怎樣，都要仔細考慮。今天算好的，晚上考慮欠妥，第二天就要改變，又要經過若干天的計算。設計確定了，澆注料用什麼，配方如何確定，他要反復考

慮，反復試驗。這一切祇有他一個人知道，一個人做，其他人插不上手。

他晚上考慮得很晚，第二天起不來，往往中午纔到廠。晚上安排加班，工人有意見，公司的人有意見。我看在眼裏，理解他的處境，却無力幫助，也不便公開批評。在我看來，他是在做這個項目的中間試驗，沒有成熟的技術，沒有可借鑒的資料，靠一知半解的資訊，然後自己摸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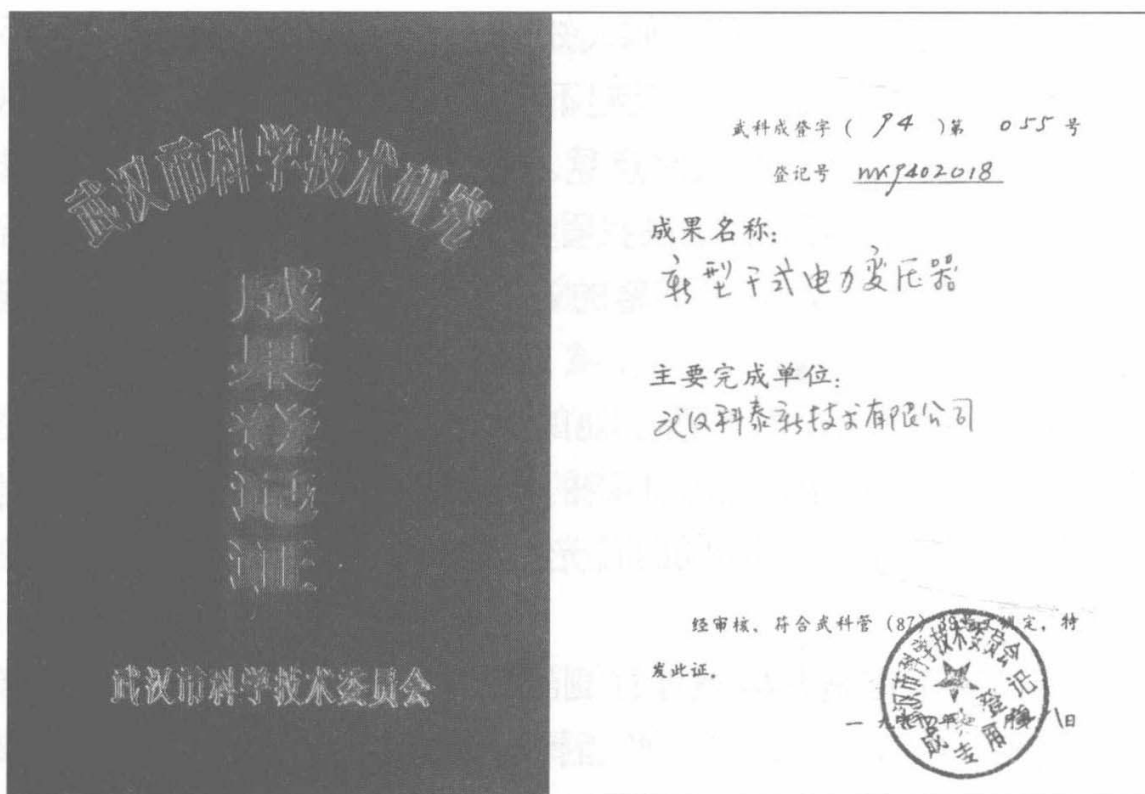
在做樣機過程中，我看清了他的所謂專利是沒有用的東西。按他的專利實施，是無法工業化生產的，產品也是不適用的。經過胡宗夫婦半年的努力，在大家懷疑的目光中和一片質疑聲中，樣機終於生產出來了。

下一步的工作是對樣機進行測試和技術鑒定。我們委托武漢高壓研究所進行測試，結果有一個指標不合格。按理是不能進行鑒定的。但我們實在不能等下去了，再新做一台樣機，又要幾個月，何時纔能進行設備設計和製造？與高壓所的老總和經手測試的工程師商量通融辦法，他們認為這個問題祇要注意一下就可以克服的，下次正式生產時注意就能解決，所以同意了我們的請求，算是合格產品，可以進行技術鑒定。

我們一方面讓胡宗負責整理鑒定資料，一方面由我聯繫主持鑒定的單位和商定鑒定委員的工作。我本意請省科委主持，但省科委提出既然是新產品，僅進行測試是不夠的，應該試用半年再鑒定，即不同意現在就鑒定。於是轉請武漢市科委主持鑒定，市科委同意，并共同商定鑒定委員人選後，發了正式的文件。

鑒定會于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在武漢水利電力大學舉行，華中電業管理局科技處長李文章任主任，順利通過技術鑒定。然後在市科委辦理了“武漢市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登記”，并發了登記證。市科委和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研究決定，推薦該項目申報國家級火炬計劃。在申報項目的推薦材料中，將我們的項目列為第二，後來響遍全國的保健品項目“紅桃 K”列為第四。

到北京後，我們沒有資金打點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而保健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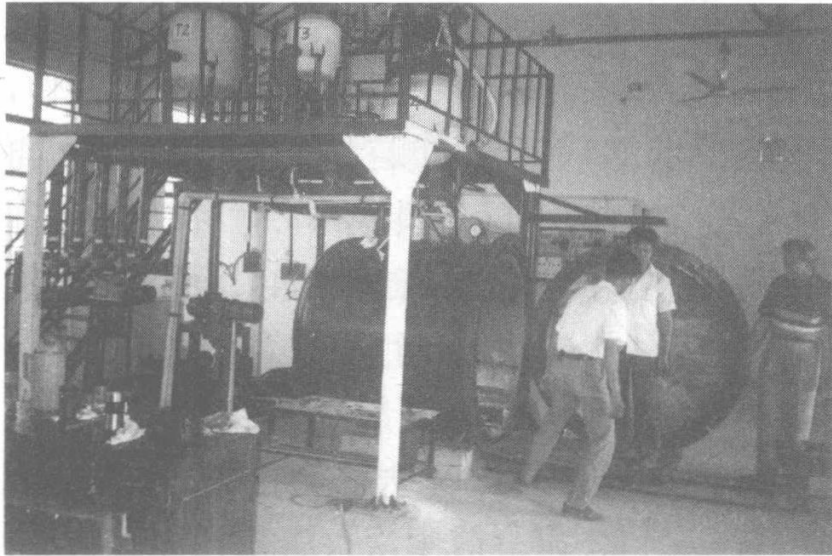


“紅桃K”項目，據知情人透露，打點費用去 10 萬人民幣，這筆錢還是貸款來的。說實話，我那時還不懂得這一套路，根本沒有朝這方面想，認為憑項目本身及當地政府的推薦，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天真的想法給了我們當頭一棒，結果我們沒有入圍，而保健品“紅桃K”項目却得了 300 萬元的火炬計劃投入，以後很快發展起來。

乾式變壓器通過鑒定後，我們兵分二路，一路由總工陳汝慶與胡宗負責，進行生產綫的設計和製造及變壓器產品的設計；另一路由我負責進行廠址的選擇和聯繫合作單位，解決後續資金的問題。

生產綫的設計按生產工藝需要，有的是購置現成的設備，如真空泵、油泵、水泵之類，有的要自己設計製造，如澆注設備、加熱爐、繞綫機等，到一九九四年四月大體就緒，六月開始租用鋼制家具六廠的廠房（武昌白沙洲陸家街），開始安裝設備，十月進行調試，一邊調試，一邊進行改進，一九九五年春節前認為可以用了。這時乾式變壓器項目已經投入資金近五十萬元人民幣，公司資金已經枯竭。

希望聯合開工廠或投資的單位談過很多，皆因認為條件不合適而沒有談成。其中有兩家我認為應該合作的沒有談成，讓我感到可



一九九四年自主設計的環氧樹脂澆注生產線

惜。仙桃市一家鄉鎮企業看好這個項目，很想把它做大，計劃投入 3000 萬元人民幣，在仙桃開工廠，把胡宗夫婦請過去，提供較好的條件。對科泰公司，希望一次性給予補償，付一筆款（比投入的

多），廠辦起來後，仍然算合資公司，利潤分成為 15%。我認為這條件是可以接受的，但討論時，台方代表不同意，認為辛辛苦苦搞的項目，拱手送人，不能接受。他們要求對方在武漢開工廠，把錢打到武漢來，人家當然不幹。該企業的地方負責人鎮長、鎮黨委書記都到公司來談，談得很坦率、乾脆。我們不幹，他們也沒有辦法。

另一家是武漢變壓器廠，該廠廠長提出，他們負責技術，投入一部分設備，如繞線機等，鐵芯由他們做，技術工人他們派，我們負責澆注設備的投入及流動資金，產品以他們的平臺來進行銷售。武漢變壓器廠是個老企業，有產品銷售管道，這樣乾式變壓器廠可以發展得比較快。然而在討論時，又一次遭到反對。反對者認為，既然武變不出錢，我們技術上沒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要拿股份給別人？銷售問題事在人為，祇要產品好，總可以打開局面。結果也沒有談成。

關於經費問題，我清醒地看到，自有資金祇能支撐到乾變廠的設備投資，生產流動資金必須另外籌措。安先生也清楚這一點，所以我們早就開始想辦法，我到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申請貸款 150 萬元，結果沒有排上隊。

開發區外經外事處對此很負責，也想幫助解決，與農行聯繫，帶我一起去談，我們把項目情況及申請貸款的報告都交給了行長。行長看後很爽快地答應說，祇要乾式變壓器具備了投產的條件，產品通



過技術鑒定，生產綫建成，可以貸 300 萬元作為流動資金，這是一九九三年十月講好的事。到一九九五年春節我們已具備了生產條件，再去找行長時，說行長已經調走了，他們不知道此事。我說：現在再辦理行嗎？新行長說，現在不比從前，不再是領導說了就可以貸，現在要嚴格審查，還要財產擔保，你們有沒有固定資產？如果沒有，就不能貸款。本來以為已經聯繫好的事，就這樣隨着行長的調動而泡湯了。

中國的事就是這樣，很多事情都是因人而變、因人而辦的。

安先生在臺灣找了他的朋友朱禹先生到大陸來投資，他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九月、十一月三次到公司。前兩次來談投資辦肥料廠，到上海沒有談成。第三次到公司來談投資，資金額為 20 萬美元，他希望按原股值的 1.2 來折算股權，但安先生要按 1.5 來折算。朱先生覺得公司沒有辦多長時間，現在還在投入，產出不多，沒有盈利，這樣的折算比例不合理。雙方沒談攏，所以他決定不投資了。我們再一次失去了吸納資金、挽救項目的機會。

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產品不能做，沒有產品也就沒有銷售。乾變廠設備在安裝調試後的一年中，祇做了三台小變壓器。

乾式變壓器環氧澆注料的國產化，我們也做了一些開創性的工作。一九九四年三月，我帶着胡宗及我院化學老師朱希珍等 4 人到湖南岳陽樹脂廠學習。該廠林工程師詳細回答了我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如為什麼不用國產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你們有沒有研究過國產澆注料的配方？能否給我們介紹環氧澆注料的配方原理、等等。林工說，日本 159 樹脂是專門用于規模性澆注的樹脂，電氣性能、粘結性能、穩定性都很好。我們引進了該樹脂的生產綫，我們叫 CYD—128 樹脂。過去中國生產的樹脂，穩定性不好，每批次都可能有變化，所以人們不敢用。現在生產的 CYD—128 樹脂穩定性好，可以用于環氧澆注料。林工接着對固化劑、增韌劑等型號、性能及生產廠家，使用時的大體比例都作了介紹。我們又請該廠的研究所為我們試驗出一個比較可行的配方。

回公司後，我們就用岳陽的原料與配方做試驗，經過小試，稍加

改進，基本可用。

胡宗就用這個配方背着我們做成了環氧澆注料，分 A、B 二組，用時混合即可，價格比我們自己配的高出一倍還多。他介紹我們到一個地方去買，用來澆注綫圈，結果發現有的綫圈出現裂縫。我不知道是他搞的，以為是專業廠家搞出來的，認為是配方有問題。我與賣方交涉，他們說是胡工搞的，等他來了向他反映，要他解決。商家不知道我和胡工的關係，胡宗的小動作就這樣露了餡。

這個配方，後來我到上海開工廠時稍加改進，一直用到現在，已有不少廠在使用。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是個好項目，前景也可以，我們投資搞成後，因沒有流動資金而沒有真正投產。但積累的技術與經驗教訓，以後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應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這也是我以後闖上海的資本。

### 3. 雙效農星液

所謂“雙效”，是指既能殺滅害蟲又能使作物增產。為了弄清該項目的實際情況，我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到江西新建縣，直接與發明人吳貴華見面。給我的感覺，小伙子有點疲乏，幾年的奮鬥，欠了 25 萬元的債務。有一個簡易的生產綫，極希望有人投資，把項目搞上去。經瞭解，他搞的“雙效”，手續基本上沒有辦，沒有鑒定，沒有系統的正規的試驗報告，沒有生產許可證，沒有登記證。

我原以為是一個已經成熟的項目，祇要投入資金就可以生產、銷售。實際情況是處于中試階段，原則上還不能稱作一項技術。但我對此有興趣，想幫他一把，讓它成為真正的技術。據此，我們提出了合作意向：分兩步走，第一步是一九九三年，我們買一部分產品到湖北試用，同時也是做試驗，爭取在一九九四年通過鑒定，進而解決產品登記及取得生產許可證的問題；第二步，正式合作建廠，把廠建在武漢，因為武漢的經濟比江西要發達些，一些問題容易解決。他也同意這個方案。

一九九三年我們購買了 1 萬 5 千瓶“雙效”，通過省土肥站、省植

保站在很多縣市試用，在果樹、蔬菜、棉花、水稻等類作物上施用，結果反映不一，一致認為殺蟲有效果，增產有效果，但不能殺蟲卵。藥效利大於弊，特別是能很快殺滅棉花上的紅蜘蛛，但 7 天至 10 天后又長出來，主要是蟲卵未殺滅之故。第二是農藥的稀釋度沒有掌握好，有些作物如果樹，按說明書濃度太大，使用後果實外皮緊縮，裏面卻還在長，造成開裂，使試驗區的臍橙損失 4000 多元。

我們弄清了基本狀態，心裏有了底。我請教了省植保站的專家，他們說這些問題弄清楚了都好解決。吳貴華曾經給了我們一個配方，經檢測是假的。因此，他給我的印象是不真誠，你留一手可以，但不要弄假。有了結果，我們認為通過鑒定也不會有多大問題。

在與吳貴華談判合作時，他提出了很高的條件：解決五個人到武漢落戶的戶口與住房；解決他在江西的 25 萬元債務；吳貴華本人占股 30%（技術投資）；新建縣科協副主席余克鈞到武漢後由我們解決工作安排，另占 10% 的股份。這樣的條件，我們是無法接受的。說實在的，根據我們的試驗和對“雙效”成份的測試，實際是幾種化學農藥的複合，然後加入了適量的增產劑或增長素（激素）。這種東西我們也可以搞出來。我不想背個竊取技術的罵名，所以仍希望與他合作。

吳貴華為了抬高身價，說有幾個公司要與他合作，條件都很好。他提出在武漢辦分廠，總廠設在南昌，我聽後覺得這個人不老實。他不是談合作，而是想通過合作撈一把。

我不喜歡與這樣的人合作，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他撈去，所以最後決定等鑒定後拿了“兩證”再說。

以上就是三個項目的實施情況，後兩個項目由於是別人搞的，主動權在他人手中，我們被牽着鼻子跑，損失了資金，浪費了時間與精力。

### （三）公司的落敗

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經過近四年的拼搏，困難越來越大，主要是缺乏資金，沒有經濟效益。黃岡所內部、黃岡所與台商安家之間矛盾加劇。一九九六年安先生宣布退出乾變的開發，不同意借款

(貸款),安家把公章及安先生的私章都控制了起來,一度使公司無法正常工作。我兩次以我個人名義,借款人民幣 10 萬元用來支付員工的工資及房租、水電費、電話費等,安先生還逼我歸還他借給公司的 1 萬美元,我處於四面楚歌之中。一氣之下,我決定離開科泰公司,並準備與安家打官司。從一九九七年開始,台方工作人員撤離,由陳汝慶教授維持,直到合作期滿結束。

回頭來看,科泰公司、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結局,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要負主要的責任。

### 1. 歷史的錯位

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時期,首先從農村開始,人民公社的解體,集體經濟開始瓦解,土地從集體耕種變為分田到戶。但是社會主義的一些制度習慣還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例如在農村,人民公社時期形成的農業生產資料先用後付款的習慣沒有改,化肥、種子、農藥、塑料薄膜等農用產品都由供銷社、土肥站發下來,等農作物收穫出賣後再付款。這種狀況給科泰公司和新建生物有機肥料廠的經營造成了無法解決的困難。

公司三大項目中,有兩個是農業項目:肥料與農藥。生物有機複合肥料在建廠初期,銷售勢頭很好,產品供不應求,越到後來越不行了,為什麼會這樣呢?農民按習慣先用後付款,企業承擔不了,流動資金鏈斷裂,各廠到後來已無法再生產。

這樣的項目,是一個有機農業的項目、環保的項目、使農牧業良性循環的項目,如果是集體經濟、人民公社時期,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公社有養豬場、養雞場,用豬糞、雞糞等作為有機原料,既解決了有機肥的肥源問題,又解決了環境污染的問題。生物有機肥的施用,既提高了土地肥力,又使作物增產,提高品質。肥料廠屬公社所有,資金由公社解決。各生產隊的用肥款,核算時劃賬。如果每個公社辦一個肥料廠,那全國該建多少廠啊!項目的生命力將長盛不衰。

歷史發展到現在,土地向少數人手裏集中,叫種植大戶也好,叫家庭農場也罷,抑或叫新型地主也行。市場經濟的建立,人們必須付



款買貨，即使個體農民，也要用現金購買肥料與農藥，肥料廠的資金鏈不會斷裂。現在大農場主也有經濟力量建肥料廠，肥料項目的命運也不會如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樣糟糕。農藥項目也是如此。

我把這種歷史因素稱為錯位，即項目的需求與歷史的現實錯位了，早也行，晚也行，唯獨在那個時期就困難重重，這叫“生不逢時”。

有人說，肥料廠的生產設備沒有完全解決也影響到項目的推廣，我認為有一定影響，但不是主要的。存在的兩大問題，在孝感廠顯得很突出，在河南鄧州張豐奇（豐奇集團老闆）那裏、在銀川董廠長那裏就不是問題。我對此作了調查，孝感的問題主要是管理上的問題，燒電動機問題在孝感廠很嚴重，一年中燒 15 台電機，原因是堵了、卡了一定要清理乾淨再啟動，否則容易燒電機。再是每天工作結束，停機後要將粉碎機、造粒機的模孔清理乾淨，否則第二天上班開機也容易造成燒電機。鄧州廠對此都有明確規定，所以沒有造成燒電機的現象。第二個大問題是乾燥設備的乾燥量不足，影響產量。設計時明確，乾燥設備的產量是總產量的 1/3，餘 2/3 是要靠太陽曬。利用天然能源可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如果全部用乾燥設備解決，則每噸有機肥的生產成本中僅乾燥這一項就需 138 元/噸，肥料價格就會大幅度上漲。鄧州廠對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他們廠的設計年產量為 5000 噸，第三年就生產了 1 萬多噸，工廠管理非常重要。孝感廠還有一個情況，每星期有關部門領導到廠裏吃、喝、玩，不僅花錢，而且也影響到廠領導的精力。他們星期天要陪吃、陪玩，星期一早上送走，已弄得筋疲力盡，等體力、工作恢復正常，又要考慮星期六晚上來些什麼人，如何招待，的確影響工作。

從各地建的十來個肥料廠看，三個是集體企業，隨着企業改制，逐步走向衰敗。個體企業主要是資金問題，自有資金不足，貸款有困難，逐步走向衰落。到目前為止，堅持下來而且有成效的還有三個地方的私營企業：鄧州、銀川、蘇州。

## 2. 資本的力量

我這裏講的資本是指錢。在我下海游泳過程中，深深地感到它

的力量。在崇尚市場經濟、私有制、資本至上的社會中，沒有錢寸步難行，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是一層意思；另一層意思是有了錢，可以為所欲為，可以高人一等。沒有錢就人前矮三分，忍氣吞聲，甚至為了錢可以背叛朋友，背叛事業。這是我以前沒有碰到過也沒有想過的事。

我為了解決科泰公司的後續資金問題，花了極大的精力。找開發區領導，找銀行領導，找合作單位，找投資者，不管到哪里，都要請人吃飯，低三下四地請他們幫助、支持，結果一無所獲，事業也不能繼續下去。有些單位有錢，那就要按他提出的條件辦，否則不成。洪山鄉有錢，同意投資乾變項目，條件苛刻，不能滿足就拉倒，討論的餘地也沒有，完全是高人一等。仙桃有錢投入搞乾變廠，條件是到仙桃開工廠，給你一筆錢，你不能參與管理，否則，拉倒。火炬計劃，明明我們的項目優于那個保健品項目，人家有 10 萬元公關經費，我們沒有錢就靠邊站，這一切都是那麼順理成章。

安先生投資科泰公司 10 萬美元，安家人一再聲稱這是真金白銀，似乎黃岡所投入的不是錢。于是一發生矛盾，就說我投入的可是真金白銀，不是來做慈善事業的。他們可以隨意指責工作人員瞎花錢，指責招待客戶吃飯的發票多開錢，弄得誰也不敢招待客人，都必須由我出面招待。黃岡所的人多是科技人員，在為三大項目的實施拼搏，安家人管錢管賬，制約開支，到後來，發展到連公章都控制使用，甚至不讓用。安先生借給公司 1 萬美元，逼我還錢，我心臟病發作，臥床不起，安家二兄弟到床前逼我還錢，後來發展到破門而入，逼我還錢，搞得我家人提心吊膽。而我為了發員工工資，借了 10 萬元人民幣又向誰要錢呢？

因為錢，項目無法繼續下去，因為錢，造成我和安先生之間的矛盾與裂痕，最後不得不分手，弄得兩敗俱傷。

### 3. 利益的驅動

我這裏講的利益是指私利。社會主義講公字當頭，資本主義講私字當頭，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批判集體企業、國營企業吃“大鍋飯”，培養了“懶漢”，不講效益，不講個人利益，人們沒有了積極性。因而，

提倡單位利益與個人利益掛鉤，提倡個人奮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

這些宣傳，對我們的隊伍產生了影響。黃岡所的同志，曾經為了一個共同目標不講條件，不講私利，艱苦奮鬥幾年，取得了項目的成功。這也是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的勝利。少數人在建立科泰公司時就產生了個人利益的訴求，反對建立公司，說辛苦幾年，現在要收穫了。黃岡所七八個人，一年建立二三個廠，大家分分就可以了，搞大了，人多了，錢用掉了，大家白搞了。

公司建立後，有的人提出股份要落實到人，要求分割。因為合資企業是台方安繼炎與中方黃岡所合資，因此股份暫時還不能分，我也考慮當時還沒有利可分，即使分了股份也沒有用，却容易讓人鑽空子。雖然給大家講了，但少數人還是不踏實，擔心將來被吃掉了。

以胡征為代表，他感到辛苦幾年，僅拿點工資划不來。一九九四年他拉着陳××，買了翻拌機的設計圖紙（翻拌機是公司出錢委托別人設計的，知識產權歸公司所有），為了私利，他們背叛了朋友，背叛了黃岡所和科泰公司，私自在外接業務建廠。我們發現後，將胡、陳等人逐出公司，撤銷了胡征在科泰公司的職務（包括董事），但却造成了黃岡所內部的混亂和科泰公司的工作困難。

有些人與我共事多年，我也一直很信任他們，但在離開公司前還不忘記撈一把。開發部經理傅厚瑜騙我說，到上海、江浙一帶去開展業務，聯繫建肥料廠，限期三個月，如三個月內一事無成，就自動辭職。他請求領三個月工資作活動經費，我同意了。一個多月後我出差路過南通去看他，纔發現原來他接了個土建工程，父子倆在當包工頭。

工程部的一位幹部在協作單位某機械廠借 2000 元，說我要他去借的，由我歸還。該廠在我公司結算時拿出借條要我還錢。

辦公室副主任王某，是我水院一位老同事的孩子，從小看他長大，是我同意把他從農場搞回來安排工作，以後批准他考大學。他從法學專業畢業，分配到湖北省勞改局工作。因我與安先生之間的矛盾，準備走司法程序來解決，他說他認識法官，可以幫忙，提出要活動

經費，我從老同學處借 2000 美元交給他。第二天法官告訴我，這個案子官司不能打，因為雙方合資合同上規定發生糾紛先仲裁，仲裁不成再訴請法院處理。我讓王交回 2000 美元，他先說明天給，後說在做藥材生意，一周後還。一周後電話打不通了，人也不見了，到他宿舍找，與他同居的女人說，她也在找他，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問他的哥哥和他媽媽，都說不知道。其實，他們都知道，就是想吞掉這筆錢。人生百態，無奇不有，為了一點小利，如此喪失人格，值得嗎？

#### 4. 自己的反省

從一九八七年開始到一九九六年底整整 10 年時間，我沒有什麼休息時間，不停地工作着、奮鬥着。科技扶貧失敗了，搞項目研究開了花沒有結果，搞公司失敗了，結果背了 60 多萬元的債務。

到底是什麼原因？這些失敗該由誰負責？

可推托的理由很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如果成功了，就不會發生這一切，也就是說，所以發生這一切，是因為沒有成功的緣故。從辦黃岡所到辦公司，都是我發起和主持的，項目是我選定的，人員是我安排的，失敗的責任當然由我承擔。我反省多年，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思想落後于形勢，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變化。我長期在高校工作，接觸社會少，尤其是接觸經濟領域更少，學習和接觸到的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公事公辦，提倡公而忘私、事業為重、大協作精神，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辦事等等。進入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從指導思想到經濟基礎都發生了或正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我是崇尚計劃經濟的，主張公而忘私的，以事業為重的，這種指導思想在一定時期還管用，如在肥料項目的研究過程中，但總的是不合時宜的，對內調動不了員工的積極性，對外不適應變化了的形勢，社會上奉行的是市場經濟、發家致富、個人利益的驅動，你還在提倡公而忘私、公事公辦，那怎麼能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呢？落伍了，又不想改變，祇有被淘汰，這是歷史的必然。

第二，主觀主義害死人。事實證明，我當初對科技扶貧，科泰公



司項目的選定，以及經營思想都是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斷，不符合客觀實際，一定會失敗。

先說科技扶貧。當時老區人民要的是經濟上的立竿見影的支持，解決吃飯問題，政府也是這樣做的。而我提倡科技扶貧，給魚竿而不是給魚，不僅拿不到錢還要投入，這從當時實際情況看反差太大，人們當然接受不了。所以說有好的想法，不一定會產生好的結果，因為脫離實際，人們不歡迎。時至今日，再去搞科技扶貧，情況可能會改觀一些。

搞農業項目，為農業服務，方向沒有錯。但農業項目時間長，投入大，收益小。這在講效益、講個人利益的時代，自己又沒有資金，祇有傻瓜纔會這樣搞。在制定肥料實施計劃時，又主觀主義地規定技術投資利潤分成，這是從支持項目開發、有利于農民的角度出發的。實踐證明，這個辦法又是主觀主義的。因為不管是集體的，還是個體的，廠一旦建成，他已經掌握了技術，再也不會需要你，也決不會再給你錢，更不要說每年分紅了。我們為了杜絕這種情況發生，用控制功能微生物的辦法。實踐證明，這又是一種主觀主義的辦法。企業為減輕成本，他乾脆不用你的微生物。我們原想統一商標、統一標準、統一供應功能微生物，都實行不了，他們要搞自己的商標和品牌。他們有的根本不造粒，直接供應有機肥；有的不放微生物，肥效差，有異味，農民不想用，到後來，搞得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鄧州、銀川兩個廠一直存在至今，并有所發展，是因為他們後來在公司買了微生物菌種，自己復壯，自己生產。

事實證明，我原先的設想很多是脫離實際的。我總是要求大家與我一樣，要朝前看，眼光放遠一點，為了事業的成功，要艱苦奮鬥。這些說教在私利面前是蒼白無力的。大家跟着我幹，是希望能得到利益，多少年的苦幹，沒有實際利益，不反對纔怪。安先生來大陸投資，為的是獲利，投資而不能得利，而且看不到得利的一天，有意見，反對我的某些做法是理所當然的。我的這些思想既不符合人們的要求，也不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潮流。

第三，固執己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最後碰得頭破血流。科泰公司的兩個後續項目，當我實際接觸以後，就認識到這是在做新的科研項目，想要獲得成功，需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物力；我也清醒地認識到，公司自有資金能支撐到項目取得成功已經不錯，要真正建廠投產，還需一大筆資金。自己沒有錢，還要堅持幹，錢用完了，項目也就停頓了。

我總以肥料項目為例，鼓勵自己堅持下去，會取得勝利的。有人也向我提出過，要快刀斬亂麻，該上的上，該舍的就舍，不要什麼都想要，結果什麼都得不到。我就是捨不得放棄任何一個項目。

在自己無能力解決資金的條件下尋求合作單位，條件要放低些，我們一味不想放掉所謂的主動權，要人家拿錢來，致使多家談判都失敗，而最受影響的應該是我們，最大的失敗者也是我們。

在公司機構設置、人員聘用上都存在固執己見的問題，不聽別人勸告。公司一成立，設立了三部二室，中層幹部就十來個，當時工作還未展開，設了廟，就要進和尚，而不少和尚既不能化緣，也不能念經。黃岡所的老人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安志順也多次提過這個問題，我都未接受，最後證明他們的意見是對的。

第四，不符合企業管理規律的工作作風。一個企業要有明確的規章制度，從總經理到員工都應嚴格遵守，形成一種風氣，像軍隊一樣，令行禁止。可我強調思想教育，有問題談一下算了，給面子。我還有一個毛病，耳朵根軟，好說話，容易輕信。所以員工有事願意找我，有時在安總那裏碰了壁，就來找我批條子，結果造成領導之間的矛盾。有些員工工作紀律鬆懈，布置的任務完不成，也不追究，經費承包不夠用了，我批准借給他們錢或追加經費，其實是有借無還。凡此種種，造成了員工不嚴格要求自己，任務完成不完成一個樣，經費承包不承包一個樣。後來我認識到在市場經濟、個人利益當先的社會中，思想工作、講大道理的確蒼白無力，很多情況下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通過反省，讓我看到了自己的缺點，認識到我的觀念、我的主張

是不符合以市場經濟、私有制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要求的，也就不能從事企業管理的工作，更不能主持企業的工作，這就是我的結論。

## 五、闖下江

“江”指的是長江，“下江”是指長江下游，武漢人把上海、江浙一帶叫“下江”。

一九九七年春，我分文全無，背負着 60 多萬元的債務，帶着乾式變壓器項目，隻身闖下江。我到下江去的目的，是尋找機會，重新開始創業，力爭把債務還清。如不行，我就在下江打工，不管多少年，也要把欠的債務還掉。

我的債務有三部分。在黃岡所時，及後來研究肥料項目時，欠下了債務。在籌建科泰公司時籌得的入股款和借款以及 4 年的紅利分成（每年 10%）由我承擔。我當時講過一句話：大家出資入股，組建公司，賺了錢，按股份紅，虧了本，我張建成承擔。因為有了這句話，本不應由我承擔的股本虧損，我要遵守承諾，由我來還。在科泰公司困難時由我出面向朋友借的 12 萬元，也由我償還。三部分合起來共有六十多萬元，當時的壓力可想而知。

這就是我為什麼決定捨棄無望的科泰公司，放棄我耗費心血搞成的生物有機肥料項目的原因。所以選擇到下江去，因為那裏的經濟比較發達，搞項目的資金較武漢好解決，還因為我是上海人，親戚、朋友、同學多，辦事方便些。

當我想到下江找合夥人建乾變廠的消息傳到上海後，很快就有了回音。我的那位親戚王國元找到了江蘇太倉市新湖鎮鋼窗廠廠長張丁元先生，他同意合作建廠，並很快來武漢見了面，談妥了條件。這是一九九七年初的事情。

### （一）蘇州新科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

新湖是太倉市西部的一個小鎮，鋼窗廠是村辦集體企業，張丁元任廠長。該廠曾經風光過，後來因開始廣泛應用塑鋼門窗，使鋼窗、

鋼門業開始凋零。當時正處於鄉鎮企業改制階段，張廠長對鋼窗廠的前景不看好，建塑鋼生產綫投資太大，他想搞一個投資不太大、有發展前途的項目，故選擇了乾式變壓器。

在去新湖之前，我對該項目的生產綫作了研究，根據科泰公司設計的生產綫使用情況，作了比較大的改變，並組織人進行了重新設計。

一九九七年三月，我帶了 4 位工程師到新湖建廠。四位工程師來自不同的單位，祇有武漢整流設備廠的高工魏天民接觸過變壓器，且都沒有接觸過環氧樹脂澆注變壓器，故從設計開始，我要向他們講解這種變壓器的特點、要求、用途，對每一件設備的作用、在系統中的位置、應該注意的問題等詳加介紹，雖然我一知半解，好多事情還搞不清楚，但也得趕鴨子上架。

從製造設備到安裝調試完成近 5 個月時間，一九九七年七月正式生產出樣機，並開始試生產，開啟了我後半生與乾式變壓器結緣的時代。

試生產證明，所設計的生產綫簡便實用，國產環氧澆注料便宜實用，這讓我放下了心中的石頭，畢竟這是我第一次獨立辦乾變廠。

在合作合同中規定，我負責生產綫的設計、安裝、調試，生產出合格產品，負責產品銷售。如今一半任務已完成，我的工作重點將轉到產品銷售上去。

根據我們廠子小、設備簡單、資金不足、無法與大變壓器廠競爭的特點，我們確定了生產小型電力變壓器的方向，重點放在高壓開關櫃中的電源變壓器，容量在 20 千伏安到 100 千伏安之間，電壓在 6 千到 1 萬伏之間。這樣的變壓器，大廠不願做，一般的變壓器廠又做不出來（沒有環氧澆注生產綫）。確定了產品，銷售也就有了主攻方向。

我第一個找的是廈門 ABB 開關公司，這是一家跨國公司，圈內比較有名，如能打入則影響較大，其他開關公司就會比較容易接受。我想不打則已，一打就要打響。我所以首選 ABB 公司，是因為我的老同學朱學聖工程師在該公司任設計師，櫃用變壓器的選用權在設計師手裏，這是我們在畢業後 30 年第一次見面時，他告訴我的。



我們的產品出來後，請他到新湖來，他認為外型還可以，質量一定要保證，祇要不出問題，選用是可以的；一出問題，不管什麼廠家，都得停用。他要我一定要保證質量和供貨時間，這樣我就有了第一個客戶。

第二個客戶，找武漢變壓器廠的戰福才廠長，請他幫忙，以武變名義搞櫃變業務，并把這部分業務交由我做。他同意了。

我又到上海變壓器廠，找周賢土廠長，他是北京電力學院畢業的，那時，我是北京電力學院動力系的書記，算有師生之誼。他熱情地接待了我，答應支持，請主管生產的陳廠長與我見面，幫助我們做鐵芯。他還告訴我們上變生產乾式變壓器所用絕緣材料，環氧樹脂、固化劑、增韌劑的型號及生產廠家，可以說他毫無保留，足見對我的真誠，我很感動。以後我多次找過周廠長，他也兩次到我們廠指導。我本想將廠掛靠在上海變壓器廠，這樣可以不做產品的型式試驗，但終因廠子規模太小，設備比較簡單，沒有談成。

新科變壓器公司在試生產期間，一度出現了產品質量問題。在做出廠試驗時高壓綫圈短路，而且連續出現，廢了近 20 個綫圈。經過對綫圈的解剖，證明都是匝間短路，這說明電磁綫的質量有問題。後來查明短路綫圈的電磁綫是從江陰一家電磁綫廠進的，該廠原來是做電動機電磁綫的，電動機的電壓一般是 380 伏，而我們做的變壓器一般電壓為 1 萬伏，試驗時達到 2 萬 8 千到 3 萬 5 千伏，所以造成短路。張廠長沒有經驗，我也未過問此事，故有此誤，損失不小。

新科變壓器公司在建設及試生產過程中碰到了很多問題，主要是資金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在與張廠長談判時，我提出投資不能少于 50 萬元人民幣，當時估算生產綫及測試設備 30 萬元、流動資金 20 萬元，也寫進了合同。張廠長口頭說沒有問題，但到建廠時，鋼窗廠已不景氣，原計劃沒有完成，收入不夠支出，更不要說拿錢支持乾變廠的建設。張廠長原來的計劃完不成，建設乾變廠的資金就沒有了來源，測試設備建設停止，產品拿到太倉變壓器廠（瀏河變壓器廠）去測試，既加大了支出，又不方便。因為資金短缺，不發工資，說產品出

來後再發，造成了武漢到新湖工作的科技人員的不滿，情緒不高。

建廠進度因種種原因落後于計劃，又成為當地人議論的話題，造成武漢人員與當地人員之間的隔閡。

我就忙着兩邊做工作，幫助張廠長找合作單位，寫報告給太倉市科委，請求支持，通過關係找太倉市領導，請求他們幫助解決經費問題。本想到新湖後祇管業務工作，誰知又要操心資金問題和人際關係問題。但因此也獲得了張廠長的信任，他認為我是真心的，是以事業為重的人，不是騙子。我們之間成了好朋友，至今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新科變壓器公司聘請胡宗為顧問，他的任務有三項，一是指導生產兩台樣機；二是在生產過程中培訓繞綫和澆注工人；三是產品設計。第一、第二個任務很快就完成了，但在如何完成第三個任務的問題上，我們產生了矛盾。我希望他將容量為 20 千伏安到 100 千伏安、電壓為 6 千到 1 萬伏的系列產品設計出來，以便我們接到訂單就可以生產；其他型號的產品，接到訂單後再設計。

我之所以這樣要求，是因為很多單位，特別是 ABB 公司，訂單一到，限期交貨，時間一般在一個月之內，有的祇有半個月，故接訂單後再設計，時間上來不及。趕時間，設計、生產都會產生問題。胡宗以沒有時間、來不及之類的話推托，不想搞系列產品的設計圖。我估計他怕設計完成後就不請他了。

後來發生了我預料中的事，一個單位因我們來不及做而取消訂單。出現技術問題，請胡宗到太倉處理更困難，來去匆匆，有時來後還沒有解決問題，自己有事非走不可。

據此，我和張廠長決定在當地聘請設計人員，請到了原瀏河變壓器廠的技術副廠長顧培琪工程師。顧工中專畢業，從事變壓器設計、製造、試驗幾十年，退休後多家變壓器廠請他設計。他來我廠看後，很坦率地說，沒有搞過乾變設計，但可以試試，願意合作。後來的事實證明，顧工是一位工作認真、業務能力強，精通各種變壓器、電抗器等電氣設備設計的科技人員。我有幸結識他，在他那裏學到了不少知識。他為新科及以後的金寶變壓器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僅在

產品設計上，而且在試驗設備的建設上都做出了貢獻。他設計的產品沒有出現過問題，開發了 30 千伏安到 80 千伏安、3 萬 5 千伏的櫃變，這是一般變壓器廠不敢做或不願做的產品。顧工的到來，讓我們在技術上有了真正的依靠力量。

新科變壓器公司從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有產品銷售，到一九九八年六月，總計銷售變壓器 30 多台，產值近 90 萬元，初始階段有這樣的業績應該是可行的。當時變壓器的售價較高，原材料價值較低，利潤也就高。我估計張廠長的投資已經回收了。

張廠長承包的鋼窗廠形勢不好，他與人合夥的稀土廠虧損，感到力不從心。我的那位親戚王國元聯繫到上海一家企業，願意投資 50 萬元人民幣，並提供廠房，希望我們搬過去合作開工廠。經過與張廠長商量，他也同意。幾經協商，算三方合作（上海一方、新湖一方、武漢一方），起名為上海金寶變壓器有限公司，於一九九八年八月搬遷至上海。

## （二）上海金寶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

金寶公司地址在上海市寶山區羅南鎮（現已併入羅店鎮），離我老家很近。上海合作方是羅南活動房廠，曾經光輝過，現已改組，成為私企，老闆是該廠的五位原上、中層領導人。該企業實際上已經不再經營，有一片廠區，有不少建築，辦公樓、廠房等都有。老闆們不能坐吃山空，想找合適的項目搞活經濟。

王國元與他們素有往來，與他們聯繫，我們事先不知道，條件談得差不多了纔找我和張廠長談。張以為是我的意思，想把廠遷到上海去；我以為是張廠長想甩掉包袱叫人去聯繫的，我們為了“照顧對方的願望”，都表示同意。所以從一九九八年六月開始接觸，很快就談妥了，八月搬遷，十月開始在新址投產。

新廠建了測試變壓器性能的試驗台。控制室是用有機玻璃做成的房子，所有試驗集中控制，既漂亮又實用，給金寶廠增添了不少成色，來考察的人一看就覺得金寶條件不錯。

我當時真感謝王國元，他做了大好事。

金寶廠從建立到我離開始終處在一種莫名的人際糾紛之中。我在這種人際糾紛中游了最後一程，讓我糾結，讓我心痛，因為涉及的人都是我的至親骨肉。

金寶變壓器公司由上海方任董事長，新湖方張丁元任總經理，我任副董事長，負責技術保障和市場開拓。上海方投入 37 萬元，除建了試驗台外，增加了一些流動資金，漸漸有了起色。一九九九年產值 120 萬元，理應盈利，但結果仍然微虧。

王國元認為總經理貪污，進料拿回扣，做假賬等等，搞得關係比較緊張。他對董事長也有意見，說投了資不管事，投資怎麼收回？對我也有意見：為什麼不讓他出任總經理？

我們三方研究解決辦法，張丁元主張辭退王國元，說有王工在他不想搞了；我是王工介紹到上海的，不好說；董事長則認為項目是王工引進的，先不要辭退。這就在張丁元心中產生了怨氣和不滿情緒。張丁元下了離開金寶廠的決心，他提出退股申請，上海方感到不好處理，于是也提出轉讓股份的要求，實際上是退股。這是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份發生的事。

我對金寶廠的前途有信心，勸二位不要放棄，但張丁元決心已定，認為祇要不改變現狀，他就無法工作。我祇有動員我的三個外甥把金寶廠買下來。他們都在金寶廠工作，覺得金寶廠有前途，決定三姐弟聯手以 70 萬元的價格買下所有股權（我的技術股除外）。

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日，三個外甥交付定金，并接手金寶公司，由二外甥任總經理，我協助他們工作。不到一個月，兄弟之間發生了矛盾，提出不買廠了。此時上海方、新湖方已退出，祇有我承擔下來。小外甥借給我 20 萬元用于支付第一筆股權轉讓費，我任命二外甥為副總經理，負責進料及業務工作。這樣的安排引起了小外甥夫婦的不滿，認為他應該當總經理，他的媳婦應該管財務。我問他，你的 20 萬元是入股還是借款？如是前者，我們另寫協定，根據投資比例確定股權，以後雙方按股權承擔公司的義務和享受應有的權利。作為我



向你借錢，按現在寫的借條辦，利息、本金按規定時間還給你。我請他們夫婦想清楚了告訴我，對我來講，兩種辦法都行。第二天他們告訴我，還是按借錢辦法處理。我以為問題說清楚了，他們也選擇好了。

實際上，他們正在研究自己開工廠的問題。小外甥是負責環氧澆注的，那時業務多，幾乎每天都有變壓器出廠。小外甥一星期不上班，就影響到產品的交貨。我去他家，他躲避不見，接着他的好朋友、負責模具製作維修的工人也不上班了，搞技術保障工作的也不來了，王工也沒有來。他們正在商量着如何自己開工廠，把金寶的業務拉過來，金寶自然就會垮。

我採取了斷然措施：辭退了有關人員，並通報所有客戶，原業務員已與金寶無關，請他們不要再和他談金寶的業務問題；所有不來上班的人作自動離職處理；立即歸還 20 萬元借款的本利。我也乘機對金寶作了一次外科手術，把不安定因素清除掉，重新培養澆注人員，招聘有經驗的鉗工負責模具的製作及維修，日常技術保障由我自己做，如變壓器的出廠試驗都由我自己做，環氧澆注工的培訓工作由我自己擔任。這是被逼無奈，但也因此讓我深入到業務領域，學到了不少東西。

我的小外甥他們在嘉定區辦了個乾變廠，從繞綫到模具製作、澆注等每一道工序的技術工人、技術保障設計人員都是從金寶挖走的。我則是一切從頭開始，困難有多大，造成的損失有多大，可想而知。不僅如此，他們還向各執法部門“舉報”金寶種種“違法”行為，如無證經營、偽劣產品、逃稅漏稅、外地人不登記等等。一時執法部門紛紛上門檢查，發現都是謊報，我們把實際情況如實告訴了他們。

不到三年時間，嘉定廠的領導之間因矛盾而分裂，廠子由我小外甥一人經營，王工又回金寶來上班。說實話，王工曾幫過我不少忙，還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沒有滿足他的願望，讓他一次次失望，纔產生怨恨，和我小外甥一起另立門戶。

金寶公司經過二〇〇一年的劫難，元氣大傷，但堅持了下來，與 ABB 公司一起開發了小容量高電壓的開關櫃變壓器，容量為 30 千

伏安到 80 千伏安，電壓為 3 萬 5 千伏。這得益于顧培琪工程師的智慧，也由于工人們的努力，每次做出廠試驗的耐壓試驗時，我總是緊張得透不過氣來，要經受 7 萬伏至 8 萬伏的耐壓試驗，讓人提心吊膽。通過試驗以後，我則如釋重負。

金寶公司跌跌撞撞地走到二〇〇四年，新的情況又產生了。任副總經理的二外甥消極怠工，上班玩撲克，不聯繫業務，不去收款，有時錢已到了却讓會計告訴我沒有到，我到處借錢應付日常開支。他這麼幹，是因為我剝奪了他購買原材料的“權利”。過去原材料是由他一手購置的，變壓器銷售也由他管。他每銷售一台變壓器總要報銷 500 元到 1000 元的業務費。對於這種產品銷售業務費，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人告訴我，他在購原材料時也吃回扣。當我掌握了他在進矽鋼片時讓對方多開發票款的證據後，我就不能容忍了，決定不再讓他購置原材料。因為這他就鬧情緒，我也懶得再去談這些事。我怎麼辦？處理他，姐姐面前如何交待？為了點錢，六親不認？不處理，公司怎麼管理？我想來想去，祇好收山不幹。

我算了一下應收應付款，還債的任務可以完成。本打算債務還清後，將金寶公司交給我的幾個外甥（加上妹妹的兒子共 4 個），讓我妹妹、姐姐的日子好過一點。但事與願違，他們中有些人迫不及待，有的公開分裂，有的暗中搗鬼，全然不顧我的苦衷和感受。我又不想發財，就此結束苦海游泳，回頭是岸，決定罷手。

二〇〇四年中，我以 25 萬元的低價將 70 萬元收購的金寶公司處理掉，轉讓給王國元和金寶廠業務員宗文其。

金寶至今還存在，由宗文其一人經營，還在掙扎着向前走，我每年回上海總要去看看。

在這裏，我付出了很多，學到了很多，也得到回報，讓我還掉了大部分債務。金寶公司的工人對我很好，我仍然經常回憶起與他們一起戰鬥的年月，懷念他們。我外甥女徐美琴、外甥婿張金興夫婦在金寶工作期間出了車禍，落下終身殘疾，令我心痛、內疚。

## 六、回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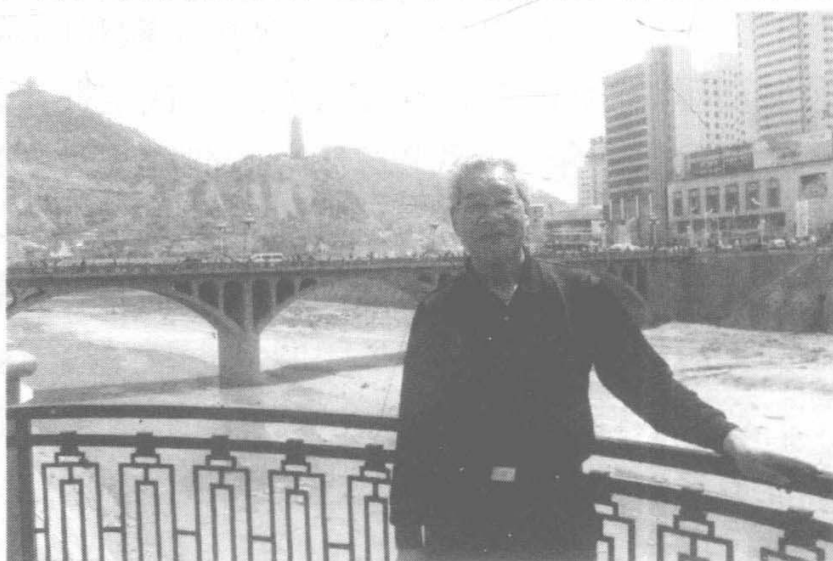
二〇〇四年六月，我結束在外漂泊的日子，也結束了那種在商海中周旋，有時還要說違心話、做違心事的日子。我回歸到了武漢的家，又可以過溫馨的家庭生活，吃上熱氣騰騰的可口的飯菜，回歸到了我自己的本來面目：一個無產者，一個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的人。

二〇〇四年下半年，我主要忙于處理債權債務，打了兩場官司，上海一場，武漢一場，都是因別人欠債不還，訴諸法律。兩場官司都勝了，法院判決限期歸還，但被告人不理會，還得去求人家。上海一家公司欠我 13 萬元的貨款，法院判如數限期歸還，他們說沒有錢，律師從中調解，還 6 萬元，我請了兩次客，送了 2000 元香煙錢，纔拿到。我一算，去掉律師費、上訴費、請客送禮費用，實際上祇拿到 5 萬元，不到 40%。武漢一個客戶欠 5 萬多貨款，說有一台變壓器壞了，祇算 4 萬 5 千元，武昌區法院判決如數限期（一個月內）歸還，我跑了無數次找被告要錢，他不是躲着不見就是說沒有。一年後我申請強制執行，至今已經 7 年了（欠款至今已十二年），還沒有如數歸還。

法院祇管判，能不能執行，他們似乎無所謂。即使強制執行，也是有名無實的。我真不明白我們的法律怎麼了，法院的尊嚴、法律的尊嚴到哪兒去了？

官方報告的，媒體報導的，和我們老百姓感受到的就是不一樣。

二十年在苦海中沉浮，身體上積累了不少病，有的是新得的，有的是原有的，由于沒有



二〇〇六年九月延安留念

時間治療而加重了。一旦負擔放掉，鬆懈了，病情就加重了。除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三種治不好的老毛病外，膽囊炎、前列腺增生、疝氣、白內障等病都突顯出來。從二〇〇五年到二〇〇七年三年中做了4次手術：切除了膽囊，同時切除了十二指腸和一半的胃；切掉了前列腺增生部分；進行疝氣修補；還有白內障手術。還了債，我心情好了許多，提高了一些生活質量，加上夫人為我精心調理，身體狀況明顯好于以前，熟人們一見，都說我比以前好了。

回歸後我注意學習，關心國家大事。我經常與一些朋友聊天，討論歷史，討論現狀，討論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如何看待改革開放。我也看正反兩方面的不同觀點的討論文章及網絡材料，提高自己的認識。心態平衡，心情愉快。

我的朋友王凱歌是武漢科學電源設備有限公司的老闆，聽說我回武漢後，希望我幫他把乾變項目搞起來。他很有事業心，一個人艱苦創業奮鬥二十多年，小有成就。我幫他把乾變生產綫建起來後，主要是控制一下澆注綫圈的質量，一周去幾次，不澆注就不去。他很關照我，要我天太熱了不去，太冷了不去，颶風下雨下雪不去。每個月發給我工資，年終還有獎金，我很滿足。到我們這把年紀，如果健康狀況允許，最好找點事做，但不能太累。我的朋友照顧我就屬於這種情況。當然我的工作對他的企業發展、產品質量提高也是有幫助的，這是兩利的事。我們之間互相體諒，合作得很愉快。

回歸後的老年生活，除工作、學習外，有時與老同事玩玩，每年回上海老家住一個月，探親訪友，生活內容挺豐富，一天到晚總有事，日子過得很快。雖然經濟上不富裕，但還過得去，年近八旬，這樣也可以了。

一個人的歷史是自己寫的，這句話我聽人說過很多次。特別在受審查期間，專案組的人、領導人找我談話時總愛講這句話。但我有時想，人的一生有許多機遇，也有很多無奈。一個人的歷史在他未走完前，有許多的可能，會走出多種的人生歷史。



就我來講，如果按照我自己想走的路，那麼我的人生歷史肯定不是現在這樣的。

我想：

如果我不到北京讀書，留在上海老家，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畢業後去工地、工廠，而不是留校工作，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我不做政工幹部，而是當教師，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我不調到電廠化學系工作，就不會到武漢，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文革中同意我調到華北電力學院，那我的歷史又會怎樣？

如果……

人生有太多太多的如果，但實際上沒有如果。

人生的歷史不完全是自己寫的，但主要又是自己寫的。

短暫的人生在歷史的長河中祇是一個瞬間，但却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足跡。此中是是非非，任人評說，但願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初稿：二〇一三年五月于武昌

第一次修改：二〇一三年八月于武昌

第二次修改：二〇一三年九月于武昌

第三次修改：二〇一四年二月于武昌

## 跋

近二十年以來，投身文化革命運動的學生、工人、軍人、幹部，已有不少人記錄這歷史事實的文字面世；作為文革最先發動和青年學生運動最先崛起的高校領域，可能是書寫回憶錄最多的地方，但高校當年的領導、幹部（含教師），寫出來且公開出版的并不多。我讀過的有清華大學當年主持校黨委工作的劉冰寫的《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有北京大學聶元梓寫的《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有內蒙古師範學院高樹華老師口述的《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這裏是剛讀到的，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今并入武漢大學）當年主持團委工作的張建成老師撰寫的回憶錄。他一九六五年調水院做團委書記，恰好我就在該院讀書，讀到他的自述——特別是他個人經歷側映出的武漢水院文革歷史，自然有另一番感受。我畢業離開武漢以後，初識者知我曾在武漢水院上學，往往恍然大悟，要麼是：“啊，就是王力去講話的那個水院！”要麼是：“啊，你們學校有個張瑞謹（著名泥沙專家）嘛！”這個地球村很小很小，水院的歷史，水院裏個人的歷史，就這樣與國家的政治、文化緊密聯繫。

讀了張老師的回憶錄，我不禁想起——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憤怒指出：“從這次鎮壓學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動看來，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我看該處理。”他質問：有人講團中央“三胡”糊裏糊塗，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有什麼糊裏糊塗？

按張建成老師回憶的史實，他所在的武漢水院團委，沒有在一九

六六年的“五十天”裏積極參與鎮壓學生，後來反而積極支持和參加了青年學生運動。我們知道，張老師在當時業已列入學院文革運動“五人領導小組”成員，按常例，他完全可能順勢執行、參與和積極投入湖北省委、水院黨委組織鎮壓學生的行動。共青團是黨的助手，政治工具嘛，團的領導幹部理所當然是接班人培養對象，且不少高校團的幹部在文革初期皆如毛澤東批評的那樣——沒有支持學生運動。誠如毛澤東在書寫《炮打司令部》前抒發的那種義憤，團中央暫時被處理了，而全國對文化革命不理解而參與了“五十天”壓制群眾的各級幹部，無需人人過關、個個打倒。不過，在毛澤東去世以後，隨着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運動被徹底顛覆，這時“該處理”的不是參加鎮壓學生運動的人，却是諸如張建成老師這樣投身于革命群眾運動的團委幹部，如與武漢水院同為水電部下屬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團委領導幹部，都成為本單位的造反頭頭，結合進省革命委員會，文革以後皆被清查并入監多年。張老師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唯一因參加文革運動被開除黨籍的幹部。這裏面有一些偶然因素，所以原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余英曾感嘆張建成老師“生不逢時”。但我讀了他的回憶錄，結合我對水院歷史的瞭解，我覺得文革十年，秋後算賬，最後輪到毛澤東曾經贊成的人和事被處理，確是必然。我想水院內外，只要不帶偏見的人，讀了這本個人回憶，都能得到這個印象。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等尚能挺身保護反蔣學潮裏的進步學生；六十年代，共產黨高校的領導和共青團幹部，居然不能挺身保護和支持擁毛學潮的造反學生，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社會，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了？

毛澤東認為共青團應該支持學生，那是因為共青團就是做青年工作的，團幹最接近、最理解青年學生。我在做教師時也常常傻想：為什麼當年學校做教育工作的領導和教師，竟不瞭解不理解自己的學生，忍能將純真向上、熱誠衝動的青年打成“反革命”呢？當然，這

涉及如今政界、學界認識大相徑庭的關於“五十天”問題，我們還是回到張建成老師作為共青團的“異數”問題上來。他的回憶比較細膩地記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一月的心理衝突過程，懷疑、離開管理他制約他的單位某些黨領導的過程，這是多數曾忠誠于當年“馴服工具”傳統政治的基層幹部真實而痛苦的過程。我觀察過一大批院校青年工作骨幹（包括團領導幹部、輔導員、教師、學生幹部、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他們能夠響應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號召，逐漸真正投身于文革群眾運動，有一種很平凡的真情，即他們認可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熟悉和理解青年思潮，他們不同意把文革運動變成又一次在青年學生中的反右運動，他們普遍有一種政治傾向，嚮往進步、正義，他們已不認為個別基層黨領導就一定代表黨組織、代表黨的正確路線。他們理解一九六六年形勢怎樣也不同于一九五七年。大量個人文革回憶陳述了這一事實。

我覺得，在張建成老師文革前的生涯裏，潛伏着也綜合着他站到或游離于造反學生一邊的多種複雜因素，相信讀者均能從文中看出來。而水院團委集體造反，他們理解與同情造反學生，也非一日之功。張老師是一九六五年春隨北京電力學院電力系科成建制調到武漢的。此前，武漢水院的幾屆學生業已經歷了中蘇論戰的學習、四清、教育革命多個政治活動，《國際歌》天天激蕩在校園，那是震撼學生心靈的幾年。同時，在院團委的直接組織推動下，國防軍體和革命文藝活動，非常活躍，特別是水院學生游泳渡江、文藝演出，聞名武漢三鎮。誠如張老師的回憶：毛澤東關於教育的春節講話傳達、毛澤東與王海容談話精神貫徹，是驅動張老師本人和師生奮起、解放思想的關鍵。實際上，到文革運動爆發前夕，學校的生活已經開始進入“頭腳倒立”的時代。我始終覺得，武漢水院之所以在文革時期在三鎮乃至全國有那樣的影響，不能忽視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業已積累、聚集的突出政治的能量和青春奮發的能量。水院團委集體造反，帶動一批政治輔導員造反，張建成老師成為水院造反派的一個頭頭，非他



一人之力。當時團委副書記王紹良，從中央團校受訓回來，在我們年級繪聲繪色地客觀介紹了北京六、七、八月運動情況——他曾被那個“該處理”的團中央派去做北京某中學工作組組長。他的宣傳的直接結果，就是促成了一些同學立即去了北京，並參加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接見。

如今“211”了的武漢大學一片鶯歌燕舞，櫻花爛漫，產業化教育的銅臭和斯文掃地的超級腐敗浸淫着校園，文革過去了三十幾年，一切都沿着當年試圖改革的原路倒退回去，偏有一個水利電力大學的“活古董”在記憶文革、記載歷史。在這個曾經發生過學潮與“六一慘案”（一九四七年，武大學生參加中共領導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受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的地方，爆發過文革學生浪潮的地方，從學校當局到新編校史都在竭力要年青一代回避最不應該忘却的文化革命歷史，沉湎于洋文、網絡、卿卿我我，深陷于自我美好憧憬的新一代，幾乎不知道半個世紀前東湖邊究竟發生過什麼。老一輩的人，可能有平庸之徒正對張建成老師的回憶竊竊私議，罵這“文革餘孽”又鑽到文革舊事裏去。

我想起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改良主義》中也恰好講過：“又‘鑽到’革命那裏去，在已經改變了的環境中始終不倦地努力鼓吹革命，努力準備工人階級力量去實現革命，——這在改良主義者看來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主要罪惡，就是革命無產階級的過錯。不要‘鑽到已經被打敗過一次的那個地方去’，——這就是叛徒和一遇見失敗便灰心喪氣者的聰明想法。”列寧對政治庸人和機會主義者批判得多好！

列寧還說過：“他（馬克思）指出，德國反動派已經從人民的意識中完全抹去了 1848 年革命時期的回憶和傳統。這真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它說明在對待一個國家的革命傳統的問題上反動派負的是什麼任務，無產階級政黨負的又是什麼任務。反動派的任務是消滅這些傳統，把革命說成是‘瘋狂的自發勢力’（這是……德國員警式資產

階級的歷史學家們，甚至說得更廣泛些，是德國大學教授歷史學家們，形容 1848 年的用語)。反動派的任務是迫使居民忘記革命時期所產生的豐富多彩的鬥爭方式、組織形式、思想和口號。愚蠢地贊美英國小市民的維伯之流力圖把憲章運動，把英國工人運動的革命時期說成是簡單的兒戲，是‘年輕時的過錯’，是不值得認真注意的幼稚行為，是偶然的反常偏向，而德國的資產階級及歷史學家也同樣藐視德國的 1848 年。反動派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也是這樣。這次革命直到現在還不斷激起狂暴的憎恨，這證明它直到現在對人類的影響還具有的生命力和力量。”(見《反對抵制》)馬克思和列寧這裏說的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有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資產階級的學者(諸如馬克思研究的法國復辟王朝時期的史學家)不能正確認識他們本階級的革命歷史，我們頭頂“無產階級”冠冕的歷史學者不幸也淪為這樣的資產階級史學者，不能正確、科學地判識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這也恰恰說明這場失敗了的革命運動對中國的影響和深遠的生命力。

張建成老師的回憶，另一個重要啟示是文革運動凸顯的幹部問題。

好些文革的回憶著作，出自普通群眾之手，反映的主要是運動中的群眾。固然，群眾是文革運動裏最活躍的因素，群眾活動是最可深究的問題，但文革運動畢竟是一場全民性的黨政幹部整風，對幹部問題認識不足乃至缺失，是迄今文革研究的短板。我們當年學生群眾的眼界，可能更多地是對教育方法、階級路線、機械呆板還是生動活潑教學、培養革命接班人還是所謂“紅色工程師”、教材優劣、師生關係、先進落後的人為分野等等問題的關注，開初多以為文革就是單純的教育革命，什麼黨的幹部路線或幹部人事關係，幾乎是學生難以捉摸和深入的問題。張老師的回憶，陳述了黨的傳統教育培養教育他、黨組織重用他，文革運動後期上級黨組織試圖使用他的過程(湖北省委和水電部都試圖提拔、重用這位文革湧現出來的老團幹部，這是不能回避的事實)；同時，回憶又以個人視角觀察，記錄了武漢水利電力

學院院、系一大批領導幹部在文革前、運動中、改革開放以來的衆生相，從一個文化單位角度，為研究提供了較豐富的幹部人事與社會心態的素材。武漢水院在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調整中從武漢大學剝離出來，融匯了各學校和地方的幹部，是一所新型的重點工科院校，如要與清華大學、武漢大學那種名牌老校做比較，會有很大的區別。不過，清華大學在五十、六十年代作為全國高校的楷模，清華治校的經驗——特別是清華培養、管理幹部的特色，無不經教育部、高教部、湖北省高教廳的條條指導，貫徹與普及到水院。事實上，文革之前，武漢水院也十分認真地貫徹過以清華蔣南翔為代表的“高教六十條”式的規範整頓。在上述學生群眾關注的學校問題背後（抽象到毛澤東說過的學校的問題是培養什麼人的問題），不能不上升到用什麼樣的幹部，走怎樣的幹部路線的高度上。文革以後，一些本校和外校的同齡人，多次嚴肅地談到自己學校的領導，究竟是不是修正主義者和“走資派”的問題，我覺得，無論是清華大學的蔣南翔們，還是水院的院領導們，主觀願望都是在按當年黨中央的部署精神，按當時的教育制度和路線，在努力工作，對中央內部的思想、路線分歧，多數不甚了了。文革運動裏學生群眾對學校原來教育制度的懷疑、批判，也來自于當時經黨委傳達、貫徹的上級正面精神和社會潮流的推動。儘管這些領導可能是不自覺或半自覺地貫徹執行，個別人心底有抵觸，口頭上不敢表露。文革激進學生群眾當年不滿意的狀態，與高校現狀基本還是兩回事，畢竟當年還是理想主義主導下的高校教育。儘管水院也如清華大學提倡的“做不漏氣的發動機”幹部路線那樣，最終是走向個人集權管理、背離理想。

但是，張老師披露的學校幹部路線、人事制度上的種種弊端，不能不是讀者可以深思的問題。在這樣的文化單位，開始出現立黨為私、任人唯親，張建成老師在文革的特殊條件下脫離了這種異化了的黨政體制，自然被體制邊緣化，從而外在地體會到水院幹部體制的某種荒謬。應該講，水院的問題，不一定在運動前就充分暴露，也不完

全在運動初顯現，“五十天”中對群眾的鎮壓僅僅體現其部分問題。同時，原體制也曾拋棄、打擊部分領導幹部，來運作荒唐的“運動機器”，但原體制的領導個人，畢竟在疾風暴雨裏自身難保，失去文革運動的話語權，造反運動致使此機制一度失靈。但在運動後期，幹部逐漸解放出來；特別是文革運動遭受清算，教育秩序恢復，步入“改革開放”以後，體制性的弊端就充分暴露出來。八十年代以來，高校校園理想蕩然無存，犬儒化彌漫招搖，普遍步入庸人治校時期。平庸和實用主義充斥校園，幹部培養與晉升，成為商品交易，學術空前腐敗，有人假公濟私、名利雙收，有人周遊列國以圖文化“接軌”，有人藉購置、營建大發橫財，有人辦學受賄索賄、變賣文憑，有人為教不尊——聚眾賭博、權色(權錢)交易……這些“人”，決非一般下層幹部。

水院沿着舊有的“為私”幹部機制，逐代領導被推往前臺。

教育領域，真個是：金玉在外，敗絮其中。

就在高校領導層藉“改革開放”走向政治、文化、經濟全面腐敗的同時，提前退休的張建成老師隨著改革潮流，步入民間科技開發的行列，自我有所作為。有意思的是，同在武漢、與水院同屬水利系統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原團委副書記、長辦造反組織頭頭顧建棠，為了生存，也走向了體制外的科技發明、創業之路。

路遙知馬力，日久識人心。我們上學時耻笑過的“假左派”、“假馬列主義者”，他們一收當年打“右派”、“反革命”、“五一六”的兇惡形象，現出媚洋媚修的原形，成為學校裏實質最右的人。在所謂對組織忠誠上，有人常顯變色龍特性：既可忠實于某前領導個人，又可擇機拋棄。二三十年過去，黨已不黨。領導層如此，人心不再思教，難怪高校會“水博士”、“爛碩士”泛濫了！

武漢人嘲笑宏偉的“211”工程，嘲笑水院、武測、湖醫與武大合并說“武大——大了，武水——水了，武測——拆了，湖醫——糊了”。實際上，即使沒有風靡一時的合并到武大的“211”壯舉，在這種大環境和幹部路線下，武漢水院也勢必“水”下去。



誠然，張建成老師的記憶和描述、判斷，出自他個人的視角和思考，水院主要領導群的個人是否確實如此，水院不同的人還會有各自不同的認識。但有一點令人確信：文革全過程的確是觸及了和袒露了水院每個人的精神，如今，顯然不是用“派”來審視一個人，而是用品質如何來看一個人，誰個優誰個劣，大多數水院的過來人，感覺基本上是一致的。

政治品質，自然是治黨治校、幹部路綫的一個關鍵。

這個回憶，涉及到一批高校的領導幹部，包括水利學院的老院長——他也亮相于群眾運動，支持自己的學生革命造反，被視為“五一六”的後台；同時，回憶也涉及到一些校外的省、部領導言行，涉及到一些參加支左的軍人幹部。這些人，都是文革歷史研究較為寶貴的對象。

在此將一些讀後感受記下，代為跋。

碧 峽

二〇一四年春